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21

10.911

778

1.22

出版社

973806

10.911

778

T.21



巴金全集

10.911

778

T.21

第二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巴金全集

(第二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228-0/Z·38

定价 13.00 元



偕叶圣陶摄于北京叶寓(一九七八年)

84183/01



《断头台上》、《俄罗斯女子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书影



偕曹禹摄于沪寓院中(一九八二年)



在上海寓所(一九七八年)

目 录

断头台上

致读者	3
呈献给“吾师”凡宰特(代序)	5
改编本书的几句说明	7

第一部 断头台上

一 断头台上	9
二 圣人利索加布(Demetrius Liboguh)	12
三 战士阿新司基(V. Ossinsky)	15
四 一个英雄中的英雄——麦秀根(Hypolyte Muishkin)	18
五 自由之战士——席米特(Peter Petrovitch Schmidt)	31
六 革命之虎——盖尔书尼(Gregory Andreilvitch Gershuni)	38

第二部 自由血

一 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	55
二 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的生诞(存目)	
三 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	123

四	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	138
五	东京的殉道者	154
六	死囚牢中的六年	175
七	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198
八	死者与生者(杂记之一)	202
九	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叙事	207
一〇	殉道者的遗书	235
附 录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	243

俄罗斯十女杰

绪言	261
一 薇娜·沙苏丽奇	279
二 苏菲·包婷娜	288
三 游珊·海富孟	297
四 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	301
附 录 圣彼得堡旅行记	330
五 薇娜·妃格念尔	340
六 路狄密娜·福尔铿席太因	389
七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	397
八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	456
九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	464
一〇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	497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前记	517
再版题记	519

第一章	司顿加·拉进与第一次革命	522
第二章	蒲加鸠夫与农民暴动	530
第三章	拉狄穴夫与知识阶级之觉醒	536
第四章	十二月党与民主主义	539
第五章	赫尔岑与西欧派	557
第六章	巧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派	579
第七章	毕沙列夫与旧虚无主义	587
第八章	巴枯宁与自由社会主义	597
第九章	拉甫洛夫与伦理的社会主义	613
第十章	奈其亚叶夫与秘密结社	621
致树基(代跋)		639

断头台上

《阿头台》一九二九年一月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署前甘著。

致 读 者

到我底墓前不要带来你们底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当我底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地来到我底墓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
我不要灵柩上羽毛飘动荡漾，
我自有死之荣光星一般明朗！
我默默地放我底手在胸膛上，
且让我和平地睡在我底墓场。

不要用你们底怜悯来侮辱我底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存在这荒凉的都城，
你们还要忍受着绝大的惨痛和苦辛！
我静睡在我底永久安息之坟墓之内，
只有我，只有我啊，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生活之苦难与惨痛再不能降临到我身，
从今后我既无困苦啊，又无悲哀之感情，
一切人间的苦难都已梦一般消去无影！
我安静地睡在我永久安息坟墓之内，
对于我，对于我啊，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生物哟，为什么这般惧怕黑暗？
对于那将临的惨痛为什么这般胆寒？
看罢，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我的家园！
从今后不要再敲你们底悲哀之丧钟，
因为对于我，我如今已经是意足心满！

——借用支加牙殉道者柏尔森司在
上绞刑台以前数小时所作的歌

呈献给“吾师”凡宰特(代序)

许多时候以来就想呈献给你的东西，到现在才预备好，但是你那曾经写出使得千千万万的人流过泪的文章的手已化成灰烬，它们不能够摩抚这本小书了。这一双肥大的手非但不曾流过任何人的血，抢过任何人的钱；而且它们还十分慷慨地把你自己的心，自己的血挖了出来，倾了出来，平等地分给所有的人。可是人们因为不能够报答你的恩惠，便把你送上了电椅。二十世纪中两个最好的人就这样地灭亡了。

人本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古今来多少有利于同胞的人大都不见容于同类而得着悲惨的命运，何况你们这两个“无名小卒”“卑贱的工人”，所以你们只有死了。

你在电椅上，在最后一瞬间，还像神话上的耶稣那样高呼“宽恕”。我知道在你的那颗爱字铸成的心中是没有“憎”和“报复”存在的。然而我却常常犯了罪了，因为我违背了你的教训去宣传憎，宣传报复。

据说在你临命前的一月中我也曾给了你一个深的影响。然而现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宽恕了。吾师啊，原谅我，我是不能爱人的，我是不能宽恕人的，我所要宣传的不是宽恕而是报复。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

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献给你这一本书，几年来我的血和泪都在这里了。吾师，请了解我。

改编本书的几句说明

信爱同志把我的几篇旧稿集在一起编成《无政府主义殉道者的壮剧》，与《无政府主义者略传》合并出版，加上一个《革命的先驱》的题目。这是一年前的事了。

现在《革命的先驱》第一版已经售完，书店方面预备再版。我乘此机会把《断头台上》几篇稿子抽了出来，略加删改，又加上两篇一万多字的未发表的稿子，和一篇“附录”编成小书，以这样的形式呈献给读者诸君。

萧 甘

第一部 断头台上

一 断头台上

一八九二年在丕芝波格刺杀美国资本家福利克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后来在他的《狱中记》内这样的写着：

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除了把他的生命拿来为着人民牺牲而外，更无其他的目的。

他是人类的战士，他把他的生命贡献与人民，帮助人民斗争。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使“自由的胜利”早日实现。他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当他人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来生活与享乐的权利。

柏克曼虽然不曾在断头台上贡献了他的生命，但却被活埋在“人间地狱”内整整过了十四年，受尽了无限的苦痛。这几句话是他的极诚恳的呼声，我们谁能不为之感动呢？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俄国青年革命党人恰是这样：

热心于改革事业的青年的眼前，自然会显现出那些苦于饥寒，疲于劳动，尚不能立足的农民，以及那匍匐于阶级的特权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的面影了。他

们见着那无数无慰安，无休息，无快乐的，死于劳动的人们的苦痛，便不得不拔剑而起。他们现在得到了对于“应当怎样做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他们所下的断案即是要建设平和的理想乡，不得不靠着刀剑的力量。青年们以火一般的热诚，高唱着自由的福音，讴歌着劳动阶级的救济，

这些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锦衣，弃玉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足穿木皮的旧鞋，离开了生身的故乡，辞别了慈爱的父母，走上了农民游说的旅途，一路去宣传他们的主义。或入山间的僻地和樵夫猎人共谈大义，或到田畔风暖之地与农民为伍，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一瞬间，把社会的同胞主义的福音传与农民。

他们的意志比铁石还要坚固。什么死刑的宣告，什么西伯利亚的流罪，在他们看来是毫不足畏的。……

他们恰如初世纪的耶稣的使徒，不恨仇敌不憎他人，以至诚博爱之心和严格的态度走上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一同消失去了。（见司特普尼克的《地下的俄罗斯》）

俄国虚无党人某曾有一首题为《断头台上》的诗，很能表示出革命的殉道者在断头台上一刹那间的心情，又足为上面所引的司特普尼克的记载的印证。虽然我的译文异常拙劣，但多少总能把原文的意思表现出来。

再见罢，不幸的乡土哟！

再见罢，我的亲友们哟！

我的末日快要到临。
看呀，绞绳已在动摇，
刽子手已在旁等候。
要是说我生前不能为你们的幸福
充分地贡献了我的生命，
那么，请原谅我，朋友们哟！
我无限地爱你们，
我的爱是无限的。
再见罢，请原谅我，绞绳已在动摇了。
周围虽是无穷的黑暗，
我的心地却是异常光明。
这是去到民众中的我的最后呼声：
为着自由，真理，爱的缘故哟，
不断地向前猛进！

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从那时起我便尽力搜集关于此类的材料，这几年来的搜集也有了微小的成绩了。在寂寞得忍受不住的时候，便写下一点东西，现在把它们整理了一下，编辑成这样的一本书呈献给读者们，想来对于那些伟大的殉道者，大家总愿意认识的。

以上的话不过是个引子，现在才说到正文。

二 圣人利索加布

(Demetrius Lisogub)

著名俄国革命党人司特普尼克在他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内曾批评当时的几个俄国革命党人说：“司特潘诺维奇(Stefanovie)，组织家也；克东门司(Clemens)，思想家也；阿新司基(Ossinsky)，战士也；克鲁泡特金，煽动家也(此时克氏还是一个青年)；利索加布，圣人也。”这所谓圣人利索加布究竟是什么人呢？

司特普尼克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为着商议传播虚无党的主义和俄国生活的特征于青年间的方法，出席于所谓学生会。此种集会自然是为俄政府所严禁的，然而在“白恐怖”最盛的时代，他们居然能常常秘密举行此种集会。这一次是讨论把当时革命青年所组织的各种秘密团体结合于一个组织下面的问题。

这个结合问题经过几次的讨论，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各团体的主张是不一致的，所以结合终于是不可能的。这一次的讨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半信半疑，讨论也渐渐没有活气了，大家都觉得索然寡味。这时候一个青年愤激的站了起来。于是满座的视线都向着这一个人。

这个青年颜色苍白，身軀瘦长，蓄长髯。他的音调没有抑扬顿挫，始终都是同一的调子，恰如微风过树梢，树叶在私语

一样，听了令人起一种特别的感觉。他的服装极其朴素，而且还破旧了。

闭会后，与会的青年们三五成群的散去了。只有司特普尼克和一个友人同这个青年还留着。这个青年的外套是很宽很薄的，虽然在这零下二十度的严冬里。他向那个友人招呼了一声便走了，因为穿的衣服很单薄，要使身体暖和一点，便跑得很快，不出数分钟便不见了。

司特普尼克便问他的友人道：“那个是谁呢？”

“就是利索加布。”这是友人的回答。

利索加布本来是一个大富豪；拥有土地、家屋、山林等巨大的财产。但后来全部的财产都贡献于革命运动，他的生活比较他从前养的奴隶的生活还要困苦些。

在当时的虚无党人中最清廉最正直的理想人物，不得不推利索加布。他的人格之优美，全党人中没有能出其右者。虽然在其他的同志中也有不少的人尽了物质上的贡献，但要像利索加布那样的人却不可多得。他除了革命的大义而外，再没有别的念头。家庭不能羁绊他，恋爱也不能束缚他，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牺牲了，自己过着极贫苦的生活，每天吃冷面包几片，咖啡一杯，也不觉得苦，然而身体却渐渐的衰弱起来了。友人们有时劝他不要过于刻苦，他并不听从他们的话，他常常回答说：“我的生命是不会永久存在的，”他下了极坚定的决心，即除了为着革命运动外，绝不多花费一文钱。无论如何，车是绝对不肯乘的。然而对于贫穷的人却肯帮助。侠义热诚的两种美点，他兼而有之。

他有一个亲戚，假若他死了，他的财产便可以落在他的亲戚的手里。为着这个缘故，他的亲戚便向政府告密说利索加布是革命运动的经济负担者。从此他的财产便失去了，革命的团体也因此失了一大助力。利索加布所最引以为奇耻大辱的，便是那残酷的裁判官，——不问是非理由，不听别人辩护，只凭着自己的成见来判定他人的罪的裁判官的判决。这种无慈悲的打击，限制了他的自由活动，使他在这短促的苦痛生涯中感觉到人间的残酷的侮辱。

由于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财产管理者德利可(Drigo)的告密，他便于一八七八年秋天在阿狄沙被捕。这个卖亲求荣的德利可居然得了利索加布的财产四千卢布。政府所凭借的本来只有这些不仁不义的举动。那么，对于这卖亲的人自然要大加奖励了。

政府所能发布利索加布的罪状，只是消耗自己的金钱，并无何等表面的罪迹，充其量只能判个四五年的徒刑，或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已。然而那个残酷的裁判官依据了德利可的证言，便判决利索加布的死刑。

利索加布以冷静的态度处之，而且拒绝提出减刑的请求书。于是在一八七九年八月八日便和西瓦诺夫(Ciuvaroff)、大卫丁可(Davidinko)二人一起被押赴死刑场。他不仅泰然自若，而且还愉快的微笑着，和这两个同伴畅谈。

这是他的不幸生涯中最幸福的一瞬间！

全俄国的虚无党人听见了他的死耗，都流涕的叹息说：“圣人死了！”

三 战士阿新司基

(V. Ossinsky)

我们既已知道司特普尼克所说的“圣人利索加布”，便不可不知道他说的“战士阿新司基”了。

阿新司基是一个极富于活动性的人。今天在东，明天便在西，出没于俄罗斯全土，特别是所谓活动之中坚的南方司特次堡。他好像风伯的化身一样，他的活动有如电光，他离开此世界又如疾风一般。

阿氏于一八五一年生于顿河之罗士德，其父为将军之大地主。然而他却能抛弃富贵，置身于社会革命的运动。在他十一岁的时候，某一天听说他的邻家遭强盗抢劫，他便拿了他父亲的猎枪，奋不顾身的跑去。而这个邻家却是杀他父亲的仇敌，在遭难的时候，他反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救他们。就这个举动已可表现出他的勇敢和仁爱了。

他的活动的本领实在利害得很。凡俄罗斯南部的一切革命运动他都以非常的气力去参加，而且总较别人更努力更勇敢。在他的面前，便是素来不十分努力的同志也要鼓起勇气去做事。这很可看出他的人格感化力之伟大。

革命团体的经费向来是异常枯窘的。然而他的筹款的本

领却是异常之大，一万或五千的款，在他是很容易筹措的。所以，俄国革命团体之能组织无数机关，为政府之大敌，而进行刺杀俄皇之大计划，他的力量也不小！

他的信仰极其坚定，他的行动极其勇敢。他不是有组织手腕的人物，却是一个多血多情的人。遇着实行问题的时候，便是他的独擅场了。他总是拚命去做的。

总之，与其说他是理想之人，不如说他是实行之人。他曾助农民暴动的领袖司特潘诺维奇逃狱，又曾刺杀检事哥德欧来维于基辅。因为哥德欧来维曾以残酷的手段对待女囚犯，他便去刺杀哥氏。

阿新司基号称“虚无党之鬼将军”，然而据司特普尼克说他却是鲜如旭日，柔如杨柳，凛如梅花，金丝发垂于颈际的美男子，而且是富于女性的人，并非残酷嗜杀者流，如官吏那样。

他于一八七九年三月末被捕，五月五日受死刑的宣告。他的态度异常安静，泰然的等那死之降临。判决后他的母亲同着他的十六岁的妹子到狱里来看他。他一面拿减刑的话安慰他的母亲。一面低声向他的妹子说：“我不久便要离开这世界，请你以后代替我好好的孝养母亲，还望你自己保重。……”这时候他的心中充满着对于母亲妹子的爱情和对于政府官吏的憎恨，在这爱与憎在他心中交战之际，又想到不久要到爱而不能爱和恨而不能恨的境地，眼见着在他面前悲泣的年老的母亲，年幼的妹子，和旁边立着的残酷的狱卒，这时候，他真是痛苦万状，然而他并不悔恨，因为他知道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

他于五月十四日偕同党安德诺夫(Antonoff)，布兰脱勒(Brontner)上断头台，在这一天他曾送了很长的书翰与他的同志们和亲友们。只此信函已可使他不朽了。司特普尼克说：“这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手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块不朽的纪念碑。”这是不错的。

在断头台上，他目击同党的酷刑苦痛，而且想到这种苦痛不久就要降临自己之身，这一瞬间，热血铁肠的阿新可基的感慨如何，是大家可想象得到的。他的面貌突然变了，头发一根根的直立起来。便是素来残忍的宪兵狱卒，目击这种情状，也受了极大的感动，希望他哀求减刑。

然而他并不求减刑，泰然自若的立在刑台上，

照例牧师是要来献十字架，代他祈祷的。但当牧师来的时候，他掉头拒之，且笑着说：“我不知道有神，也用不着祈祷。”又向台下的观众说：“为我呼一声俄罗斯的好青年。”众人照这样做了，他乃笑面就死刑。

四 一个英雄中的英雄——麦秀根

(Hypolyte Muishkin)

一个英雄中的英雄。

蒲列路克在他底名著《俄国之英雄与女杰》中称麦秀根为“一个英雄中的英雄”，这是不错的。

麦秀根是一个农奴底儿子。相貌堂堂，有一个雄伟的头，美丽而聪明的相貌；面部的表情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很能镇静，又有决心的男儿。他底精神力是如此坚强，而且十分纯洁。他不畏一切，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工作异常热心，对革命之信仰差不多到了迷信的程度。他是一个天生的雄辩家，他在法庭的演说甚至把沙皇底元老院员、警察、僧侣都感动了，其中有的人竟哭起来，甚至昏倒了。这一切都是麦秀根底特性，居然使得一个农奴底儿子成了名满全俄的人物，屠格涅夫在他底晚年也曾想拿麦秀根做主人翁写一部小说，不过死阻止了他，这部小说便没有出现于我们眼前的机会。但从这件事也可证明麦秀根底人格感人之深。

麦秀根出身农奴家庭，父亲被征为兵卒，得不着一切的公民权利，而且在当时情形之下，所有这一类的兵卒不仅自己

底身子属于沙皇，就是自己底儿了也是属于沙皇的。在七岁的时候，这类人家的小孩就被政府派人领去，安放在一种特别国家机关即所谓“营寨”内，从这时起就受着兵士的训练。他们底教师都是退伍军人或老弱残兵。这般人都是性情暴躁，不懂得教育的人，他们底唯一办法就是打。因此在这些“营寨”的小孩们竟死得像苍蝇一般，其中身体强壮的，才得活着受完这种教育，而长成为正式兵卒。

麦秀根也是在这种环境中发育起来的，幸好他底身体有铁一般的坚实，所以能够忍受一切的苦痛，受完了这种军人教育。毕业后，因为他底天资惊人，居然被派送到莫斯科测量学校读书。在那里毕了业，就做了一个住在圣彼得堡的将军底秘书和传令官。

这时候正是亚历山大二世治理的初期，沙皇很有意实行各种改革计划。这将军发明了一种俄文速记术，使麦秀根学到了。有一次沙皇叫将军当面去试验他底新发明。将军把麦秀根带进冬宫去，试验结果，成绩很好，而这个未来的革命党人居然得了他底死敌（沙皇）底奖金二十五个卢布。

这件事发生后，麦秀根就被任命为政府速记员，他因此又做过许多事，获利不少。后来自己便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印刷所。

二

一八七三年有四个青年女郎从阿尔张该尔到了莫斯科，

她们由一个老妇领着到莫斯科来寻找工作，她们都愿意做印刷工人，其中有两个已经学到了排字的手艺。她们都是一个政治流放人家庭底女儿，幼年即受着福利洛斯基(Bervi Flirosky，著名俄国著作家)与华拿拉斯基(Woinarsky，彭沙省治安判事兼地主)二人底照应和教育，这两人都是因有了自由思想而被流放到阿尔张该尔的，所以这四个女子也染了自由思想，她们偶然走过麦秀根底印刷所，便走进去要求工作。麦秀根立刻答应了。他很同情她们。

麦秀根底思想有许多地方和这四个女子底相同。因此他们五个好像是一家人，并没有什么店主与工人之分。她们又劝麦秀根印刷当时被检查官所禁止的以及革命党的书籍，他也答应了。从此麦秀根便在印刷所中设了一个秘密印刷部，专门由这四个女子负责。这就是麦秀根从事革命运动底开始。

在一八七四年春，华拿拉斯基从阿尔张该尔回到萨拉托夫，在那里开设了一家鞋店。这鞋店就成了秘密出版物底中央贮藏所，凡麦秀根所印刷的革命书报都用大箱盛着，外面贴上签条，标明为皮靴、皮革等。这年全个夏天他们异常热心地从事宣传工作，把这些书报广布于凡尔加流域各省。

然而在同年七月，萨拉托夫的鞋店底“阴谋”被警察发现了，由此警察又知道这鞋店和麦秀根底印刷所间的关系。于是宪兵去麦秀根底印刷所实行搜查，发现了大批革命书报，全体工人被捕。而麦秀根本人因事未在莫斯科，得免于难。但几年来的心血至此完全付诸流水了。

三

现在麦秀根真是“一钱莫名”，而且也没有朋友，但他决定无论如何总得和专制政治继续奋斗。他极力思索想找出一个散布革命种子之最好方法，他后来得着结论道：最先应该找出一个极得人心的革命领袖来，这个人要所有的革命党员都能信任，而且他也能够鼓舞起所有党员底热诚。麦秀根到底寻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当时被活埋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的政治流放人巧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shevsky)。

巧尔尼雪夫斯基基本是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因一篇《告农民》的宣言被判决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一八六四年五月巧氏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广场中听放逐之宣告，旁观者塞满了路途。官吏读毕宣告文后，听众争投花环于巧氏底面前，表示敬爱之意。从此这个“青年底领袖”便走向西伯利亚的荒原去了。

巧氏未去西伯利亚前，一八六三年曾在监狱中写了一本小说《我们应该怎样做？》。此书一出，就成了一代急进青年底纲领，儿子反抗父亲的纲领，而且是当时正活动的虚无主义之福音。每一个青年读到这本在监狱中写成的小说，再想到着者在冰天雪地上的困苦的放逐生活，未有不被感动的，巧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成了当时革命青年底领袖了。巧氏到西伯利亚时，沿途曾有革命党人几次计划营救，但都失败了。

麦秀根觉得救出巧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是振兴革命运动之

惟一善法。因此他最后便决定一个人去实行这计划。

巧氏当时被囚禁在亚洲东北部最荒凉的小城威留斯克。麦秀根便乔装为宪兵队官，假造政府命令，说叫他把巧氏迁移到一个新地点。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俄国本是很平常的，似乎没有大的困难。然而西伯利亚既是冰天雪地，又少有人烟，交通更是不便，加以威留斯克属于一个极大的省份雅苦次克，面积很广。麦秀根一个人以有限的金钱来担任这种工作，走这样的路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但在麦秀根，世间并无不可能的事，主意既定，就只有奋勇地向前做去了。

麦秀根经过了艰难的路程之后，终于到了伊尔苦次克。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宪兵官佐，他以他底辩才和举止，得到了那般人底信任。不久居然在宪兵队中得到了一个副官的缺。做了副官以后，他很能尽心职务，更得上官底欢心。

在几个月内麦秀根就达到了他底目的，他把宪兵队里的一切秘密文件以及秘密印信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便伪造了一个命令给威留斯克知事齐科夫，说内务大臣决定把巧尔尼雪夫斯基移到黑龙江畔B城，归麦秀根押送。命令造好后，麦秀根就在宪兵队里辞了职，离开了伊尔苦次克，向威留斯克出发了。

四

威留斯克位置在雅苦次克西部几百英里，是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城，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半野蛮人，俄国居民甚少，还有

些政府官吏，每月从雅苦次克通邮信一次，当时更没有电报和电话。麦秀根假装为一个宪兵队长，骑着驿马，装出重要军官底架子，一直跑到齐科夫底家里，把假造的命令交给齐科夫看，叙说他底来意，问齐科夫索人，齐科夫一点也不怀疑，便很客气地接待政府的钦差。

齐科夫走到监狱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巧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不知怎么齐科夫又忽然起了疑心。据说是因为他看见麦秀根只身来此，并不带一兵一卒。本来一个钦差到西伯利亚时，决不会不带卫兵，况且麦秀根又负着重大的使命。这一层麦秀根在事先也曾想到，但他受着经济的限制，实在找不到人来冒充卫兵，所以只得冒险。

齐科夫对于麦秀根既有了疑心，便不肯让他把巧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带走，当天随便找了几句托辞支吾了过去，答应第二天交人。

这晚上齐科夫又变了主意，他决定把这个消息通知住在雅苦次克省城的总监。麦秀根知道这消息到了总监那里，便会发生意外。他自己决不能够留在威留斯克待捕。所以他说他也愿意直接到总监那里去。齐科夫又派了两个哥萨克兵保卫他，说钦差是不能没有护卫的。

麦秀根现在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地位了，但他无法拒绝，只得带了两个哥萨克兵向雅苦次克省城出发了。

三个人都带着刀和枪。那两个哥萨克兵很强壮，而且一路上十分严厉地监视着麦秀根，显然是齐科夫命令他们这样

做的。麦秀根知道形势严重。然而他还是异常镇静，安静地筹划着怎样能够从这两个猎狗底爪中脱逃出来。

他们三个人是在七月七日离开威留斯克的。一路上穿过原始的森林，越过崇山峻岭，见过各种自然的美景，流览过威吕河与利娜河挟巨浸以入北冰洋之壮观。这些地方都是人迹所罕到的。高的山岭回响着熊、狼、狐以及他种野兽底叫号。就在这里麦秀根不得不实行脱逃了。虽然他明知道要在几百里以外才有人烟，然而此时不脱逃，以后还有脱逃的时候么？

还有一件事更使麦秀根不得不早早实行他底逃走之计划。原来在他们出发后几点钟，忽然另一个哥萨克兵追了上来，那个人停了几分钟，和保护麦秀根的两个兵士谈了几句话，又向雅苦次克飞驰去了。麦秀根听见那第三个兵士说他带着重要文件应该在他们三人抵省之前交与总监。这件事显然表示麦秀根这一次失败了。若不及时逃走，自己将会陷入罗网。

他们三人走入利娜河畔大树林中的时候，他便钻入树林底深处。那两个兵士立刻追上去，并且放了几枪，然而并没有打中他。一个兵几乎把他捉住了，幸好他一转身，放了一枪打伤了那人，最后居然逃掉了。

麦秀根整整在树林中过了一个礼拜。他以为总可以逃出罗网了，然而忍受了一个礼拜的种种苦痛之后，他依然落在政府底手里。这七天中他所受的苦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在白日里树林倒很暖热，而在晚间，潮湿和冷气却是异常难受了。终日终夜听不见人声，只有狐啸狼号来打破自然界底

岑寂。

齐科夫知道了麦秀根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立刻派遣了远征队四处搜索，到后来终于把麦秀根发现了。然而那时候的麦秀根因为饥饿、寒冷、力尽的缘故，已差不多变成了一具死尸。

麦秀根被监禁在伊尔苦次克过了几月，然后才被解送到欧俄，囚于彼得保罗垒内，等候审判。

五

麦秀根在彼得保罗垒中差不多过了三年，常常被锁在床上，他不断地叫号，邻室的同志们都听见了他底声音。一八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所谓“一九个人案件”开审了，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正月。本案中一共有九百多个证人，是从俄国各处召来的。被告共二百六十八名，但未开审时已有七十五人毙于狱中了。

麦秀根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当裁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便开始演说道：

“我想，我们底最近的目的并不是在创造革命，乃是在保证革命能得着幸福的结果。因为并不一定要做预言家，才能预先料到人民底绝望的与困苦的情形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人民大暴动，这是谁都知道的。我们底职务只是在尽力使革命能给人民带来可能的最大幸福，使人民不要被西欧资产阶级底狡计所骗，西欧人民在战垒上流了腥血争得来的利益，全被那般人利用去谋他们个人的利益去了。俄国人民是不能受

他们底欺骗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底实际活动便应该含着统一与融合革命的力量及热望，坚守着两个基本的革命潮流：一个潮流是近来出现的，而且在知识阶级中已经有了大的势力；第二个潮流是更广、更深，决不会竭尽的，这就是民众的潮流。一八七四年到七五年的一切运动都是志在结合此等革命的要素，志在决定地组织起社会革命党。不管社会革命的战士对于某种问题，各人底意见是不同的，然而他们却也能在一个重要共同点上结合起来。这一个共同点就是：革命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完成，革命是为人民底福利而起的，因此非得着人民底赞助不可，换言之，现存政府底秩序只有在人民自己不愿意它的时候，才能够被推翻……”

麦秀根底演说几次被裁判长打断，而且被禁止发言。但麦秀根仍努力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底同志们预先声明不肯在法庭上答辩的事是很对的。……现在谁都明白在这里是不能够说真理了，在这里一说到每一句真实的话，别人就不准被告开口了。我现在有绝对的权利来说这不是审判，只是一幕简单的喜剧或者更坏一点的东西。……”

他又叫道：“如果我这个因政治上犯罪而受审判的人，在这里竟不得着允许来批评政府，那么，我要说你们所表演的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庭而是一幕毫无内容的喜剧，而且还是更可耻的东西。”

裁判长听见这样的话便叫宪兵把麦秀根带出去。然而他底旁边的两个被告便站起来，保护着他，不让宪兵近前。麦秀

根又叫道：

“不错，这法庭是比一个妓院还要坏些。在那里不幸的女人为了免得饿死的缘故卖掉了自己底身子；而在这里那般元老院员，以及贵重堂堂的高级官吏，为了巨大的薪俸的缘故，竟像娼妓卖身一样卖掉了荣誉、真理、正义与法律，卖掉了他们自己底灵魂以及别人底生命，卖掉人类心灵所最宝贵的一切。”

这时候一幕可怕景象发生了。很多的宪兵与警察向着被告扑去，拳打他们，把他们拖出法庭去。裁判官和律师都站起来了。妇女们也昏倒了。有许多人大叫道：“野蛮人，谋杀犯！他们要杀死被告们了！”

审判就这样终结了。结果麦秀根“罪”最重，处十年徒刑，剥夺去一切公民权利。麦秀根先被囚禁在哈可夫监狱。哈可夫监狱是出名的人间地狱。政府特派的卫生监察者都布洛斯拉文教授在一个正式报告中曾说，这不是活人所宜居住的地方。然而麦秀根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他是不畏一切的。他又准备实行逃狱的计划。

麦秀根决定了逃狱的计划后，便开始用一块木板在他底囚室里墙角下掘一个地道。在夜间他脱了衣服装成一个人形睡在床上，而自己偷偷在墙角下掘地道，狱吏走他底囚室门前经过，看见有人睡在床上，也就毫不疑惑，麦秀根底工作在费了几个月的苦工之后居然完成了。有一天他正钻入地道打算逃走，谁知恰巧一个狱卒跑了进来。于是麦秀根又被拖了出来，改禁在另一个更“安全”的囚室里。

麦秀根知道一切逃狱的计划都是没有用的了。他恐怕自己也会像许多的同志那样发狂，便决定要设法死掉。然而在监狱里就是自杀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最后就决定犯一件侮辱狱中长官的事，因为根据俄国法律这是该处死刑的。他怀着这个目的，就向狱吏要求礼拜日到狱中的教堂里去祷告，这个要求自然得到了允许。他利用这机会在礼拜日那一天便当着大众在教堂里打了典狱长几下耳光。他自己以为因此就可以被处死刑了。但事实上别人已把他当做了疯人，并不去管他。

不久麦秀根和一部份政治犯一起被遣送到东西伯利亚的加拉矿山去了。这一次的长途旅行对于麦秀根倒有好处，他底精力和健康就因此恢复了。在伊尔苦次克他又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原来一个名叫德莫科夫斯基的政治犯在途中病死了，到了伊尔苦次克时大家便举行那人底葬礼。麦秀根走近棺材底前面举起他底手像一个预言家那样，作了一篇极其动人极其雄辩的演说，所有参加这葬礼的人都被他底演说感动了，甚至于牧师和狱吏也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前来干涉他。麦秀根在猛烈地判决了专制政治的死刑以后，便以这样的话来收场：

“然而，同志们哟，千万不要畏缩，也不要失望。从这个崇高而英勇的人（以及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底死灰中将要生长出为俄国的自由之树来！”

在麦秀根演说完毕之后，牧师似乎才醒了转来，便开始来诅咒这个人。而狱卒就把麦秀根拖出教堂去了。从此他又被带进监狱里，而且因此又被判了十年惩戒罪。

加拉政治犯监狱也是一个极其凶恶的人间地狱，麦秀根

被囚于其中，受尽了各种苦痛，但他决不灰心。他又筹划着逃狱的方法。这监狱里面有几座不相连靠的楼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工场。这工场是和那围绕着全监狱的木棚相邻近的。犯人在工场里作工，白天可以在天井中散步。晚饭后犯人便被锁在各人底囚室里，一个狱吏照例查狱一次，在每一个囚室门口略一张望。只要看见犯人是睡在床上不作声，就算了事。麦秀根底逃狱计划，就是在工作完毕后躲藏在工场里，等到晚间便爬上工场底屋顶，再达到木棚，爬过去就可逃走了。然而困难也是有的。第一、木棚底尖头比工场底屋顶高；第二，监狱外面四角和大门前都各有一个站岗的守兵，是全武装的。这五个全武装的守兵日夜不息地轮流守望，犯人逃狱后很难逃过他们底眼睛；第三，犯人既然躲藏在工场里，那么狱吏查夜时看见囚室里无人，岂不会立刻发现他们底逃狱计划么？

然而麦秀根和其他的七个同志居然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在囚室里装好了假人睡在床上，逃避在微光之下查夜的狱吏底眼睛，他们四对人在两礼拜之内相继逃了出去。然而最后的一对人不留心，一爬出墙便落入一团污泥中，因此引起了守兵底注意。守兵便向逃亡者放枪，然而因在夜间，很难命中。于是全监狱都被扰动了，检查结果才发现共有八个囚犯逃走了。显然逃狱者是预备向太平洋岸走去的，以便乘船去美洲。政府方面立刻组织远征队四处搜寻，各方追赶。

这八个人底逃走发生于二八八二年四月，然而在几个月之内，政府居然把他们都寻到了。麦秀根和另一个同伴已走了二千英里以上的路，但终于在海参崴，快要上船去日本的时候

候被捕了。

麦秀根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被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囚在最著名的人间地狱亚历克西半月堡内，有几个民意社的党员还被活埋在那里等死。在半月堡内麦秀根又曾几次想法煽动起囚犯底暴动，但均未成功。后来所有半月堡内的囚犯都被移到号称为“俄国巴斯底狱”的席吕塞尔堡，麦秀根自然也在其中。

至此麦秀根一切希望都断绝了，生活成了难受的苦刑。他便决定死。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故意打了典狱长底脸，立刻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就在堡内卫城中被枪毙了。

五 自由之战士——席米特

(Peter Petrovitch Schmidt)



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沙皇底“宪法宣言”公布后之次日，塞瓦斯多颇居民也和其他俄国城市居民一样举行庆祝，欢迎俄国革新的新纪元之到来。他们同时又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在塞瓦斯多颇地方监狱门前聚集了数千人，这算是一个和平的请愿运动，要求狱长把狱中的政治犯释放出来。到场的群众中也有不少的妇人和小孩，而且大家都没有携带武器。

狱长回答说他自己希望在几分钟以内，宪兵队大队长就会到狱，下令释放囚犯。群众静候了几点钟，仍没有得着一点消息，渐渐有些人不能忍耐了。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就有人想打进狱门，然而站在狱内天井中的一队兵士已开始向他们放枪了。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出其不意的，群众中死伤多人，于是大家便如鸟兽般逃散了，但枪弹还从背后来追他们，结果死伤数在四十以上。

沙皇底“宪法宣言”被人民底血染红了。这算是血祭！塞瓦斯多颇居民底怒潮沸腾起来了，市公会便议决将此役死难者举行公葬，全城各学校各机关都关门一日，表示纪念。这一

天参加葬礼者除本城全体居民外，还有从附近各区来的人。

在死难者底墓前，有人作了几篇动人的演说，其中尤以席米特底演说为最沉痛。他底最后的几句话是：

“这些死难者以及其他无数专制政治下之死难者底灵魂，从他们底坟墓中起来诉之于我们，而且问我们道：‘这新预约下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享受不到了，你们要拿它来做什么呢？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够得着自由之利益呢？我们是否就是压迫之最后的死难者呢？’

“同胞们，我们现在应该来安静那些死去了的人底苦恼的灵魂，把他们所愿望的约言带给他们。让我们现在宣誓罢！我们苦斗了多年，作了无数的牺牲而争得来的人权是决不能损失丝毫的，是决不能甘愿放弃丝毫的，至于我，我愿这样宣誓。”

群众深受感动，一致地答覆道：

“我们宣誓！”

这是十一月五日的事，就在这天晚上席米特被捕了。他底罪名就是在墓地上作了那样激烈的演说。谁知道在几天以前，沙皇曾发布“宪法宣言”承认人民底言论自由权这一回事呢？

二

现在我们且来略略考察席米特之为人。

席米特曾在俄国志愿军舰队中服务多年，在最近几年间

又是巡洋舰“Diana”底司令官。他曾受过高等教育，办事极有才干，但并未失掉人性。性情豪爽，度量宽大，待人又十分诚恳，所以很得同事底尊敬。他对于部下，并无长官气概，全舰的水兵都忠心于他。他底亲密的友人们常说席米特和他们谈起现存制度之专制时，每每拊膺叹息。他是何等地渴慕自由时代之到来。

三

席米特被捕之消息传遍全城后，海陆军人大为愤怒，其中有革命信仰的军人便乘机猛烈宣传，渐渐得到多数人底同情。大家议决在十一月十一日起事，果然在那一天就把席米特救了出来。席米特出狱后便被叛乱的军人推举为领袖。叛军把巡洋舰“O.”占领了，升起革命党的旗帜，拥戴席米特为该舰底司令官。一艘驱逐舰、两艘鱼雷艇也加入了革命舰队。港内还有几艘战舰，上面也有不少军官和水兵同情于叛乱者，但他们还不敢公然附和。

海军既然举起了叛旗，城市的陆军也起而响应，同时也有不少的市民出来附和。游行示威的事是常发生的。民众都同情革命党，然而实际上的活动者却只是少数人。席米特发出几次宣言，警告人民，要求人民底援助。在几天之内席米特本人真正成了塞瓦斯多颇全城和舰队底主人。

在十一月十五日，最后的悲剧发生了。这天天气很好，十分暖和，好像在春季一样，海水异常平静，群众聚集在大街上

望着港湾里的革命舰队，向叛乱者欢呼，鼓起他们底勇气。舰队底一切动作，岸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席米特本人乘着一艘水雷艇，带了一队武装水兵开到各战舰旁边，向各战舰的官佐宣传他底主张，并要他们与他联合。著名的一艘战舰“P.”本名为“波顿金亲王”，曾在这年七月暴动，在罗马尼亚被征服，因改名为“P.”。这艘战舰上的官佐欢呼响应席米特，决定加入他底舰队。席米特又去到运输舰“P.”上，把被囚在那上面的前“波顿金亲王”号的叛兵完全释放了，又把他们带到“O.”舰上去。岸上的群众看见这样的情形不禁热情欢呼，庆祝席米特的胜利。

席米特又带了五十个水兵再到“P.”战舰去。他们未受著何等抵抗就登了“P.”舰，逮捕了舰长和不服从的官佐。他把这些俘虏立刻送到“O.”舰上，他底意思是拿这一般人来作“人质”，有了他们在“O.”舰上，那么一旦开战时，岸上的兵就不会向该舰开炮了。这些俘虏共有一百多人，上级军医安多洛夫亦在其中。据安多洛夫自述，席米特曾向他们演说他底政治主张，想感化他们，使他们也加入革命党。席米特又告诉他们，他不久会得着全俄工人总同盟罢工底支持，而且他已经得到从俄国各地方来的七百多封祝贺与鼓励的函电。

然而这时候城里当局正在预备战争。圣彼得堡政府底命令下来了。在这一天以前席米特还和城里当局通消息，但这一天他底三个使者都被逮捕了。而且席米特亲眼见着米海尔炮台上安了枪炮对着“O.”舰，预备开放。炮台与“O.”舰间的距离仅有四百码光景。

在午后三点钟时分，岸上的政府军队开始向城内反叛的军民射击，政府军队用来复枪机关枪。同时炮台上也预备向“O.”舰开炮了。席米特看见形势险恶，便发出信号通知炮台说“O.”舰上有俘虏多人。俘虏们也派代表到炮台去要求炮台司令官暂不开炮。但炮台方面并不回答，而从堡棚、炮台、战舰三方面大炮同时并发，齐向“O.”舰射击。于是“O.”舰便只得用大口径的枪来回击了。

“O.”舰受了五十多弹便焚烧了。这时候正是晚上，大部分俘虏从“O.”舰逃了出来，居然被政府方面的战舰援救了。至于“O.”舰上的叛兵呢，也都逃入水中，有的得救，有的淹死，有的中弹而亡。席米特本人和他底一个十六岁的儿子溺水到了一个友舰上去，但后来这艘战舰也被征服，他们父子二人就被擒囚于战舰“P.”中。

“P.”舰上的官佐曾用种种酷刑拷打席米特，后来席米特被移到堡垒中时，一位太太去见过他。她出来以后曾将访问的情形函告俄国自由党首领米林科夫教授。我们现在从她底信中录出一节如下：

席米特自己敬廉地向我叙说那些官佐施于他的种种残酷的苦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父子被剥尽了衣服，一丝不挂，立于甲板，又有极其强烈的电光烧灼他们底眼睛。他们得不着食物，又冷又饿。父子两个后来便睡在一起，紧紧抱着使彼此底身体暖热。所有走过他们身旁的人都辱骂他们。有一次席米特要求人给他们父

可一点水喝，但那高级军官向他叫道：“闭嘴，不然，我要用拳头来堵住你底咽喉”；……

四

席米特和其他三个水兵卡斯尼克、格拉可夫、安记伦科受着军事法庭底审判，结果四个被告都得着死刑底判决。

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就被枪毙了。刑场是在一个叫做贝勒残的小岛上。情形是这样的：

前一天午后三点钟在运输舰“P.”上，有人向席米特等四人宣读了海军大将底最后决定。席米特面色苍白，但异常镇静。其他三个水兵底态度倒也很安闲。席米特底律师温倍尔君来“P.”舰上和席米特诀别，谈了四个小时。席米特含着眼泪，向温倍尔说起那三个水兵底判决，他说他十分希望政府能宽恕那三个人：“他们还很年轻，很忠心；他们在那次叛乱中并没有做什么事。如果我能一个人死，我便是很快乐的了。”

温倍尔很受感动，找出了许多话来安慰他，但他还继续说：“另一个思想使得我苦恼的，就是有人诬我说是我先下令放枪。我不抗议这个诬陷是不能够安心死去的。我请求你代表我声明我并不曾杀过任何人。”

席米特在最后时间中写了许多封信，其中有两封是寄给他底妹妹和他底儿子的。同时人们在预备他们底后事。在第二天早晨三点钟这四个死囚上了一只小船，到了贝勒残小岛。海里波平浪静。天初破晓，预报着一个晴朗暖热的日子之到

临。小岛上已驻满了军队，六十个兵士立在死囚前面五十步远的地方。这六十个兵士要开枪来杀那四个死囚。

席米特很快地走进刑场。他最先请求那三个和他同死的水兵原谅他。然后他又向兵士们演说，他请他们不要忘记席米特副将，“那个人是为俄国人民，为你们——我底弟兄们而牺牲掉自己底性命的！像我这样的人还多着呢！将来还有更多的这类人出现呢！”他又和他底同事们（“P.”舰的官佐们）说了告别的话，又拥抱了“P.”舰底司令官。最后他要求兵士们不要缚他，不要盖着他底头。水兵卡斯尼克叫道：“别了，同志们！死就来了。原谅我底过错罢！”其余两个水兵哭起来了，不肯忏悔。席米特昂头直立着。鼓响了。席米特张大眼睛，叫道：“别了，放枪罢！”于是司令官发下命令“开枪”，一排枪打死了两个水兵，又放了两排枪打死了第三个水兵，席米特依然直立着，第三排枪就把他打死了。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工兵们把那四具还有热气的尸体放进棺材，然后放进土里，很快地就掩埋好了。太阳底光线射在他们底坟墓上，好像要把他们镀金似的。

席米特底处刑对于俄国给了一个很大的印象。很多爱自由的人都来到这个伟大的自由之战士底墓前徘徊凭吊，献上各种鲜花，各种花圈。后来海军大将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下令把那四具尸体掘了出来，抛在海里去了。

六 革命之虎——盖尔书尼

(Gregory Andreilvitch Gershuni)



号称为“革命之虎”的盖尔书尼和其他许多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一样，也是从一个和平的改革家转变为最激烈的革命党人。他生于一八七〇年，是一个化学家。他除了服务的时间外，其余的暇时完全花费在教育民众的工作上面。但后来他渐渐明白在当时的现状下和平的教育工作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如果稍微把真理拿来向人民宣传，就算犯了法，而且官吏就要来干涉了。他常常和官吏们冲突，后来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结果他便受着政府方面底压迫，不得不改换姓名做一个非法的“亡命者”，常受着警察侦探底追捕。从此盖尔书尼之名就没有听见人说了。

到了一九〇三年盖尔书尼被捕的时候，他已成了社会革命党内的“战斗团”底首领。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内务大臣西皮雅金暗杀事件就是他主谋的。这“战斗团”就是专门组织来实行暗杀的。较后的乌发省总督波达洛维奇暗杀事件也是盖尔书尼在暗中筹划的。但在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一日盖尔书尼

被捕了。他此次被捕是被奸细出卖，这奸细就是大名鼎鼎的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而且是盖尔书尼本人所极相信的同志亚柴夫。

在审判中他底举止异常勇敢，他底应对异常雄辩。他在法庭中的演说把旁听席中的全体听众都感动了。甚至裁判官也被感动了。审判结果，被告中有三个人判处死刑，就是盖尔书尼、格利哥列夫与麦尼可夫。在判决宣读后，一个裁判官指着盖尔书尼向他底同事高声说：“不错，这真正算是堂堂的一个人。”旁听席中一个公爵也不禁高叫：“这个犹太人确是一个英雄！”

盖尔书尼底法庭演说真正十分有力，十分动人，他安静地，有条理地，然而同时又是很有力，很雄辩地批评俄国的现状，到后来甚至裁判官们也表同情于他了。他底演说之结尾的话是：

“我底一切活动都只是受着我底义务观念与劳工阶级底利益二者之指导的，我相信我已经很忠诚地尽过我底义务了。我一点也不责备自己，而且我坚决地相信将来人民一旦真正了解了我底活动，他们也不会责骂我的。然而你们，我底裁判官哟，你们把那般牺牲了自己底性命来谋众人底幸福的人送进监狱，送到西伯利亚，送上绞刑台，将来你们是不能辞其咎的。我都知道从这法庭我们就会被引到刑场去，但我一点也不悔，我更不求你们底宽仁与饶恕。”

死刑的判决宣读后，盖尔书尼回到囚室里又本着这无畏的精神写了一封给同志们的信。

我底亲爱的，永不能忘掉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很久就何等地渴望来向你们作最后的告别，表明我对于你们的无限的爱与无限的感激！我确信你们会十分明白在这种暴风雨时代被迫着离开了战场这件事对我是何等地苦痛；然而我却也是很安静的，我一点也不焦急地忍受着这种被强迫的偷闲，因为我曾相信过，而且至今还相信我们所为之苦斗多年的主义已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这般不能再应革命之召的人所留下的空位不久就会有人来填补上的。不过命运也究竟把我所不曾料到的打击带给我了，这是我不应该得着的。你们要知道对于我，我们底事件之结局在我被捕以前就已说明如白日，而且到了在基辅我被人加上脚镣手铐的时候，一切疑惑都完全消失了。我当时也曾感到一种真正的幸福，我走向在圣彼得堡等着我的恶运如同去赴一个庆祝会。我想象着我是去和我底同志们一同去受一次大审判，这次大审判会把俄国社会从长时代的甜梦中惊醒起来的。可是，呀！他们把我和那些与我合作了多年的同志们分开了，而留着一一些叛徒、无耻的诬告人和我在一起，宪兵无法再牵连许多人到我们“战斗团”案件中，便靠着格利哥列夫底帮助创出种种的诬告来；他们又骗了加屈拉，在他们底口供上捏造出一个全案来。我觉得我不得不解释，而且防卫我们底主张来驳斥一切的造谣中伤，然而要在这堆满了宪兵的法庭上向那般什么都不懂的人们说话，又是何

等比苦刑啊！在审判中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政府预备和各政党讲和，但却坚决地决定用一切方法来毁灭社会革命党。所以在法庭中，国家律师便要求对于所有社会革命党党员皆处以死刑。

朋友们，你们要继续进行那决死的苦战，自然还要遇着更大，更苦痛的损失，但是俄国革命党人是不怕死的。死是不能够使他们退缩的！这个坚决的信仰使得我们以极其安静的态度来接受死刑之判决。朋友们哟，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能如此容易地去就死！

宪兵现在又开始采用了一件新武器来攻击我们，他们极力设法引起我们党内各派间的内讧。无论谁，只要看见宪兵们对于我们党内各派意见之争执是何等满意，何等高兴，他就不得不相信我们党内各派间的争执会生出非常重大的弊害了。在狱中的同志们和我请求你们尽力消灭党的内讧，使敌人无使用这恶毒的武器之余地，而且在这个我们底历史之大转机的现在，不仅不应该引起活动的革命党人中间的不和，并且对于反对的人也不应该那样做的。

我自始至终就是很安静很快乐的。我常常想到你们，我底朋友们哟，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说，你们对我的好意，你们对我的信心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刻。请不要责备我，因为我不曾听从你们叫我离开俄国的劝告（O同志在五月里转达与我的）。我底逃避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坏

的例子，所以我不肯做。我知道我底死会给你们一个悲哀的打击，然而我自己却坚决地相信这对于我们底主义并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间，革命党人不曾得着人们底同情，完全孤独地去就死，自然是苦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工农底同意和欢迎，那么在我们底时代中去就死倒是更容易的事了。我也许会是错误的，但我确实坚决地相信，在俄国，在最近的将来自由是到底会胜利，为人民谋幸福的主义也是会胜利的。只有人民才会为着权利与正义来完成伟大的事业！一想到那伟大的光荣的将来，谁能够说一个人底生命是过大的牺牲么？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底生活已是很快活了。我没有一点理由来责备我底命运。

别了，我底所有的在伟大战争中的同志们哟！我底最后的最热烈的愿望就是在你们底成功。我诚心诚意地拥抱我底朋友 B、C、J、L、V 与 N。我爱你们大家，我无限地爱你们。我和你们的交往永远是我底力量之一个泉源，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中，它还给了我以莫大的安慰。

我以全个心灵来祝福你们，祝福我们底主义。

你们底格列郭里。

然而盖尔书尼并没有被杀，因为舆论不满意法庭底判决的缘故。他们三人底死刑又被减轻为终身惩役。

盖尔书尼先被囚禁在席吕塞尔堡。一九〇五年十月沙皇

底“立宪宣言”公布后，政府实行对所谓政治犯底特赦。被活埋在席吕塞尔堡中的老囚犯都相继出了狱。但盖尔书尼还被囚禁在那里，直到一九〇六年二月他才被移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阿加上监狱中。

二

逃狱本是每个政治犯底唯一生路。盖尔书尼一到了阿加土监狱，一个思想便来到他底脑里：逃狱。在那死城席吕塞尔堡是无法逃狱的。但在西伯利亚各监狱中逃狱就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盖尔书尼先细心研究他底新环境、监狱的规则，狱吏、禁卒们底性格等等。

最初看来，逃狱的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又和同志们商量许多次，盖尔书尼终于决定了逃狱的计划，而且这一次居然成功了。要明白盖尔书尼之逃狱，非先知道西伯利亚各大监狱里的内部生活不可，所以我现在先来叙说阿加土监狱的内部生活。

在阿加土监狱内和在其他西伯利亚大监狱内一样，政治犯和普通犯一起组织成了一个小的“共和国”，选出一个“Sarasta”^①和许多“议员”，这些人便是全体囚犯底代表。凡关于公众的事须得和管狱的官吏交涉者，皆由这些人（“长者”和“议员”）负责去办理。囚犯自己洗衣服，烘面包，做菜蔬，制造

① “Sarasta”，“长者”的意思。

其他必需的日用品。“长者”从政府方面领得众人底薪金，处置一切事物，而且对于政府与囚犯两方面都有详细的出纳报告。囚犯的图书管理员专辖书籍之收入与分配，医药管理员专门看护病人；有的囚犯被举出做工场底监察员做其他的职务。在这里的囚犯是过着自由的共同生活。监狱底墙垣以内就是他们底世界，只要他们不犯狱规，他们可以自由处理自己底日常生活，政府方面很少干涉。他们底饮食问题完全归自己一手解决，厨房是属于他们的，菜单可由他们任意改换。所以每年暮秋时分囚犯们便不得不备办大批食物，度过整个长的冬季。因为监狱附近并无店铺或人家，最近的店铺也是在几百英里之外，一到冬天就霜雪满途，道路阻塞，不能通过行人了。

俄国人每天吃饭时，总爱喝一种菜汤，这是用腌卷心菜煮在肉和亚麻仁油（或向日葵子油或平常的脂肪，以家庭之贫富而定）的很浓的汤内做成的。要备办全国冬季做菜汤用的腌卷心菜，自然需要很多的桶，在阿加土，这样的桶是贮藏在典狱长底家中天井里的一个地窖内。典狱长家在监狱外面。所以常常有囚犯到这地窖里取食物，囚犯进出自然都是禁卒追随着的，而且走过狱门时所有带出或携入之物都得由守兵详细检查。

盖尔书尼底逃狱计划，就是这样把自己藏在盛腌菜的桶内，先由囚犯运出狱门，到了典狱长家的地窖内然后设法逃走。这自然是很困难的事，地窖内并不比监狱舒服一点，而且如果逃不出来，岂不就会闷死在桶中或地窖内？然而除此而

外便无别的逃狱方法。不自由勿宁死，为了求自由的缘故，盖尔书尼也不惜拿自己底生命来冒险了。

第一个难题就是须得去找一个极大的桶，里面应该容得下一个人和一套逃走时换装用的衣服，而且还要留下三分之一的地位来盛卷心菜和盐汁，以避免守兵底注意。同时还须在桶里安一个呼吸器，把外面的空气引入桶内。这些东西预备好后又应在地窖里掘一条地道通到街上，并且还要安置信号，免得逃狱者出地道时为街中过往行人所见。逃狱成功后，又应预备在附近迎接逃亡者的马车，同时又应在狱中设法布置遮掩狱吏的耳目，使他们不致立刻发现盖尔书尼逃狱的事实。

总之，为了盖尔书尼底逃狱，外面和狱中的同志真是煞费苦心，但到底预备齐全了。地道就在实行逃狱的前夜掘好，第二天即十月十三日早晨，盖尔书尼便演了一幕惊人的活剧，逃出冰天雪地中的监狱了。

到了固定的时候，外面的同志先放了一个信号，通知狱中的同志说，一切都预备妥当了。恰在几分钟以前，盖尔书尼还去见禁卒长。盖尔书尼本是图书管理员，他带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借给禁卒长，并且请他“明天”叫裁缝来给他（盖尔书尼）量身材尺寸，做一套新衣服。这样的举动用意明明是使禁卒长不疑惑他在这天会逃狱。

三

盖尔书尼逃狱的经过情形，他曾在他底《狱中记》内详述过，现在我们且引用他自己底话：

我偷偷地进了房屋，我底同志已早在那里等着我了。一刻钟以后我就进了桶里，拚命弯曲着我底身体。他们在我底头上盖了一张皮子，桶中就完全黑暗了。忽然有人叫道：“碟子，碟子。你们这些蠢东西，你们把碟子忘掉了！”原来桶经过狱门时，狱吏常用军刀刺进桶内菜中，防备里面藏得有人。我底同志们恐怕他们用刀刺过皮子刺伤了我，所以特别用铁制造了一个像碟子那样的盖子来保护我底头，然而那时却忘记放进去。

碟子立刻带来了，有人和我握手，有人吻我底头，又有人温和地安慰我说：“别了，亲爱的同志，什么事都弄好了，安静罢！”他们铺好了皮子，用钉子把边丝钉住。我听见卷心菜落在上面了，不久盐汁从皮子底四周不断地滴了下来，我就浸在盐汁中了。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调和我底呼吸这件事上。我由桶底的一个小管呼气，另有一个小管吐气。我握着这两个小管，使它们不致于破裂或弯曲。我应该略为阻止心之跳击，防止昏晕，为了这个缘故，同志们便给我预备得有醇酒、酒、冰水。落下的卷心菜底同声还是继续下去。有时候我惊奇我是否真正被

活埋在这里面，永无再起来之日了。

第二幕又开始了。我完全不觉得他们怎么把桶从房子里搬下几级石梯，再搬到雪车上去。我只听见有人叫：“喂，开门！”觉得雪车停了，于是交涉开始了。过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喂！孩子们，快点！”我觉得雪车轻快地溜下狱外的山下去了。……谢谢天，我们算走过了！……

典狱长家天井中的地窖有两层，第一层房屋刚刚与地相平，而下一层房屋则深在地底下，很脏，很暗。盖尔书尼底同志决定把桶放在下一层房子里，因为第一层房屋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官吏太太们常常进这里来，于是他们就向押送的兵士说第一层房屋不太热，恐怕新鲜的卷心菜会冻坏了。

要把桶放进第二层地窖里也不是容易的事，两个兵士跑来帮忙，到底算把桶安放好了。在几分钟之内有人在桶边敲了三下，算放信号给盖尔书尼说，各事都弄得妥当了。第二层地窖底门盖又掩放上了。过后在第一层地窖上面又发出大的响声和喧闹，第一层地窖底门被锁上了。这些声音都是有意做出来的，用意告诉桶中人说，一切都弄妥当了。

当时的计划中曾有一项是，恐怕盖尔书尼在桶中发生什么意外，不能自己启盖而出，便派定了一个外面的同志藏在第一层地窖附近的地道中，只要他听见门再上了锁，便走入第二层地窖里，打开桶盖救出盖尔书尼来。

然而这一天等了一些时候还不见有人来，盖尔书尼等不得了，便自己动起手来。他怀里有一把小刀，他拿这把刀来割

开皮了，然而他处的地位是异常困难的，他缩成了一团，没有空余的地方，而且又得用一只下来握着两个通气的小管。他费了很大的力才割开了一个洞，立刻一堆卷心菜底盐汁落了下来，把他手里的两个小管打走了。

这是生死的关头，他若不能伸出头，几分钟以内就会闷死了。他这时只得拚命挣扎，结果到底把全皮子弄松（因为事先钉得并不稳固），从桶中逃出来了。

我不能记忆着我第一次来到世界时是费了何等的劳力。然而这第二次出世，我却是不得不拚命地劳动着；而且同时不像其他新生的小孩那样，我尽力使我不发一声。我热烈地呼吸着这潮湿的冷空气，喝我带来的醇精与酒。我带着新生的孩子底好奇心努力向四周看，但绝对看不见什么，黑暗太浓了。突然我听见脚步声，看见地窖底门盖开了。有人伸了腿下来，当时我想藏入桶中，因为我不知来的是什么人，正在踌躇之际，而且在从门隙里射进的微光之下也看不出那是什么人底腿，忽然听见一个人在低语说：“这是我。”

这是一个朋友底声音……我一手执刀一手拿酒瓶来欢迎他。

“一切都妥当么？”我问道。

“是，是；快点来，跟随我走。”这是他底回答。

我们从桶里取出了衣服，它已为盐汁所浸透了。我们又用一块布捆着桶，免得别人一进来就看出形迹。走

几步，我们就到了上一层地窖，把下一层底门盖关好了。我们到了那地方，木板已被割开。我在前面走，我底朋友在后面走，他把木板放回原处，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向左走，”他说。我看见在地窖底顶和土地之间有一个小洞。我战抖了一会，过了一会便开始爬行了。不幸我犯了一个大错，我爬入地道时身子是俯着的，如果身子仰着倒好了，地道有二十多步长，我走到中间，忽然不能够动了。我拼命挣扎着，向各方面转身，到底最后达到离出口只有几步的一个地方了。

我们就在这里停了脚步，我看表，知道这正是九点钟，从狱中出发到现在共去了半点钟的时间。自然我应该立刻出去，因为我底缺席随时都会引起狱吏底注意的。我们听过往行人底声音，其实他们只要注意到地道口，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们。我们便躺下等候外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路上有人”，第二个信号也是如此。我便回头看我的衣服。我本来带着一面小镜子，但是现在已经打成碎片了。幸好我还有几方手巾，我把脸上，手上的血通通拭去了。我们听见脚步声，我们又看见皮靴，而且我们还认出来有一个行人是狱卒。如果他偶然向他底脚边看一下，那么对于他底这个发现，他将会得着何等的报酬，然而他过去了。另一个信号叫我们仍躺在原处。

十分钟过得如此之慢，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很安静的。那么为什么不许我们出去呢？我底同志向我低声说：

“信号最不会错的。静候着罢！”

脚步声又起了，从对面来，是和刚才的脚步声不同方向的。两个狱中护送兵走过去了，一点也不曾注意到。

忽然我们听见了小孩们底声音：“捉住它！捉住它！”几秒钟后，一条小狗（我认得这是监督底孩子底狗）走过来，恰恰停在洞边，惶惑地看着我们。这真是一件很坏的意外事。它也许会叫起来，或者小孩们会自己跑过来的。我以强烈的眼光注视着那条小狗，因为我们听见故事里说过这样的注视可以使得动物不发声。果然那狗看了几秒钟，嗅了一阵，喘了一口气，好像在说：“先生，这是你底事，与我完全没有关系。”于是又转过身向小孩们跑去了。

我平常很爱听小孩们底清脆的声音和笑语，然而这时候听见这样的声音渐渐消失去了，心中却又感到说不出的欢喜！

一切又安静了，但几分钟后脚步声又起了。一个挑水的人挑着两个空水桶走过了。突然一个思想使我战抖起来了：我想他不久回来时挑着两桶水，头一定会埋下，眼光一定会注视地上，那么一定会看见地洞的！……

四

不久挑水的人回来了，并不曾看见我们，我们算放了心，一切又安静了。然而那信号还是无慈悲地继续着：“不要动。”

我看我底表。我们躺着，又等了二十或二十五分钟的光景，这在我们确实太长久了！

突然信号变了。我们几乎不相信我们底耳朵！这真是可能的么？不错，那信号无误地说：“一切都妥当了。出来！”

我们立刻跳出地道；出了地道后我们就慢慢儿走着，装出没有一点事的样子，走不数步就到了和同志们约定的地点。果然一个同志来迎接我们，把钱、护照、手枪交给我……

盖尔书尼现在得到自由了，但也不能说是十分安全的，随时都有重新被捕之虞。他应该走过两英里长的积满了白雪的平原，这平原底四周并无一点树木遮拦住，而且从山上的监狱和典狱长住宅底窗户里，人们正可以看见平原上的一切。幸好这一次他并未遇着什么事变。不久这两个革命党人就越过山岭不见了。

他们越过山岭后又走了一些路程，才遇着预先雇定的雪车。车夫也是一个同志，这天从大清早他就在那里等着了。这时候盖尔书尼便和同来的那个同志告了别，坐上雪车走了。

盖尔书尼到了一个城市，便遇着那些迎接他的同志们。他们替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躲藏处。过了一些时候，他便改装为一个乞丐，搭车到一个东部港口，然后再到日本。他底伪装是非常成功的。在车站时一个宪兵见着他竟大声叱骂道：“你这脏东西，滚开！”

在火车上过了五天，除了有时听到一两句叱骂的话语外（这在当时的盖尔书尼，叫做“天堂的音乐”），倒没有遇着什么意外事。不过去搭俄国开往日本长崎的船，就是危险的事了。一八八二年麦秀根和另一个同志从加拉监狱逃出走了一千多英里后，终于在搭船的时候被查出来逮捕了。天幸这一次盖尔书尼又不曾遇着危险。

五

盖尔书尼算逃出监狱了。然而狱中的同志们底滑稽戏还没有闭幕。他们请了狱中一个会雕刻的同志制出一个盖尔书尼底半身像，给它穿上衣服，放它躺在盖尔书尼底床上。原来盖尔书尼是和几个政治犯一起住在一个囚室里。他们在闲暇时间总爱高声辩论科学、文学、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狱吏也习惯了，并不来干涉他们，有时候还来旁听，因为政治犯大都是极其雄辩的演说家。

这一天晚上狱吏前来点名，他刚打开门，看见一个政治犯坐在盖尔书尼底床边激烈地争辩道：“我亲爱的格列郭里，你难道不晓得日蚀会如此影响到星云，以致……”还有几个政治犯站在床前注意地听着。狱吏不高兴听这天文学上的争论，站在门口把房屋的犯人数了一下，然后开始点名。当他叫到盖尔书尼底名字时，一个政治犯代答应了，声音很像，狱吏也不曾起一点疑惑，就锁了门去了。大家以为这一晚上是没有事了。

一点钟以后忽然另一个狱吏跑进来了。他平日和盖尔书尼间的感情还不坏，他常常爱找盖尔书尼闲谈。这晚上他也是怀着这心思来找盖尔书尼。于是这个大秘密就被他发现了。

“革命之虎”出山了。最能干，最活动，最勇敢，最危险的革命党人，“战斗团”底首领盖尔书尼逃出监狱了。这一晚上全监狱都闹翻了。附近的“自由民殖民地”（流放人民居住的地方）的各所小屋都被搜查了。本地不通电报，典狱长立刻派人乘车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电报局打电报报告本省总督。但卷心菜桶和地窖底事情当时还没有人梦想到。

圣彼得堡中央警察厅得到盖尔书尼逃狱底消息后，立刻通电全俄各省总督、宪兵队长、俄国边境上的国防军，并把盖尔书尼底面貌举止，甚至他底微跛的足等等都详细描写出来了。结果同时在四个地方捉了四个盖尔书尼。而真正的盖尔书尼却已安居在长崎了。

盖尔书尼从日本到美国，后来又判瑞士，一九〇八年病歿于瑞士。

在他病得厉害的时候，他得到蒲尔切夫告发亚柴夫的消息立刻气得昏死了。他醒过来时还大叫说：“只要我底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便去圣彼得堡和亚柴夫共同组织执行沙皇底死刑的计划，来消灭这一切愚笨的谣言。”可见盖尔书尼临死还相信那个把他出卖的人。但后来亚柴夫底奸状到底被发觉了。

第二部 自由血

一 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 殉道后的四十年

一 殉道者的祭坛前

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没透着殉道者的热血。大刀下、枪弹下、绞绳上、十字架上、断头台上、电椅上，在那里，古今来不知有若干的“好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从野蛮的“过去”到所谓文明的“现在”，这其间总是重演着同样的惨剧。世界上最惨酷的事更没有胜过人们对于他同类的虐待了。除了大批的屠杀，零碎的宰割而外，还有许多人被活埋在监狱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为什么呢？

人类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的，然而人类的大多数却又害怕进步。人类崇拜超时代的先驱者，然而人类又害怕这些先驱者。所以向前进的人们最初总是受着一般人的仇视，而每一次的进步总是受着大多数人的阻碍（二十世纪的灿烂的文明在前世纪的人们看来何尝不是妖魔的世界）。先加以威吓，后继之以屠杀。超时代的先驱者中谁能逃出这样的命运？死了的耶稣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稣总是受人虐待；这是多么矛

质的可悲的一件事啊！

我们计算着：这许多年来为了人类的进步不知有若干的殉道者流尽了他们的热血了。他们的血不断地流，零碎地流，流了无数的年代，现在已积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海。总有一天这血海中的波浪会冲上岸来，把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冲倒，洗出一个新鲜的世界！

将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自由平等的社会实现的时候，历史会把我们这些惨苦的年代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后代的。他们会来嗤笑他们祖先的愚蠢，然而对于那些为人类幸福而死的殉道者，他们却是极其感激，极其尊敬的。只有我们的后代才是最好的裁判者！他们会来裁判我们的一切！

我们，生活在这些惨苦的年代中的我们，将怎样的被后代裁判呢？这在我们是无从推测的。然而在殉道者的祭坛前，在芝加哥惨剧过了四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当明白向前进的道路了，我们当明白我们现在所应做的工作了。在我们的后面有黑暗惨痛的“过去”，在我们的前面有光明灿烂的“将来”，难道我们还应该徘徊在泥泞的狭道中么？殉道者的光荣的一生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四十年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在黑暗的泥泞道中徘徊，我们不应该再在殉道者的祭坛前悲哀。殉道者的身躯虽已在黄土中长埋，而他们的精神却将永远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义是不灭的。宣传真理、为真理奋斗的人是终于会得胜的。记着这个，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猛进罢！我们是会得着最后的胜利的。

二 一件渺小的祭品

伟大的殉道者：在你们殉道后四十年的今日，在你们的祭坛前，我们呈献上这一件渺小的祭品，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我们不曾生活在你们殉道的日子，也不能从绞刑台上夺回你们的生命来，我们是你们在遗书中所说的“未出世的孩子”。在我们尚未出世的时候，你们便为我们的幸福而昂然地走上了绞刑台，我们得着你们遗留下来的这点荣光，而得认识真理和正义，而得生活在光明的理想世界中，不致坠落在黑暗的地狱里与吃人的畜生为伍。我们是被压迫被虐待的人，在这强权的世界中我们曾被“人”像狗一般地屠杀和囚辱。然而得着了你们遗留下来的这点荣光，我们也能够鼓起勇气，赤手空拳像狮子一般地去打那些吃人的恶魔了。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想激起我们的高贵的感情，常常兴奋地向我们说：“孩子，你长大的时候，你要爱真理、爱正义，你要做一个好好的人！”然而他们不曾告诉过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从听了那样兴奋的话以来，我们也就抱了最大的决心去寻求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真理和正义了。不幸在这强权的世界中，对于人们的最可怕的东西再没有过于真理和正义的！很多年以来，我们受了人们的骗，跑到退后的路上为强权者和野心家张目；很多年以来，我们因为坚持着寻求“真实的”真理和正义，不肯相信那冒牌的东西的缘故，竟被恶魔畜生屠杀或活埋了。最后由于你们，你们的殉道，我们才得到了我们寻求了

一生的宝贵东西，从此我们的冰冷的心中才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们的杀得死的身躯中才有了杀不死的精神。从此我们真正地知道而且痛爱真理和正义了！在我们父母的坟墓前，我们兴奋地祷告说：“你们的孩子现在是在爱真理爱正义了！”然而在你们，——伟大的殉道者！——我们的“永久的父亲”的祭坛前，我们（你们的“未出世的孩子”）将怎样地祷告呢？假若你们现在还能够说话，我们相信你们的答复一定是：“我的孩子，爱真理罢，爱正义罢！”

吃人的畜生因为不能压下你们的声音，他们便来缢杀了它，因为不能冷却你们的热情，他们便来停止了它；因为不能收买你们的生命，他们便来杀死了它。然而结果他们仍缢不住你们的声音，冷不了你们的热情，杀不死你们的生命。

现在，四十年后的今日，你们的声音更响亮了，让我们也来同样的高叫罢。我们这件渺小的祭品不仅把你们的声音很广地传与后代，假若你们还有知觉的话，从这里面，你们也可知道你们是怎样的映在你们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眼里，而且也可以听得见我们的呼声了。柏尔森司在殉道时叫着“让民众的呼声起来罢”。现在我们是在叫了！

三 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的“五一”

一八八六年可算是美国工业界最混乱的时期。在美国，自一八三二年以来，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常在各地发生，直到一八七八年八小时制才被国会通过。工人用很大的牺牲争得

来的八小时制的法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在工厂内并没有实行。这样自然会激起工人心中的怒潮。一八八四年十月，美国及加拿大的劳动组合与职工联盟在芝加哥开会决定采用直接行动，并议决若到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八小时制尚未实现，则于五月一日这一天举行总同盟罢工。这一次资产阶级总算是屈服了。然而在这一年，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劳工组合”的会员大都被资本家辞退而失业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大大地决斗一下。在这种黑云密布，势将降雨的时候，天空中忽然起了一阵雷声，霎时风雨大作。这雷声就是麦可米克工场（Mc Cormick Harvester Factory）的工潮。于是劳资间的血战开始了。

芝加哥麦可米克工场在这年二月里无故开除工人一千二百名，因此发生了罢工潮，双方条件相差甚远，久无解决办法。被开除的工人于五月二日开会商议对付方法，柏尔森司（A.R. Parsons）与失瓦伯（Michel Schwab）曾到会演说。第二日（五月三日）搬运木料工人组合又在麦可米克工场附近开会，讨论恢复工作的条件。司柏司（August Spies）亦到场演说。在四点钟时，那些在工场里私自上工的工人放工出来了，于是一部分的群众便向他们走去，当时有少数人掷了几块石子，双方便发生小的冲突。不久大队的警察到场，向群众开枪。群众凭着一股勇气赤手空拳地和蛮横的警察相搏战，立刻死六人，伤无数。自然死者都是群众这方面的，那些有枪的“狗”能被赤手的妇女小孩打坏么？不会的。

四 阶级战争已经开始了！

司柏司目击着这样的惨剧激动到了极点，回到报馆里（他是德文报《劳工新闻》的编辑）用德文和英文写下了有名的“复仇檄文”，印成传单散发。“复仇檄文”四个字是排字工人加上的。司柏司在事前并不知道。

工人们！武装起来！

今天下午你们的主人派遣他们的走狗（警察）杀了你们的六个同胞在麦可米克工场前面了。他们杀了这些可怜的穷人，因为这些人正和你们一样有勇气来反抗主人的命令，他们杀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敢于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他们杀了这些人，是要向你们（自由的美国国民）表示，叫你们必须以他们所给你们的东西为满足，否则你们也是要被杀的！

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经忍了很大的侮辱了；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经受了无限的苦痛了；你们作工，把自己的生命也要作尽了；你们挨饿受冻也已很久了；你们的孩子们也被工场的大口吞下去了，总之，你们已经做了忠顺的可怜的奴隶，而且做了无数的年代了。为什么？为的是要满足那一般横暴的强盗似的主人之无厌的食欲，装满他们之无尽的财库！当你们向他们要求减轻你们的负担时，他们便派遣他们的走狗来枪毙你们，屠杀你们！

假若你们还不是一个人，假若你们还承认是那些流了血来争回你们的自由之你们祖先的子孙，你们便要起来，用你们的全力打倒那正在吸你们的血液的魔鬼！

武装起来，我们请求你们，武装起来！

你们的弟兄们

屠杀事件发生的第二日（五月四日），失瓦伯在《劳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

阶级战争已经开始了！许多工人昨日在麦可米克收割工场前被枪击死了！他们的血正在那里叫喊复仇！现在万不可迟疑了。一群如鹰似虎的军警正要喝我们的血呢！然而工人们并不是一群任人屠杀的驯兽。白刃临头，红血相报！宁可为争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是他们以枪炮对待我们，我们也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够安宁。在现在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武装起来了！昨天晚上正当许多寡妇哭她们已死的丈夫，许多小孩哭他们已死的父亲时，富人们正在他们的高楼大厦里，举酒狂欢庆祝胜利呢！妇人们！孩子们！擦干你们的眼泪；奴隶们！都起来罢！暴动呀！革命呀！

读了这篇浸着血泪，燃着愤怒的檄文，谁能不被感动呢？

五 草市场群众大会

五月四日的上午，又出现了下面的传单：

工人们注意！今晚七点三十分，在德门勃林号好司台特间的南道尔夫街的草市场(Haymarket)开群众大会，抗议昨午警察枪杀我们工人的暴行，并有著名演说者到会演说。

执行委员会

然而这次大会一直到了这晚八点半钟才开始。到会的人据当时报纸的记载有一万余人，但事实上只有几千。一辆小货车做了演讲坛。司柏司是第一个演说者。柏尔森司这天早晨刚从星星拿底回来，不知道群众大会的事，这晚他和斐尔登等正在《警钟》报馆开会。司柏司叫人来请他和斐尔登去演说，他和他的妻子小孩等都去了。司柏司演说完毕后，柏尔森司便继续着演说，其次就是斐尔登的演说。柏尔森司因这时空中黑云密布，怕要落雨，便带了他的两个小孩同他的妻子离开了会场。

这次的大会是很和平而且很有秩序的。芝加哥市长哈利生八点半钟到场，直等到十点钟才离开，他又到警察局去向警察长帮菲尔得说这次会议中不会有轨外的行动，不必去干涉。后来他在审讯的时候，并证明那天晚上并没有一个演说者暗示着对于任何人施用暴力，并且没有看见什么人带了武器到场。

到会的人众渐渐地散了，斐尔登已决定在数分钟后便宣告闭会了。忽然帮菲尔得领了一队带着手枪的警察共一百八十人跑步到了会场，下令立刻解散这次集会。长官向斐尔登

说：“本伊立诺伊州政府命令来解散你们。”斐尔登回答说：“我们这次集会是很和平的，”说完便走下讲坛。帮非尔得不再说什么，转身就发令开枪。在混战中，突然从旁边巷子里抛来了一个炸弹，落在警察队里。立刻死了一个警察，还伤了几个。于是血战便开始了。司柏司的兄弟也受了重伤，群众中受伤的不计其数。

六 畜生们的乱咬狂吠

芝加哥的政府当局大起恐慌，在草市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日（五月五日），吃人的畜生们便开始乱咬狂吠。这天早晨司柏司在《劳工新闻》报馆被捕，失瓦伯和斐尔登也被捕了。失瓦伯那天并未到会。司柏司和斐尔登当炸弹爆发时虽在会场，但和炸弹事件并没有丝毫关系。《劳工新闻》的排字工人斐失儿（Adolph Fischer）在这天下午被捕了。然而警察还不甘心，逐日搜索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动运动者的住宅，封禁报馆。恩格尔（George Engel）、塞利格尔（W. Seliger）、林格（Louis Lingg）也陆续被捕了，他们并未参加草市场大会，但在林格的屋子里寻出了制造炸弹的药品及器械来。尼伯的被捕是偶然的。五月五日两个侦探到《劳工新闻》报馆，看见了尼伯便问他，谁是《劳工新闻》的主笔，尼伯回答说：“司柏司和失瓦伯被捕后就由我来负责。”于是他也被逮捕了。

柏尔森司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法庭曾悬赏五千元缉拿他，警察局派出许多侦探四处密访；还有失瓦伯的亲戚雪老

柏尔特 (R. Schnaubelt) 也没有被拿着, 那些“狗”的嗅觉虽灵敏, 也嗅不出一点儿踪迹来。

七 法庭公然受贿

在审讯之前, 便开始选择陪审官。陪审名录中虽有千余人, 但只有五六个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被召集的人一个个发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及劳动运动的偏见, 说他们一定可以判决被告席中那些无辜的人的死罪。那个选定陪审员名单的特别捕役曾宣言: “这些人(指被告)应该绞死。”到后来十二个偏见最深的人便被选出来做陪审官。

五月二十五日法庭以谋杀警察狄更的罪名提起公诉, 控告司柏司、失瓦伯、柏尔森司、斐失儿、斐尔登、恩格尔、林格、尼伯、雪老柏尔特、塞利格尔十人。六月二十一日, 这次最卑鄙的审讯便开始了。而且法庭公然受贿。资本家的报纸上开始为十二个陪审员募集款项。三百个领袖资本家所组织的芝加哥公民联合会也募集了十万元来报酬法庭, 对于警察厅, 他们也允许在裁判后每年以十万元作报酬, 五年间他们实际上担任了四十八万五千元。

八 柏尔森司的自首

六月二十一日法庭开始审讯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自投罗网的人, 他爱真理、爱正义胜过爱他的生命。他明知资本家

和政府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他却不怕，他愿慷慨激昂而死，不愿苟且偷生。这个人便是柏尔森司。

当草市场炸弹爆发时，柏尔森司在柔夫厅(Zepf's Hall)里正立在窗前看外面的景象。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同志何尔门斯夫人(Mrs.Holmes)离他也不远。他听见了炸弹的声音便跑到他妻子的身边，安慰她们说：“不要害怕！”这时枪弹乱飞，很多人从外面逃进厅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阵，秩序稍恢复了一点，他们便出去了。他们是预备回家的。在路上何尔门斯夫人对柏尔森司说：“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冲突。所有的人都晓得你，他们晓得你在劳动运动中很有势力。要是我们的同志有了危险，你一定跑不脱的。不管怎样，至少你应该暂避几天。我们现在还不能听随你去牺牲。而且在这激动的情形之下，我们不晓得他们会拿什么手段来对付你。”柏尔森司说：“我并不以为我应该走开，——你果然这样想么？”何尔门斯夫人又说：“是的，你暂避几天并没有什么害处；你且暂时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去，等到你觉得这里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好了。”柏尔森司还不以为然，他和何尔门斯夫人辩论了许久，最后他听了她的话。他身边没有多的钱，一个朋友布朗借了五元美金给他。他便和何尔门斯夫人一起去西北车站；而柏尔森司夫人独自回家。柏尔森司并不说什么话。在车站上，他又问何尔门斯夫人一次，她是否真以为他应该离开芝加哥。临行因为他的妻子在家没有钱，他把身边仅有的钱分了一半，请何尔门斯夫人交与他的妻子。

六月十八日，柏尔森司夫人突然来到被告律师商议事件的地方，说她的丈夫这时在威斯康辛州的屋开夏(Waukesha)，在那里他是很安全的，但他觉得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愿意来法庭自首，他问他的妻子和律师们的意见如何，因此她便来和律师们商议。律师中布拉克大佐极力赞成柏尔森司自首，沙罗孟表示同意。发斯脱尔却极端反对，他以为柏尔森司的自首除了牺牲自己外，并没有一点别的好处。柴司奈因为不熟悉美国情形，便没有表示意见。然而柏尔森司夫人却和布拉克同意，赞成她的丈夫自首。

柏尔森司二十一日早晨八点三十分钟到芝加哥，下午两点钟便到法庭自首了。情形是这样的：

这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布拉克大佐在法庭门口的石阶上踱来踱去，像等候着什么人似的。几分钟后一辆马车来了。一个女子和两个男子从里面下来。布拉克大佐默默地和那一个带着庄严和聪明的面貌的黑发男子握了手，并且挽着他的手向里面去了。在旁边的一个人问道：“和布拉克一起的人是谁？”一个新闻记者说：“我相信这是柏尔森司。”一个侦探连忙插口道：“不会的，我们正在捉拿柏尔森司，难道你忘记了么？”

法庭中所有的眼睛都注视在布拉克和他的同伴身上。突然检察长格林奈儿惊喜地站了起来叫道：“我看见柏尔森司在这屋子里了。我要求逮捕他。”然而并没有人听他的话。布拉克大佐愤怒，昂然地说道：“这个人现在是在我的保护之下，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在侮辱我了。”柏尔森司向裁判官说：“阁下，

我来此自首，愿和我的同志一同受审。”裁判官的答复是：“柏尔森司君，你在罪人席中坐下罢。”

柏尔森司于是坐在他的同志们的旁边。司柏司悲哀地欢迎他的同伴道：“柏尔森司，你跑来送死了。”然而柏尔森司一点也不悔恨。在几分钟后，柏尔森司自首的消息就传遍芝加哥了。

这天晚上，监狱的门关住了他，从此他便不曾活着跑出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九 儿戏的审判

法律本来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工具，然而这次的审判连法律两个字也没有顾到。从裁判官以至于原告证人，没有一个人的举动不是受着金钱的支配。老实说来，就是那四十八万五千元美金在作怪罢了。

塞利格尔是一个社会党人，他是林格的房东。他夫妇俩都被法庭收买了。他虽是被告之一，然而他并不曾到法庭受审，反而做了政府的证人。捏造出种种事实来诬陷林格。

法庭说雪老柏尔特是掷炸弹者，然而他的踪迹既无人知道，法庭也无确实的证据。所以七月十五日检察长格林奈儿在法庭中辩论时，便把那些“罪人”的罪减轻为“造成杀害罪”，就是说被告的言语在演说中或著作中不知不觉引诱某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警察的性命。他绝对不能把这些被审讯的人和假定的罪联起来，也不能证明被告认识那个掷炸弹的人，

或有影响于他的这种举动。在法庭中，许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及劳动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杂志和新闻纸都被引来当作判罪的根据。格林奈儿居然明白地说：“无政府在审讯中！”他们现在不是在审讯杀害警察的罪犯，他们要审讯无政府主义！此辈的法官狂妄于此可见。法律本是设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更何况法官又受了贿赂。在八月二十的早晨一种惨无人道的判词决定了，除尼伯判十五年徒刑外，其余七人都被判处死刑。

一〇 感情的判决书

芝加哥法庭的法官既受了贿，又受着他们自己的偏见的支配，于是抛弃了正义，违背了良心，对于这些宣传真理的人判了这样残酷的刑罚。他们的判决书是对于法律的致命伤，很可使人知道法律的功用究竟是什么。

柏尔森司批评这判决书说：“你们的判决书是感情的判决书，始则由感情的冲动，继则受感情的包围，始终不出乎感情的范围。感情的判决是什么？就是没有理性，缺乏辨别的能力，不能认识真理之所在。你们能否认你们的判决不是偏于保护资本家一方面的吗？我们是宣传真理，替工人鸣不平，为工人争自由谋幸福的人。芝加哥的资本家正要铲除我们，叫你们来判我们的死罪。”

—— 第一个演说者

照例，判决了死刑后，法庭方面要问被告有无异议，因此在法庭中每一个先驱者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教训，——这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芝加哥八个无政府党演说。这些演说不仅仅是辩护他们的无罪，而且把草市场会议的始末、实业阶级的情形、无政府主义与劳动运动的性质以及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原因都表示出来了。被告八个人共演说了三天，从十月七日到九日。

司柏司是第一个在法庭中演说的人。他的演说是极光荣极能动人的。

“我在这法庭中演说，如像一阶级的代表向另一阶级的代表发言。我现在用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Falieri)于同样情形中向法庭演说的话来作我这篇演说的开始。发利里是这样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于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我被你们控告为犯谋杀的罪，是一个主谋犯或是一个随从犯。你们根据这个控告便来判我的罪。州政府并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曾知道那个抛炸弹的人，或者我与抛炸弹这件事有何种关系。假若没有证据明示我对于此事应负法律上的责任，那么，我的判罪与刑罚的执行不过是故意的、恶毒的、仔细思量出来的谋杀。这种不公正的谋杀在宗教史、政治史以及任何种类关于迫害的记载上常常可以寻得着的。……州政府自己造出大部分的证据，并且选择了一些法

官以这些证据来判定我们的罪。在这法庭上，在这全体旁听者之前，我控告检察长格林奈儿和警察长帮非尔得为凶恶的谋杀犯。”

我们再把他的演说引一节如下：“格林奈儿君说‘无政府在审讯中’，假若这是实情，先生，好得很，你可以判我的罪罢，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一阶级掠夺另一阶级的劳力而生活的国家是要消灭的！我相信社会组织的这种野蛮的形式及其法定的抢劫与谋杀是已交死运了！会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自动的结合或博爱的团结来代替它。可敬的裁判员，你可以处我以任何刑罚，然而却要让全世界知道一八八六年，在伊立诺伊州有八个人被判死刑，因为他们相信较好的将来，因为他们未曾失掉对于自由与正义的最后胜利的信仰！”

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些就是我的理想。它们构成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脱离它们，就是能够，我也不愿。假若你以为你能破灭这些分布日广的观念，假若你以为你能把我们送到断头台来破灭这些观念，假若你愿意再使平民受死刑，因为他们敢于说真理（我叫你指出我们究竟在何处说过谎话），我说，假若死是对于宣传真理的刑罚，那么我愿昂然地来付那高贵的代价！叫你们的刽子手来罢！虽然苏格拉底、基督、布鲁诺等因宣传而受死刑，然而真理却是永不消灭的。他们与他的同伴已先我们向着这条路前进了。我们预备追随他们。”

一二 无政府是一个梦

失瓦伯说：“我所要说的话并不多。假若我不发一言不会被人误认为是对法官此时的举动胆小的默许，那么我就会一言不发了。若把在现在审讯中的诉讼叫做‘公道’，要算是一种侮辱。他们法官未曾作过‘公道’也不能够作‘公道’的事。假若一阶级列席陪审来压制其他不能列席陪审的一阶级，这时还要想到‘公道’，非呆即幻。检察长说：‘无政府在审讯中’，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对暴力、反对兽行、反抗犯罪制度的社会学说。我因为在报纸上作文和演说而被处死刑！”

他的演说中有一节最沉痛，我们不可不读的：

“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天天在各处杀人么？儿童们未到作工的年龄，竟被逼着去作工，夭折多少生灵；妇女们因操劳过度而牺牲性命者成千成万，男子们死于苦工者日有所闻。我却并未见着法律来阻止这些不人道的事。就拿芝加哥一个地方来说，数万工人拥挤于不能容膝的黑屋里，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日光，小孩们同父母吃那些连富人们所养的狗也不食的臭物，疫病到处流行，妇女、小孩死于污秽堆中者不计其数。然而富人们却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丰美的饮食，穿的是华丽的衣服，并且还要虏掠些民间少女来弹唱歌舞以供娱乐。像这种情形所谓文明社会不是享兽食人最可怕的社会么？”

失瓦伯又说：“无政府是个梦。但仅仅在现在是如此。这

是终久要实现的。理性不管所有的阻碍会生长的。”

他的主张是：“革去这一切不人道的弊端，铲除这一般喝人血吸人脑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财产尽归平民掌握……每日每人只须工作四小时，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受充分的安慰。其余的时间用来探讨科学，研究艺术。要说无政府主义者是暴徒是很无理由的。这两个名词是绝对不同的。我们固然有时也用暴力，然而这正是用来反抗暴力的。以暴力抵抗暴力，这正是我们不得已的自卫方法。”

一三 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地 被杀而死更光荣些

尼伯的判罪是很奇怪的，他和草市场群众大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便是检事长也找不出反对他的证据。他在法庭上坦白地表示他的态度，他承认他是劳动运动的战士。他的最后的话是：“诸位，我只有一件憾事，假若判决能够改变，假若这是可能的话，我请求你把我也绞死，我以为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地被杀而死更光荣些。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小孩，假若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死了，他们会来埋葬他的。他们能够到他的坟墓那边去，跪倒在他的坟边，然而他们却不能到监狱里来看他们的父亲——那个无罪而被处刑的父亲。我所要说的已尽于此，诸位，我很以不能和其余的人一同绞杀为憾！”

一四 我正要高声叫你们绞死我罢

尼伯的演说完毕后，又继之以斐失儿的演说。斐失儿的演说是当时演说中最短的一篇，所以我可把它完全引在下面。

“先生，你问我为什么我不应该被处死刑。我并不要说许多话。我只要说，我反对被处死刑，因为我并未犯过罪。我在这屋里因谋杀罪而受害，因信无政府而被定罪。我抗议我被处死刑，因为你们不能证明我曾犯过谋杀罪。然而，假若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爱自由、平等、博爱的缘故而被处死刑，我就并不抗议。假若死是我们爱自由、爱人类的刑罚，那么，我坦然地说，我已经贡献了我的生命了；然而我并不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我虽然是布置草市场大会诸人之一，但我对于掷炸弹的事是毫无关系的，也许检察长格林奈尔对这事的关系还要比我深些。我承认我曾出席草市场大会，但这大会并不是为着用武力和犯罪的目的而召集的。否，这会议是召集来抗议在麦可米克工场外警察前日所犯的罪恶和暴行的。州法庭的证人瓦勒尔(Waller)及其他的人曾在法庭上证明我们在星期一晚上有过一次会议。在这会议中，我们曾讨论到恰恰在几点钟前发生的麦可米克工场事件，我们决定召集一次群众大会来抗议警察的兽行。现在我只要重述这话就得了。瓦勒尔是这会议的主席，他自己也动议在草市场开大会。而且还是他派我做一委员，印刷传单，邀请演说者；我这样做了，此外并没有别的事。第二天我便到威列尔与克

来因公司(Wehrer and Klien)去印了二万五千张传单，又去邀请司柏司到场讲演。在传单的原稿上，有一句‘工友们，到会时要武装起来’这样的话，我的理由是我不愿见在那次大会里像以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工人们无抵抗地被人横加枪击。然而当这传单在印刷时有人送了几张印好的样子到《劳工新闻》社来，司柏司同志看见了一张。我向他说要他到会演讲。他把那传单拿与我看，一面说：‘斐失尔，要是这些传单散布出去了，我便不愿意演说什么。’我承认把那一句取消，司柏司后来便去演说了。我与这大会的关系不过这点。我是在晚间八点十五分钟到会的。后来柏尔森司间断了斐尔登的演说，他站在台上说，快要下雨了，最好迁到柔夫厅去。这时我才离开草市场到柔夫厅，与我同路去的便是此时还在证人席中的一个朋友。我们拣了两个座位坐下，各人喝了一杯啤酒。我的朋友柏尔森司偕着其他几个人进来了。过后我在那里坐了五分钟，炸弹便爆发了，我完全料想不到会有这一类的事发生，因为，便是州法庭的证人他们自己也承认那晚并没有人主张要防卫我们自己。召集这会议的目的，不过是抗议警察的暴行而已。

“而且像我以前已经说过的，在这里法官的判决并不是对于谋杀罪，而是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我觉得我之被处死刑，或将被处死刑，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缘故，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杀人的凶手。我并不曾杀过人。我一生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个谋杀的凶犯便是格林奈儿——检事长格林奈儿。因为他带来一些一点事都不

知道的伪证人。他也明知道这些人的宣誓都是虚伪的；而且假若我果然被处死刑，我便宣告格林奈儿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然而假若这支配阶级以为杀死我们，杀死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便能够毁灭无政府主义，那么，我要告诉他们，这是大大的错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爱他的主义胜于他的生命。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随时随地都预备为主义而死的；然而在这次案件中，你们以杀人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而实际我并不是杀人者。你们要知道，纵然你们能把那些相信主义的人杀死，而主义却是永不能被他们杀掉的。人们为着正当的目的而被处刑的事件愈多，那么，他们理想的实现愈速。例如这十二位‘可尊敬的’陪审法官之不公正与野蛮的判决，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进行反有很大的帮助，比较我们这几个被判罪的人在三十年中所能完成的还要大些。这判决是对于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人民不久也会知道的。我所要说的话已尽于此。总之若我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因爱自由与人道的缘故而受绞刑，我便不觉有什么痛苦，我要高声叫你们，绞死我罢！”

一五 我将快乐地死在绞架上

林格在芝加哥殉道者中算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德国人，生于一八六四年。他于一八八五年秋到芝加哥，即住在赛利格尔(Seliger)家里。他是一个木匠，他便加入一个木工组合。他会制造炸弹。判决他的死刑，是根据着赛利格尔的伪

证。赛利格尔本来也是被告之一，但他因为爱惜生命的缘故，竟受了法庭的贿，做了法庭方面的证人，说芝加哥草市场四日晚上爆发的炸弹是林格做的。本来被告方面有两个证人可以推翻赛利格尔的证据，但法官禁止他们出庭。然而就以赛利格尔的话而论，他也只能证明，林格做过炸弹。

赛利格尔自认他没有钱，曾得了夏克大佐一次一元，一次半元，一次五元的帮助。夏克大佐叫他在法庭说“实话”，又说夏克大佐在他被捕后曾给了他的妻子几次钱，大约二十元或二十五元。他的妻子也出庭做证人。为了三十多元和自己的生命的缘故，便把友人出卖了。

被告方面的辩护士布拉克大佐在法庭上说道：“赛利格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美国很久了。他有三十一岁，林格仅二十一岁，然而大伊立诺伊州由其合法的代表（指法官）居然贿买了赛利格尔（一个成年的人）和他的妻子（年纪更大些），所订的条件是假若他们能够尽力把圈套放在这个小孩子（指林格）的颈项上，他们便能无罪地被释放出来。啊！诸君！这是对于正义的怎样一个侮辱啊！”那一般叫做“法官”的，听见了这样的话，扪心自问，能不愧煞！

据后来资产阶级的报纸所载十二个陪审官中有五个是发狂死的，大概是惭愧过甚的缘故罢！

林格与司柏司等同被判处死刑，死刑的执行期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但十日早晨林格即在狱中“自杀”。情形是这样的：

据说在十一月初，警察在林格的囚室内发现了四个炸弹。

在九日的夜里他坐在囚室内，靠着洋烛的光读书。爆炸的声音听见了，狱卒跑进林格的囚室，看见他的下颚已被炸落了。这究竟是他自杀或是被敌人暗算，他受伤后自己并不曾发一言，实在也不能够说话了。他的短促的一生就是这样的终局。卖友的赛利格尔，叫人卖友的法官从此该可以满足了吧！

然而在四十年后的今日，赛利格尔以及那些法官的骨头早在腐朽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引为卑鄙龌龊的符号。而林格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支加哥殉道者坟墓前的纪念碑将与他们的演说同样的永垂不朽了。

“法官们：你们曾以讥讽的眼光批评我在这‘自由的美国土地’上要谋一个人值得享受的生活的努力，你们现在又以同样的讥讽的态度，在判决了我的死刑后，允许我有发表最后演讲的自由。

“我接受了你们的允许，来作这最后的演说；但我的目的是要把你们所加于我的不公道、诬蔑、压迫的举动尽量的暴露出来。

“你们控告我犯着谋杀的罪，而且判了我的死刑；然而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

“第一，你们叫赛利格尔来证明我的罪。他，我曾帮助过他来制造炸弹，你们又证明我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把那些炸弹运到克利布痕路(Avenue Clybourn)五十八号，但是你们纵然得了你们所收买了的‘学舌鹦鹉’赛利格尔(他似乎在这事件里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帮助，也还不能证明，那些炸弹曾被用到草市场。

“你们又叫了两个化学家来考验炸弹，然而结果他们也只能说制造草市场炸弹所用的金属也与我的炸弹所用的相似，你们的阴幹孟（Ingham）先生拚命说那两种炸弹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话毫没有根据。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两种炸弹的直径相差半英寸，虽然他隐匿了那两种炸弹壳相差四分之一英寸的事实。你们便根据了这样的证据来判决我的死罪。

“而且，你们并不是为着谋杀的事来判我的死罪，裁判官在今晨陈述他的‘全案要略’时说得很。州律师格林奈儿更说过许多次，我们之受审并非为着谋杀罪而是为着无政府，因此那判决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什么是无政府？”

“这一个题目我的同志们已经解释得很明瞭了，也无须我再来解说。他们已很明白的告诉你们，我们的目的是甚么。然而州律师并没有向你们说。他并不批评无政府的学说，他所批评的、判断的只是实现这学说的方法，而且就在这一点，他也完全不曾提到，这是警察的善行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那些方法的，格林奈儿所提出的救济我们困苦的方法，只是职工组织的团结和投票纸，阴幹孟甚至承认六小时制运动的好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我们对于使用投票纸和团结工人力量两件事的每一次的努力都遭了你们的摧残，你们暴露了警察们的禽兽一般的暴行。这便是我为甚么要用暴力来和警察的暴力相战斗的缘故了。

“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我不懂得你们的‘法律和秩序’等于什么东西。它们的代表是警察，然而其中就有许多盗

贼。夏克大佐在这里，他自己曾向我承认我的帽子和书在他的办公室里被警察们偷去了，这样的东西便是你们财产权利的防卫者！

“那些拘捕我的侦探，他们跑到我屋里来，和强盗一样假冒一个住在柏林敦街の木匠的名字罗伦兹(Lorenz)。他们宣誓说只有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里，他们简直在欺骗自己。你们没有传克来因夫人(Mrs. Klein)到案作证，她那时在我那里，她可以证明刚才所说的那些侦探怎样假冒别人的名字闯进我的房来，她可以证实他们的证据完全是伪证。

“我们再说下去。夏克大佐是警察们的长官，他自己也就在说谎。他宣誓说我曾承认参加星期一晚的大会，其实我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他，那晚我在柔夫片参加木工会议。他又宣誓说我曾告诉他，我从莫斯特^①的书里知道了制造炸弹的方法，这也是在说谎。

“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法律与秩序’的代表中的较高级的。州律师格林奈儿及其同事也犯了妄誓之罪。我说他们是有意犯罪的。我的律师已经举出例证了，而且我亲眼看见格林奈儿在基尔美^②出庭的八天以前指示与他，那些要他作证来反对的人们的相貌，叫他认清楚。

“如我刚才所述，我相信要使我自己和工人同胞获得人类应该享受的生活，非靠着武力不可。而同时格林奈儿用他们

① 莫斯特(John Most)：著名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② 基尔美(Gilmer)：法庭方面所收买的证人。

的警察和流氓，收买伪证来谋杀七个人，我便是这七个人中的一个。^①

“格林余儿实在胆小可怜，他在这不许我防卫自己的法庭中来称我为一个胆小的人。鄙夫！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联络了一群卑鄙的被人雇用的流氓来把我弄到断头台上去。因为世俗上的道理除了可鄙的自私，享世上的荣华富贵以及赚利的欲求而外，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棍徒藉着别的棍徒的伪证的帮助来谋害七个人。这个棍徒叫我为一个‘胆小的人！’，然而你们责备我蔑视那样的‘防卫法律者’——那样言语所形容不出来的妄人！

“无政府的意思是不要人压迫人的强权和统治，然而你们叫这为‘扰乱’。无政府是一种制度，它绝对不赞成需要匪徒和盗贼的服务来防止你们所谓‘扰乱’的那种‘秩序’。

“裁判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州律师并不能证明我与掷炸弹的事有何种关系。然而州律师会用手段，会弄笔墨。他说我是一个‘同谋犯’。然而他怎样能证明呢？他断言国际工人协会是‘谋乱的结党’。我既然是这团体的一个会员，所以他把罪名很安稳的加在我的身上。这真巧妙！以一个州律师的才干说来，世间不会有难事的。

“我不必回顾我和我那些在不幸中的同伴的关系。我的朋友司柏司已解说过我们怎样认识的了。我可以诚实地，坦白地说，我与共同受审的诸同伴的亲密程度尚不及我与夏克

① 这时尼伯已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失瓦伯、史尔登的判决尚未减轻。

大佐的亲蜜。

“众人的困苦和资本主义豺狼的肆虐使得我们一起来做运动。不是像分离的个人，而是一群为共同目的的工作者。这便是你们所谓的‘谋乱的结党’，因此你们便判定我的罪。

“我反对这定罪，我反对这法庭的判词。我不认得你们的法律，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斗筭之徒所混杂的凑起来的東西，我也不认得法庭的判词。我的律师引了同等级法庭的判词来证明我们应该有更审的权利。州律师便引了更高级法庭的三倍多的判词来证明相反的一方面。我相信在另一次审判里假如受审的仍是无政府主义者，纵然有利于被告的判词引了二十五册，他们也会找出一百册的判词来证明相反的一方面的。而且甚至就在这样的法律，一个小学生都会蔑视的法律之下，他们尚不以合法的手段来判我的罪。他们尚要收买伪证来诬陷我！

“我明白的告诉你们，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早已向夏克大佐说过：‘假若他们用大炮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炸弹来对付他们。’

“我再说我是今日之‘秩序’的敌人，我更尽力的重复说着，只要我能呼吸一日，我便仍要来攻击这‘秩序’。我再光明磊落地宣言：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曾向夏克大佐说过，而且我预备履行的：‘假若你用大炮来打我们，我们也用炸弹来炸你。’你们在笑！也许你们会想：‘你不会再掷炸弹了’；但是我们将使你们确保我会快乐的死在断头台上，我相信那些曾听过我的演说的千万的人会记着我的话；而且当你们把我们绞

死后，你们也记着我的话，他们会来掷炸弹的。我怀着这个希望向你们说：我轻视你们，我轻视你们的秩序，你们的法律，你们用武力支持的权力。绞死我罢！”

一六 我的意见如是，我的希望如是

恩格尔的演说也是极其雄辩的。

他这样的说：“在一八七二年我离开了德国，因为在那里我已不能得着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生活了。我本来是靠着我双手的劳动来谋我的衣食，然而机器之使用，破坏了我们这一般小手工艺者，使我们的前途异常黑暗。这样我便不得不携着家眷来到美国，因为以前许多人都向我称赞说美国是自由的国土。

“我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八日到费拉得非亚(Philadelphia)，当我的脚踏上这土地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希望而且相信不久我便要在这自由的国家中与自由的人民一同生活了。我决意做一个美国的良好国民，而且庆祝我自己离开了德国来到这光荣的共和国家。我相信我过去的历史可以证明我曾经努力过要做这国土的一个良好的国民。我来到美国的法庭上，这要算是第一次，而这一次我便被人控告为杀人犯。然而究竟有什么理由会使我站在这里？究竟有什么理由能控告我为一个杀人犯？这是和使我离开德国的理由同样的，工人阶级的贫穷、的悲惨。

“而且在这里，在这‘自由共和国’，在这世界上最富饶的

国家内，仍有无数的贫民，他们得不到饮食，他们被现社会所遗弃，痛苦忧愁的过了一生。我曾看见人从街角的垃圾堆里拾些东西来吃，他们每天的食物便是这个。他们藉此来安静那每天每天蚀耗着他们身体的饥饿。

“我又在每天的报纸上读到许多事实，使我相信在这伟大的‘自由国土’内，人们仍不得不饿死。这使我不得不思想，而且起了这个疑问：使现社会发生这样情形的特别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此我对于政治制度更加注意。我的研究结果，使我发现在德国所有的社会罪恶这里也是一样有的。这便是为什么我要研究社会问题，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而且从此我便尽力去研究这种新学说。

“在一八七八年我从费拉得非亚来到此地，我极力想改善我的生活情形，我相信在这里谋生活总会较在费拉得非亚容易一些，实在，在那里我已无法维持生活了。然而在这里，我也是异常失望。我才知道无论在纽约，在费拉得非亚，在芝加哥，对于贫民都是一样的。在我作工的工厂里，我认识了一个同伴，他告诉我为什么工人为谋生活要经过如许的困难，而且没有什么效果。他把那原因指示与我了。他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向我解释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然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且得着国家的保证，那么，要想靠着我的两手的劳动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从前的想法是大大的错误。因为要更进一层地明瞭这些事实，我便以我自己和家属的劳动所挣来的钱购买了许多社会学的书籍。读了这些书籍后，我便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富饶的国家内一个工人还不能安稳地生

活下去了。我现在便想用什么方法来救济这个。我最初想到投票箱；因为我常常听见人说工人用这种方法便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

“我曾以一个好国民那样的热心去参加政治活动。然而不久我便知道‘自由投票箱’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神话，我晓得我又受欺骗了。我便得着这样的意见：只要工人们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绝对不能自由的。我很清楚劳动阶级绝对不能由投票的力量来实现一个保证工作面包以及幸福生活的社会。

“在我对于投票箱的办法还是信仰的时候，下面的一件事情发露出了，这使我相信在这国家内的政治家是极其腐败的。我住在第十四区，我也有投票权，在这一区里社会民主党异常发达，已足危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于是共和、民主两党便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这自然是应有的事，因为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然而当社会民主党的候补人选出来后，他们的胜利的结果，仍被那两个旧政党的阴谋所破坏了。投票箱被人偷去了，而且票也被人‘改’过了，因此他们无法宣布他们的候补人被选出这回事。工人要在法庭上求得公正的解决，然而结果无效。诉讼的费用共一千五百元，而他们的权利一点也不曾争到。

“不久，我又明白政治的腐败阴谋在社会民主党里也是一样有的。我便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加入当时新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团体的会员都坚定地相信工人要从资本主义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只有用武力之法，恰如历史上所讲的进步一样，

都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就拿美国的历史来说罢，第一次殖民地的人获得他们的自由，也只是靠着武力；奴隶制之废除也只是靠着武力，而且因为那个反对奴隶制的人被迫上了断头台，所以我们也必定要像他那样。在现在替工人说话的人也必要受绞刑。为什么呢？因为管治这个共和国的并不是那些忠于职务的人民。

“所谓保卫国家的利益的人——住在华盛顿城的首领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呢？或是靠着金钱的帮助呢？他们没有权利来替我们制定法律，因为他们并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我并不尊重你们美国的法律！

“因为机器的改良遂使许多人陷于失业的困境中，有的人减少了一半作工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们有思索的机会了。他们有空闲的时间，他们思索怎样才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那些替他们说话，保卫他们利益的书报到了他们的手里，虽然他们不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撮取这些书报中所含的真理，在他们是做得到的。这自然是资本家所不高兴的事，但他们也没法来阻止。我始终相信在较短的时期内，那极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会明白，要脱离多年的束缚只有由无政府主义的一条路。我们总该记得加尔·苏尔士(Carl Schurz)差不多距今八年前曾说过：‘在这国内并没有社会主义活动的余地。’然而今天社会主义便出现于这法庭上了。因此更相信要是这几年来足以使社会主义成了一般人极其注意的问题，那么，只要很短的时间便可把它施诸实行了。

“关于我的判决我所要说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惊骇：因为那些努力开导他的同胞求他们的进步的人，常常被投入监狱或被处死刑；自古已如是，约翰·鲍尔^①的事件便是这样。我久已觉察出美国的工人所有的权利，并不比他们工人所有的多一点。检察长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国民，我早已是美国的国民了，但我并不曾要求过国民的权利，我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分别的。国民也好，不是国民也好——我是一个工人，所以我没有权利，因此我也不尊重你们的权利和你们的法律，这都是一阶级制造出来，而且指挥着来压制其他一阶级——劳动阶级的东西。

“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绝对不会有人利用机械的改良获得百万的财产，而大多数的群众却陷在堕落与困苦의深渊里。既然水和空气是大家可以自由享用的，那么，科学家的发明也应该用在大众的利益上。我们所有的成文法是和自然律相反对的，那些法律把大多数群众的自由、生活，以及求幸福的权利都剥夺去了。我的罪名不过如此！”

“我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因此不能不和现社会情形宣战。凡是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攻击那个使几个人能在数年之间聚集了百万财产，而同时使千万的人成了乞丐和游民的恶制度。

^① 约翰·鲍尔(John Ball)，英国农民暴动的领袖，后被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便起来了，他们努力来创造另一种环境，在这新环境中第一被重视的就是人道，这难道是可惊奇的么？这便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为我所乐意赞助的。

“检事长说无政府在审讯中。

“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是与社会主义一样的。我说，不要再相信投票的办法，只要使用一切可由你处置的其他手段，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被人审判——因为我们曾把正当的路指示与人民。在各处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为此被搜索被迫害了，然而其结果反使无政府主义得到更多的信仰者，而且假若你割断了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就要秘密的做去。假若检事长以为他绞杀了七个我们的人，又判了一个人十五年的徒刑，便可以无政府主义铲除净尽了，那么，他完全错了。战略不久便要改变的，一切都在于此。地上的权力绝对没有能消灭工人们制造炸弹的知识的，他们已有这知识了。我希望检事长格林奈儿和他的帮手富士满(Furthman)不要遇着警察长龙甫(Rumpf)那样的运命。

“假若无政府主义是可铲除净尽的，那么，在别的国家内应该早已做到了。然而究竟怎样呢？

“在这国内第一次炸弹爆发的那晚，我正在我自己的家里。检事长极力想证实我们的阴谋事件，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诚然这次被审判的同人中有几个是我所认识的，然而大都与我并不十分熟识，有时在会场中遇见他们或听他们演说。我也承认我曾在会场里演说过，我说，要是每个工人都有一个炸弹在他自己的袋里，那么，资本制度的末日就会立刻到了。

“我的意见如是；我的希望如是；当我发觉资本制度现在情形的弱点，这便成了我的信仰了。

“当数百个工人因为矿坑里的设备不良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时，那矿山主还是异常吝啬，不想修整和善后的办法，资本家的报纸也不注意到这样的事。然而当工人们为要求增加几分钱的工资来维持生活的缘故被人枪杀时，那资本家报纸上的记载是何等满意和残酷啊！

“政府是专门给权利于特权阶级，并没有什么权利给工人們的，这样的东西会有人觉得应该尊敬么？最近我们还看见一件事实：几个煤业领袖联合起来阴谋提高煤的售价，而同时减少原已很少的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法庭不控诉他们的阴谋呢？然而当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政府便派出军队来枪杀他们了。

“我蔑视这样的政府，我要同它宣战。我蔑视它的权力，我更看不起警察和侦探。

“我所憎恨的，我所要攻击的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那个给他以许多特权的制度。我的最大愿望是工人不久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而谁是他们的敌人。

“至于我的判决，我知道这是由资本家的势力而决定的，我一句话也不说。”

一七 我愿自由的牺牲了我的生命

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庭演说中，以司柏司、斐尔登、

柏尔森司一人的演说最为雄辩，最能动人。斐尔登在他的演说的开始背诵了一首有名的诗，就是弗勒利格拉斯的《革命颂》。

他先辩驳他和草市场的事件没有一点关系。他指出他们的判罪，仅仅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缘故。他又说到劳动阶级的惨状。关于他们的判罪，他说：“我们曾因法官以为我们有罪而受审判，你们也将因他人以为你们有罪而受审的。”

斐尔登又以和平的宽大的态度说：

“汤姆生·古贝(T. Cooper)在他老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友人来拜访，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本有图画的书，跑到他面前，翻开书，指着空白页向他说道：‘古贝，给我写点东西在上面罢。’古贝便写着：

爱真理罢，我的孩子，爱真理罢；

拥护真理使它光明，

它会使你的青春之晨欢欣；

虽然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斗争，

但它将永远使你保持着正直和真诚。

“我有一个孩子，今天他在西边街的家里跪在他母亲的旁边，告诉他妈妈说，他想他的爸爸回来。对于他，我决定了，当他能鼓动他的如簧之舌的时候，我要将这美丽的感情教他。假若我因宣传真理而被判罪，而受绞刑，那么，最好不必教这个小孩子读书，最好不要将这爱护真理的感情教他。假若他们因敢于宣传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受绞刑，那么，最好把你们的学校一个个铲成平地，不要留一块石子在地上。”

斐尔登结论道：“今天当秋天的美丽的太阳以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我却站在这里，我的头是永远不能再沐着阳光了。我爱我的同胞与爱我自己一样，我恨欺骗，我恨虚妄，我恨罪恶。十九世纪犯了杀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罪，他将要悔恨的。但是，如我以前所说，假若我的死刑能够有点好处，我愿自由的牺牲了我的生命。我相信那个时代会来的，那时将有较好的理解与智慧存在。在那不平、罪恶与行贿的山上，我希望真理、正义与公道的太阳，以它的光亮洗浴出一个解放的世界来。”

一八 一生最优美的演说

柏尔森司是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每篇演说都是极其动人的。在审讯时，七月九日，他在法庭上把五月四日在草市场的讲演辞重述出来。第二天芝加哥《太阳报》批评道：“昨天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审讯的最高点。失凡伯、司柏司、柏尔森司等相继在证人席上对着一群如着魔一般的听众，一些惊愕的陪审员，以及惊惶失措的裁判员叙述他们自身的故事。柏尔森司尤其雄辩，泰然自若。当司柏司退席之后，柏尔森司接着走上证人席，他的兄长柏将军在旁听席中两眼注视着他。对于法官严重的发问，柏尔森司全以安静谦和的声调来回答，毫未露出惊惶之色。后来他被要求把在草市场大会中的讲演辞重述出来，他这样做了。自这次审讯开始以来，若说陪审员、法庭听众等曾受着礼遇，那么他们便受着这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

中的主要煽动者的礼遇了。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束记录，便开始对着陪审员演说，他的声调表示出这演说者是在准备一生的最优美的演说。幸而这证人席的椅子是活动椅，能旋转的。他左手握着记录，右手随着身体的转动，做出各种姿势。他以低的合度的声调开始讲演，后来反复申说，从雄辩到技巧，从技巧到逻辑，从逻辑到辩驳。”

这可见柏尔森司的演说之能动人了。而这次最后的一篇演说更是优美，更能动人，并且是最长的。他足足演说了八个小时。十月八日演说两小时，九日演说六小时。他把他所从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劳动运动完全重说了出来。他说，假若他希望那结党营私、公然受贿的裁判官心中还有一点正义与理性的感觉，他便错了。他的演说以一首著名的劳动歌开始。便是黑尔威格的《自由颂》：

世界冷然地叫道：“劳苦啊。祈祷！”

时间是黄金，不要慢慢地去祷告。

在你的房门前，需要的脚步已敏捷地走到；

快快地祈祷罢！因为时间就是面包。

你耕种了田，你斫伐了树，

你修建了屋，你纺织了布，

你收获的只是一些荒草；

说罢，人啊，究竟你曾得着什么了？

你日夜不息地穿梭，

你辛辛苦苦地开矿，

你使大地上的珠宝丰饶。
还有酒啊，谷啊，你造出来的已经足够了。
但谁曾为你预备下了饮食，
谁又曾给了你节令时穿的美衣；
谁又曾给了你防御饥馑的良言，
呵，哪里又是你的快乐的家室？
你曾创造了周围的一切，
但所有你的工作，哪一样为的是你！
呀！你身上带着重重镣铐，
这一切都是由于你自己的铸造。
镣铐紧紧地锁住了你的身躯，
镣铐紧紧地束缚了你精神的飞翼，
你的小孩们的脚上还带着重重的脚镣，
看啊，工人们，这就是你劳苦的回抵！
你们拼命地劳动勤苦，
养活了一般懒惰的人物；
你们辛苦地织五色的丝，
可怜啊，只织成了你们自己的困苦。
你们造好了房屋，自己却不能居住，
你们更没有蔽风雨的住处；
你们为那些骄傲的人做了精美的鞋，
穿上了鞋，他们便来践踏你。
呵，人类的蜜蜂啊，
难道丰富的自然所给你的，就只有那做蜜蜂的本领？

看罢！懒惰的雄蜂四处飞翔，
你的蜂刺呢，为什么不把它们刺伤？
劳动的人们，起来罢！
你们要知道你们有的是权力，
在你们有力的手腕的命令下，
一切机械的轮转皆会停止。
当你不愿工作的时候，
你的压迫者会将他的双手缩回，
当你说：“已经做够了！”
放下你的锄头，你的事业便开始了。
打倒这相连的二重束缚：
破坏那奴囚你的贫穷的镣铐！
推翻奴隶制的贫穷与残暴；
啊！面包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

他的重要的话是：“无政府是什么？——我因为它而被判死刑。政府是专制；政府是一个压制的组织，法律（成文法）就是它的代理者。无政府是反对政府，反对治人者，反对独裁者，反对政党。无政府是否认武力，是废除社会事务中的一切强权；他否认人管治人的权利。所有的事物只要是进化的便是社会主义的。在现在世界的劳动运动中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政府与强权；其他的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政府管治一切。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以法律的力量来解放工钱劳动者，要以合法的法令来解放他

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求有选择治理他们的主人的权利，无政府主义者不要任何种类的治人者，也不要任何种类的制造法律者。……无论是一个人压制百万人的政府，或是百万人压制一个人的政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多数压制与反对少数压制是一样的。……多数人来指挥少数人，其结果仅使他们自己变成暴虐者；他们成了剥夺者，他们会否认他人的权利。”

后来他又说：“我们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产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都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

柏尔森司最后说：“诸位，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你们把我绞死以后，社会革命便停止了吗？啊！恐怕不至于如此罢！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而起的，便是美国与全世界的人民对于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自然要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

一九 悲壮的结婚

当司柏司等在法庭演说的时候，旁听席中有一位凡冉特女士(Nina Van Zandt)，她是一个大富豪的女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居然愿意和那已经被判死刑的司柏司结婚。她自述道：“我对于这些被告，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进旁听席的时候……我本是带着一种好奇心，来看那些愚顽无知、不识法度、将受绞刑的人。谁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大为惊异，

那些被告，不但不是愚顽无知的人，而且都是极聪明极勇敢的义士；他们的态度正引起了我的同情……我很愿意和被告处在同样的地位。我对于他们的热烈的同情，引起了我对于司柏司浓厚的爱情，并且这爱情立刻就变成不可制止的情欲了。”

凡冉特女士在监狱里访过司柏司几次，他俩便订了婚。但在监狱是不能行结婚礼的。凡冉特向法院要求，竟遭拒绝。于是司柏司只得请他的兄弟作代表行结婚礼。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的《反抗者》（克鲁泡特金创办的）第四十六号上发表的《纽约通信》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同志能出监狱来与他的勇敢的妻子同享生活的幸福。”然而出监狱的已不是生龙活虎的司柏司，而是他的尸体了。

凡冉特女士当时曾大受社会的攻击，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的答复是：“我宁愿受着这无理性的社会的攻击，决不愿牺牲自己的主张。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是发生于理想的投合与乎痛苦的同情的。而且我最佩服我这些新朋友，因为他们认识纯洁的爱情的。”

二〇 一个纽约的牧师

在这金钱势力淤满了的美国内，正义、人道的名词早已成了梦幻了。这时候居然有一个纽约的牧师，他听见了判决的消息，愤怒到了极点。他牺牲了自己的几千元的俸金来替被告辩护。他的伸冤状内有一节如下：

法庭和政府都是保护富人以及无人格者的东西。工人为谋改善他们的情形起见，开会讨论办法，本无恶意。但警察竟以暴力来解散他们，投炸弹的人也是以自卫为目的。既然一方面以暴力压制，他方面也就可以暴力抵抗。以人权而论，并非违法的行为。

这个牧师叫做彭特可斯特。他的举动既可证明司柏司等无罪，又可证明正义、人道终究不能消灭的。然而全美国的牧师中只有彭特可斯特一人来为若殉道者辩护，可见那些“假冒为善”的牧师教徒原是与资本家狼狈为奸的。

二一 “我愿意死”

在听了被告的勇敢的骄傲的演说后，裁判官加利竟恼羞成怒，于是陪审员的判词又经他承认了，在十月九日他便向被告宣读判词。被告的律师要求再审，又被裁判官驳回。再上控到本州最高法庭去，到了一八八七年九月十四日，又遭最高法庭的驳斥。最后上控到合众国的最高法庭，又被该法庭以无权受理的托词拒绝了。法律上的手续都用尽了，只有请求州长减刑的一条路可走了。

当被告律师正预备上控到合众国最高法庭时，林格与恩格尔在监狱中写了下面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知道你们，特别是律师预备向合众国的最高法庭

上诉，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我反对这种举动，我反对向治人阶级去要求“正义”！

朋友们和同志们！我很愤恨这种办法，难道我们要使人们疑惑工人们竟是如此愚蠢，还需得那最高法院（这是合法的暴政，掠夺和资本的最高的化身）再来证实一次这可耻的判决，才能明白那些匪徒们之所谓正义么？……

假若有人说我相信在我们的死刑执行时美国的人民会真正觉悟的，那么我要说我完全不是这样想。而且我还反对那种思想——就是芝加哥的同志们以为他们有尽力援救我们的义务。因为要能够救出我们，非有大的暴动不行，这不是几个人的意志所能做成的。所以要责备我们的同志不努力，这太不公道了。我们应该责备全部的工人群众。

反而我愿意死，我坚决的相信我们的牺牲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早日灭亡，较之我们再在监狱里住三四年，等候合众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当好过千万倍。我以为治人阶级的这种“正义”对于全世界的自由的害处，比较他们的在暴的复仇还要厉害些。

这便是我的决定的理由。

无政府万岁！以兄弟般的感情祝福你们。

鲁宾·林格

林格的意见也就是我的意见。

恩格尔

林格是错了，他以为治人阶级还有一点冒牌的“正义”，其实那般畜生连冒牌的正义也没有的。到了十一月二日合众国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便公布了。

二二 绞杀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

法律的手续既用完了，那么只有要求州长减刑的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在州长阿格列斯拜(R. Oglesby)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从各处来的请求减刑书。各国无产阶级也开会抗议。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也表示他们对于“法律下的谋杀”的憎恨。著名社会主义的文学家摩理思(W. Morris)在寄诗人勃朗林(R. Browning)的信里说：“我请求你在这请求减刑书上签名，尽你所能做到的去救七个人的生命，他们在经过了一次滑稽的审判后便被判处死刑。……我不知你究竟曾否留意这件事，英国报纸也少有记载。然而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说在芝加哥劳动者与资本家斗争激烈的时期中，他们为着他们的主义竟代芝加哥全体工人牺牲了。……”

克鲁泡特金写了一封《告美国人书》在纽约《明星报》发表。他说：“假若我们的同志被绞杀了，我们也要求工人来绞杀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因为这是他们激起那一群匪徒来杀害我们的同志的。”

二三 司柏司愿代同志死

一切都完了，只有盼望着州长来减刑了。照例律师请求减刑时被告应该在状上签名。然而这七个人都不肯签名。他们的同志不忍见他们去死，便写了无数的信要求他们在减刑状上签名，他们的家属也苦求着。著名纽约的无政府主义者尤斯达斯·失瓦伯的一封信感动了斐尔登、失瓦伯、司柏司。他说，“要是你们存在，自由也就存在了。……”斐尔登、失瓦伯、司柏司三人便在减刑状上签了名。同时司柏司等三人联名寄了一封信与州长，柏尔森司等四人也各上书州长，他们要求正义，不要求特赦。司柏司又写了一封信与州长，要求州长保全他的同伴的生命，只把他一个人杀了来平息资产阶级的愤怒。他在这封信里首先解说何以他和斐尔登、失瓦伯三人签了名，而柏尔森司等又不签名的原因。最后他说：“我依这国土的习惯请求你阻止这种七重的谋杀，这些人的唯一的罪名不过因为他们理想家，他们渴望着全人类的较好的将来。假若这法律的谋杀是免不掉的话，那么我请求你杀了我一个人好了。”然而伊立诺伊州不仅杀了他，而且把他的四个同志也杀了。

二四 给我以自由，否则便给我以死

柏尔森司本来可以不死。检察长格林奈儿在控诉完毕时，

曾说被告的罪名是有等级的，其次序如下：司柏司、林格、斐失儿、恩格尔、斐尔登、柏尔森司、失瓦伯、尼伯。格林奈儿后来又向人说斐尔登与失瓦伯可望减刑。柏尔森司因为是自首的缘故，本不应处死刑，格林奈儿也有意开脱他的。但他的八小时的演说，寒了那畜生的胆，一线的希望也被铲除尽了。

州长也有意减轻柏尔森司的死刑，然而柏尔森司以为“不自由勿宁死”。他寄给州长的信里以轻蔑的态度拒绝特赦，他要完全的自由。在《告美国人书》的结尾，他引用亨利(Patrik Henry)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的宝贵，和平竟是如此的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铁练来作代价么？万能的神吗，阻止它罢。我不知道别人将走什么样的路，至于我呢，给我以自由，否则给我以死。”

布拉克大佐记述当时的经过情形道：“……我明白地告诉柏尔森司，只要他肯在减刑状上签名，舆论一定会使州长减轻他的刑罚的，……他回答我道：‘我知道我若签名，我的刑罚会被减轻的。前星期日《每日新闻》的主笔来我因室谈了两点钟。他极力劝我签名，并且说我若这样做了，他们的报纸一定替我鼓吹。我明白这个。然而我不这样做。我志已决，我请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是无罪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无罪。假若我果然被杀了，这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谋杀犯；因为我过去的演说和论文，而不是因为我曾掷了草市场的炸弹。假若伊立诺伊州的人民能够绞杀这个自投罗网的无罪的人，我也能够为我的主义而甘愿被绞杀。’我听了这样的话竟不知要怎样答复才好。我觉得我的脸

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柏尔森司的脸突然温和了，他又说道：‘我告诉你我的真正的秘密，相信我罢。我有一线希望（固然是很薄弱的），我希望我的态度能够救出林格、恩格尔和斐失儿来。司柏司、斐尔登、失瓦伯已签了名，可望不死。然而政府是决意要杀人的。要是我签了名，我便可不死，但林格、斐失儿、恩格尔三人就没有活命的希望了。所以我决定与他们处在同样的命运中。我知道这希望有限得很，在一千分中只有一分的希望；然而要想救他们，只有这样的办法了。其结果，他们怎样我也就怎样。我是绝对不愿和他们离开的。我恐怕结果定是我会同他们一起被绞杀，我已预备好了。’我不能辩驳他的话，而且我也不想。我明白柏尔森司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知道只有这种办法也许可以救活其他的三个人。我也知道结果大概会是他们一起被杀。然而对于这一个人他安静地去就死而且决意牺牲自己以求忠实于同志，对于他，我没有话回答了。我握着他的手，注视着他的脸，而且向他说：‘你的行动是值得的，’就离开监狱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见州长时，他问我柏尔森司签名没有，我知道他的命意。在星期三（十一月九日）我最后一次和柏尔森司会面时，我还向他说，就是在现在他肯签名，他也不致于死，他安然地答复道：‘我不能够这样做，我预备忍受一切的命运！’我只得再握了他的手，便走了。我知道有些人读了我的叙述会明白何以我爱这个人以及他的同志们。他是一个英雄的材料。我不迟疑地说柏尔森司是一个英雄。”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郎无^①叙述当时的情形道：“在死刑执行期逼近了的时候，柏尔森司的事便有了希望。他的自首和他的无畏的态度已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律师们和许多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求他在减刑状上签名。……我向他说林格等五人中，只有他（柏尔森司）可望减刑。他恳切地激动地回答说，‘然而斐失儿和恩格尔说假若我肯签名，他们也愿意签名；他们愿听我来决定。你看他们会得死么？’我说林格、斐失儿、恩格尔、司柏司等四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于是他站了起来以坚决的态度说：‘难道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愿意被那种思想来缠着，说我出卖了同志，叫他们徒然地做出胆小的举动么？不，我愿意和他们同死！’在他遇害前的两晚，他的同志们甚至于他的妻子都被拒绝入狱去看他，然而有人去告诉他说，《每日新闻》的主笔司顿君要在图书馆内见他。柏尔森司说非司顿君亲到囚室里来，他是不愿见的。司顿便跑到囚室来，他是公民联合会的主要份子，他和柏尔森司谈了三小时之久，他以和善的态度又以柏尔森司的妻子儿女的名义要求柏尔森司在减刑状上签名，以便保全他的生命。柏尔森司早拒绝了。最后柏尔森司被说得厌烦了，跳起来用手指着他说道：‘司顿君，你对于我的命运也应该负责。我被囚在这里等候星期五的死刑，大部分也是由于你的力量。我来自首，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人；然而你们报纸上的恶毒的攻击帮助判定了我们的死刑。我死，我以一颗坦白的无畏

^① 郎无(Dyer Lum)，后来也是一个殉道者。

的心同死，而你活着，你会觉得悔恨和恐惧的，因为我的血喷在你的头上了。我的话已尽于此！去罢！”司顿便走了。……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一群无耻的匪徒要想把他绞死的。”

二五 为未出世的孩子而死

就在这晚上司顿走了以后，柏尔森司在监狱中写了给他的八岁的男孩、七岁的女孩的一封最后的信：

我的亲爱的孩子们：

当我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已流了无数的眼泪在你们的名字上了。我们永不能再见了。啊！我的亲爱的孩子啊，你们的爸爸是怎样的疼爱你们。我们拿为爱人而生的事实来表示我们的爱情，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又拿为爱人而死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爱情。至于我的一生以及我的非自然的残酷的死。你们可以从他人处听来。你们的父亲是自由与幸福的祭坛上之自愿的牺牲。我留给你们的遗产是一个诚实的姓名和尽了的责任。你们保存它，发挥它罢！对于你们自己要忠实，那么对于别人也不会虚伪的。你们要勤勉，要刻苦，要快乐。你们的母亲啊，她是一个最伟大最高贵的女人。爱她，敬她，服从她罢。我的孩子们，我的宝贝，我求你们在每年我的忌日中读一遍这封告别的信。你们要想着他，他不仅是为你们而死，他也是为那些未出世的孩子而死的。祝福你们，我的爱

儿。永别了。

你们的父亲阿尔伯特·柏尔森司

在这信的封面上他叫他们要等到第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他的周年纪念日)才可以拆开来读。

二六 我的宗教

在写这封告别信的前六日，柏尔森司曾寄了一封信给《芝加哥民报》，

《民报》记者：在本日《民报》的《人民之声》一栏里，一个读者来信问道：“敢问无政府主义者柏尔森司的宗教是什么，或者他究竟有无宗教，请答复，以决众人之争论。”你的答复是：“没有”。

关于我的宗教的问题，在我被法律谋杀了以后，一定会引起争论的，那时我却不能够来说话了，所以在现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愿意来答复你们的问题，来决定你们的争论。宗教一个名词，照现在一般人的使用上看来，只不过表示一种迷信的盲目的信仰，和奸滑的流弊的假面具罢了。

假若果然有一个控制宇宙地球以及人类的万能的上帝，那么为什么那些信奉“他”的教义的人们居然来拥护人造的政府和人为的法律，而且不惜违背“他”的教义，侮

奉“他”的仁慈，用滴血的武器来防卫这人造的政府和人为的法律呢？

我的宗教——假若这可以说是宗教的话——就是：正当的生，正当的死。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道。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儿戏、欺骗和圈套。

柏尔森司

二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殉道者在监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也在外面表示他们的愤怒了。纽约职工联合的宣言在无数的抗议书中要算是最沉痛的了。

这篇宣言里有一节是：“为什么法庭要判定这些忠实的人的死刑呢？——因为他们敢于使用美国宪法所定的自由的权利。除了这个罪名而外，他们是一点罪名也没有的。连裁判官等的诬告以及被购买来的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出其他的罪来。而且你，美国的人民啊，法庭是假借了你们的名义要来杀这些人的。你们能够听随人假借你们的名义来犯这样可耻的谋杀么？不，千万个不，你们快起来使你们的抗议成为有力的呼声。你们不要相信人道之敌的话，把‘无政府’当成怪物那样。‘无政府’并不是人与人间的野蛮的斗争，它是人类之博爱的和谐。这是废止游惰阶级对于工人的掠夺，这是废止专制的暴政；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政府——这

是人道，这是自由，这是正义。”

宣言的结尾是：“他们要实行恐怖主义了。他们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好罢，他们的恐怖只有用赤血来压制的。布鲁塔斯^①难道还在酣睡么？对于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再是无意义的语句了。”

二八 我何幸而得为主义牺牲

斐失儿在死刑前六日也写了一封诀别的信与约翰·莫斯特：

亲爱的朋友约翰：

因为我们只有六天可活了，我愿意和你告别。你从新闻纸上当知道我们中有四个人是不肯在减刑状上签名的。就是说我们要自由，不然就要死。政府既不能给我们以自由，那么我们只有死了。

约翰，你知道我一想起我的妻子和三个小孩，我的心便强健起来了，我连一点妄念也没有。社会革命需要着促进的力量，而我们的高贵的主义“无政府”也需要着殉道者。我何幸而得为我们高贵的主义牺牲生命！

那些可怜的农民应君主之命作了专制的祭坛上的牺牲，难道我们争真正自由的战士便不应该为了我们的伟

① 布鲁塔斯(Brutus)：刺杀罗马大将该撒者。

大的高贵的主义而牺牲生命么？

那些不忠实于主义的胆小的人连为主义烧灼一根手指的勇气也没有。难道我们要学他们么？我们应该指示与我们的敌人看，无政府主义者是能够为主义而死的。我对于我的主义是忠实的，我以我的死来证明。——因此，我就向你告别了。

望你仍然像从前那样忠实于我们的主义，而且不管怎样困难，仍望你永远高竖着我们的旗帜。

我希望你能活着直到那大战斗的日子。啊，我也很愿意我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身死在我们旗帜之下。然而这不能够。我已坚强地决定像一个先驱者的样子而死，像这次大战的先锋的样子而死。那么，——永别了。

社会革命万岁！无政府万岁！

阿道尔夫·斐失儿

问候各同志及各朋友，请你帮助我的家庭，使我的妻儿不致饿死，我的孩子能受教育便够了。

斐失儿再及

二九 林格有母

林格在死囚牢中拒绝在减刑状上签名的时候，他的母亲写信给他说明：

你知道，我也是这样的。我为着你、你的妹妹以及我

自己的面包已苦斗了一生了。你在生我以有你这个儿子而骄傲，你死后我也是以有你这个儿子而骄傲的。虽然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愿意像你那样做；假若我是一个男子啊！

林格的婶母没有儿子，她平日很爱林格。这时她也写信给他道：

亲爱的鲁意：不管你遇着怎样的命运，——即便是最坏的——千万不要在这苦痛的情境中露出一一点懦弱的样子来！

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的！林格真正可说是有了母了。

三〇 这是一个人，一个英雄

“这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四十年前出版的《反抗》周刊上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描写林格的死，这是不错的。

林格是在监狱中自杀的，时间是十一月十日的早晨，是在州长的决定还未公布，斐尔登的死刑还未减轻的时候。林格的自杀是必然的，因为像他那样性格的人绝对不能被人像猪狗一般的绞杀。柏尔森司等是伟大的，然而林格是勇敢的。他是绝对不能被绞杀的。

他在囚室内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制造起炸弹来。他的囚室内有两个炸弹：一个是圆的，还有一个，这是在煤气管里面

装满了炸药和铁屑，管头是盖着的，只要激烈的撞击一下，至少监狱的大部分是要被扫去的，几个殉道者自然会回归于尽了。

然而六日的晚上恩格尔服毒自杀，未成。据他自己说，他的妻子很早便把鸦片烟拿进来了。不幸这事被狱卒发觉，立刻带进医生来把呕吐的药灌进他的口里，又强迫他在天井中走了两小时。居然把他救回来了。然而在六日之后人们又把他送上绞首台去。

恩格尔的失败影响了林格的工作，他的囚室第二天便被搜查，炸弹的秘密也被发现了。然而林格是不肯屈服的。隔天他又写信痛骂他的敌人，说他不肯被他们绞死。狱卒又来检查他的囚室，一无所得。

十日的早晨狱卒站在林格的囚室门口，看见林格燃火柴吸烟。突然炸弹爆炸，林格倒在地上，他的下颚完全被炸脱了。血不住的流，经过五个小时的苦痛后，他便死去了。

资产阶级究竟不曾绞杀了林格。虽然这样的死比那十几分钟的绞刑更苦痛些，然而林格究竟完成了他的性格的一致，就在死的时候他也寒了资产阶级的胆了。

三一 爱正义恨罪恶的斐尔登与失瓦伯

就在林格自杀的那一天，伊立诺伊州州长的决定公布了。斐尔登、失瓦伯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斐尔登、失瓦伯的减刑是在一般人意料中的事。因为资产阶级要顾全一点面子，要

表示一点他们的仁慈心，而且要敷衍那从四面八方来的无数的抗议，他们便不得不保全一两个被告的生命。斐尔登、失瓦伯两个人的罪名最轻，自然可望保全。

十一月八日裁判官加利在致州长的一封长信中曾批评斐尔登道：“这个人的天性中含得有一种宝爱正义和憎恨罪恶的性质。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他又是诚实的、勤勉的、和平的人。他在法庭中的演说又是很和平而且合度的。他以后的言语及行动又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草市场的炸弹事件有一点关系。总之，与其说他是一个以演说或文章来引人犯暴行的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心家。”

格林奈儿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增加道：“因为要表示我赞成裁判官加利的陈述，我愿意在此加上我的意见，我说失瓦伯也和斐尔登一样，他在审讯中的行动，他在法庭的演说都是很合度而且可赞美的，对于法律亦无不合。我相信失瓦伯是一个温顺的人，是一个有较强的意志和那些更奸滑的人的柔弱的工具。”

这样在十一月十日斐尔登与失瓦伯的死刑便被州长减轻为无期徒刑了。斐尔登与失瓦伯听见了这个消息，脸上顿现出苦痛之色，他们说，他们愿意突然而死不愿慢性的被杀。

假若裁判官和检事长的话是真的，斐尔登是爱正义、恨罪恶的人，又是诚实的、勤勉的、和平的人；失瓦伯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们的演说既是合度的，那么他们一点罪也没有。然而就是这同样的法官借着同样的法律的名义把这两个无罪的好

人判了死刑，又由州长出来把他们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

从此还有人肯相信那恨正义、爱罪恶的法律么？

三二 临刑的前夕

州长的决定是在十日午后公布的，这时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殉道者的家属及同志们的悲哀自不必说。而殉道者自己却是泰然自若的。斐失儿和恩格尔一点表示也没有，柏尔森司微笑着，司柏司痛骂那些吃人的畜生。

恩格尔在这天晚上，尽力向狱卒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人问他：“你真完全不怕死么？”他的回答是：“你看我罢！”斐失儿很悔恨不能像林洛那样的死，而让资产阶级来杀他。司柏司见着牧师。牧师说：“我来为你祷告。”司柏司昂然答道：“你应该为你自己祷告，你比我更需要忏悔。”司柏司拒绝了牧师，便来写信。在这天晚上他向守着他的两个狱卒演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真谛，以及法庭的欺骗。

柏尔森司在这晚上是很快乐的，他和管狱谈了三个小时。最初谈社会主义，谈无政府，又谈草市场事件，后来谈到他的妻子和儿女，谈到最后，他竟悲哀起来了。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勇敢的妇人，一个忠实的妻子，一个良善的母亲。他又唱了许多首的歌。当他唱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在邻近的囚室里躺在床上用肘支着头静静地听着。直到三点钟柏尔森司才入睡。在天井中人们正在筑绞刑台，声音很响亮，殉道者听见了，并不曾现出苦痛的样子。狱吏劝柏尔森司早点安睡，柏

尔森司滑稽地答道：“听见这筑绞刑台的音乐，人怎么能睡觉呢？”

三三 最后的一日

在临刑的那一天，殉道者起得很早。每人都接到很多的电报，他们也发了些回信出去。恩格尔和牧师讨论神学，就在最后的几点钟内，他还攻击那般假冒为善的教徒。牧师又去找司柏司，然而司柏司一面吸烟一面写信，并不睬他。斐失儿和狱卒谈到他的家乡和他的儿时的情形，斐失儿又唱《马赛歌》，他的同志们也唱革命歌和之。柏尔森司和狱吏布南奈德说：“我一生常为同胞谋幸福。我和一颗清白的心同死。我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死的。”他又向人说他的妻子是一个有“狮心”的女人。有人劝他喝一点刺激性的东西，他拒绝道：“我愿清醒的死！”

司柏司在赴绞刑台以前接到一封信，他读后沉思了半晌。柏尔森司接到四个电报。第一个是他的哥哥发的：

亲爱的阿尔伯特：今晚有一群天使以怜悯的眼光注视着人对于人残酷的惨剧。现在全欧美有数百万的心在为着这几个“为人道而死的人”悲痛了。我以你的高贵，你的刚毅，你的遗传的英雄气概而自豪。

你的哥哥 十一月十日自纽约发

接到了第一个电报，柏尔森司把一方红色的丝帕送与他的哥哥。

第二个——

柏尔森司：不要告别，但为弟兄们欢呼。从绞刑台上，队伍的出发快要开始了。我预备来听铛铛的鼓响。

J. T. 十一日自波士顿发

第三个——

柏尔森司：光荣的殉道者，为着社会的进步的缘故勇敢的就义！

C. R. D. 十一日自圣路易发

第四个——

勇敢的柏尔森司：你的名字将长存于世界，不久人们便要问：“阿格列斯拜是什么人”了。

四公民 十一月十一日自旧金山发

柏尔森司读了第四个电报后，就在这个电报的背面用铅笔写着：“柏尔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交与狱吏布南奈德说：“我送给你一件纪念品。”

一个狱吏劝柏尔森司喝一杯酒。柏尔森司拒绝道：“谢谢你。我愿意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和一碟饼干送来了。他喝了咖啡吃了几块饼干，便向狱吏说：“我觉得什么都对了。让我们来弄完那件事罢。”

十一点五十分执行官到狱中来了。四个殉道者穿上了白

色的尸衣，便被引到绞首台上去，从当时所留下的许多照片上我们可知道从囚室到绞首台时，司柏司在前，其次是斐失儿，再其次是恩格尔，最后是柏尔森司。

由囚室中出发时，斐失儿向斐尔登和失瓦伯叫道：“失瓦伯兄弟，我们去了，愿你能早日出狱，得享幸福的生活。”“别了，散姆^①。”司柏司和恩格尔也高叫：“散姆，永别了。”失瓦伯站在他的囚室门前，脸紧靠着铁格了。眼泪流过他的双颊，流到他浓密的长髯里去了。

斐尔登站在囚室里望着，叹息道：“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他眼见着他的同志们走向绞刑台上去，他半昏迷地转过身子，跪在他的床边，头放在床褥上，一阵痉挛的悲咽使得他的身子战栗起来。狱卒走了过来，他才慢慢地止着悲哀。忽然一阵悲感侵袭了他，这一个强壮的大人竟痛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似的。

三四 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站在绞首台上，四个殉道者直立着，一点也不动，让执行官布置。一切都布置好，只等候执行官发命令了。于是司柏司开口说道：“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今天被你们缢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斐失儿叫道：“无政府万岁！”

① 散姆：散姆尔·斐尔登的昵称，表示亲密的意思。

恩格尔叫道：“无政府万岁！”

斐失儿：“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柏尔森司极其安静。当他的脚踏上绞首台的时候，他的形容完全变了。他的精神不再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了。在这四个殉道者中只有柏尔森司是个美国人。他好像要使他临死的态度给与所有将来的人以一个重大的影响，使后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殉道者。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批评他说：“全美国的著名悲剧家在戏台上所表演的牺牲自己的英雄，也不及柏尔森司那样有声有色。”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他的态度异常泰然自若。那奇丑的尸衣上的每条折痕反而使人觉得他的态度更为明显。——这便是那幅绞首台全景的图画中最能动人的景象了。他直立着以责备的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美国人，许我说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响起来罢！——”这时执行官发了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十几分钟后，芝加哥的殉道者便荷着充满天地的荣光而长逝了。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以来究竟曾有几人！

三五 最后的两封信

亲爱的同志郎无：午前八点钟。狱卒来叫醒了我。我洗了脸喝了咖啡。医生问我要服兴奋剂否，我拒绝了。亲爱的同志恩格尔、斐失儿、司柏司以坚决的声音招呼我。

请你去见执行官马曾，索取我的信件及书报等。并

请你把我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及其科学之基础》整理出版。

八点钟以后：——亲爱的同志啊，定命的时候快来了。魔王昨晚在建造他的宝座——我的绞首台。那锯子铁锤的声音(音乐)使我很久不能入睡。这便是文明！马曾告诉我说魔王要藏起我的尸体，然而他不答应，他刚才请我把我妻子的地址告诉他，以便把我的遗骸送去。好，大量的魔王！别了！社会革命万岁！问候所有的同志。

柏尔森司

伊立诺伊州苦克县执行官马曾君：我请求你将我的遗骸交与我的妻子鲁西柏尔森司，寓密尔何基路七百八十五号。

柏尔森司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九点十分

观此可知道那般魔王的用心了。芝加哥公民联合会叫马曾将殉道者的遗骸藏起，马曾不听。他因此叫殉道者各人写了一封请托书，表示他们愿将遗骸交与家属。然后他把请托书交与担任葬事的人，叫这些人在监狱外面等着，防备盗尸的事。这两封遗书已足表示出资产阶级的凶狠了。

不仅是！柏尔森司夫人这天早晨带了她的两个小孩同着何尔门斯夫人到监狱去和她丈夫作最后的诀别，并叫小孩来见他们父亲的最后一面。她不但不能进去，而且被警察拘捕了。她的孩子和何尔门斯夫人被关入警察署且被搜查，直到三点钟才被释放出来。这时已是死刑执行过后的三小时了。

三六 柏尔森司的遗著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及其科学之基础》是柏尔森司在临死前三十天开始写的一部书。在这里面他不仅叙述他的思想，并且把他最后的生活以及他对快来的死刑的感想都详细写出来了。这部书的题词是：

当人民在专制之前静默着的时候，他们的冷淡便是他们死期的预兆。

在这书中他说：“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可用一个字来包括，这个字就是自由。”

三七 最后的休息地方

十一月十四日举行殉道者的葬礼，送葬的人不计其数。除了五个殉道者的灵柩外，有几千部的马车，里面坐的尽是死者的家属、亲友和同志们。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几部马车，便是死者家属的车子。第一部车里坐着两个穿黑衣的女人：一个是白发的老妇，她在这几天之中竟长大了十多岁。这就是司柏司的母亲。拿着她而且握着她的手的是一个美丽的青年女郎，眼里还留着晶莹的泪珠。这便是司柏司在判了死刑后结婚的妻子凡冉特。恩格尔夫人和她的十九岁的女儿同林格的未婚妻蜜勒尔女士(Edna Muller)坐一部车。斐失儿夫人和失瓦

伯夫人坐一部车。柏尔森司夫人带了她的两个小孩坐一部车。……放灵柩的车子经过的每条街，满街都是行人。行人的帽子一概脱下来了，他们并且表示诚恳的敬意。“他们不知道这个，但他们多少觉得，他们是在伟大的死者之前，那些人是死得极其高尚的。”

到了墓地，因为送葬的人太多，已把草地踏出了一条平路。在坟前有六个人用英文及德文演说，最动人的要算是布拉克的一篇演说。“从此在各处所赠的花圈堆积的花山下面，在无数悲哀的亲属和同志的面前，我们的亲爱的同志便安静地睡在他们最后休息的地方——德司勃林河畔了。”

送葬的十五万工人在殉道者的坟墓前立了一块巍峨的纪念碑，石座上刻着：“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被你们滥杀的声音更有力量时候快到了。”

三八 劫狱计划的失败

法律下的大谋杀完成了，五个最好的人在绞刑台上死了。资产阶级的快乐是言语所不能形容出来的，劳动阶级的愤怒和悲哀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呢？他们并不是在旁边坐视着同志们的被害，他们也曾想法援救那些殉道者。

在殉道者的刑期逼近了的时候，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带着武器到芝加哥来的共有数百人，他们预备劫狱，然而监狱外有数千名军警在守卫，他们冲不进去。同时芝加哥较著名

的无政府主义者每人都受着三四个警察的监视。在十月内报纸上便登载出无政府主义者武装劫狱的计划了。报纸上并登载了其中最活动的三十八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他们的身后都有侦探追随着，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警察署都会接着报告的。

最后警察当局竟采用英国政府在利物浦对待爱尔兰革命党的办法，派三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监视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执行死刑的前几天芝加哥完全在特别戒严的状态中。这样劫狱的计划自然会失败了。

三九 阴谋的发现

六年的长时间在痛苦中过去了。一八九三年正月阿尔结尔德(J. P. Altgeld)被选举为伊利诺伊州州长，殉道者的友人们请求他重查这个案件。阿尔结尔德精细地把全案卷宗检阅一遍，发现了真相。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受贿枉法，并替殉道者洗去一切的罪名，说警察攻击草市场群众大会的举动是一种罪恶。斐尔登、失瓦伯、尼伯也立刻被释出来了。

阿尔结尔德的理由书很长，最后的一节是：

全案的事实只能表示草市场炸弹的爆炸是个人复仇的举动。原告方面并不能证明掷炸弹的人是谁，而且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掷炸弹者曾听过被告的演说或读过

被告的论文；因此便不能证明掷炸弹者是受着被告的劝告才来掷炸弹的。既然他不曾受着被告的劝告，那么被告便是完全无罪；即裁判官加利引证的法款也不证明他们是有罪的。

在最后叙述裁判官凶狠残酷的事实中，有一节是：

最近裁判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虽然事情已过了六年，这篇文章里仍含有毒意。他把在六年前审判完结后一个激动的妇人写与一家报纸的信转录出来，并且极力攻击这妇人，想引起人们的偏见来反对死者与生者。不仅如是，在此文中他还极力攻击某被告律师^①，因为在五个被告的尸体下葬时，那个律师曾在被告的坟前演说赞扬他们，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这种凶狠残酷是为有史以来所未见的。他绞杀了被告尚不够，在他们死后他还要来侮辱他们。

从此在警察、法官、资本家和政府所犯的罪恶上又添上了这一次最凶狠最卑鄙的罪恶了。这不过是“法律与秩序”的最无耻的阴谋已发觉了的一件而已，然而就只这一件，已经可以把芝加哥（全美国）警察的蛮横、法官的腐败和残酷的裁判官加利的罪恶显露于世界了。

^① 被告律师：指希拉克。

四〇 致后死者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着的也没有理由再来哀悼这些死者。我们已经哭得够多了，然而谁曾见过我们的一滴泪来，谁又曾听过我们的一声哭来！假若我们的呼声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难道我们哭到天摇地撼，就会把已死的人哭得回来么？可怜的后死者们！

假若你觉得你的眼泪是流出来了，那么来听柏尔森司的最后的活：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憎恨和恐慌！
当我的嘴唇已经哑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的来到我的墓场。

.....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存在这荒凉的都城，
你们还要忍受着绝大的惨痛和苦辛。
只有我，只有我应该来怜悯你们！

.....

四十年前德国无政府党人奈柴尔 (R. Reitzel) 在殉道者墓前说的话是不错的。他的演说的结尾是：

“我们没有理由来哀悼死者，他们是死得极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曾是爱的象征一样，十九世纪的绞刑台也就是自由的象征了。但是我们应该来哀悼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羞耻悲，为我们的懦弱悲，为我们的迟疑寡断悲。”

我们离开这些坟墓时，大家记着赫尔威格的话：

“我们已经爱的够多了，

让我们开始来憎恨罢！”

三 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

一 革命的俄罗斯

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动人最光荣的一页。

谁都知道俄罗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动最富饶的园地，在这些土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重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

最初的“虚无党人”(属于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的“土地与自由”及“民意社”两团体)都是极高尚的纯洁的青年。他们富于自己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甚至爱情和婚姻。他们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死便是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的方法。那个“革命的化身”巴枯宁曾说：“……与其蜚伏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生，苟若……与恶魔破釜沉舟一战而亡！”那个因一篇《告新时代的青年》的文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死在那里的诗人米海洛夫(Mihailov)也说：“死在家里并不比死在战场上容易些。”这些经典，他们终身奉守着。

“我们需要着暴风雨和生命”，巴枯宁曾这样写过，也可算是“虚无党人”的心理。不错，暴风雨果然来了。

二 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最后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俄皇亚历山大第二的事件，参与者有许多青年男女，并且失败过多少次，然而由于革命党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强的意志，终于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感人的事！在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一个革命家的追忆》上有一幅图画描写亚历山大被刺的情景：

一个炸弹掷在他的马车下。几个卫兵受了伤。利沙可夫(Rysakoff)就是掷炸弹的人当场被捕。御者恳切地劝沙皇不要出去，并且说他能够驾驶这辆稍微损坏了的马车。但他(亚历山大)一定要下来，他觉得他的高贵的身分要他来看那受伤的卫兵，安慰他们如像他在俄土战争中安慰伤兵一样。……他走近利沙可夫，问了他几句话；当他走过另一个青年格利奈夫次基(Grinevetsky)的身旁时，格利奈夫次基抛了一个炸弹。炸弹在他们两人中间爆炸了，两人仅仅活了几小时。

亚历山大第二睡在雪上，一身染满了雪。他的随从者都抛弃了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侍从武官团回转身来。他们从雪中抬起沙皇的身体，把他放入一架雪车内，脱了一件制服盖着他的战抖着的身体，又拿了一顶制帽

放在他的光头上。一个虚无党人伊美利安诺夫(Emelianoff)臂下挟着一个用纸包着的炸弹,竟不顾生命危险,跑到侍从武官团旁边,去救护那受伤的人。人类的天性每每是这样矛盾的。(原本四三二页)

三 驯服的羔羊会变成残暴的猛虎

在亚历山大第二被刺死的前一年(一八八〇年)民意社的团员加可屋斯基(Kvjatkovski)因参加暗杀运动被捕。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这样地宣言:“我并不愿说我们的纲领是和恐怖主义无关的。我承认这是我们的活动之一。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我们采用这手段是为着保卫我们团员的缘故,并非想以此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必最初就做一只老虎来表示残暴的性质。但现在社会的情形存在下去,会使驯服的羔羊变成残暴的猛虎。政治的暗杀是由政府对革命实行的可怕的残暴手段激起来的。”

这样的解说他们采用暗杀手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们的暴行并非由他们的主义造成的,而是政府的暴行所激起的。“他们是受着内心的驱使的。这样暗杀工作便是由于道德感情的奋发,使他们不忍看见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为,而不立刻起来报复。”(见《俄国革命之灵魂·战斗者与梦幻者》)

这可见他们的动机是为人类的,他们确是为人民自由和幸福奋斗的勇士。在下面我再介绍几个勇士与中国的同志们。

四 要誓死地去铲除恶魔

在一八八九年虚无党人伯痕司坦(L. Cohan-Bernstein)和若托夫(Zotov)等三人在伊尔库次克被绞死了。他们本来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管理处要把他们和其他囚犯迁移到一处更寂寞孤独的流放地。他们不答应，实行拒绝。警卒向他们开枪，杀死了六个，伤了许多。其余的人重新受着审判，于是他们三人便被处死刑。

伯痕司坦在死囚狱中于临刑的前一日，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来和你们告别。现在差不多已是没有希望了。然而在我的心里，我已向你们大家说过告别的话了。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深深地想到你们对我的同情和热诚。我在世的时间已快要完结了。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啊，我们现在互相撒手罢！让我们所悬望着的痛苦的世界的较好的前途的希望来照耀着我们的告别辞！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强权的世界，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无益地牺牲的。不是悲伤的人类生命罢！让死者自己来爱护死者——你们有完全的生命，——道德的艰苦的生命要与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共同前进！千万不要说，也不要想尔们的生命是失去了

的，他会在无益的受苦受难中或在监狱和流放中消失的，那是不对的。要为痛苦的世界受苦，要~~去死~~去铲除黑暗的恶魔，这才是一件伟大的工作。甚至假若这就是你最后的服役，又怎么办呢？我们已把我们的贡献品带到“为人民自由而奋斗的祭坛”了。谁知道，也许你们会活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候，那时我们这强权的世界会变成自由的世界了，它并且要以慈爱的手欢迎它的忠实的可爱的孩子投入它的怀抱，和你们共同来庆祝那伟大的纪念日。

假若到了这个时候，请不要忘却了我们啊。

这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大的报酬！我愿这伟大的希望永远伴随着你们，如像它伴随着我上断头台那样。

我以我纯洁的灵魂热烈地和你们接吻。

你们的伯痕司坦 一八八九年八月六日于伊尔库次克

再说一句罢，别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恳切地吻你们。

这封信是在近代俄国史的最黑暗的时期写的。在亚历山大第三的暴政之下，一切俄国较好前途的希望似乎都消灭了。在临刑的日子，伯痕司坦仍然病在床上，因为他前次与禁卒格斗时受了重伤。禁卒连着床一起把他抬上断头台，他无力地卧在枕上，他们把他的头放进活结里，一脚踢翻了床，于是伯痕司坦便被绞死了。

五 我和一颗光明纯洁的心同死

随着伯痕司坦上绞首台的便是若托夫。在他临刑前的几分钟，他也写了一封信：

在后面天井里，离挂灯处不远，他们已经把柱竿竖好了。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断头台是怎样的筑起来了。一切都是很简单的！昨晚八时左右牧师曾来探望过我。我委婉地谢绝了他，我向他说，我既然要死了，我还希望什么身外的利益呢！

俄耶^①刚才来看我，这是我与她会面的最后一次了。她要守着我到死，她会把我临终时的情形告诉你们，我现在不能自己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是很快乐的，我的态度很光明，然而我很疲倦，身心两方面都是很疲倦的。最近两天来我的神经不知受了多大的刺激！产生了不少敏锐的感觉！

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心爱的人儿啊，现在就是我挂念你们的最后的一瞬间了！转瞬间我要失去了知觉。我死——我和一颗纯洁的光明的心同死，我觉得我是不错的。我的心很强健。只有当我想到那些生存着的，我的心爱的人儿的命运的时候，我的心才受着重大的打击。

^① 俄耶(Genya)：若托夫的新婚的妻子。

我的痛苦是什么？这只是几点钟的事罢了。但他们生者的痛苦便需要绝大的精力来忍受了。当我看见银耶的时候，什么我都不想起了。

看守的兵士来了；他们把囚服带来了；我已经把它穿上了。这衣服是雨打湿了的，我穿着，禁不住冻得发抖，连写字的手也不由得战栗起来了，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是受了刺激啊。再会罢，我心爱的人儿！

你们到坟墓中去的朋友柯立亚(Kolya)八月七日午前三时

六 反抗武力的利器便是武力

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学生巴尔马雪夫(Balmashov)把内务大臣西皮雅金(Sipyagin)暗杀了。在受审判的时候，法官问他的同谋者，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我承认我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从事于反政府的宣传，但是我从不曾主张过用暗杀手段和武力。然而俄国的大官僚使我相信在这国内已没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存在了；不公道和蛮横的武力的制度代替了正义公道的地位。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

巴尔马雪夫于五月三日被处死刑，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便写一封信给与他的双亲：

我亲爱的双亲！我现在得到了一个愉快的机会。我只与你们写几行，希望能够入你们的眼帘。四月二日的

事情以及我参加这次运动，你们若知道了，一定要惊惧到万分，并且要感觉到莫大的痛苦。但请你们不要完全责备我！这是俄国人民生活情形的痛苦驱使我来做这运动，逼迫我来流血，并且还累了你们，使你们在老年为丧失了独子而痛苦！

在我做了这件工作，尽了我应尽的义务以后，假若不曾想起你们的哀痛，你们的悲伤，那么我现在一定会感到无限的快乐。

我顺从我良心的不可逃避的命令，而感到愉快的感情与光明的心境。固然这光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感情被念及你们的痛苦的思想所扰乱了，然而我决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和那专制政治的最显著最凶恶的代表战斗呢？并且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是不免的呢？这是可以不必向你们解说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形，不仅需要物质的牺牲，并且还要向父母把他们的独子领去。我牺牲了我的生命来救济那被压迫的同胞们。这件事在道德上可以辩护我忍心抛弃了你们的举动。你们，我亲爱的，我最爱的双亲啊！

愿你们想到我的行动的重要，我希望这种观念能够安慰你们的天性的父母疼爱儿子的悲伤。我寄这封信时，同时要求你们一件事，虽然我知道对于你们是很难实行的。以后我无论遇着怎样的变故，总请你们像我现在一样地镇定和安静。或者你们的镇定和安静会透过坚厚的

狱墙，而达到我的心境；并且还可以减少我对于你们的焦急的忧虑了。

你们的儿子司太朴(Stepa)

七 我昂然地走那死之大道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加利亚叶夫(Kalyayev)暗杀亚历山大第二的叔父大公爵亚力山杜洛维支(S.Alexandrovitch)这件事成功了，然而加利亚叶夫也被捕处以死刑。在监狱中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同志们，一封给他的母亲。

在他给同志们的信上写着：

亲爱的朋友们与同志们：

二月四日的事已经得到胜利了，这是你们知道的。我现在很快乐。我已尽了应尽的责任了，这是在流血的俄罗斯内人人应做的事。

你们知道我素来信仰坚强，感情热烈，那么，你们不要因我的死而悲伤罢。

我已牺牲了我的一切来为工人阶级奋斗；我决不向专制政治屈服。假若由于我一生努力的结果，能够做一个为人道，为正义，反抗压迫，反抗强权的真正斗士，那么我便昂然地走那死之大道。我的死会以我理想的纯洁来装饰我的工作。一个人为信仰而死，便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继续奋斗。无论推翻专制政治要付多大的代价，我坚

信我们的后代会把它永久推翻的。当俄国人民得着自由的时候，那么，在这数百年来匍匐于沙皇暴政的人民之前，社会主义会得到绝大的胜利了。

我亲爱的，最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精神永远和你们同在。在我艰难困苦的时候，你们都帮助过我，我们也曾分享过快乐和愁苦；倘若将来有一天人民庆祝胜利的时候，还望你们纪念着我的名字，把我的革命工作当作我爱人民的表示，把它当作我献身于我们的党应尽的义务。这个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自由”^①。

我看生命好像是神话一样；以前经过的一切事，在我幼年梦幻中存在着的，以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都会突然地变成一阵为一切人们报复的火焰出来四散了。

我应当提起那些永久藏在我心中的亲爱的人的名字。让我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向他们诚恳地致告别的祝福，望他们为自由而继续向前奋斗。

我拥抱你们，并且吻你们。

你们的加利亚叶夫

八 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纯洁， 信仰的完成

在给他母亲的信上，加利亚叶夫写着：

① “人民的自由”：Narodnaja Volja，即民意社。

我亲爱的母亲：

我的心情是没有变动的。我服从我义多的命令，做了这件工作，我是很快乐的。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纯洁，我要保持我信仰的完成。你总知道我以前的一切行为都是公正无私的；假若我生前受了苦，这是为着他人的苦痛而受苦啊。

我的最后使我异常快乐，假若现在还想来救我的生命，这便可算得是可笑的举动了。我拒绝了在罪人请求赦免书上签名，这是什么缘故，你当然知道的，也不用我来解说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已耗尽了我身心的力量，而且相反的，在得着最后胜利的死时，我依然保全着生命所给与的一切。我在童年时代便觉得我的命运是断定了的；我对于我个人的生命是一点都不能爱惜的。我万不能要求他们的赦免，因为这是和我的信仰相抵触的啊。现在我也请你以绝大的勇气来答应我罢。请你切莫为我而哭泣，望你自慰自解，自寻快乐罢，好像我仍时时在你身旁一样。实际上我是永远不离你左右的。

恐怕我以后不能再和你见面了。——那么，我亲爱的母亲啊，别了。

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所以我用不着去求人家的原谅，这是敢自信的。

华沙生活的景象，街市异常喧闹，阳光正照在头上，这些景象一一呈现于我的眼帘。

华沙啊，再会罢。

你的忠诚的儿子伊凡

九 预备着来死的乌克兰斯基

这几个视死如归的斗士的言行，无论何人听见都不能不感动的。现在再述一件虚无党人乌克兰斯基(E. Ukhtomski)临刑的故事，这是屋拉底米若夫(Vladimirov)的通信。乌克兰斯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枪毙的。

我在塞米翁诺夫斯基联队中，听见了不少关于乌克兰斯基的故事，他在他的最后时刻表现出英雄的气概。塞米翁诺夫斯基联队在卢伯尔次(Lubertsy)把他和其他三个工人枪毙了。下面的纪事一部分便是联队的队长告诉我的。那个队长目击他临死的情形，很受他的人格感动；全队兵士对于他也表示深刻的敬意。……

他的面貌并不惊人，中等身材，有一双明亮而活泼的眼睛。初次见他，好像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呢！

他之被捕是偶然的事，他坐马车旅行，停在一所旅店內，他完全不知道那店里有兵士。他受着检查，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一支手枪，兵士就把他逮捕了。于是他被带去审讯了。

执法官问他名字，他不谈。执法官便翻阅革命党人的照片簿，一一和他对照。最后惊叫道：

“你是乌克托姆斯基！你要受着枪毙的刑罚！”

“我也是这样想。”乌克托姆斯基冷冷地回答。

是日午后三点钟左右，刑期到了。他同其他三个工人被带到刑场。他向执法官作这样的演说：

“我知道一旦被你们捉住，我是要被枪毙的。我早已预备着死，这便是我现在如此安静的缘故。现在我要死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罢：你们知道那个使装运革命党人的火车从莫斯科安然逃出的人是谁？——那辆火车载着武装的团体及莫斯科暴动的领袖，并有罢工委员会的职员。

“那个司机的人便是我，在那时，各处都布满了军队，在车站不远的地方，你们架着机关枪来恐吓我们。

“这是危险的地方，到处都是荒芜的土地，各方面都空敞的，没有东西遮拦。火车是一个绝好的枪靶；然而我加快了速度，每点钟可到七十俄丈。

“我增加了汽锅中的蒸汽压力到十五个大汽压力。锅几乎爆炸了。现在我们的最大危险是恐怕龙头会炸成粉碎，而不是你们枪弹的伤害了。

“当我的火车这样疯狂地前进的时候，你们的机关枪开放了。但我们是不怕枪弹的，我们已经身临危境，在数分钟便会到粉身碎骨或跌入万丈悬崖的地步。

“我这个司机人的熟练的手腕居然把你们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的生命保全了。你们的枪弹伤了我们中的六个人，但无一死者。他们都逃脱了。现在他们是很安全的。

你们绝对不能到他们身边。”

在刑场上他们要把乌克托姆斯基的眼睛蒙着。但他不愿，他要坦然地就死。他不愿以背向着放枪的兵士，他要面对着兵士的枪而死。

他的赴死之路上的同伴要求执法官保全着乌克托姆斯基。他们跪下，甚至哭起来。

乌克托姆斯基寂然无声地守着兵士装枪，等到预备停当的时候，他便向兵士说：

“你们现在要实行依你们的信仰而行动的义务了。忠实地做去罢，如像我忠实地尽我依我的信仰而行的义务那样。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什么都包括在这里面了。……队长，请下命令罢。”

兵士于是开枪。那三个工人都倒了。乌克托姆斯基没有受伤。他直立着，手放在胸上。

兵士又放枪，他倒在雪上，然而他仍没有死，神志很清明的。他向周围看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悲痛。

队长对着他的头又放了一枪，他便死了。

一〇 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

这类的事实本来很多，现在我也不必多引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我们除了表示极端的敬意外还能够做什么？我们且读马沙利克(Masaryk)的话罢：

他们热烈地爱护着精神的和物质的自由；他们为着人民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全不顾他们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活；他们对于同志也是很忠实的——这些都是极光荣的特性，也就是最有价值的品质；这些一定会使人对于他们革命者个人和他们所自由的俄国人民表无限的敬意和同情。

所谓同情就是说要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加利亚叶夫不是明白地说过：“一个人为信仰而死，就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继续向前奋斗”吗？

四 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

一 暴徒?——和平的人?

平常没有研究过政治暴行的心理，不曾懂得无政府主义的人，一提起无政府党人，便说他们是捣乱的暴徒，丧心病狂者。在批评者的意思，好像非此不足以表示出来他是一个温良的君子；然而事实上他所说的暴徒们远比他自己更要和平些，仁爱些哩！

法国小说家左拉在他的名著《巴黎》中描写出那个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反抗现社会制度的革命者的仁爱、温良，和他对人类受苦的同情：那个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沙尔瓦 (Solvat) 经过无数的困苦，东奔西跑，像一只被迫的狗一样，有几天不曾进饮食，不曾睡眠，终于被捕了。在法庭上他演说道：“我不怕死。假若所有的人都有像我一样的勇气，那么，你们这腐败的社会明天便会崩溃，幸福便要来了。”法官向他说：“你所炸死的是你们一阶级的人——一个可怜的女工，她的祖父靠着她作工来活命。”他答道：“只有这件事使我悔恨。……我的炸弹自然不是预备来炸她的；让所有的工人们，所有的饥饿者记着她与我一样，是为着他们而流血的。”当法官宣布他的死

刑的时候，他的脸带着小孩子天真烂漫的神气，突然现出光荣的色彩。“这是死刑。诸君，谢谢你们。”他这样地说。

固然这是小说，小说里面所说的事实不一定是人间所必有的事实；然而像沙尔瓦这类的人在法国无政府党人中的确是很多的。左拉的描写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事实来的。现在我只举出几个“沙尔瓦”来，他们的行动便足以证明他们并非暴徒，而是极爱和平的人。

二 悲剧时代

在法国有所谓“悲剧时代”(La Période Tragique)，这个时代自一八九一年的五一节为始，计共三年。在这三年中有五个著名的无政府党人继续地作暗杀行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他们完全轻视个人的快乐。为了信仰，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的缘故，他们抛弃了一切，不顾危险，视死如归。他们这种精神，这种高贵的品质，便自然在法国史上划出了一个恐怖的时代，这是人们永远不会忘却的一个时代。这五个人的名字在革命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德康(Decamps)、拉瓦夏(Ravachol)、瓦扬(Vaillant)、项利(Henry)、加塞利(Caserio)。

三 德康事件

在一八九一年的五一节，无政府党人和工人在列瓦诺华

伯勒(Levalloisperret)游行，游行者手持黑旗，高呼“自由万岁”，“无政府万岁”。后来警察出来干涉，夺去他们的旗帜，并向他们开枪，无政府党人也实行抵抗。游行的群众后来进了一所酒店，高唱工人解放歌，警察署长恼羞成怒，遂令向酒店进攻。工人方面不得不出以防卫。结果警察方面伤了六人，只得暂行退却。

于是又作第二次进攻。这次警察得了胜利，把酒店占领了。并捕去德康、达尔德尔(Dardare)、鲁福依(Leveille)三人。三十个官僚对于这三个无政府主义者施以种种私刑，践踏，拷打，无所不至。

这三个人的审判在四个月后才开始。德康预备解释他的行动，法官不许他开口；然而他终于说了几句话，当检察官要求判决死刑时，德康听见了便大呼：“你要我的头颅，拿去罢。我把它给与给你。我自问对于良心是无愧的。我们的信仰是：废灭神，废灭主人。万人都得着自由的幸福。”

因为陪审官较为公平，所以只判了德康监禁五年，达尔德尔监禁三年，鲁福依无罪释放。

四 德康的复仇者——拉瓦夏

第二年，德康的复仇者便出现了。这个人是拉瓦夏。他居然使全巴黎陷于恐怖之中。三月十一日法官伯诺(M. Benoit)的住宅被炸毁了，伯诺便是去年八月审判德康的人，十五日诺波(Lobau)军营的窗户上又发现了一个炸弹。二十七日勃

诺(Lénot)的住宅也遭了炸弹，碧诺是和德康事件有关系的。后来拉瓦夏被捕了，他的被捕是由于一个名叫勒若(Lerot)的酒店侍者告密的。四月二十六日那个酒店也被炸了。

拉瓦夏在法庭上承认那些炸弹事件是他做的。他说：“这是为我们同志德康、鲁福依、达尔德尔报仇的。”

拉瓦夏死得异常勇敢，他临终时唱了一首歌，后来成为一首很著名的无政府党歌。第六节的前三句是：

要是你要快乐，

天呀！

绞杀你的主人。

弥塞(M'usewx)在《社会艺术》(L'art Social)中批评拉瓦夏说：“拉瓦夏是一个激始激终的反抗者。他为着理想，为着要使他的理想实现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什么都不怕，他自承他所做的事，……”保罗·亚丹在悼拉瓦夏一文中说：“不管资产阶级的报纸怎样嘲骂，不管官僚们怎样造谣中伤，然而我们仍相信他是不错的。……拉瓦夏是伟大理想的宣传者，他是古代宗教的为世界进步、为穷人谋幸福而牺牲个人生命和名誉的思想的宣传者……”邵可伯赞美拉瓦夏道：“我赞美他的勇气，他的善心，他的灵魂的伟大，他宽恕敌人的仁爱。”

五 反抗者瓦扬的呼声

巴黎的居民刚刚把拉瓦夏事件忘却后，瓦扬的事件又发生了。瓦扬想炸毁巴黎代议院。他果然进了布尔朋宫(Palais Bourbon)，正要抛炸弹，一个妇人知道了他的意思，便握着他的手，然而炸弹终于抛出了，伤了一个议员和几个旁听者，瓦扬当场被捕了。在法庭上他演说如下：

“诸君，在几分钟内，你要判定我的罪了；然而我得到你们的判决，我却是很满足的，因为我把现社会伤害了。这是一个应该诅咒的社会，在这社会中我们到处可看见一个人一天的浪费可以养活数千家人而有余；这是一个何等不名誉的社会啊！少数人垄断着全社会的财富，而成千成万的穷人，却甚至终日得不着面包，这样的食物，富人的狗都能常常得着吃的，许多家的人甚至因生活必需品缺乏而自杀。

“啊！诸君！我希望支配阶级能够跑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间去看看！然而他们绝对不会的，他们好像聋子一样听不见贫民的哀诉。‘命运’像十八世纪的‘君权’一样把他们驱到了深渊，他们会被吞没于其中的。那些人是何等可怜啊，他们听见将饿死的哀号，而装聋做哑；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层阶级的人，而有权压迫在他们下面的贫民。有一个时代来了，那时人民不再与他们讲理了。他们像暴风一样的吹过来，却又像急湍一样的流过去了。那时我们会看见他们的头带着血被缚在桩上。

“诸君，在被掠夺的贫民中有两种人。一种人不知道他们自身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他们随遇而安，忍受困苦，相信他们生下来便应该做奴隶，他们以资本家交换他们的劳力后所给的小小报酬为满足。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却与前一种人恰恰相反，他们思想，研究，并且考察周围的情形，发现出社会的罪恶。他们看得很清楚，并且他们看见别人受苦心中也很有苦痛。难道这都是不应该的么？他们献身于斗争中，并且替多数贫民要求权利。

“诸君，我便是后面那种人中的一个。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看见许多不幸的贫民匍匐在资本的束缚之下。在各地我都看见同样的伤痕，使贫民的鲜血一滴一滴的流。甚至在南美洲最远的地方也是这样；我起先还以为那些受惯了文明的苦痛的人，在那里可以休息于棕榈树之下而从事于自然的研究，并且我还看见资本像一个吸血鬼一样，来吸不幸的贫民的血液。

“我于是回到了法国，我看见我的家族陷于极困苦的情形中，这是我的忧愁的杯中的最后一滴了，我实在不能再过那受苦的和怯懦的生活了。我便带了炸弹来送与那些人，他们对于现社会的困苦是负有责任的。

“我受着人们的责骂说我炸伤了几个人。让我指出过去的事实来罢：假若中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不曾实行屠杀或引起屠杀，那么他们至今还会匍匐在贵族的羁绊之下。在另一方面，我们要于东京(Tonquin)、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达阿美(Dahomey)的死者及伤者的数目上，加上那些死在工

厂矿场及一切资本的势力所及的地方的千万贫民，以及那些饿死冻死的人；我们的议员反以为这是正当的。这样看来，那么，你们对于我的责骂，是何等的浅薄啊！

“一个人不应该伤害他人，这是不错的；然而我们受了在上者的打击，便不应该防御么？我知道定有人要向我说，我不应该犯暴行，只可以用言辞来辩护人民的权利。然而我们能够期望到的是什么？要把聋子叫醒，非用大声不行的。我们已大声的叫过了。他们对我们的呼声反以不断的监禁、绞绳、排枪来回答。要知道，我的炸弹不仅是反抗者凡扬的呼声，而且还是一个阶级的呼声，这阶级要继续的保护他们的权利，并且还要于言辞之外，再出以激烈行动。实在告诉你们说：他们知道法律是无效的了。思想家的理想绝对不会停止的；在前一世纪，政府的武力就不能阻止狄岱禄(Diderot)、伏尔泰(Voltaire)那些人来把解放的思想传播于人民中，所以现政府的武力也不能阻止邵可伯、达尔文、斯宾塞、易卜生、米尔波(Mirbeau)那些人来传播自由正义的理想，这理想能够使那些愚弄群众的偏见消灭的。这些理想极为贫民所欢迎，并且还要发达于反抗的行为中，如像他们所影响于我的一样，要到强权消灭时为止。到那时人人能随意的自由组织，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他的劳力的出产品；并且偏见也没有了，人类过着和谐的生活，除研究科学和爱他们的同胞而外，更无别的欲望。

“诸君，我敢断定说，现在的社会充满了一切不平等的情形，在这社会中，我们每日都可看见因贫穷而自杀的事件，以及街角卖淫的事件；并且这个社会的重要纪念物，便只是兵营，

和监狱。——难道这样的 一个社会，还不应该立刻改造么？我们应该祝福那些为这种改造而工作的人们。这就是那个理想，它使我与强权决斗；但在这次决斗中，我仅仅把我的敌人击伤了，现在应该他来打击我了。

“诸君，无论你们处我以何种刑罚，我并不放在心上；我以理解的眼光来观察你们，我不能不笑你们的妄为，你们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来裁判你们的同胞！”

“啊！诸君，你们和你们的判决在人类历史上是何等渺小的东西啊；并且人类历史也不过是一阵旋风中的一个小东西，这旋风会使人类史至于无穷的广大，这旋风是一定要消灭的，至少也要改换过的；为着要使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事实重现的缘故，武力的普遍的不断的的使用，是永不能停止的。”

六 知识阶级一致援救

瓦扬这样的完结了他的演说。他那种反抗的精神和热烈的感情，都在这篇演说里完全表现出来了。知识阶级很受他的演说的感动。那个受伤的议员勒米尔(Abbe Lemire)还请求减轻瓦扬的罪。社会党的议员也联名向法国总统加尔诺(Carnot)请求减刑。

在法国的向例，凡未成功的犯罪是不会处死刑的，所以大众都以为瓦扬的罪名至多不过是无期徒刑。然而法国总统要判决瓦扬的死刑，瓦扬终于在断头台作了悲壮的牺牲者了。

七 思想家艺术家又一次表示 对于断头台的憎恨

法国小说家高贝(Coppe)批评瓦扬事件说：“我读到瓦扬被处死刑的详细情形，我陷于沉思的态度中，我想象他在绳索下伸展他的胸部，坚定他的步伐直向前进；坚强他的意志，集中他的精力，以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刀锋，最后向现社会吐出他的诅咒的呼声。这时好像忘却了我自己。另一幕景象又突然显现于我的眼帘前，我看见一群男人和妇女拥挤在长方形的马戏场中间，在上画千万观众的目光的注视下，可怕的叫声起来了，‘狮子！’在下面野兽的笼子开了。^①

“我以前还不相信他会被处死刑的。第一他并未杀死人，这已成了习惯，凡未遂的犯罪都不能处死刑的。这种犯罪，虽然含有可怕的目的，但却是无私的由抽象观念生出来的。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被抛弃的小孩时代，和他所过的艰难生活，都可以替他辩护的。在独立的报纸上一致起了袒护他的呼声，又响亮又有充足的理由。这是思想家艺术家的光荣。他们又一次表示他们对于断头台的憎恨。”

瓦扬的事件还牵连看保罗·邵可侣(Paul Reclus)，保罗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侣的姪子。政府说他是瓦扬事件的教唆犯。瓦扬被处死刑后，保罗还以缺席裁判被处徒刑二十

^① 这是指罗马尼罗时代的事。

年，保罗遂亡命英国。

八 愿意死并且知道怎样来死的项利

在瓦扬处刑后数日，德尔民留(Hotel Terminus)咖啡店中有一个人投了炸弹，把那些听音乐的人伤了。投炸弹者爱米尔·项利与警察搏斗了许久，终于被捕。

项利在法庭上承认二三年前所发生的炸弹事件有许多都是他做的。他并且说他曾预备替加尔莫(Carmaus)的矿工罢工者复仇，在公司的办事处里安置了一个炸弹，后来被看门人发觉出来了。炸弹被带到警察署在那里爆炸了，伤了几个人。

他在法庭上说他相信富人对于社会的罪恶应负责任的。他演说道：“我听见人们说生活本来是很容易的，对于一切智慧和努力都是很有机会的；然而我的经验却使我相信在宴会中只有强悍的人和善于谄媚的奴隶才能获得位置。别人告诉我说现社会的组织是基础在正义与平等上面的，然而我所看见的事实却证明这不过是骗人的谎话罢了。我少年时代的幻想一天一天的消失了。我无论走到何处，我所看见的事实都是一样的：在我们中间的只是愁苦。在别一阶级中间的却永远是快乐。因此我便知道我所听见的那些话不过是一具遮盖现社会的最可耻的罪恶的面网罢了。

“我极端爱自由，爱个人创意(Individual Initiative)。……我带着深刻的憎恨来参加这次斗争，我的憎恨因为看见现社会中可憎的景象，便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的社会，其中一切

的事物都是极卑污的，……在其中一切的事情都会阻止人类感情和自由思想的发展。我很愿正直地猛烈地来攻击这样的社会……我们对资产阶级宣战；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并不向谁求宽恕。我们愿意死，并且知道要怎样的来就死。这便是我对于你们的判决毫不关心的原因。”

项利的事件也有人请求法国总统减刑，但是仍遭加尔诺拒绝了。项利在断头台殉道的时候，正是瓦扬被害后数日。

九 加塞利的匕首上，刻着 一个人的名字：“瓦扬”

约一个月后，六月二十五日，法国总统加尔诺到里昂参观展览会。那天晚上他往戏园里去，在路上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党人刺死了。在刺客所用的匕首柄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瓦扬”。

加塞利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本来可以逃脱，然而他并不逃走，因此便被捕了。

在法庭上，他也自由的发表他的意见：

“陪审官诸君！我并不想替我自己辩护，这不过解释我的行为而已。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便知道现在社会的组织是极坏的，以致许多贫民不得不自杀，留下他们的妻子和小孩受苦。成千成万的工人每天去寻找工作，但是却不能得到。贫民的家族受着饿，受着冻；他们受着极大的困苦；那些小孩子向他们

的母亲要东西吃，但他们的母亲却不能够给他们，因为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们所有的极少的东西都已卖尽当绝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向人家哀求施舍；他们常常被拘禁，因为官府说他们是游民。

“我便离开了我的故乡，因为在那里我常看见八九岁的小姑娘被迫去做一天十五点钟的工，只得着二十生丁的工资，这实在使我觉得难受。还有十八九岁的青年妇女也不得不去做一天十五点钟的工，为着要获得微小的报酬。不仅我们的同国人生活在这样的困苦情形中，便是全世界的工人都是这样的情形中生活着的；他们终日忙碌，挥着汗来求面包皮，然而他们的工作出产品却很丰富，很值价的，这些工人，不得不处在最困难的情形中，他们每日的食品只有一小块面包，或面包皮，和一两杯清水；他们生活这样的情形中，所以到三四十岁他们的精力便竭尽了，跑到病院里去就死。他们因工作过度和饮食恶劣致病还不算，并且在我们国家内还有一种工人常患的病，据医生说这种病也是由于饮食恶劣，生活贫困和劳苦所致。

“我看见许多人受着饿，许多小孩子受着苦，然而城里却堆满了衣服和食物。我看见许多店铺里堆满了毛织物和衣服，许多仓库里堆满了麦和玉蜀黍，这些恰恰适合贫民需要的。别一方面，我又看见许多人全不作工，他们并不出产甚么东西，只靠着他人的劳力而生活；他们每天为着娱乐用去几千佛郎；他们奸淫工人的女儿；他们占据着四五十间房屋；二三十匹马，还有许多仆人；总之，他们享尽了人生的快乐。

“我从前信仰过上帝，但当我看见人类中的不平等后，我便知道并不是上帝创造人类，实在是人类创造上帝。我更知道那天堂地狱存在的话，都是那些想保持他们财产的人造出来愚弄人民的。

“最近瓦扬在代议院中掷了一个炸弹，来表示对于现社会制度的反抗。他不曾杀死一个人，仅仅伤了几个人罢了；然而资产阶级的裁判官却判决了他的死刑，并且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更开始压迫无政府党人；不但把认识瓦扬的人一起拘捕了，甚至连那些只听过一两次无政府党人演说的人都不能免的。

“政府全不顾到这些人的妻子和儿女。它全不想到监禁了这些人，不只是他们受苦，他们的小孩子也要受着痛苦的，他们的小孩子会在家中盼望爹爹归来给他们东西吃。那些资产阶级的裁判官也不想想这些什么事都不懂得的小孩子究竟有什么罪。他们的父亲被监禁，总不能算是他们的罪；他们只要东西吃，他们并不应该挨饿。

“政府继续着搜索私人的住宅，拆阅私人的信件，禁止演说和集会，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压迫我们。甚至到现在，还有数百无政府党人被拘禁，因为他们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或者在公众之前表示过他们的意见。

“陪审官诸君，你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假若你们想取我的头，来，拿去罢；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做去，便可以把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停止了。你们要知道：人们种下什么，便要收获什么。”

一〇 难道现社会能够要求 那个人的生命么？

加塞利也上了断头台，不平的呼声起来了。项脱(R. Hunter)在《劳动运动与暴行》中说：“难道现社会能够要求那个人的生命么？”然而现社会毕竟杀死了加塞利。

项脱批评上面这五个无政府党人说：“这几个人都不是平常的人物，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说都是极其雄辩，极其动人，所以能够激动法国光荣的思想家的感情。他们向着社会挑战。法官不许德康辩护，拉瓦夏便来炸杀法官。瓦扬以为制造法律者对于现社会的罪恶应负责任，他便把炸弹送与他们。项利却以为现社会的罪恶的责任应该由那些纵欲的、自私的、靠着工人劳力而生活的富人来负担，他便来炸杀他们。法国总统完全不懂得那种激动这些人的情感，反要处他们以死刑，于是加塞利受着绝大的刺激，便把加尔诺刺死了。

“这些人说现在所谓的公道只是为权力阶级而存在的，贫民被掠夺了，‘他们灵魂的明灯’熄灭了。他们要求我们听他们的哀诉，但是我们都不去听。他们要求我们读他们写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去读。瓦扬说：‘要把聋子叫醒非用大声不行。’他们便不得不以自己的性命作孤注一掷，以这种宣传的行动来惊醒我们。我们固然可以绞杀他们，然而我们能把他们忘却么？”

一一 无政府党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样看来，我们还可以说他们无政府党人是暴徒么？

一个人富于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着压迫，他热烈的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朴素地过他的生活，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此他才敢于做他们认为正当的事。——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们是暴徒么？我们能够说那些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维持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温良的君子，而那些为着全人类的利益来推翻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暴徒么？假若暴徒与君子的区别是这样的，那么我宁愿做暴徒而不愿做君子了。

一二 祝福这一群牺牲自己生命 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

我们要知道，无政府党人的暴行，是由我们现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和压迫促成的，像暴风雨以前积累在空中的黑云一样的使那暴风雨不可避免。犯此种暴行的无政府党人，是由于他的对人类的同情心受着现社会罪恶的压迫，和这种罪恶所表现出来的残酷事实的刺激，加以终日见着许多同胞陷于困苦的非人生活中，使他更觉得忧愁；这些事情点燃了他内心的情感，于是他才牺牲性命来犯这种暴行。所以这种暴行是救人类的，而非害人类的；只要那种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受苦的情

形还存在，这种暴行也是不可免的。

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这种暴行，然而这些牺牲自己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毕竟是值得我们祝福的！

五 东京的殉道者

一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一九二三年的九月一日，日本东京发生了空前的大地震，日本政府和军阀便乘此时机，施行屠杀朝鲜人、中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他们最初散布谣言说：“朝鲜人和革命党要暴动。”资产阶级便召集浪人组织自卫团，驻在各街中。还有军阀主义的青年团和退伍军人团也动员来攻击社会主义者的住宅，更捕杀了无数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九月三日，骑兵刺杀了两个工团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尸体和死了的朝鲜人一同焚毁，这两个人临死的时候，尚为工人祝福，还高呼着“工人万岁”。

从九月一日到六日，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有几百人之多。十六日东亚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与其甥橘宗一（一个七岁的小孩）被甘粕正彦大尉等杀于宪兵司令部，尸首抛在井内，直至二十日这幕惨剧才为世人所知道。

在巢鸭署内，许多警察用棍棒殴打被囚禁的无政府主义者，平岩巖曾气绝过四次，石里米山气绝过一次。在中野监狱

内，武良二被反剪着手高吊，而且有人还用水淋湿他的身体。

恐怖统治了全东京，吃人的猛兽四处跳跃。人道已经离开了世界了。这几天所看见的只有屠杀，所听闻的也只有屠杀。——这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二 无政府主义者

这次大屠杀，并非偶然的举动，而是日本政府数年来所精心积虑预备好的暴行。在那年保守党检阅的时候，那些司令官曾训令说：“在最近的将来，国家将要与社会主义者战争，所以……”可见政府方面早已预备好了。这在日本，人人都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更知道得详细些。和田久太郎在十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劳动运动》上写的一篇《大地设大火中的骚乱与混蛋们的逆袭》中，便这样的说过了：“所谓‘高丽人暴动’、‘社会主义者骚乱’，完全是欺人的话。”

大杉荣的被杀害，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议，日本政府惊吓着了，把这罪名推到甘粕一人身上，判了他十年的徒刑；然而一年还不到，又暗暗地从千叶监狱中把他放出来了。政府的举动，本来是儿戏的；何况甘粕的谋杀，是受命于政府的呢？

日本的民众，处在政府的淫威之下，完全失去了自由和勇气。他们眼看着残暴的政府杀了他们的先驱者，他们又看着政府释放了他们的仇敌，他们只是看着。

但在这时候，就激起了一些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三 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汉模(Hamon)在他的名著《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理》中曾解释过：所谓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形式(至少含有反抗、考究、批评、革新四种)的人。他热烈的爱著自由，有锐敏的求知心和好奇心。并且他还应该具有对于他人热烈的爱情和正义的态度；他并应该沾染着宣传的热诚，和浓厚的道德感情。

散薄痕(Sanborn)对于上面所述的又加上几个纯正的品质，重要的便是，举止的庄严；生活的朴素、整齐和刻苦，尤其应有一种无比的勇气。

皮龙生(Bjornson)在他的著作《在人类力量之外》里面，也说及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格。他说，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我们可以寻着近代的殉道者，他们为苍生流他们的血，他们含笑地去受死刑，他们相信他们的殉道是可以拯救人类的。

把以上三段联合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具体的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了。

四 复 仇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富于反抗精神的，并且又是爱人类爱真理的人，他们愿意不断地为着人类牺牲了性命，来反抗一切非人道的行动，于是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田久太郎、古

田大次郎、村本源次郎、仓地启司、新谷与一郎，便起来实行暗杀福田大将的计划，而为被害的大杉、野枝和无数无辜的朝鲜人中国人复仇！因为福田是大震灾时的关东戒严司令官。

他们在东京市外蛇久保村的一个农家里，商议这次暗杀的计划。他们决定在九月十六日（大杉被害一周纪念日）举行这惊人的举动。仓地找得了炸药；新谷便来制造弹壳。

五 手 枪

但没有等到九月十六日。

九月一日是大震灾的一周纪念日，东京本乡区菊坂町会便在本乡燕乐轩开纪念追悼大会，特别把福田大将请来演讲。

下午六点钟的时候，福田来了。到了燕乐轩门口，福田下了汽车，突然飞来了一个枪弹，在他的身后现出一个男子，手中握着一枝手枪，正要向着福田的左肩下施放，不料福田的护卫人很快的跑上前去，把这男子擒住了。

这个人便是和田久太郎。于是警察把他囚在本乡富士署留置场，而福田的生命就被保全了。

六 炸 弹

和田被捕的消息，古田等知道了，他们于是变更了进行的计划。九月六日，福田家中收到了一个包裹，开封后，轰然爆炸，毁了福田的房屋。可是这时福田却不在家，因此又保全

了他的生命。

这个包裹是古田等寄发的，但又失败了。不过古田等是不怕失败的，仍勇猛的前进，预备在十六日再来。

七 失败了

他们不能忍耐地等着十六日的到来，在这几天内，他们的烦闷已到了极点。村木有几次等得不耐烦了，提议急急进行。古田一次在给村木的信上说：“村木君，请你原谅罢。你说要急急进行，但据我看来，必须等到大杉纪念日才好，否则恐怕要失败的。”

这次是古田错了。在九月十三日警察便发现了他们的密谋。那天晚上，武装的警察包围了他们的住所。一个警察去敲门，好像送电报似的，高叫道：“有电报来了。”古田去开门，警察便跑了进来，古田被捕了，村木正要发手枪，不过迟了，他也被捕了。

仓地、新谷两人正在大阪，他们带着炸弹到大阪与小西弟兄、内田源二郎、篠部共谋破坏大阪、入满警察署及牢狱的举动，因为他们的同志滨铁、河合杀了一个银行职员被囚禁在大阪监狱内，故想把他们从监狱中救援出来。

但事情也败露了，警察知道了他们的密谋，仓地、新谷同时也在大阪被捕了。

八 看看我们先驱者的身世

古田大次郎是《小作人》的编辑者，是一个从事于实际的苦战的勇士。他是激烈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常喜自称为虚无主义者，曾和小西弟兄、滨铁、河合、内田诸同志组织了一个 Guillotine^① 社。前年他们预备实行革命，便去抢夺军资金，当场杀死一个银行职员。

和田久太郎是劳动运动社的同志，他家里很穷，在幼年的时候，便不得不作工以养活自己。他和大杉荣等很尽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他的头脑非常清晰，平常爱读书，且还喜欢诗歌。

新谷与一郎是京都人。他是贫苦家庭的小孩。在幼年时候便不能进学校读书，只得去做铁工。他的生活使他发见了现社会的罪恶，使他相信无政府主义。

仓地启司也是贫家的孩子，从小便作工。后来在天满纺织会社作工时，他便发起组织一个工会——天满纺织劳动组合。他在工会中是很活动的。

村木源次郎是一个极富于同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平常的态度很温和。他的身体素来很弱，久患肺病，但精神却是很健全的。

① Guillotine：断头台。

九 人间地狱中的殉道者

村木、和田、古田、新谷、仓地五人被捕后，便囚禁在监狱里，直到次年五月廿一日才第一次开庭审判。在这期间，村木死去了。

村木是久患肺病的，进了“人间地狱”后，一方面因为复仇的目的没有达到，心中很不快；他方面又受着狱吏的虐待，于是他的病便一天天地加重了。

今年一月二十日劳动运动社同志近藤宪二还到狱中去看他，那时他虽能够自行出来相见，然而面色却难看极了。过了三天，刑务所的通知便到了劳动运动社，说村木的病已到危险的时候，快来保释出狱，同志们得信后便跑去看他，这时他已完全失了知觉了。同志们赶紧用卧车把他拉回劳动运动社。第二天，这替大杉荣复仇的村木源次郎，便在他的同志旁边安然地死去了。这时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三时！

村木的死虽由于肺病，但肺病之所以突然沉重，未尝不是由狱吏的虐待所致。在这“人间地狱”中，是生龙活虎般的人，也难得保持他的健康和生命，何况是身体虚弱而又患着肺病的村木呢？

一〇 裁判终归是演戏

刺杀福田的事，虽发生于去年九月，但本案第一次的开庭

审判却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在六月二十一日，第三次在六月二十七日。

在第二次审判的时候，检事即要求处和田、古田、仓地三人以死刑，新谷徒刑十年。

这几次审判确是很滑稽的，好像演戏一样。古田说：“裁判终归是演戏”，这句话刺在裁判长的肺腑上如针一样。

这次裁判是预定好的，法官是熟练的戏子，在裁判时，他的行动是预先定好的，不过临时把旨意拿出来宣读一遍罢了。

固然，在我们看来，裁判是儿戏，其实在法官自己又何尝不把裁判当作儿戏呢？只苦了为这几戏而断送了性命的无数冤魂罢了！

—— 为死者复仇

在第二次审判的时候，和田在法庭上慷慨地作了这样的演说：

“我此次行动，和我平日所抱定的主义思想，并无何种关系。这次的动机是在前年。记得在前年大震災的时候，政府方面利用这混乱时期，就造出一种谣言，说是‘社会主义者和朝鲜人的放火暴动’；于是在这震灾中，对朝鲜人和中国人就大加屠杀了。我这次是为无数的死者复仇的！”

“那时候虽曾有处罚流言蜚语的法令，间或也将造谣的人处罚过一二个，以表示当时的造谣者并非政府，也不是宪兵队和警察。其实，当时造谣的人中固然有步行的，然而以骑着

马，身穿军服，和坐汽车身穿巡警制服的为多。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在震灾区周围的人，都亲眼见着的。

“那时的谣言是：‘杀朝鲜人，不要把社会主义者放了生，’于是就酿出各处都在杀朝鲜人的举动。平泽计七君十一人被军队擒着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把他们赤裸裸地惨杀了，头是割断了的。我怎样知道的呢？因为我偶然在一个地方，看见了平泽君的被害后的像片，头和身体是分成两段的。

“他们的残暴还不止此呢；十六日，甘粕又把大杉夫妇及其甥橘宗一捉到宪兵司令部惨杀了，这也是谁都知道的。

“同时社会主义者某某的住宅被携着枪剑的军人侵袭了。某某人的家里也被武装的青年团侵入。还有巢鸭警察署拘捕的同志四人在大庭广众中被牵出来殴打，并用竹片乱柴一阵乱打，打得晕死几次，这也是不可掩盖的事实。

“我们劳动运动社从九月一日到七日，这七日内只分得二升糙米，其余一切食料都被市内的青年团阻挡着，不许分配给我们。

“到了第七天，我们就被麹达警察署捉去监禁起来。我那时正患着四十度高的热病，也被警察捉去，我不能动弹，他们连被盖一起，把我放在拘留所里。

“因为有这样残酷的暴虐，所以引起我如许的悲愤。这次我才决定来复仇！

“这些残杀的事件，尤其是惨杀了大杉夫妇后，还把那七岁的活泼可爱的宗一儿杀死了的，更使人悲愤欲绝，使我不能不作复仇的举动！

“杀朝鲜人，杀平泽君等，你们说是‘非常期内的不幸事’，但为什么杀了大杉夫妇和宗一儿后，还要把他们的尸体抛在井里，移尸灭迹呢？”

“政府把行凶的甘粕惩办，不过是敷衍的举动罢了。怎见得呢？甘粕杀了三个人，只受了十年徒刑，说是办得很严；但刑期还不到十分之一，就在千叶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了。这算不算是故意的圈套？”

“我犯了所谓国法，我不是由于不知法而犯法，我明知犯法而不能不犯。……现在我向全社会中管社会生活的人大声疾呼道：‘诸君，你们还知道社会上有正义么？这次事件的责任，应由那使走卒虐杀无辜者的万恶政府来负。我这次的暗杀，是根据正义人道的悲愤而发的。’”

“在警察厅的时候，在预审判事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都向我说：‘甘粕做的事，为什么你向福田大将复仇呢？恐怕看错了一点罢。’便是福田本人在预审判事的答辩也说：‘甘粕做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对于那件事情，也很觉得遗憾。假若和田对于我的误解冰释了，我愿请法庭减轻他的罪，但是如果他固执不变，那么，法庭更应严重的注意。’”

“福田说：‘判罪之轻重在我，’这话是何等地有趣；现在暂且不提了。且让我来说明‘怎样甘粕的事我要在福田身上来复仇呢？’现在假定预审判事的话和福田的话（甘粕犯罪与福田无干）是真的。然而甘粕的暴行，决不是出于自己的主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福田自己在预审卷宗上说，‘我处于命令者的地位，和田

等的这种想法未尝无理，这是什么缘故呢？甘柏受审判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很暧昧的，就是我自己也疑惑他受了别人的教唆。但这事已经军法会议裁判终了的，可以不必提了。’——这可以证明了。

“所以说，无论何人都疑此事为福田所教唆，这是当然的。因此我便以福田为应负此事全责的人，我现在说福田是甘柏事件之主谋者，有三个证据。

“第一，他是当时的戒严司令官。

“第二，九月二日张贴的告示：‘现有朝鲜人社会主义者肆行放火暴动，尔等人民宜团结以备不虞。’都是由福田雅太郎署名的。

“第三，当时戒严司令官发给青年团、退伍军人团的密令，是用誊写版印刷的纸张：‘应彻底取缔社会主义者及韩国人。’

“以上三件事，可证明甘柏事件最明显的主使者便是福田。……所以把大杉夫妇‘取缔’了，连七岁的宗一儿也‘取缔’了。

“纵然再退一步说，‘彼辈把密令误会了，甘柏事件完全没有关系’，我还要问福田一句：‘福田你也怀疑甘柏事件有教唆的人，幸而甘柏已脱网了。那么，请你把你的疑惑明白指出来，请你把黑幕揭穿罢！使我知道我想错了，使我能恍然大悟。’

“但是背后的黑幕里，尚有多数人在，恐怕福田也不敢说，福田，你是男子汉，你就出来负这个责任罢！

“‘经过军法会议是没法了’，那种黑暗的御用军法会议便

把责任卸却了，这恐怕不是军人的态度罢。握有部下绝对服从的强的权力的长官，假若其部下在外发生了谬误的行为，当然该由长官负责任，这才算得是军人罢！”

和田这样地完结了他的演说。

一二 男子汉的行为

二十七日，在第三次公开审判的时候，检事向裁判长详说被告的罪状。自然这些话尽是根据于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偏见而来的。他说完后，和田便发言：

“检事的话中有一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就是：‘暗杀计划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做的事，而是卑怯的行为！’怎样叫卑怯？怎样不是男子汉？一个有军队有警察和裁判所政府，在暗中主动来杀人，这才算是男子汉的事吗？这才是勇敢的行动吗？”

“我们洁己而死。裁判我们的人不久也要受人裁判，这个日子快到了，我们能够见得到的，这预兆，我们已可看得见了。看呵！胜利的波浪已涌起来了！”

一三 法律是政府杀人的工具

与芝加哥的惨剧一样，我们东方的先驱者，经过了几次滑稽的审讯后，便被处死刑和徒刑了。在这现代社会中，政府是万能的，它要一个一个地把无产阶级的斗士杀死，它要一个一个

地把好人杀死。没有正义，没有人道！法律是什么？政府杀人的工具罢了！

九月十四日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和田、古田等的暗杀事件已被判决了。

古田大次郎：死刑；和田久太郎：无期徒刑；仓地启司：徒刑十二年；新谷与一郎：徒刑五年。

一四 我的事件是拚命的

这本可以要求再审，然而他们却不愿意。

和田说：“我的事件是拚命的，我不愿哀求减刑。我很以不能与古田同死为憾……”他相信支加哥尼伯的话，“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的被杀而死，更要光荣些。”因此他希望判处死刑。八月四日，他由狱中寄了一封信给劳动运动社的同志，要求他们在他被处死刑后，把尸体焚毁，然后把骨灰拿来培养盆花。

古田在九月十四日的狱中《感想录》中也写着下面的话：“我可以从布施律师处晓得你们在外面的同志的意思。我听说没有一个反对我们不愿再诉的举动，我们真感激得很。多谢，多谢。我不能止住我的谢意。”

十七日，检事允许仓地和新谷的再诉。但十八日和田的刑已确定了。二十日他便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和田在什么地方？”东京的同志没有一个人知道。到了

十月初旬，同志们才知道他在秋田^①刑务所。这是在黑暗的夜晚，政府派人把和田送到浦和，再乘火车到秋田的。

一五 和平的最后

古田静静地等候那死刑执行日的到来。

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里并没受什么打击，很平静的。像江口君的话，既已到了那个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烦闷，只有安然地等候那死的临头。

到了他的最末的日子，古田的心是很沉静的。他那喜悦的面色，他那默默的微笑，他那悠悠的态度，——这是和他会面的同志都看见了的。

十月十五日八点三十分，古田的死刑已被执行了。那晚五点半钟，他的哥哥和同志十人，到刑务所取回他的尸体。此中的经过，有一位同志曾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到了牢狱的时候，天色已是暗黑了。禁子提着灯，我们在后随他沿着高的墙边走。那个威严而和蔼的，面带微笑的同志，出了会面所，可是他的四肢已冰冷了，颈上现出了一条深大的绞痕。我们不能忍了！不久牢门开了，我们抬着新棺进去。

① 秋田：日本北部最寒冷的地方。

古田，……俯着他的头。我们都没有说话，默默地把他的尸体移到新棺里，看他的面色，好像在静静地睡着。

依了他父亲的意思，把他的尸体送到杂司谷布施家里去了。杂司谷是在东京郊外，古田君生前很爱的地方。

到了十点钟，自然联盟、自我人社，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同志数十人，围着他的棺，诵读他的遗书：

“同志诸君：我去了，祝你们健康与活动！”

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时廿五分 古田大次郎”

这是他临死前五分钟写的，我们并没有乱了他的笔迹。

他带着一只狗和一只猫的照片，以及他妹妹寄他的一片枯叶上了绞首台。那狗是他生前所爱的；猫也是他家里的；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绞首台上，他仍然怀着慈爱心呢。

看呀，这便是现社会所谓暴徒(?)的最后！

一六 死的忏悔

古田被宣告死刑后写的日记，题为《死的忏悔》。这是血和泪的结晶，他以清晰的笔墨，真挚的感情，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不朽的书，现在已经成了日本的圣经了。从这里面，我们且译出下面一节来。

被裁判之日

渐渐的已到了今天，快要往裁判所去了，我把我的感想写了一些出来。

我自称是虚无主义者，到了法庭上，还说什么不中听的话吗？我痛悔我不自杀，不能不怪我没有勇气，实在可惜；受了什么裁判，已把我侮辱到了极点了。

想到这里，不论什么都得要反抗。

父亲屡次来信，都说在被裁判的时候，应该要稳重些，特别不要想到乱暴的说法。被父亲这样说，愿不愿都得自家当心，这不能不稳重了。律师的意见，以为不应该禁止旁听；一方面和田君也想在大庭广众之前，揭穿福田大将的黑幕。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应该格外的稳重了。

父亲又说，堂堂正正的受裁判，于父为孝，于亡故的母亦算敬礼。所以我仍将说的话放在心上，以出席于法庭上。

今天是阴天，像要下雨，还未见传唤。

怎样？押赴死刑场，是觉得有点心里不安罢。（午前七时记）

一天就把全案审完了（东京的一部分）。晚上回来，要想把预约的感想写了出来，不过身体是很疲倦的。

但是把当日的写了出来，是很有价值的，没法，直到今天一大早起就来写！

第一，把我欢喜的事写在前面。

和田、仓地、新谷诸君都很胆壮，那当然是很可喜的事。戏中比较不大健康的新谷君，全然不恨我们，亦不悲观自己受刑，尤其使我更加欢喜。

其次，我最对不住仓地君：“乞宽恕我，”我向他说：“天外飞来，我也一样，”他这样的回答我，我心里十分感激，至于流泪。

和田君热烈的雄辩，很使我感动，他说到同大杉荣夫妇一起被杀的活泼天真的宗一，我也泪下，恐怕和田君说的时候，自己也是声泪俱下的。

最后使我喜欢的，就是我案的答辩，也例外的非常的好。自家欢喜自家说的好，也未可知；但是觉得十分满足的。

许多同志，在旁听席中坐着，我见了心里非常欢喜，而胆为之一壮。

最滑稽的是那个书记和中滨铁面貌一样，最初是和田君说出的。仔细一看，越看越像中滨铁君，说话也像，背影也像。和田君说，简直当作会着铁了。

被我们指着笑着的那位书记先生，变了面色，睨视着我们。

寂寞的就是村木君不在这，和田君尤其比我们觉得伤感。他还说“被告席要与村木君留一份才好罢。”

真的呢，若是源兄在，便热闹得很了……

但是还觉得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看见他。他那青白的瘦而鼻高的面孔，带着凄惨的微笑，还在说，哈哈，

你们大家都很健壮的。

还有最凄惨的不能忘的一句话，和田君陈述的时候，像布施君在说“可惜他判决了死刑！”语不成声的调子，说了出来，虽一句短语，实在有说不出的无限的同情，我感激他，而那时我也绝望了。

那一句话，到现在我的耳里还觉得明显的很。

然而任想到什么地步，我觉得我虽不是做这运动的好材料的人，但我自己觉得自己对就去做去，不要他人说……我本来是这样的人，这一点是我自己，无论如何不得不自认的。

在公判庭上也想到这一点，觉得是很凄惨的。以外的三人，一个一个的代我辩白，以后我也就忘却了凄惨，我也就喜欢了，对于和田、仓地、新谷，我很感激他们，我真正喜欢极了。

总之，那公判，热闹，欢喜的印象，都享受了。

会着他们三个，实在不能不欢喜的。

最后和田君向我说，“以后还会面几次呢。”突然把胸一触，使我不能回答。

一九二五，七，二二。

〔校后记〕 这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的旧稿，去年《革命的先驱》付印时曾删去几节。现在看过一遍，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改动的地方，而且已经打好纸版，改起来也不大方便，就率性不改了。不过现在应该声明的，就是：和田久太郎已于今

年（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在日本北部秋田监狱中自杀了。当我得到这不幸的消息时，曾将此文加以增改翻译成世界语，后德国同志 E. Liebetrau 又由世界语译成德文。最近读到德译文心中有无限的感触，想再写一点文章，然而似乎真到了“悲愤填膺”的地步了，提起笔又复搁下，最后还是把心一横，决定不再写什么了。

同志哟

在这心已干枯了的时候，

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再记〕下面的一篇古田火次郎底《狱中绝笔》是我和慈林同译的，也附在这里。

狱 中 绝 笔

五月二十六日

再说对于《灰色马》的事——

我为什么杀人？为的爱。

在我是完全认许了么？是的。

我感着生的留恋么？没有。

对于死的恐怖呢？曾经很厉害的感着。

现在，有时感着，有时没有感着。把死完全忘记了的时候很多。只是死的瞬间的苦痛，是有一点可怕的。

比这样更正当的生活方法没有么？或者会有。但是我不

知道。我常常在寻求着。以上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生活是“可以诅咒的空虚的东西”么？不是的。

我是“不爱那一个，不想去爱那一个。不能去爱那一个”的么？不是的。

我“具有一种欲求”做了我的事情么？或者我是以“很想这样做，所以这样做”的心情做了的？对于这点，我不能明白的答复出来。但我决不是以那样简单的心思做了的。

路卜洵所说的两条路——“升向基督的路，或者降到斯马加考夫的路之中”，我对于斯马加考夫是什么人物，没有知道，所以我对于后者，不能具有什么意识。但这或者与我在上面说过的“完全认许，或是完全抛弃”，是同样的意义。

“真理是什么？”“真理在何处？”我为探求真理而杀人，而自己也被杀。我相信贯彻于此点的心，便是“爱”。

“非常注意于理由与他人的意见之中，恐怕含着有怯懦的要素罢？”确实的。

五月二十七日

我曾想着到了破坏主义的境地，烦恼、苦痛都会没有了。会变得很平易。可是，并不是那样的。

因为这样的苦恼，就从破坏主义中逃出来吗？只是为死的恐怖与生的留恋，就从破坏主义中逃出来的事情，是不能认许的。很多的人因后者的理由，不想进破坏主义里来，一边他还可以说在探求真理么？要是可以说，那是虚伪的。

因为怕死，而踌躇于求真理的人，对真理不能说是忠实的。那么，他的生活，是虚伪的。
与其虚伪无宁死！

六 死囚牢中的六年

萨珂(Sacco)与凡宰特(Vanzetti)果然会被杀么？

一 杀人的政府

要说政府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罢。你看，有两个人，他们的死刑全世界各处无数的人大声反对，全世界无论欧洲、美洲、亚洲的重要都市里都成立起来了援救他们的委员会。无论是知识阶级或劳工阶级，无论是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党都同声一致地反对政府杀这两个人；全世界中凡有良心的人都一致地要援救这两个人，他们与政府奋斗了六年了，然而美国麻沙秋谢州(Massachusetts)政府仍然要杀这两个人。难道这许多万人的意志还敌不上那几千人的意志么？在一八八七年美国伊立诺伊州政府已违反了许多万人的意志冤枉杀了五个人了，现在，在同样的情形之下，那两个人也许会有那同样的命运。然而我们能眼见着政府随意杀我们的同胞么？我们要援救他们，而政府却要杀他们。从此我们也许更了解政府的性质是完全于我们有害的了。我不仅要救我们现在被难的兄弟，也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子孙，

那么我们非把那杀人不眨眼的怪物除掉不可。

那两个待死的人便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与凡宰特。

二 萨珂与凡宰特

萨珂与凡宰特都是意大利人，无政府主义的斗士，最近十年间他们在美国新英格兰一带从事劳动运动甚力。他们本来是工人，所以能纠合工友们组织工会，时与资本家抵抗，遇有罢工运动，他们总是尽力援助，因此使得罪了资本家。资本家把他们当作最厉害的敌人，时时想法陷害他们。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麻沙秋谢州南布兰垂某制靴工厂的守卫和会计被强盗杀死了。这件事本和萨珂与凡宰特毫无关系的，然而法庭会想办法。

萨珂与凡宰特的被捕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们被捕的真正原因与杀人事件并无关系。原来政府另有别的用意，是年五月三日在纽约城内有一个行人在早晨看见从警察署的十四层高楼窗子里抛出一个人的身体，这个人究竟是跌下来的，或是被人谋害后把尸体抛下的，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人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Salsedo)。萨珂与凡宰特对于这件事异常痛恨。他们是萨尔塞多的亲密的同志和友人，在萨尔塞多被捕后未死之前，他们极力奔走运动援救他出狱，谁知正在这运动激烈的时候，他们所要援救的同志竟被人谋害了。这种绝望的悲哀与愤怒使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激

烈的抗议运动，猛烈的攻击政府当局，他们预备好了开一个群众大会，散布了许多传单，但五月五日他们便被捕了，身边还有一张传单。

在被捕后的前几天，州政府只说他们是过激分子，预备把他们驱逐出境，然而法律上的理由又不充足，于是警察们便极力搜求可以做诉讼理由的证据。最后这些走狗们终于“发明”了很好的办法。政府当局轻易地把靴厂守卫和会计的被杀事件的责任放在这两个“过激分子”的头上，这真是绝大的发明！

三 儿戏的审判

说审判是儿戏，也许那些拥护法律的人不肯承认，然而事实上使我们相信如此。你想想看，那些人，他们的人格甚至比一个强盗还坏，他们居然敢来审判那些为正义人道奋斗的革命家，真太不自量了。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还不以合法的手段来审判，他们还收买了许多伪证来诬陷被告。譬如一八八六年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开始时，法官便受了贿赂枉法裁判，于是以莫须有的证据判了五个人的死刑。后来新任伊利诺伊州的州长，才把那件法官受贿的事宣布出来。从此法庭受贿的事尽人皆知；“审判是儿戏”的话谁都承认了，只苦了那呻吟于法律下的冤魂！萨珂与凡宰特的事不过是许多不公道的审判中的一件而已（其实审判不会是公道的）。

法庭方面既把一切的手续预备好了，于是开庭审判。许

多无聊的人都被收买来做证人，在法庭上胡乱说了一阵。这样的审判继续了七个星期，都不过是玩的同样把戏。那十二个陪审官照例是玩把戏的好手，还有那州律师和裁判官等，也都是上等的刽子手。所以审判的结果便是死刑。

说来是很奇怪的，法庭方面在开始审判的时候，把萨珂当成制靴工厂事件的主犯，凡宰特算是在布立奇渥达十二月二十四日另一强盗杀人事件的凶手。其实这隔了许久的事居然会连在一起，真正是儿戏的举动了。

关于凡宰特的公诉是秘密进行的：出乎一般想象以外的不公平。先判了凡宰特十五年的监禁。凡宰特为着准备再审判的缘故请求缴纳保证金，保释出狱，但法庭又以与制靴工厂事件有关拒绝保释。这种举动更足以使人明白法律的性质，实在说来更足以使人轻视法律。法官可以随意收买伪证，来把许久未决的旧案的责任放在他们所欲杀死的人的头上，法律只不过是他们杀人的工具罢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萨珂与凡宰特自然会得着死刑的判决。果然在第七星期的审判后，麻沙秋谢州法庭便判决了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虽然这“电椅的死刑”比较杀头绞首要文明一点，然而一想到这次审判的内幕，便令人不寒而栗，这何尝不是最野蛮的举动呢？

四 法庭的重重黑幕

法庭是公正的么？不，绝不！两个曾服务于联邦政府的

警察署职员奈若尔满和卫羊特说，萨珂与凡宰特是帕尔麦和警察署员弗林等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组织的渴血的阴谋之下的两个受害者。而先前死的萨尔塞多也是一个受害人。他们的阴谋是反对一般革命党——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既杀了萨尔塞多之后，又要来杀萨珂与凡宰特了。

奈若尔满又说，波士顿的联邦警察署员都以为萨珂与凡宰特实在是和他们所被定的罪名无关的。

波士顿巡回法庭庭长安德生甚至在萨尔塞多被害以前，便严厉地攻击帕尔麦、弗林等所组织的陷害无政府主义者的“赤十字军”的法西斯蒂行动，萨尔塞多的被害应由帕尔麦负责，因他当时是被帕尔麦囚禁起来的。那些刽子手要叫他供出同志的姓名来，还预备把一九一九年六月的炸弹事件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后来大概是因为这种手段失败了罢，便率性把他害死了。

这样可见萨珂与凡宰特的判决完全是法庭做好的圈套，什么证据都是假造的。法庭的重重黑幕这次算揭起了一幕，看呀！那里面是何等黑暗，阴郁！何等的可怕！法律，在你的名义之下，不知有若干无辜的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了！

然而有许多人还想政府和法庭有一点公道的处置，还希望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会有一点良心，他们请求再审，但经过了许久的努力后，所得到的是麻沙秋谢州最高法庭的拒绝！要是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萨珂与凡宰特的罪，为什么又怕再审呢？

五 真正凶手马德诺司的自白

一九二六年夏，一个杀了银行会计的凶手马德诺司(Madeiros)，在法庭上自承他和几个同伴是一九二〇年制靴工厂谋杀事件的凶手，这完全和萨珂与凡宰特无关的。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假若根据这证据审一次，那么萨珂与凡宰特的罪名一定可以洗刷干净。然而法庭方面把这重要的证据一笔抹杀了。

裁判员赛叶(Thayer)对于再审的请求，驳覆道：“以马德诺司的供词而论，法庭可以很轻易的把责任移在别一些陪审官的身上，然而果真要这样做，便无异乎规避法律所加于法庭的严重职责了。我为这严重的职责所驱使，不得不费了几星期的时间，不间断地来考验和研究关于请求再审的证据和马德诺司口供的记录。我凭着理性和良心的判断，而且存着对于被告方面的怜悯心(这怜悯心是在不与法律的原理和对于公家权利的尊重二者相冲突的范围内的)结果，我不得不判断马德诺司的口供是不可靠的，不值得相信的，虚伪的。要根据这样一篇供词便把这国里最高法庭所承认的十二个陪审官的判决推翻，这简直是在侮慢真理和正义了。因此我使用法律所赋予法庭允许请求再审的一切权利，拒绝这次对于再审的请求。”

这样以极无理的理由就把马德诺司的口供一笔抹杀，对于请求再审的希望作了这样一个严厉的打击。萨珂与凡宰特

是一定要死的了。然而他们的死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杀人的嫌疑，而是因为他们劳动的主动者，是政府所痛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真正罪名不是杀人而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于此可见世界上最卑鄙的莫过于政府的走狗了。他们不敢明明白白的杀人，而必假造一点罪名加在别人身上作藉口以杀之。芝加哥的悲剧已判定了伊立诺伊州法庭的死刑，而马德诺司的自白又判定了麻沙秋谢州法庭的死刑。现在不是法庭在审判被告，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在审判法庭的日子了。总有一天人们的愤怒堆积到无可隐忍的时候，他们会起来像捣毁法国巴斯底监狱一样，把一切的法庭捣毁得干干净净，不留一块石子在地上。

六 凡宰特的身世

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在他的自叙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里，用很动人的笔叙述他的劳工的生活。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开始在一个意大利城里的糕饼店里作工，一直作到他来到美国的时期。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便同萨珂一齐被捕了。他的全生活里都是勤勉刻苦的劳动的日子。到美国后常常有失业的时候，连面包也不能得一饱。在意大利时，他很少读书，到了美国后，不管生活如何困苦，他仍努力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思想。他读过克鲁泡特金、马拉铁斯达、邵可侣、马克思、马志尼、斯宾塞、达尔文、

托尔斯泰、左拉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书籍。他承认他的思想力还不足透彻了解这些材料。他说：“但是我又研究对于人们、动物、植物以及人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之残酷的继续的严厉的观察。生活的书：这是书中之书！所有其他的书都不过是教人怎样去读那本生活的书罢了。”最后说到他现在的情形，他说：“我在众人的自由中去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以为要建立一个正当的人类社会，唯一的道德的基础便是义务、权利、事实的平等，只有在这基础上，正当的人类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

这便是那个人，美国警察为着要保护他们的主人（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缘故，不惜收买伪证来诬陷他，用种种手段来谋杀他。然而就不管马德诺司的自白，你会相信写《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的凡宰特会做一个强盗杀人犯么？

七 监狱中的萨珂与凡宰特

最近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波尔基(A. Borghi)曾到监狱里看过一次萨珂与凡宰特，出来后，记录当时的情形如下。

我到他们的监狱里去看他们。进去时我不禁战栗，出来时我竟哭起来了。

啊，同志们！他们在那里很活泼，很康健。他们微笑着。他们谈论着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奋斗，好像他们在几星期后就要出狱似的。假若你不常见他们，你定会忘记

他们现在的实在情形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如此清明，面貌是如此安静，精神是如此平静。

然而实际上他们却被判定死刑了。

在监狱里，就在凡宰特被囚的地方，那可怕的杀人的电气刑具已设备起很久了。因此我们的同志每天早晨当他的囚室门上的锁打开的时候，他不知道究竟是狱卒领他出去照例的散步呢，还是上那电气死刑台。

凡宰特自己对我讲，有些时候，有人把他放在那个离执行死刑的地方很近的囚室里。他能够听见那伴随着刑具起来的可怕的叫声。

我出来时自己心里异常的激动。我希望这是一场幻梦；我想象到那等候着这两个被资产阶级所拘押的人质的可怕的最后，国际无产阶级看着资产阶级把他们放在刽子手的手里而不能阻止。我想到这个，我感觉很大的羞愧！

这样，经过了七年的抗议后，对于这两个被定罪的同志已是七年的殉道了。

他们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以一种激动的确信的态度向你们明白的宣言：“电椅的刑罚迟早总会来的，早一点还要好一点。”

萨珂在一阵愤怒的时候，他的南意大利人的黑眼睛为愤怒的火焰燃起来了，他叫道：“我不再签名请求再审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应该早点完结的。”

我向这两个英勇的同志说，现在法国援救他们的运

动扩大了，这是法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特别是在巴黎的）的工作。

他们都知道。他们感谢同志们，然而我再说一遍，他们相信是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不管这个，他们现在的精神仍是惊人的。

七年！……判决了死刑后的六年。

这七年之中，萨珂过了七年囚室里单调寂寞的生活，凡宰特做了七年的苦工。而且时时来到脑里的思想就是死。

今天？明天？后天？

他们是无罪的。便是他们的精神的坚忍力量已足以证明他们是无罪的了。

要是在明天，这两个殉道者在绝望的时候，承认是罪人一死了事，那些科学家、法学家能够不想想近代所用来攻击中世纪的惨酷刑罚的论辩便来承认这种自白么？

一个人生活在电气死刑的威吓下过了许多年，每天早晨狱卒来开囚室门时，都有幸出去执行死刑的恐怖，这样的刑罚，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残酷的么？

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敌人没有机会做事。

第二，应使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运动到处蜂起，像现在才开始那样。

我们且假定萨珂、凡宰特还有生存的希望，而你们和

劳动阶级援救他们的奋斗也是会得着胜利的。

八 我不是一个罪人

美国名小说家派苏司(J. D. Passos)曾到监狱去访过凡宰特一次。

凡宰特坐在一个凳子上，身体粗大，平静。在他的广阔的眉下有一对安静的眼光。他有浓密的髭须，当他微笑时嘴唇并不抖动。

我们互相问候了过后，凡宰特说：“很不好。我应该勤苦地工作，现在应该更勤苦了。我要写的东西太多，而且恐怕又没有好多时间了。”

他每天差不多有三小时的时间来读报、写信、作文。其余的时间便在工厂里作汽车的铁板。

他又说：“在监狱里写东西很困难。以前我每天可以劳动九小时或十一小时，然后坐下来写东西。……在我的文章里少有错的地方。然而现在呢，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改，在囚室里写东西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又谈到教士。天主教教士和新教的牧师都发表宣言和文章来攻击他。他们说，别的囚犯看见这个判定了死刑的罪人居然会这样一年一年地逃掉刑罚，那么他们便会变坏的。

“他们之所以恨我，不过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罢了。假若我肯走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谦卑地说：‘神父

啊，我现在忏悔了，请你赦免我罢！”他们便会帮助我的。”凡宰特这样说。

“最后，我请求见木尔飞神父。我要求见他，向他说，‘我对你曾做了什么事会使你这样的反对我呢？’他战栗得像一片树叶，除了温和甜蜜的话语外什么也不说了。要是我真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救我的灵魂，也许甚至红衣主教也要替我说情的。他们恨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罪人。”

在监狱中，你一入了法律的陷阱，你的最大罪名便是“无罪”了。

凡宰特说：“请告诉他们，我拒绝一切宽恕减刑等等的请求。我既然是无罪的了，为什么要去要求减刑呢？”他说话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声音一点也不抖。

九 全世界同声援救

判决是定了，再审也不能了，一切都完了。这种残酷的判决自然会引起有良心的人的反对。自一九二一年判决以来，世界各处都有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运动。在波士顿组织了一个“萨珂与凡宰特援救会”，一面宣布法庭的黑幕，一面向全世界报告此事的真相，请求有良心者的援手。已故法国著名文学家法朗士当时还健在，他在那年十月三十一日致书英国国民全体，敬请援救两人，言词甚为沉痛。近来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也宣言反对这两人的死刑。在法国这种运动异常激烈。不仅无政府党要援救他们的同志，便是共产党、社会党、急进党

等等都要救这两个无辜被害的人。所有人的报纸论到此事，无不反对美国政府的措置。“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援救会”在法国各大城市组织演讲会，演说的人有该城的市长以及著名人物，工团亦有人参加演讲，著名文学家乔治·比阿席(G. Pioch)每次都以他的如火的辩才把这次残酷不公道的事件展示于全法国人民之前，叫他们救救他们的无罪而被处刑的弟兄。

此外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英国、日本等国都有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抗议书致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在法西斯蒂势力下的意大利，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和共产党联名发出抗议书。在南美布威洛士，有人在美国公使馆投炸弹示威。

至于美国，各地的反抗运动更为激烈。在纽约，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由I.W.W.发起，连日在玛秋生司克亚公园开抗议大会，每次到会者有一万八千余人。许多演说家的热烈辩才感动了无数的人。有名的辩护士泰罗说，“假若尽力如此做去，便可以保证有再审的可能和生命的救助。”I.W.W.与其他劳动团体组织“国际劳动者防护委员会”，屡次向麻沙秋谢州州长提出严重的抗议书。

全美国劳动团体的机关报上——一致登出下面的口号：

从合法的杀人者手里救出萨珂与凡宰特来！

不要让这两个同志死了！

以相互扶助之键打开这两人监房之锁，把他们救出到自由的世界来！

至于资产阶级呢，这次他们也要说几句公道的话了。美

国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反对法庭的判决。《波士顿消息》上说：

萨珂与凡宰特不应照一九二一年的判决施刑。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的政治理想并不同情，然而我们的怀疑渐渐使我们确信这两个人是无罪的。再审的请求是根据警察吏奈若尔满与卫半特二人的供词以及马德诺司的口供的。关于前两个人，裁判官赛叶说他们故意使他们的供词带有侵害美国政府的威权的性质，至于马德诺司，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骗子。

我们要求考察奈若尔满与卫半特所指出文件中关于这案件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萨珂与凡宰特是在压迫革命党人最厉害的时期里被定罪的。而且警察长帕尔麦在一九二〇年纽约监狱中的悲剧里所做的事也很可疑，在其间萨尔塞多在拘留所的十四层楼上坠下死了。

因为这些理由，我们希望在一九二七年的安静的空气里重审这案件。

今年四月十二日法国社会党的报纸《每日新闻》(Quotidien)上也说：

据可靠的消息，萨珂与凡宰特将于今年七月十日后的一星期里被执行死刑了，恰恰距现在还有三个月。……我们想象中会看见那被定罪的人缚在那杀人的电椅上，然后放下来抬回监狱，过几天便行葬礼了。这所经过的一切可算是最残酷的举动了。

难道那一大群智慧科学进步的人能冷淡的看着这两

个人受这样的苦刑么？

他们是无罪的！

罗曼·罗兰等也致电美国政府抗议他们的死刑：

法西斯主义及白色恐怖下受害者防护委员会抗议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要求释放他们。

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爱因斯坦。

我们很苦痛地知道麻沙秋谢州律师要求立刻执行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

这两个人，千万个有良心的人都说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在一九二一年被判死刑后等候那最高法院的决定已六年了，他们长期的殉道已唤醒我们国人的一致的同情。

我们诉之于美国政府的仁慈，希望以公平的宽恕手段对待他们。

盖约(前国务总理)

麦拉尔杜连关人(万国人权协会会长)

巴齐(法国人权协会会长)

茹阿(法国劳动总同盟书记)

此外塞威林(Saverine)及比阿席、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二十六人联名致抗议书于美国政府，署名的人都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和学术界有名望的人。其余向美国政府抗议的人不知多少，其他各国抗议这种判决的人更不计其数。意大利政府也向美国政府提起交涉，这些事因篇幅关系也不必多说了。

一〇 劳动阶级的愤怒

全世界的工人们看见他们的伙伴快被美国政府诬杀，自然异常愤怒。政府本来是工人的仇敌，对于敌人只有奋斗到底，更何况此时他们的伙伴又陷在敌人手里呢？

美国政府要诬杀萨珂与凡宰特，便无异正式向工人宣战，工人也只有准备应战的。

柏林革命工团主义的工人国际（第四国际）发出沉痛的檄文，告全世界的劳动阶级，要全世界的工人们一致起来援助他们在危难中的两个同胞。

法国劳动总同盟致美国劳工同盟表示法国工人的态度与美国工人一致。坚决的反对萨珂与凡宰特死刑。同时又电安士潭工团社会主义国际，要求一致反对美国麻沙秋谢州政府的野蛮举动。

安士潭社会主义国际同时致电麻沙秋谢州政府，代表七百万工人表示萨珂与凡宰特的无罪，并反对他们的死刑。

南美阿根廷的布威诺亚列司（Buenos-Ayres）地方的码头工人罢工四十八小时，表示他们的反对。

纽约的工人在最高法院的决定宣布后，四月十一日也罢工一小时，十四日在联合广场举行了示威运动，并且还要开会决定总同盟罢工的日期。

—— 最后的一步

虽然全世界中有这么多的人要救这两个人，然而那些嗜血的恶魔却一定要杀他们。诺尔福克郡地方律师威尔巴说：“我相信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执行期愈速，则现在的种种运动之消灭期愈早。要是我们早把电气死刑执行了，那么决不像西布立奇渥达炸弹那样的事发生了。”

这样说来，可见支配阶级是决心要杀萨珂与凡宰特的了。

今年四月五日午后十一点十五分钟，“萨珂与凡宰特援救委员会”从波士顿发出下面的电报：

最后的一步，——电椅——情形很悲惨。

第二天法国各报都载出来，加以沉痛的评语。

果然，四月九日便宣告最后的决定了。情形是这样的，

在裁判员赛叶未到之前，州律师连奈把法庭的决定告诉了辩护士汤姆孙。

萨珂与凡宰特知道他们还有九十二天可以活的了。

不久宣判的仪式便开始了，书记起立宣誓，并问：“尼古拉·萨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萨珂便立了起来，先抱歉说他的英语不好，请原谅，然后演说道：

“我从不知道也从不曾听说过，更不曾在历史上读过世间还有和这个法庭的残酷相等的东西。

“你们经过七年的迫害后，所宣告的判决，是阶级的判决，是有产阶级反对被压迫阶级的判决。只要这两个阶级存在一日，他们便会冲突一日。我们是和你们所压迫的平民一起的。我们要谋他们的解放，而你们却故意煽起各国平民间的恶感，在他们之中筑起一道鸿沟。

“裁判员赛叶，你知道我生涯中的一切，你完全明白为什么我的妻子和我受着压迫者的迫害，在那些压迫者中，你自己也就是一个。你也知道这个人^①生涯的详情，他一生永久为弱者谋幸福，但是你虽知道他是无辜的，你却两次判决了他的死刑。

“你忘记了那绝大的群众，他们七年来用尽了精力和仁爱来阻止你对于我们的野蛮的判决。我感谢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这是有良心的人，普通的人。他们主张正义。然而你却不顾他们，残酷无情地定要贯彻你的目的。你的意思不过就是这样，什么正义，什么人道，你们何尝顾虑到丝毫！我用不着再向你说什么了。

“不！我忘记了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件事。裁判员赛叶，你明白我生涯中的一切，你深知我永不会是罪人；不但昨天，今天，而且永远我都不是罪人。”

书记又问凡宰特有什么话要说。

凡宰特答应了一声“是”，便立了起来。他演说了四十二分钟，猛烈地攻击法庭，攻击裁判员赛叶以及他所代表的秩序。

^① 这个人：指凡宰特。

“我坚持我的宣言，我不但不曾犯南布兰垂的罪案而且也和布立奇渥达事件无关。我不但与这两件事无关，而且我一生从来不曾杀过一个人，或偷过什么东西，我也永远没有流过别人的血，并且我一生中都是在为着消灭人类生活中的罪恶而奋斗的。

“谁知道我这一双手，便会明白我绝对不会在街上抢劫别人的金钱。……

“我能够不劳动而生活，然而我自己拒绝了这种社会中良好地位的引诱和荣誉，因为我以为要靠他人的劳力而生活，这是不公平的事。

“我不仅反对那种法律那种道德所判定的犯罪，我还反对这法律道德所承认所尊重的人，对于人的管治和掠夺，因为这个理由（假若能够叫这做理由的话）便使我今天在这罪人席上受判决，而且在几分钟内便能被屠杀的。真实的理由除了这个外什么也没有了。

“你知道我们已被监禁了七年。我们所受的痛苦是不能描写出来的，然而你可以看见我今天向你说话，一点畏惧也没有，我看着你脸一点也不红；没有什么羞愧，没有什么畏惧，会使我改变颜色的。

“我们是反对战争的，近十年来的教训使我们仍是这样地反对战争。我们永远相信战争是一场灾祸。我们永久是战争的敌人。假若在这里我能够向人们说：‘小心罢，你们正走向那人类中许多良好分子的基地去啊！为什么呢？所有别人向你们说的，允许你们的，都是谎话和幻想。他们允许了你们的

自由，自由在哪里？他们允许了你们的幸福，你们果然享受过么？他们允许你们道德的提高。但这道德的提高又在哪里？’假若我们能向人们说这些话，我便很快乐地去受死刑。

“我的最后的话是这样：我决不愿意一只狗一条蛇或一个地上最可怜的生物有一天会受我这样的苦，无辜而受刑罚。

“然而我相信我受苦的真正原因我自己是要负责的。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实在我是一个意大利人。

“我为我的家族以及我亲爱的人受苦更甚于为自己受苦。

“然而我是如此坚决的相信，纵然你裁判了我两次，或者纵然我有再生的希望，我仍然像以前那样把生命贡献与主义。走着与从前同样的路。

“我的话完了。谢谢你。”

凡宰特的演说感动了旁听的人。大多数人都哭起来了。全法庭静默了几分钟。检察官不说什么。裁判官赛叶也不开口。最后赛叶起立向着被告席宣读判词：

“被告等应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受电气死刑。”^①

萨珂叫道：“我们是无罪的啊！”

赛叶说完，也没有勇气照例地说那“仁慈无限的上帝会怜悯你们的灵魂”的话了。他投了一瞥骄傲胜利的眼光在不幸的两个被告身上，便匆匆进去了。大概这个时候他会打电话

^① 这里是译意。

到他家里报告他的胜利罢！

一二 勿忘七月十日

在经过激烈的援救运动后，得到这样的结果，人们的愤怒自然到了极点。在美国总同盟罢工的筹备已快妥当，在最近的将来就要爆发的。在法国已由各党派联合起来组织萨珂与凡宰特委员会。就以巴黎一地来说，隔了几天便开一次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大会，在街上到处可看见很大的招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很活动，“无政府共产主义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人》每期特辟一栏登载此项稿件。“萨珂与凡宰特援救委员会”（法国的）发出签名表四万份，每份可容一百七十五个人的名字，总共可容七百万人的签名。此项签名表由《晚报》及《自由人》两报分散。签名期自五月八日开始，六月十九日截止。预计至少可得五百万人签名，于六月十九日送到美国公使馆。巴黎的《晚报》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每天登出很多签名人的姓名和地址，而且签名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这可见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事已不仅是无政府主义单独的，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共同的事了；同时可证明萨珂与凡宰特的判罪全是冤枉的。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萨珂与凡宰特也许会死，然而我们能眼看着他们去坐电椅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无罪的。难道我们能眼看着他们受着杀人强盗犯的罪名而被害么？假若我们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假若我们还有一点人性，假若我们知

道正义、人道是什么，那么我们不能——绝对不能——眼看着，亲眼看着这两个无辜的人，甚至就在现社会中也算是人格极高尚的人，毫无证据地被人诬告，被人判罪，甚至就要被人送上电气死刑台。我们要起来，要起来救他们，也就是救我们自己。假若我们让那一般弄法的恶魔去横行，那么这世界不久就会弄到人吃人的地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无辜被杀的。我们不愿意别人无辜被杀，不愿意自己无辜被杀。那么，让我们起来表示我们对于政府的蛮横残酷的行动和卑污的谋杀二者的抗议。使那杀人的刽子手知道我们不是任人屠杀的驯羊。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可悲可痛可怖的七月十日啊！……难道我们不是人么？难道我们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么？为什么我们欧洲、美洲、亚洲许许多多万的人，还敌不过那几个洋法的官吏？他们几个人便可以任意杀我们许许多多万人所要救的两个无罪的人，这是个怎样不合理的卑污的制度啊！波士顿“萨珂与凡宰特援救会”费了五万小时的时间，散布了二十万份书报，花了三十万元美金，为的是救两个无辜受罪的工人，然而结果得到的却是七月十日的死刑。难道人民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比起来便是这样的薄弱么？从此我们该可明白了政府的罪恶罢。

七月十日快到了，快救我们的萨珂与凡宰特！假若美国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全世界许多万工人的援救，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抗，各党派以及知识阶级的抗议，五百万人的请求书都换不了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假若他们果真死了，那么，

我们要起来替他们复仇！作一个例子给一切的政府看！

勿忘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日！

（附注）此稿草完后接到美国《到自由之路》号外：《国际无政府主义团告工人》的檄文，主张激烈的直接行动，反对要求减刑。“只有总同盟罢工才能够阻止这两重的谋杀，争回我们两个劳工同胞的自由。”最后的几句话是：

美国的工人们，

这是要你们来阻止这违反人道的罪恶了！

现在是你们在受审判！历史要来裁判你们！

你们的小孩会伸出手指来责骂你们，并且问道：“爸爸，萨珂与凡宰特被谋杀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响应我们的呼声，预备总同盟罢工罢！

采取直接行动！

国际无政府主义团启

七 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萨珂与凡宰特死了，六年来麻沙秋谢州的惨剧竟这样悲惨地完结了，这样的事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然而事实明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六年来的一线希望终于被铲除净尽了。只要有“大拉”的势力存在，正义是不会来的。

这件事的经过——萨珂与凡宰特之死，确实值得用莎士比亚写悲剧的笔来描写的。在此我们既限于篇幅又限于能力，只得简略地叙述如下：

自从麻沙秋谢州州长弗勒发表了他的决定后，萨珂与凡宰特的命运便被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子定在八月十日的晚间。

萨珂与凡宰特自七月十八日起便在监狱中开始绝食。

八月五日萨珂在狱中宣言：“我们以死自豪，我们像所有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陷于同样的命运。”凡宰特的宣言是：“我们为无政府而死，无政府万岁！”

八月十日晚间在预定执行死刑时期的前三刻钟，弗勒宣布把他们的死刑延期十二日，改在二十二日晚间执行。

这十二日间，凡宰特的妹妹从意大利赶到了波士顿，她要救她的哥哥。萨珂的妻子及许许多多的人都异常努力想从电

椅上救出这两个无罪的人来。欧美各国各大都市都有人在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附近掷炸弹。美国的各大地方也常有炸弹爆炸，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军警成了唯一的主人，资产阶级真预备着来举行血宴了。

至于萨珂与凡宰特呢，他们在监狱中安静地等候着死刑的到来。长期的绝食使得他们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然而他们的精神仍是极其强烈的。

二十二日晚九点零五分，萨珂的妻子、凡宰特的妹妹和全国被告律师去见弗勒。他们谈话至一小时半之久，这两个可怜的女子哭着甚至跪着向弗勒哀求，求他不要杀掉那两个无罪的人，弗勒冷然地答道：“我是依着法律而行的！”萨珂夫人甚至向他叫道：“你有孩子，我也有孩子，照着父亲的地位来处置这件事罢！”那弗勒像狗一般的听不懂这样的人话！他丝毫不动心，什么希望也都没有了。

到了十点四十八分，狱吏通知萨珂与凡宰特说，他们要在今晚被处死刑了。

萨珂正与他的父亲写信，便请狱吏代他投邮。凡宰特在囚室里闲步！听了狱吏的话冷然地回答道：“人们终于会屈服在真理之前的。”

实在，他们早已知道他们的生命在这天晚上是一定要消失的了。在七点钟时萨珂的妻子和凡宰特的妹妹便进监狱来，和她们的亲爱的丈夫和哥哥作最后的告别，这一天她们已进了监狱三次了。

被告律师麻司满诺(Musmanno)在十一点十五分钟曾到

监狱来会萨珂与凡宰特，却被拒绝了。麻司满诺便向新闻记者宣言：“我愿意见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无罪的。便是拿全世界的电椅和绞首台来威吓我，我也要说明他们是无罪的。”

十一点三十分，监狱长带着牧师及行刑吏等来了。麻司满诺和一个新闻记者这时才得着许可进狱。

教堂的钟声铛铛地敲了十二下，牧师便来替“罪人”祷告，叫他们忏悔。他们都拒绝了。他们是无神论者，而且他们是无罪的。

马德诺司的死刑最先执行。他是因强盗杀人案件被判死刑的，他曾自认他是南布兰垂枪案的真犯，萨珂与凡宰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而裁判官赛叶说他的供词全是谎话，便把它一笔抹杀了。

马德诺司在一点零九分气绝。

萨珂在一点一十一分钟被带进刑场。他的身体异常衰弱，然而他两眼放出光辉，以坚定的脚步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叫道：“无政府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后又向旁观者说：“诸位先生，晚安。”他的最后的话说得不甚清楚，但可以分辨得出是“别了，妈妈！”

狱卒握了他的手后便离开了。电流开始通过他的身体，直到一点十九分医生才宣告他气绝身死，共经八分钟的时间。

狱卒刚把他的尸首搬到一个屏风后面，凡宰特便被带进来了。

凡宰特异常安静，不露丝毫惊恐之色。一进刑场，他便自

已向着电椅走去，他的态度很勇敢。他握了狱吏亨得利的手，向他说：“谢谢你，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然后便向旁观者说：“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自然有时候我也不免有小小的过失。我感谢你们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不仅别人所诬我的罪我没有犯过，便是所有其他人间的罪恶我也没有犯过。”他的最后的话是“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他还想说下去，而那刽子手已把套冤笼在他的头上了。

过了六分钟以后，凡宰特便不生存在这世界上了。

大罪已成。从此在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污点是洗不去的了。这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一点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时间，在人类史上是不朽的。

这时候离监狱不远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有两个女子。在半小时的时间中鲁意加·凡宰特手里拿着十字架替她的哥哥祈祷。而露莎·萨珂，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是无神论者，她只是默默的等候时间的到来。最后，一点二十九分，一个电话来报告说：“什么都完了！”那两个女子便大哭起来。

从此什么都完了！

八 死者与生者(杂记之一)

当萨珂与凡宰特被害的消息传到法国的时候，君毅同志自巴黎写了一张信片给我：“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现在所等的是那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不会久候的！”

在同天中我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到自由之路》社的同志们，这封信后来在《到自由之路》第四卷第六号上发表，现译出如下：

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了。不要忘记他们含笑而受电椅死刑！萨珂在他一生之最后时间中还高呼：“无政府万岁！”凡宰特在电椅上还辩明他是无罪的。他们死了，他们做完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做得像“一个人”，像“一个殉道者”。这是他们，他们体现出无政府之美！这是他们，他们为着信仰而流了生命之血，并且相信着他们的殉道可以救赎人类的！

然而当他们被杀的时候，当这两个无罪的人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曾知道而且高呼了多年说他们是无罪的，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

那些曾防护他们的生命，力争他们的自由，证明他们的无罪（如凡宰特在一封信里所说）的欧美两洲的人在什么地方了呢？

“银元胜利了！法律胜利了！无政府失败了。”资产阶级重又叫着他们在四十年前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被害时所高叫过的这样的话句了。不错，银元能买得到一切，然而它能够买得正义么？法律能谋杀一切，然而它能够杀死全世界的良心么？正义永不会死！无政府永不会失败！萨珂与凡宰特已尽了他们的责任，现在应该轮着我们来尽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应该来证明正义永不会死，无政府也永不失败！

同志们，快乐起来罢！鼓起勇气来！不要忘记凡宰特曾坚决地告诉我们：“为无政府奋斗，毕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要是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

诀别了，我的两个勇敢的高贵的同志萨珂与凡宰特啊！我们永不能再听到你们的话了！然而你们所说过的，所做过的都还在，而且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于我，我是一个青年同志，而且凡宰特曾向我写道：“我希望我的旧经验来完成你，鼓舞你，”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写出几行来表示我的谢意以及你们的殉道所给与我的印象了！

诀别了，我们的两个高贵的同志啊！

美国同志们：“坚定你们的信仰，勇敢地前进罢！”（凡宰特语）

《到自由之路》社书记伯沙达女士在覆我的信中有几句动人的话：

你的鼓励的信接到了，然而我们不能立刻回答，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痛苦。我们失掉了两个最好的同志，对于我们确是损失太大了，因为我们之中有的和萨珂与凡宰特相识，有的像你那样和他们通过信。

我个人在最后两个礼拜内是在波士顿住着，我亲见着我们两个同志被害后的面容……我们曾参加葬礼，并且跟随着这两个反抗者的遗体，司着千万的人游行波士顿各街市。

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来回你的信。我们觉得我们同志所未完成的工作，应该由我们继续做去。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直到我们达到目的，或者志未成而身死。后一条路倒是较稳当的……

八月十二日在萨珂与凡宰特被害前的十一天，我在接到凡宰特第二次寄给我的信之后，就写了一封信与萨凡援救委员会：（波士顿）

这里我有一封信给凡宰特，但是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入他的眼帘，因为我知道他在十一天后便要被绞死在电椅上了。

亲爱的同志们，我以至诚的心感谢你们。你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两个纯洁的同志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多活了

几年，以至于今日；你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两个清白的同志如无辜得以大白于天下。然而在这七年的苦斗之后，我们会相信这两个无辜的人竟会被冤杀么？

美国人啊！华盛顿，托马·杰的子孙！你们在四十年前杀死了十九世纪中五个最好的人，现在居然敢在四十年后的今日来把二十世纪中两个最好的人杀掉么？让后人来裁判你们！……

然而萨珂与凡宰特终于被烧死在电椅上了。我在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写信给萨凡援救委员会道：

请原谅我的长久的沉默，因为在我们这两个好同志在电椅上被烧死的惨痛的日子中，我的悲哀是言语所不能形容出来的。我，我曾深知道他们是无罪的人，我曾叫道，他们不应该死，然而最后竟见着了这样残酷的时候，在其中我们的殉道者所受的痛苦是极其可怕，而且非人类感情所能了解的，“人”是时常忘恩的，他时常杀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凡寻求全人类的幸福的人总是受着人类的虐待，甚或为人类所杀。然而后代的人是会来裁判的。

我们的同志毫无遗憾地死了。可怜的是，我们不能和他们同死！我们还被遗留在这个荒凉的沙漠之上。

法律的谋杀已大功告成，然而我们的工作却正开始。因为渴血的畜生不敢担着因理想而杀我们的同志的恶名，他们便说：“这是强盗杀人犯”；但是我们深知我

们的同志是无罪的，我们便应该来向全世界证明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是因理想而被杀的。

我们不要忘却萨珂的最后的话：“不要使我们白白地死了！”要使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有两个方法：第一，继续他们所身殉的理想而奋斗；第二，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因此，便是殉道者。

所以萨珂在临死时高呼：“无政府万岁”；而凡宰特也说：“我是一个无罪的人！”

因为我是这两个同志的信徒之一，所以我愿意尽未来与你们合作。……

九 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

——巴尔托罗美·凡宰特的自叙传

一 我底青春

我的一生值不得做一部“自叙传”来叙述。我是无名者之群中的一个无名者。从那引导人类到较好的前途之思想和理想中，我不过仅仅思索，见到了一线微光而已。

我于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一日生于意大利笔叶门(Piedmont)区枯奈屋(Cuneo)省的维亚法也托(Villafalletto)村。父亲是巴提司·凡宰特(Battista Vanzetti)，母亲是焦凡娜·凡宰特(Giovanna Vanzetti)。这小城是一个农业的区域，位置在麦古拉(Magra)河的右岸上，被一带美丽的小山所环抱着。在这明媚的多阳光的地方，我依在我双亲的膝下，直到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到本地的小学校上课，我那时很爱读书。我的最早的记忆还是在学校试验时我所得的奖品，还有宗教问答一门的第二奖。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是踌躇，究竟要我继续去求学呢，还是让我去学习一门手艺。有一天他在《民众新报》上见到一段纪事，说在杜林(Turin)有四十三个律师去竞争一个

仅有月薪三十五个“利尔”(lire)的位置。这个消息便决定了我的少年时代的命运，因为它使我底父亲决意叫我去习一门手艺，做一个店商。

因此，在一九〇一年我底父亲便把我送到柯林诺(Corino)面包点心店去做学徒，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那苦辛的无休息的劳动底滋味。我一共在那里作了二十个月的工；每天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十点钟都是我的工作时间，每月只有两次三小时的休息。从枯奈屋我又到加富尔(Cavour)，在瓜特列(Geitre)的面包店里做工，共作了三年。那里的情形并不比在枯奈屋的情形好一点，不过半月一次的休息时间是五点钟。

我并不爱这种职业，不过我为了使我的底父亲安心起见，所以拼命作工，而且实在我自己也不知道选择哪一门职业好一点。在一九〇五年我又离开加富尔到杜林，希望在那个城里寻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到了杜林我才明白我底希望原是空虚的。我不得不再往前进走到古尔尼(Courgne)，在那里我作了六个月的工。于是又回到杜林，找到一个制糖果的工作。

一九〇七年我在杜林患了重病，我受着很大的痛苦，终日关闭在屋里，像“一朵悲惨的日荫花”那样，享受不到空气、太阳和快乐。然而我底患病的信息竟传到了家里，我底父亲从维亚法也托村赶来，把我带回故乡。他告诉我，到了家里，我底母亲会来看护我，我底母亲，我底贤良的母亲，我一生所最爱的母亲！

看不见一眼上帝底光荣的世界，呼吸不到一刻自由的空气，在面包店和酒楼厨房底恶臭空气里作了六年的苦工以后，

我便回到我底家庭中了。本来这六年的光阴对于那般热心向学、渴慕单纯的田园生活的青年，是一个何等美满的时节。从小孩而长成为大人的奇妙关头便是这样的年代。啊！可惜我不曾有闲暇来观察这种奇异的发展。

火车中三小时的光光，我完全在想象我那受着胸膜炎底痛苦的六年来的生活。然而就在痛苦之际，我尚能从车窗里望见那美丽的广大田野，我们底火车正从其间经过，而且我们也成了这幅想象中的图画底一部分了。意大利北部底深绿的山谷，甚至于严寒的冬季也不能使它们褪色的。这种美丽的景色，至今尚活泼地留存在我底记忆之中。

我底母亲慈祥地接待我；她又是喜又是悲，抱着我痛哭。她把我放在床上——我从来不曾梦想到世间竟有那样的双手能够如此慈祥地来抚爱我。我在那床上病倒了一个月之久，又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只能扶着一根粗的拐杖走路。最后我底健康也恢复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我赴美国的时候，我是住在我父亲底家中的。那是我一生中一个最幸福的时期。我是二十岁了。从来这二十岁是希望与幻梦的魔力最大的时期，甚至对于那些像我一样很早便尝到了人生底苦痛，翻开了生活之书底篇页的人也是如此。我交结了许多朋友，而且把那藏在我心中的爱情自由地倾了出来。我帮助父亲耕种我家里的菜园，我觉得我工作时的那种热心，是在城里时所从不曾感觉到的。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不久便被一件灾祸所扰乱了。灾祸之来本是人生所不免的，但人们所能遇着的最悲惨的灾祸也没有能够超过这个的了。

在一个悲惨的日子里，我底母亲病了。她和我底家庭以及我所受的痛苦是笔墨所不能形容出来的。偶尔一点微小的声音也能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在傍晚的时候，常常有成群结队的青年沿着大路快乐地歌颂那初见的星群，自远而近，走过我底家门；我连忙跑出去，请求他们为了爱上帝与爱他们自己的母亲的缘故，不要作声。这样的事自我底母亲病了以来，已不知有许多许多次了。更有多少次我跑出去哀求那些过路的人另走别的一条路，不要经过我底门前，恐怕他们底谈话惊动了我的母亲。母亲临死前的几星期间，她底痛苦是如此的可怕，以致我底父亲，她底亲戚以及她底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敢走近她底床边。只有我一个人终日守在她底病榻之旁，尽我底能力所能及地去安慰她。无论是昼或是夜我都守在她底身边，看见她底那种苦状，我也无异乎在受惨刑。整整有两个月，我不曾脱了衣服安静睡过。

科学没有用，爱也是没有用的。经过了三个月的可怕的重病以后，我底母亲终于在我底怀抱里死去了。她不曾听见我底哭声便死去了。这都是我，我亲手把她放进棺材，我伴着她直到她底最后安息地；我掷了最初的一把泥土在她底棺上。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在埋葬我自己底一部分。……那时所留下的空虚是从来不曾填补起的。

然而这是太厉害了。时间非但不能宽慰我底失母之悲，反而使得我底痛苦一天一天地更厉害起来。我见着我父亲底头发在短时间内变成了灰白色；我自己也变成更孤独更沉静；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几乎一言不发，终日在麦古拉河畔的树林

中徘徊。有许多次，我走过石桥，便在桥边伫立着，看下面河底的砂床中的白石，我把它们当做美妙的睡榻，在那上面我以为再不会有梦魇了。

这种绝望的心境使我决心离开意大利到美国去。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九日，我便和我底亲爱的人们分别了。在别离的时候我底悲哀是如此的大，我吻着我底亲友们，把他们抱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底父亲在他底沉痛的悲哀中，也不能说出一句话来。我底姊妹更大声地哭着，像她们从前哭母亲那样。我底远行引起了村里的人底注意，邻居们都跑进来，把我们底屋子装满了，每一个人都送了我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随着我，走了很远的路，好像有一个村民被判了终身流放罪，现在永离他底故乡了。

临行前还发生了一件动人的事，这件事现在我尚记得很清楚；在我动身前的几小时，我走去和一个老妇告别，自从我底母亲死了以后，她待我有如她自己的儿子一般。我远远地便望见她站在她底门前，她底年轻的儿媳陪伴着她。

“啊！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她这样地说，“去罢，上帝底爱会跟随着你。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儿子对于母亲所做的事能够及得上你所做的；我的儿，愿你有福。”

我们接吻着。于是那年轻的儿媳说话了。

“也和我接吻罢。我很喜欢你，你是这样的好。”她说，一面吞她底眼泪。

我又吻了她，便逃走了，我能够听见在我底后面的她们底哭声。

在两天后我离开了杜林，到边境上的莫得拉 (Modena) 城。当火车载我离开意大利边境的时候，从我底不常哭泣的眼里流下了一些泪珠来。我便这样地离开了我底故乡，成了一个漂泊的放浪者了！那许多单纯的灵魂，那许多高贵的心灵都曾是这样地长成而开花的。

二 幸福之岛

乘了两天的火车便到法国，又在海上过了七天，我终于到了“幸福之岛”了。远远的，我看见纽约在天际出现了，它底伟大，它底幸福的幻景都来到我底眼帘前。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张大了我底双眼，想把眼光穿过那站在岸上一群一群的石工，看看岸上的景物。那一群石工便立刻招呼而且恐吓那拥挤在三等舱里的男女乘客。

自我离开意大利以来这是我底第一次的惊骇。我看见那些下等舱乘客竟像牲畜一般地被官吏牵着。没有人以一句良善的话，一句鼓励的话来安慰那些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心中充满了恐怖的人。希望，它曾引诱起这般移民到新土地来，如今它又在粗暴凶恶的官吏底接触之下逐渐地消失了。那一般小孩子本来应该是充满希望而快乐的，现在反而拉着他们底母亲底衣服，惊惧地哭起来了。那种惨酷无情的空气充满了全移民营中。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上岸时我一个人站在纽约底炮台前，带着几件旧衣服，身边仅有很少的钱。前一天我还是生活在

能了解我，懂得我的话语的人群中。这一天早晨我似乎醒在一个奇异的国土上面了，我的语言在这里的居民听来，无异乎一个不通人话的牲畜底可怜的叫号。我应该到哪里去？我应该做什么？这里就是我所梦想了很久的“幸福之岛”。那高架火车辘辘地跑了过去，并不给我一个回答。汽车、电车等依旧地急驰过去，并不注意到我。

我赴美时曾抄下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地址，一个同船的伴侣把我引到了那里去。这是在近第七路的某街。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候，然而我明白那里是没有地方给我住的，因为那里和所有其他工人的住所一样，是堆满了人的。我怀着深刻的悲伤，在晚上八点钟离开了那里，去找一个安睡的地方。我于是又回到炮台了，在一个下等的客店里睡了一夜。过了三天，我上面所说的那位意大利人替我找到了一件工作。他在那俯瞰赫贞河(Hudson river)的西某街的一个富裕的俱乐部里做主要的厨师，他便叫我在他的厨房中做一个洗碗碟者。我在那里作了三个月的工。工作时间很长；我们睡眠的地方——一个屋顶小楼又热得闷人，苍蝇咬得我不能闭一次眼。差不多每晚我都想逃到公园里去睡。

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又在毛金饭店(Mouquin Restaurant)里找到一个同样的工作。这个饭店现在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那时候(距今十三年前)它的厨房确是可怕的。在那里面一扇窗户也没有。终日燃着电灯，一旦电灯因故熄灭了，房子里就完全黑暗，一举一动非撞着器具不可。在洗涤碟子、锅、刀叉、调羹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

成了水点，夹带着灰尘与污泥，慢慢地向我底头上打下来，因为我正在下面作工。在工作的时候，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余都倾在桶里，一桶一桶地；这些东西都放在厨房底旁边，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来。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沟渠。因此污水常常反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在这厨房底中央，有一个排水管。每晚那管子总是闭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于是我们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第一天作十二小时，第二天作十四小时，如此轮流下去，每隔一个星期日有五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们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子所吃的。工钱是每星期五六元左右。这样地作了八个月的工以后，我便离开了那里，因为恐怕患了肺病。

那是一个很悲惨很困难的年头。美国工人们大概都会记得的。穷人们都睡在露天里，终日在垃圾桶里翻来覆去地搜索一片白菜叶，或一个腐烂了的马铃薯。在三个月之中，我把纽约底街道走遍了，然而一件工作也寻不到。一天早晨我在觅工处遇见一个比较我更不幸更无靠的青年人。他在前一天便不曾进食了，这时还在挨饿。我带他进一个饭店去，几乎把我所有钱都拿了出来，请他吃了一餐饱饭，他狼咽虎吞般地吃完了。他吃饱后便告诉我再要是留在纽约是无用的。他说假若他有钱，他一定会到乡下去，在乡下找工作是要容易得多，而且鲜明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人人可以享受得到的，并不需要什么代价。我把我所剩余的钱拿来买了船票，我们两个人乘小火轮，当天就到了康奈克梯加特(Connecticut)底哈

特福德(Hartford)。

从哈特福德我们又走到一个小城市，我底同伴曾在那里住过，但这小城底名称，我现在却记不清了。我们沿着大路步行，后来居然鼓起勇气去敲一个乡村人家底门。一个美国的农夫把门开了。我们问有没有工作给我们做。他并不需要什么人，然而他为我们底贫穷和饥饿所感动了。他招待我们进食，然后引着我们走遍全城去觅工作。一件小的工作也不曾找得。他着实怜悯我们，虽然他本来用不着我们底帮助，但他竟肯把我们带回他底田庄去作工。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我将永远宝贵着关于那个美国农家的记忆。他是第一个肯把我们当作人一般地看待的美国人，虽然他知道我们是来自但丁(Dante)和加里波的(Garibaldi)底国土来的。

我们又继续出发，去寻找那些肯以面包和水来交换我们底劳力的人。这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以后飘流的详情细写出来了。我们从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从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从田庄走到另一个田庄。我们敲了工厂底门，又被遣走了。……“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我们真是到了“不名一钱”底地步了，饥饿又在身内嚼着我们底心脏。有一天我们找到了一个荒废的马房，可以在那里过夜，我们便以为是幸福的了。某一天早晨我们遇着很好的幸运。在南格拉司顿柏列(South Glastonbury)遇见一个从笔叶门来的意大利人，他款待我们进早餐。我们对于他的感激自然是不用说的。然而，过后我们又不得不继续着我们底乏味的路程，去找工作。在这天午后三点钟，我们到了康奈克梯加特底中城(Middle to-

wn),我们已是异常疲倦,异常饥饿,而且冒雨走了三小时,一身都湿透了。

我们遇见了第一个人,便问他是否知道有意大利北部的人在此(因为我底那个同伴是北部人,他不喜欢找南部的人)。他指点我们到附近的一所人家去。我们去敲门,出来了两个女人: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她们都是意大利南部西西利岛的人。我们要求她们允许我们在火炉旁边烘干我们的湿衣,她们立刻很和气地应允了我们,并不因什么南部北部的分别而发生歧视的。当我们在火炉旁烘衣服的时候,我们便问她们在附近地方有没有可以找到工作的机会。她们告诉我们说这里连一件小工作也没有,不如到春田(Springfield)去,那里有三家制砖厂。

这两个良善的女子看见我们的脸上的青白色和我们的身体的颤抖,便问我们是否饥饿。我们诚实地告诉她们,我们从早晨六点钟起便没有进食了。那个女儿便拿了一块小面包和一把长的刀给我们。

“我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给你们吃的了。”她说,眼中流出了诚实的泪。“我要养活我的年老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的丈夫在铁道上作工,每天所得的工资还不到美金一元三角五分,而且,不幸我又病了很久。”

我在切面包的时候,那女子又绝望地在房子里东找西翻,最后寻出了几个苹果,她一定要我们完全吃下去。我们的体力算恢复了,便别了那两个良善的女人,向制砖厂的方向走去。

我的同伴忽然问我道：“那里有烟囱的地方是什么？”

“那自然是制砖厂。让我们到那里去找一件工作来做。”

他反对说：“现在太迟了！”

我却提说道：“那么，我们就到厂主家里去。”

他又抱怨道：“不，让我们到别处去。那一类的工作一定会使你短命的。你底身体万不适宜于做那类的工作。”

这是显然的事：我的同伴找了很久的工作，都没有效果，于是连劳动的兴味也失掉了。这种心境是很平常的。在受惯了失望与侮辱，饥寒与穷苦底压迫之后，那些失业的人到后来甚至对于自身底命运也漠不关心了。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心境，它使得那些漂泊的游民永远成为不幸者之群中的最弱者。

我站在那里，尽力使我底同伴恢复他的常态，注意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想到我们刚才离开的那所人家。我底回忆使我异常苦痛。她们今晚的晚餐减去了我们先前所吞下去的面包，不知会减少到什么样的程度；然而一想到我底自身的苦况，我忘却了那个回忆。我记起昨夜的情形，那样一个寒冷的，不能睡眠的，可怕的长夜！啊，我底身体颤抖起来了。我低头看我自身，我底衣服差不多全破烂了。

今天底黑夜又到了……

三 工作！工作！工作！

我几乎用了武力才把我底漂泊的同伴拉进城去，我们两个都在那制砖厂里寻着了工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辛苦的工作。

一作之一。我底同伴实在不能忍受。在两星期内他便辞了工作走了。我一共作了十个整月。那件工作确实是我底力量所担任不起的，然而在每日工作完毕之后我却得到许多快乐。在这里有很多笔叶门、塔斯加尼(Tuscany)、威尼斯等处的侨民，这些侨民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家庭。每到了晚上，白天底污秽工作都被忘却了。我们之中有人弹一曲凡亚林或奏一下小风琴以及其他的乐器。许多人便开始跳舞，——我呢，不幸我从不知道跳舞，只得坐在旁边观看。我常常观察别人底幸福，因而自己也感到快乐了。

我们这些侨民底患病程度也是可惊的，我还记得怎样一个个地都相继患着热症。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人底牙齿在动摇的。

从那时起我底命运渐渐好起来了。我又到康奈梯加特底麦利顿(Meriden)去，在那里的石矿作工。我在石矿中共作了两年工，作的都是最辛苦的粗工，那时我和一对老夫妇同住，他们都是塔斯加尼人，我从他们那里学得那美丽的塔斯加尼语，感到很大的乐趣。

当我在春田和在麦利顿的时候，我除了学会了塔斯加尼底土语而外，还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学到了去爱而且去同情别的人，他们也和我一样预备着去求得很少的工资来维持他们底生命。我又明白了阶级意识这个名词并不是一般宣传家捏造出来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那些明白它底意思的人便不会再是劳役的畜生而做一个堂堂的人了。

我到处都交了很多的朋友，并不是我自己去找他们，也不

是出于我底自愿。也许是我在制砖厂和石矿中的同伴们从我底眼里看出了我对于他们底辛苦的命运的同情，从我底谈话里知道了我想象中的那个理想世界，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可以生活得清洁一点，快乐一点，不再过畜生般的生活了。

我底朋友们劝我仍去做一个厨师。他们说，在现社会制度中粗工人是一个最下等的畜生；我要是再做下去，既不能够维持我底生活，也会受人轻视的。一个纽约的朋友也来信劝我。因此我便到纽约去，很快地在那里的广道（Broadway）的莎瓦林饭店找到一个工作，做主要厨师底助手。在六个月或八个月内我被辞退了。在当时我不明白我被辞退的原因。我立刻又到戏园区域的第七路的一家旅馆里做和这同样的工作。但在五个月之后又被辞退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了我被辞退的原因。原来那些主要厨师是和觅工处订有条约的。凡觅工处介绍来的人，他们都要收用。他们辞退旧人的时候愈多，他们收用新来的人的机会也愈多，他们便可践他们底约了。

和我同住的那些同国人都劝我不要失望。他们鼓励我说：“你仍保持着你底职业罢。只要我们能够有房子给你住，有饭给你吃，你就不必焦心。并且你需要钱用的时候，也请立刻告诉我们。”

伟大的心灵常常是在平民中的，啊，你法利赛人啊！

五个月来我踏遍了纽约底街道，找不着一件合于我底职业的工作，甚至想做一个洗碗碟者也没有人雇用。后来我偶尔在毛伯利街的一家觅工处找到一件泥木工作。我和一群襁褓的工人被引到麻沙秋谢州春田附近树林中的一座营房里，

在那里我们开始建造起铁道来。我在那里作工，得的工资都储存起来。我在失业时候所欠的一百元美金的债都还清了，还剩余了一点。于是我便辞了这里的工作同一个伙伴到渥赛司特尔(Worcester)去。在那里附近的几个工厂我作了一年多的工。我又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至今还存留在我底记忆之中。我每记忆起他们，便起了强烈的感情和不曾改变过也永不能改变的友爱。这些人之中有几个还是美国工人。

从渥赛司特尔我又到普立毛斯(Plymouth)，这是约莫七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我被捕我不曾离开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引起了我的真挚的爱情，因为它一天一天地把许多的人拉近我底心，我底房主、同寄宿的人、在我底周围作工的人以及那些向我买鱼的妇人都成了我底亲切的友伴了。

在这里让我来告诉读者说，当我明白了在普立毛斯的友伴们对于我也表示出亲切的友情时，我是如何地感激他们。他们不仅替我辩护，捐助款项为我进行诉讼(金钱毕竟是一件很微小的东西)，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地向我表示他们相信我是无辜的。那些自愿来帮助我家辩护委员会的人，不仅是工人，还有认识我的其他各处的职员；不仅是意大利人，还有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和美国人。

我在那里作了一年以上的工，随后又在一家制绳公司作了十八个月的工。制绳公司罢工潮发生，我是罢工工人中的一个活动分子。因此我便被辞退，而且以后也找不到这同样的工作了。事实上因为我常在各种工人的集会中演说，以后差不多竟到了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的地步了。有些工场把我当

作不好的工人。然而所有曾雇用过我的厂主都不能不承认我是一个勤勉而可靠的工人，我底唯一的过失便是我异常努力想带来一线理解之光进入我底工友们底黑暗生活之中。

我也曾在这城里的散步生与杜兰特建筑公司里做过最繁重的手工作。我差不多可以说，在普立毛斯底所有公共事业中都有我底劳力底痕迹。在这城里所有的意大利人以及各工厂的工头都可以证明我在这时期的生活是异常节俭，而且又很勤勉的，在这时候我又深深地感到对于智慧方面的兴趣，我怀抱着很大的希望。这希望燃起了我底心头的烈火，甚至在现在当我在这监狱底黑暗囚室中等候那无辜而被判定的死刑底执行期之到来的时候，我还是如此活泼，如此有生气。

我底健康并不见佳。多年来的苦工和失业期中的可怕的情况渐渐地消耗了我底精力。我因此想找一件合于卫生的工作来延长我底生命。约在我被捕的八个月前，一个朋友预备回意大利去，他向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我底小车、我底刀、我底秤去做一个鱼贩，免得再去受什么工头底束缚呢？”我乘着这个机会买了他底小车等，此后就成了一个鱼贩子，这大半是因为我爱自由的缘故。

在那时候，一九一九年，思乡病来到了我底心头。我底想回家看我底亲爱的人的念头一天深似一天。我底父亲每次来信都叫我回家去，近来他底希望更热切了。我底亲爱的妹子鲁意加也来信帮助父亲劝我回去。我底事业并不好，然而我像一个负重的畜生一样拚命地劳动，一天一天过着机械般的生活，没有休息过。

圣诞节底前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在一年内卖鱼的最后一日。在这一天我是很忙的，因为意大利人依习惯在圣诞节底前夕的筵席上总要有一样鲱鱼。读者们也许还可记得一九一九年底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是奇冷的，在圣诞节后天气还是异常地冷。我推着一辆小车沿街卖鱼，这样的劳动也不能使身体变热。在圣诞节后几天我又去为披君(Mr. Peterseni)作藏冰的工作。有一天他没有工作给我做，我又去为电灯厂堆煤。藏冰的工作做完时，我便受雇于好南特君做掘沟的工作。落大雪的日子到了，我又是空闲着的人了。然而这只是几小时的事，我在几小时后又在城外去做扫雪的工作，随后又去扫除铁道旁的雪。接着又受雇于散步生建筑公司去为某羊毛公司修造水管。

这件工作完毕之后，我又陷于失业的状态中了。铁路工人罢工，断绝了水门汀底供给，因此建筑工作也不能做下去了。鱼底来源也是有限制的，当我能够得到鱼的时候，我便去贩鱼，不然我就去捕蛤；然而捕蛤的工作，利益既小，费用又大，是很不合算的。在四月里我和一个渔人订了合股的条约。这条约不曾履行，因为在五月五日我正预备召集群众大会来抗议同志萨尔塞多在警察署中被害事件的时候，我就被捕了。同我一起被捕的是我底好同志好朋友尼古拉·萨珂。

“又是一件驱逐的案子”，我们互说着。

然而这次并不是这样。全世界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凶恶的罪名，竟被加到我们底头上了。我被认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布立奇渥达(Bridgewater)的抢劫未成案的凶犯，经过

了十一大我一生所仅见的最滑稽的审讯后，我便被定罪，被判决了十五年的徒刑。判决这个刑罚的裁判官就是后来审讯南布兰垂强盗杀人案，判决我与萨珂底死刑的裁判官，威布斯脱·赛叶(Webster Thayer)。

当他判决我底死刑时，在他底声音里没有一点同情的颤动。我一面听他底话，一面惊奇为什么他竟恨我到如此地步！这果然可以说是公正的裁判官么？然而现在我想我明白了——在他底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奇怪的动物罢了，况且我又是一个简单的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激烈派。因此所有我这一方面的证人虽然都是诚实的人而且急于来说真理的，他们竟被法官嘲笑和轻视。为什么呢？他们底话语被视为谎言，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人的证据是应该被相信的，而外国人呢？……呸！

四 我底精神生活与信仰

我还想再回溯到我底过去的生涯。我已经把我底表面上的行为描写出来了。然而一个人底生涯中更深切更真实的故事，并不是在外表的情形，而在他底内心之发展，在心灵与精神。

我底从六岁到十三年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去的。我真正爱好读书。我在加布尔度过的三年之中幸而得认识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得着他底帮助，便读尽了能到我底手里的所有出版物。我底主人订了一分叶诺亚(Genoa)地方的天主教

杂志。我当时以为这是很好的幸运，因为我那时正是天主教徒。

在杜林我除了作工的同伴和年轻的店伙外，另无朋友。我底工友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讥笑我底宗教的信仰，叫我做一个伪君子和执迷者。有一天我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竟用拳头相打起来了。

在现在我对于社会主义底各派倒多少熟悉了，我才知过他们那时连这个字底意义也不不清楚。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说是对于德·阿米西司(De Amicis)底主张表同情(德君当时是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著作家)，说是根据“时”与“地”底精神来的。这种环境所给与我的影响是异常之大，不久我自己也爱起社会主义来了，虽然我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也不敢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这些人底思想底进步是有益于我，而且也使我得着很大的进步，这是应该承认的。权利平等和人道主义底原理已开始进到了我底心中。我读了德·阿米西司底《爱的教育》，后来又读他底《游记》和《朋友》。

在那屋子里有一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底书，其中有一句话至今尚留在我底心上，永不会消去的，就是：“殉道者底热血是自由底种子。”我又找到一本“Promessi Sposi”读了两遍。后来又得一本破旧的《神曲》。啊！我底牙齿是不能啃这种骨头的；然而我仍绝望地拚命想去嚼碎它，而且我也相信这不是全然无益的。

在我快要离开意大利的时候，我又从医士弗南西司(Dr.

Francis)、化学家司克利麦吉阿(Sqrimaglio)、兽医波(Bo)三人处得到了不少的知识。我已经知道人类所受的最残酷的灾害便在于愚昧与天然感情之堕落。不久,我底宗教便进了一步,不承认教堂、祭坛和形式上的祈祷,上帝对于我已不复存在了,他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一个信仰而已。我底父亲常常告诉我说要抑制人间的情欲,要安慰人类经历的苦难,宗教便是必需的。然而我觉得我有我自己底是非。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远渡了重洋。

到了美国,我受着一切的苦痛;失望便来到了我底心头,从前的幻景逐渐地消失净尽了。所有的青年人在二十的年龄,不知道生活底情形,心里充满着美妙的梦进入了异国的土地,后来都会得着这种结果的。在美国,我见到了所有生活底残酷情形以及道德败坏,罪恶横行等等,在其中人类正在绝望地奋斗着。

然而不管我底生活情形是怎样地困苦,我仍继续不断地努力使我底身心强健。在这里我研究了克鲁泡特金、高尔基、麦尔林诺(Merlino,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邵可倡、马拉铁斯达诸人底著作,我读了马克思底《资本论》和拉布里阿拉(Leon di Labriola)底著作,毕沙坚奈(Carlo Pisacane)底名著,所谓政治上的《圣约书》和马志尼底《人权论》,以及其他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在这里,我读了关于宗教的爱国的和各派社会主义的各种杂志。在这里我研究了《圣经》,列朗(Renan)底《耶稣传》和米塞尔波(Miselbo)底《耶稣是没有的》。在这里我读了希腊、罗马的历史,美国史,以及法国革命史和

意大利革命史。我研究了达尔文、斯宾塞、拉普拉斯、弗拉马利洪(Hammarion)诸人底学说。我重读但丁底《神曲》和《自由的耶路撒冷》。我重读廖帕尔地(Leopardi)底书，和著者同声一哭。我又读雨果、托尔斯太、左拉、甘杜(Cantu)诸人底小说，居斯地(Giusti)、盖利尼(Guerrini)、拉毕沙尔地(Rapisardi)与加尔杜西(Carducci)诸人底诗集。

我亲爱的读者们，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卓越的学者。我底基本学识是不完全的，我底智力又是不足的，不能融化所有这样广泛的材料。而且请你们还记着我是在经过了每日的繁重的劳动之后才开始研究，既无适当的环境，又无良好的工具。啊，我还记得有许多晚上，我伏在案头研究一卷书，只靠着那一点飘摇的煤气灯光，我一直读到天明！我把头放在枕上，并没有过了好些时候，工厂中的汽笛声叫了，我又起来到工厂或石矿里去。但是我在这样的研究之外，又加以对于人类、动物、植物，简言之即对于人类周围的一切事物之继续的，严厉的观察，我便得到我底现在的信仰生活之书，那是书中之书！所有其他的书本都不过是写来解释这本生活之书，教人怎样去读这本大书罢了。我所说的书本，自然是指那些诚实的人；至于那些骗人的书本反而只能使人误解生活之书的。

我反覆地思索、诵读、研究这本大书，其结果便决定了我的行动和主张。所谓“各人为自己，上帝为众人”的话，我是反对的。我袒护弱者、穷人、被虐待者和被压迫者们。我赞美英勇气概，我赞美牺牲，我赞美能力，只要他们是用在为正义之

战斗上的。我知道在上帝、法律、祖国底名义之下，在自由平等，在最纯洁的抽象观念，在最高尚的人道、理想底名义之下，最凶恶的罪恶已被作过了，而且也要被继续作下去的；要直到在将来光明普照了全世界的那一天，才不会有少数人再假借着什么上帝底名义来向众人作恶了。

我知道人不能蔑视那管治着他的自然律，他也不能打破那把他缚在宇宙上的结索。所谓“天然的界限”如什么山、海、河之类不过是由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的错综而成，并不是生出来划分人民的。

我底心里长起了博爱的根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以为谁加惠或伤害一个人，便是加惠或伤害全种族。我在众人底自由中去求我底自由；在众人底幸福中去求我底幸福。我相信要建设一个正当的人类社会，唯一的道德基础便是义务、权利、事实三者底平等，只有在这基础上，正当的人类社会才能建立起来。我拿我底诚实的血汗挣得来我底面包。我底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底血液，我底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我知道生活底最上目的就是幸福。而人类幸福底不变的，永久的基础即是身体健康、良心平静、生活需要之满足与一个真诚的信仰。每一个人有两个“我”：实际的我和理想的我。理想的我才是一切进步底泉源。若有人想使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相等，这是错误的。在每个人中，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间的差别永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完满或是陨落，这二我间的距离总是一样的。

我相信人们很难完全地节制自己，真正的智慧在于宽容。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

我又相信人的历史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先史时代底末期。我以为我底智慧之眼看出来天空中已布满了新纪元底光辉了。

我以为意志之自由是生活中所不可缺的。我尽我底力量想使人类精神趋向着众人底福利一方面。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在人类未能趋向完满以前，权利和特权仍会是用武力来维持着的。

在将来人与人利益之冲突，特权与阶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废除的了。在未来人类底真正历史中，进步与改革皆要用智慧与公共利益来决定的。

假若我们和我们底后代还不能走近那个目标，那么我们永远得不到真实的东西，而人类也将更为不幸，更为困苦。

我是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且只要我不曾发现我底错误，直到最后的一刻，我还会是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是社会契约之最合于人道的形式，并且我知道只有由于自由人才能自立，才能够成为高尚，成为完全。

现在在三十三岁（耶稣基督底年龄，据某一些著名研究疯狂病的人说，这又是普通犯罪者底年龄）我便被监禁而且被判了死刑了。然而假若我再能开始来走“生命底旅程”，我一定要重蹈旧时的路，并且尽力减少我底错误和过失，一方面增加我底良好的行为。

最后，我以兄弟般的心情致友爱的，热烈的祝福于我底同志们、朋友们以及所有的好人们。

附 记

“人”这个东西真是可恨的，他自己住在安乐窝中，和爱人接吻倦了的时候，拿起笔来，写几行关于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监狱中受了七年的苦刑后无罪而被烧死的两个“可怜的”工人的事，他不但会捏造出许多事实，而且还要用许多刻薄无聊的话来厚诬死者。他不去照照镜子看看他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假若他肯设身处地想象他自己也处在萨、凡那样的境地，我不知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感想。

萨、凡不是强盗，不是共产党，他们是两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他们是二十世纪中的两个最好的人。我并不是什么英雄崇拜者，然而我却深刻地爱这两个人，我觉得要在历史上找出一个和他们相像的人物，只有那神话上的耶稣，但是那些创造出耶稣的偶像，把生殖器当作神圣一般来崇拜的人却把那真正的耶稣烧死了。

要知道萨、凡案的真相，必先知道萨、凡两人的个性及其为人。他们两个的命运虽然相同，然而他们的性格是各别的。凡宰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传道者。萨珂便是一个革命家。然而这两个人都是同样地为知道他们的人所敬爱的。

我从不曾见过这两个殉道者，然而从凡宰特的“自叙传”

以及他写给许多朋友和同志的信里，从萨珂写给他的儿女以及朋友同志们的信里，从凡宰特写给我的两封长信里，我看出了我所敬爱的两个人的一切。我确实以我的全心灵爱他们，而且那一个沿街卖鱼的意大利人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甚至在他自己快被烧死的一月以前，忘却了他自身的悲惨的命运，恳切地教我去爱真理爱正义。他甚至忘了他自身的痛苦反过来安慰我，像他从前安慰过许多其他的青年那样。他的不朽的名言：“为无政府而奋斗（纵然有人说是愚蠢的举动）到底是度过生活的最美丽的方法——要是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不仅我当永记不忘，也许会未来青年的福音罢。

这便是中国人所说的“无名小卒”，也就是胡适之所赞成弗勒烧死的人。凡宰特在致我的信中曾说，“请为我致意中国人民”。然而中国人民呢？

现在是太迟了，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的判断是要来的。做祖先的杀了这两个人，做子孙的是会来崇拜这两个殉道者，会来忏悔他们祖先的罪恶。萨珂与凡宰特的精神是不会死的。那么，这本小册子的翻译倒是必要的事。而且就本书的内容说，也有翻译的价值。

美国近代著名小说家辛克拉（Upton Sinclair）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曾在“Boston Advertiser”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的文章，可作本书的序，现在一并译出。

读者在沙若（Henry D. Thoreau）的传记中该寻得出

他在美国州政府贩卖黑奴时，拒绝纳税的一段轶事罢。他因此犯了法，被囚在监狱中，有一天伊麦孙(R. Waldo Emerson)去看他，问道：“亨利，你在这里干什么？”沙若的回答是：“华多，你不在这里干什么？”

我记着这段轶事，约在一年以前我去拜访一个全世界中有最优美的精神的人，他现在是被囚禁在查理司登的“麻沙秋谢州监狱”。他并不因我不去照他那样做，便责备我；反而以他的精神的温柔和美丽，使我异常自愧，不久我自己也设法想做一个囚犯了。殉道的精神是这样广布的！

这个麻沙秋谢州的“伟大人物”是谁呢？在我的案前放着他的“自叙传”，这是新出版的，书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著者是巴尔托罗美·凡宰特！

从这部书里我知道他生于意大利，笔叶门的维亚法也托村。他是农家之子，自小便受过教育也很热心向学；然而当他的父亲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杜林四十二个律师竞争三十五个利尔一月的的位置时，他相信教育并不是像他从前所揣想的那样有用的。

因此在十三岁时，这个小孩就被放在一个面包店主人的管治之下，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七天算一个星期，然而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日，才有五小时的休息时间。在六年以后这个小孩患着重病回到了家里。在家里他看着他的母亲痛苦地病死在他的手臂里后，他便决定到我们这个“幸福之岛”来。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孤独地在炮台登了岸。后来在一个“富裕的俱乐部”的厨房里做一个洗碗碟者。那个俱乐部显然不是极富裕的，不能够(?)使那般洗碗碟者受着较合于人道的待遇，工作时间既长，睡眠的地方又热得囚人，而且还有那晚上咬得人不能睡熟的蚤虱。

所以凡宰特又离开了这里，到一家最著名的纽约城波希米人的饭店里作工。自然读者们常常到这饭店去进餐，或者还是和几位名人一同去的。假若果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定忙着和名人周旋去了，绝对不曾想到那些洗碗碟的人。听罢：

“那厨房确是可怕的，一扇窗户也没有，终日燃着电灯。一旦电灯因故熄灭了，房子里就完全黑暗，一举一动非撞着器具不可。在洗涤碟子、锅、刀叉、调羹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水点，夹带着灰尘与污泥，慢慢地向我底头上打下来，因为我正在下面作工。在工作的时候，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余都倾在桶里，一桶一桶地；这些东西都放在厨房底旁边，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来。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沟渠。因此污水常常回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在这厨房底中央，有一个排水管。每晚那管子总是闭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于是我们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了。”

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恐怕患肺病，不敢再在那饭店作工，便到乡下去。在那里农夫们和贫家妇女们都很和善地款待他，他又作了一些时候的农工和制砖工。他不

能做下去了，便又去做一个时期，后来又做石工，最后成了一个巡行卖鱼者，往来麻沙秋温州的各小城。

他未入狱时，还做过敲冰、掘沟等等工作，落雪时他又去扫雪，后来又去掘水道、捕蛤，最后便被捕了。

这个人的外面生活如是而已。这和其他无数的人的生涯相同的。这就是“穷人底简短的编年史”。然而一个人是包含着两部分的：身体与精神。穷人的精神并不就是那样简单的。

现在有印刷机了，甚至那些在面包店和酒楼厨房里每天作十三小时或十五小时的工作的人，也会找出一点时间来思索和阅读各时代的名作。

我希望我能够把凡宰特所读的书开出一张单子与读者们。这一定会使你们惊奇的。假若你是一个普通英国的商人，这也许会使你惊骇着的，因为这些名字都是外国的，而且很奇特的：德·阿米西司和圣·奥古斯丁、但丁和克鲁泡特金、高尔基和拉布里阿拉、列朗和雨果。

现在他把他的生涯底故事写出来了，我注意地阅读过了以后，我真愿意到法庭去以社会理想专家的名义做一个证人，证明与其说凡宰特犯了强盗杀人罪，不如说我自己犯了那个罪还像些。

然而，唉！这种“专家的证据”美国法庭是不肯承认的！所以我只得尽力地把《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介绍与我的读者们。

现在《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是被译成中文了。中国的名流们，请来看你们所说的该死的“无名小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

一〇 殉道者的遗书

一 萨珂、凡宰特致全体同志信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敌人决定了我们的死期，我们活着的日子已不多了。

你们大家为了想宽慰我们的苦境，减轻我们的负担，帮助我们来接受我们的命运的缘故，送了无数感人的话语来，——无穷尽的鼓励 and 爱情从你们的心里流注到了我们的心中。

对于你们这样的信，我们如何能够随时规则地答复你们呢？

我们这一封信是写与你们大家的，请你们原谅我们不能随时答复所有的来信，并且告诉你们大家说，你们都是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是已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有信来的，或是沉默着的，都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记忆着你们一直到死！

我们现在不要说死，且来说生罢。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愿你们大家勇敢罢，快乐罢！不要因失败因忧愁而灰心，而让步。

敌人能监禁、虐待、残杀我们，毁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机关，烧毁我们的书报，但他不能消灭我们的理想，不能消灭真

理和正义！

坚定你们的信仰，勇敢地前进罢！

尼古拉·萨珂 巴尔托罗美·凡宰特 一九二七年五月

二 凡宰特致市甘信

亲爱的同志：

你的信接到了，这很使我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与全体同志的信中，我要提到“沉默着的同志”呢？正因为我 know 有许多像你那样年轻的人，还有许多年老的男男女女，他们默默地和我们的感情共鸣，防护我们的生命，力争我们的自由，证明我们的无罪，辩护我们的信仰，我们一直到死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同志啊，我感谢你们大家不顾我们的时代的残酷和黑暗，竟为我们两个可怜的工人做了这许多的事，这样的事在从前一般人，只会为圣哲或帝王做的，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受着大的感动，我们的心也就宽慰了。

这毕竟证明出来人类平等的原理（这种权利是基础在人类的天性上面的，人人都应有，不分什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已为数百万的人承认而实行了。这一点更可以乐观的。

然而这也并不就是说我们的主义是命定了必胜的。不！我且和你谈谈这件事罢。人类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个人的要素和宇宙的要素，这就是说人类大抵分为二类：一是专制，一是自由。个人或为专制的暴君或为争自由的战士；至于

宇宙，我们是从那里来而且生活在其中的。在现在宇宙的要素还是要超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之上。除去宇宙的要素而论历史，那么历史可以说是完全由人意而定的。我们要它如何它便如何。像每一个现象一样，历史是“质”与“量”的结果，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便是这样想的。所以要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如何可以得到争自由时所必需的“质”与“量”的方法，我们便可以得着胜利的。不然，我们便不能得胜。在我看来，人类和历史都不是预先决定了的。“自然”给了我们以无量的宝藏，使我们能够保证生活的安全和提高；它燃起了我们心中渴望自由不能熄灭之火，而它赋予我们以如此的能力，假若这能力能够自由发展起来，其结果一定是很可惊异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衰减的文明，灭亡的民族又告诉我们的历史相反的一面。我们看：当机器和教化二者的进步使我们的生产力增加时，而工人们仍处在贫困缺乏的苦境中，而且工作愈不卫生，愈加费力；当学术及物质条件大体地提高进步时，而人民堕落的程度愈深，道德人格遂归消灭，体力亦逐渐败坏；最后看人类普通情形的两面：要不是革新我们自己而生活，便是灭亡。这些事实都是告诉我们而且向我们证明历史的另一面。这历史的消极的一面是很难明白而且更难解释的。然而就是这个，它使得许多伟大的心灵如巴尔扎克(Balzac)、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等说人类是在一个紧密的圈子里走来走去，时常走回到以前的脚步上面去的。你也许曾遇过或者将遇着更多的流氓、教徒、愚夫（要不是三者兼而有之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世界永远

是这样，而且……”青年的同志啊，不要管他们，你仍然继续前进罢！为“无政府”而奋斗（纵然有人说是愚蠢的举动），到底是度过生活的最美丽的方法——要是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

“无政府”的真意义就是在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个人、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和掠夺等等方法，来消灭这种历史的消极结果。因此“无政府”便是我们所能处理的生活的唯一方法和道路。然而这是要由人们希望的，要由人们的努力来决定，而且实现的。它自己不会自然实现。（中略）

请为我致意巴黎的一切同志，并请致意中国同志和中国人民！

不要灰心罢，且快乐起来！我以兄弟般的心情拥抱你，我想尼克①也许会写信与你；然而无论如何我在这封信里也已表示出了他的感情。我代他问候你和所有你的同志们。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三 萨珂给他的儿子但丁的最后一信

我的爱儿和同志，

我从我和你最后一次见面以来，我就常常想写这一封信寄与你，然而长久的绝食和恐怕无力写完这信的思想，又使得我几次把笔放了下来。

近来我又停止了绝食，当我刚刚这样做了之后，我便立刻

① 尼克，指萨珂。

想起你，想写信与你，可是我又明白我的精力不足，不能够一次写完这信。不过我想无论如何总得要在他们把我们再带进死囚牢之前写好这封信，因为我深信只要法庭一旦拒绝再审，他们便会把我们立刻带回死囚牢中去的。而且在星期五到星期一之间如果没有意外的事发生，那么在二十二日的中夜我们就会被烧死在电椅上了。所以现在我来给你写这封信。我的爱儿，你的父亲在这里，他以像从前那样的爱，那样的坦白诚恳的心来和你谈话，好像我们还在一处，像从前那样。

我从没有想过我们的不可分离的生活是能够被人分离开的，然而一想到这七年来的苦痛，就好像这样的事果然已经实现了，不过它确实不曾改变过我的爱情。我的爱还是一样地保存着，而且更加强烈了。我说我们说不完的相互的爱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些，不仅是多，而且还是伟大，因为你能够看见真正的兄弟般的爱不仅存在享乐中，而且还更存在受苦的奋斗中。但丁，记着这个。我们已经证明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以此自豪。

在这种长期的死刑之际我们也受够苦了。我们至今还要反抗说我们是无罪的，像我们从前反抗那样。我们永远要为了争我们的自由而反抗。

我近来之所以停止绝食，这是因为我的身体内已经没有活力了。因为我从前用绝食方法来表示反抗，也和我今天的反抗一样，所力争的是生命，不是死亡。

我停止了绝食，因为我愿意回到你的小妹妹茵乃、你的母亲和一切亲爱的朋友的怀抱中来。所以，爱儿啊，今天在我的

身体内生命开始慢慢地安静地复活起来了，然而却时时带着死之幻象和悲哀。

我亲爱的儿啊，在你的母亲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你的话之后，在我日夜地梦想着你之后，我到底见着你了，这是多末快乐的事！我居然得和你谈了许多话，像我们从前常常谈的那样。在那次的会面中我向你说的话愈多，我心里想说的话愈说不完，然而我知道你将永远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你会永远不变地孝敬你那十分爱你的母亲；我也不再絮絮地拿这样的话来搅乱你的心情了，因为我相信你将来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你不会忘记我所告诉你的一切。我知道这个，而且我还明白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话一定会使你伤心，但是不要哭，但丁，你千万不要哭，因为许多的眼泪已经浪费掉了，你的母亲整整哭了七年，却从没有得着一点好处。所以，爱儿啊，你不但不要哭，而且要强健起来，以便能安慰你的母亲。当你愿意安慰你的母亲，把她从失望与悲痛之深渊中拖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平日安慰她的方法。带着她到清静的乡下去散步，到处采摘野花，休息在浓密的树荫之下，听着溪流和谱的节奏，享受自然母亲的温柔的静寂，我相信这一定可以使她忘掉现在的苦痛，就是你会高兴。但你要记着你父亲的话：在享受幸福的时候不要只顾到你自已，你应该去帮助那些正需人援助的弱者们，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好友，他们都是我的同志，他们都是像你父亲和巴尔托罗^①那样地奋斗那样地被害的人。他

① 巴尔托罗，指凡宰特。

们和我们一样是为着替一切穷苦的工人争自由求幸福而奋斗而被害的。在这场生活的斗争中你将找到更多的爱，而且你会为人所爱的。

你母亲告诉过我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当我睡在这万恶的死囚牢中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她的叙述给了我以一个大的快乐，因为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常常梦想的那种可爱的小孩。

明天的事究竟如何，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不过如果他们会把我们杀掉了，你必定不要忘记以感激之微笑来看你父亲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如像看你的最亲爱的人一样，因为这些人爱你，恰如他们爱其他一切被迫害的同志们。我告诉你：你的父亲，——你的为你的全生命而又爱你的父亲了解他们，而且明白他们的高贵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他们为了我们的家庭所作的崇高的牺牲，因为我曾和他们一起奋斗，而且我明白他们还保持我们的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时候他们还能够把我们 from 电椅上救出来。这是为了安全与自由的缘故而起的贫富间的斗争。爱儿，这种不息的生活斗争的原因，你在将来会明白的。

当我躺在死囚牢中的时候，我听见墙外的小孩们的歌唱和柔和的声音，在那里是充满了生命与自由之快乐；而一步以外就是我们的狱墙，在墙内深深地埋葬着三个被活埋了的灵魂之苦痛。这时候我想起了你，我深深地想到你。那些小孩们的声音使我常常想起你和你的小妹妹茵乃。一想起你们，我便无时无刻不想和你们相见。然而我又觉得你们不到这死囚牢

中来倒也很好，因为你们可以免得看见那三个痛苦地躺着等候死刑的人的可怕的情形，我不知道这一幅图画对于小小的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不过我想如果你不是十分多情易感的，那么这对于你也会有好处，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可怕的印象来把二十世纪使用这种残酷的迫害和不义的死刑之奇耻大辱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但丁，他们能够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不能够毁灭我们的思想，这思想是永远存在的，而且会是未来青年的福音。

但丁，当我说三个人被活埋了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和我们同被囚在死囚牢中的还有一个名叫马德诺司的青年，他将和我们同受死刑。他已经到过这死囚牢中两次了。啊，这死囚牢，这可怕的屋子将永远为麻沙秋谢州人民的未来留下一个污点，这可怕的屋子应该用真正进步之大槌来打碎的。麻沙秋谢州的人民应该把这可怕的屋子毁掉，另外造一个学校来教养世间那些无依靠的孤儿们。

但丁，我再说一次，你要在这些惨苦的日子里爱而且扶助你的母亲和一切亲爱的人，我相信你的勇敢和好心会安慰他们的。也不要忘记多少爱我一点，因为我的但丁哟，我爱你而且常常想到你。

为我致意所有亲爱的人，为我爱而且吻你的小妹妹茵乃和你的母亲。我诚心诚意地，爱怜地拥抱你。

你的父亲，你的同志 一九二七，八，十八。

巴尔托祝你好。我想你的母亲会帮助你了解这封信的意思。要是我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也许写得清楚

一点，好一点，然而我现在已经是异常衰弱了。附及

四 萨珂寄给他的六岁女儿茵乃的信

我亲爱的茵乃：

我希望你能够懂得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我又希望我能够写得十分浅显，因为我非常渴望你能够听到而且觉得你父亲的心的跳动，我十分爱你，你是我的最亲爱的小人儿。我愿把你的小小的而且如此亲爱的信放在我的深心处，一直到我死之日。我死的时候，你的信也要和我埋在一起的。我非常爱你，爱你的哥哥但丁，爱你的神圣的亲爱的母亲。我若得和你，你的哥哥，你的母亲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话语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苦斗的生涯中的最大的宝贝和最甜蜜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看你在绿的田垄上跳荡、笑语、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那一株，又从清莹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过这样的幸福生涯，我也希望那一切贫苦的女儿们和男孩们也能够快活地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涯。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自然母亲所给予我们大家的，为的是来达到自由之享乐。然而这个垂死的旧社会中的人们却把我生生地从你的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怀里拖走了。但是，不管这一切，

你父亲的自由精神还是存在的，我为了它而得生存至今，我为了那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到人间，回到你亲爱的母亲的怀中，回到我的朋友和同志中间之梦想才得生存至今，但是我是多末不幸哟。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儿，我相信你会爱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以及一切亲爱的人；我相信你也会多少爱我一点，因为我曾爱过你，而且现在也还在爱你。然而，茵乃，你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你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幻象中，在这囚室的四角，在天空中，在我从铁窗的格子里所能看见到的一切地方上。同时为我致意所有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特别我们所爱的人们。为我爱而且吻你的哥哥和母亲。请你接受那个十分爱你而且不断地想念你的人的接吻和抚爱。

你的父亲 一九二七，八，十八。

巴尔托罗美问你们大家好。

五 凡宰特致但丁信

亲爱的但丁：

我至今还希望而且我们要奋斗到底来力争我们的生存权和自由权，然而国家、金钱和反动之一切势力都来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是争自由的战士，是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这一层我不多写，因为你现在年纪还轻，不懂得这些事情和我很愿意向你说的别的事情。

不过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会明白我们的案件，和我们所将身殉的主义。

我向你說這些話，是因為我深知道你的父親不是一個罪人，而是我一生所知道的最誠實，最勇敢的人之一。將來有一天你會懂得我現在所告訴你的話。你會明白你的父親為了他所信的眾人的自由和正義，已經把人類心靈所視為最親愛最神聖的一切完全犧牲了。那一天你就會以你的父親而自豪，而且那時候你如果是十分勇敢，你也就會參加那一場專制與自由之苦戰而填補你父親所留下的空額，你會洗刷我們的清名，洗清我們的血跡。

如果我們現在被害而死，那麼你將來長大成人懂得這悲劇的全真相的時候，你會明白在這奮鬥，忧愁，激情，痛苦的八年中你的母親對於你，對於你父親，對於我是何等地勇敢，何等地善良。

從今以後你要勇敢地善良地待你母親，待茵乃，……而且盡力去安慰她們，扶助她們。

我還希望你記起我，把我當做你父親的一個同志，一個朋友，而且我確切地告訴你：我決不是一個罪人，我也從不曾殺過人，搶過東西，不過盡力奮鬥為眾人爭自由，使罪惡不復再現於人間。

但丁，記著，如果有人說起你父親和我，與上面的話不符合時，那個人便是一個謊言者，他誣蔑了那兩個勇敢而生，無罪而死的人。但丁，你還要記著，如果你父親和我肯做違背信仰的叛徒，偽人和懦夫，我們也決不會根據那些他們假造來殺我們的證據，來判定一只癩病狗的罪，來殺一只受毒垂死的蝸子。他們可以給那一個殺母親的惡人一次再審，卻把我們

两个无罪的人要求再审的呈文几次驳斥了。

记住，但丁，永久记着：我们不是罪人；他们购买伪证来判我们的罪；他们不给我们再审；而且如果我们在受了七年三个月零十七天的说不出的苦刑之后而被杀，这是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是站在穷人这一边来反对人对于人的掠夺和压迫的缘故。

我们案件的文书，你和别的人可以蒐集而保存起来，它们会向你证明：你父亲，你母亲，茵乃，我的家庭和我都是美国的金钱政治的反动下的牺牲者。

将来有一天你会完全明白上面的话的意义。那时候你会尊敬我们。

但丁，你要永远勇敢，永远良善。我拥抱你。

六 诀别的信

——致萨凡委员会

我们的事完全绝望了，我们不得不一死了，但这并不曾减少我们对于你们的尊重与感谢。你们在这七年中对于我们和我们家庭的帮助与同情，我们实在找不出话来表示我们的感激。朋友们和同志们，现在这审判的悲剧快要完结了。你们大家要同心协力地结合起来。要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理想是不死的，而且还有你们（我们的同志们）千千万万地活着。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并未被人征服。请你宝贵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悲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激情，

来进行将来的战斗和伟大的解放罢！

在我们的悲剧的最黑暗时期中，你们大家要一心一意地结合起来。我们还保存着这一点热烈的心。为我们致谢世间的一切朋友与同志们。

我们拥抱你们大家，而且以一个充满了爱情的心来和你们大家诀别。

祝你们大家万岁，自由万岁！

你们的生死朋友

尼古拉·萨珂

巴尔托罗美·凡宰特 一九二七，八，二十一。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

——覆六一同志的一封信

(上略)我不承认暗杀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不赞同你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有特权者为义务”的语。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的意思是“在宣传的时候往往被有特权者压迫或阻碍我们的进行，我们想完成我们的革命，非把有特权者杀掉不可”。但你要知道假若我们有力量足以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把特权者推翻，用不着暗杀了。若我们没有力量，则纵使杀了一二人，流血数步，事实上新压制者又将起来，而民众仍在下面受苦，我们的进行仍不会有好的现象。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被刺杀后，继之而起的亚历山大第三对于革命党的压迫更是猛烈。这便是一个例子。并且当一个革命党，以党的全力注意到暗杀这方面，有时杀一个暴君或显宦，费了许多的精力，失败了许多次，然后才得成功。在这种时期中，因为周围形势的危急，这个党必定会把其他的事都荒废掉，而且无余力预备以后的事，纵使暗杀成功，革命党亦会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没有人再能注意到这暗杀后的计划了。亚历山大第二被刺后的俄国革命党人的行动正是如此，以致

新的专制者安然地起来继续与革命党开战。难道俄国革命党当时竟连这个也不明白么？事实上集权的暗杀只能有那样的结果。

你说：“社会革命不能即时实现，……他方面也由于有特权者把坏制度维持下去，来和他们革命者对敌。”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民众之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之不足，这使得现社会延长下去。有特权者的几个人算得什么？回事，一旦暴动一起，军队叛变，在民众的势力下，那时我们会知道有特权者是怎样的无力了，杀也可以，囚也可以，还用得着像从前那样牺牲多数人的生命和精力为孤注一掷之奋斗么？

若说宣传，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谷逊之刺杀美国大总统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之利益，反引起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柏克曼之刺杀福利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异常反对；拉瓦夏^①的举动，格拉佛极端攻击。我虽然很了解柏克曼等，但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举动于主义之宣传有多大好处。再说一句，就是暗杀是个人行动，其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无关。

许多时候以来，人们便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terrorist)当作同意义的名词，这种错误的认识对于主义的运动很有妨害。柏克曼自己曾经刺杀过资本家福利克，然而，

① 拉瓦夏：法国无政府党，有炸弹大王之称。

他在从前致中国某同志的信上说：“欧洲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了。恐怖主义者在其他的各种政党里都有：这是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与乎社会的情形之结果，但与共和党、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无关的。”中国人之易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一方面固由于我们宣传之不得力，但一方面，这也是“地底下的”国家里应有的现象。秘密运动的团体，四围都有敌人，时时都在危险之中，这种变态的生活会使得这团体的分子趋向于恐怖主义。所以这恐怖主义者在“地底下的”俄国特别发达。现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也有不少自称恐怖主义者的。

恐怖主义是什么？这并不是很难解释的。照恐怖主义本身来说，这恐怖是指报复政府白色恐怖的赤色恐怖（革命党的恐怖，与现在所谓赤色恐怖不同）。那么，恐怖主义就是报复主义，亦即所谓“一命报一命”的主义是也。著名俄国虚无党人司特普尼克在刺杀了麦孙采夫将军后（一八七八）曾刊行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一命报一命》（A life for a life）。马沙里克说：“这题目就是恐怖主义者革命的伦理学说”。司特普尼克的意思，现在政府的军警如何厉害地用武力来压迫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们，并且杀害他们，那么对于那一群匪徒谁都有权利来以武力保护自己了。他这“一命报一命”的主张，即是有特权者杀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那杀人者杀掉；这全是防卫的报复的性质。一八八〇年民意社员加可屋斯基因暗杀运动被捕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曾宣言：“我们采用这手段（指恐怖主义）是为着保护我们团员的缘故，并非想以此实现我们

的目的。”一九〇二年巴尔马雪夫因暗杀内务大臣西皮雅金被处死刑。在受审时，他说他的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他宣言：“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一九〇六年，沙恭诺夫刺杀了蒲烈夫后，在监狱中写给他的父母的信说：“我杀了人，手上染满了血。然而这是由可怕的斗争与受苦所致，这是由于见着生活之可悲的实际情形所致。……”这便是恐怖主义的“一命报一命”学说的实行。阿尔金在《俄国革命之灵魂》里解说得很好：“他们是受着内心的驱使的。这样暗杀工作是由于道德情感的兴奋，使他們不忍见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为而不立刻起来报复。”在这里，没有义务的观念，理智没有活动的余地，感情完全占着上风，报复的行动都是如此的。再举事实来证明：麦孙采夫之被司特普尼克刺杀，是因为他劝“沙皇”对于“一九三人案件”施以加倍的刑罚。彼得堡警察总监因虐待犯人布哥路博夫，使被沙苏丽奇枪击。汤播弗省总督残害农民，即被玛利亚·司披多诺华刺杀。哈尔可夫总督克鲁巴金因同情狱吏虐待犯人，也被人暗杀。这样的事很多，现在也不能多举。这许多次的暗杀都含有报复和自卫的性质。这“报复”和“自卫”便是俄国恐怖主义的两要点。只要有政治的自由之国家内，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的实行便是不必需的了。所以一八八一年美国总统加非尔德被刺杀后，俄国民意社执行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宣言，攻击暗杀者，说“在人民能自由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见不仅造成法律，而且会使司法的人施诸实行时，在这样的国家内，政治的暗杀无异表示一种专制的趋势，这与我们要在俄国内所破

坏的专制正相同……”。

这可见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二而非一了。无政府主义者中也许有恐怖主义者，但这两种主义的本身没有多大的关联。有许多同志要用暗杀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或以为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只是暗杀，这在我看来是不合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对于无政府主义，对于民众并无好处。要实现无政府主义，除了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外，并无其他的路可走。

那样，我便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暗杀么？不，不然。就恐怖主义的本身来说，它也有它的价值，我不能否认。

恐怖主义的要点在“自卫”与“报复”。“自卫”是撤戒以后政府的行动；“报复”是报过去的仇。这在“地底下的”组织里是需要的，但在公开活动的公开组织，这便不必需了。所以被动的自卫的主义的复仇已不适用，在西欧国家内的暗杀事件，这恐怖主义的范围已扩大，而且不纯粹是被动的了。一九〇一年美国大总统麦坚尼被梭谷逊刺杀后，美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把一八四八年海岑写的一篇文章《以死报死》掲載出来。这“以死报死”使得司特普尼克“一命报一命”的学说更广大了一点。这意思是我把你杀了，我自己也把我的生命来报偿，即“我杀你，人杀我”，与“你杀人，我杀你”的“一命报一命”已不同了。这离开了“自卫”与“报复”，所以没有以前的那样简单；其实这也不是仅由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智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我们的毁誉都生不出效果的。因此对于那些鼓吹恐

的痛苦来报偿。所以阿尔志巴绥夫的《朝影》中的奈司拉莫夫就明白地说：“我爱那阳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那青春，以及一切自然母亲所给我们的和平与欢乐。我实在不愿意杀人。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究竟去杀人，去就死了，因为“我自己爱人生过烈，所以看不得别人来把它破坏”。同样，像《灰色马》中佛尼埃在死囚牢里所写的“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狱中记《死之忏悔》也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

古田是一个纯真多感的青年，他有那爱他的父亲，他有那爱他的妹妹，他有那爱他的朋友；他对于他们的爱情也是极其深刻，甚至于一只猫一只狗，他也时常想念。这真是一个无所不爱的人！对于他的父亲，七月二日（临刑前一百余日）的日记上他写着：“父亲的信来了。……文中有‘父和同胞会永远把你抱在胸中的’的话，我读的时候，不觉落泪了。”对于他的妹妹呢，七月二十日午后六点钟他在日记上写着：“妹妹们！睡了罢。”只这两段短短的话便是表示出他们的爱情，是血是泪，我真不忍重读了。对于他的朋友们呢，在他的许多好友中我只举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殉道的中滨铁来。中滨铁也因同样的事件在绞首台上牺牲了生命。古田先中滨铁六月死。中滨铁的弔古田的那首长诗在他的个人创作集《黑面包》上发表。我且举出很短的两段，便可表示出他们俩的友情。

我的眼中闪着灼灼的光辉，
我的心里却结了很厚的冰层；
露么，一滴都没有了。

同志哟！

在这心已干枯了的时候，
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京城之夜——三月，
从北面山袭来的，
烈风一般，严酷的余寒，
尚不能冻灭我们的强烈的火焰；
两人的握手啊，火似地在黑暗中烧燃。
噫，生离么？还是死别！

这友情不真是到了“你的‘是’便是我的‘是’，我的‘否’也就是你的‘否’。”（见中滨铁诗）的程度么？然而这一切——父亲的爱，妹妹的爱，朋友的爱，他都牺牲了。“为了真实的缘故只得不顾亲之泪与肉身之血，而做下去了。……父哟，请给有理解的爱与你的儿子！”这真是血泪中迸出来的呼声了。

他的最后是这样的：“他带着一只狗（名太郎）和一只猫（名“克鲁”，纪念克鲁泡特金的意思）的照片，以及他的妹妹寄他的一片枯叶上了绞首台。那狗、猫都是他生前所爱的。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绞首台上他仍怀着慈爱的心呢。”这样的死比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毒药、还要光荣得多。这才真正是为爱之故而死呢！

他的父亲说：“厚于人情连猫犬也爱纯美的心，这时如何了。”这应该去问现社会，和同时代生存着的人们。极端的爱

而不得不用恐怖主义表现出来，自己无所不爱，而不得不抛弃所爱的一切，杀身成仁，来为将来的人，谋普遍时受的生活。这种人固是有伟大人心之至人，而使得他去这样做的现社会却是应该如何诅咒的了。他的手枪他的炸弹不是钢铁和炸药，而是自己的血和泪以及无数平民的血和泪造成的。

同样，沙恭诺夫在一九〇六年给他的父母的信中便明白写出：“我做了世界上所有事件中的最可怕的一件了。我杀了两个人，把我的双手染满了腥血。然而这由于可怕的争斗与人民的受苦，这由于见着那可悲的生活实际，我才来拿起宝刀。然而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先下手的人。……请试试了解我并宽恕我罢。让人民批评我及我们的同志（那些被处死刑的以及现在活着的）像我的辩护士批评我一样。他说：‘这个人所掷的炸弹并不是装满了炸药的东西，而是满载着全体平民的眼泪和痛苦的炸弹。向他们的治人者掷炸弹，平民希望这至少可以消散他们胸中的可怕的梦魇’……”

这满载着眼泪和痛苦的炸弹谁能抵抗，谁又能说掷这炸弹的人是暴徒。这样的人，他自己甘愿受尽无穷的苦痛，牺牲他个人的幸福的生活，来为将来的人建立爱的世界，虽然他的炸弹未必就能有益于爱的世界的建立，然而这种崇高的人格，血和泪结晶的心情，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人间最优美的。这样的人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世间最优美的人，而他们竟不能把他们的精力应用在建设事业上，在青年时代（大都二十岁左右）便在断头台上送掉了性命。这种社会还不应该改造么？

这样，近代的恐怖主义已较从前的范围大了许多。除了

“自卫”与“报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破坏”。这“破坏”的出发点便是一个“爱”字，——爱而不能得适当表现的爱。因为不能为人们建设爱的世界，故只得来破坏这恨的世界的一丝一毫。这虽然范围较广大了，但仍是取社会中的种种罪恶造成的。这与无政府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这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则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与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我们鼓吹也好，反对也好，这毫不会有影响的。

我不反对恐怖主义，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但我却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下略）

俄罗斯十女杰

《俄罗斯少女杰》，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署李蒂甘著。

绪 言

我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党人中选出十个代表的人物，写了十篇评传，又把司特普尼克底《地下的俄罗斯》书中的《圣彼得堡旅行记》一章节译出来，附在后面，①编成了这一部书。

现在我两个多月来的心血和眼泪结晶的这部书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了。我说这是我两个多月来的心血和眼泪底结晶，并不含有一点夸张的意味。我确实是一面流着泪，一面来写这书的。在我尚未以这部书来感动读者之先，我自己就被感动了。英国蒲列路克在他底《俄罗斯之英雄与女杰》中曾叙述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名叫薇娜的十五岁的英国少女来访他，他把他所搜集的俄国革命党人底照片册拿给她看，并把各人底生平行事告诉了她。小小的薇娜一面听着解释，一面看着照片，看完后默默地掩了照片册，后来红着脸说：“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大家都一定觉得自己是何等地渺小呵！”我自己也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写这书的。所以我流下来的眼泪是感动之泪，也是惭愧之泪，忏悔之泪。

我不是一个“英雄崇拜者”，虽然我在本书里也常用“女

① 现附于本书第四章后。

杰”这个名词。我之所以只替这十个“女杰”作传，并不是因为我以为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党人中，只有这十个人才是不朽的，只有这十个人对于革命运动才尽大力的；反之，我却认为那无数无名的死于贫困，死于监狱，死于流放地，死于非命的少女与这十个人在革命史上是同样不朽的，有同样的重要。我写这十个人，是拿她们来做一种（或可说十种）典型，从这十个人底生涯与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无数的姊妹们底面影来。我敬爱这十个“女杰”，但我也同样地敬爱那无数无名的“女杰”！

俄国文豪屠格纳夫在临死前数月写了 he 最后的一首散文诗，标题是：《在门槛上》。

我看见一所很大的建筑。它底正面开着一扇窄小的门。门内是浓密的黑暗。在门槛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俄国的青年姑娘。黑暗里送出了一股股的冷气，一阵阵的雪风又带出来屋中人底沉闷的言语。

“啊，你愿意踏进这门槛来，你可曾知道在里面等着你的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是姑娘底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我预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这痛苦，这打击，是不仅来自敌人，而且还来自父母

和亲友！”

“就是来自他们，也不要紧。”

“好，你预备好来牺牲，你将灭亡，而且没有人来纪念你。”

“我不需要人认识，我不需要人尊敬。我也不需要荣名。”

“你还预备好了去犯罪？”

年轻姑娘低着头，说：“是，就是犯罪我也预备去。”

里面的人声沉默了，最后又问道：“你知道，你将来会失掉你现在相信的信仰；你会明白你犯了错误，而且白白地耗费了你底青春么？”

“那我也知道。”

“进来。”

姑娘踏进了门槛，一重厚的门帘立刻放了下来。

“一个蠢物！”有人在诅骂。

“一位圣人，”另一个声音这样地回答。

屠格纳夫所描写的不是仅仅一两个的女杰，而是全俄罗斯几代的革命女青年。屠格纳夫不仅描写了他当时的俄国女革命党人，而且也描写了在他底时代以前和以后的俄国女郎。

不错，从十二月党暴动失败以来，我们就可找出这种典型的女子了。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党人大批地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都是些亲王和贵爵，然而他们底妻子都肯以金枝玉叶之身抛弃了荣华富贵，跟着囚徒们去到冰天雪地，

安慰她们底为高贵的理想而受苦的丈夫。赫尔岑在他底名著《回忆录》中赞美这样的女子道：“这些流放人底妻子们失掉了她们底公民权，抛弃了她们的尊荣富贵，甘愿在那西伯利亚东部底可怕的气候之下，在那警察底压迫更要严厉的情形之中度过她们底一生。至于囚人底姊妹们，她们是没有权利跟着她们底弟兄到西伯利亚去的，她们大半便离开俄国，每人底心中都深埋着对于那些流放人的爱情。然而说到男子们呢，他们是没有这种爱情的，他们底心里充满了恐怖，恐怖心征服了爱之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提起那些不幸的流放人底姓名来。”他又说：“除了女子而外，没有一个人敢下对他底不幸的亲友们表同情、说几句辩护或安慰的话语。然而在那些人晚间被警察捉去之前，他昨天还明明和他们握过手的。……只有妇女们不曾像这样无耻地抛弃掉自己底亲近而笃爱的人。”诗人奈克拉索夫在他底名诗《俄罗斯妇女》中也曾以动人的笔调描画出那般到西伯利亚去寻找丈夫的十二月党人底妻子之高贵的面影来，最后一节写福尔恭斯基亲王夫妇在西伯利亚矿坑中相会的情形，真使人万分感动。

十二月党人底妻子之后，过了一个长久的时期，一代的新女性又出现了。我现在从我底《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七章中引出下面的一段话：

旧虚无主义^①底第二战是对于家庭与一切传统习

① 旧虚无主义即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哲学的和文学的运动，在农奴解放后的十年间即六十年代中最为发达。

俗的，其结果也获胜了。许多青年男女被唤醒起来，脱离了家庭去求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知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妇女解放问题也解决了。虚无主义的妇女不仅要恋爱自由之权利，而且也还要追求自由之本身。所以她们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之开放。“赖着热烈的妇女们之努力，战争终于奏凯。最后的胜利仍归于妇女，便是最野蛮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司特普尼克这样告诉我们。然而为了这个成功，妇女们也作了很大的牺牲，因失败于专制的家庭而自杀的女郎为数也不少呢！

毕沙列夫所讥笑的“千金小姐”，现在渐渐地减少了。许多女郎读了毕沙列夫底小说后，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我决不愿做那种可怜的‘千金小姐’。我要征服知识，我要思想；我要为我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前途。”然而俄国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当时是不收女生的。因此无数不甘困处在无知状态中的青年妇女，为了要追求知识的缘故，便不得不离开自己底家因而远适异邦。在她们看来，瑞士是自由之国土。它底学校对任何人都不会施以闭门羹的。从此这山明水秀之乡便成了这一群历尽千辛万难从冰天雪地中出来的“进香女郎”底天国。瑞士名城苏黎世便成了她们底圣地。这风气遍于全俄。在平静的凡尔加一带的平原，在高加索，在辽远的西伯利亚，在其他各处，都有无数十六岁上下的少女，带了单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费，只身跑到未知的国土去，为的是一心一意去求得那能够保证她们所渴望的自由之知识来——而留在俄国

的虚无主义的妇女也抛弃了锦衣玉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绒衣服，剪了头发，挂上眼镜，这种装束竟成了一种风气。这些女子常离开她们底丈夫和家庭，不愿过无恋爱的结婚生活。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

妇女们打破家庭羁绊时所用的武器有下列几种：第一是“力争”和“要求”，如果专制的父亲不允许她们求学，她们便采用“逃走”或“假婚”的办法，如果没有使用这种办法的机会，则实行自杀。有了这样大的牺牲，无怪乎俄国妇女会“大获全胜”了。

然而得到了知识后又怎么办呢？司特普尼克叙述道：“这一般女郎自问：‘我们要求的知识是什么？难道那仅仅是要在特权阶级中求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之工具么？我们已经是特权阶级中人了。除了我们自身而外，还有谁能享得此种利益呢？假若只有我们独享着这种利益，那么我们又和那般靠着贫困的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么分别呢？’……”

于是她们除了研究医学之外，还去参加“第一国际”底集会，研究近代社会主义，诵读蒲鲁东、巴枯宁、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苏黎世便由研究学问的名都，而变成了社会主义之永久的俱乐部了。一八七三年俄政府下了糊涂的“诏书”，命令留学瑞士的男女青年全体立即回俄，于是一八七三——七五年“到民间去”的大运动发生了。

“许多富有资财的贵族少女竟跑到厂中作苦工，做一个普通的工女，如苏波丁姊妹、路巴妥维奇、包婷娜等，这类人从

前在贵族的舞会中大都是最时髦的美人。她们居然舍弃了一切，‘到民间去’，为的什么，为的是救济人民！为的是教导人民！”狄可密若夫在他底名著《政治的和社会的俄罗斯》中曾如此告诉我们。

同时在妃格念尔、苏菲亚、松尼亚等人中，我们又找出了到乡村里做医生、做看护、做教员的女子；在加塞林等人中我们又看出游历传道，靠自己底手艺而生活的女郎。

这类牺牲——已来救济人民的高贵的少女底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们且读俄国诗人波龙斯基献给包婷娜的一首诗：

她是我底什么？不是妻子，也不是我底情人，
她更也不是我底爱女，或孙女。
那么，为什么这个痛苦的幻象要使我夜闻睡不安宁？
为什么每夜每夜都有这不断的可怕的梦境？

她还是在那富有生机的青春，
就被囚在这无空气的窄小囚室里做一个囚人；
她静悄悄地躺在那铁石般冷硬的床上，度过这潮湿
的黄昏，
她不在思想，不在流泪，眼里只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啊，黄澄澄，快垂散在地上的，她底长发如云，
她默默无言地把她底嘴唇深深闭紧；
她底瘦弱的双手放在那瘦弱的胸膛之上，
她无力地压着那没有了前途的希望而人不会哀哭的

一颗心。……

我们再读司特普尼克底名著《沙皇治下之俄罗斯》中所引证的一封信：

……第五个囚人是奈伯德瓦，她底死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五日）被减轻为终身惩役。然而监禁不论长期也好，短期也好，对于她早已失掉了恐怖。她底敌人所能给与她的恩典便是使她爽快地立刻死去！她底肺病已到了末期，咳嗽甚剧。她又患着厉害的坏血病，牙齿几乎完全落了，肉也失去了，只剩下骸骨。她看起来倒和一具骷髅差不多，不过还包着一层像羊皮纸似的皮肤。只有她底一对发光的黑眼睛还有生气。第六个囚人是雅基莫瓦^①，怀抱着一个十八个月的孩子，这是她在除伯次查半月堡中生下的。便是最无情的人也不忍看那个不动的可怜的孩子。看起来似乎每一刻都是他底最后时间。至于雅基莫瓦，她并不像曾受过多大的苦，身心两方面都似乎很好。虽然终身苦役在等着她，她也是十分镇静，十分坚强。

这是那些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宣传运动的女子底命运，而那些未具有革命之信仰的女子呢？我们再来看罢！

狄可米若夫曾说：“根据统计，每年总有二千多个女子自愿跟随她们底被流放的丈夫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跟随他们去作苦工。其中有一个曾向她底至爱的罪人说：

^① 奈伯德瓦与雅基莫瓦二人都是民意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本书第四第五篇中曾提到过她们。

‘全世界都弃绝了你，
你底灵魂因此而变成了幽暗。

全世界都弃绝了你，

然而我，我决不，我是决不离开你的……’……”

但是如果她们底丈夫是被囚在著名的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或彼得保罗垒内又怎么办呢？司特普尼克底《沙皇治下之俄罗斯》便说：“囚人底亲友们居然能够感动天地使他得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先着手于这种企图的自然是他们底父母，（特别是母亲，在这种事业中最有成功之希望的便是她。）如果父母是穷人，便由他底同志们集款使他们能够到圣彼得堡去，如果父母不知道这样做，而且在官场中没有熟人，那么同志们就教他们，劝他们去哀求那素来比较有一点好心的官吏，他也许会答应他们底哀求，为他们底儿子设法的。他们也去找某一些有仁慈心肠的女子，她们在官场中暗暗地有很大的势力，她们也常常帮助一个不幸的囚人。

“母亲之下，最好的营救者便是妻子，她底企图也是很有成功之望的，如果囚人没有妻子（政治犯大都是青年未娶者），这职务便由他底情人来代替。情人是决不会缺乏的。假若一个囚人没有父母，又没有兄弟姊妹，也没有一个更亲爱的来看他，想他，营救他，他底朋友们便立刻替他找到一个‘未婚妻’。在这种情形中很少有青年女郎会不肯担任这种又劳苦又危险的做情人之职务（因为一旦承认和囚人有关系，就会被警察疑为多少同情于革命党人与革命思想，因此引起警察底注意，后来便有危险的结局）。如果囚人底罪名较轻，下级狱吏（这种

情形中权是在他底手里)看不出这一对假情人底破绽,他便允许这临时的未婚妻去会她底假定的情人,给他送书去,有时候还可以送一瓶酒。她一个人或者再伴着母亲去哀求当局减轻他底刑罚,或者把他移到较好的监狱或放逐地。……”

在“一九三九人案”中,有一部分被牵连在内的人被释放的时候,俄国的女子又表现了一次她们底高贵的感情。这是在夜里,很早便有一大群富家女子(因为只有她们才先得着消息)在监狱门前等着囚人之出狱。最后一群政治犯出来了,站在门前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他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从前的朋友已经分别了三年,现在连住处也不知道了。“先生们,你们中有人需要住处么?”说话的人是一位坐在自己底马车中的漂亮的太太。这种对于受苦之同情心真使人感泣!

我们再看俄罗斯母亲底心:一个青年政治犯底母亲看见了她底爱儿受苦后,便在一群检察官面前叫道:“在这一点钟以前我还爱沙皇,我还尊敬沙皇,但现在我却恨他,轻视他了。”在佐治·克伦底名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中,他曾描写一个疯狂的政治犯和他底母亲会面之悲惨的情形,使人不忍重读。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底《回忆录》中也说:“我们过K地时一个学生底老母远道来看她底爱儿,押送的军官不许儿子和她接吻。她只看见他一眼,宪兵就把他驱回车里,马车慢慢走了。我走过时看见她底白发憔悴的老脸。过后她便倒在路旁。”这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全世界中母亲底心固然都是一样的,然而“母亲底心是记不起任何悲哀的”,妃格念尔底母亲在病榻上写给她底在监狱中的女儿信中的这一句话,可

以使得俄罗斯母亲底心高出于全世界母亲底心之上而明照万古了。

罗曼·罗兰在他底名剧《爱与死之激斗》中曾有一句很使人感动的話：“为了使得所爱的人幸福，这不算是自己牺牲。”我想真正能懂得这句话的，只有俄国女子。她们是无时无地不甘愿牺牲自己以谋她们所爱之人之幸福的。我们且看独意奇在他底《西伯利亚之十六年》中所告诉我们的加拉监狱之悲剧。

一八八九年有一天加拉总督忽然去参观监狱，他走过一个女政治犯科瓦尔斯加亚底面前，她坐在一个凳子上，并不站起来，总督便叱骂她。科瓦尔斯加亚依然端坐不动，冷淡地回答道：“我并不会选举你出来居高位。”总督勃然大怒，下令把科瓦尔斯加亚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中央监狱里。

在这一天的中夜，全监狱的人都睡熟了，这时候典狱长带了狱卒冲进科瓦尔斯加亚底囚室，从床上把她拖下来，拖出囚室押送到另一个监狱去了。她底叫声惊动了她底女同志们，第二天全狱的女政治犯议决举行同盟绝食，反抗狱吏底暴行。

典狱长慌忙起来了，因为饿死一监狱的女政治犯，在俄国会引起大风潮的。他便设法和她们讲和，她们一定要他呈请上司把他调到别的监狱去，他也答应了，于是女政治犯们便开始进食，但约定典狱长若不更换，她们还要再举行同盟绝食。

她们给典狱长指定的调期已满，而典狱长依然恋栈不舍。于是她们又开始绝食，同时在十二里外的男监狱里的政治犯

也实行绝食来帮助她们。典狱长又着忙了，在第二天他便和绝食者说，他已经接到了调迁的命令，不久就要离开加拉监狱了。听了这个好消息，第八天她们又进食了。然而典狱长依然不走，女政治犯又预备举行第三次绝食。

这时候，一个女政治犯西基达夫人看见这情形，知道典狱长是安心不走的，然而她底同志们又非绝食不可。她思索了许久，决心牺牲自己一人底生命来救同志们。旧俄监狱例规，凡狱囚侮辱官长就该被判处死刑，而被侮辱之官长也当立刻调迁他处。西基达夫人便要求和典狱长谈话，她当着宪兵与狱吏们之前打了典狱长一个耳光，说：“这是对于你做典狱长之报酬！”

这天过后，她们又开始第三次绝食了。一连过了十六天，她们不曾进过一点饮食。最后高级官吏出来调停，答应把她们迁移到另一个监狱去，而典狱长仍留在这里。女政治犯们第三次终止了同盟绝食。

刚刚把秩序恢复之后，总督忽然来了一个命令，说以后政治犯如有犯规之事，应以笞刑处罚。西基达夫人就做了笞刑之第一个牺牲者。她在绝食了十六日之后，身体尚未恢复原状，便受了笞刑。典狱长算报了一耳光之仇，而那个为同志舍身的青年女子西基达夫人在笞刑之后就立刻死了。于是女政治犯们便决定举行同盟自杀，以一死来报答她们底高贵的同志，科瓦列夫斯基、加留席拉亚、司米尼次加亚三人服毒自杀，差不多在同时绝命。

男监狱中的政治犯得着这个消息，也发起一个同盟自杀，

以酬他们底女同志们，参加者共十七人。独意奇写道：

我并未服毒，然而在这普遍的自杀开始后倒觉得自杀是比较旁观还容易些。……

然而我们底同志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他们用的鸦片烟太坏不能致命；不幸的人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感到很大的痛苦。但这次失败并不曾减少他们底决心。只有三个人放弃了自杀计划；其余的人决定又吞食吗啡。

第二晚诀别之后景象又重演了。……吗啡也不行。吞食了吗啡的人虽然病得很厉害，然而还可时时恢复知觉。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各吞食了三倍之多，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在夜间波波何夫还醒了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底喉鸣，他想唤醒他；抱着他，在他底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他底朋友决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食下去，睡在加留席利底身旁，永远闭着眼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狱吏来时，这两个人已经快死了。加留席利这晚上绝命，波波何夫直到第三天早晨才气绝，死尸移往墓地，葬在那四个殉道的女杰底墓旁！

俄国革命运动由和平的宣传而进于恐怖主义的暗杀和暴动。这时候俄国妇女又带了她底绝大的贡献于革命之祭坛。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曾引司特普尼克批评苏菲亚的话道：“……她在我们底阵营中过了十一年，她经历过了不少绝大的损失，全盘的失败，但她却永不困倦地准备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

把她底心里的神圣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是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鼓舞人间的天使。在她底武装的甲冑之下，仍有一个女性底优美的心在鼓动着。我们应该承认女人是比男子更赋得这种神火的。俄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热心，大半应归功于她们；只要她们加入革命运动中，革命运动便是难克服的了。”

沙苏丽奇底一枪唤醒了一代的革命青年，苏菲亚是一个最伟大的“弑君者”，也是第一个死于断头台上的俄国女子。此后数十年间舍身为同胞复仇雪恨的“天女”更是屡见不鲜，如一八八三年古地查斯加亚为加拉政治犯复仇，刺杀赤塔总督伊利雪维奇（她放枪时口称“这是对于五月十一日事件之回答”），以及二十世纪初十年代碧陈科之刺杀沙拉托夫总督沙科洛夫；爱热斯基之刺杀莫西列夫总督；席科尼克之刺杀切利哥夫总督；伊热麦洛维奇之刺杀明斯克总督；司皮利多诺华之刺杀谭波夫总督；齐奈达之刺杀冈将军；拉哥秦诺科瓦之刺杀莫斯科惩戒所所长等。爱热斯基被判处十三年半的惩戒罪；古地查斯加亚、碧陈科、席科尼克、伊热麦洛维奇、司皮利多诺华五人皆被判处死刑，后减为终身惩戒；齐奈达与拉哥秦诺科瓦被处绞刑。又如两个青年女子因为预备刺杀军事法庭底法官，事未行而被捕，也被绞死了。这两个女子是玛吗爱瓦与斐利波瓦。另外加美叶夫夫人与威奈狄多瓦女士预备去炸毁一个军事法庭，为同党亚柴夫（著名的奸细）出卖，被捕于克龙士达脱，两个人都被处死刑。威奈狄多瓦是一个出名的美人，当时且怀有孕，然而也得不着赦免，终于和她底同志死在枪弹

下了。

拉哥泰诺科瓦在上绞刑台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她底母亲和家人道：

妈妈，婆婆^①，我亲爱的，我至爱的，把你们底手信给我，我愿意紧紧地握着它们。你们应该觉得你们底安娜是在你们底身边，在你们底心里，你们应该完全快乐，完全放心。……妈妈！婆婆！我底“白发老人”哟，原谅我，原谅我使你们受到一切的痛苦！我十分爱你们，我无时不愿意使你们有一个快活的与美丽的生活。……然而我却先给你们带来了悲哀与痛苦……不过你们该知道这也并非我底本意啊！……

我至爱的，我底好人！你们一想到（然而这不是一个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你们底安娜杀了一个人，你们一定会骇坏的，凡人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会觉得他底心灵中生出了一一种宽舒与博爱之感情……然而这里却不是如此！这不是一个“人”！这是杀人害命的器械之一部分罢了！

我们愈毁掉这些器械，那么全部机器之毁灭也愈速，或者至少机器之动作会因此而缓慢的。……妈妈，我亲爱的！而且你，婆婆哟！你们是有好心肠的，你们说：难道那般冷眼看着人们被拷打，被杀，甚至他也听了别人底命

① 婆婆：即祖母。

令来这样做的人，这种人配叫做“人”么？那么，告诉我，这种人应该被叫做什么呢？我，我说这是一个野兽，这个野兽和其他的野兽一样都是应该杀灭的。既然应该把它杀掉，那么我便到那里去，杀了它。……

告诉我，我底“白发老人”哟，我是值得你们来哭的么？我纵然不死，我也不能够给你们带来幸福了，——虽然我是何等热烈地愿意啊！至于我，且看我底双眼，它们充满了如许多的光辉！它们是何等地快乐。那么我们微笑罢，我们抱吻罢，原谅你们底受娜！她很爱你们，不过因为她又爱一切的人，她便为他们而牺牲她自己了。

这种“崇高的灵魂与多情的关丽”居然使得像法国狄吕孟那样的反动派大为感动，而不得不发出深深的赞美了！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起来了，二月革命之后又继之以十月革命。在这个时期中，俄国妇女确实享受到了一种自由之幸福。十万个西伯利亚流放人居然被革命救了出来。“本为自由来，今同它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这十万人中自然有不少的革命女子，其中如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基）、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亚历山德娜（伊热麦洛维奇）等都受着民众之热烈的欢迎。

然而后来布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决裂，毅然决然地实行一党专政后，俄国女革命党人又遭厄运了。前年（一九二六年）高德曼寄了我一张在赤俄流放地和监狱中的著名女革命党人姓名表，内共有七十九人：社会民主党三十五人；无政府党

二十人；社会革命党右派十六人；社会革命党左派八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子。可见至今俄国女子底殉道事业还未终止呢！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屠格纳夫底名句至今还鲜明的在人们底心中，过去的俄国少女是不朽的了，因为她们在这一切之前，丝毫也不战抖，她们昂然地踏进那门槛里去了。现在呢，今日之俄国少女也怀着她底姊姊所有过的同样的心情昂然地站“在门槛上”了。她们曾有过一点迟疑或悔恨么？没有！这一点，我们且读下面的一首诗便知道了。

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中的一个被告患着厉害的肺病又受着监狱中的种种痛苦，病死了。病死之前寄了一首散文诗给她底裁判官：

裁判官们，请你们快点把我裁判了，请照你们底意思来裁判我；我知道我底罪又是重大，又是可怕。

我不该穿着粗布衣裳！我又不该赤着双足！我置身在我底悲叹呻吟的弟兄之旁，我又去到那不息的苦工与贫困之乡。

什么语句，什么演说，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就是被认作做了一个罪人？难道我不就是罪恶之化身？

我底两肩还披着农妇底衣裳，我底足赤着，双手也成了粗鲁的模样，这一个微弱的工作使得我疲惫非常；而你

们控告我的最重大的证据便是我爱我底人民，我爱我底故乡！

不过，虽然我犯了何等的重罪，但是你们却无力来反对我，啊，你们这些裁判官们！不，没有一种刑罚能够降临到我身上，因为我有了一个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我底信仰就是理想。它终于会战胜。纵然你们要压制它，你们也是不能。

我底生日无多。你们所能处刑的只是那些短少的日子，而我底“恶”，就是你们所以为的我底“恶”，会减轻我底苦刑。我死，我底心里充满着这伟大的爱情，我将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见我底命运之神。而那般刽子手，就是他们也会把监狱的钥匙抛在地上抛倒在我底枕边，为我祈祷，为我哀哭。

俄罗斯的女儿哟，我祝福你！

著 者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一 薇娜·沙苏丽奇^①

一八六八年之末，俄国青年虚无党人奈其亚叶夫第一次在圣彼得堡被捕的时候，他底家属和同志们都不知道他底消息。有一天奈其亚叶夫底姊姊接到了两张纸条，第一张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写的：“我走桥上经过，看见一辆载囚人的马车。有人从车里向我掷出一张纸条来，我听见了一个平日我所敬爱的人底声音，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把这纸条转送到目的地。’我就急忙送来了，并且我又转而请求你，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请求你毁掉我底纸条，免得有人认出我底笔迹来。——一个学生。”在另一片破纸上，有人胡乱涂抹几个字，不过这还可以认得出是奈其亚叶夫底笔迹：“人们把我带到堡垒里去了，不要失掉勇气，如果天还愿意我们再见呢！”把这两张纸条送到奈其亚叶夫底姊姊处的人乃是一个十三岁的女郎。她在十年后就成了一个全世界闻名的人物了。她底姓名就是“薇娜·沙苏丽奇”。

沙苏丽奇是一个彼得堡市民底最小的女儿。她有不少的兄弟。在幼年的时候，她就不愿学习料理家事，屡次向父母要

① 薇娜·沙苏丽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

求进学校读书。当时正是初期虚无主义运动的时代，俄国女子已开始了和她们父母间的冲突，有不少的女儿为了要求自由与知识的缘故，甚至身殉了她们的理想，在家庭的专制下灭亡了。然而沙苏丽奇却逃脱了这个命运。她底父母顺从了她底意思，她便开始向知识与自由之路上行进了。在十三岁的时候，她就传送了奈其亚叶夫底纸条，那个署名“一个学生”的人不消说就是她底哥哥了。

她底哥哥是奈其亚叶夫底好友，所以幼年的沙苏丽奇也就醉心于革命的学说，参加革命党人底活动了。那时候巴枯宁在俄国革命党人中声名很大，也成了这个少女所崇拜的一个偶像了。她预备到西欧去见巴枯宁，然而因为她底父亲反对得厉害的缘故，就只得留在俄国。

奈其亚叶夫后来设计从彼得保罗垒逃了出来，到了伦敦和瑞士。一八六九年他又带了巴枯宁亲笔写的认他为“第一国际”会员的证书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成立了许多小团体，沙苏丽奇也是团员之一。这年一月二十一日奈其亚叶夫等暗杀了同党伊凡诺夫，引起了政府方面底注意。革命党人底阴谋被政府发露了，在彼得堡及莫斯科两处，党人被捕者共有八十七人之多。沙苏丽奇也是其中之一，她因此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以及哈可夫等处几个监狱中过了两年。出狱后的沙苏丽奇，就不曾再现身于革命党人底阴谋中，她“到民间去”了，她底姓名也少有人记忆着了。然而在一八七八年正月里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这个青年女子立刻成了全世界人景仰的女杰！我们现在来叙述那件事底原委。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三日彼得堡警察总监特列颇夫将军参观第一拘留所，看见一个政治犯即学生波哥留波夫站在天井里不向他脱帽。他便走近波哥留波夫底面前叱骂道：“你站在我底面前敢于不脱帽吗？”说了这样的话，特列颇夫立刻举手把波哥留波夫底小帽抓了下来，掷在地上。在囚室里的囚犯从窗户里看见了这种情形，以为特列颇夫在打波哥留波夫了，便大声叫喊道：“恶棍，刽子手！特列颇夫滚开！”

其他的囚犯听见这叫声，知道了他们底同伴受辱的事，也齐声叫骂，猛烈地敲击着门，震摇着窗格子，全监狱立刻变成了大扰乱的地方。特列颇夫立在天井里，听见这些闹声，看见六层楼的监狱里每个囚室底窗户里露出来的威吓的面孔，他便勃然大怒，指着波哥留波夫向管狱官说：“把他带去，鞭打一顿！”半点钟以后，管狱官骄傲地告诉囚犯们说，波哥留波夫挨了十三下棍棒。

于是全监狱的政治犯便鼓噪起来，然而特列颇夫又派了一队警察来帮同狱吏镇压这次骚动，大部分的囚犯都受着残酷的刑罚。这一天本是囚犯接见亲友的日子，然而管狱官不许任何闲人进狱里来。囚犯底亲友们在狱墙外群聚着，听见了狱中的鼓噪，不久也就明白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消息传遍了全城，后来也就传遍全俄甚至到国外去了。

对于政治犯之此种待遇是从来所不曾有过的。这一次特列颇夫底暴行使革命党人深感愤怒，所以在国内以及亡命外国的俄国革命党人都同意去暗杀特列颇夫，替波哥留波夫报仇，不过因为那时候政府方面正预备审判“一九一三年案件”，革

命党人恐怕这次对特列颇夫的暗杀会连累到那一百九十二个同志，所以决定等那件案子完结后，才来对付特列颇夫。

然而一个青年女郎听见了这个消息，从南俄跑来圣彼得堡，在一八七八年正月廿四日她以呈递禀帖为名，见了特列颇夫。当特列颇夫接禀帖的时候，她从她底项巾下取出一支手枪，向他开放。特列颇夫受了重伤，但不曾死。这个女郎就是沙苏丽奇。她又在首都出现了。

沙苏丽奇并不抵抗，就让警察们把她捉住了。这件事发生在尚在亚历山大二世敕令凡政治案件均移归军事法庭审理的诏令未发布之时，所以得归巡回法庭审理。庭长珂尼是一个极能干的青年法学家，被告底律师亚历山多洛夫也是一个青年，然而已经是著名的律师了。在审判的时候大文学家杜斯妥益夫斯基也在旁听席中。格拉多夫斯基描写当时情形道：“当陪审官接受了问题表退庭之后，在这痛苦的停顿时间中坐在我旁边的杜斯妥益夫斯基向我表示他底意见：‘人们决不能判她底罪，这里不会有惩罚的，惩罚并没有一点好处，只应该简简单单地告诉她：去罢，不要再做第二次了。……’”

亚历山多洛夫并不替沙苏丽奇辩护，他只证明特列颇夫底专制和残酷，他并且极力攻击政府底不当的设施，使得一般听众大受感动。实在这不是在审判沙苏丽奇，而是在审判特列颇夫了。沙苏丽奇在法庭上的回答也是很动人的。

庭长：你为什么刺杀警察总监？

答：他不遵守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七日的诏令，而滥用刑罚，所以我要刺杀他。

问：你知道杀警察总监的罪么？

答：我只知道杀违犯诏令虐待人类的罪人。

问：你受谁的指使？

答：我受上帝指使。

问：你恨特列颇夫么？

答：我不恨他个人，我只恨他所犯的罪恶。

她又宣言说：“我知道要举起手去杀一个人是很可怕的，然而我要来证明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罪是不能不加以惩罚的，我要引起所有的人注意到这件罪恶，使得以后不致再有这样的罪恶发生。”

审判结果，法庭宣告沙苏丽奇无罪赦免。狂热的群众在法庭门前等待着。这时候流言已传遍圣彼得堡，说亚历山大二世已下令再將沙苏丽奇逮捕，放逐她到西伯利亚去，所以群众预备来保护他们底凯旋的女杰。沙苏丽奇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法庭，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等待着她的那辆马车。一个青年西多拉次基坐在车夫底身旁，另一个青年P君同沙苏丽奇坐在车里。马车就开始前进了。进了基洛奇那街，看见了那里的宪兵营房。一队宪兵来包围马车，却被群众前来打退了，西多拉次基拿出一支手枪向宪兵队开成了几下，然后对准了自己底太阳穴放了一枪，跌下来死在路上。这件事发生后，坐在车里的P君便急忙放下玻璃窗，向马车夫叫道：“跑快点，否则我们都会被杀了。”宪兵和群众正在斗争，想驱散群众。马车夫使劲鞭着马，在一阵得得声中马车就跑得不见了。沙苏丽奇，被称为“复仇底天女”的沙苏丽奇就这样得救了。等到后

米元老院否认了这次判决，把沙苏丽奇事件再提出交到诺哥洛德法庭审讯时，她本人已经到了瑞士，并且被一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保护着了。

沙苏丽奇底一枪不仅惊动了全俄国，而且把全欧洲也惊动了。据法国瓦尔伯在一八七八年五月一日的《两世界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薇娜·沙苏丽奇》文里说：“整整四十八小时之内欧洲把什么都忘掉了：把和平、战争，毕斯马克、伯恩斯福爵、哥尔卡科夫亲王都忘掉了，为的是只想看薇娜·沙苏丽奇。”他并且说，这一年对于全欧舆论给了最大的印象的两个人物，乃是柏林会议里的哥尔卡科夫亲王和沙苏丽奇。其他各国报纸称赞她的也不少。在几个月以后，西欧也就连续发生了四件暗杀皇帝的事，在俄国，渐渐地恐怖主义底时代就来了。总之沙苏丽奇底影响之大，谁也不能否认。

然而沙苏丽奇并不是如一般所想象的一个英勇的女杰，也不是一个像被诗化了的基督教殉道的处女那样的极温柔、极和顺、充满了自己否认与爱之感情的女郎。她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子而已。惟其平凡，才使人觉得她更可爱。她底身体很健壮，中等身材，不过初看起来，似乎是高大的。她并不美丽，却有一对很好的眼睛，和长的睫毛。眼睛颇大，但形状又恰到好处，瞳儿平常是灰白色，然而当她激动的时候，那一对瞳儿又变成黑暗的了。在她热狂的时候，眼光又像电一般地闪烁着，不过这样的情形不是常有的。她平常总是带着深思的样子，而且沉默寡言笑，甚至略带愁容。有时取笑别人时眼睛也发出光亮：这却是常有的。稍微有一点心理底变

化，她底双眼就立刻表现出来了。鼻子颇长，嘴唇薄，头大，盖着的是差不多成了黑色的头发。除了一对眼睛而外，她底面貌确实是很平凡的。

她完全不讲究装饰。一般女子都有打扮自己，表显自己底美丽之欲望，她却一点也没有。她太耽于思考了，所以不能顾到这些小事上面来。

她底声音却是特别的。她和人谈话最初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谈到热烈时，她底声音便立刻高了起来，好像对面听话的人不是站在百码以外，便是一个聋子。走到街上，如果话题转入了有兴趣的一方面，她便立刻叫起来，照例举起右手在空中像一把刀一般猛烈地劈下来。

然面在她底单纯、粗鲁，毫不带诗意的外貌之外，她却有一个极深刻有力的，充满着最高的诗趣，充满着爱与憎的心。

她是很冷淡的人，又不善于交际。她底朋友是很少很少的，而且差不多都是旧的相识。她底世界就只是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此外好像有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把她和世界上其余的人隔绝了。

她可以说是大半过着内心的生活。她也得若俄国人特有的病症，而且很厉害。这个病就是去仔细考究自己底心灵，测量它底深浅，冷酷无情地去解剖它，寻找它底缺点。其实这种缺点常常是想象的或则夸张的。她把自己责备得太厉害了。所以忧思悲感常来侵袭她。这些时候她便避开社会把自己关在房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完全埋葬在深思之中，这样的过了几点钟。有时候便逃出住宅跑到那永久的，不可思议的庄

严的大自然界里去寻求安慰。她常以一个真正的诗的心来解释，来酷爱自然，她没有爱人，自然便是她底爱人。她往往全夜不睡，徘徊于瑞士的荒山之中或踟蹰于大湖之畔，有时一直到东方发白，红日出来的时候。

她在幼女的时代就信仰了社会主义。她对于社会主义之献身极其忠实，因此她有一个异常严格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是如此之高，差不多不是人力所能满足的。在她看来，除了主义而外，什么东西都是渺小的。她底一个女友，画家X女士常常批评她说：

“薇娜愿意每天去枪杀一个像特列颇夫那样的人，至少也要每星期做一次。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便苦恼了。”

因为她对自己的责备太苛刻，她便不能以枪杀特列颇夫一件事为满足，希望每天都能做一件这样的事。可是她并没有一点出风头的野心。她本来是一个谦和的人，在她成了闻名世界的人物的时候，反而更谦和了。她像一个“复仇底天女”。在首都现身以后，又光荣地逃到了“自由的”瑞士，过起隐僻的生活来了。她极力避免在公众集会中现身。有时候她进了一个会场，忽然晓得别人认出她是沙苏丽奇，且对她表示敬意，她立刻便改变了态度，像一个刚离开学校的少女那样，带点羞愧的样子，往常震得人耳聋的声音也变成了温柔的神妙优美的调子，她底友人们笑着批评说这是“天女之声”。然而这种声音也是不常听见的，因为在公共集会中她总是不发一言。除非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非说几句话不行的时候，她便决不开口。可是在几个亲密的同志讨论运动底进行时，她

又是一个滔滔不绝的雄辩家了。

后来她回到俄国旅行传道时，也过着最刻苦最谦逊最平常的生活：做一个排字工人，做一个旅馆主妇，做一个侍女。谁知道这就是那个使全欧洲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忘掉了一切的“复仇底天女”呢？然而即使苦到这样，也不能使她底心平静。

有一次她向一个朋友（司特普尼克）说，她听见庭长宣告赦免她的时候，她并不感到快乐，她只觉得异常惊讶，过后一种悲哀底感情又立刻袭来了。她又说：“我当时不能说明这种感情，然而过了那时以后我就懂得它了。如果我被判定了罪，那么对于我万事都休了，因为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了，倒也会安静了。并且一想到我已经尽我底能力做过了，这个思想一定可以安慰我。”这一段话就把她底性格发挥无遗，有了它我在这里再连篇地写上千言万语也是没有用的了。

关于沙苏丽奇底后半生，我们找不到什么记载。我只知道她后来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蒲列哈诺夫、司特潘诺维奇、独慈奇等创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又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最后她竟完全反对恐怖主义，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她著有《回忆录》，但我未看到。

据说屠格纳夫底小说《处女地》^①中的“玛利亚娜”就是描写她。我们知道屠氏此书写于沙苏丽奇刺杀特列颇夫之前，不过她已经在奈其亚叶夫案件中现过身了。所以说屠格纳夫以她为蓝本来描写玛利亚娜，也是可能的，但这自然是早年的沙苏丽奇了。

① 即郭沫若译的《新时代》。

二 苏菲·包婷娜^①

我们知道在一块穷瘦的土地上生长不出鲜美的果实来，然而人类精神之发育成长却每每发生于极不如意的环境中。实在我们时常可以看见许多精神之花偏偏绚烂于上无雨露和阳光，下无腴土与肥料的地方。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样的例证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千几百来，这一章所述的一个青年女子底生涯只是一个光荣的例子而已。

包婷娜生于一八五二年。她底父亲是谭波夫省莫尔先斯克城的警官。他为人冷酷无情，甚至对家人儿女也是异常残暴。他底妻子在他底眼里只不过是卑下的女仆罢了。我们不知道包婷娜底幼年生活之详情，但只从她底父亲之残暴这一点，也就可以想象她底生活是何等苦痛的了。她曾进过省立的女学校并且得过最高的奖品。一八七一年她到莫斯科继续求学，在那里便传染上了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加

^① 苏菲·包婷娜：Софья Имарионовна Бардина(1852--1883)。

入了大学生组织的团体。

她在莫斯科又结识了路巴妥维奇姊妹两个，这两个女郎后来便和她同往瑞士苏黎世求学，本来瑞士已经成了俄国青年女子的进香地了。在她们看来这山明水秀之乡便是全世界上唯一的自由国土，在那里，女子是有机会求得高等学识的。

包婷娜到了苏黎世，不久便开始在俄国女同学底团体中宣传社会主义，并说知识阶级应该服务于人民，尽力开导人民，救助人民，因为那些在贫困、无知、黑暗之中受苦的人民曾流了血汗拚命劳动，才使得知识阶级能够安心读书增加知识。她们团体中大部分的女郎都很热心，有的竟恨不得立刻回到俄国，往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做教育的和宣传的工作。然而有的却以为应该先学得一门职业，然后才可以过独立的生活，包婷娜也是这样主张。她希望做一个女医生，因为她认为那是一种比较最自由的职业。

包婷娜果然离了百艺学校，考进了大学医科。但是这时候苏黎世底声名遍于全俄，而俄国的男女进香者更是络绎不绝，昏庸的俄政府因此大为震恐，遂有一八七三年底愚笨而可耻的“诏书”，说出国留学本是不法行为，而瑞士又是可怕之地，命令在瑞士的俄国男女学生全体归国。

其实俄国留学生中早已决定了归国宣传的计划，未及实行，俄政府底“诏书”已下。结果使大部分学生在一个极短的时期中成群结队而归。他们带了热诚回来，在国内开始了宣传的工作，同时又得着青年同伴底热烈的欢迎，革命的种子就这样播遍全俄了。

然而包婷娜和一些女友当时却不曾回国，她们跑到巴黎预备去进巴黎大学，但因为俄国大使阿诺大伯爵在暗中捣鬼的缘故，巴黎大学不肯收这般女生，于是这些女子也只得回到俄国去了。包婷娜并不灰心，她想既然不能够做女医生，那么做一个产婆也可以。经过很多困难，她跑到日内瓦，在那里费了几个月的功夫苦心研究一番，终于完成了产科底课程。

二

一八七四年包婷娜便回到俄国了。这时候从瑞士回来的留学生已遍布全俄，就是穷乡僻壤也有了他们底脚迹，而在圣彼得堡却成立了他们底秘密机关，传递消息，讨论计划。这种运动在人类争自由的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般年轻学生既无经验，又少能力，更乏资财；人数不多，又不曾得着他们所欲解放的被压迫的无知的人民底一点同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居然敢于和那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的政府为敌，而且具有对于最后胜利之坚强的信仰，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然而事实上确是如此。那么谁能不把这样的青年视为人类中最优美的精神呢？包婷娜就是这精神中之一个。

她以一个从摇篮里就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千金小姐之身，为了要救济人民的缘故，竟到工厂里去做一个普通的工女。照例工人是在工厂里寄食寄宿的，每一个星期中只可以出去一次。饮食坏到不可以言语来形容。黑面包是用小麦粉混合着麦梗树皮等等东西做成的，又黑又硬，既不曾烘熟，又含有砂

粒，并且发酸了，时常还找得出虫来。汤和菜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肉更不是常有。至于住房倒和中国的一种穷人住的客店差不多，床是一格一层的钉在墙壁上，不过是木板架子而已，并且每层距离很近，一个人要挺直地坐在床上也是不可能的事。一袋稻梗兼有了枕头与床褥底功用。屋子里虫虱跳蚤更是多得怕人。空气不流通是不消说的。在严寒的冬季一旦闭了房门和窗户，又闷得人要死。

然而这一切苦，包婷娜和她底同伴们都完全忍受了。对于她，可悲的是工人们在作了十六小时的苦工以后，再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和她谈论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了。她们下工回来便立刻酣睡，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铃声大响，又勉强打起精神去作那繁重的磨人的工作。啊，这样无休息，无快乐，无慰安的日子怎么能够过得下去！然而为了保持自己底良心之纯洁与信仰之完成的缘故，包婷娜和她底无数的同志们却甘愿过着这样的日子。

包婷娜进的是拉查列夫公司底大工厂。她自然不能够用真姓名，便编造了一个：“安娜蔡泽瓦”。在工厂里，男女工人是严格地分开的，包婷娜只能向女工宣传，她确实曾试过了，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纵然她说到口干声嘶，她们还像没有听见一般。对于她们，改善困苦环境的好梦从来不曾做过一个，也无法做的。因为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比男子更多一种，所以要使她们觉醒，实在不易。

于是包婷娜便改变方针，她决定去向男工宣传。她最先便去结识了在宿舍里住的一个工人家庭，以后她时常到那里

去，也就没有人起疑心了，有时她向他们诵读一篇通俗小说，听的人自然不多；多了，那个工人家里也容不下。听众中有老的，也有小的，都是带着庄重的样子静听着。包婷娜算是成功了。本来不认识字的人看见别人能读能写，当然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奇事，何况这能读能写的人又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并且书里面的话又是多末好！这是一个奇迹，在那般诚实无知的工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不久便有人来要求她解释这个奇迹。

她便捏造出一段故事。说她自己是一个正教分离派教徒底女儿，从前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当侍婢，在那里学到了读书写字的本领。众人都相信她底话，从那时候起她就成了众人所敬爱的人物了。

包婷娜得到了男工们底信任以后，便开始利用机会宣传革命思想，成绩也并不坏。所以她虽然每天作十五小时的苦工，也还有精力来做宣传工作，有时甚至设法秘密到别家工厂去参观和宣传。一切的苦她都忘掉了，因为她知道她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福音已经开始打动了那些人底心，她底苦痛生活居然得到了这样的代价，她也满意了。

然而人间的罪恶连她底如此微小的幸福也夺去了。有一天工厂管理人（是一个英国人）看见她在男工宿舍里，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自爱的女子，立刻申斥了她一顿，并不准她以后再回到男工宿舍来；不久他又在男工宿舍里，发见几个人在读小册子，这的确不是寻常的事，小册子当然被没收了，而且这还是鼓吹革命的刊物呢！工厂里起了大的恐慌，包婷娜也就在这

时期离开工厂了。

三

出了工厂，包婷娜便到圣彼得堡去。在圣彼得堡她又进行宣传的工作。当时革命党人已经成立了许多秘密机关，包婷娜也成立了一个，但不久她便被捕了。她之被捕是由于一个多少熟悉一点党中秘密的女子底告发。那个女子有一个情人被警厅捉去了，她为了要救出她底情人，竟出卖我们底高贵的女儿。包婷娜被捕后在监狱里住了两年，为的是等候审判。在这两年中她底同志们被捕的也不少，一八七七年她才开始受审。这是一次大的审判。被告共有五十人之多，犯的罪名是宣传革命。这案件，后人称为“五十人案件”。

“五十人案件”自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俄历）开始审判，到三月十四日终结，其结果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本来在从前政治犯底审判是完全秘密，不要旁听的。但这次经过内阁长期讨论之后，政府决定将此次审判完全公开，并且允许报纸尽量登载。政府底本意乃是：社会对于这种逐渐发达日趋激烈的革命运动之所以漠不关心，其重要原因便是不明瞭这种情形，不知道潜伏着的危机，一般官吏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应该公开地审判革命党人，使社会知道这般人之可畏。

然而事实上所得的结果恰恰相反，便是那般从前把革命党人当作仇敌，视为蛇蝎的人，一旦亲眼见着他们底那种高贵的牺牲精神和感人的献身态度，也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而抛

弃从前那种愚妄的偏见了。“他们是圣人！”这样的从感动了的口里出来的呼声逐渐地响遍了全俄。

在这五十个“圣人”之中还有两个“英杰”，这便是一般人所称呼的“五十人案件中的英杰”。一个是工人亚历楷叶夫，还有一个便是包婷娜。亚历楷叶夫底演说是惊人的。至于包婷娜呢，这个二十三岁的女郎答应了庭长底要求起来说明她底政治理想。她先把俄国人民底痛苦描写得活灵活现，说到沉痛的地方不觉声泪俱下。然后又以热烈的语调叙说俄国如何需要正义与自由。最后又极清楚极扼要地解释革命党底党纲。她底演说是如此雄辩，竟把裁判官惊骇着了。

有一节话是：“你们控告我煽惑暴动，其实我从没有煽惑过人民作立刻的暴动。……那些屠杀，那些接连着的屠杀使得我憎恨，使得我恐怖了。……我仅承认在某种固定的情形之下武力的革命是不可免的。”

这时候很多人说俄国的革命党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包婷娜对这个问题也说了几句话：“检察官说我们要实行无政府……然而据我所知道的以及在近代文学中这个字底意义，完全没有扰乱与专横的意思。无政府决不是个人底专横，因为无政府承认个人底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底自由为界限的。无政府是对于压制社会之自由发展的一切强权之否认而已。……”

最后她用了下面的话来结束她底长篇演说。

“然而我并不为自己的缘故来求你们开恩。我确信那伟大的日子会来的，在那时候便是我们这个怠惰的，酣睡的国民也会从冷淡的长梦中起来，觉得他们这种长期任人践踏的举

动是可耻的了，而且知道看见那般青年为着有了扶助同胞的理想而受迫害的事也是罪恶的了。……你们现在可以迫害我们，你们有的是实力，然而我们底运动却有精神的力量，历史的进步之力量，理想之力量，这些力量终于会征服你们底枪刺，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是常有的。”

审判结束，包婷娜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役九年，然而因为她底身体已经衰弱到不能忍受这种刑罚，判决又改变了，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最苦寒的地方伊希门去。

远离了人间，隔绝了世界，被囚禁在一个冷僻的寒村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里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怀着热烈的人类爱的心的少女简直是难堪的苦刑。然而她竟这样地过了四年，在这四年中物质和精神上的饥荒她已受够了。她底家属对她的帮助也很微弱。到后来她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便决定逃出西伯利亚，甚至拿生命来作孤注一掷，她也甘愿。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个病弱的少女居然逃出了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向欧俄出发了。

她先到了喀山，在那里遇着了那般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友人们，他们见着她，欢喜自不必说，然而她底憔悴的容貌和病弱的身体又使他们感到难受。谁知道这少女在几年前也曾是一朵鲜艳的花呢？可是现在正在青春时期就走到衰老的路上去了，而且在前面等着的也许就是死亡。精神固然没有变更，而且是和以前一样的活泼，可是惟其如此，他们一想到这样优美的精神不久就会和那衰弱的身躯一同走到死亡的路上去，他们底悲哀的心情真是笔墨所不能形容出来的。

她在俄国游历了十八个月，继续宣传的工作，后来才听从友人底劝告到了瑞士，定居在日内瓦，她底友人们尽力看护她，可是她底健康已没有恢复底希望了，对于运动，她也只是有心无力，不能做什么工作了。虽然她底友人还是尽心地看护她，但她自己觉得已成了无用的人，那么，她底生存只不过是地友人们底肩上加了一个重担罢了，而且还分去了他们对运动可以尽的力量。她便有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她以为这对于运动是有好处的。贫血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心身底衰弱又是有加无已，后来就是要集中精力在书报上也是一件难事了。有时候她想宽一宽心，极力装出笑容来和友人们谈笑，可是并不能够，眼泪常常不听她底命令夺眶而出，酸了的心也不能不悲哀了。“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不如用暴力来把它毁掉”，她想到这里便决定实行自杀了。

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十三日黄昏时分她拿着手枪对自己开放，衰弱的手两次背叛了她，第三次她向着胸膛开了一枪，她没有死，只受了伤。这个病弱的少女在地板上痛苦挣扎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或求救的呼声。在几点钟的光景，女房东知道了，立刻找人来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在那里她活了十二天，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钟，她底纯洁的、高贵的生活就完结了。一个充满了热烈的人类爱的女杰为了人们底憎恨，就这样地死去了！然而一直到死，她底心里仍然深深刻着那一个字：“爱”。

三 游珊·海富孟^①

在俄国革命党人中有不少的无名女杰，她们把自己底一切都奉献在革命的祭坛上，并不要求一点报酬。她们所担任的工作是很小而且琐碎的，譬如把自己底地址姓名借给同志通信，或常常隐匿自己不认识的同志，或传递物品等工作，虽然这都是不甚重要的，然而为了这些工作，她们有时候竟不得不牺牲自己底一切。被囚禁，被流放以至于死，她们还是没无闻的人。她们底姓名早被人忘却了，诗人不曾做诗来赞美她们，历史也不曾记载她们底姓名。然而后人是会对着她们感恩的。实在，如果没有了她们，那部光荣灿烂的俄国革命史还不能写成呢！

然而这类人之中却有一个少女居然被历史之波浪高高地载上了她底白色浪花之顶，而成了一个名满全球的人物，这也是“有幸有不幸”啊！

这个少女便是海富孟。

她于一八五五年生于明司克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她底父亲是犹太富翁，极其顽固。本来犹太教徒对于从基督教来

① 游珊·海富孟：Гося Мироновна Гельфман(1855—1882)。

的一切事物均目为丑恶，对于科学尤其憎恨。游珊受了新思潮底洗礼，自然对于犹太教起了反抗之心。这种顽固家庭中的生活在她简直是一种苦刑。加以她底母亲早亡，继母又是残酷无情。所以后来她不得不从家里逃到基辅，在那里以缝衣为职业。

一八七四年到了。这时候革命运动传播到各处，这个女裁缝也被卷入了革命漩涡之中。她加入了革命团体。

当时从瑞士苏黎世回来了一群女学生，其中有几个结识了游珊。由她们底介绍，游珊便开始了革命活动。那些女学生后来就成了“五十人案件”中的人物。而游珊呢，她所担任的工作是很微小的，只是把她底地址借用作革命党通信机关而已。然而在一八七五年游珊被捕了，罪名就是这一点小事。她先在监狱里住了两年候审，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审判开始，她自然是被告之一员，又被判决了两年监禁。这一次她被禁在里脱夫斯基，同囚者有她底四五个女同志。这时候她就真正了解了社会主义之原理，而且决心把自己底身心都献给社会主义。这四年的监狱非但不曾摧毁她底革命精神，反而把她造成了一个激烈的社会主义者。她日夜等候着自由之到来，她预备出狱后从事积极的工作。但她底刑期满后政府并不释放她，又把她放逐到北部的省里去，幸而在一八七九年秋天她乘隙逃了出来。到了圣彼得堡后她更一心一意地从事于革命运动，她底身体虽然十分柔弱，但却喜欢做劳苦的工作，什么事都肯做。她送信，传递物件，守卫巡风。永远热心，永远快乐。常常走了十四小时的路，走遍了这都城，散布执行委

员会底宣言，深夜回到家里，异常疲倦，精力竭尽了，颓然地倒在床上。第二天一早又起来继续她底工作。

她不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很单纯，但她底热心和勇气却为许多人所不能及。她随时都预备帮助别人，并不想到自己会因此而受着何等的苦。实在她从不曾想过自己。

她底丈夫科洛克维奇是著名的南部革命党人，他曾加入土地与自由社及其后的民意社，乃是党中一个得力人物，在一八八一年二月民意社预备刺杀沙皇的时期中被捕了。他一定会得着死刑，虽然他底审判期迟至一八八二年四月，但谁都知道他是无生还之目的！不过游珊得了这消息并不惊惶，并且以怀孕之身帮助同志进行暗杀沙皇的工作。三月一日苏菲亚分配炸弹给四个党员的地方，便是在游珊底家里。

三月三日游珊被捕了。与苏菲亚等五人同被判处死刑。

死刑宣告之日她非常快乐。她对于军事法庭底裁判官，反以微笑的态度感谢他们底判决。但是因为有孕的缘故，她底死刑延期四个月，当时外国报纸对俄政府的这种屠杀猛力攻击，俄政府在绞杀了苏菲亚之后居然害怕起来，把她底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她死在圣彼得堡拘留所中。

一个女革命党人路巴妥维奇一九〇六年在《过去杂志》中叙述游珊底最后如下：

五个月来她都生活在死亡的痛苦中。一直到临分娩的时候，别人才通知她底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了，为

了她生产的缘故，人家便把她移在候审拘留所内，给了她一间大的囚室，有禁卒看守着。……待富孟神志清醒，她的器官很能抵抗，她生了一个男孩，她还能够哺乳他。这个孩子本是属于她的；便是根据法律，谁也无权夺去她底孩子。然而几天以后在一个夜里，人家居然抢走了她底孩子，把他放在弃儿院，连号数也不告诉她。……母亲不能够忍受这个打击，不久她就病死了。

她底丈夫在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二十二人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勇敢地死于绞刑台上。

四 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①

她不愿与那些人共其命运，
那些将世界变成罪恶之窟的人们，
但她愿意接受他们的报酬，那奇异的三冠的棘刺；
她敢于劈开生命之自由的面包，
倒出生命之酒来，与人们共饮；
努力赔偿了历代所欠之负债，
直到把一个沙皇置于死地，
她死了，为了生命的缘故。

英雄与烈士仍在爱，仍在受苦；
正如从地里的铁厂出来的火花一般，
他们被投在天空去照那最黑的暗夜。
这历来如此，也将永久如此，
在这忧患世界的铁砧上，
上帝搁上人心，加以锤击的时候。

——高理斯的《苏菲亚》（周作人译）

① 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София Ильевна Перовская (1853—1881)。

我还记得自从有了这一颗时常苦痛着的爱正义恨罪恶的心以后，在十一二岁时候的我就为了一个异国女郎流了不少的眼泪了。在那时候我所知道世界上最可敬爱的人就是她一个。现在想起来，固然觉得当时的见识太幼稚了，然而我却至今还没有一点非笑当时的我的勇气。虽然幼稚的我忘掉了许多更可敬爱的人物，但是她确实也是世界上最可敬爱的人物中的一个啊！

这个异国女郎便是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在外国，人都称她为柏罗夫斯加亚；只有在中国，她才被称为“苏菲亚”，而且中国人还只知她为苏菲亚呢！我第一次知道她，是从一部小说中得来的，这部小说是岭南羽衣女士（？）著的《东欧女豪杰》，似乎没有印单行本，只在民国以前的《新小说》月报上登载过，我也没有看完。主人公自然就是苏菲亚，也说到她底爱人热利亚博夫（《东欧女豪杰》里怎样译法就记不起了）。虽是一部章回体小说，免不掉“话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一套旧把戏，也有“三尺雪夜读自由书”一类的回目，但我至今还觉得这是一部好书。过后我又在《民报》十五号上看见无首君底《苏菲亚传》。金一底《自由血》里也有《苏菲亚略传》。世界社出版的《六十名人》里也有苏菲亚底像和小传。以上都是民国以前的出版物。

近年来苏菲亚底名字在中国虽然常常被人提起，但我却不曾看见什么专门论述苏菲亚的文章。我自己在去年曾在《民钟》发表过一篇《苏菲亚之死》。今年出版的《现代妇女》杂

志上有一篇《女革命家梭菲亚的故事》，这大概是根据董秋芳君译的《争自由的波浪》内的《梭菲亚的生活的断片》而作的。然而这许多文章都不免有错误，所以我如今又来重写《苏菲亚传记》了。这一次我愿把我底幼年时代为她流过的眼泪化为一瓶清澄的墨水，用了它我要画出我一生最敬爱的人中的一个光荣的女杰底面影来。

金一君在二十五年前曾写过下面的话：“苏菲亚女士考其家乘，出自彼得大帝之天潢贵族。夫使其安享平和，销磨岁月，长为贵主之身，则天上碧桃，日边红杏，出入煊赫，居处荣华，使人望之如神仙焉。爱娇哉！贵胄哉！然而贵者不自以为贵，娇者不自以为娇，辞金闱，出绣阁，奔走风尘，投身烈火，倒戈皇室，挥剑乘舆，终至断头伏尸而后已。岂鬼崇其脑，天夺其衷乎？不自由无宁死！此苏菲亚之所以为圣徒也。吾崇拜之，愿吾同胞皆崇拜之。”二十五年前的中国人居然写出了这样的话，确实难得，就在现今读起来还觉得它有震撼读者力量。于此也可见苏菲亚底人格感人之深了。

苏菲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乃是一个又美丽又年轻的贵族小姐。她是一个美人。据她底友人司特普尼克说，“她底美不是可以令人一见魂销的，看她愈久才愈觉得她底美来。”在宽广的额下辉耀着的是一对庄严的锋利的碧眼。还有那胜过白雪的容颜，上面覆着黄金一般的细发，一个可爱的小鼻子，下面配着一张动人的口，微笑的时候，又露出两排白玉一般的牙齿。她有那潇洒的风姿，优美的举止和动人的清脆得像银子一般的声音。就在她临死的那年，虽然已是二十七

岁^①的女子，却像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一般。不仅举止而且相貌上都带了不少的孩子气，又轻快又敏捷，又灵慧。遇着什么可笑的事，她便大笑起来，这时候更像一个顽皮的女孩子。

她很爱清洁，然而并不爱打扮，衣服装饰都是异常朴素，从不穿戴什么流行的服饰。妃格念尔在一八七七年认识她的时候，她常常和女友科尔利洛瓦到妃格念尔家里过夜。她给了妃格念尔以很深的印象。妃格念尔后来自述道：“她底面貌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底乡村式的女衬衣就代替了寝衣底功用。穿着这样的衣服，垂着短的亚麻色的发辫，还有那孩子似的圆的脸颊，她真像一个农家少女。……在她底端丽的农家女底小脸上，谁都看得出来那孩子般的幼稚的诚实的表情。”

她极爱小孩，她又是一个极其优良的女教师，因为她怀着一颗赤子心，所以能了解小孩、爱小孩。同时她对入又有一个慈母般的热爱，凡遇同志患病，她便为之看护。她做着看护的事，做得极温顺，极快活，极忍耐，很能得患病者底欢心。她对于被囚在监狱中的同志也很关心。时常送食物和棉衣进监去，甚至他们底较不重要的需要，她也很知道，她真是能做到体贴入微的地步了。

然而谁能料到这一个容貌端丽，态度优美，天性慈爱的少女就是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谋者呢！用铅笔在一个旧信封上画出掷炸弹地方底图样的，是她；指定各党员底岗位的，是她；在定命的那一天早晨，身入虎穴，在万岁声中摇动手

^① 照中国算法，应作二十八岁。

巾做信号，叫同志掷炸弹的，也是她。

在这个端丽平静的容貌之中，究竟隐藏着何种伟大的力量呢？究竟这个非凡的少女，具有何种性质呢？那么，我们对于她底生平便不得不加以一番考究了。

苏菲亚生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一日，出身俄国最高贵族，属于彼得大帝底女儿伊利沙白女王^①大家底家系，苏菲亚底祖父做过教育大臣，叔祖柏罗夫斯基伯爵是一个有名的将军，曾替尼古拉一世在中央亚细亚征服了几省，而她底父亲也做过多年圣彼得堡总督。

她底父亲性情暴躁，喜压制，幸而她却有一个温良慈爱的母亲。她底母亲是一个极有智慧又很慈悲的女人，但是为她底父亲所不喜，他不仅时常虐待这可怜的女人，并且还逼迫他们底儿女去欺负母亲。那个温顺的好女人既过不惯那种贵族底奢侈环境，又不见爱、不见容于她底丈夫，生活对她便成了一种苦刑；然而她还有一点人生的乐趣。就是教养她底儿女。苏菲亚和她底兄弟一样都是在母亲底爱之怀抱中长大的。

苏菲亚是她底父母底最小的女儿。她底父亲预备把她造成上流社会中的“小姐”，所以不要她进学校，学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然而苏菲亚本人底意思却正相反，为了进学校的事，不知和她底父亲冲突过多少次，但在十六岁的那一年她终于进了学校。

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就是在 一八六六年那一年，革命党人

^① 伊利沙白女王(1711—1761)：曾与拉祖莫夫斯基秘密结婚，苏菲亚即其后人。

加拉考左夫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发生了。沙皇安然无恙，加拉考左夫受了绞刑，而她底父亲也因身为首都总督防范不周的罪名，被革了职。苏菲亚底母亲便带了她底儿女们回到乡间别墅去了。

苏菲亚和她底母亲以及兄弟们在别墅里度过了两年的幸福生涯。本来当她在圣彼得堡时“在她底家庭之压迫的空气中，苏菲亚就学到了爱人类，爱那些受苦的人，像她爱她底受了多年的痛苦的母亲一样”（借用妃格念尔的话），现在离开了那凶恶的父亲，专和她底慈祥的母亲以及友爱的兄弟们同处，她底快乐不消说是很大的。

别墅中本来有一座完备的藏书楼，这时候苏菲亚有机会可以尽量地读书了。在暑假中她底哥哥们从学校归来，带来了不少新出的书籍，都是当时俄国青年所最爱读的书，如巧尔尼雪夫斯基、都布岩留波夫、毕沙列夫等人底著作，苏菲亚热心地读毕了这些著作，很受感动。同时她底哥哥们又向她叙述当时俄国青年中的虚无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听了这样的话，好像得到启示一般，心头燃起了热情之火，梦想着黄金似的自由之好梦。她和她底姊妹玛利亚极力向父亲要求允许她们进学校读书，但父亲总是不答应。一八六九年这个别墅不得不出卖了，因为她底父亲要还很大的债。她底母亲答应把别墅里的几件值钱的家具卖了作苏菲亚姊妹读书的费用。这年秋天母亲又带了几女们到圣彼得堡，但她并不和她底丈夫同住，她另租了房屋和苏菲亚、玛利亚二人住在一处。在这个和蔼的家庭空气中，苏菲亚姊

妹二人便去进高等学校，即安拉秦斯基学院。不久她们俩就和许多抱有急进思想的同学们熟识了。这班女学生中如科尔利洛瓦姊妹等人后来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做了不少的事。然而她们底父亲知道她们和同学们交游甚密，使很不高兴。他称她们俩底女同学为“虚无党人”，他后来甚至不许这两姊妹继续求学。

然而苏菲亚是不甘心受这种压迫的，她商得了母亲底同意，便从家里逃了出来，隐匿在科尔利洛瓦姊妹底家里。她底在盛怒之下的父亲曾叫警察去四处找寻她，但后来经她底哥哥底劝阻，她那父亲才答应给她一张护照，允许她以后自由行动。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完全脱离父女的关系。他叫“她永不要在他底眼前现身”。她从此就果然不曾和她底父亲再见面了。就在他临死的时候，那残暴的父亲也忍心不来看他底娇儿最后一面。

脱离了家庭后，苏菲亚仍继续求学。她底母亲帮助她底学费。她和她底母亲相爱甚笃，常常回家来看她底慈母和兄姊。但这只能行之于她知道父亲不在那里的时候，而且因为怕遇见父亲，也不能在家里久坐。

过后她就献身于民众运动，加入了柴可屋斯基团。这个团体是以青年革命党人柴可屋斯基为中心的，最初的目的仅在个人的修养和自己教育，后来扩大为在青年中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竟宣传到工人和农民。克魯泡特金也是一个团员。苏菲亚在这个团体里是一个活动分子，而且柴可屋斯基团之得以革命化，她底力量也不小。

最初的柴可屋斯基团与其说是政治团体不如说是家族的团体。并没有一定的规则，一切都是根据团员底自由合意而行。团员间彼此敬爱，互相谦让，天才卢骚所赞颂的“人类交际之理想”，他们确实做到了。所有的团员有若一家人一般，亲亲热热，诚诚恳恳，异常坦白，彼此以诚相见，连一点极微小的事也不隐瞒。而且团员间又能做到互相督责，彼此帮助的地步。大家都去了私心，一心一意谋同胞底福利。为人民服务，就是他们底唯一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团员们底光明的人格，完成了各人底智性之发展，俄国革命运动供给了不少的优美的精神，苏菲亚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苏菲亚是柴可屋斯基团中最受人敬爱的一个团员。她律己很严，自己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而做事又一点都不苟且，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她还有可惊的智力。对于每一个问题，她不仅能完全了解，而且还能捉住它底要点，又能把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其他问题透彻地观察到。所以她得到的结论是任何人底见解所不能动摇的。她又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别人辩论总不免偏于一面，她却不然。她能抑制下她底热烈的感情，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来观察一切，来驳斥别人底论据。自己一点也不夸张，深知自己，又认识别人。她总是不断地开拓新的道路，创造新的事业，来发展自己和同志们底活动力。一八七一年与一八七二年柴可屋斯基团从向青年宣传改进为向工农宣传，大半应归功于苏菲亚。这种宣传的工作她差不多做了四年，很能得同志底敬爱。

在一八七三年她又认识了辛奈加夫妇，和他们同住在圣彼得堡城外一个工业区域，做教育工人的工作。这时候她早已完成了医药助手底课程，不再进学校了。她底生活可从克鲁泡特金底自传《一个革命家底回忆》中看出来：

我们底团体常常聚会，我不曾缺席过一次。会所是彼得堡城外的一所小屋，这是苏菲亚用了假名和伪造的一个工人妻子底护照租来的。苏菲亚出身最高贵族，父亲曾做过彼得堡总督。……现在却装成一个工人底妻子，身穿厚棉衣，足履男子底长靴，头上包着棉布巾，挑着两个桶，从涅瓦河提了水来，看见这样子，谁能认出她在几年前还是京都最阔气的客厅中的一位小姐呢？她很能得我们底欢心，我们中任何人一进这房子，便向她表示特别友爱的微笑；她性喜清洁，我们有时候走过了城外的泥泞的道路，曳起污泥的农家皮靴，穿着绵羊皮走进屋来，她为了重视屋子清洁的缘故，常和我们争吵，然而我们还是报以特别和气的微笑，这时她极力要在地底天真烂漫的，女孩似的，聪明的小脸上做出极庄严的表情。在她底道德观念上，她是一个“严肃主义者”，但决不是说教式的那一类人。如果她不满意于某人底行动，她便藐目视之；然而从她底严厉的眼光里，我们仍可以看出她底光明磊落和温柔慈爱的性情，这性情是了解人类的弱点内。只有一次她是有点近于刻薄。说到某人时她说过一句话：“他是妇女一般的男子。”她说话时并不停止工作，她底声音，她底

态要，永远留在我底记忆中，不能忘记了。

一八七三年政府对于这般和平的传道者大行逮捕，每天都在捉人，监狱也装满了。苏菲亚底活动自然逃不掉政府底注意。在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她也被捕了。这时候她正在亚历山大尔斯基区从事煽动工人的运动，几个工人也一同被捕了。然而苏菲亚因了她底母亲四处奔走营救，只在拘留所里住了一年，得了父亲底保释便被赦免了。释放后她同她底母亲一起住在克里米别墅，因为这个别墅并没有被人买去。在别墅中她过了二年的苦痛生活。她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父亲虽不见她，却派人把她监视得很严。

过后她得到了母亲底许可，又去进看护学校，一年后毕了业。她很得医生底信任和重视，因为她自幼就是以慈爱为怀的。对于病人有若慈母之爱儿子，百般体贴，无微不至。这时她又逃脱了家庭底监视，再参加从前的工作。一八七七年冬季她又被逮捕了。著名的“一九三人案件”也把她牵连在内，不过她底罪名较轻，允许保释出来候审，在“一九三人案件”开审以前，法庭先把苏菲亚传去审讯。到了法庭，没有看见一个她底同志，她很觉惊奇，但立刻即宣言道，没有她底同志们在此，她是不开口的。她既是与另外的一九二人犯着同样的罪名，当然是在一起受审才对。第二年“一九三人案件”完结了，她得到无罪释放的判决。但这无罪释放的判决也只是形式，因为一出法庭她和一部分被赦免的同志一样，都被引渡到宪兵底手里，同时警厅下了一个秘密命令，把他们放逐到北部各

省。苏菲亚被放逐到阿罗加湖北面的一个小城坡文纳士。

放逐的生活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决定在中途设法逃走。果然有一天晚上，她睡在一个小城的驿站中的屋子里，一个宪兵躺在这屋子里的唯一的窗户旁边，另一个宪兵把守着房门。这房门是向外开的，苏菲亚早看出来。半夜里她悄悄地爬起来，轻手轻足地走到房门口，轻轻推开房门。小心地爬过躺在门口的宪兵底身子。那两个宪兵睡得和死狗一般，一点也不觉得。苏菲亚大胆地逃了出来。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了装束，走到火车站，上了火车一直往圣彼得堡去了。

猛虎逃出狭的囚笼了。这时候她心里的快乐真是言语所不能够形容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底生命从此就保不住了。

那两个宪兵第二天起来，发现他们底俘虏逃走了，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呈报附近地方官吏，四处搜索，然而苏菲亚此时已逍遥地在火车上面了。

苏菲亚到了圣彼得堡，她底同志们还不知道她逃走的消息呢！她一到圣彼得堡，仍以从前那样的勇气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对于宣传运动更是异常努力。她时常向她底同志们叙述此次逃走底颠末，说得如此简单，如此真实，而且如此可爱，与她底一生的其他可怕的冒险比较起来，恰似一朵蕊香花开于荒野的千仞绝壁之上。

一八七八年苏菲亚加入了土地与自由社，这时俄国革命运动底面目已经改变了。和平的传道底结果只得着政府底猛烈的压迫与革命党人底悲惨的牺牲。于是革命党人改变了战略，恐怖主义便发生了。苏菲亚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参加恐

怖主义的工作。像在柴可屋斯基团中一样，她仍得着同志们底敬爱。因为她自己充满着鼓舞人的热诚和对于义务之最高感情，所以也能激起同志们底热诚和最高的义务之感情来。她在青年中宣传，得到意外的成功；她在工人中宣传，工人也爱她底热心和诚恳。她和米海洛夫、利沙可夫诸人成立了俄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的工人团体。从一八七八年夏在哈可夫监狱劫夺同党瓦拉拿斯基事件起，所有的恐怖主义活动，她无一不参加。

这时候她底亡命外国的友人们约她暂时到外国休息一下，她不肯，她底答复是：“我宁愿在俄国被绞死，不愿意在外国无聊地苟且度日。”她底最后的命运证明出来这不是空话！

一八七九年四月土地与自由社社员革命党人梭洛维叶夫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失败在绞刑架殉道后，该社中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员如蒲列哈诺夫等便提议召集大会决定土地与自由社底未来的战略，他们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而且相信各省同志会赞成他们底意见。然而土地与自由社中较激烈的社员则极端拥护恐怖主义，这一般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又创造了一个小团体，后来就成了民意社底执行委员会，在当时则只称做执行委员会，如在基辅省发出的宣言就署了这样的名字。这个小团体找到了一个重要团员，这就是启巴尔次奇，他为了这个目的特别学会了制造炸弹。

土地与自由社底大会决定在伏若尔次举行，而执行委员会为先发制人计，先期在里拍次克开会，并邀请了著名南部革命党热利亚博夫（后来是苏菲亚底爱人）、福洛伦科、科洛克维

奇等到会。会议结果，决定了执行委员会底目的为推翻贵族政治，用武力打倒政府，建设政治的自由，就是说承认恐怖主义。本此精神，他们就去赴伏龙奈次的大会，在这次人会里执行委员会一派得到了胜利。土地与自由社底旧纲领并未改变，仍决定继续民间工作，但同时也进行乡村与城市里的恐怖战略，暗杀沙皇的计划也要继续做下去。蒲列哈诺夫派便脱离了。于是土地与自由社便分成两派，热利亚博夫与苏菲亚等底一派称作民意社，蒲列哈诺夫一派改称黑分派。沙苏丽奇、司特潘洛维奇均属于后一派。

民意社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俄国革命运动渐渐进入暴风雨时代了，苏菲亚也不得不放弃了民间工作，专门做恐怖主义的工作。妃格念尔叙述当时的情形道：“那时她与我刚离开了乡村，心中还非常挂念。别人要我们来参加政治的斗争，别人把我们叫回城市，然而我们也觉得乡村需要我们，没有了我们，乡村会是更加黑暗的。理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追随着我们底同志们，即政治的恐怖主义者所选择的道路。……不过我们底心情却不是这样，而且我们底性情却是与这个完全相反的。我们底性情把我们连系在穷苦人底世界中。这种性情，我们当时并未加以分析，但后来我们就明白是一种个人洁己之欲望，是对于一种纯洁的生活之欲望。然而经过短时间的迟疑后，我们也就征服了我们底感情，我们底性情，抛弃了民间生活所给与我们的道德上的满足，坚定地和我们底同志们站立在一起。”

这样地参加了恐怖主义的工作以后，苏菲亚便把全副精

力都销耗在暗杀沙皇的计划上面了。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谓苏菲亚与哈尔特曼暗杀沙皇的事件发生了。我们且来详述这件事底原委：

在像古巴比伦那般宏大的半亚洲风的古城，俄国旧都莫斯科底郊外，有一些茅屋点缀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庄园。其中有一所只有一层的平房，因年代久远而败坏了，还带着那种忧郁的灰色。这所房屋虽然位置在大都会底附郭，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合宜。因为这一带的房屋都是这样，不像在都会底附郭，简直是俄国平原中的一个村落而已。在夏天，街中生着茂盛的碧草，生长得很高，差不多成了草地，一队骑兵可以在那里操练了。在秋天多雨的时候，泥地上贮满了雨水，变成一片池沼，鹅鸭在其中快乐地游泳着。

一切都是沉醉在和平的空气中。不时看得见一两个过路人，如果他不是本地的人，那么小孩们便眼盯着他底背影，一直到望不见了为止。如果偶尔有一辆马车或货车经过，车轮底声音惊动了许多茅屋中的住民，霎时间红的、绿的、蓝的百叶窗都大开了。少女和妇人们都伸出头来，好像看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一般。

这地方的居民都是互相认识的，因为大家都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一八七九年的秋天，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所灰色平房竟换了主人。新主人是两个不速之客，是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底父母就要来的。男子有二十二岁，名叫苏科路可夫，是沙拉托夫地方的一个工匠，又说是铁道上的书记。他底妻子又美丽，又年轻，料理家务时又是一个能手。不过男子却

配不上他底妻子，他不剃须，穿着短褂和高跟长靴，相貌很苍老。这一家就只有这夫妇二人，虽说他们底父母要来，但实际上却不见什么人来。房间空得很多，好像预备给许多人住的，粮食也买了不少；而且附近有些老年人夜里不能睡觉时，往往听见那所房屋底大门开阖声，以及货车底轮响，似乎有人自远方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些诚实的老百姓实在不明白。

其实真正事实是很简单的。这所谓夫妇二人乃是两个恐怖主义者，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夫妇。房子是用八百卢布买来的。男的是德国化学家哈尔特曼，女的就是苏菲亚。晚间的货车是运炸药及其他器械来的。这所房子里确实不仅住有两个人，还有几个恐怖主义者秘密地住在里面，他们在掘地道，一直达到铁道线下，然后埋地雷于其中。因为亚历山大二世从克里米回圣彼得堡要路过此间。他们预备来炸毁沙皇底专车。本来这样的地雷埋了三处，第一处在哈可夫，第二处在亚历山得洛夫斯克，都失败了；第三处就在莫斯科。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幸哈尔特曼先期被捕。十一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底专车经过该地时，只有苏菲亚和西利亚夫两人留在那所房子里准备施放地雷。苏菲亚担任发信号，果然亚历山大二世底专车一过，轰地一声，地雷爆发。不幸以五分钟之迟误竟毁其侍从之车。因为苏菲亚发第一次信号时，西利亚夫不曾把电极接好，所以亚历山大底专车得以安然走过。许多日的心血全付诸流水，西利亚夫身殉了主义；然而亚历山大却安然无恙。

（哈尔特曼后来却也设法逃脱了）。

在这次事件中，苏菲亚深得同志底信任，参预莫斯科一处地道的七八个同志并甘愿把生命交托在苏菲亚底手里。他们决定如果警察发觉出这个密谋，来搜索这所灰色平房的时候，则请苏菲亚点燃贮藏室里的甜油炸药，那么霎时间瓦石齐飞，房屋被焚，革命党人便与民贼底走狗们同归于尽了。不过这并未成为事实。

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民意社社员哈杜林炸毁了冬宫里的食堂，但亚历山大二世那天用餐很迟，又得脱险。四月苏菲亚便到阿德沙，同妃格念尔等商议，等亚历山大二世到克里米避暑，经过阿德沙时，掘地道埋炸药，再演一次炸毁专车的活剧。但这个计划在中途发生了阻碍，只得停顿了。苏菲亚最后也离开了阿德沙，后来在圣彼得堡也有同样的计划，但亦未成功。

最后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社党员终于在圣彼得堡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年二月里，民意社执行委员会知道亚历山大每星期日都要到米海洛夫斯基骑兵学校去，差不多每次都要走一条新路，M.S.街也是经过的一条路线，他们便决定在M.S.街掘地道埋炸药，来炸死那个暴君。这个计划施诸实行了。革命党人在M.S.街开设了一所乳酪店。波格达洛维奇做店主，雅基莫瓦假装为他底妻子。二月十四日那天亚历山大果然经过M.S.街，这时候地道已掘成，但不及放入炸药，亚历山大又得安然走过了，革命党人异常悔恨自己底工作之迟缓。于是执行委员会经过一次讨论后，决定要

在三月一日那一天准备完全。这第七次的暗杀计划应该是最最后的一次了，非使它成功不可。地雷自然是对付沙皇的最好武器，但恐怕这一次又错过了时间，不能炸毁沙皇底马车，所以又决定派利沙可夫、米海洛夫、格林奈夫斯基、伊美利安诺夫四人带着炸弹，在M.S.街底两端等着沙皇。

然而在二月二十七日热利亚博夫忽然被捕了。同时乳酪店也被警察光顾，幸而被格达洛维奇应付得当，居然让警察受骗了。这个消息给了执行委员会以一个大的打击。二十八日那一天执行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商量第二天的事，这时才发觉炸药还没有埋好，而且四个投炸弹的人也不曾预备完善。本来热利亚博夫是指导这工作的人，他的被捕，工作自然不免陷于停顿的状态。然而明天就是三月一日，沙皇要经过M.S.街了。怎么办呢？

参与这天紧急会议的只有十余人。苏菲亚和妃格念尔在内，利沙可夫等都未到场，因为形势紧急，来不及通知许多人了。在会议中苏菲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沙皇明天不经过M.S.街，是否单用炸弹来对付他，全场一致地回答道：“干！不管怎么样，总之明天要干！炸药应该埋好。炸弹应该在明天早晨做好，也许地雷和炸弹并用，也许单用炸弹，都没有关系。”在午后三点钟左右散了会，伊沙叶夫立刻到乳酪店去通知埋炸药的事，苏堪诺夫和他底军官同志们帮助苏菲亚搬家。

苏菲亚本来是和热利亚博夫同住的，在他们底家里正贮藏着甜油炸药。热利亚博夫是在特利哥里底家里被捕的。警

察逮捕特利哥里时，他正在特利哥里处，也就被捉去了。所以苏菲亚家里的炸药应该赶紧搬开。苏菲亚搬到了妃格念尔底家中。

在五点钟的光景，启巴尔次奇、苏琪诺夫、格拉切夫斯基三人使到妃格念尔家中来做炸弹。在八点钟以前，执行委员会底党员不断地来这里报告消息，并帮忙做事，但在八点钟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只留下苏菲亚、妃格念尔和三个制炸弹者在屋里。苏菲亚这天过于疲倦，而且第二天又要做发信号的人，所以妃格念尔劝她暂且睡一会儿养养精神，苏菲亚听从了。妃格念尔就留着给那三个人当助手。到了两点钟的光景她也去睡了。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这两个女郎起来了。启巴尔次奇等还在工作，苏菲亚便把已经做好的两个炸弹送到沙布林与海富孟家里去。到八点钟其余的两个也做好，由启巴尔次奇带起走了。十点钟利沙可夫等四人便来沙布林家取炸弹。苏菲亚便指定他们底岗位，以及事后集合的地点。地雷也预备好了，福洛伦科管着施放地雷的事。天大的罗网安排好了，只等那君临全俄的独夫进来。

这一天亚历山大二世的确不曾经过M. S. 街，革命党人底计划似乎又失败了，然而苏菲亚却立刻表现出她那种惊人的自制力，她一点也不惊惶，不久她就断定沙皇会经过加塞林运河回冬宫。她立刻把计划全部改变，找到四个掷炸弹者，另外指定新的岗位，并约定以手巾为信号。

在两点又一刻钟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底马车果然走过加塞林运河。在轮蹄杂沓间，利沙可夫向着马车掷了一个炸

弹，轰然一声，铁石碎片在空中乱飞，死伤了十四个侍从的哥萨克兵，马车也稍有损坏。利沙可夫当场被捕。亚历山大二世便下车来慰问受伤的侍从者。他走近利沙可夫，问了几句话，他还自庆道：“天幸，我尚安然无恙！”利沙可夫接口说道：“我们就公明白究竟是否安然无恙！”这时亚历山大刚走过一个青年底面前，那个青年又掷了一个炸弹，立刻平地响了一声雷，亚历山大和那个青年都倒在雪地上。在烟雾消散后，那些只顾逃命，把这两个人抛弃在地上的人渐渐回来了。侍从武官把他抬回宫去，伊美利安诺夫挟着一个炸弹忘记了他足亚历山大底大敌，居然不顾生命危险，跑过来帮助侍从武官把那个垂死的沙皇抬上雪车，人底感情每每是这样矛盾的。

亚历山大一直活到午后三点半钟。而那个炸死沙皇的青年格林奈夫斯基被抬到医院后在九点半钟才死去。在医院里格林奈夫斯基恢复了知觉。检察官赶到医院去，想探出一点消息。他问：“你底名字叫什么？”格氏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正是格氏临死之前的半个小时，他死时年才二十六岁。

在三月十日苏菲亚也被捕了。她自三月一日以来就没有一定的住所。今晚在这个友人家里过一夜，明晚又到另一个友人家过一夜。本来民意社还有几处秘密机关，她可以自由居住的，然而她恐怕连累同志们，所以不肯去住。妃格念尔在她底自叙传《一个革命家底回忆录》中叙述道：“柏罗夫斯加亚在她被捕前一两天问我道：‘薇娜奇加^①，我今晚可以睡在你

① 薇娜奇加：薇娜·妃格念尔的昵称。

那里么?’我以惊异与责备的眼光看着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这还要问吗？’她回答道：‘我问你，是因为他们如果来搜索这间屋子，看见我在这里，他们也会把你捉去绞死的。’我感动地紧紧抱着她，又把我底床头上的手枪指给她看，我说：‘如果他们真来搜索，我便拿这手枪款待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在这里。’……”

波兰女革命党人利娜在她底《圣彼得堡旅行记》（见司特普尼克底《地下的俄罗斯》一书）中也叙述到三月一日以后的苏菲亚。我已把那篇文章节译出来，附在本文之后，现在在这里就不必重述了。

三月三日沙布林等底家被搜索，海富孟被捕了，沙布林当场用手枪自杀，米海洛夫开枪拒捕，也被捕了。在三月十日苏菲亚被捕后，启巴尔次奇被房东告发，也被捕了，福洛伦科当时来访启巴尔次奇也及于难。亚历山大三世底反动更加厉害了。

苏菲亚本来可以逃脱的，从利娜底《圣彼得堡旅行记》看来，可知当时同志们很希望她能暂时离开首都到外国去，至少也到外省去。她却坚决地拒绝了别人底劝告。她从前在T街用“瓦罗华”名字为热利亚博夫租的房子也遭警察光顾，不过“瓦罗华”早已搬起走了。苏菲亚当时常到一家牛乳店买牛乳，卖牛乳的女人认识她，警察署便叫这妇人伴着一个警察巡行全城去找寻那个名叫“瓦罗华”的女子，后来果然在圣彼得堡底最热闹的大街奈夫斯基路上找到了苏菲亚，便把她逮捕了。

为了审判谋杀沙皇者的缘故，一个特别的法庭组织起来

了。最初利沙可夫一个人受着秘密审讯，当时曾有利沙可夫泄漏革命党底秘密的谣传，这是不确的。热利亚博夫在监狱中写信给检察官，说他是这事件底主谋者，所以他也被牵入这案件。后来米海洛夫、海富孟、启巴尔次奇、苏菲亚四人也被控为谋杀沙皇者。

判决是早定好了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一幕滑稽剧而已。在审讯期中，苏菲亚底母亲从克里米来看她底爱儿。苏菲亚并不和她底母亲多说话。她像一个病弱的小女孩一样，流着泪，把头放在母亲底膝上，动也不动。在她底囚室里日夜看守着她的两个狱卒看见这样的情景也受了感动。

在法庭上，苏菲亚先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演说，她虽然是个女人，但要求不要和她底同伴们分开，她愿分享他们底命运。

在审讯的时候，法庭方面替被告选定了律师，唯有热利亚博夫拒绝了，他说，他自己能够辩护。果然他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说曾感动了许多人。被告方面的律师也都是有名望的，然而判决已早定好，无更改之余地。这一切只不过是骗人的手续而已。结果六个被告一律被判处死刑。检察官在他底案情节要中列举苏菲亚底罪状，有一节是：

“在柏罗夫斯加亚底罪状中，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们能够想象到一个政治的阴谋，我们能够想象那些阴谋者采用最残酷最激烈的方法，我们也能够想象一个女人参加了这个阴谋。然而说一个女人做了这阴谋底主脑，一切谋杀底布置都是出于她底手，她还极其冷静地指定掷炸弹者底职责，亲手画出地图指定掷炸弹者底岗位，而且这个女人既做了这阴

煤底主脑后，又去亲眼观看它底结果，甚至跑到离出事地点只有几步远近的地方，以亲见她自己底手艺而自豪，——这样的一个女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常人底道德感情对之是无法了解的。”

苏菲亚底律师凯德林在他底陈述中说道：“……当你听说一个女人居然参加这个大罪，你一定以为她是一个怪物，一个空前的匪人。然而你在这个法庭中会见她时，我相信你底第一个印象会立刻改变到相反的一方面，至少我是如此。她给我留下的印象现在和我未见她时的想象全然不同。我现在看见的是一个谦逊的少女，她底态度毫无使人觉得可怕、可厌的地方，……我想她向你们所作的坦白的供认（她一点也不替自己辩护），以及她对于你们所控告的她的罪名的态度，都明白地表示出来她连一点虚伪底影儿也没有。”

最后，法官问苏菲亚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她答复道：

“检察官放了一大堆罪名在我们底身上。关于这案件底普通事实，我并不想再说什么，因为我在以前的口供里已经一一承认过了。然而要把什么不道德，什么残酷，什么不顾公众意见底罪名加在我和我底同志们底身上，我却要声言反对。凡是和我们相熟识的人，以及明白我们底生活与我们工作底情形的人，是不会拿不道德或残酷来责备我们的！”

审判底结果是六个人一律判决死刑。这个判决并不惊人，这是谁都料到的。然而这种六重的谋杀，究竟也是可怕的事，何况其中还有两个女子，在俄国对女子从来是不处死刑的。

所以在二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哲学家梭洛维约夫便开会反对死刑底判决。在他底动人的演说中有下面的一段话：

“明天判决就要宣布了。现在在那边，在石壁之后，人们在商量怎样杀掉那些被解除了武装的人，……然而如果这个工作果然完成了，如果俄国皇帝——基督教人民底领袖——蹂躏了训戒，杀掉了这些人，如果他带着血迹进这里来，那么俄国人民——基督教人民——便不能够再跟随他了。俄国人民会离开他，走自己底路。”

这篇演说感动了不少的人，全会场中都响着同样的叫声：“特赦！宽恕！”

三月廿九日，死刑底判决宣布了，执行期在四月三日^①。这六天以内，全俄国甚至全世界都激动起来了。谁能相信这六重的谋杀会见诸事实呢？托尔斯太曾写信给新皇亚历山大三世劝他不要拿这六个人底血来染红他底宝座，然而这个大文学家底话是没有人听的。四月三日，死刑就执行了。海黛孟因为有孕的缘故，她底死刑被延期四个月，所以那一天以英勇的态度上绞刑台的，只有五个人。

这一天早晨，苏非亚从第一拘留所被宪兵牵了出来。她穿着黑色的囚服，他们使她仰卧在马背上，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弑君者”，然后又把她底双手缚得很紧。她叫道：“把绳子放松一点罢，它弄伤我了。”“你不久还会觉得比这更坏的呢！”这便是宪兵队长底回答。于是马车便风驰云飞般

① 即公历四月十五日。

地跑去了。

她底母亲在牢门口等着，要和她底爱儿见最后的一面。看见了这一切的情景，亲见了她用慈爱所养大的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儿这样被人糟蹋，更想到女儿在一瞬间便要绞死在可怕的绞刑台上，她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痛苦。然而她是弱者，这一切都只得忍受了。眼睁睁望着那载着她爱儿到死路上去的驰去的马车的她底心情，在我，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了。对于这个白发的母亲，难道世间还有更甚于此的残酷的举动么？

绞刑台建立在西米洛夫斯基广场里。五个囚人都被带到了。于是热利亚博夫（农夫）、米海洛夫（工人）、启巴尔次奇（牧师的儿子）、利沙可夫（中等阶级的市民）、苏菲亚（贵族女郎）便上了绞刑台。苏菲亚先和她底爱人热利亚博夫吻抱，然后再吻抱其他的同志。她底最后的话是：“妈妈，我们永别了！”

四月十六日的《科隆新闻》（Kölnische Zeitung）上载有一则如下的《俄国通信》：

我在东方看过十二次死刑底执行，但从未曾看见这样的屠杀。启巴尔次奇和热利亚博夫异常安静；米海洛夫面色稍带灰白，但很坚定；利沙可夫面作深红色；苏菲亚表示出非常的精神力。她底两颊还保留着玫瑰色，而她底毫无半点虚饰的庄严的面貌上更充满了真正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底容貌是安静而平和；一点夸张底表现也没有。

这便是苏菲亚底最后，而且这是出于一个资产阶级通信员底手笔。谁能说她是一个暴徒呢？

在午前九点十五分苏菲亚便离开了这世界，年仅二十八岁。然而她底精神却是永存的。

苏菲亚诚然是一个温柔可亲，而且有一颗爱人类的黄金似的心底的女子；但同时在做事的时候，却又是一个阴谋的天才。她是下列三种特性的混合体：一，深远广大的能力；二，热心激烈的性情；三，钻石一般的意志。

司特普尼克批评苏菲亚说：“她底精力可比譬成一个饕餮者底胃，它把万事咀嚼下去来裁断，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底工作，从不知道困倦。而她在青年中神出鬼没的煽动底本领，实为她底拿手好戏。她底游说力是如此可惊：那种明快的论理带着崇高的道义之热情地说出来时，任何人都要感服的。

“她是一个极能干的组织家。以她底敏锐的，透彻的精神，她能够把那些关系于重大工作之成败的极细微的地方捉摸到。在做预备的工作时，她又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她能自制，又有先见。她决不肯泄漏秘密。有时一句话就可使全盘的事体毁坏，她是一句话也不告人的。……她底保守秘密之程度竟到了极点，差不多使人不相信；她底私人的亲密的友人和她同住数月，也不能知道她在做些什么事。

“她因为久处于革命党的环境之中，故有知人善任之明，也有领袖之才。然而她之统御人并不用什么权术，只以崇高的道理，坚定的性格，热烈的同情与乎独特的游说力，人们会自然地集合在她底指导之下。总之因为她有崇高的道德观

念，和无限的献身热情，她才能够感动所有和她相熟的人。

“她底意志力之坚强也和她底智慧力相等。原来在俄国当时的情形之下，要继续不断地做阴谋底工作，实在是危险中的危险事，难事中的至难事。这种工作恰像地狱的火一般消耗了最壮健的性质；因为那个难调和的‘革命之神’不仅需要它底信徒们底生命与血液做祭品，而且也需要他们底脑筋和骨头底精华，甚至他们底最深的灵魂，否则它便会残刻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然而我敢说这可怕的工作一点也不能动摇苏菲亚底意志。

“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我们底阵营中过了十一年，她经历过不少绝大的损失，全盘的失败，但她却永不困倦地在准备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把她底心里的神圣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从不拿那忧郁的，悲哀的严格‘义务观念’来束缚自己。不管她底刻苦和自励，不管她底表面上的冷静，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鼓舞人间的天使。在她底武装的甲冑之下仍有一颗女性底优美的心在鼓动着。我们应该承认，女人比男子更赋有这种‘神火’。俄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狂热，大半应归功于她们；只要她们加入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便是难以克服的了。

“她不仅是一个组织家，而且自己常常身先同志去蹈危机。她底迷人的魔力全在于此，当她以她底似乎透入别人底心之深处的透察的眼光定在一个人底身上，用恳切的态度说‘我们去罢’，谁能够回答她说‘我不去’呢？她自己常常甘愿去蹈危险，据她自己说这是‘幸福的’。……”

妃格念尔在她底“自叙传”中评论苏菲亚道：“谁看见她底外貌底朴实，定想不到她所出生以及度过她底小孩及少年时代的环境；而她底平常的面部底表情，她底柔和的面貌，又使人想不到她底坚强的意志与坚定的性格。大体说来，她底天性中包含着女性的温柔与男性的严厉二者，她对于工人，温柔慈爱得像一个慈母；对于同志，却不肯宽大；而对于她底政治的敌人——政府，却是异常残酷，这种特性差不多使得苏堪诺夫战抖起来。苏堪诺夫底理想的女子是不能有这特性的。”

“柏罗夫斯加亚和我们当时的理想相合，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我用不着叙说她底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简单与朴素，我只举一个表明她对于团体底基金的态度例子。就在三月里的一天，她来到我家里说，‘借十五个卢布与我。我把那笔款项用在药品上了，这是不能从普通帐上支出的。母亲给我送来一件丝的跳舞衣，裁缝答应替我出钱，我拿这笔钱来还帐。’我想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这样严格地否定自己。”

妃格念尔又叙述苏菲亚很受麦秀根底人格之影响。实在的，“一九三九案件”中的英雄麦秀根曾感动过大文学家屠格纳夫，屠格纳夫预备拿麦秀根来做主人公写一部小说，可惜死把他底工作阻止了。苏菲亚也曾为麦秀根底人格与演说所感动，她想设法使他由哈可夫省的齐古叶夫中央监狱逃出来，但终于没有成功。

在“自叙传”中妃格念尔还说：“柏罗夫斯加亚最爱的两个同志都是有卓越的精神力的人，然而他们却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一个赋有莫大的光彩，这是热利亚博夫；一个完全

没有那种光彩，这是福洛伦科，她和他底友人们都称他为‘米可诺’。我是在伏若奈次会议里才初次会见这两个人，而柏罗夫斯加亚却早已认识他们了，她向我说了不少关于他们两个的事。我们可以看得出她虽然尊敬‘米可诺’，而热利亚博夫确实得着她底最热烈的赞美与崇拜。”

克鲁泡特金在他底“自传”中也批评她说：“柏罗夫斯加亚是一个彻头彻尾、异常坚定的民粹派，同时又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钢铁般坚强的战士。她并不以为工人和农民有理想的美德才来爱他们，为他们劳苦。他们是怎么样她便把他们当作怎么样，她曾向我说过：‘我们已经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也许两代的人都要牺牲来从事这种工作，然而无论如何这工作总是应该完成的。’我们底团体中的女同志没有一个会在绞刑台前退缩。她们谁都不怕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在单纯的宣传时期中会想到这个命运。柏罗夫斯加亚底常见的肖像是非常之好。这能表现出她底热烈的勇气、灵敏的智慧与仁爱的性情。她在登绞刑台以前写给母亲的信最能表现出女人情感里的慈爱的灵魂来。”

苏菲亚寄给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底亲爱的，至爱的妈妈：我每次想到你，想到这次的遭遇给与母亲底心上的打击，我总觉得说不出的难受。请你自己宽慰罢，不要过于悲伤。我对于我底命运一点也不怨恨，我要安静地等着死刑之到来，因为我久已盼望到这样的命运，而且知道它是迟早必来的。亲爱的妈妈

哟，相信我，我底命运并不是十分可悲的。我底命运乃是顺着我底信仰自然得到的结果。我依照我底信仰之指示而生活，我实在不能够另走别的道路。因此我等候着命运，任随什么样的命运到来，我都安然地甘心承受。只是母亲哟！我底唯一难堪的苦痛是什么？这就是……亲爱的母亲哟，……我至爱的母亲哟，我想到你底悲哀，你底苦痛，我底柔肠寸断了。这难堪的思想压迫着我底心，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可以除掉它。

我最亲爱的，至爱的妈妈哟，记着你还有一个大的家庭。在那安全的家庭里还有你底不少的爱儿，大的和小的，他们都还需要你，需要你底温暖的慈爱，你底伟大的精神力。你若只是一味心软地忘不了我，这是不对的。我一直到现在都带着你底挂念。我是很感激的。恨只恨我不能够把我自己升高到你底道德的高度。然而每当我觉得自己在飘摇，自己有点软弱的时候，一想到你，我底精神就强健起来了，你底容颜把我支持住了。我不说我对于你的爱慕；你晓得从我底童年以来，你就成了我底最深刻最热烈的爱底对象，我底最大的苦痛乃是为你焦虑。我希望你会安静自己。我最深爱的，最爱慕的母亲哟，你能了解你底女儿底这点苦心，请不要为我底命运而悲伤罢。请你宽恕我做了使你悲伤的事。不要多多责备我，母亲斥责备，在我是再悲苦不过的。

我心里想时时吻你底双手，我跪着请求你不要对我发怒。所有家人亲戚处也请母亲千万为我致意。

我底亲爱的妈妈哟，我还有一件小事请求你。请给我买几条领子和袖口来。领子最好窄一点；袖口用普通扣就可以了。（因为这里面不许用带花钮扣的）。衣服也破旧了，在出庭受审之前，我自己须得把它修补一下。在未能再见面时，且暂时分手罢，我底亲爱的妈妈。我再说一次，请你不要悲伤，不要为我而苦恼，而伤及你底身体，这是我底最后的请求。我底命运究竟也并不是十分悲惨的，请你不要为此伤心，千万！

你底爱儿苏菲亚 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①

附 录

圣彼得堡旅行记

一

一到圣彼得堡，我便去找我底老友杜夫人。她是我底同国人。我知道她虽然不曾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她那里却有一个革命党底秘密集会处，因此她一定能够把一切重要的消息告诉我。她对我之到来极表欢迎。她告诉我果然有些恐怖主义者时时到她那里。……

① 即公历四月三日。

我离开圣彼得堡已有数年，我想近来一个虚无党人底生活一定是十分可怕的。

杜夫人告诉我，在每一次新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便有一个短时期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暴风雨一过，一切又都平静了。现在便是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我没有护照，因此很焦急。然而杜夫人极力安慰我说，这一点也不要紧，我用不着害怕。……

第四天，我在杜夫人家里会见了海富孟，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她底脸上使我感动的，就是她底嘴唇边，她底眼睛里的一个形容不出来的苦痛之表情。杜夫人刚刚把我介绍给她之后，她便立刻意气激昂地畅谈“事业”，畅谈各派底纲领，畅谈“民意社红十字会”等等。

此后我见过她多次。她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印象，使我相信她是那些最诚实，最质朴，最谦逊的女人中之一个，她献身事业之忠诚是言语所表示不出来的；然而她却缺乏独创性的思考。

她底丈夫科洛克维奇在我到此地之前数日被捕。虽然这时候重忧压着她底心，而且常常不由她自主地在她底眼内、脸上，声音中表现出来，她总是毫不困倦地做党底工作，凡同志们有事托她做，她未有不努力从事的。杜夫人及其他知道她的人都说她底温良是无人可比的。

她似乎没有时间来想她自己私人的事和自己底悲哀，也许她是着为此事的。

我记得有一天她交了一张纸条给杜夫人，托杜夫人转交给斯某，这斯某常与宪兵通消息，由那个宪兵她便可传递书信与彼得保罗垒中的囚人。她要求杜夫人把这纸条转交给她底丈夫，这时候她底声音里露出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悲哀。这是多末悲痛的声音啊！

不幸这时候和堡垒中的通信断了，她底纸条自然无法交到她底丈夫手里。我又看见杜夫人把纸条还给她。

海富孟常到杜夫人家来，全家的人，甚至于那个老祖母也都爱她。

我看出她是很羞涩的。无论什么时候，她们请她用餐或吃一点东西，她总是推辞。她很少在杜夫人家喝一杯茶，不过我知道她时常饥饿，因为她异常忙，常常没有时间回家用餐。

我天天晚上要找宿处，所以去过很多的人家。到处都听见人说起海富孟底名字，青年人说到她，更表示绝大的敬意。学生们十分爱她，敬她，他们很欢喜游珊来访他们。她极其熟悉革命党中的一切新闻，这都是社会上一般人所注意，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关心的。她底衣袋里和她从来没有离过手的大皮包里总是装满了执行委员会底宣言、《民意杂志》，以及为了救济流放人、政治犯，或援助秘密印刷所的缘故而发行的彩票，而举行的音乐会、跳舞会、游艺会底入场券。她知道许多人底地址，她可以随时和重要的恐怖主义者约定地点会面。

有一天她给我带来了苏菲亚底消息。她说苏菲亚如果不病，便要来看我。

二

数日后我在老友阿利林家会见了苏菲亚。她底脸白得像一张纸，几乎举不起足，一进屋便颓然倒在躺椅上。

她来向阿利林领取他按月募得的捐款，数目并不多，只有一百卢布左右。不幸阿利林尚未收到这笔款。我底衣袋中恰巧有一百卢布，不过这是别人托我带到圣彼得堡来交给某人的。我说我愿把这笔款借与她过两天；她底面貌是非常忧愁，而且我想要不是为了特别的急需，谁也不会会在晚间十一点钟，在那样病弱的状态中跑来要钱的。然而苏菲亚不肯接受我底提议，她说她不能确定能否在这样短促的时期中还给我。同时她告诉我，她真是一钱莫名了，她被一个侦探跟着，不得不改换几次马车来逃避；她又说自己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否逃出了侦探底掌握，警察随时可以来阿利林家逮捕她。她应该立刻离开此地，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至于阿利林，他是一个老狐狸，他底家里没有一点与革命党有关的东西。不过我底衣袋里有一卷《民意杂志》。我们打算把它们烧了，然而苏菲亚一定要带去，她说烧了可惜，并且放在她底身上，她若被捕，警察们发现了这一卷报也不会加重她底罪。

她匆忙地走了；在临去时，她说她在第二天愿意和我约定一个地点相会，只要她还是“活着”（这就是说“安然无恙”）的话。我们约定了地点和时间。然而她不曾来，我非常害怕她已经被捕了。第二天游珊来安慰了我。苏菲亚并没有被捕，

不过病得非常厉害，不能够离家。

这些事发生在三月一日之前两天，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与她在阿利林家会面之前一日热利亚博夫被捕了。

三月一日是星期日，在这一天早晨我走到G地友人娜狄亚家。G地在当时算是全俄最平静的地方之一，

星期一早晨我听见娜狄亚底女仆说起三月一日大事件的谣言。午后一点钟光景本区的牧师来说他听见从圣彼得堡回来的乡民说起这件事。晚间娜狄亚底姊姊带了报纸来。……

于是可怕的日子便来了。苦刑、嫌疑、恐怖的日子来了。世界的末日似乎到了。每一份新报纸带来政府残酷地压迫无党人的消息，还有警察不断的新发现的消息。随后T街①的可怕的事件又来了，一个无名者底自杀。逮捕复逮捕。无党人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被捕了。

后来我实在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便决定到圣彼得堡去。

这是星期四。惨云悲雨锁住了这名都，压倒了我底心灵。街灯、房屋、阳台、窗户似乎都蒙着一层悲哀的面纱。

我直向杜夫人家走去。全家人都聚集在屋内。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狼狽的恐惧。杜夫人见了我进来不禁失声叫喊。其余的人也不见得比她镇静。

“什么邪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要跑进这可怕的地方来？你不知道我自己也受着警察底监视么？你想在这时候我能够把你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① T.街，即 Teleguia 街。海富孟与沙布林同住在这街上。警察来逮捕他们时，沙布林开枪自杀，海富孟被捕去了。“无名者”即指沙布林。

杜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和态度都是十分激动，她在屋里踱来踱去，偶尔又立在我底面前，露出异常焦急没有办法的样子。……

忽然进来了一个华服的太太，她说愿意和杜夫人作密谈，这时候一屋的人都沉默不作声了。我们又疑惑又惊惶，因为杜夫人底妹妹在几点钟前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时候以为一定有什么祸事发生了。

不久杜夫人回来了，她把我拉在一边，向我低声说这位太太是苏菲亚派来找我的。

我几乎欢喜得跳了起来。她还是“活着”，显然是她想到外国去。我只想到她除了偷越国境一件事外，决没有其他可以用得着我底地方，因为那是我底特别任务。

充满了这些快乐的思想，我进了苏菲亚底房间，她在那里等着我。她看见我进来，便走来迎接我。我便说我知道她决定到外国去，我很欢喜。她望着我，好像听着什么完全不可了解的话一般。

我知道我底猜想是错误的了，便劝她离开首都，在这里别人正在缉拿她。当时我还想不到她对于三月一日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她在莫斯科地雷事件中的责任，已被哥登堡供了出来，而且见于报纸；在我看来，这一个理由便够使她这时候离开彼得堡了。

然而她坚决地否定了我底一切提议，她说：“在如此重要的时期离开首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有许多事待做，许多人待见！”

她对于革命党所得到的胜利非常兴奋。她相信着将来，觉得万事都有希望。她坚决地拒绝了我底恳求，她又说她有什么事要找我。

她愿意知道点关于谋杀皇帝者底审判的消息。她知道我与某“达官”认识，这个人是和最高警务部有关系的，虽然政府方面对于这次审判之准备是非常严守秘密的。这个“达官”总可以给我们一点消息。苏菲亚所托我的就是这件事。她非常焦虑。她所爱的人（即热利亚博夫）也是在被告之中。他虽然被牵连在本案内，不过他先期被捕，并没有直接参加三月一日的事件，苏菲亚希望……

我告诉她说我不仅愿意去找那个“达官”，而且如果她以是是值得的话，我还愿意去找我底“宪兵”，几年以前我在担任与政治犯秘密通讯工作的时候，曾和他有过联系。

这一点苏菲亚却不赞成，她说我底“宪兵”已经和虚无党断绝了一切关系，如果我去找他，他会把我立刻送到警察局去的，再不然要是他怕我供出他来，也会派一群侦探来跟随我。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告诉我们什么的，也许他自己就一点也不知道。至于那个“达官”，倒用不着害怕，他本人不能够做这种卑鄙的卖友之事，而且在有些地方他是真心同情虚无党人的。

我决定明早十点钟去见“达官”。苏菲亚很愿早得回音。然而她筹划了许久，总不能在晚间六点钟以前和我相会。我觉得很奇怪，她便向我解释她如何分配时间。原来明天她有七处约会，而且七处地点相距很远。我们底谈话完毕后，苏菲亚便叫我们相会处的这个家庭里的一个青年到户籍局去查问

我底“达官”底住址，她又叫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家底密友）去给我找一个宿处，因为我曾对她说我现在需要宿处。

这时候只有我们两人在屋里了，我又请求她到外国去暂避一下。又说如果她以为她这时不应该离去俄国，那么她可以到边境上一个小城去，我可以伴着她在那里过两三个礼拜。她不听我底话；她还讥笑我底懦弱，不过这也是出于好意的。

她连忙转过话头。她告诉我那个投了炸弹在皇帝足下与皇帝同归于尽的青年是谁。她又告诉我在T.街自杀的人是沙布林。他是我几年前的旧交。这个消息使我不禁战抖起来。

等那位出去给我找宿处的姑娘回来时，我们便分别了。苏菲亚问我要不要钱来打扮自己，以便去见我底“达官”，这一次她底袋里却装满了钱，然而我说我用不着钱；因为我已有了一套很好的衣服。

第二天我便去见“达官”，他待我之客气，是我不曾意料到的。他把一切重要消息都告诉了我。这消息实在使人不快！热利亚博夫和其他诸人底命运都断定了，没有改动之余地。所谓审判只是形式而已，手续而已。

六点钟光景，我带着这个消息到我和苏菲亚约会的地点。苏菲亚到九点钟才来，我看见她进来，便长叹一声，算是放心了。我们两人底脸上都带着愁容；我因为等了她许久不来，惊惧交集；她呢，据她说她十分疲倦，也许另有其他的原因。主人把茶壶①端上桌来，便让我们两人留着密谈。

① 茶壶，即茶炊（沙莫瓦尔）。

我把我所得到的消息立刻完全告诉了她。我不曾看她底脸，因为她底眼睛埋下去了。当她抬起眼睛时，我看见她全身在战抖。随后她便握着我底手，俯下头倒在我底身上，头埋在我底膝上。她这样过了几分钟；她不哭，只是战抖。后来她站起来，坐回原位，极力镇静自己。突然她握着我底手，握得异常之紧，使我觉得痛了。

我记得我曾向她提议，叫她到阿德沙去找热利亚博夫底家人亲戚来看他。然而她回答说，她并不知道他们底确定的通信处。而且如今太迟了，赶不及在审判之前到圣彼得堡来。

“达官”很惊奇热利亚博夫自己宣言他是沙皇暗杀事件的主谋。当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苏菲亚时，她回答道：

“这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利沙可夫一个人底审判太单调无味了。”

我又告诉她，“达官”曾说热利亚博夫底勇敢以及他底崇高的气概，真令人景仰不已；这时候我看见她底两眼发了光，双颊又有了玫瑰色。这显然是她底最大的安慰。

“达官”又告诉我，所有的被告都知道他们底命运在等着他们；然而他们在死亡面前都表示出惊人的镇静与坦然，毫无惧色。

苏菲亚听说，不觉长叹。她很感痛苦。她想哭，却又极力自制。然而过一会她底眼里还是含满了泪珠。

这时候谣言传遍全城，说利沙可夫泄露了什么秘密。然而“达官”却极力否认，我记得我把这事向苏菲亚提说时，我又附加道，也许连“达官”本人也不知道。然而她却回答说：

“不，我相信他底话全是真的。关于这一点，他也不会错。我知道利沙可夫，我相信他不会招出什么；米海洛夫也不会的。”

她便告诉我米海洛夫是怎样的人，在恐怖主义者中姓米海洛夫的人很有几个。她又叫我去警告我底一个朋友说，朋友中已经有人告发了他，要他留意。

差不多一直到中夜，我们才分别了。她愿意先走，然而她却却是疲倦异常，几乎站不起来。这时候她不大说话，她底声音甚微，说的话也很短。

苏菲亚和我约定明日午后两三点钟之间再到这里相会。第二天我在两点半钟来到这里，她已来过，不及等我便去了。从此我们便无缘再见。

两天以后她便被捕了。……（下略）

——自司徒普尼克底《地下的俄罗斯》中译出。

五 薇娜·妃格念尔^①

今年读到一本最好的书。几月前寄友人君毅信中曾说，“昨晚重读妃格念尔底自叙传，流了不少的眼泪。我在哭我自己！”可见这书感我之深了。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底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底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无穷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底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妃格念尔是什么人呢？她底名字在前章^②内读者已经见过。现在让我详细地把她介绍给诸位罢！

—

法国文豪法朗士所称为“俄国革命之贞德”的妃格念尔，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于俄国喀山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她底祖父是一八一二年的一个有名的将军。但她们的四姊妹后来都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她底二妹利狄亚曾加入过一个革命团体，从事工人宣传运动，被判处惩戒罪，后来被元老院将

① 薇娜·妃格念尔：Ви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Фигнер(1852—1942)。

② 指关于苏菲亚的一章。

判决减为终身流放于西伯利亚；她底三妹爱屋金尼因牵连着冬宫炸药事件，在一八八〇年被判决流放西伯利亚；她底四妹阿尔加，也跟着她底丈夫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做教育民众的工作。

薇娜幼年时代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有和蔼慈祥的母亲，又有很友爱的姊妹。她对于她们的爱情都是无限的。一八六三年她进了女学校读书，在一八六九年就毕业出来。在学校里，她有一次读了奈克拉索夫底长诗《莎霞》很受感动。她在“自叙传”中曾说过：

人的性格常常是在人们、书报、和周围的生活等等底暗中的影响之下造成的。然而有时候此等要素之一居然会在你底心灵中刻了一条很深的印迹，造成了一个新形成的性格之根抵。奈克拉索夫底《莎霞》，本来是教员波非叶夫拿给我们来分析的，这长诗对于我底发展却留下一个这样的根抵。

奈克拉索夫原诗底内容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那个聪明而多才，善于言辞的阿加林从都会中去到一个寂寞的乡村里，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智力尚未发达的青年女子。他开始使她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和她说起社会问题以及为人民谋幸福之工作。受了这种说教底影响，理想的渴望与问题就在莎霞底心灵中产生了。然而一两年后莎霞重遇见阿加林时，她对他便感到了一种幻灭。在莎霞底眼里，这个如今在精神、智性上正繁荣的阿加林不过是一个虚浮的空言者，他“飘游各处，想做出什

么伟大的冒险事业”，到处散布他底雄辩的话语，然而他只限于空谈，不曾做过一件实在的事。这样，莎霞对她底“英雄”便感到很大的失望。她发现他底言论是和他底行为全不符合的，那么，言论纵然是十分美丽，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最后她便不再相信他，终于离开他了。

这首诗打动了十五岁的妃格念尔底心。她说：“我反复地沉思着这首诗，在我底这十五年中我从来不曾沉思过。这首诗教我怎样生活，这首诗给我指示了一个值得渴慕的目的。它教给我的是：我底话应该和我底行为一致；从我自己，从别人都应该要求这种言行一致。这就变成了我底生活之标语了。”

薇娜毕业后就回到家里。那时她底父母都住在乡间。恬静、朴素、美丽的乡村环境对下这少女底心灵之发展自然有很大的帮助。她由母亲底介绍又读到当时著名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如《俄语》、《现代人》等四五种。这时候的薇娜有了相当的学识，又有富裕的家财，更有迷人的美貌，似乎在她底前面就有一个幸福的将来。她底命运，哪个女子不羡慕呢？

然而在她自己，事实却不是如此。她说过：“有一夜我从梦中醒来。这是夏天，人人都睡了，不过我们底两个亲戚还坐在阳台上闲谈。一个是母亲底妹子瓦伦加，一个是从嘴出来看我们的表姊。她们在谈论我底二妹利狄亚和我自己。瓦伦加说：‘利狄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女人；她会是有用的人。然而薇娜却只是一个美丽的木偶。她倒很像那个挂在她房里的好看的红灯笼，在向的一面是很好看的，但在靠着墙壁的一面却是空的。’我把头埋在枕上，伤心地哭着。这时候一边流

着眼泪，一边问我自己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

在这时候她已由叔父底介绍开始读虚无主义之创始者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底著作了，但她还不能了解这些著作。在乡间过了几个月安闲的无目的生活，薇娜觉得厌烦起来了。她想至少应该找一点事做才行。做女伶去演戏么？做女教员么？她想了许久。做女伶她不十分愿意；而做教员，她又觉得自己底能力不够。她底三妹爱屋金尼在预备进女学校的时候，曾在她那里补习功课，她由这经验明白自己还没有做教员的能力。那么又怎么办呢？

这时候俄国妇女要求高等教育的运动已经开始了。苏斯洛瓦女士在苏黎世得着医科博士学位的消息传到俄国，感动了不少的女郎，薇娜由此也找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她决定到苏黎世去游学。

在我底体内潜伏着的生活力之过度激动了我；在从学校围墙内出来之后，一个快乐的自由之感觉便出现到表面上了。我走进生活之门时，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带着这种丰富的快乐；这种丰富的快乐就成了我底利他的渴望之真实的源泉。我底高扬的心情要求着活动，而这个无法使我有表现我底人格之机会的生活便是难堪的。我又拿我自己和我底友人相比，我觉得我自己底环境是最幸福的，而且身心两方面又都健全。加以我又觉得我比较我周围的任何人更为人所爱。这两件事都使我感动，并且唤醒了一个柔和的然而又是含糊的感恩之感情。

感激什么人呢？感激那般爱我而不妒嫉我的朋友，感激那些成功地帮助我得以名列第一的教员们，感激那在我底端庄的斯巴达式的童年时代以及后来以绝大的关心看待我，叫我得享受到足以使一个从学校出来的少女心憎一切事物的我底父母，感激那以金色光芒来洗浴田野的太阳，感激那夜间在花园之上照耀着的明星。……这不是为某一件特别事情而感激某一个人，这是为着万事而感激万人。我愿为了世界之祝福，生活之祝福，而感谢某人。我愿做一点好事……这件好事是应该同时利于自己又利于别人的。

阿慕斯科^①底一篇小说告诉过我们：圣母如何应在寺院之顶，向着世界伸出地底手。这双手伸长达到了那些孤独的人底不可见的泪珠上面，从这双手上又流出金线来，它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给与所有需要着爱和同情的人们。诚然这确是一幅图画，描绘出每个健全的青年灵魂在快乐的庇荫之下走进生活场中时所经验到的幸福的心境。难道谁不曾经过这种时期：站在寺院底顶，不带一点哲理的推论或怜悯心，单单渴望来散布福善之黄金么？难道谁不曾经过这种时期：愿意周围的一切都得与他（或她）相和谐，都是健全的、快乐的、美丽的与强壮的么？

在我底周围是乡村。在那里是污秽、是贫穷、是疾

① 阿慕斯科(Eliza Orzeszko)，波兰女小说家。

病、是愚昧。然而从苏斯洛瓦伸出金线来达到我身边，然后又继续伸出去，到了乡村，到了乡村的居民，再伸出去又到了一般的人民，到了我们底本国，又及于全人类。

除了这种心境外我还受着别人底善言之影响。从我底叔父，我第一次知道了功利论底学说。他给了我一篇关于这题目的论文。叔父说：“每个人底目的应该是最大多数人底最大善。”这个思想曾给我以深的印象。

有了这种心境和影响，薇娜便不能再在乡村中住下去了。她说：“一想起这一个无活动、无高远目标的生活，我就不能够忍受下去。那一份载着苏斯洛瓦成功消息的杂志便决定了我底将来。”她便预备去进大学，但还没有决定或者进外国的大学或者就进喀山的大学。然而她底父亲不赞成她底决定，觉得一个女子进大学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她底父母便把她带到喀山城里去，想拿社会交际的兴趣来分她底心，使她把到外国求学的热心冷淡了。他们底计划多少有点效验，因为到了喀山，薇娜认识了她父亲底一位好友底儿子威克多洛维奇，不到一年后他就做了她底丈夫。威克多洛维奇是学法律的，这时在做检察官。

在喀山，薇娜并不曾进大学，却进了跳舞场，她后来也感到社交底兴趣了。但不久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乡间。威克多洛维奇常来看她，他对于她进大学的计划很表同情，而且在思想上又和她相同。所以在一八七〇年十月薇娜便和他结婚了。

薇娜底生活在结婚后并不曾变更，而她底求学之心却是更切了。这时候她不必得着父母底允许就可以到瑞士苏黎世去了，不过她自己须得筹一笔路费。她底丈夫又教她以几何代数，因为她所学过的数学知识很浅。她那时候“已相信犯罪是从贫穷与愚昧中生出来的，又把一个检察官底工作视为可怕的了”。她后来到底劝服了她底丈夫辞去检察官，准备和她一起到苏黎世研究医学。但两个人底旅费、学费一时不能筹到，薇娜便先到喀山，在那里和她底二妹利狄亚（她已在女学校毕业）同进喀山大学。大学里最好的教授是解剖学教授奈夏弗特，最得学生底欢迎。但后来奈夏弗特忽然被辞退了，因为他底同事妒嫉他，向政府告密说他有鼓动青年学生的嫌疑。奈夏弗特去职的消息使得薇娜姊妹愤怒异常，她们便离开了喀山。一八七二年春天，薇娜夫妇和利狄亚一起到苏黎世去了。

二

到了瑞士，薇娜便进了苏黎世大学医科，同时又常常参加社会党底集会。后来她底意见和她丈夫底有了分歧，他日趋于保守，她却一天天走向革命的路上，她底二妹利狄亚先她加入当时学生底革命团体，她本人在二十一岁也加入了这个革命团体。她开始相信不公平的、掠夺的经济制度是社会罪恶的泉源，要医治这种罪恶，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推翻专制的、特权的阶级为日的，由激烈的战争把这种制度改变过来。

后来这个团体的会员四处分散了，有的回到俄国，有的到法国等处。薇娜还留在瑞士，她又在伯尔尼大学医科继续研究了一年多。她预备将来回到乡间做医生。

同时她底同志们在国内异常活动。但在一八七五年秋大批的逮捕发生了。她底同志们大部分都进了监狱。然而革命的宣传运动是要继续下去的。柴可夫斯基团体重要团员拉丹·孙要求薇娜回国继续进行团体的工作。这时候薇娜已经和她底丈夫脱离关系了。然而她底毕业期却在五六个月以后。“我已经想好了博士论文底题目，在一两个月以内我就要开始动笔了。母亲底希望，亲友们底希望，自爱，虚荣！我已经明明望见那目标了，然而我又不得不亲手毁了这一切。我仔细分析过这问题底两方面，我分析了我底朋友们所站的那一边，他们把自己底一切同他们底全心灵一起一点不留地献给了事业，他们完全轻视了这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幸福，他们不屈从于亲戚们底自私心，也不屈服于他们底个人的野心；我也曾记起那些还在监狱中受苦，先我们而经历了艰难惨苦的命运的人们；我又明白我自己已经有了做医生所必需的知识，只缺乏一张正式的证书而已；在这时候我底明白国内情形的朋友们说现在国内正需要着我，而且我对于我多年所预备来做的工作是能够有用处的，所以我最后便决定回国去了，为了使我底行为不致和我底言论相反。我底决定是很谨慎而坚定的，结果我后来并不曾有一次丝毫的悔恨。”在一八七五年十二月薇娜便离开瑞士回俄国了。

这时候她底二妹利狄亚早在莫斯科被捕，她底母亲受此

打击后身体异常衰弱，正预备到瑞士去养病。薇娜回国的事是她底母亲所万料不到的。薇娜在彼得堡会见了母亲，但几天之后母亲便带了爱屋金尼与阿尔加到瑞士去了。

在她底母亲去国后，薇娜便定居在莫斯科。她在革命团体中担任的工作是和在监狱中的同志暗通消息。“我一整天写着暗号的信函，在晚上我便到肮脏的酒店去会某一些品性可疑的人物；或者到大街上和阴暗的莫斯科小巷里去和宪兵与警察会面，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出卖某一方面，看见他们底样子真使我讨厌。我们计划救出几个同志，但结果除了花去不少的钱外，什么也没有成功。”

这时候革命党底内部很空虚，政府底压迫又很厉害，她底同志们一时又无法严密地组织起来，因此工作进行得很少有效。薇娜很觉灰心，后来听从一个拉甫洛夫派的同志底劝告，把她底工作交给别人，离开了莫斯科，“到民间去”了。她先到Y地，六个星期之后在医药局受医生助手业的试验，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后来她又到喀山，和她底丈夫把离婚的事办妥了，从此“我就恢复了我底处女底姓名了”。

我回到圣彼得堡后，在内外科医生学院通过了产婆业之试验。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我底一切的私事都定夺了。我毅然决然地埋葬了我底过去。从我底二十四岁这一年一起，我底生涯便完全和俄国革命运动底命运相关联着了。

三

在一八七六年末俄国革命团体分为两大派：宣传者与暴动者。前一派普遍于北部，后一派底势力则在南部。前一派多少赞成拉甫洛夫底《前进报》底见解，而后一派则拥护巴枯宁底《革命问答》。两派都同意于一点，即一切的活动都应集中在普通的人民中间。然而这两派却把活动底性质看得不同。宣传者把人民看成一张白纸，他们应该在这纸上染上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主张把人民在道德上、精神上提高到他们自己底水平线，在人民中组织成团结坚固的，有知识的少数人，这少数在一个组织的革命之时代中便应该负责来公布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理想。……反之暴动者不仅没有教导人民的意思，却反而主张我们应该从人民学习。依他们底意见，人民底生活情形就带着社会主义色彩，人民急盼着社会革命之发生，人民憎恨现存制度，正确地说他们无时不反抗它，这反抗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又是消极的，但永远是在反叛的状态中。知识阶级底责任就是在把这一切个人的反抗和小的骚动结合起来，融合成一个大的激潮。……

南部的暴动者在作过了壮烈的牺牲之后就在监狱里，在流放地中，在绞刑台上消灭了，一点遗迹都没有，剩下的几位“老将”也只能加入到北部的新团体中，因为北部的革命党很

重视组织问题，而且正从事于严密的组织。在一八七六年秋天，北部新团体土地与自由社便成立了。领袖人物就是拉丹孙，薇娜也是一个发起人。这个新团体看出了以前南北两派底缺点，所以又完成了它自己底纲领。这纲领底基本思想就是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上都有其自己底眼界，这和他们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所形成的道德的、精神的、概念之水平线相符合；俄国人民也是如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应该观察人民对于政治的与经济的问题之态度。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要在变更统治的制度之先来改变这些已经确立的见解是很难的事。所以革命党应该利用当时人民中间普遍的态度、渴望、愿望等等来做一个出发点，把在人民底意识中已经成熟了的理想大书在革命的旗帜上，这种理想在经济问题上就是农民在耕种时可永远领有土地。土地公有以及由公社没收一切土地之理想也是与社会主义原理相合的。在政治方面极力打破人民对于沙皇底信仰，用关系人民底切身问题的事实来给他们证实沙皇不是保护人民的。同时革命党人又应该到民间去，生活在人民之中，由此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教导他们。这样的纲领就是后来所谓民粹派底纲领，在早年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底著作中已有了根基了。

这个新团体取名为“土地与自由”，乃是纪念六十年代旧土地与自由社的意思。新团体成立后的一件著名的活动便是在圣彼得堡喀山礼拜堂的示威运动，结果被捕去多人。薇娜一部分同志的活动中心地是在萨马拉省，在一八七七年八月薇娜本人也到了那里，做了一个医生。

从这时候起薇娜便深深地明白人民之疾苦了。她底心情，她底生活，她底工作和其他无数到民间去的革命的男女青年底是相同的。在这里我也无详细描写的必要了。这的确是不愉快的生活。你听薇娜自己说：“当我给这些不幸的人配药的时候，我底眼泪常常一串串地从眼眶里流下来；失望捉住了我。难道这个真正可怕的贫穷会有终结的时候么？难道这一切药方在这四周的污秽之中不算是一个伪善么？难道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能够有一点反抗的思想么？难道对这般被物质的营养完全毁坏了的人民说反抗，说奋斗，不算是一个反面的讥讽么？”

薇娜这样地劳苦了三个月之后，一个女革命党人在萨马拉被捕了，在她底行李中搜出了圣彼得堡朋友们致薇娜等人的信函，同时圣彼得堡同志派加特科夫斯基来召回薇娜。后来宪兵来搜寻薇娜的时候，她已经去了一个礼拜了。

此后薇娜便和梭洛维叶夫、加特科夫斯基二人在伏尔加省从事宣传工作。不久，“一九三三案件”底判决公布了，一部分的革命党人被释放出来。土地与自由社因此增加了不少的社员，这般新出狱的青年虽然才受过了无穷的痛苦，而且个个弄得身体异常衰弱，好似从坟墓出来的一般。但是一出了狱，会见了他们底活泼的同志，他们自己又忘掉了一切的苦痛，重新鼓起了热情，再来为革命作一次牺牲。革命运动比较算有生气了。薇娜便和另一个同志到彼得堡去欢迎新出狱的同志们。在彼得堡，薇娜认识了不少七十年代初年便露了头角的革命党人。她和苏菲亚相识也是在此时。她说：“我已经

听到了不少对于她^①的热烈的赞美。至于我呢，我被她底自由与大量的脾气和性质、她底质朴，她底举止之温柔所迷着了。我们底友情一直继续到她死，就是那时候在监狱中她还嘱咐她底同伴要‘保护苏堪诺夫与薇娜奇加^②’呢。

不久薇娜又回到乡间去了。这一次她在彼脱夫斯克县得了一个位置。她底三妹爱厘金尼刚在沙拉托夫省医药局受过外科医生助手业之试验，也跑来帮助她。她们两姊妹便很顺利地开始工作了。

对于农民，女医生倒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怪事。他们甚至跑去问教士：女医生是只给女人治病呢，还是医疗一切的病人？他们得到回答后，便成群结队地去找薇娜。一天从早到晚薇娜底茅屋总是不断病人底足迹。薇娜底名誉很快地传到了她所服务的三镇之外，后来甚至传遍本县，传到别一县了。她所需要的药品都是从医药局领来的。她能够尽量地把他们所需要的药品施给他们。

有一个不幸的农妇流着血，走了四五十里路来找我医治。她回到家里向人说，我一触到她底伤处，她底血便停止了。别的人又带来水和煤油，请求我在上面“念一遍咒语”，因为他们听说我用符咒治病，得了惊异的成功。他们又带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来，这些都是失明十五年或二十年的盲人，他们想求我帮助，使他们在临死前得见一

① 指苏菲亚

② 薇娜奇加：薇娜的昵称。

次光明。……第一个月我接待了八百个病人，十个月之内我一共接待了五千个病人。……自然，要是没有我底三妹底帮助，这个大工作是我底力量所不能够完成的。

我们不久开设了一所学校。爱屋金尼告诉农民说如果他们肯把孩子送来，她愿意教授他们，不要一点报酬。我们备办有教科书和纸笔等等；父亲们用不着花钱买什么。立刻便有了二十五个男女学生聚集在我们底屋里。我们这三镇里没有一所学校，有些学生还是从十五英里外的邻村来的。有成年的学生，也有小孩。有几个农民还要求我底三妹教他们学算术，这是计算各种村镇的帐目所不可缺的。不久我底三妹就得着称号：“我们底黄金般心的小教员。”

我们把诊疗室和学校的工作做完之后，便带着我们出诊的器具和一本书走到一个农家去。在那一家这晚上就会成了一个节日。这一家的主人便连忙出去叫他底邻人和亲友们来，听我们开始诵读带来的书籍；到了十点或十一点钟他们还要求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常常读奈克拉索夫底诗，有时候也读莱芒托夫等人底诗，或者杂志上的论文，或者老莫夫等人底小说以及几篇历史的文选等等。我们常有机会谈起农民的生活状况，谈起土地，以及他们对于地主，对于官吏的关系。我们又论到农民底需要，听他们底诉苦，他们底希望，同情他们底忧愁，分享他们底同情与嫌恨。有时他们还要求我们把书留下，以便自己可以重读他们所喜欢的那一章、一节，甚至把它读

熟，能够背诵出来。他们又请我们到村会里去揭发书吏底奸谋，他底腐败，他底贪婪，因此便可保护“密尔”。他们想叫爱屋金尼做村书吏，现在的村书吏齐某是农民所极憎恶的。他们请求我们到镇法庭而且常到镇署里面去，使书吏不能够再辱骂他们，侮辱他们，虐待他们。农民们说：“他在你们底面前会羞死的。”当我们最后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得不给他们以庄重的约言，说一定会使他们底孩子们也像我们现在这样“博学”。

我们底生活，以及我们和那般觉得光明就在眼前的质朴的农民间的关系有一种迷人的美，就在如今，我每一回忆起，也常感到莫大的快乐；每一刻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被需要的，我们还不是多余无用的，自己也感到一种安慰。这种觉得自己还能够有益于人的意识便是把俄国青年吸引到乡村去的磁力。只有在那里，一个人才能够有一个纯洁的心灵和平静的良心，如果它们就把我们从生活，从活动拖开了，我们也无一点怨恨的。

四

然而这样的幸福，薇娜姊妹也不能够享受多久。后来本县的书吏和教士们已开始对她们姊妹采取攻击和诬陷的态度了。薇娜们已有了革命党的嫌疑了。她们底位置也很难继续下去。不久，梭洛维叶夫特别来乡间和薇娜商量一件重大的计划，他抱了绝大的决心要到圣彼得堡去刺杀沙皇。这时候

虚无党的运动已开始进入恐怖主义时代了。沙苏丽奇向特列斯科夫放过了枪，司特普尼克杀过了麦孙采夫将军。而且暗杀沙皇的事在一八六六年加拉考左夫就实行过了（虽然得了失败的结局）。“到民间去”的运动有什么效果呢？一八七三至七五年的成绩明摆在革命党人底眼前：——监狱、流放、死刑。俄国青年中的精英都这样地白白牺牲了，恰如司特普尼克所说：“这些人又过于理想化了，……他们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他们底信仰是‘社会主义’，他们底上帝是‘人民’。纵然他们所见的事实和他们底理想相反，他们依然坚决地相信有一天革命会爆发的；恰像生在中世纪的人迷信着世界末日底裁判快要到临了那样。然而残酷的实际对于他们底热诚和信仰给了一个大的打击，把他们所崇拜的上帝（人民）底真面目显露出来，这和他们从来所梦想的并不相同。这时候，他们依然愿为人民牺牲一切。不过他们在这第一次失望之后，已经失掉了奋斗的热狂和勇气，看不出前途有胜利的希望，于是宁愿抛弃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便走向殉道的路上……以至诚博爱之心，严格的态度与温和的微笑走上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水同消失了。”

和平的“到民间去”的宣传运动底结果，证明出来这无异乎以人头来碰铜墙铁壁，是不能够摧毁敌人底营垒的。而且反把俄国青年中的精英当作孤注一掷，送到政府底血盆大口中做鱼肉而已。专制政府在一阵狂乱的畏惧之际，便大行恐怖政策，旧有的监狱容不下无数的传道者，又建造起新的来。“稍有一点嫌疑便足以被逮捕了。一篇演说；一封从‘到民间去’的友

人处来的信函；从受着惊吓不知所措的十二岁小孩底口中供出来的一两句话，也足以使嫌疑者陷身囹圄了。在那里，俄罗斯国民中的精英被严酷的监狱制度摧残殆尽；在那里，人间的青年之花被无情的暴风雨打得枝叶凋零。”（司特普尼克语）

过去是惨痛的；未来又是黑暗忧郁的。然而革命运动也不能停止，于是那般怀着激昂的心情急欲行动的革命党人便不得不找寻一种新的方法。“实在另一种人已经起来了。在远处的天边突然现出了一个幽暗的人形，被一股地狱之光黑耀着，他有一个骄傲的态度，还有表示着憎恨和大胆的相貌，在惊吓着的人群中走过，以坚定的脚步走进了历史底舞台。这就是恐怖主义者！”（司特普尼克语）

梭洛维叶夫便是一个先锋！他对薇娜说：“皇帝底死会使得社会生活起一个变动；空气会变成清洁；知识阶级不会再徘徊观望，他们会开始在人民中作广大而有效的活动。一大串少壮的生机和精力会流入乡间。要实际地影响着全俄农民底生活，只有靠着这种大的生机和精力，单靠着我们个人底热心是不够的。”

同时使梭洛维叶夫底此种决心更加坚强的就是沙皇日趋反动的事实。当全俄人民为沙苏丽奇底赦免而欢呼的时候，沙皇一家人却去慰问特列颇夫。“一九三三案件”判决后，元老院要求沙皇减刑，而沙皇反把刑罚加重了。把被释放了的人又重新逮捕起来，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若放过了沙皇，单暗杀一般官僚岂不是可笑的事么？梭洛维叶夫底决心是和磐石般坚定了。薇娜说：“我想纵然我们大家都

反对他底计划，他也一定会去实行的。而且他绝对地相信他底成功。当我向他说这次暗杀一旦失败就会产生更厉害的反动的时候，他便以如此的信仰和热诚向我确说那失败是完全想不到的，他自然不能在失败后逃命，他当用全力量，用全机会来求成功；因此我也只能愿望他底希望得以实现了。这样我们就和这个人分离了，他把英雄底勇敢，禁欲主义者底自己否定和儿童底温良三种特性结合在一起而成了一个殉道者。”

四月二日梭洛维叶夫向沙皇放了数枪均未命中，沙皇安然无恙，而梭洛维叶夫在绞刑台上把性命牺牲了！政府底反动是更加厉害了。不久警察们知道了薇娜与梭洛维叶夫的关系便去逮捕她，幸而薇娜姊妹已经得到同志们底警告先一天逃掉了。但薇娜在乡间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后来书吏散布谣言说我们已被捕、爱屋金尼已受绞刑的时候，农民们常常夜间去会我们底朋友，探听这消息是否真实。他们安慰地，快活地回到家里。在几个月以后我遇见一个曾住在我们的附近的女郎，她抱着我底颈项热烈地祝贺我：‘你们并不曾在那里白白地生活了！’……”

从此薇娜便终止了“到民间去”的和平的宣传运动，而决心到土地与自由社本部中去帮助同志们继续进行暗杀沙皇的工作。

然而梭洛维叶夫底枪弹引起了一部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对团体的战略之疑惑。在伏若奈次的大会后，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两个团体：即民意社与黑分派。薇娜自然是属于民意社。这在本书前章内已经说过了。

五

伏若奈次大会还没有把土地与自由社底命运完全决定，因为到会的人大部分都倾向于恐怖主义的。就把马克思主义者蒲列哈诺夫气走了。当时薇娜曾叫道：“朋友们，应该把他叫回来！”然而米海洛夫说：“不！”蒲列哈诺夫派的四个同志也起来跟着他去了，然而在低声商议了一阵之后又回到会场里来。当时有人提议表决蒲列哈诺夫是否还属于土地与自由社，结果多数表决承认蒲列哈诺夫已脱离了。伏若奈次大会就此完毕。加特科夫斯基保护着薇娜到圣彼得堡。土地与自由社又在东斯诸开会，蒲列哈诺夫派的重要人物都没有到场。这会议中便决定将土地与自由社名称取消，两派另组织新团体。两派举出代表商议旧团体遗物底处置，结果商定把印刷所拨归黑分派，党中存款由两派平均分配。然而这时候担任旧团体经费的同志利索加布已被捕，因在监狱中，他底财产已被告发他的人狄利可吞没了。所以两派都不能分款。

民意社成立后不久便得着同情政治恐怖之纲领的死之胜利团同志捐款二万三千卢布。同时米海洛夫底小团体又把印刷部组织成功。薇娜这一派的新团体因为主张先推翻贵族政治，以人民底意志来代替独夫底意志，故取名为民意社。

民意社执行委员会也就成立起来了。委员会底一件工作就是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同时又在工人与知识阶级二者中间从事积极的宣传。热利亚博夫在哈可夫；科洛克维奇与薇娜

在阿德沙；米海洛夫在莫斯科；加特科夫斯基等在圣彼得堡进行这种工作。

执行委员会会员自励的章程是异常严厉的，重要的条文是：第一，会员应允许把本人底心力、智力完全奉献与革命工作，为了革命工作的缘故，应忘却一切亲属底关系，一切个人的同情、爱与友情；第二，在必要时牺牲本人底生命，不得顾及一切，不得顾惜一切；第三，会员不得有私人的财产，一切应该与团体相共；第四，完全献身于秘密结社，抛弃一切个人的欲望，服从社内大多数底意志；第五，会员对于团体之计划与提议及其他有关事务应绝对保守秘密；第六，（不重要，故略），第七，退出团体时，对于团体活动之性质以及退出人以前所参与、所目睹的工作应严守沉默。

薇娜对于这章程的批评是：“这些要求是太严了，然而对于燃烧着革命的精神，带着不畏一切，但知前进，决不退后或左右顾盼的那种强烈的感情的人，这也是容易实行的。如果这些要求不是十分迫切，如果它们不曾如此深刻地激动了人底精神，我们决不会以它们为满足的；然而现在它们以它们底崇高而严格的性质把我们提高了，而且使我们去掉了一切琐碎的、私人的考量。一个人更活鲜鲜地觉得在他（或她）底体内已有了一个理想存在着，而且应该有一个理想存在着。”

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几次计划，其失败及其最后的成功，我在前章内已叙述过了。现在只把薇娜底工作略说一说。薇娜把她底三妹找到圣彼得堡来代替她底职务，她本人便带

着炸药到阿德沙去，原来当时委员会在莫斯科，哈可夫、阿德沙三处安置炸药，预备炸毁沙皇从克里米回京的专车。她底妹妹听了薇娜底主张，便和加特科夫斯基同住，谁知竟因此送掉加特科夫斯基底性命。爱屋金尼把《民意杂志》许多份给了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后来被她底未婚夫告发，在警察署供出这是某某人给她的。于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爱屋金尼与加特科夫斯基一起被捕，在屋子里宪兵搜出了炸药和一张地图^①，在地图上某一个地方画了一个“十”字，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沙皇用餐之地。加特科夫斯基在第二年被处死刑，而爱屋金尼也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薇娜、启巴尔次奇、福洛伦科、科洛克维奇和女同志奈伯德瓦等人在阿德沙掘地道、埋炸药，但未到成功的时候，一个同志哥登堡带了委员会底命令来通知他们，莫斯科一处的炸药不够，要把这里的炸药运一部分到莫斯科去。哥登堡在阿德沙住了两天便回去了，但在路上就被捕于E地。不久薇娜们又得到消息说沙皇底专车不经过阿德沙了，于是福洛伦科和奈伯德瓦先离开阿德沙。十二月启巴尔次奇、次年正月科洛克维奇也先后去了。薇娜还留在阿德沙和几个本地同志一起进行宣传工作。

莫斯科地雷到底爆炸了，但没有炸伤沙皇，反而失去了西利亚夫。哈杜林炸毁了冬宫，而不幸沙皇又居然脱险。

一八八〇年三四月间，沙布林和苏菲亚先后到了阿德沙，

① 地图，指冬宫图。

说沙皇夏天到克里米时大概会经过此地，预备再作安置地雷之举，费了许多的功夫，结果仍是失败。薇娜等又图谋刺杀以残暴著名的阿德沙总督多某，但在垂成之际多某忽然被调开了。革命党人为安地雷而开设的店铺也关了门，同志又先后走了。薇娜在一八八〇年七月也离开了阿德沙到了彼得堡，薇娜受委员会底委派为外国通信的书记，她对于外国宣传方面尽了不少的力。

过后，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底计划终于大功告成，详情我在前章已经叙述过了。

六

薇娜并未参加掷炸弹的工作。“听从委员会底命令，我留在家里一直到三月一日午后二点钟，以便接待乳酪店的同志们，因为波格达洛维奇应该在沙皇一行人经过那条街一小时以前离开店铺，而雅基莫瓦则应在得到信号知道沙皇已经到了涅瓦大街时立刻离去。第三个人福洛伦科应管着通电流的事，如果工作已完成，他侥幸还不致于同归于尽，就应该装作一个顾客的样子离开店铺。”

在午前十点钟福洛伦科来看我。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看见他从他带来的包裹里取出一瓶红酒，一根香肠放在桌子上，预备用早餐。在经过了我们昨天的决定以及一晚不睡眠的预备之后，在我十分激动的状态之中，吃

饭喝酒的事在我看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了。“你在做什么？”我差不多带着恐怖地问道。我看见这个命定了在几点钟后就会与地雷同归于尽的人，居然如此从容不迫地吃喝，真是不能不吃惊了。

“我必须完全据有着我底精力才行。”我底同志安静地答复道，他就默默地吃起来了。

你看，这个人对于那不可思议的死居然能如此地蔑视，而且能压抑下一切热烈的感情，明白地认识要执行他所担任的职务必须完全据有自己底精力，而且也能做到了这样镇静的地步，在这种人底面前，无怪乎薇娜“只能带着沉默的赞叹而低头了”。

然而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走过乳酪店，福洛伦科也没有死。到底是洛林奈屋斯基一炸弹断送了沙皇底性命。但这次计划底变更全靠苏菲亚底临机应变之力，薇娜这时还不知道，当伊沙列夫等来报告沙皇未走过 M. S. 街的消息时，薇娜以为这一次革命党人又大遭失败了。薇娜便出去打听消息，这时候一切都是很安静的，然而在一个半小时以后她到了乌斯彭斯基家，I. P. 君便来报告说曾有炸弹爆炸，盛传沙皇已被刺死了。

我跑回家，街上议论纷纷，人们非常激动。人们谈到沙皇，他的伤，谈到血和死。我走进我底房屋，看见那些毫不知道这事变的朋友们的时候，我是十分激动，我差不多不能报告沙皇底死讯了。我哭罢，我们中许多人都

哭着，那个十年来在我们底眼前谋杀了青年俄罗斯的可恨的魔鬼现在消灭了；那些我们底千百个同志们所遭受的监禁、流亡、死刑、拷问、虐待之恐怖，我们底殉道者之血都被这个由我们亲手所流出来的沙皇底血所报偿了。我们底肩上的重担现在落下来了；反动应该消灭而让步于一个新的俄罗斯了。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中，我们底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俄国底较好的未来之希望上面。不久苏堪诺夫来了，他又是快乐又是激动，他拥抱我们，以未来的名义祝贺我们大家……

三月一日事件以后，参加这事件的主要人物相继被捕，执行委员会命令薇娜等人暂时离开彼得堡躲避一下，然而薇娜不肯听从。四月二日警察居然来到她家，但幸而她已在一个多小时以前搬走了。民意社底重要文件也因此而得以保全。

那一天，四月三日是我们底杀皇帝的同志被处刑的时期。天气非常之好，清明的天空只有一个光辉的春天之太阳照耀着；在街上雪正融化着。当我出门的时候，这景象已经完毕了，然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处刑的情景。我底心为思念苏菲亚与热利亚博夫而痛楚着，这时候我走进一辆车，在车上都是些看完了处刑回来的人。许多人的脸都激动了，但是却没有一点悲哀和忧愁的痕迹。一个穿着蓝色大衣的体面的市民恰恰坐在我底对面。他有黑发和暗黑的脸，他有竖起的胡须和发红的眼睛。他底

体面的面孔因激情而扭曲了，他真像是一个“阿卜利奇尼克”^①，预备来砍掉别人底头颅。

就在四月三日这一天，委员会又命令薇娜离开圣彼得堡赴阿德沙经营地方事务。十月下旬薇娜得着莫斯科同志的邀请，在次年三月十五日她到了莫斯科，但不久为警察所逼迫又去哈可夫。在六月里执行委员会剩余的委员又大半被捕了。狄可米若夫、阿香利娜早去外国，执行委员会在俄国的代表如今就只有薇娜一个人。所以十月十五日一个同情革命党的著作家米海诺夫斯基便从彼得堡代表学者尼可拉知底意见和薇娜交涉，说新政府愿与革命党人议和，要求革命党人放弃恐怖主义的战略。薇娜自然拒绝了政府底提议，但从此她却和米海诺夫斯基成了好友。

在十二月下旬一个消息从阿德沙传来，说该处的秘密印刷所被查抄，同志德加叶夫等五人被逮捕。这个消息给了薇娜当头一棒。她自述道：

我看见所有我底预备都等于零，所有我底工作都无效果。我所拟出的任何计划都被毁坏净尽，同时还损失了那些与我共同合作来实行这计划的人。我还生存着，但是一切都没有用处了。然而这时候青年的灵魂从远方带着希望在守着我，寻求道德的支持来维持他们底信仰。我能够后退么？我能够灰心么？我记着我当时所接到的

^① “阿卜利奇尼克”，暴君伊凡的一种特别卫队。

一封信。我所认识的一个青年女子，她是政治的亡命者，正受着警察底压迫，她写信给我说，在她底忧郁的灵魂之黑暗里只有一颗明星——这就是我。在我被捕以后她便卧倒在火车下自杀了。在我底周围万事都消灭，都毁坏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像尤哉·西底小说中的永久漂泊者那样，走着无边无尽的忧愁之路。

现在我还过着一种两层生活，甚至比前几个月更苦了，我一方面过着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方面过着为自己的内心生活。在外表上我不得不保持一个安静勇敢的面目，这我做到了；然而在夜之沉寂里我便会以苦痛的焦虑来思考：“末日”会到来吗？“我底末日？”到了早晨我就会戴上我底面具开始我底工作。当米海诺夫斯基为了上述的目的来访我的时候，临行时曾问起我底计划。我以象征的语句回答道：“我要把断了的全线集起来系在一起。”米海诺夫斯基用双手捧着我底头，亲吻我底脸。只有后来我读了他死后发表的他底遗诗，我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要吻我，我想这是因为他被我的坚守目的之那种坚定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

一八八四年二月十日薇娜被捕了。她之被捕完全由于德加叶夫底告发。德加叶夫很早就为警察所收买了。阿德沙秘密印刷所之被查抄，德加叶夫不能无嫌疑，他本人虽然也被捉去了，但这是警察署底一种策略，不久就把他放了出来，使咱们再有一次机会来出卖薇娜（德加叶夫在一月二十三日见薇

娜时，假称他自己是逃狱出来的)。虽然德加叶夫后来向同志们深表忏悔，并杀死那个和他接洽的政府方面代表苏德金(宪兵队官)以赎罪，然而薇娜却因了他，被活埋在人间地狱中过了二十三年。

七

亚历山大三世得到薇娜被捕的消息非常高兴，他大叫道：“谢谢天，那个可怕的妇人居然被逮捕了！”

在警察总局中，内务大臣脱尔斯道和薇娜讨论许多问题，最后他说：“可惜我没有时间，否则我一定会说得你明白你底错误。”薇娜冷然地答道：“我也可惜，我希望我能够说得你相信我们民意社底纲领。”这句话传到了检察官底耳里，他后来便问薇娜：“你能真正相信你可以说服脱尔斯道伯爵改信你们底信条么？”薇娜微笑地答复说：“为什么不呢？”

从此薇娜就被囚在彼得保罗垒中，一直到这年九月二十一日才被提到第一拘留所，第三天便受审于军事法庭。被告一共十四人，都是民意社底党员。

在每两个人中间站着一个拖刀的宪兵。互相拥抱或握手都是不可能的事。这倒很好，因为单是他们脸上的改变就足以使得人哭了。谁能够以安静的眼光看那些灰白淡黄的脸呢？它们在从前也曾是如此勇敢而充满着生命与快乐。……

当我在候审的监禁期中，我底四妹阿尔加知道我愛

花，曾几次要求送花与我，但裕宁狱中保罗全狱例只得让
罢。如今在这审判之日她给我带来一束美丽的蔷薇。这些
奇异的蔷薇给了我一个最温柔的回忆，它还伴着我走到
旁吕塞尔堡中。

当裁判官问薇娜有无最后的话要说的时候，她在众人注
目之际，在死一般的沉静中作了一篇动人的长篇演说叙述她
底生平，她底活动，她底理想。因为这一切我已在前面略略述
过了，为避免重复起见，我只把开端的两节译出来：

法庭已把自一八七九年以来我底革命活动考察过了。
检察官在他底公诉状里已表示出对于这些活动底性质以及
其范围之广大，他非常惊奇。然而这些犯罪也和一切其它的一
样有它们自己底历史。他们和我以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
当我被囚在堡垒中候审的时期内，我常自问，我底生活是否
能够走着一一条与这不同的路，我底生活之归宿地是否能够
不是这法庭而是其他的地方。每次我自己底答复都是：不能！

我底生活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中开始的。我对于自己
底性格之形成并不缺乏导师。我底家庭是聪明而慈爱的，所
以我决没有经验过新旧两代人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
我没有过物质上的缺乏，也从不曾为着日常用品或维持生活
而操过心。在十七岁，我在女学校毕了业，于是我才第一次
知道像我这样在如此幸福的环境中生活的，只是少数的人。
我是属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

之中——这一个空泛的观念唤起了我底义务思想：我既然幸而得属于有知识的少数人中间，那么我便有一种义务来帮助那般终日劳苦完全享受不到一点所谓文明之祝福的无知识的群众，这种思想又使我感到应该为我自己创造出一个趋于利他的生活目的。……

我底演说完毕时以及随后的休息时中，我底同志们与辩护士们底同情的眼光，握手与祝贺使我相信我底演说也产生了一个印象。……

判决下来了：我和七个同志（其中有六个是军官）判处绞刑。

审判完结后我回到我底囚室里，狱中监督（一个退职海军官佐）来向我说：“被判处死刑的军官们决定上呈文请求减刑。然而司特龙堡还未决定，他想知道你底意见，你以为他应该怎么做。他究竟顺着他底同伴底意思也请求减刑呢，或者他应该不参加他们底行动？”

“告诉司特龙堡说，我决不劝别人去做我自己在同样情形中所不会做的事。”

那个监督责备地望着我，他说：“你是何等残忍啊！”

我底母亲和四妹在判决后的星期六那一天来看我。我相信这是我们底最后一次会面了。

“我底母亲希望再把我底脸看一次，

她又转过身来。她又慢慢儿走回去；

我底妹子在开着的门前徘徊着，

从她底眼睛里露出了她所说不出的言语。”

受着这长久的悲哀的凝视，是何等地痛苦。她是否知道这就是我们底最后的相会么？再过一刻，我就不能忍下去了！然而门很重地关住了，永远关住了。……

薇娜并不曾受绞刑。在第八天傍晚典狱长便来向她宣读一纸公文道：“皇帝陛下开恩将汝之死罪减轻为终身惩戒。”从此她就被活埋在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中了。

八

薇娜进席吕塞尔堡的第一天便受着一件意外的侮辱。

……“你底手，”狱卒说。

我伸出手，在一阵响声之后，他打开铁链，取去了。所有的人都走开了，只剩下一个青年的军医。一个突然出现的中年妇人和我自己……

医生在桌旁坐下，背向着我，那女人便开始脱我底衣服。

几分钟以后我站着，全然是裸体了。

我感到苦痛么？不！

我羞愧么？不！

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我底灵魂飞开了。只剩下我底肉体，它感不到羞愧与道德上的痛苦。

医生站起来，在我底周围走着，记录下一些什么。然后走了。

他们带我到这里，要我在此住一生。是永不会离开这地方了！然而他们还以为应该把我底衣服脱光，应该记录下来我底身体上有无特别记号。

四年以前他们在我底三妹爱屋金尼受过审判后，曾这样对待过她。当内务大臣脱尔斯道在我被捕后和我会面时，我曾愤怒地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这简直是兽行，决不会有事。”

然而如今不管那个，他们又使我受着这同样的待遇了。我并不反抗，也不叫喊，我并不抓，也不咬。

在我底童年我读古罗马的历史时，知道罗马皇帝为了娱乐乱民的缘故，把青年基督教处女放在马戏场中，然后再放进狮子来吞噬她们。这读本怎么告诉我们呢？

那些女子并不叫喊，也不抵抗。

然而我也有我底上帝，我底宗教，自由、平等、博爱之宗教。为了这个教义底光荣，我也必须忍受一切。……

被囚禁入第二十六号囚室以后，薇娜开始了一种新生活。生活在死一般的沉寂的“活葬坟墓”中是多末可怕啊！小小的一间黑暗囚室就是她底天地。自由新鲜的空气对于她是无缘的了，人间的声音形色，她也是无福再接触到了。夜深梦回时躺在冰冷的铁床上，回想过去的梦景，回想生生地被人隔离了的母妹，我底薇娜不知流过若干部的眼泪。然而她并不灰心，并不绝望，她还自励道：

薇娜，你要鼓起勇气，要坚定！不要忘记俄国人民，

他们是怎样地生活着！记着世界上不幸的人，记着他们底摧残自身的苦工，他们底没有一点快乐的生活；记着屈辱、饥饿、疾病与贫苦。

要刚毅，纵然他们把你底母亲带走了，你不要哭，也不要为战斗的失败而哭，不要为死亡了的同志而哭。更不要为你底生命战场上的断井颓垣而哭！

不要怕。不要怕。在这神秘的静寂之中，在这聋哑的石墙之后，你底朋友们还是无形地存在着。在这里受着压迫的不单是你一个人，他们也在受苦。你要想到他们。他们虽是看不见的，不过他们总是在这里。你虽然听不见他们底声音，不过他们总是在这里。他们像脱了躯壳的灵魂一样，在守着你，保护你。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会发生的。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孤独的！

在第一年中薇娜底同囚者就死了十五个，有的是因侮辱狱官而被枪决的；有的是自缢的；有的是自己烧死的；有的是疯狂而死的；有的是患病而死的。薇娜自己也很悲哀。有一次他底邻人用叩壁法问她在做什么事，她便答复道：“我在想我底母亲，我在哭。”

事实上“我决不悔恨我曾选择了把我引到这地方来的一条路。这条路是我底意志选择了的，没有悔恨之余地了。我被剥去了锦衣华裳而穿上粗布的囚服，我从不曾有过一次的后悔。我也不曾因我受苦而后悔过。只有我每一想起了我底母亲（只有她一个人底影像在我底心头），我就因和她分离这件

事而感到绝大的悲哀了。”然而她底朋友们帮助她，使她得鼓起勇气征服了悲哀，而屹立地继续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瘠哑的墙壁开始说起话来；我能和我底朋友们通信息了。他们温柔地谈着，送了许多慈爱的音信来，席吕塞尔堡底冰层在他们底爱怜之热度中融化了。……”

在我底监禁之第五年中在一次未到预定的期间就失败了同盟绝食之后，我差不多更逼近了死路，而且也渴望着死，然而又不由自己地被人强迫生活着；我底精神充满了失望，我底神经完全震动了，那时候，我听见了一个同志（他是我们中天赋最高的人）说出的这些话。他不是和我说话，不过是在向别人说起我，我偶尔听见了。他说：“薇娜不单是属于她底朋友们的，她是属于俄国的。”……

这些话放了一个理想在我底面前，这是一个达不到的理想，然而我却不得不渴望着它。这些话给了我一个事业，努力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增加知识，奋斗，征服自己。要努力，要征服，要战胜自己！要战胜疾病、疯狂与死亡。

然而我应该怎样奋斗，怎样克服呢？要克服，这就是说要驱散那常常来威逼我底精神的黑暗，要驱逐开一切阻碍着我底眼睛，使它们见不着光明的东西，这意思就是说要忘掉一切。我力求忘掉一切。我驱散了一切的回忆，把它们全葬在一个坟墓里，十年来我埋葬了它们，十年来我努力忘掉了一切，十年来在我底意识中我底母亲已经等于死了；我对于故乡、活动、自由等等之渴望也都死了。

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了下来，以它底白色大笔掩盖了过去的一切。我呢？我还活着，我还很好。

九

三年过去了。有一天狱中监督给了犯人纸、笔，每人拿到一本抄本，说：“你们写满了就交进来，他们会另外给你们一本新的。”于是薇娜们便开始写起来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写在抄本上的是东克拉索夫底名诗《在俄国谁能自由和幸福？》中之一节。后来又写出我所记得的其他的诗。然而不久一个材料底新宝库发现了。乐巴丁由朋友们辗转几次把他自著的诗献与我：

Accursed be the day that lighted up my way,
To these grim walls, where I have said farewell
to Freedom's shade;
And curst the day of birth that brought me to
this earth,
And would not wisely let my mother kill the
child she made.

其余的五六节都是以这同样的“诅咒”开始的。……在我自由的时候，我从没有写过诗，但我这时忽然也想用诗句来回答他，又由朋友们做传话人把我底诗寄给乐巴丁：

Fortunate are we to give our strength that Liberty may live,
And though we suffer, though we die, we shall not shrink from destiny.
We shall endure, and not reproach but humbly peacefully approach
The kindly darkness waiting near……Our strong young brothers, they will hear
Our silent call to battle new, for freedom, and for justice too.

所有的同志都称许我底诗，而乐巴丁又把其中使得他感动而至于流泪的句子，敲回来给我。在这样的成功之后，我就有了要用诗句来表明我底情绪的欲望，我不得不常常把它压抑住。我便写了《献给我底母亲》、《我底妹妹》等诗。我底朋友们也仿效我，于是大家都写起诗来。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吟诗。立刻有十六个诗人出现了——人间地狱的席吕塞尔堡就成了诗神所居的仙山。每一个诗人都忙着敲出他底诗来。……他们中最严肃的人也被鼓舞起了，甚至我们底实在论者颇博夫与福洛伦科也各写出了一首诗。……在谁底生日或命名日，他有时便会得着感人的礼物，如乐巴丁在九月十七日送与我的：

Though buried in this fiendish tomb,
Our love surrounds you, close and dear,
And though deprived of light and room,

And kindred, yet your friends are near.

You are not utterly bereft,

For friendships loving words are left.

在我所宝爱的物件中有一个廉价的小磁像，这就是在审判后我们母女分别以前，母亲拿来祝福我的，我最小心地保藏着它，胜过我底其他的物品。……磁像底一面刻着一个精巧的人形跪在所谓上帝底母亲之前，另一面刻着一行字：“意外的快乐之最神圣的处女”。

我底母亲在祝福我的时候，说：“也许有时候甚至你也会明白一个意外的快乐的。”

当母亲在我们分别以前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底心情究竟是如何的呢？难道她是在说我如果有了再见着她的快乐，我底命运就会改变么？抑或她愿意拿她底祝福的话来鼓舞我、激励我么？抑或她要使我明白纵然生活受着残酷的摧残，而生存也不能够是完全没有快乐的么？

岁月一年一年地逝去了，然而快乐，再见着母亲的快乐依然不曾来。我渐渐地离开现在，不再向前看，只是回忆过去，我要在我底监狱生活的事实中找出母亲底祝福之应验。难道在席吕塞尔堡中还有快乐么？是，果然有。实在，如果那里没有了一点快乐，我们还能忍受下去而得生存至今么？最初的几年是初入监狱的人底最大难关，那时候我们底唯一快乐就是互相交谈，用敲壁法来彼此祝贺；来传诵彼此底诗；庆祝彼此底命名日；写几句

温柔慈爱的话秘密地夹在书里，藉此传递——这一切鼓舞我们，怡悦了我们底心！然而在这些快乐中都含得有苦味，含得有可以使人落泪的东西。……年华逝去了，又带来一些纯粹的快乐，这些快乐之第一个便是一份报。

我们这些人，住在广大世界中的人随便花几个铜板就可买得一份报，如果在报馆或报贩处订了一个月，每早晨还有人把报送到家里来。在我们看来，报实在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然而对于那般终日被活埋在窄小的囚室里与人间完全隔绝了的人，报底价值自然就很大了。无怪乎薇娜们要如此地看重它！

不久薇娜们又得到了一种快乐。靠一个医生底帮助，他们居然从圣彼得堡流通博物院借到了不少标本来，大家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其中莫洛索夫诸人对于自然科学本来就有根柢。薇娜也开始重温旧课。为什么警务部允许他们向博物院借标本呢？这是很奇怪的。莫洛索夫滑稽地上了一张呈文，说他在著一篇关于物质之组成的论文需要标本参考。这滑稽的理由居然瞒过了那般官僚。从此在四年之中席吕塞尔堡的囚犯居然得饱览博物院底关于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的丰富的采集，物理学的用器，动物学与组织学的标本了。

在这几年（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席吕塞尔堡居然变成了学院，囚人也变成学者了，狱吏对他们自然也很宽待，单独禁闭也废除了。囚人可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可以在外面订购科学书籍，可以从事著述。薇娜这时候也很潜心研究科

学。莫洛索夫底大著之一《物质之构造》就是在这时著成的。路加雪维奇写了一部大著《地球之无机的生活》，他出狱后将此书分两册出版，曾得地理学会底金奖牌与科学院底阿马托夫奖金。雅洛维奇专心于统计学的工作。其余的人有的在写回忆录，或小说。然而这种生活也是很苦的。譬如路加雪维奇画他底地质学上的图表时，他就没有颜料，只得用灯上的煤烟来代替黑色，用囚室墙壁的灰泥来代替蓝色，用自己底血来代替红色。古今的科学家中从没有一个人苦到这样，然而路加雪维奇毕竟成功了。

一〇

在一九〇二年监狱里又发生了事变，薇娜几乎因此送命，这是不可不详述的。

三月二日傍晚五点钟光景，我们散步归来后，忽然被锁在各人底囚室里。接着我听见每个囚室底门依次打开，这表示有什么不寻常的搜查发生了。我底门上的锁也开了，监督带了两三个宪兵进来。

“典狱长对于狱中的纷乱很觉不满，”他用沉闷的低声说，带着一个庄严的表情。“骚乱应该终止了，从今天起旧的规则要完全应用了。”他说完了预备走出去。

“这有什么事？什么样的骚乱呢？”我问道。“我们并没有一点错。我完全不懂得你们这通告底理由在哪里！”

“典狱长不满意。从今天起旧的规矩要完全应用了。别人不许我多说话。”

“这命令从圣彼得堡还是从本地官吏来的呢？”

“从本地官吏。”他说罢向着门走去。

他离开时我向他说道：“我们不能够服从规则。他们要缚我们底手足。他们甚至不要我们呼吸。我们是要违犯规则的。你们快预备惩戒室好了。”

他安静地回答道：“我们要预备的。”……

在十点钟的光景，我们听见在走廊的另一头，第二层楼一间囚室的门上小窗开了，它后又大声关闭了。十分钟后又听见同样的响声，有人说了几句话。第三次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忽然下一层又发出了骚动，过后那第二层楼的囚室打开了，宪兵从里面拖出了一个很重的东西来。这显然是在拖一个人底身体：一群宪兵拖着一个人底手脚。接着又是沙喉咙的呻吟声。全监狱的囚人都各站在囚室门前静听着。大家都以为谁在自杀了，都叫着禁卒，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宪兵答应了，他打开窗洞看了一下，不作一声。

突然典狱长叫道：“放开他！”

一定有人自缢了。……每个人都用手、脚、书、砖头打门，一面大叫“什么事发生了？”

典狱长答道：“二十八号违犯了狱规。”二十八号是伊凡诺夫。

什么！别人要自杀，他们叫做违犯狱规！所有的门

都大响。有人大叫“救命！”，左右上下都响起了震得人耳聋的敲门声。全监狱疯狂起来了。

第三次典狱长底声音又响了。他高声发命令道：“叫医生来！”一阵暴乱的疯狂占有了我们；监狱变成了疯人院了。

第二天早晨薇娜们照常出去散步时，伊凡诺夫底最邻近的同囚者便告诉他们昨夜事件底真相。伊凡诺夫因为讨厌监督常常从窗洞看他，他便贴了一张纸在窗洞玻璃上。监督叫他撕去，他不肯，因此发生冲突。监督叫了宪兵来缚住他底手足，给他穿上“紧背心”，拖他到“惩戒室”去。刚把他拖出去，他便发了癫痫病（据医生后来说），典狱长便叫“放开他”，薇娜误以为是伊凡诺夫自杀了。

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听完了这故事。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样的事情在明天，在后天，在——是会再发生的。要忍受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既没有体力，也没有心力来忍受它们。我们应该抵抗，然而应该如何抵抗呢？要放过这件事，一点也不抗议，我们实在想不到！我们会被压倒，闷死。我们必须行动，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一天苦痛的日子过去了。每个人都在想：还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要怎么办呢？在傍晚我想写一封短信给我底母亲，这封信的内容要使得警务部不肯把信送去。不过他们那般人总会因此关心席吕塞尔堡最近发生的事，自然不会不派人来考察这件事情。我写道：

“亲爱的小母亲：我正要给你写回信，然而狱中发生了一件事，把全监狱闹得天翻地覆。请求内务大臣和警务部部长立刻派人来考察详情。

你底薇娜 一九〇二年三月三日”

这封信监督自然不肯送出去，因为送出去就先要经过警务部。监督便拿回来叫薇娜改写，薇娜一定不肯。监督便说：“你如果不重写这封信，我们便把你以后通信的特权剥夺了。”

“那么你真要禁止我通信么？”薇娜问。

“不错。”这是监督底最后的答复。

忽然一个思想来到薇娜底脑中，好像有人在向她说：“只有由你底行动，你才知道你底力量。”

薇娜举起双手，猛力按着监督底两肩，扯落了他底肩章向地上抛。监督叫着：“你在做什么？”便鼠窜而去。

旧俄监狱例规，凡狱囚侮辱官长就应该判处死刑，而受侮辱的官长也当迁调他处。薇娜这举动含有舍身救同志的意思，因为她曾在席吕塞尔堡中亲见过两个同志（米拉科夫与麦秀根）因此而被枪决。

薇娜底举动果然有了效果。内务大臣派了代表考察监狱，访问薇娜诸人。他底报告上去，席吕塞尔堡底典狱长和监督被撤换了。薇娜未受惩罚，她底同志们在日夜焦虑，恐怕她会被处死刑。然而在五月开始监狱里建起断头台了。

宪兵抬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条到老狱底天井中来，在那里要建造什么东西。忽然福洛伦科报告说他从窗子里看见宪兵

抬进断头台底架了，全监狱都吃惊了。……安多诺夫说：“我们必须和薇娜诀别了。”

在监狱的雾中，万物都带着一个夸张的曲解的形状；生活充满了怪想，——我们底生活是一个连续的怪想。现在我们又是彷徨莫定；我们又是没有了引导人的“群盲”了，闭着眼睛，伸着手四处飘荡摸索，每走一步，我们底脚都会踏入一个深渊之中。

不错，宪兵搭了一座断头台，没有人知道这是为替谁搭的。然而既有了一座断头台，当然要杀掉一个人。谁应该被杀呢？这断头台是为谁搭的呢？这疑惑一直到五月四日破晓才消失了。

被绞杀的人不是薇娜，而是刺杀了内务大臣西皮雅金的巴尔马雪夫，他在临刑前一日才被带进席吕塞尔堡。这无怪乎别人要疑心断头台是为薇娜而搭的了。

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三日，薇娜和平地坐在囚室里，忽然典狱长带了几个宪兵进来向她宣告说：“皇帝陛下听从你母亲底哀求……开恩把你底终身服役罪减为二十年徒刑。”在一阵沉

① “群盲”：典出自比国梅特林克底戏剧。

默之后，他又说：“你底刑期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为止。”

“这是普遍的敕令，还是只适用于我一个人呢？”

“只适用于你一个人。现在你可以写信给你底亲人了。……”

囚室又被锁住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怀着深深的悲哀把这不幸的消息用叩壁法报告与我底同志们（因为这开恩对我算是很大的不幸）。这灾祸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底坚决而勇敢的母亲如何能够“哀求”沙皇对我开恩呢？她曾经不流一滴泪，不示一点弱，先后送别了她底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两个女儿；而且当她和我告别的时候，她不是允许过我决不向沙皇要求减刑么？我相信她，犹如相信我自己。她如今怎样了，什么事会使得她违背了她同我分别时所给我的庄重的诺言呢？……

去请求沙皇开恩；我底母亲便违背了我底意愿；我不要谁开恩；我愿和我底民意社的同志们同受艰苦，支持到底。如今母亲没问过我，不征求我底同意，也不使我知道，就去哀求沙皇开恩，破坏了我底生活。难道世间还有更大的侮辱么？她怎么能够这样做？她曾尊重过别人底信仰，别人底个性，而且曾把这种尊重教给多，她怎么能够这样做？如此粗暴地，如此专断地破坏了别人底生活！摧毁了别人底意志！沙皇底开恩，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

今。然而谁使我至于此呢？我底母亲，我底可爱而可敬的母亲！她屈辱了我，而她也屈辱了自己。我底同志们劝慰我说：“这不是你底错！”听见这样的话，我底心是何等地难受！

三天以后，解释来了。这是母亲底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她快要死了；她已卧病三月；她开过两次刀（西妹附笔说，因患癌症而受割治）。我曾是如此愤怒；我曾预备和我底世间最亲爱的人决绝，然而她现在已经一只足踏进死之门限了！我还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一个女儿还能把责备与抱怨送给她垂死的母亲么？我要回答她，我底信也许就是她所能见到的最后的信了。

我底残酷的心软化而谦卑了。在我底记忆中抱怨与责备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我对她所做过的一切的犯罪，和她对我所做过的一切的好处。我记起在我底童年，她给我建立了我底人格之根柢；在我被捕前的可怕的时期中，她又给了我以道德的支持；在监狱中候审时我们偶尔的会面给了我以绝大的快乐，在审判时我们底聚会又给了我以无限的安慰。我记起了一切。她所给与我的太多，太多了。而我，我曾给了她什么呢？最初由于早婚，其次由于革命活动及其结果把我和她永远分离开了，我曾给了她什么呢？只有忧愁，而且更有甚于忧愁的！……我一生所给与她的，除了忧愁外，再没有其他了。如今结束的日子来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怀着悔恨的心情，记起她所对我做过的一切，跪下未忏悔一番，跪着用热泪来

洗她那一双亲爱的手，哀求她底饶恕……我真正在哀求饶恕了！她底回信中来了这一句永不能忘掉的话：——“母亲底心是记不起任何悲哀的。”

母亲死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〇四年二月我又给了我几封四妹底来信，从这些信中，我知道他们依着母亲底遗命将她葬于M地。

—二—

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底二十年的刑期已满，就在这一天我应该离开席吕塞尔堡了。然而在二十七日晚本地官吏来通知，我底出狱期改在二十九日。而我在二十七日已和留在狱中的九个同志辞过了行。我们极力自持，极力镇静，虽然明知分别后也许就没有重见之日，但大家都不愿在临别时现出伤心的样子。有的眼含泪珠；有的声音嘶哑。“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我一面说，一面掉过身子避开了，免得我哭出声来。

在我临行前数日一个同志对我说：“你离开席吕塞尔堡时，一定会哭的。”

我热烈地抗辩道：“这是什么话？哭！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还要哭呢？”

啊！不在临行的时刻，而在出了席吕塞尔堡以后，在汽船上，当席吕塞尔堡底圆塔和白墙看不见了的时候，我真绝望地哭起来了。我的同志们说那样的话时，我只想

到那个地方，只想到我在其中憔悴了多年的石壁，却不曾想起那般还在那里憔悴着的活人。我不曾想到我底同志们，我本来是违背了自己底意愿而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我底思想一转到他们时，我对于那摧残精神的堡垒之反抗的感情就消失了，被忧愁与绝望的感情代替了。我为那些还留在堡垒中永无出来之希望的人而忧愁；我因我自己所受的损失而绝望。不错，我失掉了这二十年来在非常的环境中和我亲密地同生活，同受苦的人们。这二十年来只有这些人是和我同处在平等、休戚相关、爱与友谊的地位中的。只有从他们那里，我才得着了扶助、安慰与快乐。全世界把我关在门外，所有人间的连锁都断了，而他们，只有他们代替了我底家庭、社会、党、俄国，进而至于全人类。非常的环境用非常的连锁锁住了我们。而如今这些连锁都被打断了。我底眼泪，我底绝望，我底哭泣都是有原因的。……

薇娜出狱了，二十二年的监狱生涯就此告终了。

……突然！关住的门上起了叩声。……这一次是生命自身在叩门了，它叫道：“起来，去！”……啊！这是何等的悲剧啊！当我已经放弃了一切，不预备再生活，而且服从了我底命运，那时候忽然被一个叫声惊醒了：“来，生活！”这不真是一个悲剧，一种苦闷么？就是在如今，我也不把它摆脱掉的。

这是一九〇六年出版的薇娜底诗集中一封代序的信函里

的话。英译本(简本)的薇娜底“自叙传”说到她出狱时就收场了。

一三

薇娜是和伊凡诺夫、亚新布勒二人同时出狱，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一九〇五年十月沙皇底“立宪宣言”公布后，薇娜等得着了特赦，她后来就到外国去了。一九〇七年在德国举行的万国社会党大会中，她曾以俄国代表的资格出席。

一九〇八年社会革命党中发生亚柴夫事件。原来党员蒲尔切夫揭穿了同志亚柴夫底假面具，证明他是政府方面底侦探，先提议于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大部分同志皆深信亚柴夫为忠实的革命党。然而蒲尔切夫也是一个卓越的党员。他底告发也是有理由的。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巴黎组织革命法庭审判这事件。革命法庭在十月间开庭，请了三个著名革命党人做裁判官。第一个裁判官是克鲁泡特金，第二个是乐巴丁，第三个便是薇娜·妃格念尔。在这次审判中蒲尔切夫是出席的，他底演说极其雄辩；亚柴夫未出席，但大部分同志都帮助他，所以没有结果。薇娜当时也相信亚柴夫。据蒲尔切夫自述，当他陈述他底理由的时候，“薇娜·妃格念尔脸色青白得像死人一样，她底一双美丽的大眼表示出恐怖与痛楚，而克鲁泡特金与乐巴丁两人脸上显出注意集中的样子，把他们底座位移近我，不愿听漏我所说的一个字。”

后来经过中央委员会底考察，中央委员萨文夸夫(即《灰

色马》的著者)等三人亲赴伦敦与前警务部部长洛甫兴会面,证实了亚柴夫是政府方面的侦探。中央委员会便发表宣言公布亚柴夫大底奸状,所谓亚柴夫事件便结束了。

此后薇娜底生活还是富于革命的活动。俄国革命后她回到了俄国,参加革命的建设工作。友人抱朴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赫尔岑街克鲁泡特金逝世周年纪念会会场中见过她。他在《赤俄游记》中写道:“会场在戏院里面,到者数千人,讲坛上有克氏底半身石像与画像两种。当场有妃格念尔女士……等演说。女士……现在虽已老迈,但革命精神仍极奋发。”一九二三年社会革命党左派与最高限度派举行拉甫洛夫百年纪念大会,她被聘请为大会主席。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院委员会从成立以至于现在,书记底职务都是由薇娜担任的。于是证明“自叙传”底英译者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了:

就在七十五岁之高年妃格念尔还显示出五十年前使她在革命党中大露头角而得为领袖的那种这样崇高的精神,同样坚强的性格与信仰,同样人格底吸引力。

米海诺夫斯基从前曾批评薇娜说:

她所发射出来而且如此引动了她周围的人的魅力与动人处是由什么东西构成,这很难说。她自然又聪明又美丽,然而她岂只聪明而已!至于美丽,是革命团体中所不大注意的。但此外她并没有特殊的才干,她之所以动人,在她底全身是非常谐和,非常一致的,她底一言一行动都表现她底全个自我;疑惑与犹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

这类的人总是非常刻苦，端庄的，然而她完全不是这样。反之，当党的工作进行得很好的时候，她便是十分活泼，十分爱戏谑，恰和一个小孩子相似。

本文写成正值薇娜·妃格念尔底七十六寿辰，我愿把这一章献给她做生日之礼物，同时在我放下“万年笔”之前，我愿诚心诚意地祝她：“福寿康宁！”

六 路狄密娜·福尔铿席太因^①

俄国女革命党人中有两个著名的犹太女人：一个是海富孟，一个就是路狄密娜。

关于路狄密娜底身世，我还不能够找到相当的记载，虽然她底名字常见于俄国革命运动的书报中。我从薇娜·妃格念尔底“自叙传”里知道路狄密娜还是十四人案件中被告之一，她是和薇娜一同受审的。在审判中她底态度很勇敢，并不注意法官底问话，她不断地和她底邻座同志谈话，所以庭长常常干涉她道：“被告福尔铿席太因！不要和你底邻人谈话。”“被告福尔铿席太因！我请求你——停止私语。移到凳子底末端去。”审判结果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薇娜和路狄密娜成为好友是在席吕塞尔堡狱中的事。薇娜在一八八六年正月曾要求狱中监督，在每日照例在天井中散步时，允许她找一个同志作伴。她底要求到底被允许了。据薇娜自述：

在正月十四日他们带我出去散步时，我们所称为“第

^① 路狄密娜·福尔铿席太因：Людмил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Волкенштейн (1857—1934)。

一囚笼”底门忽然开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衲衣，头上包着麻布头巾的女人，她迅速地抱着我，我费了大力才认出来这是我底同志福尔铿席太四。……我们站着，彼此拥抱，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哭。

在这时以前我仅在审判时期中见过她。我们以前并不曾相会过，只彼此常听见别人说起。路狄密娜底诚实、质朴，她底热心立刻感动了我。我们在这种监狱的情形之下，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便结下了我们之间的亲密的友谊。我们好像是飘流在无人迹的荒岛上的人一般。我们在这世界中，除了彼此而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我曾给了什么给路狄密娜，然而她却是我底安慰，我底快乐，我底幸福。我底神经和一般的组织已完全松弛了。在体质上我很衰弱，而在精神上我也已完全竭尽。我底一般的心情也是反常的：啊，看！我找着了——一个朋友，她并不曾像我这样被监狱磨折到这末厉害，这末深刻。这个朋友又是温柔、善良、慈爱之化身。她底可爱的精神底一切宝贝，都十分慷慨地尽量给与我了。不管我们相会时我底心情是如何地忧郁，她总会想法子来驱散我底忧愁，千方百计地来安慰我。只有她底微笑，她底可爱的面貌，使我一见就忘掉了自己底悲哀，欢慰了我底心情。我和她散步一次之后，就恢复了我底勇气，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回到囚室里，那黑暗的小屋也不是如此阴郁了，生活也不是如此难堪了。我立刻便梦想着我们下次的相会。我们每隔一天才能会面一次。……

凡遇着监狱里发生了不幸的事的时候(譬如我们底同志们之死,他们底呻吟和临死时苦痛之叫号,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人的脸色都变成了灰白,非常激动,沉默不语。我们极力不要看见彼此底脸,便接吻、拥抱着,然后无言地在小路上走未走去,或是坐在地上(因为没有凳子),背靠着墙,极力避开从小守望塔上监视我们行动的宪兵底视线,愈远愈好。……

在这年春天,他们给了路狄密娜和我二人菜园中的两块小地(每块约长二英尺半,宽九英尺)。狱吏把菜园用竹篱隔成了六个小花园。这块花园毗连着堡垒的高墙。……

我们底土地是小的,长方形的,而且位置很不好,差不多全得不着太阳光。一边是高的石墙,其余三面各有一个九英尺高的竹篱;总有东西把阳光遮拦住。然而就是这四面高墙围着的井一般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天堂了。……

当草木开始发芽的时候,到处出现的绿色幼苗给了我们以说不出的满足;在夏天,宪兵们以前沿着边墙种下的花一齐开放时,我们竟狂喜得像小孩子一般。我们渴望碧草,我们渴望田野和草地:一丛丛的碧草居然从我们底枯萎的心中唤出了全然意外的感情之波浪。每一片小草底绿叶都是我们底宝贝。……

然而路狄密娜更特别钟爱昆虫和偶尔未到园里的少数的雀鸟。她把麻雀养得非常之驯,它们常常成群地站

在地底膝上，从她底囚衣上嚼食面包屑。当我们手挽手地散步的时候，我常常忽然注意出她拉着我向旁边走。我曾几次猜想这是什么缘故。后来她把地底理由向我解释了，我不禁笑起来，过后也深为感动。原来这个恐怖主义者曾见了一只甲虫或爬行的蝶蛾类的幼虫，也怕会被她踏死！后来我们有了覆盆子树，小虫常来吃覆盆子叶，我劝我底朋友把这害虫捉下来淹死在水盆里，她总不听。她宁肯让覆盆子全树都死掉，不肯杀死一个生物。有一次她对于她在囚室里发现的木虱的待遇，更引起人发笑。路狄密娜用一片纸把木虱小心地包起，当她出去散步的时候便带了它出来，又小心地打开纸包放出了它。

这种对动物的待遇很感动我，我曾问过她是否从来就这样对待动物。她回答说无论何种形式的生命，她永远是这样爱惜的。在她，这种态度实在不是暂时的监狱生活的“情痴”，乃是真挚的感情，而且完全和她底一切可爱的天性相合。她待人之温柔与慈爱是无人能及的。……路狄密娜深知生活，深知人们，她并不把生活或人们加以理想化。他们是怎样，她就把他们当作怎样，她知道他们有光明处，也有阴暗处。她爱光明处便把阴暗处宽恕了。她能够找出来，而且永远不曾忽略过一个入底好处；她确切地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潜伏有一种基本善。她坚决地相信善与爱能够征服一切的恶；因此要纠正邪恶，最有效验的方法便不是严厉的斥责与压制，乃是慈爱的话语和同情的友谊的批评。她和别人的关系，都可用“无

限的仁爱”几个字来概括。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大家都生活，而且让大家生活。”……

观察路伏密娜，静听她底谈话，尊重她的人格，那么谁都会自问道，她底仁爱与温柔怎么会和革命运动底暴力与流血相调和呢？自然，发出光和热，使人民幸福，乃是这类酷爱一切的天性之天然的事业。然而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之不平与罪恶又逼迫着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对于劳工阶级之残酷的掠夺又使她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俄国自由的公开的活动之不可能以及对于个人之野蛮的压迫，又把施造成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只有在革命的反抗中，她底酷爱一切，自我牺牲的精神才寻找到了能够以清白的良心表示出它底利他的热望之唯一的形式。所以她甘愿牺牲自己底生命来扫清生活的大道让后人来走，——这事业是只能求之于革命的反抗中的。

虽然我们两人相伴散步是何等地快乐，而且是我们底唯一娱乐与安慰，但在同年（一八八六年）秋季我们便不得不把这种相伴散步的特权放弃了。……

原来狱中向例，凡“品行良好的囚人”才有相伴散步与种花园之特权。当时她们底大部分同志都因为被狱吏认为“品性不良”，不曾得着这种特权，而且有几个同志如何比连斯基、热拉拖颇斯基竟不曾见着一个朋友底面孔就死去了。别的人还痴等着这种特权之降临。她们因此觉得这是很不公

道的。

然而路狄密娜别有一种见解。她想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反抗狱中的规则。监督之分配特权既是如此专断，如此不公，因此我们便不应承认这种特权。路狄密娜提议采用一种消极的反抗；她底方法是我们这时候正享受着这种特权的人实行自愿地放弃特权之举。我们底放弃自然应该有一个理由。那么，我们便说所有囚人底品行都是多少相似的，而我们独享着特权，因此我们底同情与友谊的感情，使我们不能在别人寂寞受苦的时候，自己安心享乐。经过长久的时间，我还不能决定作这样的一个牺牲。自然我每一想起我在享受着一种利益，我底同志们却正因为享受不到它而悲哀着，这时候我也感到很大的苦痛。然而我一觉得我是生活“在深渊中”，我和路狄密娜的会面乃是我底唯一的快乐。……并且我又相信狱吏不会因此屈服……加以现在享着这种“特权”的同志中有几个是非常病弱，极端需要朋友底帮助。

路狄密娜看见我非常害怕分高的念头，便过了一些时候不提这件事。然而后来这恼人的问题，又时时在我们底谈话中发生了。路狄密娜坚持地把这问题底新面目指给我看。她说我们应该不仅看重这次反抗底直接结果，除了它底直接目的（使种花园以及与同志相伴散步二事成为四人的普通权利，人人都可得着，不再是一种特权）而外，这反抗本身还是有一种意义的。在一般的沉默

与屈服之中，狱吏也会看见我们并不完全被动地忍受别人给我们安排定的一切，而且我们也不仅如狱吏们所命令的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同情于我们底同志们，起来发言援助他们，防护他们。……

路狄密娜底议论居然渐渐说服了我，我们便联合了几个同志实行拒绝享受这种特权，我们说非等全体囚人都有了这种权利时，我们几个人是不愿享受的……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不曾种过花也不曾相伴散步。

后来新监督就职后，这种特权就成为人人都可享受的普通权利了。

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内，有一天典狱长忽然通知一部分囚人说沙皇已将他们底刑罚减轻，其中路狄密娜等三人应立即出狱。

路狄密娜得着这个消息异常愤怒。而我们想起我们中有几个人居然得生还于人世，也很觉宽慰，便急忙去祝她，但她气愤着，听也不听，到后来才慢慢几气平了，急忙作出狱的预备。

路狄密娜在和我们同住了这许多年，经过了各种人事变迁之后，要离开我们确是一件苦事。她爱我们，而且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简直离不开她，恰像她就是光与空气一般。在我和她的最后的谈话中，她屡次表示出对某几个同志之慈爱的关切，要求我不要忘记对于某几个同志她底分离是特别地苦。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路狄密娜便和其他四个同志离开席吕塞尔堡了(有两个同志底十二年徒刑期恰在这时候满了,所以和这三个遇特赦的囚人一起出狱)。

路狄密娜临行前的最后一小时是在我底囚室里度过的。她不断地哭,我安慰她。临别时,她深带感情地说她把自己一生中所遇着的最好的人留在席吕塞尔堡而去了。

在一点钟时分我们底出狱的同志们相继离开了他们底囚室,然后再被引出监狱。他们正走出狱墙而进入堡垒底天井中时,他们便止了步,为了要默默无言地和我们“诀别”,我们从各人底囚室底窗户里,注视着他们底退去的背影。他们大家都转过身子,向着我们深深地曲着腰,脱下帽子挥舞着,表示祝福底意思,而路狄密娜却停了两三次,挥着她底手巾。我们也都拿着白手巾,这是我们囚室底两重的窗户和铁格子所遮拦不住的,他们也能容易地看见了。……

路狄密娜出狱后仍从事革命运动。一九〇六年正月海参崴水兵叛乱,举行游行示威运动,路狄密娜也参加其间。政府军队用机关枪向游行水兵与群众猛烈地射击,死伤多人。路狄密娜也受伤身死,作了一个革命的殉道者,很得后人底敬仰。

七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①

今年正月三十一日巴黎“L'oeuvre”报上载了一节莫斯科电讯如下：

莫斯科，正月二十九日——此间准备今年庆祝俄国革命之祖母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八十五岁生辰。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现居布拉格。

我预料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底八十五寿辰的庆祝会上定有一番盛况，可惜我无法“躬逢其盛”了。那么我就拿这一篇短文献与她，做一个祝寿的礼物罢！

—

这号称“俄国革命之祖母”的布列斯科夫斯加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且听我道来。

一八八五年乔治·凯伦受《世纪杂志》的委派，去考察西伯利亚底荒僻的部分，并研究流放制度。后来他写了两册《西

^①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вская，1814—1934。

伯利丑与流放制度》。这是一部极有名的著作。在这部书第二卷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中，有一节动人的文章，描写他这年十月在外贝加尔区的塞伦金斯克和一位女政治犯会见的情形。

当夏马林和我谈话之际，布列斯科夫斯基进房里来了，我被介绍给她。她是一位约有三十五岁的太太，面貌强健聪明但并不美丽，态度直爽坦白，还有热烈的、大量的、鼓励人的同情。她底面容带着无穷的受苦之痕迹，她底丰富的暗黑色的、飘飘的头发表已到处染上了灰色，不过这在矿山的监狱中被剪短了。然而任她困苦也好，流放也好，惩罚也好，这一切都不能够摧毁她底勇敢的、锻炼得很好的精神，也不能动摇她底对于尊严与义务之信仰。她是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女人，起初在本国女学校读书。她能说法、德、英、俄四国语言，又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她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她在各方面是一个动人的、有趣味的女人。她曾两度被送到加拉矿山里，而且在第二次刑期满后又被强迫住在这个苦寒的、少人迹的塞伦金斯克的博牙特人殖民地，并受着地方警察首领底严厉的监视。据我所知，在这一百英里以内，再没有第二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政府每星期给她一元又四分之一的薪金做她底生活费；她底通信也要由警察检查。她永远和她底家属、她底友人分离了。在我看来，她底前途只是多多少少的几年的贫穷和艰苦，到后来塞伦加河边的寂寞的坟场便是她

葬身之所，在那里一个不曾油漆的木十字架简略地记载着她底生与死，没有一滴同情的眼泪会落在这十字架上的。然而那无可动摇的勇气(这不幸的女人靠了它便轻视了她底可怕的将来)，以及她所表示出来的对于在她本国内自由底最终的胜利之信仰都令人万分感动，也是异常英勇的。她向我说过的最后的话大意是：“克伦先生，我们会死在流放中，我们底儿女会死在流放中，我们底儿女底儿女也会死在流放中，然而到底会从此生出一点结果来。”从那天以来我便不曾再看见布列斯科夫斯基夫人了。她从我底生活中完全消失了，好像在我和她告别的时候她就死去了一样。然而我每一想起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我未有不确实地感觉到所有我底勇敢、毅力与英勇的自我牺牲之旗帜都被举起来了，而且被一个女人底手举起来了。

凯伦君一八八五年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分别的那个女人，被抛在穷困与隐晦中，似乎“死去了一样”的女人，就是今年要在莫斯科被庆祝八十五岁生辰的“俄国革命之祖母”。多年的监狱和放逐生活也不曾把她底身体损坏丝毫。就在这八十五岁的高龄她的身心两方面还是异常强健。她和尼格念尔两人算是民粹派老将中之仅存者了。我想她在八十五岁生辰的那一天，抚着她底稀少的银发，回想起过去几十年的岁月和她所经过的六十余年的革命运动，一定会感到满意而微笑了。以一个身体病弱的女子，为俄国人民底自由奋斗了六

十多年，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压迫，却能够保持自己底信仰，完成了自己底人格之一致。她底敌人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底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三世病死了，尼古拉二世也死于革命党人底枪弹之下，俄国的专制独夫——沙皇就这样地灭亡了。然而以赤手空拳和那股专制独夫战斗的她到今天还是活泼地生存着，光荣地生存着。她现在是退隐了，光荣地退隐了，回来了，光荣地从革命的战场上回来了。虽然她所宝爱的理想在俄国依然未曾实现，可是现在她已经是精力竭尽了。难道这一个八十五岁的老妇现在还有力量来和那统治全俄的大党战斗么？从她侨居捷克斯拉夫京城市拉格这件事看来，就可以知道至今她还是一个亡命者，还不能够回到俄国，因为她是反对布党政府的人。

二

加塞林是一个贵族家女儿，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小俄罗斯维特布司克县别墅中。她幸而有贤良慈爱的父母。她每一次对人提起她底父母，她底脸上便发出光辉，她说：“我真有奇异的父母，如果我有一点好处，这都是从我底父母那里来的。”她底父亲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常常教他底小女儿读科学与旅行的书。她有德法两国的保姆，所以在幼年她就可说德、法两国语言了。加塞林底母亲对于宗教信仰很深，但她不赞成希腊正教底繁重的仪式；她所注重的是行善的精神，所以她常常教她底女儿要待仆婢如待自己底姊

妹兄弟一般，要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分给邻人。

她底父母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他们夫妇间恩爱甚笃，从没有争吵的事。她底母亲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对人从没有粗暴的举动。她从不曾鞭打小孩，母亲时时告诉儿女们说：“人生中最好的东西就是‘金言’。”如果小孩犯了过失，母亲就用“金言”谆谆地向他们劝导几小时。家庭里充满了和乐的空气，加塞林就在这种空气中长大的。

在加塞林四岁的时候，她底父亲在切尼哥夫县置了很大的田产。他们便移到那边去，她底儿时就是在切尼哥夫县度过去的。

加塞林从小就感到现社会制度底不平等，每当她拿她底家庭和父亲底几百个农奴底生活情形比较起来，小小的心就感到大的痛苦。有时候她和一个衣服破烂不堪的农家孩子手牵手地走进母亲底华丽的客厅来，请她底母亲看这个瘦弱可怜的小孩子，他底脸是如此的瘦，如此的脏，腿瘦得和木棒差不多，肚腹又是那么大，然而在母亲看来，这种举动是不对的，因为富家小姐不应该和贫家孩子玩耍。

在八岁的时候，寻求正义的问题就开始来困扰加塞林了，我们且读她底自述：

我们住在一所装饰得极其华丽、陈设得极其精美的大屋，在大屋底周围有许多花园和菜园……

然而对于一个有活泼的想象、温暖的心情与活动的精神的小孩，引起她注意的不仅是府邸中的生活。在我底

父亲底别墅四围，和在其他地主底住宅周围一样，都有所谓“乡村”者围绕着，这就是立满了破漏的茅屋的长街，在那里居住的尽是些穿着粗布衣服、头不梳、脸不洗的壮健的生物，这些人看见他们底地主或地主家庭中的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就会快快地摘下头布来，而且把头俯下，差不多俯在地上了。他们是耕种土地的农夫。他们在日出之前就起身，直到深夜才能上床，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花费在田间、草地上、树林里、仓廩里、马房里、花园里、牧场上作工。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在作工。只要犯了一点小过失，遇着主人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要被骂、被鞭答，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底妻女都被拿去作主人或小主人底小老婆；他们底儿子不得他们底同意就被主人带去训练来做奴隶，或在主人家中做贱役。男子们跑来主人处哀求点面包，因为他们家里的人饿得快死了；妇女们也跑来哭告主人，要回她们底被夺去的孩子们。我亲眼见着这样屈辱、堕落、惨痛的事而受感动，甚至失了知觉，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投身在父亲底脚下恳求他饶恕那些为了在牧羊时睡觉而被认为犯罪的人们，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看见几百个农夫在天井中等候主人底吩咐。光着头，赤着足，冷得浑身打战。而那主人叫他们等候了一天，一句话也不说就遣他们回去，因为他自己在和别的地主打纸牌，这些地主也是一样，自己玩得很舒服，叫他们底车夫寒天里在车厢上等候着，把手都冻坏了。我看见这样的事气坏了我的肚皮，也不知有多

少次了！

这些事情苦恼着我底孩子的心，甚至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它们还来折磨我。我睁着眼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因为想着我底周围的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我实在不能熟睡了。

我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农民底生活，因为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跑来我家，和我底父亲讨论关系着他们底共同生活的每一件事，在这些时候我总是在他底旁边，可以听得见那些农民要说些什么话。这尽是些关于田地、牧场、树林、茅屋之建造，他们应缴纳的租税，应修筑的道路，应排泄的沼泽等等的事。然后再说当兵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农民底儿子才被征去当兵。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也已经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忠厚的人应该把工作和租税底全个负担放在自己底肩上。我又看见，我底父亲虽是一个好人，但他总是重视他自己底利益过于他底农奴底利益，我于是痛苦地感到贫富间的不平等。

我常常从家里逃出来，一个人跑到邻近的村庄去，拜访我们底农奴底茅屋；在那里我会看见老年人躺在干草上，饿得异常之瘦，又没有人来理他，因为在那夏天的长日子里，只要能作工的强壮的农人都是在田地上作工，一直到夜间才能够休息。那些污秽瘦弱的孩子们便在污泥或尘埃里争吵，吃着猪狗底饮食。每逢礼拜日我看见许多农民走进教堂虔诚热心地祈祷，为了上帝的缘故施舍出他们底最后的铜子，为的是想在来生它着一个较好的生活，

因为他们底幸福之希望除此而外，便再也不能有什么了。

从八岁以来，“如何寻得正义”便成了苦逼着我的问题了。

平常人在小孩时代总有一种攫取任何物件之欲望，然而加塞林却不是如此。凡到她手里的东西，她都愿给别人。如果有人把新从火炉里出来的又鲜又脆的点心给了她，她便会立刻把它送给一个仆人。如果她得着一个新玩具，不等这一天过完，她就给了农民底小孩。她常常在回家时，没有了外套或大衣，因为她已经给了一个穿着破布冷得发抖的人。她底母亲自然会责备她，她便回答说：“妈妈，你给我们读的《福音书》上不是说过么，一个人若有两件衣服，就应该给一件与穷人。我正是照你给我们读的话而行的，为什么你要动怒呢？”

有一次她看见一群蓬发赤足、带着重镣的人被宪兵赶着在街上走。这悲惨的景象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她便问母亲这是什么人。“他们是不幸的人——在生活道上走了错路的堕落者。”这就是母亲底回答。这个回答自然不能释去她心中的疑惑。她以后常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

她在小孩时代的唯一梦想，就是怎样可以使农民得着幸福。她常常想象自己做了一个大田产底主妇，在她底田庄上，全世界的不幸的农民都可以舒舒服服地住着，穿得好，吃得好，又不受束缚。

在平静的夏天的午后，她在露天里躺卧着，高高的碧草围绕着她，浅蓝的天空中点缀着数朵纯白的飞云。远处又有

座山，山上偶尔有一辆马车走过。飘浮的白云似乎聚成了各种物件，什么山啦、谷啦、溪啦、河啦、花啦、树啦、巨人啦、城市啦、动物啦，应有尽有——只要她在书上读过，或听见别人说过的东西，都在云上现出来了。拿这些云做背景，她便建筑起她底空中楼阁，极乐世界。

她又常常听见人说美洲是富有金子的地方，她便想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打算带回不少的金子给农奴买田置地，让他们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耕种，自由地享乐。每当她望见天空的彩云，她就看见她所欲创造的世界了。她常常把到加州去的计划告诉别人，家里的人就拿这话传为笑柄，然而在别人笑她的时候，她总是直率地回答道：“但是许多人已从那地方带了金子回来过了！”

三

在十六岁的时候，加塞林已经读了不少服尔泰、卢骚、狄岱洛诸人底著作，熟悉了法国革命底历史。她受着新思想底鼓舞，怀着青年的热诚在别墅附近开设了一所学校，居然找到二十个成年的农民做学生，她一个人做教员，教他们读书写字。不久一八六一年解放农奴的事就发生了，然而实际上解放后的农民底生活状况更变坏了。因为许多年以来，在旧制度之下，农奴除了耕种他底主人底田地外，他自己还有一块土地是为着供养他底全家的。他知道他本人和这块地都是属于主人的，然而他也知道主人要卖掉他时也必须把那块小地同

时卖掉。所以他们常对主人说：“我们是属于你们的，然而土地却是属于我们的。”这样，农民便满心希望，在他们被解放了以后，那块地也会分给他们。但是沙皇底意思却不是如此。我们且听十七岁的少女加塞林底自述罢：

农民是自由的了。他不再该束缚于土地上了，他底地主便吩咐他走开。他得了一小块晓土，在那里他是自由的，他会饿死。他昏迷着了；他万想不到他没有他底原来的一块地会能生活……在渗瘠的，却是逐渐增加的愤怒之际，他不肯离开他底那块地到晓土上去。他哭叫道，“主人啊！我怎么养活我底小孩们度过一个俄国的冬天呢？那样的晓土，对于我，就是等于死。”这种哭叫声已响遍全俄国了。

政府在每一县中派了一个所谓“公证人”，来劝导农民。“公证人”一点事都没有做出来。于是政府调遣了军队来，驻扎在农民底茅屋里。农民底家人饿得快死了，老年人被醉兵打伤，女儿们也被兵士强奸了。然而农民更变成狂暴了，于是军队就用笞刑来对付他们。在我们乡村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农奴不肯离开他们底土地，军队便把他们成行排队地驱赶到街上去。从每十个人中叫出那第十个来，用鞭子打他；有些人就当场被打死了。过了两个星期农民还是不屈服，那么军队又用笞刑，但这一次是在每五个人中叫出第五个来鞭打。那般可怜的无知识的生物们，却要勉强地保持着他们所视为他们底权利的东西；于

是他们又成行地被拖了出来，这一次每个人都挨打了。在五年之间，这样的事行遍于全俄，到后来血流尽了，精力也竭尽了，农民也只得屈服。

在我底小学校里听到这些伤心的故事，我底父亲和我们县里的“公证人”更告诉了我不少。农民们成群地日夜来到我们底家。有许多是被家人抬进来的，因为被鞭子打成残废人了。呜咽着的妇女们垂着泪，诉说在她们底眼前被杀害了的她们底丈夫的事。这般可怜的苦人常常爬行着，拉着我底父亲底膝盖请他给他们重读‘上谕’，查出那是“错误的”，又哀请他在法庭上为他们求赦。父亲接待过了那般苦人们后，来到我这里，他很疲倦，很憔悴了。

我现在才明白我底从前的计划没有用了，我觉得应该有大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变革才行。然而我这时还是一个自由党，只想到改革，不曾想到革命呢。

在十九岁的时候，加塞林就伴着她底母亲和姊姊到圣彼得堡去了。到了圣彼得堡，她就结交了不少自由党，这都是出身贵族、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因为这时候在俄国国内，女子是无法受高等教育的，这一般人就在暗中为女子开设了许多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班次。这样的课程，加塞林是完全听了的。

后来她底母亲病了，不得不回家去。母亲要把加塞林带回去，但加塞林不愿意，她要做一个人；她以为应该靠

自己生活。在当时许多贵族青年都有这同样的主张。克鲁泡特金在他底“自传”中曾引用了诗人奈克拉索夫底话：“奴隶所做出来的面包是苦味的。”他又附加说：“青年人确实不肯吃那种面包，也不肯享受靠着奴隶的劳动而积聚在他们底父亲底家里的资财，不管那般劳动者是真正农奴，或是现代工业制度底奴隶。”

加塞林底母亲到底顺从了女儿底意志，让她在一个贵族家里做家庭教师，得了钱就作她留在圣彼得堡继续求学的费用。母亲回家去了。她做了两年半的家庭教师，她底品行极好，很得那一家人底敬爱。

但她底父亲后来一定要叫她回去，他允许她回家后有完全的自由，可以过着独立的生活。果然她回到故乡后，她底父亲帮助她开设了一所女子膳宿学校，她居然得着许多富家女子做她底学生，她就靠她们缴的学费维持生活。她底父亲又为她修造了一所茅舍来教育农家小孩，不收一个钱。她从那女学校所得的钱如果维持简朴的生活之外还有余，她便把剩余的钱尽拿出来帮助农民。有时买一头牛送给这一家，有时又买一匹马送与那一家，想尽她底力量来减少她周围的贫苦。她说：“我现在与人民更接近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每个农民对于从那记不清楚的时代以来的笞刑和苦役之惨痛的回忆。我觉得他们之爱慕自由是潜意识的，然而却又极其深切的。”

又过了三年，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加塞林和一位心胸开放的贵族青年布列斯科夫斯基结了婚。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心地很良善，又是一个自由党。他在本处县会里很活动，对于农

民底苦况也很关心。他和加塞林共同设立了一所合作银行，一所专为农民而设的农业学校。

然而加塞林还觉得应该做点较大较急进的事才行。她又到基辅去，为的是想寻几个帮手。在基辅时正遇着她底一个姊夫死了，她又不得不参加葬礼，安慰她底姊姊。过后她底一个儿时的好友科法利克来信，叙说他和几个朋友不满意俄国的现状，决定到美洲去建立一个“新村”，在那里人人都可以自由地用脑力和手力工作。他约她回到美洲去。她答覆道：

我决不去。在俄国正有许多重要的事应该做，然而差不多还没有动手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俄国呢？在美洲多了我们，对于人民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俄国人民却正需要着我们哩！

在基辅城内，大学学生设立了一所饮食店，每月膳费共六个卢布，对于不是本校学生的人也并不加价。加塞林先付了一个月的膳费，每天到这里用餐，借此可以观察一切。这是一所木头的建筑，最下的一层全被这所饮食店占据了。制得粗糙的长木桌子上面盖着洗得不干净的桌布。每个屋角里堆着一叠又厚又重的白色碟子，在用餐的时候，照例发出一阵响声，这一叠碟子就被倒放在地板上。于是用餐的时间开始了，学生们高谈阔论地争辩着各种问题，她静听着，想考察出他们底性格。后来她拿了一些小纸条把她底姓名和住址写上，第二天她就选择几个给了她以好印象的学生，把纸条分散与他们说：“请来看我，我们可以随便谈论谈论。”

这人晚上就有五个学生来看她。他们都是富于同情心的诚实的青年。她便问他们道：“为什么你们不做一点事？在俄国群众正饥饿着，颈项上挂着铁链，门口站着狼群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做一点事？为什么你们要做‘闲人’呢？为什么你们要用学校来遮蔽你们底眼睛，不去看看现实呢？”

“我们是‘闲人’，然而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使情形变好一点呢？”这几个学生中也有和革命党人认识的，不过他们还没有做革命党人的心思。

这一次谈话自然没有什么大的结果，不过从此加塞林便和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又由他们底介绍得和革命党人认识。

但不久她底丈夫和友人又把她叫回故乡去了。在那里她和他们极力想由政治行动来改善农民底状况。加塞林这时候已表现出她底演说的本领。她底声音是又洪亮又清晰。她能说农民所能懂的语言。而且她有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人格，所以更能感动人。

选举地方法官的时期到了。这时候科法利克因为去美不成，跑来看加塞林一家人。加塞林便劝他做一个候选人，他答应了，不过因为他不是本地方的居民，没有被选举权，所以她底父亲就造了一个假的租佃契约，算把田地租一部分给了科法利克，科法利克就有了被选权，而且果然被选出来了。他本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又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其余的法官举他们为底首领。他办事果然不错，在三个月之内就把八百多件陈年的积案断得清清楚楚。他断案完全依着公道，极力

维护农民底权利，很得农民底欢心，然而却也得罪了地主们。那般贵族便去报告内务大臣，说这一群自由党将有反抗政府的阴谋。

于是科法利克被免了职，加塞林底父亲受着连累，也被免了职，他们底同志们中有几个未受审判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加塞林夫妇自此便受着警察底严厉监视，他们为农民开设的银行和学校都被封闭了。这离科法利克做法官的时期还不到一年！

政府方面又去侦察加塞林向农民所作的演说是何种性质的，本省总督并把她底父亲叫去，要他说明加塞林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加塞林底父亲回答说，他底女儿以为应该把新法律向农民解释明白，为的是使他们懂得自己底权利，总督听了这样的话，便冷笑道：“我们这里用不着传道的使徒。”并且还告诉加塞林底父亲说，他一家人愈少干预农民的问题愈好。

这个惨苦的经验便使加塞林从和平的自由党变成革命党了。她明白要想得着大的进步的改革，非先把现存的政府底形式改变过不可。贵族专制的政府实在是农民幸福底一大障碍。所以要为农民谋幸福，就应推翻现在的政府。

然而要去做推翻现政府的事，同时就是去找监狱、苦刑、拷打、流放、死刑。加塞林现在有二十六岁了。她底丈夫也是在青春时期，她便把她底心事告诉她底丈夫，并且问他是否甘愿去冒大险、去坐监、去死，他回答说，不。加塞林便说“我是甘愿的”。于是就和她底丈夫分开了。

四

加塞林又到基辅去，加入了一个革命团体。这正是奈其亚叶夫案件开庭审判的时期，审判结果大批的革命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件事惊动了俄国社会，而革命风潮也就更厉害了。

这时候的俄国革命党人大体分为两派，一是拉甫洛夫派，一是巴枯宁派。拉甫洛夫派上缓进，以为农民要受到相当的教育后才能得着自由，所以应该先从事于慢慢儿教育农民的工作，而巴枯宁派则不然，他们主急进，以为目前的急务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革命，愈快愈好。他们说农民底反抗不久就会成熟的，因为那种普遍的困苦使得农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饥寒便是最有力的教师，去告诉农民：为什么他要受寒挨饿，向他说明他如何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很快地他就会懂得的。”

这两派虽有不少的分歧，却也有一个共同点。两派都承认只有民众革命才是根本改革俄国悲惨情形的唯一方法。这两派底领袖拉甫洛夫和巴枯宁都是侨居瑞士的亡命者，而且是好朋友，所以这两派的人也是互相敬爱的。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出身贵族家庭。他们以为做贵族的人安富处优，坐享农民底血汗之利，已经有无数的年代了：只有靠着压迫农民，掠夺农民，他们才能够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因此这般青年人便以为他们应该来替农民服务，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把自由

与幸福交还给农民，为的是替他们底祖先赎罪。

加塞林是属于巴枯宁派的。不久在基辅城内她就找到不少的男女同志，他们都很敬爱她。在加塞林底亲密友人中有一个年纪较她小九岁的女郎马霞·加林金娜，这个少女因她底信仰坚定、行为勇敢，后来在革命党中成了著名的人物。她因为读了奈克拉索夫底关于农民的诗歌就变成了热心的革命党人，后来便到基辅汲取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思想。她进了基辅产科学校，在那里结识了加塞林底姊姊阿尔加，又由阿尔加底介绍和加塞林相识。马霞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少女，有柔嫩的皮肤和容颜，平日沉默寡言、性情温柔、作事勤勉。凡遇危险艰难的事，她总是比众人都勇敢有为。说得少，做得多，若有人把秘密托给她，她从不泄漏一句的。许多青年对她产生了爱情，而她自己对男子总是很冷淡。加塞林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她回答说：“我爱运动。”加塞林批评马霞为“温顺时像一只小羊，勇敢时就像一只母狮”。

在一八七三年“到民间去”的运动开始了。同年俄政府下了“诏书”，命令侨居瑞士的俄国男女学生立刻归国。于是在短时间内大队的革命青年便回到俄罗斯来了。“到民间去”的运动加了这一支生力军后更兴盛起来了。基辅这时候就成了一座沸腾着的火山，在那里聚集着不少的革命党人，加塞林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完全抛弃了贵族底身分，去做农民中的一个，衣食住和农民底一样。每天也像农民那样劳苦。因为和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便能够体贴他们底苦痛，了解他们底需要，才好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加塞林更说：“我们要变成。

和他们同样的人，我们才有权利来煽动他们。”

既然这样地决心去参加煽动农民革命的工作，加塞林便和家人告别。因为一旦做了反抗政府的革命党人，就应该把生命置之度外，随时都会被捕、被监禁、被流放、被处死刑。所以她在去就牺牲之先，要和她底亲爱的家属见见面，作最后的诀别。她先到科夫诺省的一个县里去见她底长姊，然后到路歌威次去见她底父母和丈夫。他们都劝她不要去做革命工作，不要无益地去送命，她本可以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他们又说她已是快要做母亲的人了，不应该去冒万险、历万难。这时候她似乎站在歧路上了。一边是充满了富裕、奢侈、繁华、慈爱的家庭幸福；一边是监狱、流放、死刑。然而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慰，她却毅然决然地选取了后一条路。她深感到那个最重大的责任叫她到战场上去，她是不得不去的。怀着痛苦的心情，含着满眼纯洁的泪水，她和她一生最亲爱的人们告别。从这时以后她就不曾再和他们见过一面了。在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不久，她底丈夫就死去了；等到她从西伯利亚回来时，她底父母也早已成了过去的人了，她底积蓄了多年的辛酸泪也只能洒向他们底墓前。

她本来决心立刻到农民中间去，但她底同志们劝她暂时等待一下。等革命党人在农民中间的组织稍微有点力量的时候再去不迟。她听从了他们底话，便留在基辅城内。然而她要靠自己底力量谋生活，她便剪了许多小方块纸写上她底姓名和住址，又写道她愿意担任家庭教师，并且指定某几个科目。她拿了这些小纸块走到一个女学校附近的街角，等着女

学生下课回家便散与她们或她们底家属，她底朋友们觉得这样的举动是很滑稽的，便时常嗤笑她。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方法却很有效果，居然有不少的家属请她去教他们底女孩们。她每月平均可得一百四十个卢布。晚上她又忙着做革命党的工作，整日整夜地忙着，她底身体反而强健起来了，比从前过闲散生活的时候还强健得多。

不久加塞林又得着一个表姊底信，劝她到维特布司克她（表姊）底田庄上去，帮忙做点有利于农民的事。那表姊是一个爱做慈善事业的妇人。她果然去看了，她很满意表姊对于农民所做的事。表姊留她在那里住下去，但她一时不能决定，便先到彼得堡去和重要的同志们商量进行方法，她曾把她表姊底计划告诉科法利克。他回答说：“加丁加^①，你已经做够这种社会的改良工作了。现在你正应该投身激烈的战场中。为什么你不加入战线呢？”

他底意思是叫她不要再去做不彻底的慈善事业。他劝她立刻穿起农妇底衣服到民间去宣传革命。

她在彼得堡的生活也是异常活动的，不久就成了革命团体底中坚分子。她底刚毅、朴实的性格，她底不怕一切的勇气，她底坦白的、热心的、中肯的谈话，以及她底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得革命党人底敬爱。

但不久，她底小孩出世了。产后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后，她回到了基辅，和她底嫂嫂威娜同住。她底嫂嫂和她友爱甚笃，

① 加丁加：加塞林的昵称。

她答应把加塞林底孩子当作自己底孩子般养育。

这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来了。她底姊姊阿尔加得病死了，临终时还频频叫着加塞林底名字。加塞林经过这个打击后，威娜又患了病，她尽心竭力地把嫂嫂底病看护好了。威娜病愈后不久，加塞林底哥哥就来接他底妻子回家去。加塞林不得不和她底小孩分别了。临别的情景是很悲惨的。

马车停在门前，两匹终日奔波的马把鼻子抵着地，吼着。威娜和她底丈夫坐在车内。加塞林从房里抱出小孩来交给威娜，大家都沉静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过了一会，加塞林底眼里流出泪，哭起来了。她哭得像一个无人慰藉的小孩一般。威娜便叫道：“加卡，加卡！你怎么了？”她仍伤心地哭着，不答应。威娜在她底额上亲了一下，马蹄得得声一响，马车就立刻在石头道上驰起走了。加塞林迷惘地望着驰去的车轮和马车底后影，直到缩小到不见为止。但她底双眼还朝那个方向痴痴地望着。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但在她底心里似乎一个寒冷的秋天来到了。她觉得自己是被人抛弃了。她说：

我底心似乎裂成了千万块了。我底脚跛了，我底手臂硬了。我不能够从那地方移动了。这时我想起当我最初说起自己愿为农民服务的愿望时，别人所给我的劝告。我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别人说：“等着罢。你将来结了婚，就会被束缚住了；你底青年的血也就会安静下去了，你底急流着的小河也就会变成平静的湖了。”那个时代果然来了，但我觉得我底精神并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

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还是和从前一样强烈，而且似乎更强烈了。那时友人们又向我说：“等着罢 只要你有了一处田产归你管理的时候，你底全时间、全思想就要完全耗费在那上面了。”然而我底丈夫和我果然买了一处田产，却也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我决不能把这微小的田产来和全俄国的大平原比较，而不看重后者的。我底精神和信仰还是和从前一样，并没有改变。然而从友人方面新的劝告又来了。他们现在却说：“是的，丈夫和深庭并不曾使你变化，但你是要屈服于自然之命令下的。你底小孩一生，你底革命思想就会死的。你曾经用来飞翔在天空中，白云间的羽翼，你将来会用来庇护你底小孩了。”我生了一个小孩。我觉得我底青春便埋葬在他底身体中了，当他离开我底身体的时候，我底精神之火似乎也同他一道去了。然而事实也并不就是这样。我对孩子的爱情与对革命和俄国人民底自由的爱情，时时在战斗着。这种心理底交战使我许多夜不能安睡。我明白我要做一个贤母，便不能再做一个革命党人。这不是两件可以同时并做的工作。只要一件就可以把人底全副精神吸收干净了。因此我便把孩子交给威娜和我底哥哥，让他们当作亲生的孩子养去。

作了这种牺牲的并不只有我一个。在那为俄国人民底自由奋斗的无数妇女中，我知道有不少人在做争正义的战士和做在暴政下受害者底母亲两者之间，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一条路。

五

一切都安排妥善了，加塞林便决定出发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之大道。她约定了两个同伴，一个是司特范诺维奇，我在关于沙苏丽奇的一章里曾提到他底名字。他后来成了一个极其著名的革命党人，因在齐基林县组织农民革命，功败于垂成的时候被捕；但又逃了狱出来。然而这时候他还只是个二十岁的孩子，一个沉静寡言、异常诚恳的青年革命党人；还有一个同伴就是她底女友马霞。司特范诺维奇装做鞋匠，马霞也学成了染色和油漆的手艺，她又教给了加塞林。

在一八七四年七月里一个晴明的早晨，这三个人动身向那不可知的前途进行了。大家都穿着农家衣服，背上的包袱里尽是些粗布衣服和他们各人手艺底用具，各人都带着假护照。她只有三十岁，然而她却找到一个四十岁妇人底护照。因此她须得把自己打扮得老一点。她穿着大的树皮鞋，厚帆布的衬衣，一件粗麻布的裙，一件黑色短衫，腰间再束上一根宽松的红带。他们假称说是堂兄妹，自然据年龄看来，加塞林居长，司特范诺维奇居次，马霞是最小的妹妹。

这是一个明媚的日子。加塞林三人异常快乐。他们底心中充满了对于全人类的善意，而且在他们对于被压迫阶级的爱中他们也找到了一种宗教的快乐。他们先到尼比河口岸上，搭船到切尔加司。船里的乘客都是农民和工人。大家都在进饮食，加塞林三人也从包袱里取出黑面包、干鱼、苹果酒

来吃喝。别人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从阿洛夫省来的。我们在寻找工作。我们听见说某某城内正需着我们这一行的手艺人。”不过加塞林和马霞底手都是异常白嫩，不带一点做过苦工的痕迹，因此又引起了工农们底好奇心。加塞林解释道，她们以前是贵族家里的侍婢，只做过轻便的工作。

在切尔加司登岸后，他们不得不走上一个沙石的高山。小小的马霞背不动她底重包袱，她底身子更渐渐地俯下了。她底两个同伴说要把她包袱里的东西取出一点，放在他们底包袱里，她起先不肯答应，动怒说：“如果我不能负重，那么我还算什么样的农妇呢？”但后来她实在背不起了，便答应从她底包袱里取出些东西分给他们。

他们三人穿过城市，又走到乡下。一边是无垠的大平原，一边是浓密的大树林。有时一辆马车驰过，掀起了地上的尘土，似云雾一般，把他们底眼睛迷住了。有时又遇着了湿地，这实在难走了，何况又背着重的包袱！于是这两个女子就不得不常常坐在道旁休息一会儿，歇歇她们底疼痛的足。司特菴诺维奇是惯于在湿地和尘土中走长路的人，看见这样子，便嘲笑她们底娇柔。但站在她们底前面说，“走罢，你们现在已经坐得够了！”她们实在没有力气了；然而她们知道在黄昏以前她们必须走到邻村去，否则这晚上她们便不能在农家中找到寄宿处了，因为农民素来不愿留那些深夜来借宿的生客。于是她们只得又站起来向前走了。

在六点钟的光景，他们三人到了B村。大家都疲倦了，就

坐在一家茅屋底门前歇歇。过往的农人们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仍然回答说是从阿洛夫省来找工作的。一会儿县书吏来了，傲慢地问他们道：“你们有护照么？”他们心里很惊惶，但表面上并不动声色，就把假护照拿出来给他看了。司特范诺维奇还问书吏，他们能够在哪里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那书吏不屑于回答这问题，只是昂然地把护照看了一眼就交还给他们。

然而他们总得找到一个住处。县吏去后，司特范诺维奇说：“我们必须到一家酒店去，在那里总会有更多的人。”不过这天是星期三，酒店里几乎全没有生意。那犹太人店主坐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高大的、衣服破烂的、酩酊的农民伸着四肢睡在桌上。他是一个退伍兵士，曾参加过克里米战争，现在正在夸耀他底战绩。他底话起初还引起他们底兴趣，但不久就使得他们讨厌了。他们催促那位农民把他们引到一个可以寄宿的地方去，然而他还继续说他底故事，舍不得走。司特范诺维奇后来请他喝了几杯谷酒，他才中断了他底故事，说他底一个朋友（是个鳏夫）有一间房屋出租，但离此并不近，还在那边村头上。他把路线告诉了他们，他们就向着到那边去的路上出发了。

他们问着那个鳏夫底住家，他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们，不过他警告他们说，房子还没有打扫出来，这晚上睡在里面是很苦的。幸而旁边一位老妇慷慨地请他们到她家去暂住一夜，并请他们进饮食。他们吃了几块饼干，但那个和拳头一般大小的大麦面馒头确实太难下咽了。不过他们一想到自己为人民

服务的义务，也就勉力把馒头吃了。那馒头底臭味后来追想起还使加塞林颤抖。

进饮食的时候，他们和主妇谈起找工作的艰苦。她回答他们说：“不要烦恼。将来会有不少的女孩来找你们给她们染手中、漆皮鞋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工作做。”

第二天早餐之后，他们三人就去看他们底新居。墙壁已颓败、动摇了。地板是破的，生满了恶虫。到处都有鼠洞，还悬着蜘蛛网。他们无力无助地立在污秽丛中。也许这时他们想到了各人已离开了的家庭寝室中的温软床褥和几盆蔷薇与朝颜，但他们甘愿抛弃了这一切，并无一点悔恨。那主妇又向他们提议说：“你们最好从田间取些新鲜温暖的粪来，和石灰掺杂在一起，好好地吧地板刷洗一下。那么你们就可以拿新稻草来铺床了。”

把粪和石灰掺杂在一起，在农家乃是妇女们底专门工作。司特范诺维奇不能够帮助她们。加塞林和马霞勇敢地劳动着。不过把粪和石灰调和起做成浆糊来涂那虫蛀的地板，这样的事是那两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不曾学过的。她们极力忍耐着，不要呕吐。司特范诺维奇抄手望着她们笑。他无意地说了一句：“真是女子底事！”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你晓得说空话是太不公道的。”加塞林回答道。

“这倒是一件很好的工作！怎么？难道我竟要做村夫村妇们底笑柄！”这是司特范诺维奇底回答。

房屋到底整理完竣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总算弄得很清洁

了。床铺也算安置好了。然而夜间加塞林和马霞两人却不能安睡，因为她们刚吹熄了蜡烛，各种虫鼠都跑出来了，一群群地发出各种叫声来袭击她们。至于司特范诺维奇呢，他睡得像一条黄牛一样，一点也不觉得。这一夜可苦了加塞林和马霞，她们极力和这群恶虫战斗，从这边滚到那边，从床上搬到地板上；然而恶虫到处追随着她们，而且老鼠也出来了。一直闹到天明，虫和鼠都逃走了，她们才得安静地睡几个小时。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一面靠着他们的手艺来维持生活，一面又借此来结识农民，开始他们底宣传工作。但后来他们发现在这里是不能煽起暴动了。三人又到 S. 城去。

在 S. 城内他们租了一间屋子，主人是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老年人，年纪有八十多岁了，长着飘飘的白须的脸上还带着光辉勇敢的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就同若许多人一起来 S. 城的 B. 伯爵底田庄上作工。B. 伯爵待他们极为残酷，有许多农民常常被鞭打到半死。因此农民便起来反抗伯爵，这老人便是反抗的农民底领袖。到后来几排枪和许多根皮鞭就把暴动压服了。他受着极厉害的笞刑，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

那时他们底宣传工作进行得很好，但不久本地的官吏听到了风声，说要逮捕这三个传道者。幸好他们三人听从了同情者底劝告先后离开了 S. 城在切尔加司集合。司特范诺维奇先走，加塞林与马霞同道。临行时凡认识她们的人无不落泪。那老人更是感动得厉害，他向加塞林说：

“我和我底妻子很快活地过了许多年了，然而我对于你所产生的感情，从不曾对其他的女人产生过。你是一个妇女

中的一个。愿上帝帮助你所做的一切事业！”

六

马霞回基辅去了。加塞林在切尔加司住了一些时候，就和司特范诺维奇同赴 Y. 县，后来又游历宣传到 Z. 地。

这时候他们有了大批的革命书报。加塞林白天做苦工，晚上便进行宣传工作。后来她自述当时的经验道：

我底会总是在夜间举行的。一间低屋子，墙壁和地板都是泥土的。梁木可与我们底头相齐，再上去一点，就是茅草。屋子里挤满了许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两个大人坐在高的砖炉上，摇摆着双脚，有时敲着表示喝采。这些人都是我底房主找来的。我底房主是我挑选出来的一个勇敢的农民，而他又去挑选了那般不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我使他们记起他们所受的笞刑；我指出那些终身残废的人，我又指出那些丈夫死于鞭笞下的女人。当我问，是否人应该永远受鞭笞的时候，他们就极其猛烈地叫号起来了，他们底叫号声是如此猛烈，以致隔壁的三四条牛都吼起来，需要人过去镇静它们。我又问他们孩子底生活情形，有几个农妇回答说她们底孩子在去年冬天就死了。我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家只有最硠薄的土地。要得自由，要能生活，人民非有土地不行。我从大衣里取出寓言书，这些寓言是写来宣传我们底主义，激起

人民对自由之爱慕的。于是在深夜里，一盏微弱的灯光，照耀着那一堆圆睁着眼睛的农人底宽大的脸，他们带着敬畏的眼光望着那神秘的东西——一本书。

这些书是花了重价秘密印刷出来的，它们底效力比口头宣传要大两三倍。印书底费用虽大，然而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有图书、珠宝，值价的衣服和毛皮出卖，可以卖大批的钱，而且随时有同志加入又可捐助经费，我们又没有个人的耗费。

我时常因为被侦探认识了，便不得不在工作未完的时候很快地离开了我定居的村庄。那么，我底会场里的听众就会跑到一个能够诵读这些奇异的寓言的农民处去集合。他们还想着我，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别一个人又乔装到他们中间来了。

在一八七四年有两千多个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到民间来了。你们说，这是令人厌倦的工作。不错，如果农民是粗笨、迟缓的，自由的精神就似乎只是幻影了。然而只要自由的精神一旦发展成为实在的东西时，我们就不会觉得厌倦了。我们有时又得和同志们把握。我们常能互相勉励，因为大家都看见农民已经接受我们底主张了。要占有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祖先们底梦想。他们底热望起来了。坚决的鼓舞的话语从一个团体传到别的团体。秘密的组织成立了，通信的暗号发明出来了。运动广布了俄国的三十六个大省份，而且一天一天地组织得更好。人民底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九月，加塞林又同司特范诺维奇到T地去从事宣传工作，但，她后来就在那里被捕了。情形是这样的：

在T地时，她和司特范诺维奇寄宿在一个农民家里。房东底妻子病了，他雇了一个婢女。司特范诺维奇不久就因事到基辅去了，把他底行李留交加塞林照管。加塞林每天早晨要到市场上去买食物。有一天她买了两个苹果、一小片猪肉向家里走去的时候，路过那旧王府底断井颓垣，心里正想着将来有一天沙皇底宝座会像这样让给虫蛀的，忽然一辆马车从后面飞驰过来，她先听见了车声便掉过头，一个高大的警官坐在车上。他向她粗暴地叫道：“站住！”

她知道事情不妙了。

“过来！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阿洛夫省。”

“你底护照在哪里？”

“在我家里。”

“好，坐上车来。如果你有护照，我们不久就会看见的。”

一阵马蹄声中马车飞驰走了。警官并不曾问她底住处，但车子却是向她底家去的。加塞林知道警官一定到她家里去过，而且还发现出什么来了。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茅屋底窗户都被取下来了，为的是透进更多的空气。那个婢女站在一株老树底旁边。她底面孔成了死白色，而且昏迷得像痴呆了一般。原来事情就不在她底手里。有一天她偶然在加塞林底行李中发现了文件和地图，这在农家是很不寻常的。她把这件奇事告诉了朋友们，后来

就传到警察底耳里了。

“护照!”警官咆哮道。

车夫跑进屋去把房东叫了出来。

“护照!”警官又狂叫道。房东跑进去把护照取了出来,挥舞着给警官看。

警官便讯问加塞林,又伸手去捉她底下颌,这本是上官习惯对农民的样子,加塞林觉得被侮辱了,便发了怒。这一来就使警官知道她不是一个农妇了。警官底眼里射出了恶意的闪光。他转身向那战抖着的房东问道:“她底东西在哪里?”房东以为警官疑心加塞林做了贼,问的是贼赃。他知道她是清白的人,便答道:“老爷,她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那却又是什么呢?”他指着房角里重的行李说。

“啊,那都是她自己底东西。”

“好,好。我正要那些东西。带到这来。”

于是房东把那些包袱拖到房子底中央,打开给警官看。

“呀!”警察抽出了一些革命小册子,高兴地叫起来了。“那么,你还能读书写字?”加塞林并不答话。她坐在一个大木柜上吃着她刚买回来的苹果,态度是异常冷淡,异常安静,好像她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没有一点关系。那警官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自从做了警官以来,办过的最重要的案件就是去寻回一口走散了的猪,或追回几只被偷去的小鸡。现在居然捉到一个革命党,在他不可不说是一个非常的凯旋了。这时在窗外、在天井里、在房子内聚集了一大群人,男女老幼都有,

大家都怀着恐惧与好奇心。

警官鼓出两只眼睛高声向群众宣读革命党底宣言。凡是激烈的地方使他发了怒，他更大声读出来。他又叫人把县吏请来，县吏又高声把宣言朗诵一遍，他们又把牧师请了来，牧师也把革命党底宣言重念了一遍。在他们，以为这些话是大逆不道的，而在场的听众底心理都正相反，因为这里面所说的都是农民渴望的东西。听的人就越加多了。忽然警察署长到了。他问加塞林道：“这是什么？”

“宣传品，你们底县吏刚才曾拿它来煽动人民。”

“搜她，”警察署长说。

于是几个农妇便把加塞林带进一间小屋里，关上了门。然而她们不肯搜她。她们都哭了，一面又称赞她底镇静。她身边只有两个卢布，一个白信封和几根燃过的火柴。

这时加塞林就被押送到那个旧王府中，囚在黑洞里。她告诉我们第一次的经验道：

当我走下去的时候，发现了两个昏迷着的可怜人。我是被推进来的，那重门就被用力关闭了，门闩在黑暗中响着。我向前走了一步，脚滑了一下，因为地板上积满了屎尿。……我倒在一堆干草与破布上面。一分钟后我又恢复了知觉，连忙跳了起来，满身爬着虫虱。我靠着墙壁，然而墙壁又是湿的。所以我整夜里都站在“黑洞”底中央。这就是西伯利亚的开始了。

就在这时候她所焦虑的还不是她自己底事，乃是怕司特

范诺维奇回到此地后被捕。她被移入监狱之后，有十二个全武装兵士看守着她，但她居然设法给基辅通了一个消息去。

不久她就被移送到彼得堡监狱去了。在那里她等候审判，共候了两年，终日就在那个九尺长，五尺宽，七尺高的囚室里，这真是一个禁锢自由的铁笼了。她又说：

在第一晚上我躺在黑暗中自诟道，不管这个灾祸，我们底战斗是必须继续下去的，不过我有点为这战斗而恐惧，好像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东西而恐惧一样。我躺着不动，那单独禁锢果然有了效果，使得我底心不安宁了。忽然我坐了起来。我听不见什么声音。我又躺下去了，我底耳又靠近那根支着我底床的铁管。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我曾听见说过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中所计划出的叩壁底方法，但我现在记不起了。到后来我有了一个观念。俄文中共有三十五个字母。我急敲着壁。一下，两下，三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我便敲三十五下。没有回答。我又敲着，这一次敲得很慢，很清楚。我底心在跳动。从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狱卒走近，而且从我底门口走过了。他底脚步声渐渐消失了。突然——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最后一次也接连敲了三十五下。于是我们便慢慢拼出字，拼出话句来。靠着这笨拙的方法，别人又把轻便的方法教授给我了。此后两年中间那铁管差不多无一刻不在谈话的。我们谈得多么快啊！……

一八七八年我们底审判开始了。在三百多名被囚者中，有一百多人已死亡或疯狂了，我们这一百九十三个生存者拥挤在一个小的厅堂里。其中有大半数的人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团体的，从前我和他们差不多无日不见面；现在我见着他们，我底脑筋异常震动。他们在相貌上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色灰白，形容枯瘦，举止迟钝，然而他们却依然保持着那个强健的心。我们底审判，简直是一幕滑稽剧，裁判官是由“沙皇”特别委派的，另外有特别陪审员七人，其中只有一个是属于农民阶级的。他们把我们分成许多小组，十个一组，或十五个一组。这次审判继续了半年之久。当我底轮值到了的时候，我在法庭上宣言反对这种滑稽剧。我向裁判官说：“我幸而得为俄国社会党和革命党之一员，我也以此自豪；因此我不承认‘沙皇’底法庭有权威来裁判我。”为了这一段话，我便立刻被逐出法庭，而且因此我底判决又加上惩役五年。俄国妇女因政治犯罪而被判处惩役者以我为第一人。我底刑期一满，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了若干年。

在一个夜里，我们中十个人被秘密地押出监狱（以后每晚押出十个）。下面街中有十一辆运货马车，每辆车驾着三匹马。我被放进了一辆车，两个强壮的宪兵在我底两边坐着，监守着我，车夫就坐在我底膝前，我要在车里住两个整月。车夫在马背上一鞭，在一阵马蹄声中，我们底五千里的旅程就开始了。

七

从欧俄到西伯利亚去的路程可算是一条死路。政治犯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很少能够活着回来。关于西伯利亚旅途中政治流放人底情形，已经有不少的诗人文士描写过了，因此我们一听见西伯利亚四个字便觉得不寒而栗。加塞林也曾将流放路途中的恐怖告诉过人，睡觉的驿站小屋里墙壁上全是虫虱底血迹，又充满着难闻的恶臭，并且还是传染坏血病、肺病、伤寒病的地方。“不断的脚镣手铐底响声，妇人底哭泣，病小孩底叫号常常穿过墙壁来到我们底耳里。”最后她到了加拉监狱，在那里住了十个月后又被移送到巴古金。这是近北极圈的一个荒野的小地方。她到巴古金时，正是二月，天气异常寒冷，甚至到寒暑表(摄氏)零下四十五度。

加塞林在巴古金过了两年极其困苦的生活以后，就借着一个机会偕同三个青年学生(都是政治犯)逃走了。四个人在荒凉的野地上走了六百多里，在饥寒交迫之际到底被捉回了。加塞林被带回加拉监狱，被判受皮鞭四十下，但这次判决并未付诸实行。

为了惩罚我底脱逃起见，我又被判决在加拉监狱做苦工四年，并且受四十下笞刑。一个医生到我底囚室里来，看我底身体能否受得住那四十下笞刑。我明白他们底用意。因为对于女政治犯从未经用过笞刑，他们现

在不敢鞭打我，故意说我患病甚重不堪受罚，这样开了一个先例，将来他们就可以对女犯采用笞刑了。我坚持说我是十分强壮，如果他们不立刻鞭打我，他们就没有权利来通过这样的判决。这判决到底没有实行。

这四年的惩罚也是十分难堪的。她自述道：

整整有三年多我们不曾呼吸到户外的空气了。我们还不得不时时和那加之于我们的恶劣待遇奋斗。有一次在受了虐待之后，我们绝食了九天，终日躺着恰像一排死人。后来狱卒让了步，我们才开始进饮食。我们常常采用“同盟绝食”的方法，因此我们常被狱卒把手足捆起，由强健的哥萨克兵把食物灌入我们喉咙中。

四年的惩罚期一满，加塞林就被流放到塞伦金斯克去。从加拉到塞伦金斯克有一千多英里的路程，犯人完全步行，同行者有百余人，其中只有加塞林等两个女犯，佐治·克伦就是在塞伦金斯克会见加塞林的，克伦底文章我已译在本章第一节中了。

她在塞伦金斯克住了八年，这八年的生活可算是她底流放生活中最困苦的时期。她时常找不到一个谈话的人。在冬天，寒暑表降到零下二十度至五十度，她冷得没有办法，常常把她底椅子放在砖炉顶上坐着，头达到屋顶的茸草。这时候她底心情可从下面的话中看出来：

我底心里燃烧着一个热烈的欲望，我极欲脱逃，再开始我们底战斗。我悲哀着，像一只鹰被囚在狭小的笼

里一样。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脱逃，我预备着冒万险，历万难来实行脱逃。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塞伦金斯克的八年留了一个忧暗的空穴在我底记忆之中。

然而这并不仅是为着她个人底困苦底缘故。“一想到我底同志们底受苦，我就把自己底苦痛完全忘掉了。我一天忙着劳动以便能够把所得的钱送到黑暗的监狱去，送给那些在冰天雪地上受冻挨饿的被忘掉的我底同志们。”

八年期满，她便得着了护照可以旅行全西伯利亚了。她又西伯利亚各城市中住了四年，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她底流放罪完结了。她便离开了西伯利亚走向欧俄，回到自己底家中去了。

八

加塞林回到欧俄后，先花费了三个月功夫去拜访她底亲戚和老友。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看见她底姊姊比她老得多了，这时她便知道坚强的信仰是保持健康最有效的东西，所以只要有坚强信仰的人即使处在最大的困苦中，也要比较那些过安慰与奢侈生活的人更能保持着健康。她说起她底姊姊底家庭：“他们天天挂虑着咖啡，挂虑着菜园，挂虑着一切事情。我三十年来没有一件行李，什么都不挂虑。”

加塞林现在恢复自由了。俄国警察从此可以得着一个大教训：要毁坏“人的身体”是容易的，然而要毁坏那个被正义、

自由以及同胞爱之崇高理想所鼓励起来的，铁一般的“人的意志”却是很难的事。所以加塞林得着自由后就毫不迟疑地再投身在革命底漩涡之中，而且以更大的热心与忠诚来做革命的工作。自然这时候她看见俄国一般情形以及革命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以前的同志们中有许多已入了坟墓，有许多至今还憔悴在西伯利亚监狱中。另一代的青年又起来了，新兴的革命党人一半继承了前辈的工作，一半自己发现了新的道路，完成了新的理想，采用了新的战略。从前的民意社已不复存在，而是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了。加塞林自然加入了这个新党。她根据地底丰富的经验来从事组织与宣传工作，旅行各地，帮助同志组织地方团体，帮助新加入的同志，组织秘密通讯的办法，在秘密会议中演说，总之凡是她可以做的事，她都不辞劳苦地一一去做了。

这六年来火车就做了我底家。我们夜间常常在河里船上开会，或者白天在城里租屋中、在农家茅舍中、在树林中开会，但和从前不同的，就是现在常常有人保护我。

在一九〇〇年俄国政府秘密通令全国警察，逮捕三大革命党领袖。第一个就是加塞林，还有两个是她底同志盖尔书尼和麦尼可夫。盖尔书尼等二人于一九〇三年被捕，次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死刑又被减为终身服役。

一九〇三年社会革命党遇着很大的灾祸。大批的逮捕与搜查夺去了党中指导的工作者，夺去了最好的秘密

印刷所。夺去了大批的书报。这是应该立刻补救的。这时候党的工作在外国倒很发展起来了，这要归功于我们底又热心又有才干的亡命者，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出版党的机关报和通俗丛书以及小册子上。为了叫这些青年立刻回国来活动，我便第一次出发到外国去。一九〇三年五月我在阿德沙上了船，取道罗马尼亚、匈牙利、维也纳到日内瓦，当时党的中心人物散布在巴黎、伦敦、瑞士各处。

加塞林此行底结果甚好，果然有不少的男女带着许多书报和那本题为《在战斗中你才会得着你底权利》的小册子，回到俄国的革命战场去了。

九

一九〇四年秋天加塞林为了要求经济上的援助，便出发到美国去，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民与俄国侨民底欢迎。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俄国自由之友社欢迎她的大会特别热烈，据当时《妇女杂志》所载，波士頓F. 厅很少有那样多的听众。“当那位伟大的老太太站起来演说的时候，听众也全体站起来了。有许多人挥舞着手巾，有许多人把帽子抛掷在空中，无数的人从各方面向她吐出五国语言的敬爱之语，喝采底声音震得人耳聋。……”

俄国侨民对于她的欢迎更是热烈。在费拉得非亚时她在

一次演说完毕后，被听众胜利地举在肩上在会场内四周巡行，群众大声唱着俄国革命歌，直到把声音叫哑才闭了口。所有的人都跑上前来争着拥抱她。她底衣服几乎被扯破了。她底美国朋友恐怕这一次的欢迎会断送了这个老太太底性命，所以当群众抬着她走近讲坛时，他们便把她夺下了来。她力竭了，坐在一把椅子上，还热心地请求她底朋友们允许她再让俄国人抬起走。

谈起个人的印象，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曾写道：“看见这个银发飘飘的圣徒好像受着了一次祝福，她底外表的与内心的安静是非常惊人的。不管多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活，她底双手还保持着柔嫩与洁白之美丽。她底声音不高，却是极其温柔。她底微笑很动人，很天真。只有她底眼睛泄露出来她多年的受苦。她底脸是钢铁一般地强壮。她底双眼又说出了最深的热情。我们①一天早晨同坐在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底小屋里，她向我们叙述她底奇异的故事。她安静地说着，然而她所叙说的事却是非常可怕，使得我们底心弦不禁颤动了。忽然一声尖锐的敲门声，一个暗黑眼的中年人在门口出现了。他看着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时，他底一双黑眼睛像明珠一般地发亮了。他说了几句俄国话提起他们两个人生涯中的一件旧事。她立刻现出很大的快乐抱着他，吻他底双颊。他们两个底最近一次会面是在西伯利亚一个监狱中，那时候两人都是政治流放犯。

① 这里原有人名，现略。

一九〇五年三月华特夫人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写道：

不多天以前我走进了一所育儿室。四个从两岁到九岁的小孩子坐着，眼望着一个服装朴实的美丽的妇人。她底灰白色头发是向后面梳的，还飘舞在她底穴的头上。她叙述一个木偶底奇遇，她底眼睛里充满了快乐。那四个小孩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记得那个可爱的故事叙述者和她底迷人的故事。故事说完后，她坐在一把矮椅上，四个小孩围着她，她继续不断地谈着，谈得十分有趣，她一面又剪纸折成各种好看的东西——雄鸡、船、篮子、木偶等等，折得异常之快。几分钟后那个三岁的孩子便坐在她底膝上了，她对于小孩们的征服完成了。

那叙述故事的人就是俄国亡命者布列斯科夫斯基夫人。

她怎么能够在她底可怕的一生经验之中还保持着这颗新鲜的赤子心呢？她在监狱内和流放地中的同伴们死的死了，疯的疯了，病的病了。然而她一个人还健在。不仅是她底强健的体格救了她，救了她的还是这颗赤子心，再伴着一个活泼的想象力，一个诙谐的性情，一个对于未来之崇高的信仰。

“亲爱的夫人，经过了这许多年残酷的生活以后。你怎么不曾留着一点苦痛的遗迹呢？”

“呵，这是因为我相信进化的缘故。我知道他们是依他们之所信而行，而我呢，我也是依照我底信仰做去的。”

“那么你是被一个大的希望所支持着的么？”

“是，许多大的希望！”她这样回答。……

黄昏时分她坐在火炉旁，她底光辉的眼睛，她底高贵的面貌，她底和谐的音调，这一切使得她像一个光荣的女先知，她给我们带来了质朴、诗意，以及含着原始的美德与先知的灵感之伟大生活底献身。

加塞林底美国朋友们劝她不要回俄国去，但她觉得她底义务是战斗，而不是休息。所以在 一九〇五年三月她就乘船回俄国去了。同行者有著名老革命党柴可夫斯基和一个青年女子。她在美国募得了一万元美金做革命运动的经费。

她在美国三个月的宣传工 作很使她满意。她觉得当时俄国的一个宣传者在被捕、被囚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前所能做的工作，结果也不过得着这样的成绩。有人问她道：“你愿意为了这三个月的活动，就牺牲你底二十年或一生的自由么？”

“不错，”她安静地回答道。“只有靠着许多人都来做这件事，我们底可怜的人民才会终于觉悟，才会得着自由。我们还能做其他的什么事？许多人都走到西伯利亚去了，为什么我不去？”

一〇

一九〇八年加塞林被同党亚柴夫所出卖，与老同志柴可夫斯基同时被捕。这两个老革命党都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中

候审。柴可夫斯基得着朋友们(特别是美国友人巴洛夫妇)底营救，准许保释出狱；而加塞林呢，政府方面却因为她底案情重大不准保释。巴洛夫妇决定在一九〇九年春季赴欧洲到巴黎去和国际监狱委员会交涉。有人提议巴洛夫人先到俄国去一次，将加塞林保释出狱再说。巴洛君向他底妻子说道：“只要你能够帮助‘小祖母’，那么就去罢！我也愿意为她牺牲自己底生命，并且觉得这也是值得的。”

巴洛夫人在三月里便动身了。她刚刚到了圣彼得堡，便接到海底电报报告她底丈夫病重的消息。她连忙赶回美国。她回到家里，她底丈夫已经死去了。一月后她又出发到俄国去，并且携带不少美国名人底信件，她以为这一次总可以把加塞林救出来了。

巴洛夫人差不多要给俄国首相斯脱利宾跪下了，要求他允许她和加塞林见一面！然而那官僚是没有人心的。他不但允许巴洛夫人去见加塞林，甚至不许她和加塞林通消息。所以到两年以后，加塞林才知道她底忠实的友人为了她底缘故，曾两次远渡重洋。

巴洛夫人最后预备向俄政府上请求保释状时，觉得应该找加塞林底一个血族的亲人签名。加塞林底儿子尼可拉这时已成了成功的小说家，但他自幼即由加塞林底嫂子威娜养育成人，对母亲并没有大的感情，并且又不同情她底主义。所以他不愿签名。一个俄国亲王(柴可夫斯基底友人)便把尼可拉请来用午餐，在席上他向尼可拉说：“今天你底母亲老了，这里还有另一位老太太，为了你底母亲的缘故，她曾两渡重洋；而

你，你是她自己底儿子，你甚至不肯伸出一只手来援助她！”尼可拉被感动了，他签了名。然而这个请求状竟遭政府批驳了。

审判终于开始了。审判结果柴可夫斯基无罪释放；加塞林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请求释放加塞林的呈文雪片似的从英美两国飞来，但都成了废纸了，没有人读，至少没有人来答复！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巴洛夫人道：

我们看到了你底老友，握了她底坚定的手，吻了她底双颊。她还永远是那末坚定，那末勇敢，虽然她底强健的身体在年龄与环境之压迫下开始衰弱了。……

她底案情是全然无望了。如果她被判决监禁与惩罚罪，那么在这两年中间她就会死了。^①

审判继续了两天，这两天我和她同坐在一张凳子上，两旁都有带刀的兵士守着。

法庭问她底职业，她安静地而又坚决地回答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在诉讼全过程里她不时发言纠正公诉状内不合事实的陈述，否认证人底伪证，然而她总是以一个安静的自尊，与庄严的伟大底气概来承认她参加过党的工作。

啊！看见她底灰白色的头和直立的身躯被一群守兵拥着在法庭的走廊上不见了的时候，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这是我一生中所仅见的最高贵最勇敢的女人，她

① 她已有六十八岁，俄国法律对于七十岁以上的人才无惩罚罪。

自己甘愿投身在被践踏者底国土里，她被剥夺去了一切人的权利，她还要受着任何小官僚和狱吏底侮辱。我从没有看见过她底面貌像在静听判词的时候那般光荣，那般骄傲的！

加塞林这次被流放到基伦斯克，这是在利姆河中一个岛上的小城，离彼得堡有几千英里远。她底朋友愿集款作她底路费，使她在路上过得舒服一点，但是她拒绝了，因为她不愿一个人独享特权。在一九一〇年春季，他们一百五十个政治犯和一百个普通犯便开始向放逐地出发了。加塞林一路上很平安。当她和押送队经过曼楚加城时，一个政治流放人会见了她，后来那个人写信与友人道：

祖母于八月十四日过此地，她十分忧愁地问起约瑟底消息。“啊，在监狱里怎么过日子呢！不能够记忆那些事，也不能够说起那些事！”她底脸阴沉起来了，而在一刻以前她还是十分活泼，十分光明的。一想起她底不幸的同志们就使她底心上受着大的苦痛。我们与她见面时只有这一刻她是很忧郁的，其余的时候她总是十分活泼，十分和蔼，看见她这样子谁也不相信她已是将近七十之年，而且刚才在两年半的单独禁锢之后从监狱里出来的。我看着她底玫瑰色的脸（我注意看过上面并无皱纹）和闪光的眼睛，灰白色的头发从头布下露出来，垂在她底额上。……（中略）

这是很奇怪的事：记得我们在这年四月被押送到了

流放地时，一路上押送的兵士不断地问我们道：“祖母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望上帝允许我们见着她！”伊尔库次克全监狱的人都盼望看见她。全西伯利亚的囚犯和流放人都等着来看这个“奇迹的妇人”。

不幸火车在曼楚加停得不久。我们差不多没有时间来和她谈话，因为想见她，对她表示敬意的人太多了。她爱谈谐，她又遍吻我们。我们几乎来不及问候她，并提起许多朋友（自然你们也在内）致意她的话，卫兵便走过来说：“小祖母，请上车罢！”就停着她上车了。她指着一个与她同车的同志说：“这是我底朋友。一路上有他看护我。”……

在这年（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她到了基伦斯克。从她在九月二十九日寄美国女友的信中我们知道彼得保罗坐中两年零八个月的孤独禁锢几乎完全毁坏了她底健康。然而她也不曾把时间荒废掉，“我在监禁期间曾写了不少的文章，陈述我对于社会生活各问题的意见：有关于儿童与青年底教育者；有关于妇女底命运与责任者；有关于心理学上的某一些问题者；有关于艺术与文化者。总之我到底把我底思想和我底一生中所积得的经验一一解释出来了。……”



加塞林在基伦斯克的生活我们可以从拉查列夫致布拉克

威尔女士信中(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看出来：“西伯利亚的流放人可分为两类……第二类是受过审判，被判决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的。他们底一切公民权利都被剥夺了。政府不给津贴与他们，不过法律上规定他们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住了半年以后，便可以领着一张护照自由旅行本县各地，寻找工作。祖母就是属于这第二类的，但这类人享受到的权利都被剥夺去了。……她得不着津贴，不能自由迁移，也不能旅行各地寻找工作，而且连自由地在这个小城的街道上行走也不能够。她永远受着警察底监视。”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拉查列夫致巴洛夫人信说：

在利娜金矿的和平的罢工潮发生后，工人中被军队枪杀与打伤者共有男女老幼八百余人，同时所有的政治流放人(有许多还在那里作工)都被驱逐出境。……警察曾来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家搜查过两次。他们把她底一切报纸、信件、画片、照片等等都拿走了，但过后又还给了她。她现在真正被囚禁在基伦斯克。同时她又不休息地尽力帮助饥饿的流放人，并且利用他们的关系，得以间接对于本地居民作医药上及其他的帮助。全体居民都爱她，但因此又引起警察们底疑惧。我按月送她四十卢布。

在一九一三年加塞林曾实行脱逃，但不幸功败垂成，她又被捕了。这年十二月十四日拉查列夫致布拉克威尔女士的信说：

祖母被捉住了。

所有俄国报纸，都说她平常每天总是在她底同志流放人呈拉狄米洛夫家里用午餐，六个侦探(两个两个地替换)照例在她底来去的途中监视着她。在十一月十八日她照常去呈拉狄米洛夫家用午餐，侦探照常跟着她。然而在黄昏时分，一个流放人安特列夫穿了地底衣服，伴着几个朋友走回地底家中，后面跟着侦探，但侦探并不曾看出破绽来，同时祖母便乘马车出发了。此后几天之内，侦探还不曾发觉出来，而假的祖母一天便躺在屋子里。她底午餐也在家中吃了，和从前她身体不大舒服时一样。每晚上屋子里灯光照常燃着。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侦探发现她已经逃走了。她要乘马车到伊尔库次克须得要七八天的功夫，地方当局立刻疯狂起来。他们先打电报给伊尔库次克总督和彼得堡内务大臣。命令下来了，悬赏一千卢布来缉拿她。

十一月二十三日，伊尔库次克总督带了八个宪兵和五十名警察在路上去截留她。令人十分惊异的，就是他们在离伊尔库次克城只有七里远的地方就遇着她了。如果再有两点钟的时间，她便可安抵伊尔库次克，在那城里找个安全的住处了。兵士们遇着一辆马车载着一位绅士。不幸他们发现出来这位绅士就是祖母，她便立刻被捕，押送到伊尔库次克监狱。

这对于她底朋友们是一个绝大的打击。然而我知道她底焦虑不在为自己而在为他人。她在事前便嘱咐我，

如果她底逃走失败了，叫我尽力来安慰你以及所有她底友人们。

为了这一次逃走的缘故，她又被单独禁锢在伊尔库次克狱中过了两年，以后便被驱逐到更北的流放地去。就在伊尔库次克狱中她也不曾感到一点后悔或悲哀，她当时寄朋友的信函中还充满了快乐的句子。如一九一四年四月致爱伦女士信中说：“世间最美丽的事无过于为邻人所信任，和知道他们与我们间的关系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改变的这两件事了。有了这确信，一个人便觉得自己是很强健的，可以克服一切的困苦与灾祸了。”九月致布拉克威尔女士信中又说：“我刚读完王尔德底《狱中记》，他底心理和我底心理是何等大的差异啊！那些永不知道人类心灵之休戚相关的人是多末可怜！……在八个月内我想就可以出狱了。”十一月致布女士的信中又说：“我底健康并未变坏，我相信这个冬天我一定会过得很好。……人道，就是我底激情；而在我底希望中使得人道完成的人就是妇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拉查列夫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说：“我方才收到祖母底一封长信。她现在已经到了七十二岁高龄。她说她决定和命运女神作一次‘交易’。她决定把过去的七十年抛开，从七十岁起开始她底新纪元。她如今只有两岁。……”

五月，加塞林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说：“今天我得到你底信，你说起要我将来写我底生涯的故事。亲爱的孩子，我正正经地告诉你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底历史，我也不曾感觉到它。我底心灵无时不在动作，而它底动作方向从我底幼年以来就不

曾变更过，所以它底历史一定是很单调的。我自己对于我底物质生活并不感到兴趣，因此我也就记不清楚了。我每次读到我底老同志们底回忆录时，我常常惊奇他们所写的关于我的话。这使我微笑。我要努力追忆起我底过去。我所能确切地说及我自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底全生涯中我曾想做一个好人，一个有价值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断地在改正我底过错和缺点。对于他人，我底观察之对象乃是他们底道德的倾向，他们底心理，而非其余的一切。我还要说我所顾念的特别是将来。过去与现在之感动我，仅在它们能引到某种程度的人类生活之‘完满’，或是给我以这种希望。我底人民之进步——我不断地想到这事；我对于各国底进步非常关心，我知道它们是何等互相依靠，不能分开的。”

六月，她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又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底通信处是：亚洲，雅苦次克。我底朋友们努力想使我得着政府允许住到较南的地方去，但他们底努力失败了，我将被放逐到基伦斯克北部二千里远的地方去了。这并不使我惊异；现在我先告诉你，基伦斯克的生活充满了不断的与难堪的压迫，因此变更地方倒不是可怕的事。我只忧愁在监狱里多住了两个月，因为运送队要到七月内才出发。

雅苦次克底寒冷常在零下五十度。冬天共继续八个月之久；并没有春天，因为到了五月，地上仍盖着积雪，八月里夜间仍有冰冻。夏天只有两个月，有时酷热，

所以地上能生长一点莱菔。

不过我要到的地方是雅苦次克省省城，那里有较多的居民，也有医生。那里也有一些政治流放人，所以你倒可为我放心了。我要努力保养身体，而且靠着你们大家关心我的缘故，这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愈生活下去，我愈明白我底生存之根柢乃是一个对于人类之热烈的、不可克服的爱。我相信这种爱自身便包含着一个无限的智性的“完满”（一个会使生活成为无限快乐之道德的升高）之一切胚胎。生活在人类生活全体中的习惯使我和普遍的心理连系得十分紧密，其结果我自己也消失在普遍的心理之中，而且不大关心我个人的命运了。因为一旦和众人底命运分离之后，我个人底命运对我也就不是亲密的了。

加塞林出发到雅苦次克时，一个政治流放人会见了她，和她告别。那个人自述道：“她稍微有点聋了；她底头发已经雪白了。然而在精神上她还是永远和从前一样。我初见着她，不禁放声痛哭，把我底头藏在她底胸中。‘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有什么事！我不喜欢看见我底孩子底悲哀的脸。孩子，快活起来，高声说话像一个战线上的军官一样，我有点聋了。’我注视着她；她底母亲般的慈爱的眼里包了一腔眼泪；她在微笑。我不能够说一句话。别的孩子和女儿还在等候着他们底轮值呢！”

据说加塞林到了雅苦次克后还要被流放到北极圈下的B.

地。但后来因为美国报纸底猛烈的反对，政府底这个计划并未实行。忽然政府要把她押送回伊尔库次克。

一二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加塞林在《涅瓦报》上写道：

我底心中有了如许多的生命，我决不能想象到我底活动已完结了。监狱中长久的岁月，以及雅苦次克的流放生活都不曾损坏我底精神，我底内心向我说：“我要历这一切而生活，我要历万事冒万险而生活，生活到看见那光荣的自由之日。”

在伊尔库次克我病得很厉害，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医生极力瞒着我，不使我知道自己病势之危险。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很奇怪的。当我底心灵中正充满着对于日近一日的革命底胜利之完全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居然能够想到我底末日到临！这是多末奇怪啊！……

我等着那报道自由的钟声，我奇怪为什么钟声还不大鸣。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里民众的愤怒相继爆发，那时候我底一只足已踏进西伯利亚的雪车，只忧愁着雪路已开始融化了。

三月四日一个电报到了明路新克，宣告了我底自由。我就在那一天往最近的火车站阿金斯克走去。从阿金斯克再向前走，我开始和兵士、农民、工人、铁路雇员、学生，

以及一大群可爱的妇女们接触了。……

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底第一件工作便是西伯利亚的十万个政治流放人之特赦，加塞林一到莫斯科就大受民众与临时政府底欢迎。她被放进沙皇底御车内，由一队兵护卫着，到了当时莫斯科国会开会的地方。在那里她又受着正式的欢迎。

在彼得格勒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她。欢迎会最先在彼得格勒车站内的皇家接待室中举行，这在从前只是接待皇族的地方，不料如今人民居然在这里欢迎一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老流放人了。所有仅存的老革命党这一天都在这屋里等候着加塞林。这所客厅里堆满了无数花篮与花圈，花中以红郁金香为最多，上面都挂着纸牌，写着“献给我们底亲爱的祖母”，“献给俄国底殉道的女杰”。火车一到站，群众开始大呼“来看祖母啊！”

这个“老女杰”微笑地指着她底车内堆满了的花说，“我想全世界中没有有一个做新妇的姑娘会收到这许多花的。”不错。这许多花，都是她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到彼得格勒时一路上人民送给她的。临时政府要人克伦斯基先送了她一束红玫瑰花，他们接吻了三次。他扶着她走下车。但他先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让群众来看她。他一面脱下帽子说：“同志们，俄国革命之祖母到底回到一个自由的国中来了。她曾在地牢中住过，她曾在利娜惩戒地上住过，她曾受过无穷的苦刑，然而现在她是在我们这里了，又快乐，又勇敢，让我们来为我们底亲爱的祖母三呼万岁罢！”

霎时间月台上平地起了一个大雷，群众简直发狂了。后来群众让出了一条路，克伦斯基把加塞林引进站内接待室。那里有许多代表团正在等候她。一群看护妇舞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俄国革命的祖母万岁！”）迎接她，把花献给她，一个代表致辞道：“在这俄国底幸福的日子所有的姊妹们都愿对你献上她们底微小的，崇拜的祝辞，我们这些看护妇只不过是她们中的一个极小部分而已。”代表说罢，妇女争上前来吻她底手，男子们脱帽大呼“万岁”，加塞林便在这群众欢呼声中同克伦斯基乘汽车到劳工代表会去了。

在那里兵士代表会底会议正在举行。听说“祖母”到了，每个人都站起来迎接她。这次欢迎会继续了很长的时间。克伦斯基是第一个发言人，他说：“祖母，我很荣幸很快乐地以俄罗斯共和国与临时政府名义来祝贺你。我很高兴来祝贺你，你这一个曾被旧政府所迫害，而我们现在又光荣地见着的人。”蔡知君又代表兵工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发言：“我祝贺那个鼓舞起俄国革命的女人。让我现在以同样对于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来希望她继续鼓舞起我们去做解放俄国之更进的工作。我再来谦卑地祝贺你，向你致敬！”随后各团体代表都来祝贺她，最后她很感动地致答辞道：

我已经走过很长远的路程了。我现在老了，不能够记忆起一切的事情来。当我走到月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人民；我看见周围有无数的工人。我来到这个自由之庙堂，我看见军事组织，我看见工人，我看见哥萨克兵，我

看见士兵，我今天何幸而得见全俄底各种代表。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幸福么？这个正证明出来我们大家能够不怀私见，自由地快乐地联合如一个人而进行工作。

亲爱的同胞啊！五十年来我置身于俄国革命党之中，我可以毫不矜夸地说我是最忠于职务，最重视义务的。我们底党内从不曾有一次因我之故而起争端的。我总是尊重同志们底意见与党底纲领的，所以我常常主张使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得着一个友谊的，圆满的解决。

我不是看见你们大家都是同一理想底孩子么？兵士和工人不是一样的么？你们都是我们俄罗斯母亲底孩子，为什么你们也要互相争闹起来呢？

一个兵士走近了讲坛，她从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花给他。那兵士温柔地吻她底手。她温和地抚摩他底头发，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着自由与平等，那么我们之间彼此还会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什么争端呢？为什么要互相倾害呢？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底大敌，像威廉第二那样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够克服我们间的小小的异点么？

各方面来的这一切的祝贺都是献与一个人——这一个你们大家称作“祖母”的人，这可以证明你们是万众一心的了。每个人都说：“我们愿为自由而死。”在这句话里我看见了连带性。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克服敌人，则巨大的困难将降临到我们俄国人民之身。他，我们底死敌，要来拿他底法律来统治我们。我知道你们决不希

望谁底统治，你们只愿做自由的人。我们并没有野心，我们也不想征服他人，但别人来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俄国人是甘愿受人践踏的！

我底孩子们，世间没有无代价之物。没有艰苦的工作，没有巨大的牺牲，完全的自由是不会实现的。你们也许比我更懂得世间没有一事物是自己完成的。——精神和脑筋都是必需的东西。俄国这三年来已经受够别人所不曾受过的苦了，也许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还要受更多的苦呢！那么让我们联合起来，联合成一个，我们努力不要叫那些小小的差别来阻碍我们走到我们底主要的目标去，——我们底主要目标就是全俄人民底自由与幸福。

加塞林演说完毕便坐在椅子上，克伦斯基、蔡知等人又把她底椅子抬了起来，放在他们底肩膀上，走了几转，最后便抬到 E. 厅。在那里又有别的欢迎会。一队由战地回来的兵士的代表祝贺她道：“祖母，我们以旧俄二万五千戌兵底名义来祝贺你！”

她温和地轻拍着那个发言的兵士，给他一朵玫瑰花，一面说：“回去告诉他们说，祖母送了他们一朵玫瑰花，并且祝福他们。”

一个红十字会看护妇走上前来，说：“祖母，以北方前线看护妇底名义让我来吻你。”祖母便吻她，也给了她一朵玫瑰花。

一个伤兵走上前说：“我受过四次伤。我底兄弟为自由牺牲了性命。让我以伤兵底名义祝贺你。”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这是祖母底回答。

国会中哥萨克议员那查洛夫以国会全体议员底名义来祝贺她：“伟大的俄国祖母万岁！在你底青年时代你散播自由之种子。在你底老年你使得俄国幸福！和平之护持者万岁！俄国妇女万岁！”

不久加塞林又和克伦斯基乘汽车赴歌剧院的欢迎会去了。在那里还有两个革命老将，就是妃格念尔和乐巴丁，两人都是在著名的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内住了二十年以上的。他们三人都受着群众底热烈的欢迎。加塞林在她底演说中极力鼓吹人民结合起来，不要自相分裂。她说力量是只能由联合中得来的。她又指着妃格念尔与乐巴丁，叙说他们在从前如何为革命奋斗，如何在革命战线上互相接替，并且又说他们之所以如此强健，只是因为他们同志彼此间并无一点隔阂。她希望民众都在自由之旗帜下亲密地联合起来。

加塞林说毕，乐巴丁便说道：“为了我们得到的这个自由，我们已付出绝大的代价了。我何幸在垂死之年（我已经快到又聋又瞎的时候了）还能够看见一个自由的俄罗斯底胜利。”妃格念尔患着病，所以没有发言。这次欢迎会自然也是十分热闹的。

加塞林后来又在莫斯科女权增进协会发起的大会中演说道：

你们把我欢迎为一个女杰。事实上你们大家从没有听见说我做过什么英勇的事业，不过在我一生中我永远

是在做一个忠实的兵士，默默地做我底工作，就是这样，我也是不能够时时做这个工作。三十二年监狱内的和西伯利亚的生活使我不得不做一个懒惰的人；只有十一年“地底下的”秘密生活，才使我有机会来做我心里所愿做的活动、工作。但这并不是英勇的事业；这是平淡的、日常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也正是人民需要的。

世间并不需要什么英雄的行为。不幸有许多偷懒取巧的人想象着去做出一点奇特的英雄的事迹，以为这是必需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了两条路：——登上一座高山之顶做出一件震惊全世界的非常的英雄事业来；否则便坐着一事不做。其结果这类人便终日懒惰地坐在家中，一事不做。

诚然，有时候，时势要求着而且产生出伟大的天才，心灵与行动之巨大的力量。然而我愿意你们紧记着现在还有许多平常时期的工作待人完成。现在最重要、最需要的不是英雄事业，而是平淡的工作。

我底最大的宝贝就是我底对于人民的无限的爱。许多和我共同工作、共同受苦的人都有这一个宝贝。不过我一个人幸而有强健的身体，得在他们死后而残存到今天。我们都是志在给人民带来光明与自由。现在我们这一般后死者底义务就是更艰苦地工作，使那个目的得以早日实现。

我现在的愿望是组织一家书店，专门出版平民需要的读物，而且尽力散布于平民之中——这些书报都是用

最浅显的文字写的，要使他们大家都懂得。而且还需要组织一队青年把这类书报尽量散布于全俄，穷乡僻壤都要散布到。几日后我便要开始做这种工作了。我也许可以得着一辆火车(因为我没有家)游历全俄，去和那般需要我们底言语和行为的人会面、谈话。

同年五月三日致布拉克威尔女士的信中她又说：

……我现在正旅行全国，去听，去说。长期的受苦倒有了效力。到处都散布着友谊，每个人都愿见这个老妇人，她曾很长久很诚心地爱一切受苦而愿求得自由的人们。我底声音现在已不够表明我底意思，我底一个年轻的“孙儿”伴着我，我不能说完的话总是由他来接替说下去的。农民、工人、兵士以及所有的青年都赞助我们。

这年九月，美国联合通信社特派员看见她住在冬宫里忙着做散布书报与工农及前敌兵士的工作，她说她和同志们已有了一百四十家小印刷局来印平民读物。

十月二十日正式国会开会，加塞林也是一个议员，克伦斯基当时做内阁总理，他在开会辞中提议推举加塞林为议长。她底计划是尽力解决土地问题，使土地归农民所有。这计划一部分的农民自己已经实行了。

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瓦解，列宁一派的多数党得势。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有一部分势力，但加塞林不是左派。后来多数党专政，社会革命党左派亦受压迫。加塞林因为在俄国不能做自己底工作，在一九一八年就离开俄国到美国去

了。在美国她曾表示反对多数党专政的意见。以后她的消息我们就不大知道了。总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她还是一个漂泊在异国的亡命者呢！

我底故事到这里完结了。最后我想引几句加塞林底话来作本文底收场。她有一次致一个美国友人信中曾说过：

我们应该拿我们自己底例子来鼓舞人民底心，我们应该使他们熟悉更好的道德与更高的理想，因而给一个更纯洁的生涯之观念与他们；我们应该唤起他们底最好的感情与最强的原理。我们应该叙说真理，不要怕得罪听的人；而且我们还应该拿我们底行为来证实我们底话。

加塞林自己确实这样做过了的。她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过几句诗一类的话语，

I would be tru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trust
me;

I would be pur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care;

I would be strong, for there is much to suffer;

I would be brave, for there is much to dare.

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兼有着“真实”、“纯洁”、“坚强”、“勇敢”这四种美德的女人！

八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①

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日谢米诺夫近卫联队司令官冈将军在彼得何夫车站被一个青年女子一枪打死了。这个女子底姓名是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她当场被捕，但是无论如何总不肯吐露她底真姓名，也不肯招出她底同党。不久一个宪兵队官把她认出来了，因为她从前也曾被逮捕过，而且他曾审问过她。在八月二十四日这个女子就在军事法庭中受审了。这个军事法庭是由六个联队长和一个将军组成的，庭长自然就是那个将军，另外还有宪兵做证人。地点就在彼得保罗垒内。齐奈达是个身材短小、面貌和善的女子，然而她底态度却极其勇敢，她坚决地不肯站在被告席中，她说这不是一个法庭，这是沙皇底刽子手底屠杀场，她不承认这所谓军事法庭有审判她的权利。法庭要她说明她刺杀冈将军的原因，她便回答以一篇长的演说。这篇演说在俄国，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不朽的：

杀人的权利

我是社会革命党底一个党员，也是现在北部战斗队

①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Зинаида Копыленникова (1879—1906)。

的一个人，我把冈将军杀死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底理由如下：我相信谁也不会忘记去年十二月里冈和烈曼在莫斯科所做的事。他们像杀什么天大的仇敌一般地杀死了几百人。我常问，为什么莫斯科人民会这样地被屠杀呢？回答是：——因为工人在贫穷与愚昧中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一方面又受了尼古拉二世底“立宪宣言”和政府底政策二者之欺骗，所以竟敢于举起反抗之旗帜来反对那般多年的压迫者。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被屠杀了。我杀死冈，因为他谋杀了自由之先驱者；我杀死他，因为他用无辜者底血液淹没了莫斯科底大街。

我被捕以后，你们问我：“谁把杀人的权利给了你呢？”我是社会革命党底一个党员，我便拿我底同志们先于我所答复过的话来回答你们：“我们底党决定对于政府底滴血的白色恐怖以赤色恐怖来回答。”这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政府逼着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战斗方法。因为我是从平民中出身的，——我底父亲是一个兵士，我底母亲是一个农家女儿，——我便要代表平民来质问你们：谁又给你们以权利来把我们囚禁在愚昧无知中、在贫困中、在监狱中，放逐我们，罚我们做苦工，而且把我们成千成百地枪毙和绞死呢？这种权利是谁给与你们的？你们用武力占据了 this 权利，你们又拿你们自己造出来的法律来证明它是正当的；然后又有牧师把它加以神圣化。然而现在一个新的权利来了，这是人民底权利，它要比较你们底非人的权利正当过千万倍。你们已经宣告和这即将

到来的权利决一死战了。

一个女教员底经历

我现在略略叙述我底生涯。我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被派往李夫南省底一个远僻的乡村里去教育儿童。这个学校是省立的，专门为教育爱斯多尼人而设。本来俄国政府在从前和在现今一样，极力想把波罗的海各省完全俄国化，所以设立了许多这样的学校，男女教师都是俄国人，只用俄国话教授。我服务的那个地方是很沉闷的，三面都是树林，还有一面乃是拍蒲湖。这里的居民穷得吓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算是解放了，然而没有人把土地分给他们，土地还是在地主和政府手里。因此这些居民只能靠钓鱼为生。我自己是在穷困之中生长的，穷困底滋味我已经尝够了。我并不害怕它。可是我惊奇那些人既不想办法改善他们底状况，又没有对于前途之一线希望，在这黑暗的天际中，永无一点光明；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不过我不懂他们底语言，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我只能在学校里服务，但这工作又使我觉得讨厌了。我只能用俄国话教授儿童，我可怜那般被强迫来听异乡话的小孩，他们以忧愁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问，“为什么不许我们说我们自己底土话呢？”

我在这个学校中服务了一年，便到圣彼得堡省彼得何夫区底一个乡村里，在一个村立小学校里做教师。在

学校底前面住着一个宪兵，后面是乡村警察；在邻近的山上住着牧师，在他底附近又有那唱赞美诗的，凡我底一举一动，这些人都要去报官。如果我要向平民谈话，或向他们讲演或诵读一点东西，那个唱赞美诗的便立刻去报告视学官说：“教员荒废职务，忙着去谈闲话。”而那个牧师又去报告上司道：“教员在宣传基督教主义与托尔斯太底学说。”如果我想筹备演剧的事，宪兵和乡村警察又要跑到他们底上司那里去告密。这都是五年前的事。靠了这几个报告者底功劳，我就时常被唤到视学、校董或总督那里去听训话。然而我居然忍耐着这一切，在学校里服务了两年半，到后来终于被辞退了。我离开了这个职业，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悲哀。经验使我相信：就是我想把我底有限的知识分给平民，也是不可能的。人不许我去打开农民底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底状况；人不许我把农民底困苦之真正原因告诉他们。我们在师范学校里的時候，教员常常告诉我们说做一个教员的目的是在“心灵之和谐的发展”，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心灵之和谐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得到结论道：“最先应该创造出新的环境。”我便成了一个革命党人。

“请原谅我我底人民”

不久我就被捕了。我被囚禁在监狱和堡垒中过了一年多。后来释放了我；但在两个礼拜以后，我又被捕了。

我又在监狱中住了八个月。被释出后我就到外国去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回到俄国。监狱和迫害之厉害，更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但我底革命精神却反而因此更坚强了。我很明白纵然“沙皇”本人不是一个暴君，他至少也是奴役人民的一个工具。在俄国所谓统治是与抢劫、放火、谋杀同义。我又极清楚贵族专制和官僚专制的政府是只能靠暴力、靠统治者所行使的永久的恐怖而存在的。而且生活本身又告诉我：如果旧秩序不破坏，新事物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不能够拿枪刺来打倒思想，那么要知道人也不能够单拿思想来打倒枪刺的。我就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

贵族专制和官僚专制的政府底末日到了。它在无意识的日俄战争中之失败已经表示出它底死期将近。去年十月的工人大罢工使得它大为惊恐。政府想安慰那般含恨不平的人民，便说它预备把自由给与们，然而它一手拿着“自由”，一手派遣了惩罚远征队到各乡村去，而且在城市里实行屠杀。迫害，残酷的压迫像黑云一般地笼罩了俄国全土。但是人民底不平更增加了。政府又想法欺骗人民，说召集“国会”，政府底本意是想拿“国会”底招牌，来支持这个已经坏了的机器，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又用尽各种残暴而不讲道理的方法，希望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政府一方面。这个希望不料竟成了泡影。国会选出后表示出来它是倾向自由党一方面的。政府最初还能忍受国会对于它的责难，然而到了后来议员求助于人民，而且

要承认强迫售卖私人土地之原则的时候，国会就被政府解散了。于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迫害底时期。但是政府底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无论是逮捕或监狱，无论是流放或惩罚，无论是绞死或枪毙，无论“惩罚远征队”或屠杀犹太人的“坡格隆”，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人民底运动。

你们可以把我判处死刑。无论我死在什么地方——死在绞刑架上也好，死在矿坑里也好，死在拷问室里也好，——我将带着一个思想而死：——请原谅我，我底人民。我所能给与你们的只有这一点。我只有一个生命。然而就在临死的一瞬间，我还有坚决的信仰，我相信那日子到底要来的，那时候沙皇底宝座会倒塌了。在这广大的俄罗斯平原上，自由之太阳要以它底灿烂的金光照耀出一个新的美来。

英勇的最后

这样的演说只能引起那几个无人心的军法官底反感，于是齐奈达果然得了死刑之判决。在俄国向来女子是没有死罪的。苏菲亚算是第一个死在绞刑架上的俄国女子，在一八八一年苏菲亚过后第二个被处死刑的女子就是齐奈达了。不过我们知道为了革命的缘故，在人间地狱中和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病死、自杀、疯狂的女子却是多得数不尽。但是那样一寸一寸地被杀而死，还不及只受十几分钟的痛苦，在绞刑架慷慨激昂地殉了道痛快得多！齐奈达可算是“死得其所”了。

齐奈达底审判以及死刑之执行等等都是极端秘密的。政府甚至不许报纸登出军事法庭裁判官底姓名来，为的是怕革命党人复仇。不过当时处置齐奈达事件的委员团中的几个委员，后来却偶尔向友人们提起齐奈达殉道的情形，渐渐传了出去，所以我现在写本书的时候，居然可以详细向读者报告了。

这个委员团是由几个军官和法官组织成的，其中还有一个医生。医生底职务是检验犯人究竟是否已经气绝。绞刑架是立在席吕塞尔堡内，绞刑底执行期定在九月十一日底黎明。在前一天犯人和委员团便乘了水雷艇从彼得保罗堡出发，沿途没有一个人开口，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心底压迫，不敢互相对看一眼。医生更受不住，似乎要晕倒了，连忙喝了很多的俄国烧酒，才勉强支持下去。

到了席吕塞尔堡后，什么都预备好了，忽然一个委员说有一点法律手续还不完备，主张将死刑延期执行。其他的委员却一致反对，有一个叫道：“难道我们真是野蛮禽兽么？她已经预备好死了，你还要使她再受些新的等死之苦刑么？”结果议决并不延期。

军法官在执行死刑前问她要不要送告别的信函给她底亲戚，并且向她宣誓说，无论她写什么都没有人拆看她底信。然而她回答说，她不愿写什么东西。

死刑执行的时候来了。齐奈达并不要人牵扶，勇敢地独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请她脱下领子。她立刻做了，然而领扣阻碍着，一时取不下来，她使用力扯下了领子抛在地上。刽子手打算缚住她底两手，不过她请求他不要触动她，要他把拉紧

活结的方法告诉她。他底解释是很简单的。他说完以后，她就站上了木凳，把头放进活结里，然后拉紧绞绳，一脚踢翻了木凳，……这个动作很快地就做完了。那个宣读长篇的死刑判决书的书记还没有读完呢。他看见齐奈达已吊在绞刑架上，大大地吃了一惊，呼吸急促了，手抖了，他读不下去了。旁边另一个硬心肠的人夺过了他底手中拿着的判决书，一口气读完了它，然而所谓的犯人已经听不见了。一个年轻的禁卒从没有见过女人底绞刑，这一次初见便吓得昏死过去了。

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女子就这样地死去了。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齐奈达死后发了一篇宣言。其中含有下面的两段话：

尼古拉二世底政府在军事法庭之名义下实行大批的秘密枪毙，然而它却没有勇气来光明正大地杀人。我们底同志齐奈达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许多人底面前执行了对那人民之刽子手将军底死刑。她在英勇地杀了沙皇底奴仆之后，又以更英勇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底死刑。

像齐奈达那样如此简单如此勇敢地而死，是只有那般把人民底安乐和幸福看得比自己底生命还宝贵的英雄与女杰才能做到的。只有真理之圣徒与殉道者才能以至高的安静与勇敢昂然地登上了断头台。

九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①

一

自离开中国后，就不曾得着司太恩堡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与最高限度派驻外代表）底信了。昨天从另一个德国友人底信里才知道他现在大概在美国或加拿大，不久要回柏林。我近来很想他，其实并不是想他，乃是想她，他是“她”底亲密的同志和友人。

“她”就是在监狱中的玛利亚女士。记得大前年中国的《妇女杂志》上登出了朱枕蓀君底《玛利亚传》以后，曾有人翻译成俄文交给司太恩堡君看，司君又转给玛利亚看。后来司君来信说，玛利亚看了那篇文章很高兴。我听见了这个消息，也起了写点关于玛利亚的东西献给她的念头。我每想起那个在冰天雪地中度过放逐生活的，有伟大的心的女革命家，读到我们这个“谜之国”的《妇女杂志》上关于她的文章而感到安慰时，我也深受感动，我觉得我底心更强健起来了。那么我怎么能不写点东西献给她以表示我底感激呢？

①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idonova (1881—1911)。

然而可悲的是我底文章到今天才动笔，而不得玛利亚底消息则已两年了。在我所能见到的各国报纸上也见不着她底名字。难道她果然已不存在于这世界中了么？在可怕的人间地狱中，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便是生龙活虎般的人也难得得住他底生命，何况一个病弱的女子呢？如果她果然死了，在她也许是一个耻辱。不死于残暴的尼古拉二世底手里，而死于多数党的革命政府底掌握中，这在玛利亚，真是料不到的事了。但是不管她底生或死，我现在是在写《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了。我常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现在我是耍拿这个称呼来称玛利亚。玛利亚，我底“精神上的母亲”哟，如果我底呼声还能够进入你底耳里，那么就请你来接受我底诚心诚意的祝福！

二

玛利亚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个最能干最英勇的女杰。她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容貌非常美丽，又受过完备的教育，在表面上看来，她是一个所谓幸运的千金小姐，为一般人所极羡慕的。然而她却抛弃了锦衣玉食，抛弃了荣华富贵，去参加革命运动，为被压迫阶级谋幸福。在十八岁时她已经是社会革命党底党员了。就在这一年，她枪杀了谭波夫省底总督路仁洛夫斯基将军。其实在十五岁的时候她已尝过监狱底滋味了，那时她因参加小学生保障会底会议而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了。

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间，俄国农民中常起骚动。特别在谭波夫省的农民，因为实在负担不起横征暴敛的苛税，更受不了官僚底暴虐，便起来反抗，放火烧了几处地主和官僚底房屋。总督路仁洛夫斯基是著名的残暴者，因此就大为震怒，派遣远征惩罚队到各乡村去实行屠杀。那些野蛮的哥萨克兵把农民逮捕了，强迫他们半裸体地在雪地上跪几个小时，还猛烈地鞭挞那般无抵抗的农民，其中为首的都被处死刑。那时候玛利亚虽只是一个小姑娘，却已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同志们底信任，她便下决心来担任为农民复仇的工作。

这自然是很难的工作，但她底同志们却很相信她，而且她到底做成功了。路仁洛夫斯基防卫得很严，他带着哥萨克远征队到各处旅行，掠夺粮食来供给当时的日俄战争，人民异常害怕他。但玛利亚却有坚定的决心，她什么都不怕，她要去做她所愿做的事。她装扮作一个农家妇，暗暗地追着路仁洛夫斯基底行踪。她不时在各个火车站或乡村的大路上徘徊着，说是“去找寻我底不知下落的去从军的丈夫”。

她不顾一切危险以及贫困和饥寒，跑遍谭波夫省底各村镇。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六日她到了柴德屋加车站，在那里她以为一定会不着总督了，便买了一张三等车票，预备回波利梭格里布斯克去。下午一列火车到了车站，车上的宪兵与哥萨克兵之多，使玛利亚立刻明白总督是在车上，她便赶快换了一张二等车票，因为二等车是和总督底车比较接近的。

当火车进波利梭格里布斯克站时，玛利亚离开她底座位，站在车门口，以便观看下车的乘客，车一停，宪兵和哥萨克兵

便下来驱逐站内的行人，这显然是为着保护总督底安全，然而他们却把站在车门口的小姑娘忘记了。这时她穿的是女学生底制服，右手握着满装着子弹的手枪，藏在袖笼里。

闲人被驱散了，车站底月台上只有官僚、宪兵和哥萨克兵。路仁洛夫斯基从容地从车上走下来。玛利亚还站在车门口，据她后来说：“我离路氏约有十二，或十三尺的远近，就对着他开枪。”第一枪未把路氏打死，她便跑下来又接连放了三枪。在一阵烟雾和枪声之际，那般健壮的哥萨克兵和宪兵居然被一个青年女子骇着了。他们一点也不反抗，任她放枪打死他们底首领。

四枪都打中了总督，路仁洛夫斯基到底死在玛利亚底手里了。玛利亚亲眼看见路氏死了后，便拿手枪对准自己底头，打算自杀。然而别人拉住了她。野蛮的兵士便打她，踢她，她要求他们把她当场枪毙，但没有人答应。她受尽了许多不能以言语形容出来的拷问和惨刑。后来她自述道：

……我用手遮住我底脸，但哥萨克兵都用刀来刺我底手，我便不得不放下来。这时候一个哥萨克军官^①飞跑过来拖住我底发辫，把我吊在空中，然后用他底全力把我狠命一掷，掷到丈远的水门汀地上。那时候又有人来捉住我底双脚，把我拖下石阶，我底头就次第碰在每一级的石级上。他们这样把我拖到车站门口，又拖着我底发辫使我起立，于是我被推入囚车了。

① 指阿布拉莫夫。

我在监狱中时有两个哥萨克军官^①用重脚踢我，又剥去我底全身衣裤，不时用皮鞭抽我。他们一面还用嘲笑的口气对我说：“喂。现在你好给我们作一篇激烈而动人的演说了。”我底一双眼睛已经被打得看不出什么东西，我底右颊肿得非常之高，他们还故意捻着我这一边的面颊，笑对我说，“什么？亲爱的！快些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是你底同志。”他们又把我底头发一根根的拔去，在拔去的时候对我问道：“谁是革命党？”不但如此，他们还用烧红的烟卷在我底身上到处乱烧，而且对我怒声大喊道，“现在你哭罢！你！”……

高德曼说：“……他们把她拖进候车室，把她殴打到失了知觉。她底衣服又被人尽行剥下，他们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里。他们拿她来做娱乐品，用燃着的烟烧灼她底裸着的身体，又把她踢到满屋滚，最后还凌辱她。……”

《俄国底英雄与女杰》底著者蒲列路克说：“阿布拉莫夫与切达洛夫把她底衣服完全剥下，把那个完全裸体的她当作皮球般踢来踢去，过后又用皮鞭打她，用纸烟烧她。他们又用指甲来撕裂她底嫩肉，拔她底头发。他们底目的是要她供出她底同党底姓名。她虽然受着重伤，肢体残废，一只眼睛差不多被踢出来了。全个脸红肿得厉害，还在流血，但她总不开口。这更使那两个刽子手发怒了。他们用重的皮靴踏她底脚趾，又

① 指阿布拉莫夫与警官切达洛夫。

扯她底头发，然而她死咬紧牙齿不开口。”

妯弟女士在她底《俄罗斯之赤心》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下：

……哥萨克兵就拔出刀来，走近她底身边。她预备自杀，但他们手脚很快，立刻就把她捉住了。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叫道：“打死她！杀死她！”

她在监狱里，他们把她底衣服尽行剥去，鞭打她，嘲骂她。……他们把燃红的烟卷来烧她底肉，又把厚重的皮靴来踏她底脚，但他们还不甘心，又拿其他种种凶狠残酷、非人所能忍受的毒刑加在她底身上。他们用皮靴踢她，踢她底胸，又踢她底背，同时还高声怒骂道：“现在你可说出你底同志们底姓名了。快些说出来，你这恶棍，否则我们还要继续上刑的。——你如果要不要痛苦，就快些说出来。”

可怜的玛利亚忍受着痛楚，始终不说一句话。……

这样的受过种种苦刑之后，玛利亚就被押送到谭波夫省城去了。押送的人就是那个哥萨克军官阿布拉莫夫，因为玛利亚伤势沉重，便又派了一个车站医药部底看护在火车中照料她，恐怕她会死在路上。

在路上阿布拉莫夫犯了一件绝大的罪恶。记得几年前我在《俄国革命之破坏》(高德曼著)底译文中关于玛利亚的一章里，曾把“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里”改译为“使她站在他们——醉了的守兵底前面”，因为前一句使我感到无限的痛

苦。谁知友人君毅读到我底译文，想到赤裸裸的她站在醉了的兵士底面前的情形，还是忍受不下去。他当时寄我的信中曾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他每读一遍，便感到更厉害的良心的痛楚，要我把那一句话再改过。我并不会照他底意思做。而且现在我还要叙述一件更使他“感到良心的痛楚”的事。这在我，单从我以前把“交付”两字改译的事看来，就知道在我也是很感苦痛的。然而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事，何况这对于我神圣的玛利亚底人格并无一点损伤，我又何必为她讳呢？而且为了表现官吏底残暴和玛利亚所受的苦是何等的大，为了使我尽了为我至敬爱的人作传的忠实的责任起见，我不得不请求君毅恕我，让我来叙述下面的这件事。如果君毅更因此“感到良心的痛楚”，那么我请求他记着玛利亚自己后来向营救她的外国人说的话。

如果你们对于我这个俄国少女表同情，那么你们更应该对我这困苦的俄国表同情才好。我自己绝对不要什么名利，只因为我丧失自由已很久了，我底赤心，我底灵魂，我底一切我都送与大家了。

事实是这样：在中夜的时分，火车到了脱洛屋加车站，阿布拉莫夫遗走了看护。他把玛利亚带进自己底车房里强奸了她。她已病弱到那样的程度，哪里还能够抵抗呢？只有让那残暴的畜生纵欲罢了。更可恨的是从此他把他底一种病传染给她了。

到了谭波夫省城，玛利亚在监狱里昏迷了十七天，病才稍

好。一直到二月十七日她底母亲才得着进监的许可。铁门大开了，母亲走进了冷气逼人的潮湿的囚室，她看见了一幅凄惨而可怕的图画，她底爱女睡在屋子地上底一角，缚着麻布的头动也不动地放在枕上。眼睛上也贴着膏药。宪兵队官和狱官进囚室的时候，她一动也不动。母亲不敢进来，痴痴地立在门口，也不敢发声来打破这可怕的死一般的岑寂。她好像走到她底女儿底坟前来。那可怜的，心已碎了的母亲缓缓地走近爱女底身旁，也坐在地板上，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眼睁睁地望着那个垂死的女儿，滚滚的泪珠像决了堤的水一般不断地从老眼里流下来。在这里，在她面前躺着的已不是她底如花似玉的爱女了。她辛辛苦苦用十八年的全心灵，全功夫才养成的女儿，在一个月之内就被人弄成了这般模样，而且就在这时候，她也不能得着许可，再用母亲底爱来看护那正需要着她底慈爱之泉的垂死的爱儿。宪兵队官也跪在她底身边，为的是不让她们说什么秘密的话，实际上那母亲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在她底心里她也许想问他，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她底强健而美丽的爱女弄成这个样子，而且怎样居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她底强健而美丽的爱女弄成这个样子。这太可怕了，不是人类的感情所能了解的，也不是做母亲的人底感情所能了解的。然而她并未问他，或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她实在什么话都不能说了。她底女儿也不告诉她什么。虽然母亲底热泪伤了女儿底心，但玛利亚却不曾哭，实在，在敌人底面前，在她底刽子手底面前，她不能够如此示弱。然而在她底心里眼泪已贮满了。她没有哭。

忽然死白色的脸改现出了笑容，肿了的、带伤的眼里射出了光辉，她向她底母亲说：“我将快乐地死去，我底悔恨乃是他们阻止了我自杀，使我落在这一般畜生底手里。”

“你们怎么把我底孩子弄成了这般模样？”母亲带着这个无人可答复的问题回去了。不仅母亲，便是女儿底友人也要愤愤地把这个问题来问那般畜生。当玛利亚押到了省城时，警察局曾叫贵族协会底书记来证实她，因为那个书记是她底熟识的友人，她也曾在那机关里服务，然而这时候那个书记仔细地吧垂死的玛利亚看了许久竟不能认识她了。他惊呼道：“不，她不能够是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她一定是另外的一个女子！”

三

玛利亚底身体稍微好了一点，便开始受审判了。这是归军事法庭审理的。玛利亚底律师要求法庭允许派医生来检验她底身体，法庭答应了。那两个医生底报告真正骇人，实在我们单就玛利亚在法庭的情形，也就知道她底病势是何等地沉重了。

当庭长问她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她也努力说出了几句话：

诸位，你们且向四周围看看，你们在什么地方会看见满足的幸福的人民底快乐的面貌呢？没有，什么地方也

没有！便是那些在目前好像得意的人也是忧郁的，他们一想到他们底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就要过去，因为所有被压迫的、受苦的人民不久就不再以悲叹与哭泣自满，而要起来防卫自己了，那么他们底胜利也就被这个念头所毁坏了。至于我，我知道我就要被你们处死了，但是你们虽然可以判决我底死刑，虽然可以使我受最可怕的苦刑，你们却不能够再加上比我已经受过的苦楚更要厉害的什么了。你们也没有再比这种种更要残酷的刑罚了。杀死我罢，然而我底信仰却是杀不死的！我确信那伟大的日子会来的，那时候人民会得着自由与幸福了，正义与真理会胜利了，博爱、平等、自由的理想也不再是梦话了，却会实现于实际生活之中。为了这样的将来而牺牲个人自己底生命，难道不真是一件幸事么？我底话已尽于此，我不再说什么了。

这几句话真是和着她底心血一同吐出来的。她说话的时候不断地咳嗽着，时而吐出几口血来，吐在她底手巾里。这是大家亲眼看见的。

玛利亚底律师台司伦科底法庭演说也是一篇极动人、极雄辩的演说，我在这里译出最重要的几节来：

法官先生们：检察官要求你们判处被告底死刑。然而我请你们深刻地仔细地反观你们底良心。难道被告所犯的罪里果然有引起人们底绝大的愤怒与恐怖之点存在

着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它能够把她送到刽子手底手里吗？我们俄国人的正义之概念中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原理，俄国人中间的正义之感情使得他们绝对地，彻头彻尾地反对死刑。……

如果你们凭着良心来考察被告所犯的行为，你们便会明白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不再是一个刺杀了路仁洛夫斯基的司皮利多诺华，她乃是受苦的俄罗斯之全体。你们会看见数百个司皮利多诺华，与数千个路仁洛夫斯基；你们也会看见那正压迫着、毁坏着我们的全个恐怖。呀！许多年以来我们就已经生活在流血与破坏之中了。所有的人类之大发现——蒸气、电、电报、电话等等似乎联合起来，只为的是每天从这不幸的国家底四面八方集合起来而且给我们带来不祥的消息，来苦恼我们。请看一看你们今天早晨所读的报纸。实在印出它们的不是印刷人底油墨，而是那般被杀害的人底血，那般死于鞭笞之下，或被用各种方法拷打、绞死、枪杀的人们底血液。那么每一行的字迹岂不是一声悲叹，一声哀号，一声求救的呼叫？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对于这一切的屠杀、拷打等等的愤恨。难道我们能眼看着那些把自己底生命献给人民的高贵的灵魂，眼看着他们单独去死，只因为他们曾把我们大家的感情用行动表现出来么？

司皮利多诺华本人就住在这些乡村里，路仁洛夫斯基曾带着他底像摧毁万物的暴风一般的远征队走过这些乡村。他曾向你们说过这些乡村底名字，那些被枪杀、

挨鞭打到死，或则被拷打，被弄到一生肢体残废的农民底名字。她又曾告诉你们，许多关于哥萨克兵强奸妇女，抢劫、捉人的事。路仁洛夫斯基真正成了统治潭波夫省的一切恐怖主义之化身。

而且其他各省的人民谁不知道路仁洛夫斯基？识字的人都熟悉他底名字，因为这是常见于报纸的。然而一般人底愤恨之感情不能够找到法律上的伸雪，农民也不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保护。这时候司皮利多诺华底灵魂便激动起来了，你们听见她在法庭上告诉我们的话。她说：“我底心在悲痛，我觉得当这样的事在我底周围发生的时候而我还活着，这真是绝大的耻辱。而且我看见一个农夫因受着残酷的拷打而发狂，一个母亲，她底年轻的女儿被哥萨克兵凌辱，不愿忍辱偷生，便投河自尽，那时候我便向自己说：‘我要杀死路仁洛夫斯基，纵然这件事要我底生命作代价，亦所不惜。’”……

你们在这里已听到关于司皮利多诺华所受过的拷打的可怕的故事，她底叙述是毫不可疑的，因为她所受过的每一下打击，每一次苦刑，都留了痕迹在她底身上。受了如许多的残酷的拷打之后，死刑对于她又算得什么？这不过是表示“叫她回老家”去罢了。在从上古罗马的竞技场中，角力的勇士受了伤倒在地上的时候，四周围激动的残酷无情的看客大叫道：“叫他回老家去！”然而你们底心竟然会承认这类的正义，居然像罗马人那样地行为么？

俄国政府已经征服了不少的敌人。难道它还真正需

要来征服这个敌人，这个无力防卫的，又不能伤害别人的，病弱的妇女？

诸位，起来保卫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不要把你们底拯救她的荣誉让给别人。你们必须从死神手里把她救出来。

站在你们面前的不仅是被拷打、被强奸的、病弱的司皮利多诺华一个人，而且是整个的俄国，她也被人拷打、被人强奸、也成为病弱了。每一天死刑底消息都来震撼我们，好像电流一样；在不曾疗治好的旧的伤痕上又添了新的伤痕。如果你们杀了司皮利多诺华，全俄国都会因为恐怖而战栗。

迟早这种憎恨是应该消灭的，人们要开始说和平的话句了。现在你们有了特权做第一个说这和平的话句的人。回到你们底会议室里，再出来时望你们带着和平的橄榄树枝，不要带出鞘的刀了。

这篇动人的演说，并没有一点效果，法官们并没有听它，至少也没有答复它。五分钟以后法官们出来了。他们带来的判决是绞刑。

四

玛利亚这一次并没有被绞死。她受着种种毒刑的消息传到西欧后，曾引起各国底抗议。全俄国也激怒起来了。各处

的报纸上一致地登载对于政府的抗议；要求惩罚拷打玛利亚的军官们，并且减轻她底死刑。向法国及其他各国的妇女界要求援助的书信发出来了。法国著名文学家法朗士等许多人联名要求俄皇减刑。法国人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营救她的团体，英美两国人民亦大呼援救。尼古拉二世终于害怕起来了。于是玛利亚底死刑便被减轻为终身在西伯利亚作苦工。这样她居然被人间的同情从绞首台上救下来了。

然而她底健康已坏到极点。肺病一天天厉害起来，身体消瘦得可怜，几乎到了垂死的地步。经过了长期的医疗后，才逐渐恢复了健康，勉强可以到西伯利亚去了。于是他们把她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里她被囚在阿加士监狱中。

从谭波夫到西伯利亚的途中，她受着群众底热烈的欢迎。在每个火车站都有无数的流放人与政治犯聚集起来祝福她，并且送礼物给她。她和其他的女政治犯到阿加士监狱的那天，全狱的政治犯举行大庆祝，热诚地欢迎她们，献花、礼物、革命的旗帜给她们，并且合唱革命歌。旗帜上大书着：“殉道者底光荣，生者底自由。”这样的事会发生于俄国监狱中，读者大概会觉得惊奇罢。然而事实是这样：俄国监狱制度固然专制残酷到了极点，但有时在有些地方也会有异常温和、仁爱的狱吏，他们对于政治犯的待遇相当宽大，因为政治犯大都是有钢铁般的意志，黄金似的心，高的智慧，光明纯洁的人格等的人，有的甚至举止温柔可亲，所以常常得到狱吏们底敬爱。在阿加士监狱中的情形便是这样，因此政治犯们也能得到一点自由。玛利亚得着同志们底看护，身体也恢复了原状。不过一

目失明，一手被折：这是永远不能弥补的事了。她底形状上永留着官吏底残酷的暴行之痕迹。

然而命运捉弄人真是厉害！玛利亚连这样的比较安静的生活也不能享受多久。赤塔的总督知道在阿加上狱中的政治犯得着了较多的自由，心里很觉不满，便下令把玛利亚等六个女犯移到马尔切夫监狱内。果然一九〇七年二月在一个浓霜的早晨，几部囚车便把这六个女革命党载出阿加上监狱，经过十日的旅程后便到了新的监狱了。

在马尔切夫狱内不久就发生了一个惨剧。政府忽然派了一个新的管狱官来。这是著名的刽子波洛杜林，他在利加及其他波罗的海区域城市的监狱中，以善于发明拷打犯人的方法得名。这消息自然使得政治犯异常愤怒，他们在波洛杜林就职的那一天，并不对他表示敬意。于是波洛杜林便派兵来迫害他们，所有的政治犯都受着枪头底打击，而且戴上了镣铐。

但是波洛杜林也拿他底生命赔偿了这次的暴行。这个悲剧发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这年九月波洛杜林请假住在蒲斯可夫的时候，就被人暗杀了。而曾经拷打玛利亚的两个畜生，阿布拉莫夫和切达洛夫也都早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阿布拉莫夫被暗杀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切达洛夫被暗杀于五月十七日。

玛利亚在西伯利亚整整住了十一年。在其中她得到了一个极其亲密的女友，这就是亚历山德娜·伊热麦洛维奇，她也曾和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台康斯基的革命党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很尽力地看护过她，他们同为青年，同是孤寂，同属同

志，同受患难。

忽然晴天起了一声霹雳，二月革命起来了。这次革命掘开了一切政治犯底活葬的坟墓，把人生最可宝贵的自由为他们带回来了。玛利亚得着释放的消息后，她底快乐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出来的。但是临时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命令到了，和她所期望的并不一样。在这个监狱内共有十个女革命党人，而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上却只有八个名字。狱官缓缓儿读着名单，她们焦急地等待着。在受苦多年的憔悴的脸上同时现出愉快与怀疑的表情。名单读完了，那两个在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女子顿时变了脸色，全身发抖起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她们两人孤苦地同声问。

“你们还得留在这里。”这便是狱官底回答。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

这时候玛利亚便出来说：“那么，我们八个人都不出去！”

那天果然没有一个人出去，大家都留在监里等消息。第二天来了一个电报，叫狱官把这十个人全体释放。于是她们十个人便一同向彼得格勒出发了。

五

在民众底热烈的欢迎声中，玛利亚到了彼得格勒，后来又去莫斯科。她顿时成了革命民众底喉舌。但她并不去争权夺利，也不想冬宫里去摆架子。她投身于革命民众丛中，尤尽力于农民运动，农民都很信任她，敬爱她，一致地选举她为全

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她现在是俄国农民底领袖，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底领袖，人家都称她为“农民俄罗斯底小将军”。她和他底同志们一样主张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赞成与布党合作进行进一步的革命，并且大呼“工厂归还工人”，“土地归还农民”等口号。

美国《旧金山公报》底驻俄特派员妣弟女上当时曾会见过玛利亚，并描写她底情况如下：

我第一次和她在客厅里谈话，她现出很瘦弱、很疲劳的样子。她告诉我说，她每天晚上只睡两小时。她终日忙着见客，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去拜访她。他们来和她谈论关于农民的问题。她除了接待农民外，又要出席于各种会议，如左派社会革命党及农民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都是非她出席不可的。而且在开会之后，她又要编辑一种专门讨论农民问题、土地分配问题的报纸。

十月革命发生了。这是俄国的工农群众和各派社会主义者合作底结果。玛利亚总是站在民众的一边，日夜不息地工作，为着她所爱的农民服务。

她是当时农业部底主脑。她极力主张土地公有，曾草过一篇土地公有底计划书。她这时真是忙得很，身体又不好。但她一面扶病从事文字的工作，一面又从事实际的运动，时而和布尔塞维克党领袖列宁讨论革命进行计划，时而与社会革命党右派领袖周诺夫辩论革命问题。就在这一年玛利亚一派（左派）便和周诺夫一派（右派）完全分裂了，玛利亚一派与布

党合作，来从事于革命后的建设，她不肯在革命政府里做什么委员，她底目的只是在为农民做一点事。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和布党完全决裂，而玛利亚等也就被捕了。这经过情形，我可以从司太恩堡寄给我的一篇关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文章底原稿里抄译出一节如下：

第一次苏俄政府成立时，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党合作，人民委员会中有社会革命党左派委员七名，布党委员十一名。这两个各有色彩鲜明的纲领的党派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一直合作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然而其间社会革命党左派并没有一刻忘掉自己底主张。对于布党所主张的劳工专政、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党统治苏维埃等等，社会革命党左派是极其反对的，不过为着打倒俄国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计，这两党便联合起来，其共同的目的是拥护全世界革命的和平，消灭俄国以前的阶级设施，巩固苏维埃制度在各省的力量，防备资产阶级底复兴。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党签了《布来斯脱和约》，对于俄国革命给了一个打击。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召回苏维埃政府中该党的人民委员。一方面不签这个和约，一方面表示它底抗议。它并不是以为签了这个和约，对德国屈服，丧失了俄国底体面，它是由此看出了布党决意走向投机主人的路上去，要和资本主义的列强妥协。它为着拥护俄国革命，拥护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和布党决裂。同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梅伯黑，布党藉着

这个口实，便公然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宣战，把司皮利多诺华女士及其他的党员逮捕了。

从司太恩堡底说明里，我们便可以知道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党分裂底真因。社会革命党左派以为《布来斯脱和约》公然把革命出卖了。他们认为梅伯黑之在苏俄实在是德国帝国主义底一个威吓与侮辱底表示。因此他们便公开地刺杀了这个德国大使，表示对于德国底侵略的抗议。他们看见革命处于险境了，便起来防卫它。

在梅伯黑被刺杀以后，玛利亚曾亲赴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预备宣读社会革命党左派底正式宣言，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梅伯黑。然而布党宣布大会闭会，逮捕了全体农民代表，玛利亚也在其中。

这一次布党把她监禁了五个月，又释放了。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她又被逮捕了。莫斯科革命裁判所对于她的判决是：

因为不愿意使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受无谓的痛苦，……莫斯科革命裁判所决定把她幽禁在“疗养所”内过一年，不要她从事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使她有机会来做正规的身心两方面的工作。

这样的奇怪判决倒是很少见的。玛利亚那时候曾从所谓“疗养所”的监狱里寄出几封信，现在我随便摘译出一点来，可以看到她底“疗养所”中的生活是怎样的。

六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我想在法庭上，我大概可以把这封信传递给你。因此我便写了这信，等着有机会交给你。

第一，你若在那天看见我底样子消瘦得难看，那么请不要惊惶，不要狐疑。我在这里没有充足的食物，而监禁底情形也不十分好。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温暖，又不能安静地睡。这样的环境是人故意造出来的，好像为的是复仇。……（中略去两节）

给我送一个寒暑表来。我底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了。我应该睡在床上，然而那张床大可怕了；我有疼痛的腰和背，实在不能够睡下去。我底腰部痛得很厉害，好像受着针刺一般。这就说明我底肺病发展得很快。我就这样容易地被肺病征服了，这真是我底耻辱。床是粗木棍，木条做的，并没有木板，所谓褥子只是一张污秽的薄破布，木条木棍上的刺都可穿过褥子来刺进我底身体。我试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在一个平坦的地面上，然而石地是潮湿的，而且又太冷。

三月四日

今天我收到一个包裹，在那些当作包皮用的新闻纸上面，我看见了“司皮利多诺华案件”，现在我读到我底案件底判词了，当时我在法庭中并不曾听得清楚。这读起来

实在很有趣味。何等地无耻！布哈林在我底会场中曾被工人们叫骂了下来，而且几乎被赶了出去。尤烈奈夫在我底会议中大概噤若寒蝉，偶尔在一阵听众底吹叫声中说几句话。司米多维奇只许说十五分钟，然而听众总是在闹。这一切人民所不承认的领袖们现在在所谓“正义之法庭”中做起我底裁判官来了。……他们不能够在公共会议中回答我——所以他们想他们能够拿监狱、审判、“英卡”来征服我。……（略去一节）

我只能把布哈林及其他“苏维埃领袖人物”假说为了医疗我“不愿意使她受苦”的缘故所创造出来的制度，认为是属于“神经昏乱病”一类的。

可卑鄙的伪君子 and 老奸巨猾……在他们底机关报上他们大呼他们底同志拉台克在德国监狱中带着镣铐的事，然而你可知道身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自己所创造出的是什么东西？我宁愿带着脚镣手铐，颈上系着铁链，却不愿过现在的这种生活。为了要判断这个共产党政府起见，我要说出一切关于我现在的環境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受不下去。

克伦姆林囚室

在二月十五日我便被移到克伦姆林皇城，移进卫兵管去了，我想，这大概是为着“教育上的治疗”、或仅为着激怒我的缘故。我住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隔壁就驻扎着红军军人一百二三十名。这间屋子算把我和那个又聒噪、又喧闹，时常发出叫笛声、射击声、噼啪声以及一切兵

营里所应有的声音的卫兵营分开了。我底屋子又被用一块木板分隔成了两个小囚室，不过木板太窄，只有两尺半到三尺宽的光景，也没有达到天花板。

在我底“第一个”囚室里只有一扇窗户，而在“第二个”囚室内就是完全黑暗了。一个反声的、石的拱形屋顶，三百年以前的石壁，和潮湿的石地。在木板之后便有两个狱卒带着枪，不时把枪机弄得响。一个守卫站在房门口，不时向我底房里看。还有一个便从一个小圆洞里来监视我底行动。总之这两个守卫和巡察（这时共有五个）都不断地把眼睛贴在窗户和圆洞上，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

这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这许多日子以来，我不得不和衣而睡，并且我很疲倦。我底全个身子好像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不能够沐浴，我不能够安静地读书、写字、思索，因为我总是那般畜生底好奇心之对象。你想我做了别人底好奇心之对象，在我是何等地难堪。你明白服着长期的苦役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所受的待遇甚至比较从前受之于沙皇底奴隶者还要厉害得多！

我常常向那般侦探说道：“够了，你们已经看得够了；难道还不害羞么？”

“我们底规矩是这样。”他们总是这样地回答，有时声音里带着羞愧，有时带着骄傲。……

我底屋子里没有火炉，热气是从隔板通过来的。自

然还是冷。稍微有了热气后，玻璃窗上就布满了水气，还得用破布揩干才是；于是墙角、天花板角、石地角都盖满了湿的点子，整个囚室好像涂上了颜料一般。

我不时患着热症，我时常咳嗽，这是由于这个可怕的囚室和那看不见地渐渐堆积起来的，闻不惯的烟草气味的缘故。而且隔壁的火炉又建造得很奇怪，从那里面常常传过来毒人的煤气，我因此也就咳得更厉害了。

火炉烧热后，我在桌子前坐了几小时，极力想躺在那不能躺的床上，极力想镇压心底猛烈的跳动、太阳穴底急跳，以及其他中毒后的表现。这是日里的事。

我要求户外运动，呼吸点新鲜空气，别人不许我。我要求给点报纸来读，别人不许我。我要求肥皂，经过很大的困难算得着了。为什么又不许人来会我呢？

守兵把我押到盥洗室里去，那里完全和我底囚室差不多，也有裂缝的木板壁。守兵便守在门前。要走到盥洗室必经过大的厅堂。在厅堂里有不少兵士野蛮地望着我，等我到了盥洗室，他们便一拥的跑进盥洗室的隔壁一间有大的玻璃门的屋子里。……

狱卒每两小时更换一次。每半小时又有一种特别的巡察。他们永远监守着我。在夜里，房门响声、高声的谈话，以及各种响声同时大作，每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都有人在门口望，看我用大衣盖着假寐。

这样的事，就在我从前做定了罪的囚犯的时候，也不曾遇到。而且那些无终局的，小的意外事甚至说也不能

够说。……

布哈林、列宁、托洛斯基可以满意了。他们算报了仇。然而他们不懂得像我这样的敌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拷打，可以谋杀，但是不能够拿无聊的小的嘲笑来侮辱我。……

我向你说这一切的事，并不是使你惊惶，叫你去各官厅去奔走要求把我释放。我们不应该匍匐于那般醉心权力的官僚底面前，向他们哀求。……我们必须再来开始战斗，拿我们在监狱中的精神来取得别人底尊敬，我们必须创造传统。身为国际主义者的我们只信仰工农底权力而不信仰一党底权力，我们还应该憔悴于一切政府底监狱中过长久的时间呢！

进医院（三月十四日）

三月九日我被移到克伦姆林医院。我病得很厉害。我从被关在那破屋里的第一天以来就病了。又冷又湿。囚室里一旦通进来了热气，水就开始溶解，全屋子都潮湿了。在三月四日到五日的那晚上，我咳出了多量的血，恰和在一九〇六年的情形一样。我本该躺在那恶臭不堪的地窟里，让血不断地流出来。我却站了起来，我底头在作响，我知道我底情形很坏，但我不愿为病所征服。

有一夜竟到了一个特别危急的境地。我突然醒了起来，觉得我底末日到了。血开始从心中吐了出来。整个枕头、手巾、面巾都浸透了腥血。我觉得好像我在咽气了。

陡然我感到我不再是自己底主人，“它”来了。……

我叫守兵把我抬起来，然而我发现我没有声音了。我想敲门，我底手却又不听命令。

我不能够举手揩去唇边、嘴上、颊上的血。究竟我在这样的情形中过了若干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天亮时，我恢复了原状，把自己整理一番。这很有趣味。思想异常纷歧。对于这似乎就在面前的“死”，并不感到愤怒。一点也不！

我记起我一生所未完成的事业。我底灵魂是十分谦逊。这是十分安静，安静得很。我躺着，等候死之到来。

我寒颤不止。在早晨的时分，守兵们看见我底容貌大为惊骇。我请求他们不要去报告官吏，我拼命反对他们，然而他们终于打电报向官吏报告了，并且请求派一个医生。我对于一切的询问只有一个回答：“我什么也不要。”

医生来了，是一个女人，她看墙上的湿气的点子，又看看全囚室，说：“如果你再在这里过一夜，你就要死了。”……

现在，在医院里，我底身体差不多又复原了。我底双手颤抖起来了，我底头还在作响，然而我又有新的力量了。在这里我失掉了七八杯的血。我本该把我底手巾浸在血杯里，那就定会做成一面奇异的、光荣的、血红的旗帜来。

在这里我立刻开始呼吸得比较舒畅了。我底身体实在应该是有力量的。身体全被医疗好，我不会死。

三月二十日

我又被搬出医院，到这铁廊，到这一间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来了。这屋子是用暗红色的纸糊着墙壁的，有一个石的拱形屋顶，而且屋子里充满了铁锈的气味。由于守兵底坚绝的要求，才居然生了火；否则人们还没有生火的意思！我还是冷得战抖，但我爱这屋子。地板是木制的，囚室虽窄，却相当长，我可以在其中走十步。

今天人来量了窗户底尺寸。他们要用铁栏杆来罩着窗户。好，他们不但不布置出一个“疗养所”，反而把克伦姆林的房屋之一改变为监狱了。好聪明的人们！

七

玛利亚后来终于从“疗养所”逃了出来。为了避免侦探底注意，她底行踪是异常秘密的。一九二〇年七月高德曼在莫斯科一间小屋中会见了玛利亚。高德曼叙述当时的情形道：

我十分小心，要确信自己是不曾被“其卡”人员在暗中跟随着。我先和玛利亚底友人们约定了一个相会的地点，从那里我们曲曲折折地走了许多街道，到后来走到了一个院落背后的房屋底最高一层楼上。她们把我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几把椅子。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信函和报纸，桌前坐着一个纤弱娇小的女子。这就是玛利亚。这是俄国最伟大的殉道者中的一个，这个女子曾如此无畏、如此坚强地忍受

过沙皇底刽子手所加于他的种种残酷的苦刑。……

我在她这里过了两天，听她详述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的实事。

她是极其安静、极其自制，在每一个论点上都十分清楚。她能完全地利用她底材料和知识。有几次在谈话之际她从我底脸上猜出了我底疑惑，便说道：“我恐怕你不十分相信我。好，这都是农民们写给我的信。”她在写字台上拿了一束信函，向我读了几段，这都是说起农民底困苦以及他们反对布党之厉害，真令人伤心。在这些充满了一歪一倒的，有时甚至不可辨认的字迹的信函中，乌克兰与西伯利亚的农民报告“强迫征收粮食”之恐怖，以及这种办法对于他们和他们底土地的影响。“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了，甚至下次播种所需用的种子也拿去了。”“征收粮食更把我们底什么东西都抢去了。”这些信的内容就是这样。常常有些农民愿意知道究竟司皮利多诺华是否走到布党一路去了。“如果你也抛弃了我们，马土西加^①，我们便没有人可依靠了。”一个农夫这样地写着。……

她说：“布党所持的论据中没有一句话是合于真理的。”诚然，我国没有训练熟的军队可以阻止德军底前进，然而俄国却有一种更有绝大效力的东西：她有一个自觉的革命民众，他们会流出最后的一滴血来打退侵入者。事实上，革命的民众曾抵御住一切反革命军队对于俄国的

① 马土西加：玛利亚的昵称。

攻击。谁曾使德奥的军队不能留驻在乌克兰呢？还不是革命的民众、农民与工人？谁打败了台尼金及其他反革命将军呢？谁战胜了高尔哲克和犹丹尼奇呢？列宁与托洛斯基说这是红军。然而历史的事实乃是西伯利亚与南俄的工人农民联合组织起来的志愿军，极其坚强地在前线作战，而红军平常只是完成志愿军底胜利而已。……

她又接着说：“布党底坏处在于他们不信任群众。他们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党，却又不信赖工人。”……

在我们谈话之际，我说布党之采用“强迫征收粮食”，大概是见着农民不供养都市这个事实，故不得不用这个方法。司皮利多诺华解释道：在革命时期之初，农民苏维埃存在的时候，农民很慷慨地、很情愿地送粮食到都市去。然而一旦布党政府解散了这些苏维埃，逮捕了五百个农民代表，农民便反对政府了。而且农民一天天地眼见着布党制度之无能：他们看见自己底出产物堆积在衙门里，任其腐坏，或者在市场上成了投机者底所有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自然不愿再把粮食拿出来了。我们知道农民从没有拒绝过供给红军底粮食，这件事证明出来除了布党所用的方法外，别的方法倒是能有效用的。布党所用的“强迫征收粮食”的办法只会扩大乡村与都市间的鸿沟。布党也靠着“远征惩罚队”，这成了乡村底恐怖。他们到一处，便给这一处带来死亡与毁坏。农民到后来失望到了极点，便不得不起来反抗布党制度了。在沃龙各省，在南方，在乌拉岭一带、在西伯利亚，农民暴动

常常发生，但都被武力与铁腕所压服了。

司皮利多诺华并不说起她自己自从和布党分离以来所受的苦楚。但我听见别人说她曾被捕两次，监禁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她被放出以后还是受着严格的监视，和她在沙皇时代的情形一样。有几次在夜里“其卡”人员把她拖出去，告诉她说就要枪毙她了。这是“其卡”善用的方法。我曾向她提起这件事，她虽然自己讨厌说她自己底受苦，但她也不否认这些事实。她底全副精神完全贯注在革命底命运与她所爱的农民底命运上去了。她并不想到她自己，不过她很热切地希望使全世界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知道布党治下的俄罗斯底真相而已。……

八

在两月以后，即一九二〇年九月，玛利亚底住所又被“其卡”发现了。她当时正患着热症，睡在床上不能动弹。他们不能把她移开，便派重兵守着她底住屋，不许任何人进去看她。后来她底病稍微好了一点，“其卡”又把她移到秘密警察区去，放她在监狱病院里。她底病势很重，“其卡”才允许亚历山德娜^①去看护她。亚历山德娜是玛利亚底密友，又是同志，她和

① 亚历山德娜·伊热茨洛新奇是一个将军底女儿。她在一九〇六年刺杀了那个以屠杀犹太人而著名的明斯克总督辛洛夫，被判处死刑，后经沙皇减为终身苦役，就流到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革命后被释回俄。一九一九年又被布党政府逮捕下狱。此后她底命运便是和玛利亚底相同。她是玛利亚底生死友人，她底生涯是不能和玛利亚底分开的。

玛利亚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同住了十一年。亚历山德娜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捕了，在毕第基监狱住了一年后于十月二十七日被提送到秘密警察区病院里。玛利亚正是在前一天被搬进去的。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亚历山德娜从监狱里写了一封长信出来，描写玛利亚底可怕的生活，以及她数月来看护玛利亚的情形。此信后来载于纽约援助政治犯国际委员会出版的《俄国监狱书信集》中，在这里我因篇幅关系就不译出来了。总之亚历山德娜告诉我们的是：玛利亚不断地受着“其卡”人员底严密的监视，受着孤独的禁锢，她底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养料都被别人掠夺了。她在狱中得了坏血病，——四肢浮肿，头发和牙齿都逐渐脱落了。更难受的是她从前在沙皇底宪兵和现在的“其卡”人员那里所受的苦刑底可怕的幻象也常常来到她底心头。有一次她实行绝食自杀，“其卡”初以强迫进食的话来威吓，但后来也答应了亚历山德娜和另一个囚犯堪科夫^①底要求，让他们去劝她进食，她才得以不死。

一九二一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会议，发表了一篇宣言，送与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苏俄政府的重要官吏，叫他们注意玛利亚底身体，并要求释放她，使她能够享受合宜的医疗与安全看护。

同时出席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一位著名外国女代表，也向托洛斯基作同样的请求，托洛斯基却回答说，玛利亚还是

^① 堪科夫：社会革命党左派领袖之一，也是玛利亚底好友。

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不能释放，后来因为欧洲社会党报纸抗议得厉害，政府才答应把她释放出来，但以病好后即回狱为条件。

后来莫斯科的俄罗斯红十字会也要求莫斯科“其卡”底委员长翁席立席特答应把玛利亚送到外国去养病，但那位“其卡”底领袖却说西欧的情形对于玛利亚底健康会有妨害。这样奇怪的推口话真难使人相信。由此看来可知布党政府是安心把玛利亚慢性地杀死在监狱里了。事实上果然玛利亚底病情稍微好了一点，又被捉回监狱里去了。她底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密友亚历山德娜也同时伴她入狱。

此后玛利亚底生活较前更为悲惨了。一九二三年她曾设法逃狱，但没有成功。这件事直到柏慈帕洛夫底回忆录《一个格别乌人员底忏悔录》出版后，才为世人所知。柏氏书牌有下面的记载：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和其他几个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央委员同监禁在那里①，他们被监视得很严。狱卒寸步都不离他们之身，玛路霞打算逃狱。有一晚上她从窗口爬出去，爬上了屋顶。我们底人发觉了，就开枪射击，都没有打中她。她又慢慢地爬回来了。

要是一枪打中了呢，玛利亚岂不是就这样绝死去了么？

在一九二四年末，政府就要把玛利亚放逐到土耳其斯坦

① 指邻近莫斯科城的一个监狱

去。她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实行绝食，表示反抗，然而终于无效。一九二五年春她果然被放逐到南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同时被放逐的有亚历山德娜与麦约诺夫^①等人。

玛利亚底此后的状况，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了。她也许还生存在土耳其斯坦，也许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我未得她底消息之前，无法下断语。自一九二一年读过她底《致西欧工人的一封公开信》以来，我们就不曾读到她底作品了。难道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革命家，一个殉道者便这样地消失了么？

六年前当托洛斯基宣言不能释放玛利亚的时候，高德曼曾写道：

只有一件事可以救玛利亚——便是使她离开俄国。她底友人曾向布党政府这样要求过，但是没有一点效力。一九〇五年文明世界底抗议曾救了玛利亚底生命。现在又需要同样的救护她的抗议了。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她须得脱离“其卡”底监视，离开这悲惨的俄国底祸患和苦难，到外国去呼吸点自由的、山间的、又清洁又新鲜的空气，才可以恢复身体底健康。她已经过百死的了。难道她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

高德曼底希望成了梦想。现在连托洛斯基也不能保护自己，被他底同党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那么玛利亚底事件还有什么希望呢？

① 麦约诺夫：著名社会革命党左派。

“玛利亚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我曾这样地自问过，现在
我将永远地拿这问题来问自己了。

“玛利亚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

一〇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①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五日生在基辅省底达拉席卡县。她是著名十二月党五个领袖中之一人加哈夫斯基将军底孙女。她底祖父因参加“十二月党叛乱”被尼古拉一世绞死了。她底早年的身世我们不甚知道。她底回忆录《一个女革家底回忆》也只是从她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活动说起。不过我们知道早在一九〇四年她虽然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便已经加入在革命运动中了。她在彼得堡底奈厘斯基堡塔的工人中宣传革命甚力，而且组织了革命团体。三年后她就被逮捕了，军事法庭把她判处了二十年的惩役罪。她在阿加士监狱中住了六年，在一九一四年遇赦被放逐到横贝加尔区域里。俄国二月革命后，她和许多同志都得了自由，回到欧俄来。

伊林娜回到欧俄后，便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中的极左派。这一年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一派和周诺夫一派右倾的党员分裂了，玛利亚一派另组织社会革命党左派，这情形我已在前章说过，伊林娜也就是加入左派的。她底卓绝的办事才能使

①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Ирина Каховская(1887—?)。

得党员推举她为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还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布党与德国订了《布来斯脱和约》后，社会革命党左派认为这和约无异乎表示德国帝国主义底势力已征服了俄国，所以他们决定有一种反抗的表示。他们已加入苏俄政府的阁员一律退出，不与布党合作，同时实行暗杀德国大使梅伯黑的计划，梅伯黑果然被刺杀了。

这时候乌克兰早已被德军占领，而且德军在乌克兰的权力又为《布来斯脱和约》所承认。实则爱席哈痕元帅率领的德军之专横，以及反革命军哥萨克大将司科洛帕次基底军队之残暴，使得乌克兰人民日坐涂炭之中，浮沉在苦海里，而且白党将军台尼金又得着协约国底帮助，正预备重振旗鼓，革命局势岌岌可危。所以为拥护革命计，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决定先杀掉反革命派底首魁，如爱席哈痕、司科洛帕次基、台尼金等，由伊林娜负责组织暗杀团。

社会革命党左派战斗团之组织，最初只有三个人：司莫连斯基同志，他当时在苏维埃政府任着要职；波利司·重斯查同志，他是克龙士达脱的水手，深得同伴信任与敬爱；其余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们三人此时以前都是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这时我们很难把这个工作推脱掉。

司莫连斯基便先到德国去征求德国社会党人对于这个计划的意见，而波利司与伊林娜二人则乘此时机赴塞瓦斯多颇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并探听消息，从事宣传。伊林娜 路上

的见闻都是很动人的，她后来曾记述在她底回忆录中。

伊林娜与波利司二人在外面耽搁不久，就回到了莫斯科。后来司赞连斯基也从德国回来了。他此行底结果使他相信“战斗团”应该以刺杀爱席哈痕元帅为第一件工作，因为爱席哈痕在乌克兰乃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有一次他实行农民大剿灭，就杀了八千五百多人；有一次铁路工人罢工，他也实行大屠杀。

这时候伊林娜底“战斗团”除了原有莫斯科的三人外，又加入了两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底代表：一个是玛露霞·西沙鲁西娜亚，一个是 I. B.，另外还加入两个同志专门从事暗杀那个哥萨克大将的。这两个便是 G. 与 M.（但到了基辅这两人就不见了）。玛露霞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从事党的工作很久，富有经验，又非常热心，同志们很相信她。当时便决定她先去基辅打听消息，并与基辅的团体切实联络。

玛露霞底信到来了。伊林娜一行人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底便带着银钱、武器、炸药以及制造假护照用的一方图章向基辅进发了。

基辅浴着五月的阳光；到处都是花朵，到处都是新绿。这城市所给与我们的印象是非常迷人的：行人穿得很好，而且很快活，好像在过节一般，有很阔气的商店底货摊，咖啡店挤满了一大群人，这城市和那又冷又饿的莫斯科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隔。这里正是那般幸而能逃掉了革命的“社会之花”底区域，人们都似乎过着一个兴奋

的反常的生活；人们在德军威枪刺之下疯狂地臆想，疯狂地作乐。……在大街上群集着德国军官、乌克兰警察、哥萨克大将底卫队、穿着春季服装的女子；青年女子献花给德国兵营。从早到晚，人们唱着德国军歌或乌克兰歌曲；鼓声不停，公园里奏着音乐。……

费了长久的时间去找房子，我们到底找到了一个过夜的地方，我们可以暂时安放我们底行李，把做好了炸弹藏在我们底衣服内。……玛露霞在高基辅八公里的S.地，租到了一所隐在生满了丛林的园中的可爱的小别墅，我们到后第二日便到那里去。她把我们三人（我、波利司、司莫连斯基）假装当作来底般看待。我们又在城里租了两处房子，又在B.地租了一间“留待不时之需”的房子。我们买了一辆出赁的马车，一匹马，又在G.地买了一所适意的茅屋；“马车夫”波利司就做了那茅屋底主人。每天他驾起他底懒惰的驾马出去，从不肯拿鞭子在马背上打一下教它走快的。这所茅屋底天井便是我们埋藏炸弹和武器的地方，而且就在那地方，我们成立了我们底很简单的实验室。至于我呢，我假装为一个犹太妇人在城里B.大街上租了一间闷气的房子。司莫连斯基假名为波尔，说是我底哥哥。……

……约在一星期之后，同志I. B. 来，……他一个人住在G.地，假装为一个锁匠，起初他给我们帮了一些小忙，过后他就从事积极的工作了。居住问题安排好了以后，就应该认定地点了。我们人数太少了，而且我们也明

白要知道爱席哈痕底习惯，以及他每天出门底时间是很困难的。自然本地团体(由玛露霞传达)把爱席哈痕底住宅的位置，加太林街上卫队营的地点，以及爱席哈痕常去的Q.G.地方等等都告诉了我们；然而L.区是一个非常荒凉的街道，而且在这里秘密警察和卫队营底监视又是异常之严。……在加太林街(即爱席哈痕底住宅之所在地)没有一个货摊，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一陀甚或一间出租的房子。邻居都是兵营，全街只有几个脚步急速的行人。所有房屋都是被高级军官占着的；每条路都有卫兵；警察们傲慢地在街中闲踱着，就在大热天他们也穿着雨靴，手持雨伞；每一个行人都是他们底注意之集中点。……

有一天我照常在加太林街散步，我到底和将军对面地遇着了；不久我又知道他平常离家到参谋部(离他底住宅不远)去办公的时间：是恰恰在午后一点钟的时候，他拿着手杖，带着一个马弁，步行从家里出来。……三分钟后他走过那一排在他未到之前便排成队伍等着行敬礼的兵士面前，走进参谋部的建筑里去了。

同时我们也侦察司科洛帕次基底习惯；我们做这种工作特别在夜间。波尔与我二人藏在粗大的菩提树后偷看着，在夜间一点钟光景有许多精美的汽车驰进“宫殿”去，“哥萨克大将底朝臣”穿着“朝服”走下灯光辉煌的石阶，然后哥萨克大将本人也走下来了，他平时总穿着常服，有时也穿着普通哥萨克军服。所有的人都穿过G.树林走进一所尼姑庵里作乐去了。……

然而伊林娜等底第一件工作是暗杀德国元帅爱席哈痕，第二件工作才是刺杀哥萨克大将，所以他们仍以刺杀爱席哈痕为最重要。

正到了伊林娜等准备完善的时候，爱席哈痕忽然动身到克里米去了。

……现在我们底活动之战场乃是车站了，我们每天在各报上查看他回来的日期。后来果然查到了。在那一天我们四个人各人带了一个炸弹在车站上去迎接他，各人认定了岗位。然而各报底记载都不可靠。爱席哈痕已在两日前回来了。我们只得忍耐着重新进行旧的计划，这计划就是等他从家里到参谋部去的时候，我们在街中袭击他。

从此可怖的时期开始了。波利司变成了过度的兴奋，眼睛深凹进去，唇边同时表现不安与决心，每天都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底生命，每天都在向他底朋友、向他底自由诀别，离开我们，他独自去完成他底惊人的事业。我们伴着他走到街角，和他在一起，直等爱席哈痕快要到参谋部出来的时候；过后他便走去了，我们等候着炸弹底爆发声。他走回来又失望又狂怒，因为他失败了；有一次恰遇着一辆马车走过；有一次几个小孩嬉玩地走过，离将军甚远；有时候他又不能够遇着爱席哈痕。有一天机会正好，他刚拿起炸弹，炸弹底盖没有上紧，便落了下來，滚到爱席哈痕底脚边；波利司俯着身子把盖子拾起，匆忙地在众

人眼前又把盖子上紧在炸弹上，不曾引起别人底丝毫的疑惑。我们常常注意到改换我们底面貌和服装；有一天另一个同志来代替波利司，但他也失败了。波利司显然是疲乏了；然而他又十分固执，以一个平静的勇气和差不多幼稚的率直，双眼永含着烈焰，每天做那不倦的工作，他相信它，一直到他底最后的日子。

我们每夜都是在 S. 地的别墅中度过去的；雨落得太多了；我们把灯完全灭了，恐怕周围的人看见深夜还有亮光会起疑惑。我们三人留着一直到早晨，过后略睡一刻，我们就搭小火车进城去了。

在这时期中我又和 I. B. 及“波尔”商议，想出一个办法使波利司掷炸弹完成了以后可以逃脱出来。……（方法略）然而我们不敢叫波利司行这计划。实在我们在二作开始之时就决定我们底行动应该产生出最大的骚动来，为了这个目的，就应该有审判，恐怖主义者得公布他底姓名，在全世界人们之前解释他底行动之意义，在宣判时又表现出他底理想之正当与圣洁。除了这个政治的见地之外，波利司本人又有一个特别的概念；鼓舞起他在恐怖主义中的这种理想、这种勇气的，并不是任何演说或书报，也不是任何外来的影响，乃是他底固有的天性，他背诵着《福音书》里的话：“麦子落在土内，不死在那里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然而如果它死了，它便会带来一个丰收。”他一想到他幸而能够把他底微小的贡物献给解放之运动时，他底双眼就因快乐而发光了。他把能够牺牲自

己底青年的，而且前途富有希望的生命这件事当作一种幸福。然而必定要去杀一个人，这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悲剧了；如果他不相信拿他自己底死与受苦来赎回他所要犯的谋杀罪，那么他也许还不能够下决心去杀人咧！我们知道这一切，最近几夜我们也常在别墅中讨论过，我们不过以为应该不顾这一切，给他找一个事后脱逃之路。……然而我们这样决定的时候，波利司本人却否定我们底计划，而且以一个非常猛烈的态度排斥一切关于他自己安全的考虑，这几乎使得如此为他担心的我们感到很大的羞愧了。一切自己安全的考虑在这伟大的行动之实现面前都消失了。“只望它能够成功！其余的并不大要紧；自然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好的。”在他遇害前数日他在监狱中写信给他底母亲道：“妈妈，给我祝福，不要怜悯我；我是非常快乐的。我好像见着天了。”

七月三十日午后一点钟光景我照常在上街口和他分别了。一刻钟以后他又来了，不曾带着爱席哈痕。在一阵长雨落过之后，太阳又出来了，受过雨洗的树木发出了香气，我们互相庆贺这个好天气，谈了几句话正预备再分开，这时节来了一位先生，他以无理地固执的态度向我们讯问到总督家去的路。波利司眼望着大钟，很快地转过身子急忙向加太林路走去了，并不和我们握手分别。五分钟以后我们便听见猛烈的炸弹爆裂声。

难道这是一个意外的事变，炸弹就在他底手里爆裂了么？爱席哈痕死了没有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明

！白波利司一定不能生还了。……

我们装出无所事事在街上散心的人底样子，向着K街走去，预备再回到L区。一群人向我们拥挤过来，因为L区被军队守住了，不准行人往来。我们听见人说：“元帅死了，马弁……”“马弁死了，将军轻伤，凶手被捉，……”

稍后我们便在植物园内一株栗树上刻了一个十字架，这个暗号告诉本地的同志说，我们已成功了。然后我们又坐上马车回到S地的别墅中，等着晚报看……

晚报告诉我们说凶手已被捕；元帅的腿被炸碎，已经死了……第二天的晨报报告爱席哈痕之死，并详细论到波利司以及元帅底葬礼。然而以后的晚报和晨报就没有一点消息了。

城里立刻大起恐慌。谣言四处流布，说德国军队要来基辅屠城，德军炮队要来轰城，报仇雪恨；大批的拘捕发生了。……城里在那附近四乡居民群集着的市场上，或在工人底群集中，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显的快乐。有人居然在大街上说：“哥萨克大将底轮值该到了。”大家把这件事归功于“莫斯科的同志们，他们什么事都能够做，而且他们要做一切的事来把工农们从血的暴政之中解救出来。”……

爱席哈痕底葬期是在八月一日。我们知道哥萨克大将将要参预奠祭的，我们决定等着哥萨克大将在奠祭完毕从路德派教堂出来的时候，来完成我们底第二件工作。

这时候伊林娜等底忙迫和困难自不消说，我们且放过了这件事，来谈她底以后的记载。

……波利司在分别前曾向我们说：“我知道，我确信你们会把你们底工作做得很好的，请尽力快点做，使我在被处死刑之前，会得着那个好消息。”

葬礼之日，我们到了 I. B. 和我们约定交付炸弹的地点。他不曾来。我们连忙乘车到他底家，他底房东走到门口挥手向我们说：“快跑，快跑。昨夜许多外国军官乘汽车来把他捉去了，并且还打他。”我们便拚命地跑开了；我们自己另外新装了一个炸弹；然而我们到得太迟了。据我们计算至少要一个月以后才有这样的机会呢！

这期间“波尔”回到他底住处几遭逮捕，幸而逃脱了。

我们觉得我们底命运危在毫发之间，便决定“波尔”到莫斯科去请求援兵来进行第二件工作。我则留在基辅看守东西，维持已着手的事项，依着我底方法而行动。

傍晚时分我们到城里住处取了行李，寄放在我们认识的门塞维克底家里，那个人又答应帮助“波尔”明天早晨乘汽船离开基辅。夜间我们在 S. 地的路上遇着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同志 T. 君。我们三人便向着城里走去。这夜要在树林中过得很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十分疲倦，需要休息，而且应该带着旅行所需要的东西。更应该讨论与决定一切的详情。

夜色十分幽暗。一个窄小的草径穿过花园直达我们底家屋。我们手牵着手连串地走着。外面的一切似乎是和往常一样地平静；然而走近阳台我便看见一个坐在茶桌旁边的哥萨克军人底侧面阴像！“有人！”我所能向同伴们说的就是这一句话。立刻一排枪震聋了我底两耳，一股电光向我射来，使我不能睁眼。我蒙着两耳背靠在墙上。在阳台底栏杆前埋伏着一排德国兵，共有十个人。他们看见了我，而且听到我们底声音，便放了一排枪，其目的显然只在惊吓我们，并不在把我们杀死。这一排枪历时约两分钟。我向四周一望，不见一个人。我的同伴们靠着黑暗底庇护，居然逃到园里丛林深处躲藏着了。兵士不敢去追他们。……

伊林娜底两个同伴居然都逃出来了，他们看不见伊林娜，相信她是被排枪打死了。“波尔”即日离开基辅到莫斯科，而本地中央委员会同志T.君居然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伊林娜又说：

德兵甚至不知道我们这晚来的共是三人，他们只去搜索司莫连斯基^①，这一队兵只得以捉住我一人为满足了。我与波利司两人皆因谋杀爱席哈痕之罪受审于军事法庭，他是正凶，我是同谋；而I.B.因当局找不到证据，故不曾牵连在本案内。

① 司莫连斯基 即波尔。

那个指挥着这队埋伏兵的哥萨克军人把我拷打了一个整夜，这些苦刑，波利司和I.B.二人都曾受过。天一明就有两个隶属于德国公安局的粗鲁可厌的俄国军官来用汽车把我送进德国监狱。一路上他们带着明显的快乐叙述波利司与I.B.受着何等的拷打，他们并且自夸他们底本领赛过福尔摩斯。他们又怒骂道：“然而这些狗！他们总是闭着嘴，好像他们底狗嘴里装满了水一般。”

在德国监狱，我完全受着单独禁锢。除了一个严酷而沉默的狱卒和几个军官而外，什么人都看不见。那些军官永远是垫起足，头放在窗格上投一瞥好奇的有时就是惊异的眼光在我底身上，然后又沉默地去了。……

我不曾得着波利司底消息，又无法向人探问，我试问管狱员要求由他转交一点钱给波利司。他讥笑地回答说：“姊姊伸手援助她底弟弟了！他拿着钱有什么用？他只有几天可活了。”……

被捕后第二日我便戴上了脚镣手铐……九日受过审问后，人家又把我移到一个新囚室里，这囚室是在一个阴暗的走廊下，共有三个囚室，我的是最末的一个，隔壁的囚室内空空无人。一具草褥完全不像床，然而囚室内除此而外，别无长物。他们又把我戴上手铐，但这次是反剪着双手的。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过后，就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了。门前有一个狱卒看守着。外面没有一点声音进来，里面也没有一点声音送出。我居然有方法探听到波利司底消息。原来他们叫了一个囚人进

我底囚室里来换窗户上的一面玻璃。那人把我底手铐望了一眼便问道：“你一定是刺杀将军案的要犯，像星期日晚上被绞杀的水手一样？”门前看守的狱卒并不干涉我们；我便问他波利司被害之详情，他一一告诉了我。……

波利司底命运在全监狱中引起了很大的同情，甚至德国兵士也同情他。那个换玻璃者又以一个颤抖的声音叙述波利司受着何等的拷打，受着何等的痛苦。他说：“他是为着我们而受苦的。然而他应该立刻自杀好得多；他多末能受苦刑啊！”死刑执行期在八月十日午后四点钟，观者甚众。波利司绝命后他们在他底身上贴着“暗杀爱密哈痕元帅之凶手”的纸条，在电柱上悬了十小时之久。

在很短的时间以后，我居然能够和那些轮流看守我的狱卒们恳切地畅谈起来；他们又告诉我许多关于波利司被捕、被拷打、被害的正确的消息。……

……有一次在晚上九点钟忽然进来几个德国和俄国的军官，其中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柏立亚叶夫，哥萨克大将近卫队副队长。……于是一次凶暴的审问就开始了，整整挨过了一夜，柏立亚叶夫说：“关于你底案件我们不能发现出一点东西。然而你一定有同党，你在城里一定有不少的相识。告诉我几个人底住址，你不说出来，我们是不定的。”我向他们证实说I. B. 同志是和这案件完全没有关系的，柏立亚叶夫又说：“你看，你所说关于S.①的话，完

① 即I. B.的假名。

全不合事实。我们把他叫来和你对质，我们再听你说什么。”他低声向一个哥萨克兵发命令。这个哥萨克兵便到办公室去，但不久便回来说“前天已经把他释放了。”柏立亚叶夫很不高兴，诅骂了几句。到了早晨，他们便决定去了。我底手足被缚在行军床上，挺直地躺着。

早晨十点钟光景典狱长来了。他把他底膝盖在我底草褥上。他向我说明恐怖主义方法之无用，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他最后说，“把这本小《福音书》（这是柏立亚叶夫带来的）给我，写几句纪念的话给我，但要用法文写，现在你且把这书保存着，等万事都休了的时候，再给我好了。”他又答应叫人给我松绑，说只在夜间才把我缚在草褥上。……

审问开始了。我第一次见着检察官，他是联队长胡伯勒，一个身材短小、面貌和蔼的人……他每天早晨带了一个书记来；狱卒搬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在我底囚室中一直坐到晚上，只在正午才休息一下。……他所问我的大半是恐怖主义战役之动机，社会革命党左派之内容，恐怖主义之心理学与观念学，以及波利司之人格等等。

胡伯勒是能够顾惜他底名誉的。他很惊奇我受到的拷打。他命令放松我底手足，不许再这样把我绑在草褥上。“你一定会被判处死刑，人家要把你枪毙的；然而打你，拷问你，这就是绝大的丑事了；这样的事，只有像俄国人那样野蛮的人才做得出来。”在判决之前夕，他提出

了下面的几个问题：“你后悔你底行动么？你所回答均否是与你底政治的、道德的信条确实一致的么？如果波利司·童斯奎失败了，你会继续进行他底工作么？”他记录下我底回答，临去时用手拍拍卷宗说：“好！现在什么都完毕了。”

宣判底程式是在狱中办公室内举行的。胡伯勒要求将我判处死刑。照例官厅方面指定的替我辩护的律师呐呐地说到“这一般不能被人列在普通杀人犯之类的人底理想”。在一个什么雇员家里，有人在开留声机，歌声从窗户送了进来。裁判官们底脸上现出昏迷与冷淡的样子。他们讨论究竟我是帮助这行动呢，还是参加这行动呢；他们承认了后一个结论，决定把我判处死刑。不过刑期要在得到德皇底同意之后。胡伯勒在宣读判词时说：“在我们那里，要绞杀一个女人不是如此容易的事。”一个半月以后，他们才把判词送到柏林去，这位亲爱的联队长胡伯勒先生便静候着德皇底回答。……这时候德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变。十一月底德皇宣告退位；他再也不能在判词上签名了。……

判决以后我底生活就比较容易过了。我接到了许多囚人底关心与同情的表示，他们由监督之手送了不少的东西给我。有的送来一朵花，有的送来一封信，有的送来一张纸或一支铅笔。我居然能和囚人们通信；我还写信给外面的朋友们。胡伯勒来看我：“还得等下去。我们至今未得着片纸只字的回答。我想光阴会把你底感情改变

过的，在临死前认识真理，比死于谬误中好得多。皇帝居然想到你并且为你而忙碌，你真有莫大的荣幸。”我当着 he 底书记和守兵之前含笑回答他说，我是把德皇全不放在眼里的，他动着手做了一个恐怖的姿势，叫兵士连忙离开，不要受到魔鬼底影响。

常常有各级军人来看这个“被判死刑的俄国太太”，他们发出许多关于我底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奇怪的、率直的问题。有一天一个青年德国军官偷偷地来到我底囚室的窗前，把头贴在窗格上，因为恐怕别人发觉出他底这种违犯军律之举，全身都战抖起来了。他向我说：“姑娘，你好么？我丝毫不能够帮助你，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物，然而我诚心地握你底手。忠于你底理想罢，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啊！”说完就不见了。……

我底更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阿托的守兵，他底眼光是可爱的，当他从窗格里看我的时候，我只能看见他底一只眼睛。他底看守的职务完毕后，把一根手指伸进窗洞来：“姑娘，我也许不会再见着你了。至少你在临死之前愿意握着一个男子底手的。”他再来时看见我还生存在这里，非常高兴。……

德国革命一起，在俄境的德军也就大起恐慌。柏特鲁拉又率领起农民暴动军向基辅进攻，德军便连忙预备退回德国去。因此柏特鲁拉连战皆捷，在十二月十五日柏特鲁拉进了基辅城，哥萨克大将司科洛帕次基逃走了。

一九一九年正月，在布党占据基辅之前数日，伊林娜就被乌克兰工农群众援救出来了。伊林娜一出狱，便回到莫斯科，商量暗杀白党将军台尼金的计划。这时候布党政府底秘密警察机关“其卡”正在缉拿伊林娜。不久“其卡”居然侦察出了伊林娜底住处，就把她囚在监狱中。但在一次详细的考察之后，“其卡”人员发现出伊林娜所组织的战斗团底新计划。

布党政府当时正受着台尼金军队之压力，所以觉得伊林娜底新计划对他们也是很有利益的，便把她和她底几个同志释放出来，允许他们到乌克兰去暗杀台尼金，但有个条件，就是事成之后，如果他们得免于死，应该回到监狱里来。

伊林娜们果然去南俄进行暗杀台尼金的计划了。然而当时乌克兰的情形异常混乱。一个政府成立几天便又倒了，另一个政府底命运也是如此。靠着所谓“无政府主义将军”马哈诺所率领的乌克兰革命农民之力，台尼金居然被打得大败而逃走了，伊林娜还正在进行她底工作，然而这一次完全没有用了。她便在一九二一年回到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她就患着重病，几濒于死。病稍愈，她又被捕了，这时正是在布党政府压服了克龙士达脱三月暴动之后，她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加路卡过了两年。两年期满，她自然回到欧俄来，但在一九二五年又被布党政府逮捕了。

这时候伊林娜正患着肺病，但也被判决流放到南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三年，她因在莫斯科狱中时，前一年因病割治过的伤处又破裂了，后来再经医生缝好。幸未致命。

她底朋友们和同志们曾几次设法想使她到外国养病，但

总不能得着苏俄政府底许可。

她今年虽然只有四十一岁，然而在她此生究竟有无自由之日，还很难说！不过不管她底命运怎么样，这个“牺牲了自己底青春，自己底生活，自己底全精力来从事解放那般劳动的受苦的人”（借用她底《回忆录》的法译者纽满君底话）的伊林娜是永远不能被忘却的。

现在且让我也来像那个青年德国军官那样向她说：

姑娘，你好么？我丝毫不能够帮助你，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物，然而我诚心地握你底手。忠于你底理想罢，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啊！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三六年一月再版。

前 记

这是我底《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底前十章，大约占全书底五分之一，除了第九章外其余的都是我七年前的旧稿。这几年来忙着写小说，就没有心肠来写完这书，并且写这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这部未完的旧稿在我底书箱一睡就睡了七年。最近因为编辑《文化生活丛刊》偶然想起了它，把它找出来，整理了一番，补写了第九章，编成第一卷，就这样草率地出版了。

第一章前面本来还有一章《绪论》，现在暂把它删去，将来拟附印在第五卷后面。但是第五卷什么时候可以写成，现在连想也没想到。不过我想，即使以后的几卷暂时不出版，对于第一卷读者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把第一卷作为一本独立的小书看，也未始不可以。

这本书底题名不很恰当。倘使叫做“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也许好一点，但译成中文怎么样讲呢？我可不知道了。

写这书只算是一种尝试。虽然是读一百本书，写一本小书，但这也是我底研究底一点小成绩。我自己当然有我个人底见解。精细的读者不用等着看“绪论”和“结论”，从每一章

底发展中也可体会出来。然而我应该声明的是我并不曾添加过一点宣传的话句，所以这只是一本研究底书。至于我底研究方法有无错误，尚待贤明的读者指教。

一九三五年七月巴金记于东京。

再版题记

这本小书居然会在三四个月以内再版，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我自然为这个高兴，而且这还鼓舞起我续写第二卷的勇气。

这本小书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当初写它的时候曾读了一些参考书。这里面虽然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论断，但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我自己生在二十世纪，又生在中国，不能够看见书中所叙述的事情，不能够认识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因此只得依据别人的书。我手边还有一部 Kulczychi 的三厚册的《俄国革命史》，还有 J. Prelooker, Rapport, Masaryk, Bienstock 诸人的书，此外还有参加当时的运动的许多人的回忆录或别的著作。譬如 Tikhomiroff, Stopniak, Figner 诸人的书，都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的可信赖的著述。我没法证明那些作者“改造历史事实”，我就只好依据他们。但不幸却引起了一位所谓批评家的抗议。他说我“改造历史的事实”，他却不知道我并没有资格创造一句新话，这只表明他自己读书不多了。

关于我写这书的企图，我在《前记》里已经说过。我想写

的是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①而不是“社会运动史”,所以我在下面加了一个“话”字,还声明过“题名不很恰当”。至于我为什么要写 Biographical History 呢,原因自然有几个,但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的环境,②做批评家的似乎不会不知道。我既然选了这体裁,因此在这 Biographical History 里面,我便主要地描写当时激动着全俄国的社会思想的发展。这样我当然要举出当时的几个理论家来做代表,这不能说我看轻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我在第一、第二两章里所写的就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我对于历史的看法,我在我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中写得很明白。我在这书里也不会是两样。那位批评家故意栽赃,甚至不惜抹煞这书中的一些篇页,装作没有看见。例如十二月党运动中领袖们的行动,我分明写在那里,他却说我“把它故意抹煞了”。又如他怪我不提蒲列汉诺夫;他却不明白,依我的体系那应该在第二卷中才能够提到。更如他责备我“无视工人的势力而把农民力量看得太重要”,我倒请他把当时的社会情形仔细研究一下,关于这问题也有好些书籍。至于我,我要在第三卷里才写到工人运动。

我的这本小书自然有很多缺点,我承认。但他所指出的三个缺点,却并不存在。他连人家原书的体系还没弄清楚,遂

① 我看过一本“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小说家 J. M. Wiltam 写的。

② 第八章中关于巴枯宁的“基本思想”,本有一段叙述,另外还有一节论达巴氏所著《革命问答》的文章,因别种关系,付印时都给删掉了。

人家所根据的史料也没读过，就要来下论断，对于这样的批评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巴金记。

第一章 司顿加·拉进与 第一次革命

一

在俄国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进的民歌中间，有一首极普遍而且为一般农民所最爱的，这就是著名的《凡尔加底岩石之上》。

凡尔加河岸上有一座岩，
在岩上长满了野生的青苔；
它静寂地在那里立了很多的年代，
不关心一切，再也无心悲哀。

它底顶已被风浪和暴雨扫得干净，
在上面栖息着的，只是那凶猛的老鹰；
它把它底巢建造在秃了的岩石之顶，
每日价在巢内吞食它所捕获的飞禽。

有一个人攀登上了这岩石之顶，

在顶上留下了他底深深的足印；
从今后岩石就成了神圣的东西。
而伟大的“司顿加”底名号也将永远生存。

虽然在神圣俄罗斯底教堂，
这个人年年月月地被人诅咒、诽谤，
然而凡尔加的人民在他们底祈祷的颂歌中，
却永远深深地宝爱着这个人所留下的印象。

有一次在黑暗的深夜中，
这个人登上了岩石之顶；
他孤独地在上面对徘徊，不宁，
直到金色的太阳放出了它底光明。

海浪在下面急急地私语，
四周围都是闷得死人的沉寂；
悲哀的思想未到了他底胸中，
在这夜里，伟大的行为就从此产生。

沉思的，忧愁的，他走下了这岩石之顶。
伟大的，勇敢的决心便产生于这天早晨！
他要从暴君底怀抱里，
救出那憔悴了多年的莫斯科母亲。

啊，他底神圣的热望终久是徒然，
对于那无情的命运，他底祷告也竟是枉然；
今后任他血海奔腾，人民的滔浪滔滔不尽，
他们底号泣也终不曾引起他人怜悯的感情。

他啊，并不像一个有权的国君，
也不像一个被欢迎的尊贵的客人，
更不像一个骑着战马带着军刀的将领，
走进那克伦姆特宫底白色的城门！

他只是一个被刽子手牵引着的，带着镣铐的囚徒，
在这巍峨的城门下面，他低下了他底高贵的头颅……
伟大的司顿加竟这样一去不还，
那凡尔加底岩石却是年年依然，
只有这河流和这岩石啊，在他们底沉默的教礼中
还不时地纪念着那英雄的“阿达满！”

如果在我们底乡土里还生存着一个人，
他并不贪图淫乐，也不只顾自身，
对于周围的人，他从没有不义之行，
他也不曾压迫过惨苦的农民，
他爱自由，就像爱他底母亲，

① 阿达满(Ataman)：哥萨克军队底首领。

他以地底名义，向着生命之路迈进，
那个人如果敢独自登上这岩石之顶，
这巨石便要把司特潘底故事忠实地说与他听。

二

所谓“正史”是时常与真正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因为写“正史”的人所根据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偏见与无知。

读俄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罗曼诺夫朝，亚历克西斯治下（1645—1676）有一个著名的匪徒，一个凶狠的叛贼，名叫司特潘·拉进（Stephan Razin）绰号为司顿加（Stenka）其人者，纠合了无数的匪徒称兵作乱，残害人民，起初声势极为浩大，连陷名城，后来终于败北，被政府捕获，先受了种种拷打，然后在莫斯科城内受车裂之刑。俄国的教会也把他诅咒为上帝底敌人，国家底叛贼，提起他底名字就好像提起了魔鬼一般。

然而事实上司顿加·拉进并不是这种人。拉进是俄国底第一个革命的领袖，他是第一个揭竿而起，组织了一个俄国人民底大暴动，反对沙皇底暴政的人。

关于拉进底早年的身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出身顿河地方的哥萨克人，而且是正教教会底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在一六六一年曾到白海，梭罗维次基寺院进香，到了寺院，他在那里祷告了许多日子。过后他又热心做慈善的工作，建筑了一个老弱残废的哥萨克人休息的地方。

这时候一般人的不安一天一天地扩大了，这大半是农奴

制度底结果；农奴制度在十六世纪末期才开始被认为合法，过后就逐渐变本加厉了。

同时俄国教会里又起了分裂，有名的主教阿瓦铿率领的一派脱离了教会，另组成了一个新的宗派名Starovertsi^①。这个新的宗派成立后就受着政府底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又增加了社会的恐慌和人心底不安。

在这种空气里面，拉进一旦出来，置身于叛乱的顿河地方的哥萨克人丛中，率领他们向着沙皇政府和一切领有农奴的地主进攻，自然会得着大部分农民底响应了。

拉进对于他底追从者有极大的魔力，他底同伴们也实在爱他而且忠心于他。他具有一般哥萨克人所共有的特性。他底身体强壮，相貌魁梧，做事富有无畏的冒险精神，言语半带诙谐，却又是极其雄辩，有时对于敌人又离不掉真正哥萨克人底野蛮，那种无慈悲的残酷。

在他底宣言中，拉进主张消灭各种阶级的区分；推倒农奴制度与沙皇政府，建立自由的共和国，在那里，一切国民都是平等的。人民开始称他为“巴吐席加”^②了，这个尊号从前只是用来称沙皇的。

拉进不仅长于陆战，他还组织了一队很好的舰队，共有战舰三十五只。一六六八年春天他占领了沙里育及雅次克两处要塞，他的势力的雄厚，连沙皇也震惊了。于是沙皇派人与他议和，说如果拉进不再进攻，政府也不加罪于他，然而拉进却

① Starovertsi，旧信仰者的意思。

② “巴吐席加”(Batushka)，“小父亲”的意思。

置之不理。他还说：“如果沙皇希望得到一个回答，非亲笔写一封信来不可。”沙皇于是派兵从阿斯多拉罕进击，又为拉进所败。拉进得着了这样的成功，又率领舰队进里海，侵波斯海岸，大败波斯军队，虏掠了波斯的公主。一六六九年回到阿斯多拉罕，这时候他便成了俄国全东南部底主人翁了。

随后他又回到顿河地方，和另一个反叛者底领袖哥萨克人瓦斯果尔(Vaskolls)联合，从此他底声势更为浩大。

一六七〇年六月，拉进再整队进攻阿斯多拉罕，沿途都不曾遇着重大的抵抗，遂得占领阿斯多拉罕，杀死总督卜罗若夫斯基和亲王柴加斯基二人。

拉进占领了阿斯夫拉罕以后，就在这城里设了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这个政府底特征，就是一切重要服务员之委派以及一切主要的公众问题，皆由一个“Vyecha”^①来决定。

司顿加·拉进又带兵向莫斯科前进，沿途占领了萨马拉、萨拉托夫等城，创设了同样的哥萨克共和国。然而在这年九月拉进却在辛比斯克阵上受了重伤，他底队伍又大遭失败。

不过这时在凡尔加、鄂加、德温拉一带的广大区域中，各村落的农民都竖起叛旗，反抗地方官吏，杀戮或抢掠地主们。在这些地方，拉进底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求自由的人，大概会为自由牺牲的，因此英勇盖世的拉进也免不掉最后的命运。在部下因政府底利诱逐渐叛离了之后，拉进在一六七一年四月终于和他底兄弟福洛尔(Frol)同时被

① “Vyecha”：市民县总会议的意思。

捕，即被押送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尽了种种的苦刑，又坐火室，烧得焦头烂额，他不曾呻吟过一声。

一六七一年六月六日拉进和他底兄弟同受车裂之刑。他底最后尤为悲壮动人，虽遭肢裂之惨，也未尝作丝毫悲痛之色，从容而死。

俄罗斯沙皇及贵族政治之大敌就这样地消灭了。

拉进底思想可从他底宣言里看出来。有一次他率领舰队航行之际，遇着押解囚犯的船，他便把这些囚犯一律释放了，并且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以自由，满足你们底愿望；我现在正和那睡在人民底血泊里的万恶政府战斗，如果你们愿意与我合作，就请加入到我们底队伍里来！”他又派人潜入莫斯科张贴他底宣言道：“莫斯科帝国政府高等贵族之辈，本是我们底佣兵，迟早必做我们底奴隶，我仗义为被压迫的人民奋斗。并非想以暴易暴，自立为王，只愿做你们底弟兄。凡住在俄国境内的人，请聚集在我们底旗帜之下，来打倒那些掠夺者！”在另一篇宣言里，他又说他底目的在打倒专制政治，使每个人都得着“土地与自由”。当人民把沙皇尊号中之一个，“Gosudar”^①用来称他的时候，他使道：“我愿意生活在你们中间，像一个弟兄，不愿做一个沙皇。”

依据民谣与传说，拉进还做过一件惊人的事，至今尚脍炙人口。前面已经说过，拉进攻波斯时，曾虏掠了波斯的公主，这就是波斯王麦奈狄底年轻美貌的女儿，拉进自得到波斯公

① “Gosudar”：“主”的意思。

主以后宠爱异常，有一次拉进率领舰队顺流而下，在一天晚上，他照例在船上和波斯公主饮酒作乐。在背后的兵船里，有几个兵士在闲谈。他底兵士抱怨他爱波斯公主胜过爱自由底目的。这样的私语偶然被拉进听见了。他沉思了半晌，忽然立起来，把波斯公主抱在怀里然后举出头上，向着河说道：

“凡尔加，啊，凡尔加！你给了我很多的金钱，你给了我很多宝贝的东西，现在请你收下从你底‘阿达满’送来的他底最宝贵的礼物罢！”说了这样的话，他便把波斯公主掷入深水之中了。

关于拉进的轶事，还有许多的传说，然而都很难令人相信。不过他底英雄的人格却给俄国人民以一个深刻的印象，自然会鼓舞起许多勇敢而高贵的精神来步他底后尘！

第二章 蒲加鳩夫与农民暴动

司頓加·拉进叛乱被沙皇政府底铁血政策压服了。英勇盖世的叛徒身殉了他底主义，毫无遗憾地受了车裂之惨刑，然而自由之目的是不会消灭的。于是约在一百年以后又有蒲加鳩夫(Emelian Pugatcheff)所领导的农民大暴动。

实在，拉进叛乱被压服以后，彼得大帝底统治(1689—1725)不久就来了。在他底铁腕之下，农民底地位日益沉沦，他们底困苦日渐增加。因此社会底不安，农民对于政府底不满也一天一天地加甚了。第二次农民大暴动之出现自是必然的事。果然约在一百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说起来，蒲加鳩夫底叛乱比较拉进底叛乱还更重大，更有意义呢！

蒲加鳩夫和拉进底出身一样，也是一个顿河地方的哥萨克人，又是一个“旧信仰者”宗派的教徒。关于他底早年身世，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在他年少的时候，因为不满意旧哥萨克人与政府通声气来压制新哥萨克人的缘故，曾极力煽动雅次基的哥萨克人，鼓励他们去投土耳其底“苏丹”。一七七二年他就因此事被捕，先被囚于辛比斯克，然后被囚在喀山底监狱中。据说他在狱中的品行极好。他底谦和，他底仁爱的

气禀，他底虔诚，不久就博得一般同囚者和狱吏底敬爱。他不喝酒，时常跪着祈祷，从不曾打骂过人，甚至守卫的兵士对于他也表示尊敬，有一次，他底钱被人偷去了，他底同伴提议在一般同囚者中间去搜索，他便说：“让他拿去罢，上帝会来裁判他。这一笔钱不过是别人施赠给我的罢了。”从此蒲加鸠夫底声名便传播全城。因为囚犯是被允许接受外人底帮助的，所以时常有人来问禁卒道：“这里有一个叫做蒲加鸠夫的人么？我带了一个卢布来送给他。”

蒲加鸠夫既得着这末多人底同情，那么他底逃狱便是很容易的事了。有一天两个禁卒带着他到城里去要求施赠的时候，在路上他们便让他逃走了。蒲加鸠夫一得着自由，就立刻跑到乌拉地方的哥萨克人那里去。那些人是和他同宗派的，都是“旧信仰者”。他便联合他们，揭竿而起。他们底叛旗上写着他们底目标：为“旧信仰”而奋斗，争回人民底“土地与自由”。在一七七三年他更宣言，他就是沙皇彼得三世。彼得三世乃是女王加塞林二世底丈夫，是被他底妻子囚禁，而后暗杀死的。蒲加鸠夫说当时被暗杀的是替死的人，他本人则早已逃出来了。

这样的假话在现今是少有人相信的，然而在当时却很能博得多数农民底信仰。而且这时代正是冒充彼得三世的时代，到处都有人冒充彼得三世，单在一七六五年一年中间，已经有三个彼得三世被捕了。聪明的蒲加鸠夫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农民这次真正相信彼得三世尚在人间，现在要来打倒贵

族，替农民争取自由了。有一些教徒得到彼得三世尚在人间的消息，甚至替他祈祷。巴席奇尔人(Bashkirs)扬言说：“现在我们是 在一个女皇底羁绊下面，所以我们必须忍耐。然而大家都说不久那个男皇帝又要登极了，那时我们便可以大胆要求他给我一些正义与慈悲。”

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怪乎蒲加鸠夫会得着许多的追从者了。

有一次蒲加鸠夫看见眼前群集着的民众，便傲然问他们道：“你们果真认识我是彼得三世么？”

“我们果真认识。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苦于重税。自己底所有物一点也没有存留的了。”这是民众底异口同声的回答。

蒲加鸠夫便率领这些民众向专制政府底堡垒进攻。一七七三年七月他以彼得三世底名义下令解放农奴，宣言道：“从来被地主所束缚的农奴得在无赔偿的条件之下领有土地且获得自由，兵役义务从此废止，人头税及一切租税均停止征收，此外农奴并有职业、宗教等等的自由。一切设施均以自治为原则……”

于此可看见这个并非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多少“为民众谋幸福”的革命家底气概了。蒲加鸠夫志在创立一个农民帝国。他并且傲告全俄道：“凡反抗我主权，叛乱我帝国，破坏我农民者，均处以绞刑，杀无赦。”这种思想在现今看来固然幼稚，然而对于当时的那般生于忧患死于饥饿的农民却不得不算是一个大福音了。

蒲加鸠夫在一七七三年秋天已经有了二万五千兵士，这都是哥萨克人和逃避了兵役的军人，而且还有不少的逃走的农奴与农民。同年他又和奇尔基次游牧部落底酋长连络，势力愈加雄厚。

蒲加鸠夫率领大队围攻阿伦堡，不久即将它占领了。从这里又派出部队四处搜索，杀害政府官吏与地主。不久，喀山、阿斯多拉罕、里尼洛哥诺德、拍尔门等处皆被刀枪与烈火所毁坏了。各处的农民暴动相继而起，一七七三年末，两个月之间，凡阿姆尔河流域、奇尔基次平原及乌拉岑一带，农民暴动接踵而至，官吏地主被杀者甚多。

蒲加鸠夫底声势虽然这样浩大，然而最初俄国政府并不注意。例如蒲加鸠夫底队伍逼近了阿伦堡的时候，阿伦堡总督还在一个跳舞会中，有人报告他说敌人已把本城四周的要塞占领了，总督丝毫不以为意，还继续举行跳舞会。后来他明白了情势危急时，已经是太迟了。

阿伦堡一失，加塞林女王大为惊愕。当时俄国正和土耳其构衅，至此俄政府便急与土耳其议和，专门用兵来对付蒲加鸠夫。一面下了许多道“机密的”及“异常机密的”诏书，纠正各总督底错误，叫他们不要小视蒲加鸠夫底势力。

蒲加鸠夫之所以能异常顺利，一方面固由于农民忠心于他，相信他是他们底救主；一方面也全亏得政府官吏底糊涂。高级军官以饭桶居多，他们连俄国的地理形势也弄不清楚。因此在参谋部所下的攻击蒲加鸠夫的战略的命令中竟说到“某一个拉巴河”，实际上俄国并没有什么“拉巴河”。一省的总督

甚至不懂得本省底地理；大炮也不会放。于是便增加了兵士底迷信，他们说：“沙皇自己底大炮不能够打沙皇。”

蒲加鸠夫这一群乌合之众，居然震撼了全俄，甚至动摇了沙皇专制政府底基础，也不得不归功于这帮人！

后来蒲加鸠夫遇着了一个大敌：比比可夫将军。比比可夫连将蒲加鸠夫击败两次，把他驱逐回乌拉地方。蒲加鸠夫底幸运好像快终结了。然而比比可夫又突然死去，后继者席切巴托大亲王懦弱无能。于是蒲加鸠夫又得重整队伍，铸造军械，再占领喀山，直迫莫斯科。不幸中途为米雪尔孙将军所败，只得退到凡尔加河右岸。他又占领萨前斯克城，把从邻近城中逃到这里来的官吏地主三百余人全数拘囚。随后他又占领彭查，派一个农奴做总督。至此他底队伍又有二万五千多人了。革命之火点了俄国底东南部，地主大批地被杀了，俄国政府底势力在这些地方完全被摧毁了。

然而革命家底末路来了。八月二十四日在阿斯多拉罕附近遭著名猛将米雪尔孙底压迫，蒲加鸠夫竟一败涂地。他底部卒被虏者七千多人，阵亡者也在四千人以上。蒲加鸠夫仅以身免，他预备去募集新军，重整旗鼓，然而在同年（即一七七四年）九月十四的晚上为部将所卖，被捕。政府用铁笼把他送到莫斯科。

卖掉主将的托尔可波洛夫等得到了政府底二万卢布，而蒲加鸠夫竟于一七七五年一月十日惨受车裂之刑。蒲加鸠夫临刑时，丝毫没有悲哀痛楚的表示，他高叫道：“但愿人民底反抗不会从我而止，则俄罗斯终有得救之一日。”

支持了三年(1772—1774)的蒲加鸠夫底暴动就此告终了。蒲加鸠夫身殉了他所热爱的农民。曾经战败过蒲加鸠夫的比比可夫将军也宣言说蒲加鸠夫个人并不重要，不过全俄的农民底不满却是要紧的事。难道农民底不满就随蒲加鸠夫底血一同消失了么？

我们且慢慢往后面看罢。

第三章 拉狄穴夫与知识 阶级之觉醒

拉进与蒲加鸠夫都是民众之子，出身于贫家，他们所关联着的暴动也是被压迫群众的自发的反抗运动，这两次暴动的中心人物也都是来自民众中间，而知识阶级却在长梦里酣睡着。

然而拉进与蒲加鸠夫底血，以及日渐增加的农民底困苦和社会底不安，却把俄国知识阶级惊醒起来了。

最初，我们便可看见两个从贵族阶级中出来的社会改革家，洛威科夫(Nicholas Ivanovitch Novikoff)与拉狄穴夫(Alexander Nicholaievitch Radishtcheff)。

洛威科夫(1744—1818)出身贵族，曾在军队中服过短期的兵役，过后就专门从事出版杂志报章，号称为俄国新闻业之父。然而他所发行的刊物，因为主张改革，提倡废止农奴制度，并且攻击当时社会底弊害过于激烈，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他又在莫斯科开设了俄国第一个大规模的印刷所和书店，并附设有一个工人医院，供给病人医药概不收费。他并且加入一切慈善的运动。总之他对于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底目的在“人道，启明与社会的正义”，他以书籍为

宣传底最好的工具。因此，他便得罪了加塞林女王，一七九二年加塞林女王亲自下命令将他逮捕，判定了死刑。这个不近人情的判决自然会激起了一般人（尤其是洛威科夫底友人和同志们）底愤怒与抗议。加塞林女王看见众怒难犯，只得把洛威科夫底死刑减为十五年的徒刑，囚之于最可怕的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一七九六年加塞林女王逝世，洛氏便被保罗一世特赦了。

拉狄穴夫(1749—1802)底命运较洛威科夫底更坏。他也是出身贵族，幼年在家庭里跟着一个法国亡命者受教育，于一七六二年进侍从武官学校，因此得以观察加塞林女王底宫廷生活。一七六五年加塞林女王派了十二个青年到外国留学，他便是其中的一人。他在德国研究自然科学和法律，到一七七一年回国。一七九〇年他底名著《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出版了，在这本书里面他极力批评当时社会底道德，攻击政府底弊害，主张农奴解放。他不仅抨击奴隶制度底一切罪恶，而且积极地解说农奴底完全解放是必需的，并且写出了一个详细的实现农奴解放的计划书。他要求为万人的正义，一切的人（不管是属于任何阶级）都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他甚至说政府是为人民的，不是人民为政府的。

加塞林女王不仅下令销毁了这部书，而且还把此书底作者判决了死刑。她说拉狄穴夫是“比较蒲加鸠夫还要凶恶”的革命党人。后来她又把他底死刑减为十年的徒刑，流放在西伯利亚；一七九六年保罗一世即位，便将他召回。在亚历山大

一世底治下他又做了法典编纂委员中的一人。

他本想利用这个地位来实现他从前的主张，在编纂民法之际，提议废止农奴制度，承认一切阶级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不见容于委员长查瓦多夫斯基。拉氏与查氏激烈地争辩了一次以后，回到家里便服毒而死，这时是一八〇二年九月十二日。

拉氏在德国的时候，他底亲密的同学武卡科夫(Оухаков)得了不治之病，后来医生说武卡科夫只有几天的寿命了。武卡科夫叫拉狄穴夫把毒药给他，预备服毒自尽，免得受苦，拉狄穴夫不忍这样做，然而在这一天，他却在日记上写着：“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来毁掉。”他自己后来反做到了。

拉狄穴夫一死，我们又失去了一个“自由之歌者”了，(诗人普希金这样称呼他。)他底死并不是他底失败。其实，“只要社会中还有那些宁愿死而不肯与生活底污秽调和的人，人类还是有希望的。”^①

洛威科夫与拉狄穴夫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自由是不曾和他们同死的。事实上人们受压迫愈厉害，则对于自由的渴望亦愈烈。既有人举起了自由底旗帜，那么，追随者是不会缺乏的。何况处在那黑暗惨苦的，非人间的社会中，有人心的人谁肯顺世浮沉呢？所以洛威科夫与拉狄穴夫所下的种子便一天一天地发芽成长，最后圣以沙克广场底洪亮的炮声竟响起来了。我们且翻过这薄薄的一页来看后面的活剧罢！

① 这是高德曼批评俄国柴霍甫底名剧《海鸥》的话，我特别借用在此，高氏原文见她底《近代戏剧之社会的意义》。

第四章 十二月党与民主主义

一 圣以沙克广场底炮声

赫尔岑批评十二月党暴动时说得好：“圣以沙克广场的炮声惊醒了一代的青年。手执军器在圣彼得堡大街上公然地攻击沙皇政治怪物的政治暴动，实自此时始，在此时以前从没有人看出它底可能性来。在宫殿里暗杀了一个彼得（按指彼得三世），或一个保罗（指保罗一世），再换一个同样的暴君，这样的事没有人会当作神秘的，然而在这种秘密的谋杀与那在大街上对于专制政治之公然的反抗，以英雄底鲜血与苦痛所浸染着的反抗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一个共通点。”十二月党暴动底意义便在此。

二 秘密结社

在拉进与蒲加姆夫两大叛乱之流血的收场以及洛威科夫与拉狄穴夫两大改革家之悲惨的终局以外，影响于当时俄国知识阶级的，还有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法兰西大革命。

一个大国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要求人民的权利之理想，

而起了革命。竖起自由、平等、博爱之旗，把专制的君主——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把人间地狱——巴斯底铲成了平地。见着了这样的伟大事业谁能不惊心动魄！

同时伴着法兰西赛纳河畔剑戟之音而响于俄罗斯青年底耳际的，还有那比啜指裂肤的北海寒风更要寒冷的俄国农民底牧谣歌曲。这是诉饥渴的哀调，伸悲愤的怨曲，似乎多年来难堪的苦痛都集中在这里面了。那些多情多感的青年听到了这样的歌曲，怎么能不感奋兴起呢？

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1801—1825)，一个新的强烈的政治运动发展了起来，一般知识阶级以及上级军人受了那法国革命所产生于欧洲的政治理想底影响，也就渐渐地觉醒起来。从这时候起，我们便看不见什么冒充沙皇的事，凡不满意现状想竖起叛旗的人，也不必再假借沙皇底名义，如蒲加鸠夫冒充彼得三世那样。现在的叛乱者是要攻击沙皇本身，打倒他底贵族政治，甚至要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一个自由联邦的共和国。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尤其普遍。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1813—1814)留居巴黎的俄国军人受了自由思想底熏陶，看见了法国大革命底遗迹，又熟习了西欧的文明与教化；他们回到俄国后，俄国的社会状况便使得他们生出了不满与怨恨来。一方面，他们看见了专制独断的政府，他方面，他们又看见了被压迫的、贫穷惨苦的民众。于是怨恨之声遍于全军队中，上自将军下至兵士，无不心怀不满。

“我们为国家流了血，我们现在又被迫来替贵族做事了。我们打倒了一个外国的暴君救了祖国，然而我们又受着我们

自己底政府和贵族底暴政之压迫了。”这是军队里的怨言。历史家屠格涅夫说得对：“自俄国军队从西方归来后，自由思想便很快地传布于俄国了。”

这样的情形，那般从外国归来的青年军官是尤其不能忍受下去的。他们深染着人道的思想：他们中有许多人异常憎恨农奴制度，他们希望得着宪法上的保证；而其中有几个如派斯台尔(P. I. Pestel)、芮奈叶夫(K. F. Releieff，著名诗人)等，甚至反对君主政体，主张回复到旧俄罗斯底共和的联邦主义。抱着这样的见解，他们便建立了一些秘密结社。

最初成立的秘密结社是在德国组织的“修德同盟”，其性质与“修养团体”(Tugendbund)类似，修养个人底品行，终身以反抗压迫和不义为务。抱有进步思想的俄国军人，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在一八一七年，在俄国第一个秘密结社便成立了，名称是“祖国忠良之子结社”，后来又改称为“公共福利同盟”。派斯台尔、穆拉维约夫弟兄(A. Mouraviev与N. Mouraviev)、阿波斯脱弟兄(M. and S. Mouraviov-Apostol)、易楚金(Ikonehkin)、格林加(Glinka)、陆林(Lunin)、除伯次奎亲王(Prince Troubetzkoy)等皆是这个结社底社员。他们最初所讨论的全是关于农奴解放的问题，他们预备说服贵族，要贵族去劝沙皇实现这个计划。后来他们明白那般反动的贵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又采用君主立宪国的政策。到了一八一八年这个结社便自行解散了。

一个新的秘密结社又成立起来，它底宗旨是：(一)废除奴隶制度；(二)一切国民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三)国事公开，

(四)取消酒精专卖；(五)改善防卫国家者(指兵士)底命运等等，总之，目的不过在“一般的福利”罢了。这个团体共有社员五十六人，然而也没有什么行动的决心，而且社员底意见也不一致。一八二一年这个团体又分裂为“南部联盟”与“北部联盟”。“北部联盟”还赞成君主立宪，而“南部联盟”则以派斯台尔为领袖，主张民主共和。因为听说政府方面已经知道这个团体底存在，于是在名义上这个团体便宣告自行解散了，而实际上，它底活动仍是继续下去的。“北部联盟”以圣彼得堡为根据地，“南部联盟”底中心则在杜尔奈(Tulchin)第二队军队之驻扎地。“北部联盟”底重要人物为除伯次奎亲王(蒲烈布拉银斯基联队大队长)、穆拉维约夫(参谋部卫队长)、阿波伦斯基亲王(Prince E. Obolensky, 芬兰联队官佐)及芮奈叶夫，这一派人主张起初应该专门从事于宣传的工作，而“南部联盟”中派斯台尔等人则极力主张出以决断的积极的行动，

一八二四年派斯台尔到圣彼得堡，宣言他不满意同伴们底工作。他极力主张采用决断的方法如下：将皇族完全杀害，强迫元老院及神圣宗教议会承认秘密结社为临时政府，由此逐渐建立新的秩序。这个主张极为“北部联盟”诸人所不满，穆拉维约夫反对最烈。他们不赞杀害皇族，除伯次奎主张将沙皇送到外国，芮奈叶夫则主张将沙皇囚于席吕塞尔堡。

虽然南北两派底意见不能一致，然而大部分社员渐渐都同意于杀害皇族的主张。最后连芮奈叶夫也承认杀害皇族是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法。

一八二四年里尼洛哥诺德骑兵联队队长雅苦波维奇(A.

Jakubovitch)加入“北部联盟”，算给这团体加了一副兴奋剂，他说他已经准备去暗杀沙皇，他又申说这是如何地有利于俄国，芮余叶人诸人虽已不反对杀害皇族的主张，但听说有人就要去暗杀沙皇，倒觉得为时过早了。他们极力劝阻雅苦波维奇，雅氏后来答应不做这件事。

于此可见他们还没有行动的决心，然而“南部联盟”的另一个社员阿波斯脱却不能忍耐，想立刻就举起革命之旗。他知道不久沙皇要来检阅第三队军团，他决定乘此机会杀死沙皇，立刻发出两道宣言，一告军队，一告国民，战斗便从此开始。这是“南部联盟”的工作。同时“北部联盟”便占领冬宫，逮捕皇族，把他们送到外国，一面宣告临时政府成立。这是阿波斯脱底见解，他并且派人到圣彼得堡将这个计划告诉“北部联盟”诸人。然而不管他个人是如何热心，这两个联盟底社员还是迟疑不定。

到了一八二五年三月，许多小的秘密结社都联合在南、北两大联盟之下，同时两个重要的团体“波兰爱国者结社”与“斯拉夫人联盟”也和他们联合起来，因此势力就愈见雄厚。

行动的日子一天逼近一天，然而革命党人仍没有充分的准备。究竟在什么时候暴风雨才会来呢？这是谁也不能断定的。但是雷声响了。这就是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底暴死。

三 两个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一死，便生出了皇位继承问题。亚历山大一世并无子嗣，他有三个兄弟：君士旦丁大公、尼古拉亲王、密海尔亲王。君士旦丁大公五十九岁，其余两个较君士旦丁约小二十岁光景。君士旦丁很早就宣言过，他甘愿放弃皇位继承权；而且他在一八二〇年离弃了他底元配，另和一个波兰女子结婚，这是和他底地位不相合的。因此他曾屡次向尼古拉及密海尔宣言，他决不做俄国皇帝。他并且在一八二二年正月致书亚历山大一世说他不愿做皇帝，因为“我没有做君主的天才、本领和能力”。在这封信发出的十九天以后，亚历山大一世回答他说，他底退让被承认了。然而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

亚历山大一世死在达干诺格，这个消息传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亲王便最先宣誓承认君士旦丁为新皇。君士旦丁大公这时是在波兰华沙。这个人现在倒有点奇怪了，据说他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逝世消息后，曾经过一个整夜的思索与讨论，然而他还不能决定到底做皇帝好呢，还是不做好！他底回答也是含糊的。

实则奸雄尼古拉一世早已准备即位了，在表面上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愿让君士旦丁做皇帝，而实际上他已下了极大的决心，而且已在暗中料理国事了。

然而在一般人民看来，君士旦丁既不来，尼古拉又不出

面，俄国底皇帝到底是谁呢？人心底惊惶自不必说。人们在街中遇着，总要彼此相问道：“明天到底怎样呢？”在这两个新皇底暗斗中，人民知道大祸是要临头了。

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革命党人自然不肯放过，于是十二月党暴动便发生了。

四 暴风雨底前夕

实在说来，革命党人底准备在这时候还差得很远，然而时机既到，他们大有不得不发动之势。芮奈叶夫家成了会议所，他们底忙迫自不消说。

就在十二月十二那一天，尼古拉亲王写信与狄比齐将军说：“后天我将会做沙皇——不然我便会死”的时候，“北部联盟”底领袖除伯次奎还不能决定如何行动。芮奈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告诉他说，他们已被一个青年军官罗斯多切夫所出卖，因此只有立刻发动的一条路可走了。芮奈叶夫说：“我们一定失败了，那么让我们手执武器而死。”

“要干就是现在，不然就永不要干了。”芮奈叶夫底话是不错的。实在当时一般人多不满意尼古拉，有些人说尼古拉强迫君士旦丁退让。雅苦波维奇明白宣言他不参加尼古拉底宣誓礼，其他拒绝参加宣誓礼的人也不少。现在是时机了。

固然成败是不可必的，然而芮奈叶夫说得好：“我坚决地相信我们会失败，但是暴动却是必要的。一个革命党底战略只有这几个字：激起扰乱；因此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底失败

也会给一个教训与他人。”

这种铁石般的意志与烈火般的热辩，就把暴动底事定夺了。于是他们又讨论这次反对尼古拉的暴动是否要抄以前的宫廷革命底旧文章，在黑夜里举行呢，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大光明地去做呢。最后的决定是采用俄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新方法：在人民的面前公开暴动；要得着人民底同情，至少也要使他们觉得可以相信得过。当时并举出除伯次奎亲王为革命底领袖。

最后的一次会议是在十二月十三晚上在芮奈叶夫家中举行的。诗人阿多屋斯基亲王 (Prince Odоеvsky) 在和他底朋友们告别的时候，他拥抱着他们，热诚地叫道：“我们要去死了，然而这是何等光荣的死啊！”

五 一篇未曾发表的宣言

在除伯次奎底文件中，后来有人寻出了一篇宣言书草案，如果十二月党暴动成功了，这篇宣言便会由元老院公布出来，其要点如下：

(一) 废除旧政府；

(二) 建立临时政府，然后由人民选出宪法议会，决定新政府底形式；

(三) 出版自由，废止检察制度；

(四) 意志自由，一切信仰平等；

(五) 废除农奴制度；

(六)在法律之前各阶级一律平等。废止军事法庭及一切司法上的委员制。所有未决案件移交民事法庭办理；

(七)所有公民都有任意选择职业的权利，不为阶级及其他障碍所限制；

(八)废止人头税；

(九)取消一切专卖权；

(十)废止军事殖民地，废止现行征兵办法；

(十一)减少兵士服军役的年限，固定军役年限，各阶级皆有服兵役之义务；

(十二)凡兵士在军中服役十五年者，即许其自由离去；

(十三)承认自治区、县、省的行政权；

(十四)司法公开；

(十五)对于刑事及民事案件均采行陪审制度。

十二月党底纲领在此，这就是他们暴动底目标。这种纲领在今日也许是极其平庸，并不能解放民众。不过在当时的俄国，这个纲领却不得不算是很大胆，很进步的了。那五个高贵的领袖为了它，牺牲了性命也是值得的呢！

六 十二月十四日底悲劇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政府下令各军队都应参预新皇尼古拉即位的宣誓礼。革命党人中的罗斯多屋斯基亲王(Prince Shtchepkin Rostovsky 莫斯科联队卫队长)，柏斯吐雪夫(Bestjoushev)和其他几个军官在十三晚上就煽动了一部分

莫斯科联队及海军等等，叫他们集合在元老院前的广场，拒绝参加尼古拉宣誓礼。这两个人算是先发出暴动底信号。柏斯吐雪夫本是一队步兵底指挥官，他便向兵上演说，君士旦丁大公已起程赴首都，然而在中途被阻止了。为的是尼古拉要做沙皇，实则尼古拉毫无做沙皇的权利，兵士于是高呼：“我们不要尼古拉！君士旦丁大公万岁！”

联队长弗烈得利男爵及旅团长少将，大队长克福清斯基想来镇抚军队，洛斯多屋斯基就把联队长及旅团长杀害，大队长看见形势不佳就连忙逃走，于是洛斯多屋斯基及柏斯吐雪夫二人便率队向元老院广场出发，并且不久雅苦波维奇又到了。革命党的军队开到元老院广场后，即排开成一列，静待总指挥官除伯次奎底到来。

谁知除伯次奎临时忽然胆怯，不敢到场指挥，反在一个亲戚家里躲藏起来。诗人芮奈叶夫带病到场，充当临时总指挥官，然而过后实在支持不住便回家去了。不久阿波伦斯基亲王及其队伍便开到了。

圣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到这一天的早晨还在他底情妇舞女泰奈雪瓦家里贪欢，听见了军队不稳的消息，便到元老院前广场来抚慰叛军。阿波伦斯基要求他离开，他不听，阿波伦斯基便砍了他一刀，同时加哈夫斯基（Kakhovsky）一枪就把这个彼得堡总督打死了。于是“君士旦丁万岁”的呼声遍于全广场。

尼古拉一世得到彼得堡总督被害的消息，即派阿洛夫将军所指挥的近卫马队去剿灭叛军，然而到了广场，马队并不肯

开枪杀他们底同伴。

忽然尼古拉一世带了一队近卫军出现了，然而他却不敢走近叛军底面前。实在，加哈屋斯基自己在后来也说过他已准备向尼古拉开枪了。这时候，尼古拉不死，也算是微幸！

同时潘洛夫率领了七个中队步兵到冬宫去逮捕皇族，然而可惜迟到了几分钟，一队忠于沙皇的工兵联队已先在冬宫前布防了。尼古拉后来在他底回忆录中说：“要是这个工兵联队来迟了几分钟，革命党人便会占领了冬宫，那么皇族就会为反叛者所害了。”

元老院前广场上的叛军因为没有总指挥官（而且连雅苦波维奇也装头痛跑开了），不知怎么做才好，所以没有什么动作，只是排在那里，空叫“君士旦丁万岁！”

政府底军队渐次开到，叛乱者仍空叫“君士旦丁万岁！”

不久彼得堡总主教又捧起十字架出现了，他想来劝阻叛军，说什么“上帝给我做见证，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理，而且我以神圣教会领袖底资格请你们宣誓忠于我们底沙皇”。叛军底回答是：“你是一个叛贼……滚回你底教会去……。”

尼古拉便下了剿灭叛军的决心了。他派苏科查奈将军来下哀的美教书，叛军回答道：“滚回去，另派一个较诚实的人来。”

这一次尼古拉派来的，不再是什么主教或将军，而是炮队底大炮了。第一炮射中元老院，杀死了几个坐在屋顶上的小百姓。叛军立刻回答道：“君士旦丁万岁！”“我们要宪法！”他们想用枪刺来攻击炮队。然而排炮齐发，登时鲜血染红了元

老院广场上的白雪。

叛军失败了，便大队退到涅瓦河底冰上。柏斯吐雪夫预备重整队伍去攻击彼得保罗垒，然而大炮又放了，叛军正预备作最后的一次决战，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我们被水淹了！”原来涅瓦河上的冰被炮弹击破了，于是叛军一律落进了水里。这些俄国自由底先驱者，“十二月党人”底尸体在第二年春天冰块溶化的时候，又流到波罗的海里面。

为要求农奴解放，为要求改善国民底境遇的人底结局便是这样！这天晚上尼古拉一世便成为君临全俄的沙皇了。

当第一炮开始射击以后，许多旁观的闲人突然遇着这样的意外，便乱向房屋奔跑，然而广场底各道门都关闭了，在这种惊恐之中被践踏死的人不计其数。尼古拉下令限于晚间将尸体完全移开。死者随便搬去，伤重尚未死者便投掷在涅瓦河里。人民底生命不值一钱，因为这天晚上尼古拉做了君临全俄的沙皇了。

在圣彼得堡流血惨剧发生以前，“南部联盟”底主要人物派斯台尔大队长，和阿波斯脱弟兄及其他几个军官已被捕了。“斯拉夫联盟”底军事领袖便率队劫狱，但只把阿波斯脱弟兄救了出来，而派斯台尔则已先被移到他处去了。阿波斯脱等得着其他暴动的军队底帮助，就占领了瓦西科夫城，又与其他友军联合，向政府军队进逼。在切尔科夫附近一次发生了决战，政府军队大胜，“十二月党”革命就从此告终了。

七 革命党人底审判

这天晚上俄国政府又举行大搜索，自芮奈叶夫以下的许多叛乱者都被逮捕了。

经过一次最高法院底审判，芮奈叶夫、派斯台尔、阿波斯脱、柏斯吐雪夫、加哈屋斯基五个领袖被判处死刑，其余一百一十六人中，三十一人也得着绞刑底判决，十七人得着终身苦役底判决，剩下的人各处徒刑及流放罪不等。

在法庭上芮奈叶夫慷慨宣言：“我本可以阻止这个密谋，然而我反来尽力促成它底实现。我是首犯。如果这几个人中间有人应得死刑，那么这个人便是我。我对于俄国同胞的热爱也许会使我走错路，然而我决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更不是为个人的野心而行的。因此我将勇敢无畏地就死。”

派斯台尔说：“我底最大错误也许是在未下种前就想收获。”

尼基达·穆拉维约夫说：“我以前所草的宪法草案是为君主国用的，但自我被捕以来，我仔细思索了一番，因此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已经变成一个民主党人了。”

陆林说：“我们底秘密结社决不想谋杀沙皇；它底目的是更要高尚一点。然而你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谋杀沙皇的思想在俄国并不算是陈旧的了；我们还找得出最近的例子。”陆林指保罗一世之谋杀事件，因为裁判官里面有两个人便参预过这件事情。

八 革命家底最后

最高法庭底判决又经尼古拉一世修改，三十一人底绞刑减轻为终身苦役，其余八十五人底罪名也各各减轻了。至于五个领袖底死罪是无可饶恕的。不过尼古拉一世不愿看见他们流血。他便命令法庭想个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于是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二到十三的那晚上，这五个高贵的人便被绞死了。

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尼基达之弟)在致他底妻子的一封信里描写他底五个同志底最后道：“黑夜是利于作恶的。我们被引到在堡垒前面一个露天坝子里，绞刑台已立好了。我们中间穿着军服的都被人把军服剥了下来；军服被投在火里，我们底军刀也被折断。我们成了人们所共弃，上帝所诅咒的恶人了。当我们被带回到囚室的时候我们底五个同伴已经上了绞刑台。我们底不幸的，高贵的同伴中有两个，芮奈叶夫与阿波斯脱从绞刑台上跌了下来，跌断了手足，然后才被绞死。”

五个人就这样地死去了，然而也曾有不少的人拿眼泪来埋葬他们。一个中尉得着命令去引这五个人上绞刑台，他拒绝了。他指着挂在胸前的圣乔治十字架，一面说：“我已经光荣地尽过我底职务了，现在在我底晚年我不愿做这五个我所诚心敬爱的人底刽子手。”近卫骑兵大队长楚波夫也拒绝率领他底联队去参预死刑底执行。他说：“他们都是我底同伴，我不去。”可见在一般人战栗地匍匐在新统治者面前的时候，还

有些人敢「表白他们自己底良心，权力果然能压倒一切么？不！

九 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派斯台尔

在这五个高贵的死者中，有两个尤其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派斯台尔与芮奈叶夫。这两个人是全运动底中心，全运动底灵魂。一个是“南部联盟”底领袖，一个是“北部联盟”底主谋者。

派斯台尔一七九〇年生于圣彼得堡，祖先为德国人，幼年即受教育于德国德烈斯敦地方；后来从军，从近卫师团团副一直升到维亚次基步兵联队大队长。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军队组织者。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沙皇政治，他还主张采用美国式的宪法，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以为立宪政体乃是专制政体底假面具。他被捕后曾致书法官说：

我是希腊黄金时代之憧憬者。希腊黄金时代就是希腊共和国时代。而且我又拿罗马底光辉的共和国时代来和它底悲惨的帝制时代两相比较，我便以为在俄国那个依共和思想而立的洛哥诺德朝代算是俄国人民底幸福时代。至于君主立宪政治乃是对于俄国的一种欺骗政策，如英法两国的宪法皆是。而我们现代的主要的倾向乃是民众与各种门第上或财富上的贵族间的斗争。我国的贵

族也和在英国的一样保持着君主以上的权力，贵族实是国宝幸福底最大障碍物。要除去此种障碍物非采行共和制度不可。

他主张解放农奴，而且农奴解放后土地应成为公共的财产，然而一半土地也可归农民私有。

他主张保护工人，他说，在现今富人们可不劳动而生存，然而贫民却不得不靠劳动而生活，因此他们只得顺受一切，这是不对的，“政府必须保护他们，来抵抗有钱人底专横的勒索，而且必须记着那些不幸的贫民遇着疾病或衰老的时候，便不能作工，甚至连微小的生活费也得不到。”

总之他所最注意的就是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必须先解决，应该解放农奴，把土地分给农民，到那时候革命才能完成。”这样的革命，“至少要十年”才能够完成。因为“宣布一个共和国底成功固然容易，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变更而已”。

他底意见散见于他底《俄罗斯的真理》和其他著作中。要之，他底主张缺点甚多，有时他甚至不能完全脱掉专制思想底影响，然而这也不能怪他。赫尔岑说得好：“社会问题在当时还不曾引起人们底注意，被人视为‘疯子与野人’的巴布夫已早被人忘掉了。圣西门虽然写好了他底著作，但是没有许多人读它们。福立叶也被人冷淡，而奥文底论文，爱读者也不多。甚至当时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如公士当(B. Constant)、古利叶(P. L. Courier)之类也会愤愤然不承认派斯台尔底意见呢！……”实在派斯台尔受巴布夫、圣西门、福立叶底影响

颇深，他多少同情于社会主义，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倒也不是过誉的话！

一〇 十二月党人中的席勒——诗人芮奈叶夫

赫尔岑拿名剧《威廉退尔》底著者德国诗人席勒来比芮奈叶夫，称芮氏为十二月党中的席勒，这是不错的。

芮奈叶夫生于一七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幼年受过完备的教育，一八一四及一五两年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曾两次从军到法国，和约签字后便回到彼得堡，他底最初创作乃是歌咏俄国历史上英雄的一些小曲。在这些小曲里，他以热烈的语调叙述他对于俄国的眷爱，对于自由的渴慕，因此不见容于检察员，这些小曲只能辗转抄录，秘密传诵，却也流传甚广。他的名著是长诗《瓦拉洛屋斯基》(Voinatovsky)曾得到他的友人诗人普希金底赞美。这诗叙述小俄罗斯志士瓦拉洛屋斯基为同胞争自由的故事。克鲁泡特金批评它说：“两三代的人读过了这首诗，而且它还要以同样的对于自由的爱和对于压迫的恨鼓舞着每一代的新人。”

一一 十二月党暴动底评价

十二月党暴动，严格地说来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运动”，更适当一点说，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知识者起来为国民争自由的运动而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低它底

意义。

兰波(Rimbaud)在他底《俄国史》里面说得好：“十二月党人给我们指示出来在俄国也有能够为自由而死的人们。虽然十二月党底密谋不曾成功，然而它底道德的影响却是异常之大。”《俄国底英雄与女杰》底著者蒲列路克说：“俄国社会中最优秀最有势力的分子得着军队底帮助来公开地，决绝地要求一部宪法，和贵族政治对面血战：在俄国历史上这算是第一次。”

然而不管十二月党人底错误，不管他们底失败，他们这次暴动对于后代的影响却是异常深刻的。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底理论和宣传的缘故，毋宁说是因为他们底高贵的牺牲精神，和他们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甚至在沙皇底面前，在绞刑台上的英勇气概，以及在冰天雪地中，在矿坑里的那种坚忍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不能忘记的。他们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自由底空气通进屋子里来，透入人民底心灵里，把他们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起来。

从此以后，一层缚带从许多人的眼睛上脱落下来了。十二月党人从绞刑架底高处，从矿坑底深处唤醒了俄罗斯底灵魂。人们底血可以由暴君尽量地吸吮，然而崇高的理想却是永远不能杀灭的。十二月党人底血泪灌溉了自由底种子，而在后代的青年中这种子就发芽，开花以至于结果“圣以沙克底炮声惊醒了一代的青年”，赫尔岑底这句话果然预报道沙皇底末日之降临了。

第五章 赫尔岑与西欧派

一 虚无主义底先驱

在争自由的殉道者底血泊中，尼古拉一世做了统治全俄的沙皇，从此一个野蛮的反动与专制就开始了。俄罗斯在这个“铁君”底治下呻吟了三十年。而全欧洲的自由之生机也不免受着他底摧残。尼古拉一世一方面尽力压制国内的人民，一方面又助长国外的反动。匈牙利底独立底战争之被摧残，他也出过大力。

贵族政治得胜了，沙皇得胜了，在尼古拉一世底高压的政治之下，一切自由底希望都完全消失了。一八三六年诗人卡代夫(Tchadaieff)在他底《哲学书翰》中曾写道：“俄罗斯底过去是空虚的；它底现在是难堪的；它底将来是无望的。”在一八五一年批评家柏林斯基(Byelinsky)逝世的时候，历史家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作文悼他说，“柏林斯基得以早死，还是多末幸运的事！那般有力量的人都陷入在绝望里，对于他们周围的事情全然沉默，不作一声了。啊，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愁苦的世界化为灰烬啊！到处都听得见怨恨之声，然而力量在哪里？这生存底重担，我们实在担负不起了！”

从上面的两段话里我们就可知道，尼古拉一世在位的三十年中的社会情形是何等地黑暗惨苦了。

总之尼古拉一世时代之一般的社会状态，可以拿三句话来形容无遗：对于人权之极端的压迫，官僚主义之横暴，内外政策中之投机主义。然而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中的人民呢？

人民底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书籍之出版须先经过严厉的检阅。普希金、莱芒托夫、果戈理等人底著作都被禁止了。以文字得祸的人在在皆是。青年波尔查夫(Polezhaeff)以一首描写学生生活之讽刺诗而得重罪，遂致绝望而死。拿这一个例子便可以想象当时文字狱之厉害了。

一八四九年又有彼得拉雪夫斯基(Petrashovsky)案件发生。彼得拉雪夫斯基结合了一般年岁相差不远的青年组织一个团体，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社会问题。其中最常讨论的问题是农奴解放与司法改革之问题。他们对于福立叶底乌托邦社会主义，感到非常的共鸣。他们是赞成用和平的方法来使社会主义实现于世界的。他们当时并没有革命的密谋。

然而这个和平的团体也不见容于尼古拉一世，于是这团体底会员三十三人一起被捕了，他们底罪名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诵读柏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函，煽动一般的革命精神。”

尼古拉一世下令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讯这个案件。委员长在审讯时，控告被告等“翻译利德曼关于社会主义之著作，以便不懂德文的人能够读此书；输入而且在会中诵读昆西太朗、福立叶、蒲鲁东、圣西门、卡白等人底著作。”为了这

个罪名，法庭便判决被告中七个人底死刑，二十一个人底徒刑，或苦役，其余五人无罪释放。这判决书里面说被告“想铲除一切人间的与神的法律，破坏社会底基础”。判决书送到尼古拉一世那里，那个暴君居然把七个被告底死刑减轻为流放罪。他在判决书上批：“死刑判决书应该在军队面前向罪犯宣读，然后，在执行死刑前的应有手续预备完善之后，才宣告皇帝恩放了他们，将他们底死罪减为褫夺公民权，而且按照罪之轻重分别流放在矿坑中作苦役，或囚于堡垒内，或编入军队中。”以人命为儿戏的专制君主底残暴于此可见了。这样地徘徊于生死关头间的那七个人底苦痛实非人的感情所能了解的。这七个人中，有一个青年就是后来以名著《罪与罚》轰动了全世界的一代文豪杜思退益夫斯基。这种惨刑在他底一生中留了一个深的影响。

彼得拉雪夫斯基事件算是在俄国法庭上第一次因宣传运动而被定罪的政治案件，也就是黑暗中的一线微光。这就是说在这种严厉专制之时期中，还有敢于来宣传真理的人。从这件事看来，已可知道十二月党人所下的种子在发芽了。

自由种子底生长是很快的。不久果然一代的新青年便露面了。在俄国的社会中又现出了新的力量，要求着一个自由与进步底新生活。在民众陷于困苦的深渊之中，俄国底一切生机正被摧残的时候，一群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青年居然觉醒起来，公然发表攻击旧势力的言论，要求人民底自由，要求社会底改革。于是莫斯科便成了改革的元神底中心，而黑暗的俄罗斯也有了一线光明了。

在觉醒了的青年中间最卓越的人物而且先后成了俄国青年运动之指导者的有亡命者赫尔岑、阿加列夫、巴枯宁、拉甫洛夫、流放者巧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早死的都布若留波夫、毕沙列夫等；这些人中有的是十二月党人与虚无党人中间之连环，有的是虚无党人之先驱，有的甚至是虚无党人运动之指导者，他们对于当时青年之影响都是很大的。为了便于了解后来虚无党人底运动起见，我在这本论述俄国社会运动的书中也不得不留了一些篇页，奉献与他们。在读了十二月党人底如火如荼的暴动之后再翻开这一些篇页，也可以松一松读者底紧张了的神经。现在我且慢慢地翻开这些篇页，一一展示于读者底眼帘前罢！

二 赫 尔 岑

亚历山大·赫尔岑 (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 是一个莫斯科贵族底私生儿。他底母亲是德国人，“赫尔岑”是他底父亲给他取的姓，这是从德文底“心”(Herz)字来的，他底父亲说：“因为他是我的底心之爱儿。”他幼年受过完备的教育，他底家庭教师有法人、德人及俄人，都抱有自由思想。他并且读过他父亲所藏的十八世纪德、法两国哲学家底著作，受影响甚大。他底俄国教师又曾把十二月党殉道者芮奈叶夫底诗秘密抄给他读；他底法国教师是一个亡命者，也时常向他谈法国革命底故事。十八岁时他就作文颂扬德国诗人席勒，在这篇论文里他并且表示出他自己对于自由之热望，并且愿意

过一种为人类谋幸福而受苦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同时他又进莫斯科大学。在大学中他便加入同学所组织的研究德国哲学体系而且应用它们来讨论实际的社会问题的团体。批评家柏林斯基、诗人阿加列夫、以及革命家巴枯宁都是这个团体底会员。

十二月党暴动给与少年赫尔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后来在他底《回忆录》中追述他十五岁时的情景道：“这次暴动与领袖底审判，以及莫斯科城内的恐怖等记载给了我以一个深的印象：一个渐次变成了我底道德的生存之中心的新世界便显示于我底眼前了。我不知道这是怎样来的，但是虽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或是含糊地了解一点）它底意义，我总觉得我不是站在枪弹，胜利，监狱，铁链这一边的。派斯台尔及其同伴底处刑打碎了我底心灵中的孩子般的梦境。”在这种影响之下，他和他底表弟阿加列夫，这两个小孩便宣誓要替这般的自由底先驱者复仇了。

一八三三年赫尔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这时候在西欧发生的革命风潮激动了他们莫斯科大学的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学生常常在秘密集会中高唱革命歌。有一次在集会中有些学生公然地捣毁了尼古拉一世底半身像，惊动了警察，于是许多学生被捕了，一个政治的审判又开始了。一八三四年阿加列夫与赫尔岑先后被捕，在他们底家里搜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圣西门底著作。赫尔岑与阿加列夫虽然辩明与毁像事件无关，然而圣西门底著作已足以用来作定罪的证据了。

判决底结果是：一部份人得着囚禁在席吕塞尔堡的无期

徒刑，阿加列夫被流放到彭查，赫尔岑被流放到拍尔门。后来赫尔岑又被移到乌拉岭斜坡上的一个小城凡特加，在那里他整整地度过了六年的苦痛生活。

一八四〇年赫尔岑得着许可回到了莫斯科。那时俄国青年正患着黑格尔热狂，完全醉心于黑格尔底玄学的抽象。当时斯坦克微奇(1813—1840)一派青年黑格尔信徒迷信黑格尔底名言“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因此演绎出奇怪的推论，说专制政治也是“合理的”。赫尔岑自然不能相信这样的话，然而他却不得不把黑格尔底学说研究一番，其结果他仍是法国大革命原理底赞美者。

然而在这年赫尔岑又被流放到了洛哥诺德。一八四二年他才得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他便离开了俄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 西欧的亡命生活

赫尔岑在意大利停留了一些时候，便到了巴黎。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前夕。赫尔岑眼见着这次活剧底开始，又看见了以后的失败以及六月底可怕的日子中巴黎无产阶级底流血。他和小说家屠格涅夫居住的那条街也被军警围住了。军警是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因此他们只能在屋子里咆哮着，听那排枪底连珠般的响声，知道胜利的资产阶级在屠杀他们所捕获的暴动的工人。看见这种伤心惨目的悲剧以及继之而起的欧洲底反动，便使得赫尔岑对于西欧底文明深深地感到失

望了。他写道：“凡是见着这样的瞬间的人，在十年以内他底憎恶是不能消灭的，他底复仇心一生也不能消灭。”

他在巴黎结识了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人物，他底住所成了各国自由思想家和革命的亡命者之中心。蒲鲁东和屠格涅夫都是他底亲密的友人，总之他底影响在当时确是很大的。一个奥国的新闻记者拉席(G. Rasch)描写当时的情形道：

我认识赫尔岑，是在诗人黑尔威格家里，正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他是一个面目秀雅，举止愉快，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三十五岁光景的人。他那时有很大的家产。他底家屋对于各国的亡命者都是开放的，在那里我们可以遇到德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等等。每天吃饭时总有二十多个人。要到赫尔岑家里，并不需要什么人底推荐或介绍。他花了不少的钱帮助亡命者。……著名德国著作家加朴(F. Kapp)亡命到巴黎来时无法生活。赫尔岑知道这种情形，但又不便直接送钱给加朴，只好说请加朴做他底儿子底教师，加朴答应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他底儿子已经有了教师。这类的事情是很多的！

四 赫尔岑与蒲鲁东

蒲鲁东对于赫尔岑的影响很大，赫尔岑自己说：“蒲鲁东对于我底智的发达有很大的帮助。”他又极爱读蒲鲁东底著

作，他说：“读蒲鲁东底著作和读黑格儿底著作一样，启发人底特别的能力，磨练人底武器，而且只把方法，而不把结果供给人。”

蒲鲁东当时正是国民议会底议员，一个革命报纸《人民代表》底主笔，这份报后来改名为《人民》。一八四九年“这个顽强的力士”（赫尔岑称蒲鲁东）从病床起来，看见当时情势严重，路易·拿破仑怀着准备政变的野心，他便公然猛烈地攻击那个刚得到五百万选举票做总统的人。他底文章虽为赫尔岑所赞美，然而蒲鲁东竟因此获罪。一八四九年蒲氏被判处三年徒刑，罚款一万法郎。

蒲鲁东在囚室里又办了一个《民声报》，然而这个报出版，应缴纳二万四千法郎的保证金给官厅，这笔款子全是赫尔岑一个人付出的。蒲鲁东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赫尔岑的信中曾说：“我们底观念是相合的，只有推论不同罢了；至于外国事件底批评，我们完全让你来做。你我都是同一个思想底宣传者。你不久便会知道我们在一般的讨论中的意见，你一定会赞同的……”赫尔岑答覆道：“……我很高兴地知道旧世界快要崩坏了，而且相信我们底使命就是宣告它底迅速的终局。你底同国人并不具有同样的观念。我只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你。你们法国的革命家是保守派。他们是基督教徒，然而自己又不明白。他们是保皇党，却要来建立共和国。只有你一个人把革命与否定之问题提高到一个科学水平线上，你又是第一个人来告诉法国人说，一个内部朽坏了的建筑是无法挽救的，而且是值不得挽救的；就是它底自由与革命

之概念也是充满了保守主义与反动。实际上政治的共和党只是基左、巴洛等人所唱的宪法的调子底变形而已。有了这个见解，我们便应该分析欧洲的近事，不仅攻击我们敌人底队伍中的反动，天主教，与君政主义，而且还要攻击我们自己底阵营中的反动，天主教与君政主义。我们必须把民主党与执政者间存在的那种相互的保证揭穿。我们既然不怕攻击胜利者，那么我们也不必因虚伪的温情而怕去攻击失败者。我深信如果共和国底异教裁判所不杀死我们底报纸，它便会成为欧洲底最好的报纸的。……”

蒲鲁东底回信中又说：“你关于所谓共和党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也以为那般政治的经济学家或哲学的历史家所说的，不可测的变化底和平的、循环的前进，对于革命不再是可能的了；我们必须大大地跳一下才行。”

这报纸得着意外的成功。赫尔岑说得好，蒲鲁东底“论文富于新意，富于热情，富于刺激性”。有一次批评路易·拿破仑时，曾有这样的话：“总统先生，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呢？——男人，女人，禽兽，鱼？”另一篇论文《皇帝万岁！》又是一篇对拿破仑的极厉害的冷嘲热骂。——一八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民声报》便被封禁了，同年六月赫尔岑也被驱逐出法国。

赫尔岑离开法国先到瑞士，过后就住在尼斯（尼斯当时还不是法国底领土）。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赫尔岑底母亲与儿子航海遇险，淹死在海里。关于这件事他写了一篇极其动人的文章，屠格涅夫说“这是用血和泪写的。”蒲鲁东听见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便写

信给他道：“难道命运竟从那方面来打击我们？我是不能受这个可怖的意外底打击的。我爱你。在我这个被许多人称为铁石一般的心中，我还深深地留着你底影像。”为什么蒲鲁东要这样说呢？我们看赫尔岑底回忆录就可知道了：

我听了不少关于蒲鲁东底粗鲁和狭量的话；我却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情形。一般温良的人所说的他底严厉乃是战士底紧张肌肉。他底蹙着的额正表示出他底精神在猛烈地工作；他在愤怒的时候，又使我忆起了一个盛怒的路得或克林威尔在讥笑他底反对者了。他知道我了解他，而且又知道了解他的人是如此之少，因此他也很宝贵着我底了解。他又知道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五 活动与死亡

赫尔岑在一八三二年秋定居伦敦。这年十一月路易·拿破仑做了皇帝，法国又变成君主国了。赫尔岑对于西欧文明深感到失望，他很想回俄国去。然而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比西欧更坏，结果他还是决定留在英国。

他在伦敦设了一个俄文印刷所，出版了《北辰》杂志，后来在一八五七年又改出《钟》。这两份杂志对于俄国青年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只举出克鲁泡特金底当时的印象，就足以看到它们底力量是何等地大了。

伟大的亡命者赫尔岑在伦敦开始发行了他的杂志《北辰》^①，大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宫廷里也有它底读者，而尤以圣彼得堡秘密购读者为最多……我常常以差不多到了崇拜的程度的感情，来看印在这杂志封面上的被尼古拉一世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人底高贵的头颅……赫尔岑底文体之优美（屠格涅夫说他是用血和泪写文章，俄国人从没有像他那样地写文章的），思想之奔放，以及他爱俄国之深切，使我受着无限的感动，我再三诵读，不忍释手，甚至以全副心神去领会，而不加以理智的判断了。

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下来后，赫尔岑在《钟》里面发表了一篇《加利利人，你战胜了》，赞美亚历山大二世。他当时的快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然而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不给以充分的田地，而向之征收极高的赎金，反使农民沦落于更惨苦的深渊。而且在两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又以火与剑压服了波兰叛乱。赫尔岑当沙皇沉溺在波兰叛乱者血泊中的时候又写道：“亚历山大，你为什么不死在那一天？否则，你将被视作一个英雄而名垂万世了。”

波兰叛乱被压服后，反动势力底气焰真有万丈高。赫尔岑底恶运也来了，因为他在《钟》上面赞助波兰叛乱的缘故，在俄国渐渐失却了一般上流阶级底同情。而政府对《钟》的取缔尤其厉害，运入俄国，更加困难，同时俄国青年也和他起了隔

^① 这里应作《钟》。

阔，《钟》底销路使一落千丈。

在他底晚年，一代新的青年出现了，这就是巴扎洛夫式的民众主义者的青年，虽然实际上果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他们是“他自己底智的儿女”，然而他不能够了解他们。连加拉考左夫一八八六年刺杀俄皇的事也被他严厉地攻击了，因此俄国青年更不满意他。他晚年感到异常的孤寂。一八七〇年正月二十九日他死在巴黎。后来他底朋友们依他生前的意志把他葬在尼斯。

六 赫尔岑与巴枯宁

赫尔岑在临死前不久给巴枯宁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可表现出他和新式的革命青年间的隔膜来，现在我把它译在下面：

我承认有一天我曾在死尸堆里，在枪炮所毁坏了的
房屋堆中，狂热地听着被捕的二人被枪杀，我以全心全意
智性呼吁狂暴的复仇力量快来毁灭这个罪恶的旧世界，
我也并不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从那时候到现在已有
二十多年了；复仇来了，然而这是从别一方面来的，并且
还是人民忍受着的，因为他们在那时候以及从那时以来
依旧不了解什么。一个长久的，苦痛的时间使得激情可
以平静，思想可以深入了；它给二人以反省与观察的机
会。你我都不曾卖掉自己底信仰，你总是把破坏底激情
当作创造底激情，而以这个激情急忙地向前跑；你踏碎

一切的障碍；你只重视未来的历史。至于我呢，我却不相信旧的革命方法，我努力想了解过去和现在人们底进行，以求知道怎样与他们一同前进，不致落后，然而也不像你那样走在前头那么远，因为他们不会追随我——他们也不能追随我！

然而事实上走在前头的巴枯宁在俄国倒得了不少的追随者，赫尔岑却被人抛到后面去了。因为俄国的青年也是要“急忙地向前跑”呢！就是从一封信函里我们也可以了解赫尔岑晚年的悲剧的生活之原因了。

巴枯宁是赫尔岑底一个亲密的朋友，巴枯宁对于赫尔岑的影响比任何人对赫尔岑的影响都大。赫尔岑自己说过，巴枯宁对于他有一种魔力。他们底关系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我在这里便不详说了。

七 赫尔岑与马志尼及加里波的

要了解一个人不仅应该从正面来观察他底生涯底大概，而且还应该从侧面来就他与别人间的个人的关系而判断。我写这本书，并不想专门来解释某一个人底学说，只拿事实作主干，借此来略略说明他底学说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革命运动有影响之点而已。那么现在我再来说起赫尔岑与这两个伟大的意大利革命者间的关系。

赫尔岑在日内瓦第一次见马志尼，这时正是一八四九年，

自此以后，他们底交谊日渐亲密，后来两个人同亡命英国，更成了生死不渝的好友了。他们两个底意见是不相同的。赫尔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差不多带着宗教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家，而马志尼却反对社会主义。不过这两个人都是真理、正义以及人类底自由之追求者，他们为着这一个共通目的，便在一起合作，而且互相尊敬亲爱，马志尼在赫尔岑底妻子死后曾寄了一封很美丽的信与赫尔岑，

我底弟兄：我刚从报纸上知道你底巨大的损失。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也不是在安慰你。只有上帝和你自己底儿子才能把你所需要的慰安给你。我只想告诉你：我是在为你苦痛而且同你苦痛，因为我能够了解你底悲哀，实在，我觉得你底生涯底这个不可填补的缺陷，而且我也能看见那个暗影，它把你底灵魂放逐了，好像沙皇放逐你底身体那样。……勇敢些！你要忍痛，不要叫你底精神破碎了。我常常以为我们底亲爱的人底死会使得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底义务乃是去做一切她所欢喜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当我以尊敬与友爱之感情来握你底手时，我所要使你记着的话就是这些。我这样做，我像一个熟识生活及其悲哀的人，我自己也常常寻求爱 and 同情，然而总是看着爱和同情被毁坏了。我自己受过很多的苦痛，因而我也能感到他人底受苦。你现在预备做什么事？我听说，依你底意思如果恶运再降临你身，你便移居到美洲。不要这样做！请仍留在欧洲与我们这一般老战

士一起。你在美洲能够寻到什么？自由？你不已经有了吗？问题是在要在没有自由的地方制造自由。帮助我底做这件工作，因为你和我都追求着同一个伟大的理想，都在一个欧洲式的积极的，持久的道路中去追求她，一直走到实现我们底胜利底末端，我们都不是在静观的东方的道路中追求这伟大的理想的。来，并且定居瑞士，在那里你会有好处，我们也可相会。别了我友，请爱我，像我爱你那样。

赫尔岑与马志尼确实曾积极地合作了几年，从事意大利与俄国底解放运动。有一次赫尔岑曾将他底进款十分之一交给马志尼，捐与意大利独立运动，并且说“意大利底事也就是我自己底事”。马志尼也帮了赫尔岑不少的忙，又给赫尔岑介绍匈牙利独立运动底领袖柯苏士，柯氏曾帮忙散布赫尔岑在克里米战争前告俄国军队的宣言。

马志尼给赫尔岑的最后一封信不曾注明日期，大概是在一八六九年写的，在那封信里这个意大利独立运动者说：

……不管他们怎样做，我们一天一天地和一个意大利共和国接近了，我必须尽我底全力来使机器上铁轨，只要它一旦上了路线，便会有充分的工人来推它前进的。我底健康坏了。我好像一株空心的树，虽然依旧站着，然而一股微风都会把我吹倒的。如果我活着看见在意大利做成了一些事，一星期底工作就会杀死了我。每一年都要带走一两个我底朋友，我常常记起沙查洛特翻译的阿

西安底一句诗：

“我听见许多的年岁走去时，悄声私语，
为什么依然唱着这同样的——句？”

我俩底宗教的甚至一部分政治的见解并不同，然而我知道而且也从不曾怀疑过你底个人的性格。……你只看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也不减于你，能够看出基本的问题乃是劳工解放。然而目的是不能与达到它的手段相等的。谢谢上帝，单是社会问题还不曾激起过什么大革命。我说“谢谢上帝”，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主要的刺激物只是物质上的获得，结果一定会产生出一个穿粗布工衣的资产阶级。自马拉顿战争时代以来，一切伟大的事件都是以民族的或宗教的观念之名义而发生的，例如英国革命、北美独立、尼特兰反抗西班牙、希腊革命等等。然而我们且抛开这些意见底差异而以自由底名义互相拥抱罢。

请时常写信给我，我好知道你底漂流底踪迹。我永远渴望读你底著作。

一八六四年加里波的到英国的时候，他去访赫尔岑，在他底家里会着了马志尼。这两个意大利独立运动底领袖因为意见不同的缘故，以前便十分疏远，现在由赫尔岑从中斡旋，他们又和好起来。赫尔岑在伦敦的住宅又成了当时全世界优秀的人物底会所。

加里波的认识赫尔岑是一八五四年的事，那时他正从南美战场归来，此后就和赫尔岑成了亲密的朋友。一八六一年

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以及其后俄国军队在华沙枪杀波兰的游行群众的消息传到西欧的时候，加里波的在这年四月十三日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岑：

……只有最近沙皇解放农奴的事得到了全欧底赞许和欢颂。那个做了这件伟大事情的君主由此得以置身于人类底最大的恩人之中了。然而，我带着忧愁来说，这个良好的工作已染上了无辜者底鲜血了。凡是曾赞美过农奴解放的人，现在都应该起来攻击那些凶恶的犯罪者！你底杂志深得俄国人底欢迎，所以我请你把意大利国民底同情转达给那不幸的然而又是英勇的波兰人，而且也把我们底感谢转达给那些勇敢的俄国兵士，他们如波坡夫那样，折断了他们底军刀，不愿使它们为人民底血所染红。同时扬起所有欧洲国民底愤怒之声，反对那屠杀叛乱者的刽子手。

在一八六三年之末，当俄国远征惩罚队在波兰整批地屠杀波兰人的举动达到最高度的时候，赫尔岑写了一封长信向加里波的叙述俄国政府如何散布流言，说波兰暴动是波兰贵族与罗马教僧侣底工作，是来反对波兰农民及工人的，只有俄国政府才是贫民与希腊正教底保护者，俄国政府如何拿这样的话来激起人民对波兰暴动的恶感。加里波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回信说：

……你底可宝贵的信收到了，在我底眼里看来，它是

一份重要的文件。赫尔岑，我相信你，我也知道……俄国人民对于维尔诺底拷打，以及华沙底绞刑都是无关系的，知道在你底本国也充满着自由底精神，未来底精神。我记着许多军官宁愿死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愿做杀波兰人底刽子手。波坡夫与亚伦何特底神圣名字深印在我底记忆里，历史也会时常把他们底名字和他们底殉道的同志底名字列在一起而告诉后人。然而在我看来，波兰，它底妇女是如此地被凌辱，它底青年这样地被送在刽子手底手里，它该会激起俄国人民底哀怜罢，至少也总会激起你们那一般高贵的人底哀怜罢，那么一个比单纯文字上的抗议更要严重的抗议是应该发出来了。

赫尔岑把这封信发表在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底《钟》上。并且注释说，他读到这封信时不能不流出了他底苦痛的眼泪，而且替他底同国人羞愧。实在加里波的责备俄国人对于波兰人要求独立的斗争之抱着冷淡的态度的话，是极其公正的。

赫尔岑底其他的亲密朋友有雨果、路易布朗、加奈尔、柯苏士、米席勒等。

八 基本思想

赫尔岑在一八五一年致马志尼的信里叙述他自十三岁以来就献身于一个单纯的理想——尽力反对任何压制的力量，来谋个性之绝对的独立。这单纯的理想就是他底学说之出

发点。他从不曾参加过实际革命运动，而且有时他也反对革命，他底见解也常因环境而变迁，然而上述的理想依旧是他底中心思想。所以马沙列克说：“赫尔岑和蒲鲁东一样是个人主义者，联合主义者，自由社会主义者，”然而他自己却喜欢称为社会主义者。而陈加也说赫尔岑已有自由社会主义底基本思想了。

赫尔岑是唯物论者，他在唯物论中找到他底个人主义之支持。然而他底唯物论并不是经济的唯物论，而是哲学的。因此他也反对马克思底主张。赫尔岑以为社会的及历史的改革都是脑筋变化之结果。他完全从物质的一方面把思想解释作脑筋的活动。所以他有时希望进步可由脑筋之改善而得到。

他又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以为俄国并不必走西欧各国所走的道路，他说俄国可不经资本主义而跳到社会主义的。他承认新俄国底基础便是“密尔”(mir)。他说“密尔”有三个极可宝贵的要素，就是：(一)各个人有土地权；(二)土地共有；(三)乡村共同社会之自治。然而“密尔”却有一大缺点，就是把各人底个性吸收入“密尔”中，不能让它自由发展。不过也有解救的方法，若能使它和个人之自由相调和就得了，因此农奴解放便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他底社会主义就替后来的民众主义开了路，他叫出了“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实则蒲加鸠夫叛乱时代就有这个口号了，这是俄国农民底要求)，就为后来“土地与自由社”的先驱，他鼓吹知识阶级到农民中去，又为后来“到民间去”运动底引路人。

赫尔岑底社会主义可说是哲学的；他很少注意到经济问题，在这方面蒲鲁东便是指导的权威。同样在政治见解上他底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联合主义也是受着蒲鲁东底影响。在前面所举出的他与蒲氏的通信里，他们常说彼此底意见在大体上都是一致。

巴枯宁给赫尔岑的影响也不为不大。他底自由社会主义全是由巴氏底影响而来的。在一八六九年《寄一个老同志的信》^①中，他说他和巴氏底目的是相同的，就是把资产阶级国家改变为平民社会（他从前也曾在一篇文章里攻击共和政体的政府，说这是“旧世界底最后一场春梦”）。他把废除国家当作一个目标，然而他说要等大多数人达到精神之完全发展才能实行废除国家，因为这是国家之废除底本质的初步。在这封信里蒲鲁东底联合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又寻到重复的表现了。因此在战略上他便和巴枯宁及俄国青年不同。他以为国家不能立刻废除，而一次政变或暴动又不能教育人民向着平民社会进行，那么国家虽是暂时的，即是要变动的形式，但它底功用在现今尚未消失净尽。因此他甚至梦想拿国家做教育人民向着自由进行的工具了。

在他看来，社会是逐渐进化渐次前进的，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达到理想社会。因此他便不赞成武力革命，以及巴枯宁底煽动方法。他反对当时渐露头角的恐怖主义，对于加拉考左夫暗杀俄皇的行动也极反对。他说人们内部不曾得着自由，

① 老同志：指巴枯宁。

外部也不能解放的。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参加实际运动，专门从事于宣传工作。他说“宣传是人类所必需的……我们需要使徒，他要向同情者与敌人作同样的宣传。……这些站在悬崖上背负着那拚命把他们抛下深渊的财富之重担的人引起了我的哀怜。……我们必须打开他们底眼睛，我们不能够单把他们打出我们底道路之外；如果他们愿意自救，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自救的机会。”

九 结 论

赫尔岑底一生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他从西欧把自由之精神吹入俄罗斯之平原。在几十年中他不断地着爱地在尸体一般的俄罗斯身体底伤痕上涂满了香膏，一直到他看见它苏生了，而且产生了新生活。从他所下的种子中一代新的改革的青年起来，他们以他们底奋斗之热诚与牺牲之精神惊动了全世界，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荣的迹印，这一代的青年曾得着了一个光荣的尊号：虚无主义者。

一〇 诗人阿加列夫

赫尔岑底许多亲密的友人中，有一个人是和他底一生，他底事业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他底表弟诗人阿加列夫（1813—1877）。

阿加列夫底作品并不能说是十分伟大，然而他对当时的

革命党人及俄国青年的影响却也是不小的。赫尔岑刊行《钟》时也得他底帮助不少。赫尔岑说阿加列夫底一生的主要事业乃是完成像他自己那样的一个理想的人格。这一点就可看见他底伟大了。他底生活是最不幸的，他极端爱自由。他在俄国时曾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在出国之前便把他底农奴完全解放了，无条件地把土地交还与他们。他在外国所过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违背过他底理想的，他依然忠于他幼年所宝爱的自由与平等之理想。他为人又很谦和可亲。论到他底主张，他是和他底亲密的友人赫尔岑一致的，但他底晚年的思想更接近于巴枯宁底思想。

克鲁泡特金说：“如果在俄国，进步的思想永远忠于被沙皇暴政或奥国所压制的各民族（波兰、芬兰、小俄罗斯、高加索等）之目的，那么阿加列夫与巴枯宁底功劳也就不小了。”他是真能懂得阿加列夫的人！

赫尔岑与阿加列夫都被人称为西欧派，而同时有大影响于俄国青年而为虚无党人之前驱的又有所谓民粹派的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我们且另辟一章来论述他们罢！

第六章 巧尔尼雪夫斯基 与民粹派

一 虚无主义之创始者巧尔尼雪夫斯基

屠格涅夫一八五九年在他底小说《父与子》中第一次用了“虚无主义者”(nihilist)这字眼。他借阿加狄·彼得洛维奇底口解释道：“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在任何权威下面低头的人，他未经过考验一个原理以前，不管这个原理是如何可信，他都不承认。”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虚无主义之典型就是巴扎洛夫。

然而我们要知道在俄国“虚无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一八六〇至七〇年间的旧虚无主义，一种是一八七一年以后的新虚无主义。屠格涅夫底虚无主义者虽可以代表一代的青年，但是他对于当时的青年终有些隔阂，一般人都承认他用这个字时含得有轻蔑的意思（实则屠氏深爱巴扎洛夫）。能够描写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且给俄国青年指出了一条道路，提出了他们底纲领的人乃是巧尔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 1828—1889)。他底小说《何为》对于当时的青年真算得是一个启示。

巧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贫穷的僧侣(司祭)之子。早年受教育于家庭，后来进萨拉托夫神学校。一八四四年他离开神学校，两年后进圣彼得堡大学。在一八五七年到六二年之间，《现代人》杂志在俄国极有势力，与赫尔岑底《钟》相等。巧氏底名字是和这个杂志分不开的，他底主要著作都是在这四年间写成，而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之上，鼓吹解放农奴甚力。

一八六一年是巧氏底声名极大的时代，他已成了知识界和青年界底权威。然而他底被捕也就在这一年。在这年中，他看见农民底小暴动，看出了俄国革命之可能性。所以草了一篇《告农民》的宣言。他说：“在其他地方尚无准备叛乱之时，只有一个地方底叛乱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现在应该组织起联络的团体准备好无论何时都有可能发生叛乱，这才是上策！”为了这篇宣言，便有人写信到“第三区”告密，还说他是“诗年底领袖”，“狡猾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便被逮捕了。

元老院的裁判官控告他犯了三个罪名：(一)和那个“力谋推倒俄国现在政府”的赫尔岑发生关系；(二)草《告农民》的宣言；(三)煽动暴动。

法庭除了一封匿名的信而外，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巧氏底罪名，不过它也就胡乱地判处巧氏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而且作苦工十四年。巧氏在庭上泰然自若，并不抗辩。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日巧氏在圣彼得堡底一个广场里听了放逐的宣告。这时候他才知道沙皇把他底苦役期减为七年。这一天落着绵绵的春雨，天色甚是阴暗，旁观的人塞满了路途。官吏把

宣告文读完以后，听众争投花环于巧氏底面前，表示敬爱之意。从此这个“青年底领袖”便走向西伯利亚的荒原去了。

巧氏未去西伯利亚时，在监狱中备尝艰苦，他都一一忍受了。有一次因为反抗狱吏底无礼，曾绝食八日。又有一次，他在给他底妻子的信里，写了下面的几句话：“我俩底生活是属于历史的。许多的世纪会过去了，而我们底名字依然会存在着，为人们所宝爱，他们要感恩地纪念着我们底名字。”因此人们就不许他和妻子相见。

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监狱中写了一本小说《何为》。巧氏写了这部小说算是对专制制度复了仇。这部小说一出，就成了俄国青年底纲领。克鲁泡特金深知六十年代青年底精神，他说：“它对于当时俄国青年算得是一个天启”，真是不错。实在果如克氏所说，此书在俄国销数之多，读者之众，影响之大，诚为任何著作家底作品所不能及。

就文学上的价值而论，巧氏底小说实在平常得很。乐卜何夫帮助薇娜逃出家庭，两人成了夫妇。薇娜高兴来组织缝衣女底生产合作社。她底丈夫尽力帮助她做这一类的事。当他明白他底妻子和他底友人哲学家奇尔沙诺夫有了相互的爱情的时侯，他便甘愿退出他们底生活环境。他假装自杀而避居美洲。他底妻子后来也明白了他底踪迹和他底计划，她和奇尔沙诺夫结了婚。最后他镇静了对于薇娜的爱情，便回到圣彼得堡，和薇娜底女友结了婚，两家往来十分亲密。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底结构是极平庸的了。巧氏在自序上说：“这小说底大功绩就在‘它是真的’。”然而究竟他根据什么

样的事实，我们可不能知道了。不过他解决了一个妇女问题。他主张自由恋爱。而且创造出了新妇女底典型，同时又指示出真正虚无主义者应该走的道路。

巧氏又是福立叶底祖述者。就在这小说里，他也热心地主张共同的行动与共同的要求是何等有利的事，并且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类底将来是异常幸福的。

在这小说里他又指示出了虚无主义者底理想之三位一体——“意志底自由”，“有知识的同伴”与“适合于主义的职业”。这正是当时的俄国青年所希求的。马沙列克说得好：“此书一出就成为一代激进的青年底纲领，儿子反抗父亲的纲领。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只分析了当时才开端的虚无主义，巧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已经在活动的虚无主义之福音了。”而且这部小说是著者在监狱中写成的，出版的时候著者仍旧在人间地狱里面。因此在以后的数年中每一个青年一读到此书，再想到著者在冰天雪地上的困苦的放逐生活，未有不被感动的。著了这小说，那位不朽的囚徒确实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这事实甚至反对巧氏的人也不能否认。“这指示与你们：我所愿望的是什么！”巧氏底话实在不错，而且从这里面一代的青年也看出了他们自己所愿望的是什么了。对于他底迫害者们，巧氏所能给与的回答再没有比这小说更厉害，更有力的！

巧氏到了西伯利亚在奈尔秦斯克的矿坑中作了七年的苦役，此后便被关闭在雅苦次克的一个小村里，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许多革命党人曾几次设法救他出来，都没有成功。麦秀根也曾计划在西伯利亚去救他出来，但费了几个月的功夫，

到底失败了。乐巴丁(Lopatin)本是一个亡命者，他竟不顾被捕的危险，从伦敦回到俄国去营救巧氏。然而他底计划尚未实行，他本人就被逮捕了。

巧氏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二十年，一八七四年政府曾设法引诱他哀求特赦，然而他以极骄傲的态度和最坚决的言辞拒绝了。一八八二年亚历山大二世才许可他回到俄国，住在阿斯多拉罕；一八八八年他得着政府底允许回到故乡萨拉托夫，第二年十月便长辞此世了。

我们知道巧尔尼雪夫斯基是和赫尔岑立在反对地位的。巧氏曾到伦敦去见赫尔岑，打算讲和，然而没有效果。后来巧氏得着俄国青年底信仰，而赫尔岑底《钟》在俄国，就差不多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了。巧氏这一派攻击赫尔岑底西欧派的自由主义很厉害，说赫尔岑太空泛，他底政策是保守的。实则这两个人底主张都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而。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忽略了经济的问题，一个很重视它，还解说历史中的经济影响。赫尔岑带贵族底气味颇重，而巧尔尼雪夫斯基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巧氏底学说带有自由社会主义的色彩，他很轻视国家。他受蒲鲁东底影响很深，因此时常表示他对于政府的憎恨，他也从不提什么“条文”。他异常憎恨专制政治，他以为专制的君主政治只是贵族的阶级政治之完成，因此自由只有由民主主义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他说民主主义与贵族政治之对立是以社会之政治的组织为基本的，君主政治只不过是贵族政治之一形式而已。而农奴制度乃是贵族的专制政治之基础。这

样无怪乎他对于当时高呼“加利利人你战胜了”的赫尔岑深觉不满了。

然而，实在说，巧氏与赫尔岑在主张上相似之点甚多。他与赫尔岑一样，主张俄国可不经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以为俄国可由“密尔”底原始共产主义而直接变到未来社会底共产主义。他重视农民，而忽略了城市无产阶级。他也把“密尔”看得很重。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向青年说道：“拿你们底生命来力争土地之权利平等，拿你们底生命来维持乡村共同社会底原理。”他并且比赫尔岑更进一步反对一切私有制度。

巧尔尼雪夫斯基底社会主义与赫尔岑底社会主义一样是伦理的。巧氏不仅反对阶级争斗，而且还从道德的观点来反对达尔文底生存竞争说。他并且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诚实之无上命令”。他又重视个性与知识，曾说“我们知道地球上没有比人类人格更高的东西”，而“知识是本质的能力，凡政治、工业及人类生活中之其他一切东西皆附属于它”，因此他便相信有知识的伟大的个人为改造社会之原动力，他甚至说群众无力来了解与尊重别人为它底利益所做的工作。

这就是巧尔尼雪夫斯基学说之要点，也就是民粹派思想之精义，而后来又为新虚无主义的“民意社”所修改而承认了。

阿尔芒多在他底论虚无主义的书中说：“巧尔尼雪夫斯基底肖像是麦丢撒^①之头。虚无主义者把它插在他们反对沙皇

① 麦丢撒：希腊神话中的妖女，有发如蛇，见者立化为石。

的一切反叛里。被监禁在西伯利亚狱中，孤独的，无力的巧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俄国贵族政治所下的打击，较赫尔岑、巴枯宁一般人在欧洲的亡命中以他们底秘密结社，他们底宣传与行动之自由所给的打击还要厉害得多。俄国社会主义者揭开巧氏底这个面网，重说着丹东^①向刽子手说的话：‘你把我底头拿给人民看罢。我底头是值得这样的。’”

二 都布若留波夫

巧尔尼雪夫斯基底弟子与青年友人都布若留波夫(Dubrojubov, 1836—1861)，对于当时的俄国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底父亲是里尼洛哥诺德底牧师。他幼年受教育于本地的神学校，离开神学校他就进圣彼得堡师范学校，因为他底父亲不能供给他到大学去读书。第二年他底父母都死了，他虽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也不得不负担了养活兄弟姊妹的责任，他便靠译书与作家庭教师来养活他们。一八五五年他认识了巧氏，巧氏退回了他的小说稿，劝他不要从事于文学创作，他以后便专致力于批评的工作。一八五六年他进了《现代人》底编辑部，因为工作过度，在二十六岁时就死了，留下了四卷批评的论文。

都布若留波夫确如司特普尼克所说，“是一个天才的批评家，他底不朽的名著曾震动了俄国底全社会。”据说屠格涅夫

① 丹东(C. J. Danton, 1759- 1794)，法国革命党人。

底《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化身，可是我们也不能承认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直接的写照。都氏底主张与他底先生巧尔尼雪夫斯基大体一致，所以在这里我便不多说了。

懂得了巧尔尼雪夫斯基与都布若留波夫，便对于旧虚无主义有了一个概念。于是我们再进而深入到旧虚无主义中，而且举出一个代表的人物来，这就是毕沙列夫了。

第七章 毕沙列夫与旧虚无主义

旧虚无主义乃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哲学的和文学的运动，在农奴解放后的十年间即六十年代中最发达。巧尔尼雪夫斯基可算虚无主义之创始者，然而在有些地方，他底主张和虚无主义还是不同。在毕沙列夫(Pisareff, 1841—1868)，虚无主义才找到一个真正的代表人物了。

国人常常把虚无主义视作厌世主义，认作是什么“虚空破碎大地平沉”的主义，其实虚无主义完全不是这样，就是最初用这个字的屠格涅夫底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司特普尼克说得好：“虚无主义底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曰，绝对的个人主义而已。”虚无主义以脱离一切的羁绊，获取意志之自由为出发点。凡所谓社会、国家、宗教、家庭所强加于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之负担，它都藉口于个人底自由对之一概否定。所以虚无主义者不仅反抗政治的专制，而且还极其猛烈地反抗那束缚个人心意自由之道德的专制。毕沙列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毕沙列夫绝对否定而且破坏一切过去的遗留物，以及和传统有关的东西，他除了服从自己底理性外不服从任何权威。他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大胆宣言：“每个生物对于他

自己乃是宇宙底中心，宇宙底意义，甚至对于一个最平庸的庶民，他底个人的苦乐与愿望，也是比较他所未参加而且对于他底个性之命运毫无影响的宇宙革命重要得多。”他相信他底个人主义之最坚固的基础是在“合理的利己主义”之中，这“合理的”三个字是应该注意的，因为毕沙列夫底同志，又是他底杂志《俄语》底投稿人沙热夫在致新虚无主义者的公开信里说：“我以至诚向你们宣言，我们并不是如你们所称的利己主义者。”

毕沙列夫，像一个尼采底先驱者，他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要重新来答复一次。他说，要创造新的，必须先把旧的完全毁坏。他最爱说的话就是，“凡能够毁掉的东西，就必须毁掉它。凡受得起打击的东西就适宜于生存。凡破碎成片片的东西只配抛在垃圾堆里。你且勇猛无畏地冲开你底道路，因为你不会做出害处来的。”

毕沙列夫是赞美巴扎洛夫，而且以他为模范的。他曾写过一篇《巴扎洛夫》，以青年俄罗斯之名义承认这种典型。当《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安多洛维奇攻击《巴扎洛夫》说它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粗鲁的人的文字后，毕沙列夫在监狱中又写了一篇更详细的文章。这篇文章底标题是《实在论者》。而且就是它底“献辞”也就足以寒敌人之胆了：“献给我底最好的友人，我底母亲。”于此毕沙列夫又在巴扎洛夫中找到他底“最好的友人”，他底“母亲”。而且实在论者的毕沙列夫也找到一个同志了。在这篇文章底结尾，著者把实在论底性质概括在下面一句格言之下：“爱情，知识，工作。”

虚无主义并不是唯心论的与玄学的。虚无主义是唯物论的，实证论的，进化论的，功利论的，而且果如毕沙列夫所说，虚无主义与实在论是二而一者。所以毕沙列夫又称虚无主义者实在论者。

我们知道巴扎洛夫曾从事于蛙之生理学的观察，并且把这种观察推荐与别人。毕沙列夫竟热狂地写道：“在蛙中你可寻到俄国人民之救济与复兴来。”他又说：“必须彻底地去思考事物……我们对于自己应该忠实”。实在论者应该忠于自己，忠于一切同胞，尤其忠于女人；他与别人的关系，应该是坦白的，忠实的。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目标，而且必须达到它。然而只有受过科学的训练的人才能明白这个目的，因此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在俄国散布科学而且使科学通俗化。一切工作，一切实习，都是基础在知识上面；俄国需要知识，需要科学，需要自然科学。

巴扎洛夫说过：“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实验室，在其中，人只是一个劳动者而已。”在虚无主义者看来，自然本身只是为化学工艺供给材料的东西罢了。毕沙列夫又说：“实在论者是一个深思的劳动者，是一个爱他底工作的人。”

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无论趋于何种极端，也只在个性之发展，以及一切权威之否认而已。个人主义者不做奴隶，不受人压制，同时他也不做主人，不去压制人。所以绝对个人主义者的毕沙列夫也承认在普遍的人类连带性中寻出社会的和一般的利益，而实在论者必须用手与脑把这个连带性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基础就是自然科学）。个人主义者巧尔尼雪

夫斯基也说：“真正的实证论者除了爱和高贵的心灵外什么也没有了。”沙热夫更宣言是“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

从功利论者底见地，毕沙列夫又否认了普希金底著作。虚无主义的诗人奈克拉索夫更说：“读普希金全集，不及食干酪一片。”另一个热狂者又留下一句名言：“一个鞋匠是要比较拉斐耳^①高贵得多，因为鞋匠制造出有用的物品，而拉斐耳所造出的东西全没有用处。”因此他们更趋于极端，把艺术认为唯心论的表现之一面加以排斥，并且凡足以刺激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为他们所否认了。

虚无主义者又是达尔文主义者，毕沙列夫曾著过以《植物与动物界中之进化》作为标题的一系列的论文。沙热夫在他底“公开信”里面也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而且我们任何人都预备登绞刑台身殉莫列旭特和达尔文底学说的。”

实在毕沙列夫自己差不多可说是身殉主义的。他生于一个大地主之家，受过完备的教育。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觉得富家生活之罪恶，脱离了家庭，抛弃了财富，和一个贫苦的同学住在一间房子里，有时又和许多同学住在一间房子里，在他们底喧闹中作文。他异常勤勉地工作。一八六二年他底一篇批评一本反动的政治小册子的论文被一个同志秘密印了出来。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因此获罪，被囚禁在彼得保罗牢中过了四年。他底有名的论文都是在狱中写成的。

① 拉斐耳(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名画家。

出狱后他底健康完全毁坏了，一八六八年的夏天在海滨洗澡时，溺死于海中。

毕沙列夫死后不久旧虚无主义也就死了。在一八七一年另有一代新的青年起来，这一代青年在西欧也得着了“虚无主义者”这个尊号。

旧虚无主义底生存期虽然不久，然而他底生存却是极其光荣的。旧虚无主义底第一战是对于宗教的，“没有经过丝毫困难没有费过大力便绝对地确定地得胜了。”在当时的俄国，果如司特普尼克所说，“只要受过教育的人，若说他现在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论者，这真是奇怪的事了。”在这第一战后，旧虚无主义就把绝对的无神论当作遗产而传给后代了。

旧虚无主义底第二战是对于家庭与一切传统习俗的，其结果也获胜了。许多的青年男女被唤醒起来，脱离了家庭，去求比生命还宝贵的知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妇女解放之问题也就解决了。虚无主义的妇女不仅要求恋爱自由之权利，而且还要追求自由本身。所以她们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之开放。“靠了那些热烈的妇女底努力，战争终于奏凯。最后的胜利仍归于她们，便是野蛮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司特普尼克这样告诉我们。

毕沙列夫所讥笑的“人体模型”现在渐渐地减少了。许多的女郎读了毕沙列夫底小说后都异口同声说：“不，我决不要做那样可怜的‘人体模型’。我要征服知识；我要思想；我要为我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前途。”然而俄国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当时是不收女生的，因此无数不甘困处在无知的状态中的青年

妇女，为了要追求那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知识的缘故，便不得不离开自己底家园而远适异乡。在她们看来，瑞士是自由的国土，它底学校对于任何人都会敞以闭门羹的。从此那山明水秀之乡便成了这一群历尽千辛万难从冰天雪地中出来的“进香的女郎”底天国；瑞士底名城苏黎世就是她们底圣地耶路撒冷。这种风气遍于全俄。在平静的凡尔加一带的平原，在高加索，在极其辽远的西伯利亚，在其他各处都有无数十六岁上下的少女带了单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费，只身跑到未知的国土去，为的是要一心一意去求得那能够保证她们所渴望的自由的知识的来。而留在俄国的虚无主义的妇女也抛弃了锦衣玉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绒衣服，剪了头发，挂上眼镜，这种装束竟成了一种风气。这些女子常常离开她们底丈夫和家庭，不愿过无恋爱的结婚生活。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虚无主义已大获全胜了。

“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旧虚无主义者至此已心满意足，不再前进了。巧尔尼乌夫斯基底小说《何为》或毕沙列夫底论文对于这问题是没有回答的。

“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客人，他来拜访他底先生。他以热烈的语调问那旧虚无主义者道：“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

老主人底答复是这样：“我自己是幸福的了。”

充满了热血的青年客人听了这样的答复，不禁愤激起来

了，又说出比刀剑还要锋利的話：

“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要是你晓得你底乡土底同胞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你还能够是幸福的么？他们快要饿死了，人家夺去了他们所有的钱，强迫他们在街上去乞求一点面包皮。他们底苦痛诉之于人，人不顾，诉之于天，天也不闻。号寒没人给之以衣；啼饥无人给之以食。人生并非无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却不得不说是无情的了。也许你不知道这个罢；不然，你怎么能享乐呢？怎么能够不去替他们做点事呢？你不是在数年前曾说过你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奋斗’么？”

巴扎洛夫式的旧虚无主义者毕沙列夫、沙熟夫等对于这个青年底质问是无法答覆的。所以旧虚无主义便不得不走上死亡之路了。而那个青年呢，他将抱着满腔悲愤而去了，从此他要用失望的语调来反覆地自问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然而时节来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了。在这个俄国青年底眼前现出了一幅图画：一个大城市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要求人民底权利之理想而起了革命。这个青年用全副精神注视着赛纳河岸上演着的惊天动地的活剧。他看见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听见在大路上被屠杀的妇人、小孩底沉痛的哭声。然而他们是为着什么而死的呢？为着什么而哭泣的呢？为的是工人底解放；为的是伟大的社会理想！

同时他又回头来看俄国。好像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向他说：“把你底眼光转到田塍上罢，你且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农夫，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据说在现今的俄国内，已再没有奴隶了。你再看清楚一点！这个自由的人并不是在劳动，或播种。

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吞食土块。固然人把田地给他了，但是他没有耕田的耒耜和锄头，他也没有牛马，因此他无法使土地肥腴。他没有吃的东西，饿得急了，只得吞食土块！要是他在土里寻出了树根，他还要留下来带回家去给那在破屋中等待着的妻儿们。

“看看农民们罢：他们底全生活充满了忧愁，受苦和虐待。他们苦于饥饿，疲于劳动，永为特权阶级底奴隶，终日无休息，无希望，无慰安，无快乐地劳苦着；政府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知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夺他们，践踏他们，没有一个人援手救他们的。”

热泪从这个青年底眼里流了出来，他底心苦痛着：“要是我真受着苦，要是我真在痛哭，这是由于那个苦痛着的俄罗斯老母亲底缘故，她眼看着她底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底枯瘦了的怀中。俄罗斯啊，我在哀悼你！”

然而徒然哀悼是无用的，于是这个青年便起来了。他现在得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个问题底解答。他所下的断案是：“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不得不靠着刀剑底力量。”他找到了他应做的工作——“到民间去”。他便向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农民们怎样才能够解放他们自己，怎样才可以使他们得着幸福。为着这可怜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受苦的农民们，这青年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他底额上现出了红光，他底眼里喷出了烈焰。他于是在心里立下了庄严的誓愿：愿牺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一切，来解放那般匍匐在特权阶级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他知道那

一类人曾流了生命之血来使得他——一个特权阶级的后代过着安乐的生活，能够安心读书增长知识。

于是这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掉那烧灼他底身体的锦衣，弃却那梗塞他底咽喉的美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足穿农民底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间去”的旅途。在那里他以一个贵族的后裔而加入农民底队伍，或入山间的僻地，或到田畔风暖之区，和农民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瞬间便把现代的福音——社会主义来宣传。

同时那般在瑞士留学的女学生，在那里除了医药学校之外，也看到了一个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她们不久便明白了俄国旧虚无主义与近代社会主义二者间底异点，于是疑问又起来了，“我们要求的知识是什么？难道那仅仅是要我们在特权阶级中求得一个更有利的工具么？我们已经是特权阶级中的人了。除了我们自身而外还有谁能享到这种利益呢？如果只是我们独享着这种利益，那么，我们又和那般靠着贫苦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么分别呢？”她们便抛弃了医学的研究，而开始常去参加“第一国际”底集会，研究近代社会主义，诵读蒲鲁东、巴枯宁、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苏黎世便由研究学问的名都而变成了社会主义之永久的俱乐部了。俄国底男女“进香客”更是络绎不绝。昏庸的俄国政府大为震恐，便有一八七三年之愚笨而可笑的“勅令”，命令全体俄国男女学生立刻回俄。

本来在瑞士的俄国留学生已决定好了回国宣传的计划，

乘此机会便成群结队而归。他们带回来的是宣传之热诚与牺牲之决心，在国内受着青年同胞底欢迎，从此国际社会主义底种子便一帆风顺地播遍全俄了。

旧虚无主义就如此死亡，新虚无主义就如此诞生。从此俄国社会运动史上又翻开了新的一章了。

第八章 巴枯宁与自由社会主义

一 新虚无主义者底两个导师

新虚无主义者既然不能够以巧尔尼雪夫斯基与毕沙列夫满足，他们便另外找到了两个导师。新虚无主义者司特普尼克说得好：“这两人底力量是很大的。一个是‘安那其主义的，联合主义的国际’之建设者，破坏的天才密海尔·巴枯宁；另一个是以一管横扫千人的笔鼓吹新思想，对于我们的运动有绝大贡献的哲学家彼得·拉甫洛夫。前者又是一个热情的演说家，大胆的思想家，曾著有《革命与联合主义》一书，以非凡的头脑，伟大的能力，鼓吹直接的民众革命；后者乃是著名的《前进报》之主笔，以淹博的学识和不断的勤勉来维持着《前进报》底荣名。在这两个人之间自然有若干不同之点。巴枯宁是‘第一国际’中激烈派之拥护者，而拉甫洛夫却倾向于温和一方面。然而他们两个都承认只有民众革命才是可以根本改革俄国底悲惨情形之唯一方法。”

巴枯宁所处的时代虽然较早于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然而他对于俄国青年的影响却在后，而且支持得最久以至于现今。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几个思想家如赫尔岑、巧尔尼雪夫

斯基、平沙列夫诸人都只是学者，而非革命家；都只是理论家，而非实际家。只有在巴枯宁身上，俄国革命青年才寻出了他们底真正导师，才寻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所以新虚无主义者一出，巴枯宁底影响就遍于全俄了。

二 少年时代

巴枯宁于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生于俄国特威尔省(Tver)·普利安姆秦诺县一个贵族底家庭。他底父亲共有子女十一人，密海尔·巴枯宁居长。据巴枯宁本人后来在他底断片的自传《我底生涯之故事》里所描写，他底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具有大量的同情和宽厚的精神之真正慈善家。他底父亲曾参加过“北部联盟”，但并不十分热心，所以十二月党失败后，居然逃脱了多数同党底“悲壮光荣的命运”。

他底父亲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地主，共有一千个农奴。巴枯宁底幼年就是在故乡中度过的。他底父亲和叔父教授他以各国语言、历史、算学等。他底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所以他也得免掉了宗教教育底束缚。这个青年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憎恨一切不义之事，因此他在早年，对于农奴制度就生了厌恨之心，认为这是极其不义的了。

巴枯宁十五岁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一八三二年毕业，被派到明斯克炮队里做一个军官。那时正是在一八三〇年被波兰叛乱被压服之后，俄政府压制残害波兰人民的情形燃起了巴枯宁心里的反抗不义之火，他开始判定了专制之死刑而厌弃

军人生活了。据赫尔岑所述，他在军中的生活是异常无聊，每天总有大半天的时间是完全浪费掉的：他不脱寝衣睁开眼睛躺在床上，一事不做。到了一八三四年他终于违背了父亲底意志，脱离了军籍。

巴枯宁离开军队后，就到莫斯科去研究哲学。他一共在莫斯科住了六年，在夏天有时回家乡去住几天。这时正是黑格儿哲学风靡俄国的时候，他便加入了斯坦克微奇底团体，研究黑格儿哲学。在一八三八年他就成了一个热烈的黑格儿信徒，和斯坦克微奇、柏林斯基一样承认“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了。一八四〇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时，他已是斯坦克微奇团中的主要人物。据赫尔岑说在莫斯科时“巴枯宁底亲族什么也不给他”，他在那时的生活是异常贫苦的。

一八四〇年他得了赫尔岑、阿加列夫两人底帮助，经过圣彼得堡而后到德京柏林。

三 欧洲的生活

巴枯宁在柏林时和屠格涅夫同住，友谊甚笃。那时在德国也是黑格儿学说底极盛时代。柏林底青年学生大半都是黑格儿信徒，他们鼓吹革新，主张自由主义。本来黑格儿学说具有保守与革命两方面底要素。唯物派哲学家费尔巴赫已从黑格儿哲学中引申出无神论，巴枯宁也开始从黑氏哲学中找出他底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之结论了。

一八四二年巴枯宁由柏林到德列斯敦，在那里和当时黑

格儿派底一个首领，怀有自由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安诺特·路格(Arnold Ruge)往来甚密，又常在路格主办的《德国年报》上发表文章，《德意志底反动》一文便是在这上面发表的。

这篇文章题为《德意志底反动：一个法国人之断片》，下面的几句话开始：“自由，自由之实现——谁敢否认说在历史上这个字不是最时髦的么？它底仇敌也和它底朋友一样地承认它，没有人敢公开宣言他是自由底敌人，然而自由之实现却是——革命。”结尾的几句话更有名：“我们且确信这永久的精神罢！它只有破坏与毁灭，因为它是一切生命之不可测度的，而且永久创造的源泉。破坏之欲望也就是建设之欲望。”《德国年报》攻击政府甚力，不免遭政府底嫉恨，巴氏便于一八四三年赴瑞士。巴氏受路格底影响颇深，以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与此时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

到了瑞士后，他仍然常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往来，又和德国唯物派哲学家瓦黑特相识。还有德国潜特灵被捕的事情也曾牵连到他，因此瑞士政府与俄国政府颇注意他。而且俄政府又下令要他回国，他便离开了瑞士，往当时全欧洲革命思想底发源地——巴黎去。

在巴黎他会着了蒲鲁东。他和蒲鲁东的友谊甚厚，常读蒲氏底著作，与蒲氏作竟夕之谈，受蒲氏影响很大，日后思想之根基已坚固于此时了。他虽敬爱蒲氏，但他对于蒲氏底缺点也异常明白。他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此地。他常常和他们研究集产主义，讨论革命；因为他们主张的不同，所以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巴氏和亡命巴黎的波兰的革命党人也很

接近，他很赞助波兰底独立。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他在一八三〇年波兰暴动纪念会上演说赞颂波兰底起义，俄国公使请求法政府驱逐他出境。俄国元老院并判决将他底家产全部充公，若本人一旦回国被捕，则终身流放于西伯利亚。

巴氏被迫去法后，到了比京布鲁塞，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他又回到巴黎。同年巴氏又赴布拉格参加斯拉夫民族大会，提倡斯拉夫革命，但没有得着什么效果。巴氏又在这年尾做了一篇《告斯拉夫人书》，叫他们和别国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扫灭那三个专制君主国——俄、普、奥。

第二年正月，巴氏秘密赴米比锡，帮助波希米亚人反抗普鲁士政府，并且成了这运动底中心人物。五月德列斯敦底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把城市占据了五天。巴氏虽热烈地奋斗，但这次革命运动终于失败，到后来他也被捕了。

四 人间地狱中的革命家

自此以后，巴氏屡历各国底监狱，受着长期的监禁。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四日被判处死刑，问他愿意向国王请求减刑否，他说“宁愿被枪毙”。但五月后，又得着减刑的宣告。奥政府要求引渡，遂移至奥。奥政府又于一八五一年五月把他判处死刑，旋又改为终身监禁。他在奥国监狱内，手足均上镣铐，有时狱卒们竟用绳索把他缚在墙上。

因为俄政府要求引渡，巴枯宁又转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底手中。巴氏在俄国监狱彼得保罗垒中共住了六年，得了坏

血病，全副牙齿都脱落了，健康也完全丧失，一切的食物都不能消化。然而他底精神的痛苦更胜于物质上的痛苦。他在写给赫尔岑的信中说：“所谓无期徒刑是怎样的可怕啊！无目的，无希望，更无生活底兴趣。只是一天一天地变傻了，数周间不断的可怖的牙痛，昼夜不能安睡的失眠症，读什么书，做什么事，片刻之间，所谓你不过是奴隶罢了，死骸罢了。……”从这几句话我们很可看出他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时他底勇气并没有失掉，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仍是和从前一样的。他自己接着又说：“我但有一事，即是决不陷于妥协，无论如何不变初衷，若自欺而求安，实在是卑劣的事。”这样地过了六年，他最后得着终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刑罚。

五 西伯利亚的流放和逃至伦敦

在西伯利亚底风雪之中埋了四年，巴枯宁底精神反而一天一天地强健起来。这四年中间，他无时无地不想到逃走的事。以他那样身体衰弱的人，攀越深山，跋涉幽谷，入霜深之平原，寝于布满了白雪的旷野。备尝了苦楚辛酸，到后来，逃走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一八六一年他由西伯利亚逃到日本，经过美洲到了伦敦。

他离开了这冰天雪地，望见了暖热的太阳升到天空，世界革命的雄图在他底胸中跳跃，这时间巴枯宁底感情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

猛虎出山了。巴枯宁突然在伦敦出现了。当时赫尔岑正

在伦敦发行杂志《钟》，对于俄国底革命运动继续不断地作有力的指导。巴氏也常在《钟》上发表文章。

一八六二年波兰暴动发生，巴枯宁很努力地去帮助波兰人，然而这次的暴动终于失败了。自此以后，巴氏渐渐地把眼光放到西方去。在一八六四年他竟明显地鼓吹世界的革命主义。

六 意大利之行与瑞士之行

从一八六四年到六八年，这四年之中他完全住在意大利。在那里他建立了“国际友爱会”（即“社会革命党同盟”），这个会一直支持到一八六九年。

一八六七年所谓平和自由协会在日内瓦开大会，巴枯宁和友人邵可伯等都去参加。他们主张废止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以独立自治体的自由联合来代替。第二年又在柏林开会，会长便是法国小说家雨果（V. Hugo）。巴枯宁主张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不得大众同意，他们便退出，另组织“国际社会民主同盟”。其纲领中有“主张无神，废除阶级，土地资本及生产机关归社会全体所有，消灭国家，建设自由团体的世界联合”（大意）等语。这同盟仅存在了六个月便自行解散了。

七 国际工人协会

现在才说到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是一八六四年

在伦敦创立的，马克思并非它底创立者，但其规章和党纲均出自马克思之手。后来在各国发展得异常之速，不久成了传导社会党思想的一个有力的机关。一八六八年九月在布鲁塞开会，遂完全变成社会党的了，巴枯宁以前并未加入，至是便同着许多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讲法语的瑞士一部分地区等各处底同志实行加入。

一八六九年在伯勒(Bale)开第四次会，两派底争执便有坚强的表示。德人和英人倾向于马克思，且相信私产废除之后，仍允许国家存在；而别一方面，拉丁民族大半信仰巴枯宁，反对国家，不相信代议制，两派底争执愈演愈烈，终于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会里决裂。巴枯宁被大会开除。同时巴枯宁派底犹拉、西班牙、意大利、东比利时等联盟，完全与马克思派底总评议会分离，在圣地米会议后，成立了联合的同盟，打起自由联合主义的旗帜继续“第一国际”底工作，直到一八七八年，因政府迫害过甚，无法开会，也就慢慢地消灭了。自圣地米会议起，近代自由社会主义才以完全的体系出现。

八 里昂底革命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起了，巴枯宁很关心这次战局，他以为俾士麦底铁血主义如果成功，世界底文明和一般社会主义都会遭摧残的惨祸，反动的势力更要扩张了，他于八月十一日给阿加列夫的信说：“重大事件就要发生了，你还研究什么杂志底图案和论文？你真是——一个哲学家！你原来不过是一个俄

国人，而我是一个世界人，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真使我热血沸腾。”

九月四日法兰西帝国崩坏，第三共和国成立了。他决意到里昂去。他寄瓦黑特信说：“里昂底革命社会主义者叫我去那边去，我决意带着这朽骨前往。也许这是我最末次的事业了。”巴枯宁派当时在里昂颇有势力，而且巴氏自身本来就决定无论什么地方起了民众暴动，他都要参加的，因此他便往里昂去了。

十二日到了日内瓦后，便和俄斯诺夫及波兰青年革命党人兰克维支同去里昂，可惜迟了。

在九月四日里昂便成立了保安委员会，委员中除了少数第一国际底战士外，大半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巴氏底亲密友人布朗(Gaspard Blanc)、利夏尔(Albert Richard)都不是委员。九月八日利夏尔曾提议派人到巴黎去和巴黎底国防政府接洽，经众公推利夏尔等三人为代表。然而其他二人便在巴黎做了官，利夏尔虽也曾受一命之荣，但他唾弃不顾，愤而返里昂。

这时里昂完全在急进共和党及政客阴谋家底势力之下，巴黎政府又令急进共和党某做里昂知事，把保安委员会解散了，里昂底情形真正使巴枯宁失望。

然而他是一个革命的天才，他对于暴动底方法很熟悉。他便在一所小小的屋子里同他底友人计划新的暴动，于是民众会议又风起云涌般的起来了。十七日在市政厅举行的大会议决组织“救法中央委员会”。巴枯宁这时确实忙极了。他寄阿

加列夫信说：“真的革命尚未发生，但快要来了。”

二十四日的大会确是民众的集合，由画工舍尼主席，当场议决取消一切官吏及军职，强迫富人纳税等议案。二十五日“救法中央委员会”散布传单，揭示革命纲领，由全体委员署名，巴枯宁也署名的。巴枯宁此时很高兴，他寄阿加列夫信说：“请看我们底宣言，我们向民众宣言扫荡阻碍进行的一切权力，我们今晚要除尽我们底敌人，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战斗！等着：我们底胜利来了。”但那天晚上的大计划又延期到二十八日，这不知什么缘故。

二十六日的大会通过了“法兰西自由市革命联合”底宣言，第一条便是“国家底执行机关即统治机关均无实力，今废之，法兰西完全为民众所有。”

当时里昂市会把官立工厂职工底工资由三佛郎减到二佛郎半，因此劳动者便表同情于革命党，二十七夜在市政厅举行“官立工场劳动者大会”，预定在次日举行大示威运动。二十八日正午数千工人集于德罗街，举代表十六人向市会要求恢复三佛郎旧制，市会惧而闭会，舍尼便领了数百工人闯入议场，巴枯宁等跟随着，舍尼上讲坛高呼，强迫市会采用救法委员底宣言。

救法委员占据市会底会议室，颁发布告，就花费了两三个小时，巴枯宁警告他们说：“快点做罢，国防军就要来了。你们非先捕知事、市长和马斯由将军不可。”但他们不听。

兵队到了，官吏也能自由活动召集他们底国防军来攻击市议会。革命委员会竟同地方委员会妥协，从议会撤退。

巴枯宁被市长爱罗擒住了。他在--封信中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有些人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对待我，笑骂我，推我，扭我底手和臂。也有人说：‘不要伤害他。’实在，到处都是残酷的胆小的中产阶级……我底记事册和钱袋都被那些绅士拿去了。”俄斯诺夫听见这个消息便带领义勇队去救他出险。到了这个地步，巴枯宁也没有办法，在友人处住了一夜，听说下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便同兰克维支往马赛去了。

九 西班牙意大利底革命

这次的失败并不足以使他灰心。一八七三年夏西班牙革命爆发，他觉得他有参加的必要，他说：“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死在大革命底暴风雨里面。”这次机会来了，然而他没有路费，他写信向加费罗(Cafiero)去要，加费罗一时也没有钱，只允许在他死后养他底妻子，居乐美也只能筹到一笔很小的数目。巴枯宁赴西班牙的计划便完全不能实现了。

西班牙革命失败后，巴枯宁底希望又向着意大利。意大利饥饿农民底暴动果然起来了。

“朋友们，那里所留与我的只有死。别了。”巴枯宁和他底朋友们告别后，便向意大利出发，在路途中，他寄信与居乐美告别，并说他要参预意大利底运动，恐怕不能生还了。他到了意大利，行踪很秘密，除他底同志外，更没有人知道。

他们议定在八月七、八两夜起事，约定几个地方底民众武装地联合起来强迫兵士服从，然而到了约定的时候和地点，罗

马纳(Romagna)底同志不来，伊模拉(Imola)底同志被军队压服了，并捕去多人。那些集于城墙下的波伦亚(Bologna)同志等到天明也就散去了。巴枯宁晓得这次革命又失败了。他预备自杀，恰恰那时他底友人西尔魏赶到了，他说还有希望，劝巴枯宁图谋再举。然而再举也没有成功。

一〇 革命家底最后

自此以后，巴枯宁便住在意大利，他极想牺牲他底生命来殉他底主义，他想在意大利做出殉道的事业，然而也没有成功。

他是一个“需要着暴风雨和生命”(他自己底话)的人，到了此时全然遇不到暴风雨了。晚年的生活便是如此的苦痛和寂寞，身体日衰，疾病益重。到了一八七六年六月他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跑到瑞士底伯伦去，他底老友瓦黑特在那里，他向瓦黑特说：“我来此地，请你为我医疗，不然就死在此处……”果然在七月一日就死去了。

巴枯宁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底著作虽是断片的，无系统的，然而却也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力量的。现在他底全集已有法、德、俄、意、西班牙五国文字的刊本了，《上帝与国家》一书几乎全世界都有译本，传播甚为普遍。奈特劳有一部极详细的《巴枯宁传》，凡三大册，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

—— 巴枯宁论

克鲁泡特金说：“‘密海尔’这个名字，在他们（巴枯宁底同志）底言谈之间常常被提起。他们并不把他当作那意见便是法律的首领，只是当作一个亲爱的友人。”

赫尔岑在其遗稿中论巴枯宁道：“他虽则五十岁了，却依然是莫斯科的书生，巴黎的放浪儿。从不忧虑明天底事情。对于金钱也是毫无关心的。有了钱，则如流水般散给周围的人，没有钱，又好像天真烂漫的小孩向父母要钱似地去向他人要钱；得到了，从不偿还。同样即使自己连烟草和茶都不能买，也把自己底所有全给与旁人。”

巴氏一生完全在穷苦中过活的。他底穷困真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有一次他底妻子寄阿加列夫的信里末句说：“请你原谅，此信未贴邮票，即行付邮，因我们现在真如这信内所说，不名一钱了。”他并不因此感觉到什么痛苦。模克利维奇(Debargori Mokrievitch)在他底回忆录中说：“我要出发的前晚，巴枯宁以旅行指南计算归国费用。他叫我把钱袋拿与他看，我说钱够用。他还是要看，我只得打开，恰恰不足三十佛郎，我便向他说：‘波希米亚有个朋友，到那里，可向他们借钱。’巴枯宁说：‘好，好，你说笑话，’随手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木匣，从匣中取出三十佛郎给我。我说：‘到了俄国就奉还。’巴枯宁便说：‘说什么还呢？这不是我底钱。’‘哈，给谁也好罢，’我说。‘什么，唉！这个私有财产底主张者。……总之，无论如何，你

若一定要还，那么，你捐给俄国底运动罢。”这样的人真可爱极了。”

赫尔岑更说得好：“他底性质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儿童似的直率和单纯：这种性质给他以特别的魔力，使所有的人（不论强者弱者）都和他接近；和他相远的，只有那些负气的傲慢的人。”

巴枯宁不仅可爱，而且他底人格也是极伟大的。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底思想力是很伟大的，他底感情是极热烈的，他底意志是极坚强的，他底精力也是能够支持永久的。穷困的生活，残酷的刑罚，孤独的监禁，以及死的危险都不能使他灰心失望。他是为革命而生的，他所知道的只是革命，他无时无刻不想念到革命。所以人称他为革命底化身。以他底勇气而论，全世界的革命党人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

伯林斯基说巴枯宁“自身之中有一种能消灭其一切个人缺点之力而且有其心灵深处活动的永远之动力”。不错。波勒尔夫人在她底回忆录中也说，巴枯宁有一种征服人们的精神的力量。“凡是听他谈话的人，就是一两句话也会使你觉得非做一点事不可。”克鲁泡特金在自传上更说：“他帮助犹拉地方底友人阐明他们底思想，表示出他们底渴望；他更以他底有力的，火一般的，不可抗的革命的热诚鼓舞他们。”

克鲁泡特金深以没有见过巴枯宁为憾，他说：“我只有一

次听见别人提到巴枯宁底名字，把他当作一个权威。……有几个青年在一处谈论，他们说了许多对于女性不很尊敬的话，座中一个女子忽然叫道：‘可惜密海尔不在此地，他若在此，一定不会让你们说这样的话。’……”克鲁泡特金接着说：“那个为革命底缘故牺牲了一切，而且怀着从他底革命的观念得来的人生最高尚最纯洁的见解，专为革命而生活的伟大的革命家底风貌至今还鼓舞着他们。”

巴枯宁底影响是很大的。邵可倡、加费罗二人在《上帝与国家》底序文上说：“俄国的学生，德国德列斯敦的暴动者，西伯利亚的流放的同胞，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各国里一切诚恳热心的人，没有不受巴枯宁底直接的影响的。”

波勒尔夫人述她底经验说，对于群众和对于个人，巴枯宁底感化力是一样的。她接着又问道：“究竟巴枯宁底魔力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我且引克鲁泡特金底话来回答：“是他底道德的人格之感化超过于其知识的权威之感化。”我说他底魔力只是两件东西：热情和可爱。路格也说过：“巴枯宁和许多人发生关系，以其才智及其可爱的性格，便得了众人底敬爱。”惟其他富于热情，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最活泼的人，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是我们底亲密的友人，而不是什么超人的英雄，因此我们不得不爱他，受他底感化。

一二 基本思想

巴枯宁底思想，可以从他所起草的日内瓦“社会民主同

盟”底纲领里看出来，现在节译在下面：

(一)本同盟主张无神论，志在废除一切宗教的服役，以知识代替信仰，以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废止现在那种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与市民的布置之婚姻制度。

(二)本同盟第一志在将一切阶级完全地决然地废除；各个人，不论男女都有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平等；……而且赞同最近布鲁塞工人大会底决议，主张土地、生产工具以及资本只能由工人即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使用。

(三)本同盟主张所有的儿童不论男女都应受平等的教育。……

(四)本同盟为一切专制政治之大敌……凡不以劳工反对资本的主义之胜利为直接目的之一切政治行动，本同盟一概排斥。

(五)本同盟以为……一切现存的政治国家皆将消灭，而代之以农业的与工业的自由联合之普遍的结合。

(六)因为社会问题只有在万国工人之普遍的，国际的休戚相关这个基础上面才能够决断地，有效地解决，所以本同盟排斥一切以所谓爱国主义与国民间的敌对为根据的政策。

(七)本同盟希望一切地方联合以自由为媒介而普遍地联合起来。

第九章 拉甫洛夫与伦理的社会主义

巴枯宁与拉甫洛夫被称为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底双壁，但二人底性格在各方面都是不相同的。巴枯宁是一个感情之人，是实行之人，是积极的战斗者，而拉甫洛夫却是一个理智之人，是理论之人，是冷静的思想家。巴枯宁是猛勇的战士，拉甫洛夫是平和的学者。然而正因为这种不同，他们才相辅相成地鼓励起了一全代底青年，引他们到争自由的战场上去。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他们二人底影响都是很大的，激烈派便跑到巴枯宁底旗帜之下，而温和派就奉拉甫洛夫为精神上的指导者。所以在俄国革命青年中就有所谓巴枯宁派与拉甫洛夫派之分了。

所谓拉甫洛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人呢？

彼得·拉甫洛夫 (Peter Lavroff) 在一八二三年生于蒲司科夫省一个村落里。他底父亲在那里有一所祖传的田产。这个沙皇底未来的敌人也是出身于压迫阶级的。他底父亲是一个性情专制的人，不过也曾受过当时的完备的教育。彼得在幼年就深通俄、德、法三国语言，读了不少书籍。服尔泰，狄岱禄，达南倍尔诸人底著作便是他底幼年时代底好友。他一

一八三七年进炮兵学校，十六岁时就从事于诗歌底创作。在学校的时候，他尤爱读狄叶(Thiers)底《法国革命史》，过后他就接触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著作家底著作。一八四二年出校，四四年被任为炮兵学校底数学教师，一八五二年又做公士坦丁军事学校底讲师。他在这两个学校里教书，一直到他被逮捕的时候。

这时他已写了一些关于数学的和其他科学问题的论文，然而他底文字上的活动却开始于亚历山大二世朝代底初期。

他底第一篇引起公众注意的论文就是一八五六年写的《黑格尔哲学论》。后来他底论“个性”的一系列的论文更得着读书界底赞扬，这一系列的论文于一八六〇年印成单行本，在书内第一页上写着这书是献与赫尔岑和蒲鲁东的，在这书里我们可找出作者一生中的主要行动和根本学说底钥匙来。他主张每个人都不应该盲目地去服从传统及习俗底见解，各人应该把各种流行的思想严格地批判一番，拿实证科学底原理来做他底指导，为他自己创造出他自己底信仰，然后根据这信仰而行动于实际生活之中。“像我们底父亲和祖先们那样”而思想而生活，这不能够形成一个“道德人”，然而那些独立地思想，形成了自己底信仰，但却不能为实行这信仰之故而努力，而牺牲，这种人也是一个“不道德人”。

这些原理便是美学派的初期虚无主义之根柢，然而就为了阐明这种纯学理的见解，拉甫洛夫后来便不得不离开了他至爱的俄国。但是他在最后的三十年中却无一刻不以思想家之深沉，信仰者之热情，真正先知者之勇敢来阐扬发展这个

学理。

亚历山大二世一天天从自由主义走到专制政治，而拉甫洛夫也就以同样的比例从改良主义变到革命主义了。恰在一八六三年政府决定用武力镇压波兰叛乱的时候，拉甫洛夫便加入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和巧尔尼雪夫斯基结了亲密的友谊。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加拉考夫暗杀沙皇的事件发生后，政府方面立刻采行了恐怖政策：逮捕、流放的事接踵而起。拉甫洛夫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也就被逮捕，受着军事法庭底审判。他底罪名是写了四首“侵犯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底尊严”的诗，又和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甚密，而且办报宣传“捣乱的思想”。结果被拘留了九个月之后，在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拉甫洛夫便被流放到乌拉岭的一个小城去了。

在这半野蛮的地方，拉甫洛夫居然征服寂寞和困苦，把他那“个性论”著者底道德力很光荣地表现了出来。他一到那里就开始了他的文字工作，在各种俄文杂志上发表了許多长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与野蛮部族》与《道德》等篇。

他底名著是一本小书，《历史书简》，这也是在流放地中写成的。这部书后来便成了七十年代上半期“到民间去”的青年底福音书，是那时候革命青年底圣经，除了巧尔尼雪夫斯基底《何为》外，当时销行最广的书籍就要算《历史书简》了。在这些“书简”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底导师，他教导青年说他们对于人民所应尽的义务是很重的，他们在受教育时代，在大

学读书的年岁里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贫苦阶级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来帮助人民，报答人民。总之在本书中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见地来讨论“个性”在历史中的任务，道德之目标，以及一个智性地道德地发展了的人对于人民应尽的义务。此书对于俄国青年影响之大可从路沙诺夫(Roussanoff)底《拉甫洛夫传》中看出来：“啊！要明白《历史书简》对于我们周围的人之绝大的影响，要感到《历史书简》对于我们自己之绝大的影响，非重新生活在七十年代的‘到民间去’时代中不可。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是成年，有的还是小孩）都不肯和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分离，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底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之渴望。我们底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底大师底形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在我们底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叫我们前去为理想而苦斗。……”

一八七〇年二月拉甫洛夫得着青年革命党人乐巴丁底帮助，居然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在这年三月他就已安抵巴黎了。从此他便开始了亡命客底生涯，为他底理想而工作，在科学与革命两方面努力，支持了三十年之久。

拉甫洛夫到巴黎不久就被聘为著名《人类学杂志》底编辑员之一。同时他又结识了后来巴黎公社革命的殉道者瓦尔南(Varlin)，由瓦尔南底介绍加入了“第一国际”。次年巴黎公社

革命爆发，拉甫洛夫用全力帮助革命政府来组织学校的事务。但当时革命政府本身底存在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没有余力来实现拉甫洛夫底计划。拉甫洛夫又决意去运动各国革命党起来援助巴黎公社，抱着这个目的他便到布鲁塞与伦敦去，但都未得着好结果，而巴黎公社也被凡尔赛军队镇压了，拉甫洛夫便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这是巴黎公社文献中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在一八七三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份俄文的无定期刊，报名就叫做《前进》(Vpered)，次年《前进》移在伦敦出版，改为半月刊。拉甫洛夫编辑该报一直到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六年后他便脱离了《前进》，因为那时俄国革命党人从和平的宣传运动进到了恐怖主义运动，拉甫洛夫是不赞成用暴力的，他底主张便为在俄国的巴枯宁派所反对，而他自己也以为关于革命方法之选择应由在俄国国内的战士来决定，他只是一个脱离了实际运动的国外亡命者，是无权过问的。不过他自己底意见不是如此，所以决定脱离《前进》，暂时采取旁观的态度。

一八八〇年二月哈社林炸毁冬宫事件发生，民意社员哈尔特曼被捕于巴黎，俄政府要求引渡。这件事激起很大的风潮，拉甫洛夫营救哈尔特曼最力，结果哈尔特曼被释放了。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拉甫洛夫又再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民意社红十字会”国外部，因此在一八八二年二月被法国政府驱逐。于是他便移居伦敦，他底法国朋友们对法国政府驱逐拉甫洛夫的事极力抗议，结果法国政府答应把驱逐令取消。

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之间民意社在国外出版机关

报，拉甫洛夫也是编辑人之一，在这时候他攻击专制政治最为猛烈。一八九二年他又编辑了一种亡命者底秘密出版物《俄国革命运动史料》，自己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他底晚年的著作《思想史》两册共一千六百六十页的未完成的书，这是他一生学说之集大成的著作。这部书是世界底进化之天文学的、地质学的、人类学的、历史的研究，作者从生活与思想之过去的进化中看见现在那般合理的社会改造家之最大的梦是一定可以得着胜利的，因此对于一般为正义、真理以及人类之更好的前途而奋斗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但可惜书未完成，而作者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就死在巴黎了。

拉甫洛夫是一个实在论者，像旧虚无主义的思想家一样，他底社会主义是伦理的、个人主义的，他的出发点是一个人，所以他否认了一切束缚个人自由的强权，甚至也否定了国家。

他底学说底要点在个人底进步与发展。进步是在于个人底身体的、智的、道德的发展，又在于个人由当时的社会组织而认识真理与正义。社会的幸福不过是那般构成社会集团的个人底幸福，因此各个人有权利来改善现存的社会底形式。能够自己思考而具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是历史之真实的制造者；别的人（那般盲目地信从习惯传统的人）只是被动的东西。在后一种人里面，拉甫洛夫以为有两类：一类是统治阶级，他们极力把持着特权，信从那些历史的传统，他们顽固地坚持着不肯思考，批判；另一类是贫苦的劳动者，他们整日家忙着做工，被生存竞争耗费了全部精力，既没有功夫也没有心肠来思

考，批判。他们都是文明的牺牲者，因此有思想的少数人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启发这般牺牲者，使他们明白他们受苦的原因，使他们觉醒，以便来参加创造历史的工作，使他们经过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团结二者底发展向着进步的道路前进。

他说：“我们现在逼近一个时代了，那时候人道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那时候个人底有利益的倾向便会和集体的福利调和。人们和谐地组织起来，被集体的工作底共同利益连结在一起，而且共同为着寻求正义而活动，只有这种组织才能够造成个人底幸福。”

然而，孤立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他必须得到那般受苦的劳工群众底支持。倘使少数的知识分子永远孤立，那么文明也就会灭亡了。所以知识分子假若真正关心着个人底发展和社会底福利，他们应该离开他们底宝座走到民众中间，牵起那般劳苦同胞底下，把他们引到希望的国土去。一个优越的文明，要是想维持下去，它必须基础在民主主义上面，因为没有群众底支持，它一定会灭亡，再不然就会落在侵入的种族或少数野心家底手里。

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不道德的”。真正的道德的社会应该基础在正义上面，使全体人员可以合作来增加他们底幸福，而且努力使人类底受苦减少以至完全消灭。“利他主义将成为我们底新道德底基础，但这并不是神学的，或玄学的，它只是社会的。”

拉甫洛夫所要求的并不是部分的改良，而是社会底彻底的变革。但暴动的方法却是他所不赞成的。所以他主张不要

人为地去煽动人民反抗。他说：“革命是民众底历史的发展之结果，自然地起来的东西。不等待这个自然的勃发，而去人为地动摇社会，反会得着使民众苦痛的结果。”因此唯一的方法便在于启发民众。只有到后来他才赞成使用武力。

拉甫洛夫底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人格对于七十年代的俄国青年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而且他成了他们底精神的支柱，对那般“到民间去”的和平的宣传者，拉甫洛夫底《历史书简》是他们底鼓舞底泉源。他底完美的人格恰像一颗金星挂在黄昏的天际，给那些在昏暗中走路的青年一点慰安。而他底伦理的社会主义，更给那般怀着献身的利他渴望的青年们燃起了圣火。

现在我们再揭开一页，看看另一种和拉甫洛夫完全相反的典型。一个非道德的阴谋家，虽然他给了青年以坏的影响，虽然受着当时人们底非难，但他却意外地在俄国社会运动史上留下了深的脚印，这个人底姓名是赛尔该·奈其亚叶夫，杜思退益夫斯基还为他写了一部小说：《恶灵》。

第十章 奈其亚叶夫与秘密结社

巴枯宁一八六九年致居乐关的信说：“我们俄国青年也许是全世界中在理论上与在实际上最革命的青年，现在他们激动起来了，以致政府不得不把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的各大学各专门学校以及几个中学关了门。我这里有一个这一类毫无顾忌，不畏一切的青年热狂家底标本，他们是没有上帝的信仰者，没有空话的英雄。”这所谓俄国革命底标本就是奈其亚叶夫(Sergei Netchayeff)。

这奈其亚叶夫是怎么样的人呢？巴枯宁后来在另一封信里批评他道，

诚然奈其亚叶夫是我所遇见的最活动最有精力的人中之一个。说到为着他所谓的主义做事时，他毫无顾忌，决不踌躇，对于自己与对于别人是一样地严格。这种主要的性质便使我倾心于他，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愿与他合作。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骗子，这是不可靠的。他是一个忠诚的热狂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危险的热狂家。……他最初属于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结社在某个时期里确实存在于俄国。但后来就消灭了；所有的社员都被

插了，只有奈其亚叶夫一个人还留存至今，他一个人就组织成现在他所说的“委员会”。在俄国的团体被毁灭了，他便不得不到外国创造一个新的。这都是很自然，很平常，很有用的事——然而他进行这事所用的方法却是可恨的。……对于他，什么真理，互相信任，真实的严格的休戚相关只存在于那构成这团体底“干部”的十二个人中间。其余的社员都只是一个盲目的工具，这一打真正联成一体的人底手里所掠夺的东西罢了。这一打人有欺骗，陷害，偷窃，甚至消灭他们的义务。……他要侦探你，极力想知道你底一切秘密，等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在他底屋里侦察你底秘密，他要打开你底抽屉，读你底往来信件，如果他发现了一封有关系的信件，就是说在某一点上可以陷害你或你底朋友的信件，他便偷了去，小心地收藏起，作为一封可以要挟你或你底朋友的文件。他对于O（阿加列夫）与达达（赫尔岑的女儿）以及其他的朋友就这样做过了，而且当我们在一个大会里证明出来时，他公然回答道，“好，这正是我们底制度，凡不是完全赞同我们的人，我们都应该视为敌人，我们底责任正是去欺骗他们，陷害他们。”这所谓“他们”就是指那些不相信这种制度而且更不愿自己去实行的人。如果你介绍一个朋友给他，他底第一件事就是散布谣言，乱生是非来离间你们，总之激起你们争闹。你底朋友若有一个妻子或女儿，他要设法诱奸了她，使她生下一个小孩，为的是逼迫她不得不破坏现在公认的道德，投身在对于现社会之革

命的反抗运动里面。……不要以为这是夸张的话，这一切都是有很好证明的。奈其亚叶夫看见他底面具被揭穿了，他还是如此直率像小孩子似的，他还相信会把我底意见改变过来。他甚至要求我答应把这种理论在他预备出版的俄文杂志上阐明出来。他卖掉了我们大家对于他的信心，他偷去了我们底信件，他极厉害地陷害了我们——总之他做了一个恶人。他底唯一可原谅的理由，就是他底热狂。他是一个野心到了极点的人，然而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后来竟把他自己本人认作革命的目的。不过他也不是一个最坏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也常常拿自己来冒极大的危险，过着殉道者般的生活，过着贫困的，寂寂无闻的生活。他是一个热狂家，他底热狂竟使得他成了一个完全的狡诈者；有时他也变成了一个蠢虫。他底谎话大部分都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不管这种比较的直率，他却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他每天都做坏事，弃信背盟，阴谋陷害，人们很难防备他，因为这样的事差不多使人疑为是不可能的了。有了这一切，奈其亚叶夫就是一个力量，因为他是一个绝大的精力。我要和他分离，很感困难，因为我们底运动正需要着许多的精力，而发展到这种地步的精力更是少见的了。然而我用尽了一切方法都不能说服他，我只得决意和他分离，而且一经分离之后，就应该和他拼命相战了。（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致达南第尔信）

这样的人确实是稀有的。不管我们憎恨他也好，讨厌他
也好，然而我们总不能轻易视之，多少总要受他一点影响。依
他底行为看来，他乃是现社会中所谓最坏的恶人。项脱说：
“他是一个说谎者，一个小贼，一个谋杀犯，他是憎恨、恶意与
复仇三者之化身，只要有利于他所说的革命，他可以犯任何的
罪恶来对付朋友和仇敌。”比洋司托克在他底《俄国革命运动
史》中也说巴枯宁对于奈其亚叶夫的批评是最公正的。“他把
所有的人甚至他底朋友都视作象棋的兵卒，随时可以把他们
牺牲”。自然我们现在反对这种战略，因为正如一个俄国革命
党人所说“他把那些致革命的死命的概念与习惯介绍到了革
命活动底中间”，这就是说他底战略非但不能有利于革命，反
而危害着革命的。然而奈其亚叶夫并非理论家，他想得到他
就做得到。他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实行家。他底生涯是和
他底理论一致的。

奈其亚叶夫生于一八四六年，出身贫家，十六岁入莫斯科
大学，深恨贵族底专横，而怜悯贫民底苦痛的境遇。一八六五
年加入奈费得夫团。我们从该团另一个团员底《回忆录》中，
可得到一段描写青年奈其亚叶夫的叙述：“在一八六五年秋天
奈费得夫介绍了一个青年加入团体，这是却列麦既夫伯爵底
农奴底儿子。他有十八岁，面貌柔弱；眼里放射光辉，表示出
非常的精神，举止笨拙。他打算做小学教师。他常到大学去
自由听讲，在我们底集会里，他很少发言。我和他交情还好。
他在试验过后就到彼得堡去，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市立小学教
师的位置。三年后这个谦逊的沉静的少年就成了轰动俄国和

全世界的一幕悲剧之主人翁了。奈费得大所介绍入我们底团体的新团员就是奈其亚叶夫。”

一八六八年正是大学生闹风潮的时代。教育总长托儿斯太采行极端专制的手段来压迫学生。学生底一切集会皆被禁止，而且他们底一切行动都要受着警察底监视。许多的大学生因为一点小小的事就得着开除的处分。这样一来，无异火上加油，非但不能平静风潮，反把风潮扩大，驱使青年学生加入到革命党底队伍里。这时候奈其亚叶夫在彼得堡的青年学生中间很活动，他底目的在使学生风潮多含政治的性质，他以为这可引起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学生的同情。他说：“革命是免不掉的，看起来革命是唯一的结局，因为政府拿一只手来开学校，又拿那一只手来阻止大学生在学校中读书。”他已草成了他底革命的纲领，而且很广地散布于学生中间和社会里面。在这纲领内他把学生运动和全俄人民底伟大的革命目标连在一起，他以为“应该尽量地创造出许多革命的典型人物，又要在社会中培养革命底必然性与可能性之意识，革命才是达到较好的生活情形之秩序的唯一方法。”

一八六八年三月彼得堡军医学校起了风潮，随后工业专门学校和大学也都起了风潮。学生向政府提出要求，允许学生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并改善教育的设施等。政府不收学生底呈文，反把那些最热情的学生逮捕了，先开除他们底学籍，然后把他们驱逐出首都。在这时候学生们散发了许多篇宣言，大部分都是抄写的；其中有一篇《告公众》却是印刷品，是出自一个青年学生特加焦夫(Tkatchov)底手笔。这篇宣言激

动了秘密警察，因为这证明出来在彼得堡有一家秘密印刷所存在着，其结果大批的逮捕发生了。奈其亚叶夫底许多同志们也被逮捕了。在这时候，他确实成了风潮里面的一个重要分子，他已屡屡宣传“到民间去”，他说所有诚实的人都应该离开书斋，“到民间去”，而且差不多在每次学生集会中他都要拿他底雄辩来煽起同学底革命精神。总之他已经不再是“谦逊的，沉静的少年”了。他这时还有一种习惯，爱吮自己底指甲，常常吮出血来他也不顾。这样的人自然逃不掉秘密警察底注意的，不久，在一八六八年年底奈其亚叶夫也被逮捕了。

有一天奈其亚叶夫底姊姊接到两张纸条，一张上面写着：“我走桥上经过，遇着了一辆载囚犯的马车，有人从车里向我掷出一张纸条来，我听见了一个我所敬爱的人底声音，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把这纸条转送到目的地。’我就急忙送来了，并且我又转面请求你：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请你毁掉我底纸条，免得有人认出我底笔迹来。——一个学生。”在奈其亚叶夫底一片破纸上胡乱地涂抹着几个字，“人们把我带到堡垒里去了，不要失掉勇气，而且要设法救我。如果上帝还愿意我们再见呢！”转送这两张纸条的人，是一个十三岁的女郎。这个女子在十年后就闻名全世界了。她底名字是：薇娜·沙苏丽奇。

奈其亚叶夫底姊姊和她底女友柯尔利诺瓦到处奔走打听消息，也没法知道他究竟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后来消息传遍了俄国青年中间：奈其亚叶夫脱逃了。

实在奈其亚叶夫是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内。有一天他把

将官底外套偷到手，装成一个军官从堡垒底便所里逃脱了。在阿德沙再被擒又再逃脱，步行了五十俄里走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借了一个朋友底护照，假名尼科奈叶夫向伦敦出发了。

奈其亚叶夫在伦敦会见了赫尔岑，给了赫尔岑以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他这样的人自然是赫尔岑所讨厌的。但他后来（一八六九年三月）在日内瓦会见巴枯宁时，却深得巴枯宁底赞美，这我们可从巴氏当时致居乐美的信^①中看出来。在这一年里，他和巴枯宁往来甚密，共同讨论和应付俄国革命运动的事。巴枯宁受了他底感动，在他底影响之下写了著名的《革命问答》和其他的小册子，皆由奈其亚叶夫秘密输入俄国，散布于俄国青年中间。《革命问答》一书没有印本，原稿存在奈其亚叶夫手边，在俄国的秘密结社中留了一份暗号底本，后来在法庭宣读之后才得为世人所知。奈氏又和巴枯宁联名发了一篇《告俄国学生》的宣言，劝他们抛弃“空疏的知识”，离开大学到民间去。他们说，俄国人民现在处在与亚历克西斯治下司禄加·拉进现身于一个可怕的叛乱之首的时代相同的情形里面了。青年人应该离开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过着平民底生活，他们应该成为一个集合的拉进，置身于解放战争之首，使这场大战得着全胜。他们应该煽起农民发生叛乱。

同年九月他负着组织“人民法庭”这个秘密团体的使命回到莫斯科。他底一切行动都假借着“中央委员会”底名义，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就是他一个人。不过他带回了阿加列夫献

① 见本章开始处。

与他的一首诗，和巴枯宁亲笔写的证书，承认他是“第一国际”底一个会员。加以奈其亚叶夫又有光荣的历史和热烈的辩才，所以俄国革命青年都跑到他底身边来了，奈其亚叶夫差不多成了俄国革命运动底独裁者。他立刻成立了“五人团”，这“五人团”指挥着所有其他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法庭”。他很快地组织了不少的团体，并且从学生，甚至于资产阶级、小商人、军官、贵族妇女中找到不少的社员。不到一月他找到了一百五六十个社员。他底假名很多，有时就叫做“二六六四号”。他底面貌装束也是时常改换的。他同时又在彼得堡设立了九个区部，又在俄国三十七省内成立了不少的团体，我们可以说他是把俄国革命团体底基础建立起来的人。

奈其亚叶夫这时确实实行了他以前的主张，他自己做了革命团体底“君主”，把其余的党员当作他一个人底盲目的工具。“五人团”中的伊凡诺夫（一个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忽然被奈其亚叶夫谋杀了。据说伊凡诺夫要求退出这个“五人团”，奈其亚叶夫恐怕他以后泄露团体底秘密，便决定杀之以灭口。一天晚上奈其亚叶夫把伊凡诺夫诱到了一个花园里，得到了两个“五人团”同志蒲利约夫与尼科奈约夫底帮助，一枪打死了伊凡诺夫，把他底尸体抛在池子里面。

后来在这个农业学校花园底池子里，伊凡诺夫底尸体浮到了水面上来，给人看见了。政府方面发现了真相，开始搜索革命党人。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两处逮捕了八十七个革命党

人。两年后，直到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才在彼得堡开庭审判。其中蒲利约夫等四人受苦役的处分，其余的人，有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有的被监禁在堡垒。而奈其亚叶夫呢，他在事发后就逃到瑞士去了。一八七一年的审判就叫做奈其亚叶夫团审判，对于当时的青年有绝大的影响。

究竟奈其亚叶夫为什么要杀死伊凡诺夫呢？真正原因，我们很难知道。俄国革命运动历史家中有的说伊凡诺夫是一个野心家，想离开奈其亚叶夫另组织团体；也有人说伊凡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宁肯自己受饿而去开设廉价的饮食店，然而奈其亚叶夫在那里张贴了许多革命党宣言，以致警察把这些饮食店统统封闭，伊凡诺夫因此灰心，要求脱离团体。到底这两种说法，谁是对的呢？我们不能确然断定，不过承认第一种说法的人较多。奈其亚叶夫说伊凡诺夫是侦探，这不一定靠得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主张说谈话的人。总之这件事发生后，奈其亚叶夫底声名在俄国也就开始扫地了。

他到了日内瓦又和巴枯宁等发生关系，他假借着俄国革命党委员会底名义，居然使得阿加列夫在赫尔岑死后把一笔巨款交付与他，要他转到委员会去。其实所谓委员会只是他一个人而已。阿加列夫后来问他要委员会底收条，他不答应，于是阿加列夫、巴枯宁对于他的信心便渐渐消失了。在七月中旬奈其亚叶夫忽然不见了，过后巴枯宁和其他的俄国亡命者便发觉出来奈其亚叶夫偷去了他们底文件和重要信函。巴枯宁便开始和他决裂。前面所引的巴枯宁致伦敦友人达南第尔的信就是决裂后写的。巴枯宁在五月里写给达氏的信里还极

力赞美奈其亚叶夫，然而两月以后，奈氏底面具已被揭穿了，他还到伦敦去会达氏，所以巴枯宁便有那样的信。

奈其亚叶夫在伦敦出了两期《公社》，攻击巴枯宁、阿加列夫非常厉害，然而这时候奈其亚叶夫底言论已引不起人们底注意了。

奈其亚叶夫后来又由伦敦到瑞士苏黎世，在一八七二年尾，俄国政府以杀人犯的罪名要求苏黎世当局将奈氏逮捕，引渡回俄。在奈氏未被捕之时，俄国亡命者中已有人得到了这种风声。巴枯宁等在他被捕以前十几天曾找人间接去警告他，他说：“这一定是巴枯宁派设法骗我离开此地。……这和一八七〇年的情形不同了；现在我有朋友在柏林的联邦政务会里；如果有危险我一定会先接到报告，”然而他终于被逮捕押送回了俄国。

奈其亚叶夫被捕后，旅居瑞士的俄国亡命者曾发出宣言反对他底引渡，他们说伊凡诺夫只是一个侦探，因此这件谋杀案便是政治上的谋杀，政治犯是不能引渡的。然而他们底反对并没有效果。

这次的被捕倒算救了奈其亚叶夫。因为如果奈其亚叶夫就长此在外国住下去，也不能恢复他底信用，革命党人已经完全离开他了，那么他晚年的生活也一定会是寂寞苦痛的。然而这次的逮捕以及其后的监狱生活却表现出他底坚强的意志，他底牺牲的精神和他底铁石般的心，这样使得他又把伊凡诺夫底血迹洗涤净尽了。

奈其亚叶夫被押送回俄国以后，这年十一月二日巴枯宁

自洛加诺写信给阿加列夫说：“这共和国把不幸的奈其亚叶夫引渡到俄国去了。……他将像一个英雄底样子而牺牲了，这一次他不会背叛任何人，也不会背叛主义的。……我不知道你底感想怎样，然而至于我呢，我却十分怜惜他。在我一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于我做了许多的坏事，他从各方面陷害我，然而我却也很怜惜他。这是一个具有稀有的精力的人，我们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底心里还燃烧着对于那不幸的俄国人民的爱；他底灵魂里还留着对于我们俄国历史的和人民的灾祸之真正的苦痛。……”

奈其亚叶夫审判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刑事法庭开始，他不要一个律师，在受审的时候他底态度始终是异常傲慢的。裁判长问他是否承认犯了谋杀伊凡诺夫的罪，他依然坐着，回答道：“我是一个侨居外国的人，我已经不是俄国底臣民了；我轻视你们底一切诉讼手续；我若让你们来裁判我底行为，真是我底奇耻大辱。我已经不是你们底专制之奴隶了。”

这样他就被驱逐出法庭，然而在走廊上他又和卫兵起了冲突，于是又被引回法庭里。检察官提起公诉，详细地叙述了奈其亚叶夫底罪名以后，审判长问他有无辩护的话，他回答道：“我觉得要来辩护这尽人皆知的诬陷我的流言，实是我底大辱。全俄国的人民都知道我是一个政治犯。我现在重复地说我曾向奈瓦雪夫伯爵说过的话：‘政府可以拿去我底生命，然而我底荣誉是它所不能拿去的。’”

审判结果，奈其亚叶夫得着二十年的苦役和放逐到西伯

利亚的刑罚。判词读毕后，奈其亚叶夫答以“打倒专制政治！”之呼声。

这一次的审判和一八七一年奈其亚叶夫团审判一样是绝对公开的。政府底本意想借这两次审判来毁坏革命党人底名誉，引起社会对于革命党人的恶感。然而结果正如拉坡颇尔特在他底《俄国革命之先驱》中所说，是适得其反。“社会反对奈其亚叶夫底战略，然而它不能不赞同并且称许他底理论。我们可以憎恨在一个运动之首的那些人，然而我们却要尊重这运动中的基本思想。这审判证明出来是一个关于反抗精神的优美的宣传，因为它雄辩地解说出革命党人底理论，而且传播政府所正急欲压制的思想。所有的被告在裁判官前而的行为都是极其勇敢的，因此得到了旁听者底全心灵的同情，他们不能不把这些被告视作为着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的之殉道者。学生们特别为各被告底高贵的行为与崇高的目的所感动了。他们反对奈其亚叶夫这个人，然而他们却赞美他底思想。对于实行之渴望，以及在许多人心灵中的睡眠着的革命之倾向突然醒起来了。”拉氏底话是根据模克利维奇底《回忆录》来的。

事实上奈其亚叶夫并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内的阿奈克西斯半月堡里面，他被活埋在这里整整过了十年，一直到死。就拿他底监狱生活，他也足以使专制者胆寒了。在监狱中的奈其亚叶夫，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傲然地直立着。

他入狱时，他底邻近的囚室里住着一个近卫将校。这个

近卫将校因和长官冲突得罪，后来忍受不下监狱的苦，便发了狂。每天晚上在别人睡眠的时间，他时而哭泣，时而狂笑，时而叫骂，时而怒吼。奈其亚叶夫对于这种搅乱神经的骚动一点也不动心，他安静地读书，而且设法与外界通消息筹划革命的事，他一进狱里就上书于司法总长和沙皇，说他在瑞士如何被捕，如何被引渡到俄国，政府对付他的办法都是极其卑鄙，而且审判又全不合法。实则政府曾经和他交涉过两次，第一次奈瓦雪夫伯爵代表“第三区”（秘密警察署），要他供出革命党人底姓名，革命党底内容，计划等等，他愤怒地拒绝了。三年后宪兵司令官波达颇夫将军又来向他提出这个条件，他这一次的回答是更粗暴：他突然伸出手来在波达颇夫将军底脸上用力打了一下，打得他口鼻流血。这件事过后，奈其亚叶夫就被加上了镣铐，用重铁的锁把他锁在石壁上，晚间便横在冰冷的石床上。读书写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然而奈其亚叶夫横在石床，身带重铁的镣铐，听着邻室狂人底骚动，这样的过了两年，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不颓丧，一点也不屈服。没有了墨水，他用了他底血写了许多封信。他底意志力竟坚强到这地步，这样的人，古以来能有几个！

两年过后当权的人又换了许多，奈其亚叶夫底名字已渐渐被政府忘记了。因此人们除掉了他底镣铐，打开了铁锁。后来他又用绝食的方法要求写信、读书及收受新刊书籍之权利，不进饮食者凡七日，终于得胜了。这时候正是奈其亚叶夫底得意的时期，他把囚室当作大本营，开始了他底革命的宣传。他用了种种方法来催眠狱吏，研究禁卒底心理状态，刺

探各种秘密，巧妙地欺骗他们。按监狱里的规则，他是不许和禁卒谈话的，所以他每每当着禁卒在他身边的时候一人低声独语，他说他是为他们（禁卒们），为农民，为人民而牺牲的。他又说他在宫廷里有很重要的关系，皇太子是帮助他的，他之所以得除掉了镣铐，也就是靠着这般人底力量。他自从打了波达颇大将军以后就得到了禁卒底尊敬，渐渐地，他们不仅敬他，而且爱他，甚至有他而骄傲，他们提起他时，称他为“我们底老鹰”。

一八七九年梭洛维也夫暗杀沙皇的事件发生后，在禁卒们底眼里，奈其亚叶夫底身分更抬高了。他欺骗他们说这是皇太子想推倒亚历山大二世的阴谋。禁卒们由是更相信他，而且忠心于他了。他得了禁卒们底帮助，把这堡垒内的地理形势和守备状态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同时又明白他已经得着了大部分守兵底信任，所以他决定了一个计划：某一天全皇族要到堡垒内的礼拜堂来，那时候他便占领全堡垒，把沙皇和皇族一起囚在堡垒中，同时宣布皇太子即位。

然而两个同囚的政治犯西利亚叶夫与米尔斯基反对这种计划，他们设法和民意社执行委员会底重要人物热利亚博夫通消息，据说热利亚博夫居然化装亲身到堡垒来见奈其亚叶夫，说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个计划不可实行；执行委员会以为可以设法使半月堡中的囚犯全体逃狱。奈其亚叶夫同意了执行委员会底建议，然而要进行他底逃狱计划，需要着钱来做运动费，这时候执行委员会正在进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缺乏金钱。所以执行委员会便叫奈其亚叶夫自己决定究竟在他

底逃狱与暗杀沙皇这两件事中，应该先做哪一件。奈其亚叶夫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暗杀沙皇”。

奈其亚叶夫常和民意社多数社员通信，苏菲亚也是他底通信者之一，他在监狱里的十年中也曾制定了不少的革命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是在迷信沙皇很深的省里假造了一道沙皇底诏令，说应允了贵族底要求，将农民还与原来的主人，延长军役年限，毁灭一切异教教堂等。这样自然会激起人民底暴动。同时又假造圣议会（宗教议会）底“密令”给各僧侣，说：“万能上帝降祸俄国。新皇亚历山大二世患疯狂之疾。各僧侣为不致泄漏国家秘密起见，应该秘密祷告上帝，早使新皇痊愈。”奈其亚叶夫以为僧侣底口是闭不住的，他们一定要向人说，社会因此会起恐慌，那时候再用所谓“全俄国”（大俄、小俄、白俄）主教会议底名义发表宣言给农民和军队，说，已决定分配土地，取消军役，凡有反对此宣言之实行者应被逮捕而受裁判。

这个计划是早年制定的，被当时的革命团体所否决了，但司特范诺维奇在一八七七年煽动齐基林县叛乱时却曾采行了这个计划。

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虽专心去做暗杀沙皇的事，但同时也沒有忘记帮助奈其亚叶夫逃狱的事。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不久，苏菲亚被捕了，在她那里，警察搜出了几个堡垒守兵底妻子和情妇底地址。这件事又暴露了，奈其亚叶夫底逃狱阴谋终归失败。政府举行大搜查，堡垒管理者波哥若德次基等也因此被捕。以后奈其亚叶夫便又受严酷的待遇，到后来他究

竟被囚在何处也无人知道了。一八八二年五月八日的晚上奈其亚叶夫和平地死在囚室之中，据说是得肺病而死的。当时谣传奈其亚叶夫是被绞死的，不过至今尚未证实。

前次搜查的结果，证实了堡垒底守兵曾受了奈其亚叶夫底革命的宣传。审判后被定罪者二十五人。其中一部分被判作苦工，一部分被送到纪律严厉的军队里去。从此果如陈加所说，这个“虚无主义诗篇之使徒与圣哲”奈其亚叶夫“像哑剧里的一个魔鬼一样地下去不见了。”

然而格林斯基 (Glinsky) 更说得好：“奈其亚叶夫从天边下去了，但是他底影子在此后很久还长留在俄国革命运动上面；他拿他底一个热狂的精力，他底以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战斗必然有流血的终局之信仰做一个实际的例子，不断地鼓舞着俄国底革命运动。”

奈其亚叶夫不是一个理论的人，而是一个实行的人。他之感动人，全在他底行为。他早年虽然犯了不少的过失，但他底最后十年监狱生活却把他底一切罪恶洗涤净尽了。世人称巴枯宁为奈其亚叶夫底先生，底主人。巴枯宁确是深知奈其亚叶夫的一个人，奈其亚叶夫果如巴枯宁所说，像一个英雄，一个殉道者底样子而消失了。最后一次他确实不曾卖掉任何人，也不曾背叛主义的。在理论上奈其亚叶夫是巴枯宁底学生，他是巴枯宁一八七二年以前的学说之信奉者；然而在战略上，他确实是一个独创的人。他底战略虽然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所否定，但在恐怖主义者中间我们仍然看出强大的影响来。巴枯宁被某一些人误认为恐怖主义之父，其实可称为

恐怖主义之父的应该是奈其亚叶夫，他在 一八七〇 年曾作出一个被他判决死刑的官僚底姓名表，在表上头一排有两个人，就是特列颇夫与麦孙采夫将军，在一八七八年这两个人都被恐怖主义者刺杀。第一个被沙苏丽奇暗杀未死，第二个就被司特普尼克杀死了。这也是一件巧合的事。

奈其亚叶夫在黑暗的牢狱里消失了，他底名字早已被人忘记，但是他底影响虽然有一部分是不好的，却多活了许多年代。他可以说是秘密结社的阴谋家底最完全的标本。在地底下的运动中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好像是一个连环，把旧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连结起来的。他好像是一道桥，是从宣传通到实行的。所以到了他，我底这部运动史话底第一卷才得完成。这第一卷只是一个序幕，以后才是热闹的正戏。

从第二卷起我们将不再叙述少数卓越的个人底生涯与活动，等到新的帘幕揭开时，显现在我们底眼帘前的将是团体底活动与无数男女青年底牺牲底壮剧了。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现在轮着我来说第二十一卷了。关于这一卷我有话可说，编印《全集》，收进这三本著作，原非我的本意。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作家，对待自己的旧作我不够严格，却每每笔下留情。写作这三本书的时间都是在《灭亡》的前前后后。它们都是写在练习本上的，用练习本写作，这说明我是学生，不是作家。我翻开书页，就仿佛听见巴黎圣母院的沉重的钟声。

三本书中《断头台上》最先完成，这是一部报告文学的集子，也写到我当时参加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和我在法国的那一段生活。第二年十二月我回到上海，生活告一段落，集子也印出来了。第二本书是《俄罗斯少女杰》，我离开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时就脱稿了。索非没有能推销出去，我就把原稿拿回来送到我们熟悉的太平洋书店编辑部，稿子马上给接受了，因为我不要稿费。这书问世在《灭亡》之前，太平洋书店印过两版，共二千册。不过作者署名不同，不曾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三本书出版较迟，在三六年，也印过两版，是作为巴金的著作出版的。其实它是一部残稿，我二八年动笔，当时打算写一部五本头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可是只写了一本

就搁下了。在沙多—吉里那个中学里，我读书较多，大都是关于俄国革命者的著作，是伦敦自由社的一位英国朋友托玛斯·基尔(Thomas Keell)替我借来或买来的。我以前也读过这一类的书，现在收集的正是同一类的材料。读者不难看出三本书中重复的地方。固然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是我当时最崇敬的人，我也用不着同时写两篇她的传记，在另一本书中保留一个目录或摘要就行了。可见我经常不动脑筋，不肯独立思考。但是我五、六岁的时候，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先入为主，我至今还不曾摆脱它。

三本书都是在沙多—吉里写成的。材料的来源是共同的，写作时的心境也是类似的，的确出自一个人的笔下。十一年前我意外地重来这个地方，依旧是中学饭厅的楼上，依旧是漆着白色的宽敞房间，似乎“哲学家”还在隔壁吟诵陆游的诗，我只停留了那么短的时间！我不由自主地到处寻找一位老太太慈祥的笑脸。我始终忘不了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一九二八年我和“哲学家”离开学校时仿佛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我带着她的祝福回国，很遗憾，重访玛伦河畔，我没有能在她的墓前献一束鲜花。

就是在这十分短暂的时间里，我也曾想起在饭厅楼上写成的书。年轻时候我写小说像在寒夜点燃篝火，一心要它燃烧到天明。但是过了几十年我再回想旧作，只能断断续续地挖开记忆的坟墓，在骨灰盒里找寻残灰了。

通过上面那些话我只想说明：了解我六十年前的旧作可能比当时困难。在同一时期、同一环境、用同一材料写成的凡

部作品为什么不能互相启发、互相解释呢？可以用我自己的话来回答：我的生活里充满矛盾，我的作品中也如此。第四卷付印的时候我对你谈起我的处女作《灭亡》，我说这也是一部分青年挣扎着前进的声音，虽然幼稚，却又是多么真诚。今天最后一次回顾过去，我在六十年前的“残灰”中又看到自己的面目。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在燃烧，留下一堆一堆的灰，一部作品不过是一个灰堆。尽管幼稚，但是它们真诚，而且或多或少地灰堆中有火星。

在那个时期有两位朋友给我很大帮助，对我影响较深。他们就是与我同去法国的卫和在巴黎的里昂车站迎接我们的吴。他们对我非常慷慨，我用在书中的一些知识，一些议论，一些生活，不少来自他们。我汲取了各种养料，至今不曾感谢他们。只有声明搁笔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想着：倘使当初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路的确是人走出来的。

巴 金 1990年6月20日。